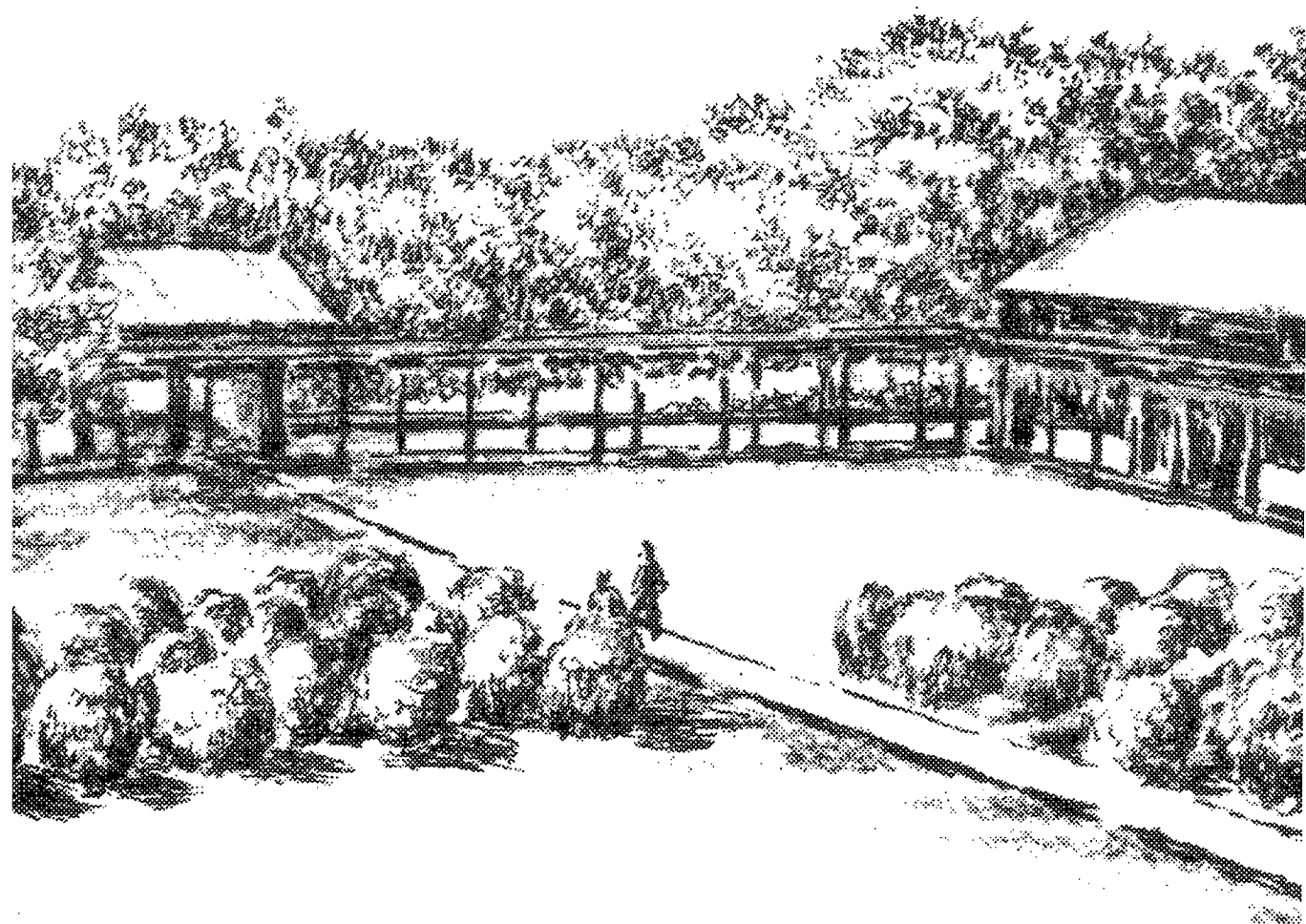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四十四卷



東海大學文學院出版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第四十四卷

Volume 44

發行人 Publisher

王亢沛 Wang, Kang-pei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召集人 Chair

黃海雲 Huang, Hai-Yun

執行編輯 Editor in Chief

吳福助 Wu, Fu-Chu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殷偉芳 Yin, W. F.

陳計堯 Chan, Kai-Yiu

鍾安妮 Chung, Annie

何淑靜 Ho, Shu-Ching

萬胥亭 Wan, Hsu-Ting

工藤節子 Kudo, Setsuko

助理編輯 Editorial Assistant

林威宇 Lin, Uei-Yu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出版

Published in July, 2003

封面、封底繪圖：陳瑞洲

刊名：清陳鴻壽書體 陳菽玲集字

出版者：私立東海大學 Published by Tunghai University

印刷者：鴻輝印刷廠有限公司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第四十四卷

### 目 錄

#### 〔論文〕

- |                                                                                                                      |      |     |
|----------------------------------------------------------------------------------------------------------------------|------|-----|
| 1. 先秦華夏民族的宗教信仰                                                                                                       | 鄺芷人  | 1   |
| 2. 《詩經》之敘述視點及視點、聚焦模糊詩篇詩旨問題探討                                                                                         | 呂珍玉  | 36  |
| 3. 棄婦的悲歌——試析唐代詩人魚玄機與臺灣詩人王香禪                                                                                          | 許惠玫  | 63  |
| 4. 林和靖詠梅詩對後世相關詩題創作的影響                                                                                                | 歐純純  | 90  |
| 5. 生死關懷與生命美典的書寫<br>——以方苞傳、祭文、哀辭、墓表、墓誌銘為視域                                                                            | 林淑貞  | 108 |
| 6. 從《廣雅疏證》看王念孫的詞族研究                                                                                                  | 徐興海  | 138 |
| 7. 彈詞小詞《天雨花》的女性書寫特徵                                                                                                  | 朱我芯  | 159 |
| 8. 藍鼎元《東征集》的文學表現                                                                                                     | 林翠鳳  | 183 |
| 9. 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探析                                                                                                     | 向麗頻  | 204 |
| 10. 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                                                                                               | 黃美娥  | 222 |
| 11. 懷海德與後現代世界觀                                                                                                       | 俞懿嫻  | 247 |
| 12. From English Orthography-Phonology Correspondence to<br>Phonics Instruction                                      | 王啟琳  | 280 |
| 13. From Reading to Hear-Say:Hemingway's Literature Marketing<br>Strategy in Allying the Readers against the Critics | 陳順龍  | 309 |
| 14. 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育てるプログラム                                                                                         | 工藤節子 | 338 |
| 15. 『日本書紀』判斷文                                                                                                        | 北川修一 | 362 |

#### 〔書評〕

- |                                                                |                |     |
|----------------------------------------------------------------|----------------|-----|
| 1. 《〈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評介                                             | 張顯成            | 390 |
| 2. 《簡帛發現與研究》評介                                                 | 陳文豪            | 397 |
| 3. 星光燦爛的文學天空——《苗栗文學讀本》評介                                       | 許俊雅            | 402 |
| 4. 《張文環全集》評介                                                   | 林政華            | 409 |
| 5. 《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評介                                             | 林珠雪            | 414 |
| 6. A Review of David Crystal's English as a Global<br>Language | Russell Morano | 422 |

# 先秦華夏民族的宗教信仰

鄭芷人\*

## 【提要】

宗教生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環節之一，研究先秦「華夏民族」的宗教活動，這除了是「宗教史」問題之外，也與文化、社會、哲學、史學等問題的研究，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遠古時代，文獻不足徵，故本文在可信的文獻資料中，以「甲骨文」、「金文」，以及《六經》中的《書經》與《詩經》為主。從甲骨卜辭中，殷商時代是多神信仰，而上帝則被視為人間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雖然，《尚書》把上帝人格化，具有喜、怒、憐恤之情。但是，到了西周，《書經·周書》與金文所表現的「天道」觀，非常相似，上帝的觀念逐漸與形上的「天道」觀念混合。例如，在鐘鼎銘文中，上帝基本上只代表著一個像徵公義、德行的神明，祂是藉著「天命」來表現祂的公義。在另一方面，周王的德行又非出於遵守上帝所「啓示」的律令，而是出於人類德性的自覺。此外，「天命」乃以德行為依據，在這個意下，天命的流行與人類的自我造命沒有差別，這個假定避免了定命論的思想。進一步說，西周社會已逐漸形成一神教，並以上帝意旨作為德範的基礎。這種天道思想，由墨子繼承下來，作為其所謂「天志」的理論基礎。因此，順著「天志」或《書經》、《詩經》的天道觀，先秦的華夏民族原可發展出「一神教」的宗教生活。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如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東周以後，儒家以人文精神取代了宗教信仰。到了孟子，更企圖為德教的人文精神進一步建立理論基礎，他一方面提出四端說，另一方面又以心性取代天道。儒家既沒有開拓出宗教，然而，宗教生活卻又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環節，故到了東漢，一方面從印度傳入佛教，另一方面，道教也在中土醞釀而出。

關鍵詞：華夏民族 宗教 甲骨文 卜辭 鐘鼎銘文 書經 天道。

\*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 一、關於華夏民族

宗教生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環節之一。「華夏民族」的歷史淵源流長，不僅是當今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之一，而其可溯源的、並且是信而有徵的歷史與文化，也是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難以匹敵的。例如，1927 發現「北京人」化石<sup>①</sup>，距今有 50 萬年，1954 年發現「丁村人」化石<sup>②</sup>，1930 年發現「山頂洞人」化石<sup>③</sup>，1951 年發現的「資陽人」<sup>④</sup>。在文化考古方面，1921 年發現「仰紹文化」<sup>⑤</sup>，1928 年所發現的龍山文化<sup>⑥</sup>，以及殷墟的發現<sup>⑦</sup>等，皆表明華夏民族的歷史悠久。然而遠古時代，文獻不足徵，故本文之目的，乃在於從可信的文獻資料中，分析地展示先秦時代「華夏民族」的宗教信仰。本文有關古代華夏民族「宗教」的討論，是指源出於華夏本土的宗教而言。文獻是以「甲骨文」及「金文」，作為華夏文明最早期的可靠文獻。其次是《六經》中的《書經》及《詩經》，因為此二經典在《六經》中，最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實際宗教信仰。至於儒、墨對宗教之言論，只反映當時的思想界對宗教之主張。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討論前者，而後者則只能在結論中指出其要旨。至於原自本土的道教及源自印度的（但是又經過了本土化的）佛教，吾人另將有專文討論。

「華夏民族」的「夏」字，最早見於《尚書·堯典》，所謂「蠻夷猾夏」，其中的「夏」可能是指夏代人對夏朝的疆域之稱謂<sup>⑧</sup>。「華」字作為

---

① 北京人，于 1927 年在北京西解 48 公里的周口店山洞被發現。從 1927-1937 年間，發掘頭蓋骨 5 個，頭骨碎片 9 塊，面骨 6 塊，下頷骨 14 具，牙齒 147 個，斷裂股骨 7 段，肱骨 2 段，鎖骨及月骨各 1 件。1949-1951 年間，又發掘得牙齒 5 個，肱骨及脛骨各一段。見翦伯贊鄭天挺主編之《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未註明年份），pp.153-163

② 1954 年，在山西襄汾縣丁村發現三枚人類化石牙齒。考古學家推測丁村人與北京人之時期相近或稍晚。又於同一地點發現石器和石片二千多件。

③ 山頂洞遺址位於周口店西端的最高處，於 1930 年被發現 7 具男女不同的個體，石器 25 件，也有骨器及裝飾物。

④ 1952 年在修建成渝鐵路時，在四川資陽縣黃鵠溪橋基旁所發現之頭骨，考古學家認為資陽人與北京人及山頂洞人是有一定的關係。

⑤ 1921 年在河南滎池縣仰韶村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

⑥ 1928 年在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發現陶片、石器及骨器等器物，稱為龍山文化，其年代約在西元前 2900-1700 之間。

⑦ 光緒年間，河南安陽小屯村的農民發現甲骨，上刻文字。1899 年被考證為商代遺物，1928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小組開始在小屯村發掘，其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接繼進作發掘工作。至 1950 年，共發掘十五次。

⑧ 猾，是擾亂之意，指蠻夷擾亂夏。

又：《孟子·萬章上》及《禮記·大學》均提及《堯典》。西漢伏生所傳之《堯典》，首句「曰若稽古帝堯」，至

族群意義，則最早見於《左傳》中所謂「夷不亂華」<sup>⑨</sup>。《說文》謂：「夏，中國之人也」。華夏民族，原先以雍州及梁州為發源地，然後逐步擴展，故到了春秋時代，便有「諸夏」之說<sup>⑩</sup>，「諸夏」其實不僅指當時的各諸侯國，也漸及中原周邊的部族。例如：

(1) 甲骨文中，記述了殷人與其周邊部族之間的戰爭。例如：馬方、土方、冊方、危方、井方、羌方、虎方等。現舉例如下：

(1.1) 殷人與「馬方」的戰爭：「甲亥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又。」<sup>⑪</sup>。

(1.2) 殷人與「冊方」的戰爭：「壬寅卜，爭貞：今春王伐冊方」<sup>⑫</sup>。

(1.3) 殷人與「危方」的戰爭：「辛酉卜，爭貞：王從望乘伐下危」<sup>⑬</sup>。

這些部族，可能不久便被殷人同化。有些部族歸順殷人之後，便協助殷人降服其他部族。例如「𠄎貞：王從興方伐下危」<sup>⑭</sup>。「興方」原是在殷民族西南方的小部族，在武丁時降服於殷人之後，便協助殷人討伐「危方」<sup>⑮</sup>。

(2) 《後漢書》講及東夷，把東夷人視為「仁而好生」、「天性柔順」，因而甚至孔子也「欲居九夷」。可見東夷不再被視為蠻夷，而漸已視之為「華夏民族」一份子<sup>⑯</sup>。

(3) 《史記》《匈奴列傳》講及周襄王娶戎狄女為后<sup>⑰</sup>，此乃華夏民族進一步的擴大，並與西戎及北狄民族融合。

(4) 民族融合的情形，也見於《左傳》有關重耳與夷吾的事蹟<sup>⑱</sup>。重耳就

---

「陟方乃死」。偽古文《尚書》將《堯典》分拆為《堯典》與《舜典》。顧頡剛《古史辨》稱《堯典》乃漢代之作，但是，《孟子·萬章》既然引述《堯典》，則《堯典》當出現在孟子之前。《堯典》作者記述帝堯及帝舜之事迹，開卷並謂「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可知寫作之時，距帝堯時代已久遠。「蠻夷猾夏」句乃記述帝舜之言，則文本所隱藏之語境，表明寫作者可能以夏朝為背景，因此，吾人在此推測華夏之「夏」，最初出於《堯典》，指夏代人對夏朝的疆域之稱謂。

⑨ 《左傳》定公十年：「夷不亂華」。

⑩ 《論語·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在此處感歎當時諸侯僭亂，禮制解體，不如夷狄尚有君臣之序。

⑪ 〈乙 5408〉。

⑫ 〈存 1.627〉。

⑬ 〈丙 23〉。

⑭ 〈合 151〉。

⑮ 關於殷人與其他部族的戰爭，可參閱朱岐祥著：《甲骨文研究》第21章〈殷初戰爭史稿——殷武丁時期方國研究〉（里仁，民 87 初版），pp.369-444。

⑯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故天性柔順，……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⑰ 《史記》卷110，《匈奴列傳》：「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餘年，而戎狄至洛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

⑱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案：謂他娶其亡父之妾齊姜為妻），生秦穆夫人及

是晉文公，夷吾即晉惠公，這兩位歷史人物的血統，乃是華夏民族擴大與融和的具體表現。其先，晉獻公娶于賈為妻，但無子，遂娶其亡父之妾齊姜為妻。其後又娶戎狄兩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晉攻打驪戎時，驪戎男爵把其女兒許配晉獻公。

(5) 關於中原與南方各族的關係，《後漢書·南蠻傳》也講及藉著軍事而統合的情形<sup>19</sup>。

由此可見，華夏民族是隨著歷史的演變而不斷融合的。清末學者章太炎以「華山」解釋「華」，因為雍、梁二州分別在華山之東南及東北。至於「夏」則指「夏水」，乃漢中之地標<sup>20</sup>。因此，所謂「華夏民族」，可指以華山與夏水之民族為基礎，而逐步在歷史中不斷繁衍與融合而形成的民族。

華夏民族最早之信史，首見於殷墟之甲骨卜辭中。因此，吾人對先秦華夏民族的宗教信仰之探討，也必始於卜辭。以下吾人便從卜辭的資料中，對殷商時代的宗教信仰作系統性的考察。

## 二、殷墟卜辭中的宗教信仰

### (一) 卜辭中的天帝觀

卜辭是最早記錄華夏民族歷史的文獻。光緒年間，河南安陽小屯村的農民發現在龜甲骨上刻有文字，而且都是關於占卜之語，1899年被考證為商代遺物。1928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小組，開始在小屯村發掘。其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接續進行發掘工作。到了1950年，共發掘十五次。安陽地區在商代稱為「北蒙」，又叫做「殷」。西元前14世紀，盤庚帝辛（即商紂王）以此為首都。商朝滅亡之後，此地漸成廢墟，故稱之為「殷墟」，而在此地區所發現之甲骨文字，便稱之為「殷墟卜辭」。卜辭的時間，可上溯至殷高宗武丁時代（1324B.C.—

---

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案：謂他娶戎狄兩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案：謂晉攻打驪戎時，驪戎男爵把其女兒許配晉獻公）。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

<sup>19</sup> 《後漢書》卷116，《南蠻傳》：「莊王初立，……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

<sup>20</sup> 章太炎謂：「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熱如此也。其後人艸所至，遍及及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為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正言種族，宜就夏稱。……夏之為名，實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見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此文收錄在《章太炎全集之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pp.251-261。

1275B.C.)<sup>①</sup>。從卜辭的文字得知，殷商人民有「天帝」的信仰。其情形如下：

### 1. 天帝的文字學解釋

「天」這個字雖然出現於卜辭裏，但是，卜辭中的「天」字基本上解作「大」字，例如「天邑商」便是「大邑商」之意，把殷商王國視作大城邑。但是，後世天神意義的「天」，在卜辭裏卻稱之為「帝」，而且有「帝」字的卜辭還超過四百多片。「帝」字在卜辭中寫作「𠩺」、「𠩺」、「𠩺」、「𠩺」或「𠩺」等多種<sup>②</sup>，至於何故用這些符號代表「天帝」？對於這個問題，論者有不同的解釋。例如以「𠩺」為花蒂之象形，王國維、吳大澂、郭沫若等為此說的代表人。葉玉森則主張束薪說。日本學者內野台嶺，則認為「𠩺」是象徵祭器<sup>③</sup>。然而，無論是花蒂說、束薪說，或祭器說，皆與「天帝」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例如，主張花蒂說的吳大澂就認為：花蒂落下便成為果實，而果實又成為草木枝葉所發之處，這就象徵生物之始，與天合德，因而「帝」（花蒂）足以配「天」，所以「花蒂」的「蒂」便可引申為「帝」字<sup>④</sup>。

卜辭中的「帝」又稱作「上」、「上子」及「上帝」。例如：

[a]〈佚 18〉：

貞，勿佳王正（征）𠩺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sup>⑤</sup>

所謂「下上弗若」，乃說「上下的神祇皆不答允」。其中「若」是「承諾」之意。卜辭中有「下上弗若」的殘片頗多，「下上」之「上」解作「帝」，而「下」則指地上其他的神祇。

[b] 關於把「天帝」稱為「上子」，卜辭中也有多處。例如：

[b·1]〈後上·8·6〉：

貞，上子不我其受又（佑）。

[b·2]〈後上·8·6〉：

貞，上子受我又（佑）。

① 請參閱《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p.219。

② 見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台灣學生書局，民61），pp.38-9。

③ 見島邦男撰，溫天河李壽林譯：《殷墟卜辭研究》（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4），p.188。

④ 見島邦男撰，溫天河李壽林譯：《殷墟卜辭研究》（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4），p.187。

⑤ 此條也見於〔鐵244·2〕及〔粹1084〕等多處。見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台灣大通書局，未註年份），p.256。

然則如何推知「上子」即「天帝」呢？理由就在於「受我又」及「不我其受又」，乃卜辭中的常用語，而且這些常用語只用於「天帝」，而非用於其他神祇。

至於「帝」及「天帝」改稱「上帝」，胡厚宣以為是在廩辛康丁時的卜辭才出現，而從「帝」改稱之為「上帝」，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王權漸漲，商王也自稱為「帝」。例如廩辛康丁時，稱祖甲為帝甲，即廩辛康丁也自居為「帝」<sup>26</sup>。此外，帝乙也以「帝」為名。因此，為了區別商王之「帝」與「天帝」，遂把原來的「天帝」稱之為「上帝」。總言之，胡厚宣認為「帝」或「天帝」，是在武丁時代殷人對宇宙最高神的尊稱，而此種稱謂，至廩辛、康丁時代才改變為「上帝」<sup>27</sup>。然而，胡氏之說尚有爭論，例如，吾人可從董作賓對「貞人的分期」作為線索，檢討胡氏之說。董作賓在1932年，提出依據「貞人」而把甲骨文字分成五個時期<sup>28</sup>。對於貞人的人數，雖然尚待考訂，但是，對於貞人「𠄎」為武丁時期人，及貞人「𠄎」為祖庚祖甲時期人，這方面是沒有異議的。因此，吾人便可以這兩位貞人為線索，發現「上帝」的稱謂在武丁及祖庚、祖甲時代的甲骨文字中已出現。這些甲骨文字是：

(1)「……𠄎 …… 二𠄎 …… 𠄎 𠄎」。〈續存 168〉

(2)「……𠄎 …… 二𠄎 ……」。〈後上 28·14〉

「二𠄎」就是「上帝」，而「𠄎」字亦即「𠄎」的另一形狀。〔續存 168〕中貞人「𠄎」為武丁時代人，而〔後上 28·14〕中，貞人「𠄎」乃祖庚祖甲時代人，可見「上帝」之稱，不但已見於廩辛康丁之前，且遠及武丁時期。

## 2. 天帝之屬性或能力

卜辭中表現出殷人相信的天帝，天帝具有多種超自然能力，這也是他們所信仰的天帝之屬性。這些屬性或能力略如下述<sup>29</sup>：

<sup>26</sup> 見〈戰 5·13〉：「帝甲日其牢。」

<sup>27</sup> 胡厚宣謂：「帝乙帝辛者，亦以帝名，因人王亦名帝，故於天神之帝遂加上字以別之。」見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台灣大通書局，未註年份），p.301。

<sup>28</sup> 他以商初至武丁為第一期，祖庚祖甲為第二期，廩辛康丁為第三期，武乙至太丁為第四期，帝乙帝辛為第五期。見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收錄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sup>29</sup> 胡厚宣謂殷人相信天神有八種權能：一曰令雨、二曰授年、三曰降旱、四曰岳王、五曰授佑、六曰降若（祥）不降若（祥）、七曰降禍、八曰降。見所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台灣大通書局，未附出版日期），〈殷代之天神崇拜〉，pp.283-290。本文不依胡氏說，因為授佑、降禍等可列為同一事。

(1) 天帝具有掌控降雨或不降雨的能力。例如：

(1.1) 〈前 1·50·1〉謂：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

(1.2) 〈前 3·18·5〉謂：

貞：今三月，帝令多雨。

「令」字在《說文》寫作「令」，與甲骨文極相似，乃命令的意思，謂上帝命令多雨。

(2) 天帝能使朝代興亡

例如，在〈乙 4534〉之甲骨文字如下：

丙辰卜。貞，帝佳其冬茲邑。貞：帝弗冬茲邑。

甲骨文「冬」字譯為「冬」，通假為「終」，象徵繩索兩端的形狀（可稱之為「終結」）。至於「佳」字，通假為「惟」<sup>⑩</sup>。所謂「通假」，乃指「通音假借」之意，即借用同音或近音的字，以假作本字而用之。「冬」字通假為「終」，而「佳」字通假為「惟」，便是其中的例子。「茲邑」乃指商邑或商王朝，這一條是講到天帝是否要終絕商邑<sup>⑪</sup>，表示殷人相信天帝能決定朝代的興替<sup>⑫</sup>。

(3) 天帝能賜福與降禍

(3.1) a. 〈前·3·24·4〉謂：

庚戌卜。貞：帝其降我莫。

b. 〈乙 7793〉謂：

戊申卜，爭貞，帝其降我莫。貞，帝不降我莫。

「莫」字在甲骨文原作「莫」，有釋之為艱、饑、嘆等，而其中以「嘆」較為可取。把「莫」解釋為「嘆」，最先乃出自唐蘭。他引用《周禮·舞師》

<sup>⑩</sup> 林祖泰謂：「按佳象鳥形，卜辭均通假為惟」。見所著《殷墟卜辭通假研究》，p.112-3。

<sup>⑪</sup> 于省吾謂「帝佳其冬茲邑」一條，他謂「前文的帝佳其終茲邑和帝弗終茲邑，是就上帝是降終絕茲邑言之，商代還是城邦制度，其言茲邑即代表商國」。見《甲骨文字釋林》（臺北大通書局，民77年），p.188-9。

<sup>⑫</sup> 于省吾謂：「邑乃茲邑的簡稱。終字應訓為終止或終絕。前文的帝佳其終茲邑和帝弗終茲邑，是就上帝是否終絕茲邑言之。商代還是城邦制度，其言茲邑即代表商國。」見所撰《甲骨文字釋林》（臺灣大通書局，民70），p.189。

所謂：「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遂把「暵」訓為旱<sup>33</sup>。根據唐蘭這種解釋，則卜辭中所謂「降奠」，便是指「降旱」。

(3.2)〈續 5·2·1〉謂：

𠄎 采勿降𠄎 𠄎 采不勿降𠄎。

(貞，帝佳降𠄎。貞，帝不佳降𠄎)。

這一條的重點是在「𠄎」字。關於這個字，目前尚沒有一致的看法。「𠄎」字在甲骨文字又寫作「𠄎」，孫詒讓以為是「雝」字，楊樹達認為是「罪」字。于省吾則認為「𠄎」應讀作「摧」，是「摧毀」之意<sup>34</sup>。卜辭中涉及「𠄎」字的地方頗多，例如，〔續存下六八〕：「貞，帝不降𠄎」。以「摧毀」釋「𠄎」，也可解釋本條。

(3.3)〈鐵 191·4〉

𠄎 采弗𠄎于王。

(貞，帝不保于王。)

「保」字在甲骨文原作「𠄎」，郭沫若及唐蘭均把將之釋為「缶」，胡厚宣以為「缶」與「寶」之音相通，而「寶」字古通「保」，於是卜辭所謂「帝弗保于王」便依胡厚宣說而可解釋為「帝弗保王」。這樣，則「帝弗保王」便有如《尚書·多士》所謂「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sup>35</sup>

(3.4)〈龜 1·11·13〉：

𠄎 𠄎 采 𠄎 𠄎 𠄎。

(伐吾方，帝受我又。)

類似的文句也見於〈前 6·58·4〉：

𠄎 𠄎 𠄎 𠄎 采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貞，勿伐吾方，帝不我其受又。)

「受」字訓作「授」，而「又」則通假為「佑」。因此，「帝受我又」猶言「帝授我佑」，這是說天帝給商王庇佑之意。以上各條，表明殷人相信天帝能庇佑及降禍福的最高主宰。

(4) 天帝能起風、雷

(4.1)〈乙 2452〉：「翌癸卯帝其令風。」

(4.2)〈集 14130〉：「𠄎帝其令雷。」

<sup>33</sup> 見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臺北大通書局，民 77 年），p.287。

<sup>34</sup> 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臺北大通書局，民 77 年），p.226。

<sup>35</sup> 語出《尚書·周書》。「降若茲大喪」，謂降大如此大的災難。

(5) 天帝能使商王生病，例如：

〈集 14222〉：「貞：唯帝肇王疾。」

以上說明殷人對上帝的信仰，上帝具有超自然能力，並且能對人間及商王施予禍福或興亡的決定作用。

## (二) 殷人對祖先的崇拜

### 1. 對祖先的崇拜

卜辭中有關對王亥的祭祀，在《殷墟卜辭綜類》收入達 96 條之多<sup>36</sup>，例如：

(1) 〈明 738〉：「𠄎𠄎卜，其夔（於）上甲父（王）夔」。

(2) 〈庫 1064〉：「四羊四豕五羌（于王）夔」。

〈明 738〉謂上甲乃王亥之父。廩辛甲骨一片，上有卜辭兩條：「貞，告于高且王夔」及「其五牛」<sup>37</sup>。「高且」即「高祖」，故「告于高且王夔」即「告于高祖王亥」，而高祖又當指遠祖，即奉王亥為殷人的遠祖。王亥在甲骨文是從鳥從亥，以鳥為首，表示作為殷人遠祖的王亥與鳥有關。《山海經》也講及王亥的故事。<sup>38</sup>上引〈庫 1064〉謂以四羊、四豕、五羌來祭祀王亥，可見祭禮之隆重。由於王亥被視為殷人的遠祖，而甲骨文中的亥字以鳥為首，表示殷人其實是以玄鳥為圖騰（象徵）。《詩經·商頌·玄鳥》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案：謂生殷人的祖宗契）」。<sup>39</sup>《史記·殷本紀》也有殷人之祖契的母親吞玄鳥卵而孕生契之說<sup>40</sup>。因此，倘若吾人把甲骨文、《詩經·玄鳥》及《殷本紀》合而觀之，則王亥可視為殷人領袖「契」。

### 2. 殷人相信祖先能降禍福

(1) 〈乙 5408〉：「乙酉卜，爭貞，佳父乙降凶。貞，不佳父乙降凶」。

這一條，謂「佳父乙」有時降凶，有時不降凶，表示「佳父乙」有降凶的能力。

(2) 〈乙 7513〉：「大甲受王又」。

<sup>36</sup> 此說見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pp.350。

<sup>37</sup> 〈寧滬 1.141〉、〈京津 3926〉。

<sup>38</sup> 《山海經·大荒東經》謂「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見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pp.547-8。《大荒東經》謂王亥把其所養的牛寄在有易處，其後有易殺王亥而奪其牛。《山海北經》則謂王亥被殺的故事。

<sup>39</sup>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又」字即佑，庇佑之意。表示大甲有庇佑商王的能力。

(3)〈乙 2139〉：「貞，咸允左王。貞，咸允弗左王」。

「左」字意為佐，即幫助之意。「咸允左王」謂祖先「咸」的靈魂能輔助商王。

(4)〈乙 2293〉：「貞，大(甲)賓於帝。貞，大(甲)不賓於帝」。

有些論者認為「賓於帝」指「生前德高望重，死後可與天帝匹配」<sup>40</sup>，此說其實是出於胡厚宣，他認為殷人雖然把上帝視為至高權威，但是又同時認為人王死後也可稱為「帝」<sup>41</sup>。但是，本文撰者卻認為不宜把「賓于帝」解作「與天帝匹配」，在理念上宜解作「駕臨至上帝處」<sup>42</sup>。換言之，「大(甲)賓於帝」是說祖先大甲死後，其靈體便到達上帝那裏，於是，殷人便可向祖先之靈祭祀，祖先靈代向上帝祈求庇佑。卜辭中也有所謂「北帝」、「西、南帝」、「方帝」等，例如：

①〈集 418〉：「貞，方帝。一羌、二犬。卯，一牛」。

②〈集 34156〉：「貞，於北帝」。

此中「帝」字可能即「禘」字，名詞指祭禮，動詞指祭祀活動<sup>43</sup>，而非指「上帝」之「帝」字<sup>44</sup>。

③〈集 21089〉：「戊寅卜，九犬帝於西」。

〈集 34154〉：「癸亥卜，帝北」。

這裏所謂「帝於西」及「帝北」，其中的「帝」也是「禘」(祭祀)之意。《爾雅》以「禘」為「大祭」<sup>45</sup>，鄭玄注《學記》、《明堂位》，及《周頌·雝》等，均以大祭釋「禘」，表明古代確有「禘」之祭禮<sup>46</sup>。此外，殷

<sup>40</sup> 此說見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p.353。

<sup>41</sup> 胡厚宣說：「殷人以為帝有全能，尊嚴至上，同他接近，只有人王才有可能。商代主要的先王，像高祖太乙、太宗太甲、中宗祖乙等死後都能升天，可以配帝，因而上帝稱帝，人王死後也可以稱帝。從武乙到帝乙，殷王對於死了的生父都以帝稱。」引自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p.356。

<sup>42</sup> 日本人島邦男把「王賓帝事亡尤」解釋為「王駕臨宗廟來對帝行祭祀」，即把「王賓」的「賓」字就解釋作「駕臨」。見島邦男著，溫天河李壽林譯《殷墟卜辭研究》(鼎文，民64)，p.185。

又：朱歧祥把「賓於帝」解釋為「賓迎於帝」。見所著《甲骨文研究》(臺北里仁，民87)，p.449。

<sup>43</sup> 《爾雅·釋天》：「禘，大祭也」。

<sup>44</sup> 「帝」字在甲骨文中也有釋作「禘」的地方，例如日人島邦男針對〈前 1.222〉甲骨片上的「帝」字謂：「郭某(郭沫若)釋作『帝』，讀為禘」。葉玉森也以爲「卜辭之帝亦多假作禘禮，大傳不王不禘，惟王者宜禘」的解作禘。」見島邦男著，溫天河李壽林譯《殷墟卜辭研究》(鼎文，民64)，p.183。

<sup>45</sup> 鄭玄注《周頌·長髮》謂大禘指郊祭天。又注《喪服小傳》以祭天釋禘。

又：關於祀帝於郊、《明堂位》、《禮運》、《公羊傳·宣三年》、《左傳·襄公七年》、《魯語》等經書均有論及。《中庸》也有「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之說。

<sup>46</sup> 胡厚宣在其《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的〈殷代之天神崇拜〉一文中謂殷人尚崇拜月神、星神、雲神、虹神、風、四方神(該書pp.9-23)。卜辭中有關膜拜各種自然神祇之說，出於陳夢家。日人島邦男謂：「陳夢家從前認為日、月、風、旬、東母、西母等是被奉為神格的(《燕京學報》十九期)。胡厚宣從之，而謂有日、月、星、

人雖然也將其國王以「帝」稱之。但是，「帝辛」、「帝乙」之「帝」是與「上帝」有別，人王之「帝」不能取代「上帝」之權威性，因為「上帝」乃殷商時代信仰中的最高主宰。

### (三) 其他神明的膜拜

在甲骨的卜辭中，殷人除了信仰上帝之外，尚有對河神、土神、山嶽之神、日神等的膜拜<sup>47</sup>。例如

#### 1. 對日神的膜拜

在甲骨文中，記錄了殷人對日神的膜拜，例如：

〈屯 890〉：「癸未貞：其卯出入日，歲三牛？茲用。」

「卯」為一種祭儀，吳其昌解作「象雙刀對立之形」，王國維推測「卯」字乃「劉」之假借字，而「劉」是殺之意。郭沫若則把「卯」字訓作「剖」。因此，「其卯出入日」乃謂在日出及日落時，殺牲以祭祀日神之意。

#### 2. 對山嶽之神的膜拜

卜辭中也記錄了殷人對山嶽之神的崇拜，例如：

(1) 〈集 34167〉：「𠄎卜，又於五山，在果𠄎月卜。」

(2) 〈集 14472〉：「甲辰卜，爭貞，我舞嶽。」

「又」與「舞」均屬祭儀。「我舞嶽」句當指殷人向山嶽之神膜拜。

#### 3. 對土神的膜拜

殷人對於土神的崇拜，卜辭中有許多記錄。例如：

(1) 〈集 32301〉：「丙辰卜，于土寧風。」

(2) 〈集 34088〉：「己未卜，寧雨於土。」

「寧雨」及「寧風」的「寧」字，胡厚宣及陳夢家均認為是指「祀風之法」。日人島邦男則把「寧風」解作「祈求風停息的意思」，而不是「祭風」<sup>48</sup>。

雲、四方之神。陳氏近時又將前說稍作修正，主張有日、雲、風、雨、雪、東母、西母等神祇的存在」。見島邦男撰：《殷墟卜辭研究》（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64），p.229。

但是，島邦男否認殷人有此信仰，他說：「胡厚宣，陳夢家所指出的自然神在卜辭中均不存在。因此，殷代的自然神只有上帝、土神、河神、嶽神。」見《殷墟卜辭研究》，p.233。

<sup>47</sup> 以上對卯字的各種解說，均見於島邦男撰：《殷墟卜辭研究》（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64），pp.293-4。

<sup>48</sup> 朱歧祥認為殷人尚有對對「東母」與「西母」的膜拜（如上所言，此說其實是本于陳夢家，胡厚宣從之），並引

#### 4. 對河神的膜拜：

甲骨文字中，有關殷人崇拜水神或河神的記錄甚多<sup>49</sup>。例如：

(1)〈集 14549〉：「庚寅卜，爭貞，我其祀於河」。

(2)〈集 30433〉：「庚申卜，其又於河」。

「爭」乃「貞人」之名<sup>50</sup>，故「爭貞，我其祀於河」句，是記述名為「爭」的貞人。「其」字，于省吾訓為「該」，或視作虛字<sup>51</sup>。故「我其祀於河」句，不論「其」字是視為虛字或訓為「該」字，皆為祭祀河神之意。<sup>52</sup>此外，殷人尚有對雷神、雪神、風神等崇拜，在此不一一列舉。<sup>53</sup>

### 三、金文中的宗教信仰

首先，讓吾人簡明說明「金文」的歷史背景。根據《左傳》的記述，臧武仲對季孫曾談及彝器鑄造的問題。季武子把擄獲的兵器鑄成林鐘，並且在鐘上刻上魯國的功績，以便留傳後世子孫<sup>54</sup>。又譬如，《左傳》在記述叔向與晏嬰的一段對話，叔向在談到晉國王室日益式微時，曾引用「讒鼎」中的銘文，其中有所謂：「昧旦丕題，後世猶怠」<sup>55</sup>。「銘文」乃指刻在鐘鼎上的文字，可見鑄造鐘鼎在春秋之世乃流行於貴族統治階層。其實，制

---

〈集 14335〉為證：「壬申卜貞，<sup>54</sup>於東母、西母，若。」（見所著《甲骨文研究》（臺北里仁，民 87），p.460。據朱芳圃，此處的「<sup>54</sup>」為祭名。見所著《殷周文字釋叢》，p.125。但是，這條卜辭的意義尚待考釋。例如，「若」字在此文本中至為重要，但其意義卻仍待考釋。（見李孝定編述的《甲骨文字集釋·第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 之五十，未附出版日期）。）在李孝定引羅振玉之意，把「若」訓為「順」。胡厚宣則在其《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講到「降若」、「不降若」的問題時，把「若」訓為「吉祥」（見所著，〈殷代之天神崇拜〉p.6）。但是，吾人仍未能確定〈集 14335〉的文義是否為對東母西母之祭祀。

<sup>49</sup> 可參閔島邦男《殷虛卜辭研究》，pp.219~221。又如朱歧祥：《甲骨骨文字研究》等。

<sup>50</sup> 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臺北大通書局，民 77 年），p.91。

<sup>51</sup> 他說：「甲骨文」中的其字，常用作虛字。又謂除去在句首有時用作發語詞外，均當作該。見《甲骨文字釋林》（臺北大通書局，民 77 年），p.427-8。

<sup>52</sup> 關於殷人對神靈的崇拜，讀者可參考朱歧祥：《甲骨文研究》第二十二章〈殷商自然神考〉（里仁，民 87），pp.445-468。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中〈殷代之天神崇拜〉（臺北大通書局，民 77 年），pp.281-338。

<sup>53</sup> 胡厚宣在其《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的〈殷代之天神崇拜〉一文中謂殷人尚崇拜月神、星神、雲神、虹神、風、四方神（該書 pp.9-23）。

<sup>54</sup> 見《左傳·襄公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抑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時，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天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似愆之，亡之道也。』」

<sup>55</sup> 見《左傳·昭公三年》。

器鑄彝之舉，並非始於春秋。《史記》更把鑄鼎之事上推至傳說中的黃帝<sup>56</sup>。漢代開始，便有人發現古代彝器。據《漢書·武帝紀》，於武帝元鼎元年五月，在汾水得鼎。宋代發現庚鼎、辛鼎、癸鼎，其鑄造時代可能遠于夏商。

鐘鼎等銅器多刻有文字，這就是俗稱為「金文」。以下吾人就從著名的「大豐殷」、「毛公鼎」及「宗周鍾鐘」等銘文，展示其所表現的天道觀。這些銅器，乃周代所製造，大抵已無異議，而銘文中所展示的天道觀，是代表了當時統治階層對「上帝」或「天」的看法。現分別說明如下：

### (一)「大豐殷」銘文

「大豐殷」的鑄造年代，可能是在周武王之時。本銘文的主要內容如下：  
乙亥，王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尤。王殷（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饗上帝，文王德在上，丕顯王作省，丕王作彝，丕克三殷（衣）王祀。丁丑，王饗太祖。王降亡助（賀）爵復甌，佳（又）朕有慶，每揚王休于尊殷。<sup>57</sup>

本銘文共八行七十八字。首先是關於其鑄造年代，銘文中既謂「王衣（殷）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何故單獨「丕顯考文王」呢？武王乃文王之子，在周代列王世系中，武王的功績至巨，他討伐商紂王而滅商，建立周王朝。由於單獨標榜文王，可見銘文很可能為武王或武王時代之作。從文義方面說，此銘文難作句解，但就其中可解釋之處而言，則「大豐」當指「宗伯大封之禮」<sup>58</sup>。所謂「乙亥，王有大豐」句，乃謂「乙亥日，周武王有大封宗伯之禮」。「王祀於天室」一語，「天室」無疑是指周王祀天的地方。「事喜（饗）上帝」謂以酒饗祭祀上帝的意思。重要的是：周初，把祭祀上帝的地方稱為「天室」，這可能是金文中「天」或「上帝」發生關係的最早文獻。<sup>59</sup>

<sup>56</sup> 《史記·封禪書》：「黃帝作質鼎三，象天地人。」

<sup>57</sup> 見《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增文本）（臺灣大通書局，未附出版日期），p.1。

<sup>58</sup> 關於宗伯大封之禮，見《周禮·春官》。

<sup>59</sup> 本文撰者在研讀「大豐殷」的銘文之時，發現「大豐殷」的銘文與另一名為「殷」的銘文至為相若。「殷」的全文如下：

「丁亥，王有大豐，王用四方，王祀於天室。降天祚佑，王殷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使饗禘。文王在上，丕顯王作惠，不肆王作庸。丕克殷王祀。丁丑，王饗太祖。王降祚，則釐綏縶。唯爾有翼，敏揚王休于尊殷。」從上列引文中，吾人可以看到「大豐殷銘」與「殷銘」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至於何故有如此相似的兩種銘文，則尚待考釋。吾人在此所關心的，主要在於銘文中所表現的天道觀。

## (二)「孟鼎」銘文

《孟鼎》為周成王時所製造，現在把其銘文抄錄如下<sup>60</sup>：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孟，王若曰：『孟』，丕顯玟（文）王，受天有大命。在珷（武）王嗣玟作邦，辟昏（厥）匿，備有四方，畎（畷）正昏（乃）民，在粵（於）禦事。戲酒無醜（醜），有癸烝祀，無敢醜。故天翼臨子，灋保先王， $\square$ 有四方，我鬲（或作「小正」）。殷隊命，唯殷侯甸，粵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喪師。已！女（汝）妹（昧）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學女，勿克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刑甯于玟王正德，若玟王命二三正，今余唯命女，孟。召癸敬雖德，經敏朝夕入調（諫），高奔走，畏天畏……唯王女又三祀<sup>61</sup>。

關於《孟鼎》的要旨，現在列述如下：

1. 第一，《孟鼎》極可能是成王時代所製造的，因為銘文中有「丕顯玟王」及「在珷王嗣玟作邦」句，而銘文的大旨是（成）王訓誡即將赴封邑的「孟」，以殷王朝亡於肆酒一事為借鑒。學者中有持「孟鼎」乃康王時代的制物，而其所據的理由在於所謂「孟鼎二」（小孟鼎）有「用牲畜（禘）周王 $\square$ 王成王」句，以此判斷「孟鼎」為康王時代的器物，但此說難成立<sup>62</sup>。
2. 第二，《孟鼎》中表現周人的天道觀：
  - (1) 指出周文王乃受天之命，故謂：「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
  - (2) 由於銘文的要旨在於告誡「孟」在其即將赴任的封國中不可肆酒，並且以武王為榜樣，從而說到武王因此而獲得上天的庇佑，所以說「故天翼臨子」。「翼」字引申為庇佑，而「臨」是「到達」之意，至於「子」字是以先王比擬為上天之子。合而言之，「天翼臨子」是謂「上天把先王（指武王）當作兒子那樣去庇護他」。日後王帝

<sup>60</sup> 銘文之釋釋，各家不同，此處主要乃參閱郭沫若：《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台灣大通書局，民60年）。

<sup>61</sup> 見郭沫若《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台灣大通書局，未附出版日期），p.33-4。

<sup>62</sup> 此說為容希白所持，見《商周彝器通考》（臺灣文史哲出版社，民74），p.48。

又見郭沫若《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謂：「本鼎乃康王時器，下小孟鼎言用牲畜（禘）周王、 $\square$ 王、成王，其時代自明」p.34。

但此說有困難，理由是：

a. 吾人必須先證明「孟鼎二」的年代，否則無法從後者的年代推論前者的年代。但是，論者卻沒有提出這方面的論據。

b. 「孟鼎二」已於太平天國之亂中毀壞，現存的銘文拓本只見于道光年間李文瀚所輯錄的《撫古錄金文》一書中，這樣只從「孟鼎二」的名稱相近而視為同時期的器物，是難成立的。實則若只據銘文，則「孟鼎二」乃康王時的器物，而「孟鼎」則為成王時所製造。

稱為天子，則《孟鼎》也許就是這個用詞的開端。或者說：天子之稱乃源于成王時代。

(3) 銘文更進一步強調殷王朝亡於肆酒，由於殷王朝的統治階層「率肆於酒」而「喪師」（喪師猶言喪失百姓民心之意），這樣就使到殷王朝「隊命」。「隊命」即「墜命」，這是與「受命」相反，即謂上天不再賦與治理百姓之權力而言。

(4) 銘文中還要求「孟」要「畏天畏」，「天畏」猶言「天威」，故「畏天畏」乃謂「敬畏上天的威嚴」之意。

### （三）「孟鼎」銘文與《酒誥》

從文義方面看，「孟鼎」的銘文與《尚書·酒誥》主旨相若。《酒誥》的主角是「封」，也就是周公旦之弟康叔。至於《酒誥》成文的日期，誥文沒有提及。今文《尚書》中有三篇文章是告誡康叔的，這就是〈康誥〉、〈酒誥〉、及〈梓材〉。《尚書·序》謂：「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史記》在講及〈康誥〉、〈酒誥〉及〈梓材〉三篇之來由時，謂「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sup>63</sup>。這三篇文章，要旨在於告誡康叔必須以殷亡為鑑，力斥肆酒之害。既然三文同為周公旦告誡其弟之辭，而周公攝政七年，倘若三文皆在於討伐管叔、蔡叔之後與討伐康叔于衛國之前，則〈酒誥〉成文時間便大略可推知。<sup>64</sup> 無論是《孟鼎》或〈酒誥〉，均強調以殷王朝的亡國為鑑，故〈酒誥〉謂「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豈可不大監撫于時」。這是以古代名言，指出常「以人為鑑」，而「不可以水借鑑」。所謂「以人為鑑」，就是以殷人所建立的殷王朝之滅亡為鑑。周公在〈酒誥〉裏講到「殷墜厥命」，所以「我豈可不大監（鑑）撫于時」？這與《孟鼎》所謂「我顛殷隊」一語的用意相同，「顛」字通「聞」字，乃聽之意。「隊」字通假為「墜」，故「殷隊」

<sup>63</sup> 《史記》卷37，〈衛康叔世家第七〉：「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亂此。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sup>64</sup> 今查考《中國歷史年表》，得知成王即位於西元前1115年（丙戌），而周公攝政七年，則〈酒誥〉之作便在西元前1115-1109年之間。又由於〈孟鼎銘文〉有謂「孟用對王休，用作祖南公寶鼎，「唯王廿又三祀」。假若「唯王廿又三祀」乃指成王廿三年，則「孟鼎」之製造於西元前1092年，距周公還政有十七年之久。又假若康叔是在周公攝政後三或四年而封土，則「孟鼎」之銘文便晚於〈酒誥〉之作約二十年。

猶言殷王朝喪失天命。在〈酒誥〉中，周公告誡康叔在其封國內，不許群臣（包括殷代遺民）隨便肆酒，故謂「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汝剛制於酒」，而《孟鼎》也以殷代百官肆酒誤國為鑑，指出「唯殷邊侯甸，粵殷正百辟，率肆於酒，故喪師」。「邊侯甸」，「殷正」、「百辟」就是指殷王朝京畿內外的百官而言。所以，在《孟鼎》裏，成王無疑也藉此告誡「孟」，要他在封國內不許百官隨便肆酒。可見《書經·酒誥》與《孟鼎》的要旨相同。

進一步說，關於商王朝的「墜命」問題，無論《孟鼎》或〈酒誥〉，皆認為商王朝因「墜命」而「喪師」（失去百姓的支援，亦即失去政權），皆是咎由自取，所以〈酒誥〉說：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這是說，上天所以使商王朝的統治者失去政權，不再愛護殷政權，原因乃在於殷商的統治者肆于逸樂。上天並非虐待殷人，而是殷人自己招來的禍患。這是殷人咎由自取的。此點亦為《孟鼎》的觀點，否則就不必一方面告誡「孟」要「畏天威（畏）」，而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于玟王正德」（繼承或學習文王之正當德行）。

#### （四）「毛公鼎」銘文

「毛公鼎」全篇文字共 497 個字，乃鐘鼎文中最長之作<sup>65</sup>。至於「毛公鼎」的製造年代，論者意見不一。吳大澂以為是成王時的器物，郭沫若從文義而推測為宣王時所造的<sup>66</sup>。但是，宣王與毛公相隔約 280 年之久，何故在宣王時才銘刻以公毛為主角的鐘鼎呢？況且所謂從文義及鐘鼎的花紋等去鑑定其時代，也不一定可靠。毛公為武王之弟，而銘文又只提及文武二王，再加上銘文的文字晦澀古樸，則其製造時間可能是在成康時代。現在引述銘文中與天道有關的部分如下：

王若曰：父曆，丕顯文武，皇天弘厥昏（厥）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率懷不庭方，亡不閑于文武耿光。唯天壯集厥命，亦唯先正克薛厥辟，暨勤大命。肆皇天無斃，臨保我有周，丕鞏先王配命，啟（愍）天疾畏，司（嗣）余小子弗及邦。……告余

<sup>65</sup> 銘文之釋譯，各家不同，此處主要乃參閱郭沫若：《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台灣大通書局，民 60 年），及黃公渚：《周秦金石文選評註》（上海商務，民 24 年）。

<sup>66</sup> 見容希白著《商周彝器通考》，臺灣文史哲出版社，p.56。

先王若德，用仰邵皇天……。<sup>67</sup>

「毛公鼎」文字晦澀，現試作解讀：「父胥」，胥乃毛公之名，是武王之弟，故毛公與周公旦為兄弟關係。周代稱同姓諸侯為父，因而有「父胥」之稱。「丕顯文武」，乃對讚美周文王及武王德業之辭。「皇天弘厥厥德」，「厥」是「充足」之意，或解作饜飶，意思都是一樣，引申為豐盛之意。所以，「皇天弘厥厥德」猶言「偉大的上天，具有豐盛的美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謂皇天給與周王朝治理百性的命令（或使命）。「率懷不庭芳」，《詩經·大雅》〈蕩之什·韓奕〉篇有「幹不庭方」句，《朱子集注》謂：「幹，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懷」乃歸附之意，故「率懷不庭芳」，是說「由於皇天授與周王朝大使命，並且率領那些本來不向周王朝朝貢的國家，最後也歸附了周」。「亡不閑于文武耿光」，「亡」字通假為「莫」，「閑」字《說文》謂「閑猶門」，可引申為門徑或「由於」之意。全句是說「莫不由於周文王及武王的德範」。「唯天壯集厥命」，是說「由於皇天集其使命于周王朝」。「亦唯先正克薛厥辟」，是說「同時也由於公卿大夫輔助周王」（「辟」指周王，見於《詩經》多處）。「警勤大命，肆皇天無斃，臨保我有周」，「無斃」謂無所厭惡。這三句是說：「由於周王勤勉地服膺皇天的命令，所以皇天愛護（不厭惡）周王，保佑周王朝」。「丕鞏先王配命，啟（愍）天疾畏，司（嗣）余小子弗及邦」。「啟」同旻，故啟天即謂旻天，《詩經·大雅》〈召晏篇〉有所謂「旻天疾威」句，「旻天」原指秋天，以秋天的蕭瑟來顯示皇天之疾威。「丕鞏先王配命，啟（愍）天疾畏」，是謂「至於落實先王配合天命的德範，敬畏皇天的威嚴，這是我等後輩所不及的」，末句乃自謙之詞。

根據以上的解釋，則《毛公鼎》的天道觀是強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範配合天命，才得到上天的庇佑，上天德範豐盛，而周王朝之受天命，亦由於文武王的德業所致，這是一種「天人合德」的思想。

## （五）「宗周鐘」銘文

「宗周鐘」的銘文共 119 個字，全文如下<sup>68</sup>：

王肇遷省文武勤疆土，南域長子，敢陷虐我土。王猷（敦）伐其至，戡伐季（厥）

<sup>67</sup> 見《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大通書局），pp.134-6。

<sup>68</sup> 銘文之釋譯，各家不同，此處主要乃參閱郭沫若：《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台灣大通書局，民 60 年），及黃公渚：《周秦金石文選評註》（上海商務，民 24 年）。



都，服子乃遣閒來逆邵王。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我佳司（嗣）配皇天王<sup>69</sup>，對作宗周寶鐘。鎗鎗息息，雉雉離離。周邵（昭）格丕顯祖考文王，其嚴在上，熊熊豐豐。降余多福，福余順孫，參壽唯利，猷其萬年，峻保四國。<sup>70</sup>

此鐘銘的文字意義如下：「省文武勤疆土」，是謂省察文武二王所努力而建立起來的疆土之意。「南國服（服）子敢陷虐我土」，是說南方服國（子為爵位）出兵侵犯我疆土。「王敦伐其至」，「其至」指服國所侵佔之地，謂王討伐服國軍隊，收回被侵之地。「戡伐厥都」，「戡」即擊伐，「厥都」乃指服國之都邑言。這是說，周王不但收復被侵犯的失土，並且還率兵攻佔服國的都邑。「服子乃遣閒來逆邵（昭）王」，意謂這時服國便派遣使者來見周王。「昭」是晉見，也可解釋為「周昭王」。這句話甚至可解釋為「服國遣使向周王投降」。「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這是說，因這次戰役而歸附于周王的有廿六邦之多。「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意謂我能得到上帝及其它神靈的保護，才有這項成功。銘文從「王肇適省」而至「朕猷有成」，就是記述周王討伐服國，使到廿六邦歸附于周王朝，並認為周王之所以能獲得如此輝煌戰績，乃得自上帝及其它神祇的庇佑所致，從而說明鑄造「宗周鐘」之動機和目的。

「宗周」二字，在前文所引述的《孟鼎》中已出現過（「王在宗周」）。金文中稱鎬京為宗周，因此，「宗周鐘」在名稱乃取義於首都鎬京，有「王都之鐘」的意思。至於「宗周鐘」的製造年代，銘文開端彰顯文武開疆辟土，則當為周成王之後的器物則無疑，但是確定的時間則不易推斷<sup>71</sup>。銘文中雖然講及與南方服國之戰，但史冊上對此一戰役卻沒有記述。至於本鐘的銘文中有「唯皇上帝」及「皇天」等字，也不能提供我們具體的時間觀念，因為「皇天」二字也見於「毛公鼎」，及《書經·周書》中的〈梓材〉與〈召誥〉中<sup>72</sup>，而此二篇文章皆可能為周公時的文獻。

<sup>69</sup> 此處標點乃依郭沫若，黃公渚則為「我唯司配皇天王對」，其中「王」指「先王」。

<sup>70</sup> 錄自《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大通書局），pp.51-50。

<sup>71</sup> 關於其製造之年代，唐蘭認為是厲王時的器物，郭沫若則認為是昭王時所製造，然而這些說法畢竟都只是臆度之說而已。

<sup>72</sup> 《書經·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書經·召誥》有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般之命」。

## 四、《書經》中的信仰問題

《書經》又稱《尚書》，「尚書」乃「上書」之意，而「上書」在語意上乃指記載「上古」時代之書，因而也就是一部有關「上古」時代的歷史之書<sup>73</sup>。《尚書》非常強調「天命」。「天命」一詞，常見於先秦典籍。其中「命」字的主要意義如下：

(一)「命」指命令，即遣派之意。如《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曰昊天」。又如《尚書·洛誥》：「今王即命曰」等。

(二)「命」指「受命」，謂「接受上天之命令」或「上帝的意旨」之意。如《尚書·大誥》：「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迪知上帝命」及「格知天命」。〈湯誓〉：「天命殛之」，〈盤庚上〉所謂「先王有服，恪謹天命」，或〈皋陶謨〉：「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等。

(三)「命」指「命運」，如〈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綜合上列例子，則《書經》中所謂「天命」的「命」字，在動詞是「命令」或「受命」之意。「命」字在名詞為「天命」，而「天命」則又可訓為「上帝的意旨」及「命運」。以下，吾人便把《書經》中有關天命的信仰，歸納為下述各項：

### (一) 政治、法律、社會等制度，皆以天道基礎

《尚書·皋陶謨》把社會、政治、法律等規範訴諸天道<sup>74</sup>。其中講到「天敘」、「典」、「五惇」、「五禮」、「五服」等問題。「天敘」指天道、宇宙秩序或自然秩序。「典」指常規，故「五典」乃指仁、義、禮、智、信五種倫常。「五惇」當指「五典」所反映人性之純厚。「天秩有禮」，「秩」指爵位尊卑，謂爵位尊卑也依「天道」來建立；而「五禮」就是指天子、諸侯、卿大夫、

<sup>73</sup> 孔安國《尚書·序》：「以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之名始於漢代，《漢書·藝文志》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由於《尚書》原是古代政府之文獻（書），故依朝代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及《周書》。後經孔子加以編纂成《書》而成爲「經」，故稱爲《書經》，故《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尚書》有真偽之糾紛，對於這個問題，可參閱呂思勉《經子解題》（台版有高雄複文圖書出版社，民72）。今本以西漢今文的28篇本的《尚書》爲真本，各篇撰寫時間不一，而像《堯典》、《禹貢》等「書」，雖然不一定是堯、禹時代的虞夏之書，但是爲先秦之作則無疑。

<sup>74</sup>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又：《史記·五帝本紀》：「舜曰：皋陶，……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信」。又《史記·夏本紀》，也提及皋陶向禹講及「五刑五用」。

士及百姓之禮法。「五服」指依爵位尊卑而設計的五種服飾，「五章」指「五服」上之圖案。「五刑」指墨（點鑿其額，並涅以墨）、劓（截鼻）、剕（別足）、宮（去除性功能之刑罰）及大辟（死刑）<sup>75</sup>。「天聰明」，「聰」指「耳聰」，「明」指「目明」。合而言之，謂天道是有規律的，仁、義、禮、智、信這五種倫理規範（五典）就是基於「天礪」，這些倫理規範也醇厚了人性。在政治上，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百姓之禮法（五禮），及「五服」的設計，也是遵循天道而設立的制度（庸）。由於上天要懲處犯罪作惡的人，故強調人間也要依照天道的五種刑罰，來處罰犯五刑的人。主政者當明白這點，並以天道來勉勵自己。這也就是所謂「勅天之命，惟時惟幾」<sup>76</sup>。上天所聽所看的，就是人們所聽到所看到的；上天對人之賞罰，也是出自人間對為善與作惡者的賞罰，這就表明天人之間其實是合一的。

## （二）相信天命、恪守天命

《尚書·甘誓》講述夏啓討伐有扈氏。帝啓在採取軍事行動前，向將領們訓話<sup>77</sup>，強調「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sup>78</sup>，故上天要斷絕其統治，夏啓遂遵循上天之命令，伐討有扈氏。〈湯誓〉謂商湯向將領宣告他本人不是要故意作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而是由於「有夏有罪，天命殛之」。而夏禹因為出於敬畏上帝之心，才不得不出兵討伐有扈氏。又譬如，殷帝盤庚欲從奄遷都至殷，這可能是由於「奄」常患水災<sup>79</sup>，盤庚才決定遷都，但卻遭百姓所反對。盤庚也以天命告誡殷人，謂先王因恪守天命，故才五次遷都<sup>80</sup>。

《書經》表明天命不是「前定的」(predestinate)，也不是天意的任意妄為之結果，而是上天依據人們的「德」與「不德」之法則而確定的。例如：

1. 《尚書·高宗彤日》講及殷武丁祭成王湯王時，祖己訓武丁謂「惟天監下民，典厥義」<sup>81</sup>，這是說上天在觀察人間的人事時，是以「德行」（「義」）

<sup>75</sup> 見《史記正義》釋《五帝本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句。

<sup>76</sup> 《尚書·皋陶謨》，意謂把握時機，對天命要保持誠謹恐懼之心。

<sup>77</sup>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又：《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sup>78</sup> 對於〈甘誓〉中有關「五行」與「三正」的解釋及其他相關問題，請參閱鄭芷人：《陰陽五行及其體系》（增訂二版一刷）（文津，1998），p.12。

<sup>79</sup> 《尚書·盤庚中》：「汝不謀長，以思乃災。」其中之「災」可能指因黃河泛濫而引生的水災。

<sup>80</sup> 《尚書·盤庚中》：「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於今五邦。」

<sup>81</sup>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為「原則」(「典」)為依歸的<sup>82</sup>。就以上天賜給人們壽命的長短為例，壽命短的人，乃咎由自取，並非上天故意使他們半途夭折(「非夭夭民，民中絕命」)。他們不循「義」而行，也不理會上天對其罪行的懲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因此，上天是根據人們的德行之多寡而給與壽命之長短的(「天既孚命正厥德」)<sup>83</sup>。

2. 當周文王(西伯)討伐了黎國之後，接著攻打商紂王只是早晚的問題，紂王之臣子祖伊把這個消息向紂王報告<sup>84</sup>。紂王之臣子祖伊告訴商紂王，說：「由於紂王淫亂無度，又無心于朝政，所以上天放棄了商政權」<sup>85</sup>。又說：「百姓都希望紂王早死，百姓還抱怨天命為何不早點到來，上天何故不懲罰商王」<sup>86</sup>。紂王回答祖伊說：「既然我生下來便有命，則百姓咒詛我快點死也沒用」(原文：「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回答說：「你的罪惡都一一累積在天上，上天就根據你的罪行而定你的壽命，這是你咎由自取，不能怪責上天(「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同時，殷之即將滅亡，百姓都說商王朝是喪失在你的手上。由此可見，祖伊認為「天命」不是前定或預定的(predeterminate)，他相信上天是依個人行為的善惡而決定對他的償罰。
3. 商紂王的一位同父異母兄長叫微子<sup>87</sup>，他看到當時商王朝的百官皆「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從而預言「殷遂喪，越至於今」<sup>88</sup>。箕子回答微子啓<sup>89</sup>，細述殷人之罪惡，朝中的君臣皆沈迷於酒，肆無忌憚，不聽長輩及資深且有經驗的人之勸告(乃罔畏畏，弗其耆長)。其中特別強調「上天從社稷的治亂來評斷殷人」(「降監殷民用乂」)<sup>90</sup>、「現在商王

又：《史記·殷本紀》說明〈高宗彤日〉之作的由來：「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三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sup>82</sup> 《史記·集解》引孔安國謂：「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

<sup>83</sup> 《史記集解》引孔安國謂：「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

<sup>84</sup>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又：《史記·夏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sup>85</sup> 《尚書·西伯戡黎》：「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sup>86</sup> 《尚書·西伯戡黎》：「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sup>87</sup> 《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後，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史記索隱》：「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為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為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

<sup>88</sup> 《尚書·微子》：「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句，「沈酗於酒」指沈迷醉酒；「厥」指殷商的先王；「亂敗厥德於下」謂破壞了殷人先王對後世所留下的美德。「殷遂喪，越至於今」，謂商王朝之瓦解，就在今天。

<sup>89</sup>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息。罪合於一，多瘳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政。商其淪喪，我罔為臣仆。』」引自《尚書·微子》。

<sup>90</sup> 「乂」，原義為治理。這裏可引申為「社稷的治亂」。

朝必有災難」(「商今其有災」),及「商王朝必將淪亡」(「商其淪喪」)。  
因此,對箕子來說,朝代的興替,完全取決於治國者是否用心於政。

### (三) 上帝的擬人化

所謂「上帝的擬人化」或「擬人化的上帝」(the anthropopathic God),也可說是「人格神」。這是指上帝具有喜、怒、憐憫、懲罰等之情。現在說明如下:

#### 1. 上帝有喜悅之情

〈康誥〉是周公旦對康叔的告誡<sup>91</sup>,誥文中講及上帝有喜悅之情<sup>92</sup>。《僞孔傳》謂「帝休」指「天美其治」<sup>93</sup>,這是把「休」訓為「美」。《爾雅·釋詁》及《廣韻·尤韻》,均把「休」訓為「美」。但是,「休」也可引申為「喜」,《廣雅·釋詁一》便把「休」訓為「喜」。例如,《詩經·小雅·菁菁者莪》:「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在當代漢語中,也有「休戚相關」一詞,此乃出自《國語·周語下》:「為晉休戚,不背本也」。其中,「休」與「戚」相對,「休」為喜,「戚」指憂。因此,綜合言之,〈康誥〉中所謂「帝休」,乃謂「上帝喜悅」之意。

#### 2. 上帝會震怒

上帝除了會「喜悅」之外,也會「震怒」。〈洪範〉便講到上帝不但會「震怒」的,而且還能「賜」或「不賜」人君「治國之道」<sup>94</sup>。上帝之所以對「鯀」感到「震怒」,因為他「墮洪水,汨陳其五行」,故上帝給與禹而不給與鯀「洪範九疇」(九類治國的大法則)<sup>95</sup>。

#### 3. 上帝有憐憫與疾惡之情

<sup>91</sup> 康叔名封,乃周武王之弟。時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周公遂以成王之名告誡康叔,故名〈康誥〉。《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政當國……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sup>92</sup> 「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仍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又:《尚書》其他地方也有用「休」字,如〈大誥〉:「天休于甯王,與我小邦周」,〈召誥〉:「治民今休」等。

<sup>93</sup> 《孔氏傳》(《僞孔傳》)即《尚書孔氏傳》,收入《古注十三經》(《四部集要經部》)(臺北新興書局)。

<sup>94</sup>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sup>95</sup> 《孔氏傳》:「畀」與也。《爾雅·釋詁上》:「畀,賜也」。郭璞《注》:「畀,賜與也」。《爾雅·釋詁下》:「畀,予也」。《玉篇·廾部》:「畀,相付也,與也」。

又:「洪範九疇」,《孔氏傳》把「洪範」釋為「大法」;「疇」,類也。

《書經·呂刑》也講及上帝有憐憫之情<sup>96</sup>。〈呂刑〉乃周穆王誥甫侯之言。根據裴駟的《史記·集解》引鄭玄之說，謂甫侯於周穆王時為相，甫侯即呂侯。在〈呂刑〉中，周穆王謂蚩尤殘暴無道，殺害中原百姓。無辜的百姓遂向上帝申訴，上帝下察蚩尤與苗民，發現苗民之間罕見美德，而只臭到腥臊之氣。上帝憐憫（哀矜）被殺戮的中原無辜百姓，遂以嚴厲的手段，報復蚩尤與苗民的暴虐，使其絕滅於人世間。由此可見，在《尚書·呂刑》中，上帝既有憐憫之心，同時疾惡如仇。

#### （四） 朝代興亡出於天命

《書經》中強調朝代興亡乃出於天命，也就是說乃出於上帝的意旨。現在說明如下：

##### 1. 周公討伐管叔及蔡叔之叛亂，乃出於遵從天命

吾人在上文已指出：《書經》中所謂「天命」，在動詞是「命令」或「受命」之意，如〈湯誓〉：「天命殛之」，在名詞則可訓為「上帝的意旨」，如〈大誥〉：「格知天命」，〈盤庚上〉所謂「先王有服，恪謹天命」等。《尚書·大誥》<sup>97</sup>，講及周公輔政之時，管叔及蔡叔反叛，周公以成王之名出征討伐。他對各諸侯及大臣們提出告誡，說：諸百姓雖然不知道上天命令周王為天子，但各諸侯王及眾大臣則不得不知道這個天命，而且天命是不變的。上天既要亡殷，那麼，我們怎麼可能不遵從上天之意旨，並保護國土呢？我們出征討叛，天命是沒有錯誤的。

##### 2. 革命出於天意

〈召誥〉說到周王承受天命，乃出於上帝背棄殷政權，謂偉大的上帝革除祂的長子的大邦國「殷」的政權。召公告誡成王，謂成王領受天之天命，領袖天下。成王既受命為王，一方面故然是一件喜悅之事，但是在另一方面肩負了重擔，也應存著憂患之心，所以不得不謹慎為之。上天既然把政權轉移給周王，則殷商的前後諸王以及殷的百姓，也就接受了上天的

<sup>96</sup>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又：《史記·周本紀》：「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

<sup>97</sup>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禦事。……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意旨<sup>98</sup>。

### 3. 天命以善惡為本，王者以德得天下，以惡失天下

在《尚書·多士》，周公也從「天命」的觀點來告誡殷商的遺民<sup>99</sup>：

爾殷遺多士，弗弔<sup>100</sup>，旻天大降喪于殷<sup>101</sup>。我有周佑命，將<sup>102</sup>天明威，致<sup>103</sup>王罰，勅殷命終於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故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這是周公以周成王之名，向殷遺民說明殷人喪失天下，與周人承接政權的原因。周公認為上帝使殷人喪失政權，乃是由於殷王不體恤百姓。周王之所以能繼殷而承受天命，乃因周王得上天之助，奉行天的指示，揚善懲惡。上天命令周人，誅罰殷王，革除紂王的政權，讓周人為帝王。不是我們這個小邦想奪取紂王的政權，而是上天不把政權賜給巧諂善辯、不憐恤百姓、指固執而不知變通、及惑亂社稷的人。在這種情形下，上天才輔助我周，我周王不是要求大位。上天不把政權賜給紂王。而且我的百姓之言行，是能順從天之命令，上天因而表明其威德，把政權賜給周王。接著，周公再以成王之名，向殷遺民解釋夏、商王朝興亡，以及周王得到政權之理<sup>104</sup>：

我聞曰：『上帝引逸』。<sup>105</sup>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sup>106</sup>。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於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周公認為：上天之本意是要百姓安享民逸樂的，但是，由於夏桀之為政，百姓得不到幸福快樂，所以上天下達懲罰之命令，以譴告之。夏王多不背棄上天所下達的告誡，因而一直得到上帝的照顧。但是，到了夏桀，他不

<sup>98</sup>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遷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末三句謂上天已終結大邦國殷的政權，那些已故殷王朝的先王們及其後之殷王與百姓，皆服從了天命。

<sup>99</sup> 又：《史記·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sup>100</sup> 「弗弔」，弗是不，弔指不幸。

<sup>101</sup> 旻天謂能懲罰之上天，降乃下降，喪是喪滅亡之意

<sup>102</sup> 將，是奉行。

<sup>103</sup> 致，指推行。

<sup>104</sup> 《尚書·周書·多士》。

<sup>105</sup> 「上帝引逸」，謂上帝能帶領群眾往安逸之地方。

<sup>106</sup>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上天因而建立殷朝，保護殷王朝。

聽從上天的勸告，沈迷于逸樂，世人對他感到非常不滿。上天於是不再憐憫他，廢除他的權位，並以此懲罰他。上天遂命令殷人的先王成、湯革夏桀之命，成湯任用才俊，治理社稷。從成、湯至於帝乙，莫不昭明其德范，體恤百姓，祭祀上天，以求保宗廟社稷。於是上天便建立殷王朝，而歷代殷王，皆能不忘祭祀，不敢違背上帝，也無不配合天道與上天之德澤。但是，到了紂王，卻不但不向上天表現其德行，也不體念殷代先王們勤奮治國的精神。王紂過度享樂，不顧天理與民疾。因此，上帝不再眷顧紂王，而降下如此大災難。周公再三向殷遺民告誡，謂周王服從天道，上天遂命令周王消王紂的政權。

周公作〈多士〉，告誡殷的遺民，而周成王則作〈多方〉，告誡當時四方各國，說明周王因其敬天與德業，才承接社稷大任：

惟我周王靈承於旅<sup>⑩</sup>，克堪用德，惟典神天<sup>⑪</sup>。天惟式教我用休，<sup>⑫</sup>簡畀殷命<sup>⑬</sup>，尹爾多<sup>⑭</sup>。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於爾多方？<sup>⑮</sup>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sup>⑯</sup>，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sup>⑰</sup>。

這是說：惟有周王，善於以仁政而得人民的愛戴，能以美德行事，又負責祭祀天神。因此，上天只單獨教導我周王，採取最佳的方法來治理國家，隆重地讓周王取代殷王之政權，管理四方。我現在不敢教導你們，而是要向四方各國下達命令。你們何故不誠懇地向各諸侯國宣導？你們何故不協助我周王而享天命？你們現在有自己原有的房舍可居，有自家原有的田可耕種。既然如此，你們何故不順從王政，把天命（周王朝）揚光大？

以上各節，說明朝代興替，皆出於天命，而天命是以德為本。有德者得天下，無德者失天下，夏、商、周三代皆如此。

## （五）對祖先靈及其他神靈的崇拜

《尚書·虞夏書》講到虞舜時期，已提及對祖先膜拜之祭典。〈皋陶謨〉

⑩ 「靈」是善於，「承」為承受，「旅」指群眾。故全句謂唯獨周王能於接納群眾之意見。

⑪ 此二句謂以美德來處事，以上天之命令作為法規。

⑫ 式，用也；休，美也。全句謂上天唯獨教我採用最優的方法處理事務。

⑬ 謂上天隆重地要我革除殷王之命。

⑭ 尹，管治之意。「尹爾多方」謂治理汝等各方諸侯。

⑮ 「爾曷不忱裕之於爾多方」，謂汝等為何不誠懇地勸導各諸侯？

⑯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謂汝等何不輔助我周王？

⑰ 見《尚書·多方》。又：《史記·周本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所謂「祖考來格」<sup>115</sup>，是說祖先之靈來到祭壇，可見祭祖之傳統由來已久。《尚書·盤庚中》講及盤庚勸諭殷人要服從他的命令而遷都：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sup>116</sup>

在這節引文中，「我先神后」乃指盤庚之前的殷帝王。他說在先王時期，殷的先民也曾受到遷都之苦。盤庚自責倘若不遷都（「陳於茲」），那便是一項政策性的錯誤（「失於政」），先王也必然降下重重的災難。同時，倘若不遷都，先王之靈也必降災來懲罰百姓，故又謂：「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堯典》講及堯繼舜為帝時，舉行各種祭祀<sup>117</sup>。在正月上旬，舜在堯的太祖廟堂舉行即位儀式。然後，一方面觀測日月星辰，藉此以調整曆法；另一方面就是祭祀神明，包括以「類祭」祭祀上帝、以「禋祭」祭祀天地與四時之神明、以「望祭」祭祀山川之神明、以「柴祭」祭祀泰山等。此外，《尚書·堯典》中，還講及舜委派伯夷負責各種祭祀的禮官<sup>118</sup>。《尚書·召誥》也提及祭祀后土之神<sup>119</sup>。由此可見，在周以前，華夏民族除了信仰上帝作為最高神明之外，還信仰多神，特別是自然神。周代則不但以上帝為最高神明，且接近一神教的信仰。

## （六）卜筮

《周禮》有太卜、卜師、龜人、占人、筮人等之職，是屬於「宗伯禮官」<sup>120</sup>。《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自稱為周朝的「卜正官」<sup>121</sup>。《左傳》

<sup>115</sup> 「饒曰：『曷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祖考來格」，格是來。祖考指祖先之靈。《孔氏傳：「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sup>116</sup> 這是盤庚向殷人有關遷都的告誡，其中所謂「爾先」，乃指盤庚時殷人之祖先。

<sup>117</sup> 「正月上旬，受終於文祖。在瑤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歲於群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受終於文祖」句，《史記·五帝本紀》謂：「舜讓於德不慍，正月上旬，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集解》：「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司馬貞《索隱》謂：「《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肆類于上帝」，其中，「肆」解作「遂」，「類」是祭祀方式的一種，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五經異義》：「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禋于六宗」，「禋」也是一種祭祀方式，「六宗」指天地與四時。「望于山川，辨於群臣」句，「望」是另一種祭祀的方式。「岱宗」指泰山。此處引用之《史記》，臺灣宏業書局印行（民69年），內有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及張守節《史記·正義》。

<sup>118</sup> 《尚書·堯典》：「帝曰：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四岳」指各方諸侯，「三禮」，《史記集解》引馬融謂：「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這是舜問各方諸侯，誰能負責各種祭典？「僉曰」，《史記·五帝本紀》謂「皆曰」。

<sup>119</sup> 原文：「乃社于新邑」。社指祭后土之神。新邑，指新興建的洛邑。故「乃社于新邑」謂於新興建的洛邑祭祀后土之神。

<sup>120</sup> 見《周禮》卷二十四。

<sup>121</sup> 《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記載占卜之事甚多。例如：〈僖公三十一年〉，四月有「四卜郊」<sup>⑫</sup>；〈僖公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sup>⑬</sup>。可見先秦時期確有《周禮》所講的卜占之官職。卜與筮是兩種不同占卜，《禮記·曲禮上》：「龜爲卜，筮爲筮」。「筮」指用作占卜的蓍草。《尚書·洪範》所謂「洪範九疇」（九種治國大法）的第七疇，就是卜筮。卜筮之目的在於「稽疑」（解決疑難）。〈洪範〉主張「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並把爲國者解決疑難的次序分別爲：其先是自己用心思考，若無法解決，便上要與「卿士」們商議，再來是與百姓商議。最後若再無法決疑，便訴諸卜筮。故謂：「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研判卜筮的原則有六：

1. 第一個研判原則是：「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sup>⑭</sup>。意思是說，你若同意、龜卜、蓍占、官員及百姓的意見均贊同，就表示你身體安康強健，子孫昌盛，則便是大吉。
2. 第二個研判原則是：「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sup>⑮</sup>意思是說：你若同意，而龜卜、蓍占均贊同，但是官員及百姓不表贊同，仍可視爲吉。
3. 第三個研判原則是：「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sup>⑯</sup>這是說，官員、龜卜、蓍占均贊同，而你不贊同，仍可研判爲吉。
4. 第四個研判原則是：「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sup>⑰</sup>這是說，百姓龜卜、蓍占均贊同，你及官員不贊同，仍可研判爲吉。
5. 第五個研判原則是：「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sup>⑱</sup>這是說，你若及龜卜贊同，蓍占、官員及百姓不表贊同，則裡面爲吉，外面的事爲凶。
6. 第六個研判原則是：「龜筮共違于卜，用靜吉，用作凶」。<sup>⑲</sup>

<sup>⑫</sup> 原文：「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四卜郊，四次占卜以決定祭祀的日子。又：同年冬天，狄圍攻衛，衛遷都於帝丘。衛國太卜遂舉行占卜，占卜的結果認為在帝丘建師爲吉，可延長國運三百年。原文：「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sup>⑬</sup> 意謂懷嬴懷孕超過時間仍不生產，梁太卜招父與其子都舉行占卜。

<sup>⑭</sup> 從是贊同之意。此語引自《尚書·洪範》。

<sup>⑮</sup> 《尚書·洪範》。

<sup>⑯</sup> 《尚書·洪範》。

<sup>⑰</sup> 《尚書·洪範》。

<sup>⑱</sup> 《尚書·洪範》。

<sup>⑲</sup> 《尚書·洪範》。

這是說，龜卜著占的結果皆與你的意見不同，則一動不如一靜。靜為吉，動為凶。

《尚書·大誥》指出，由於人們不知天命，遂以占卜來測知天命<sup>130</sup>。〈大誥〉接著說「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sup>131</sup>。周公攝政期間，就討伐武庚的事求之於占卜<sup>132</sup>。〈召誥〉中，講及召公建洛邑，對於選擇洛邑的位置，也用問卜來決定<sup>133</sup>。

## 五、《詩經》中的天道觀

《詩經》中的天道觀，主要在於表現《小雅》及《大雅》。但是，由於《詩經》是一本詩集，作者意見不一，故《詩經》中的宗教觀並不是統一的。在《詩經》的《小雅》及《大雅》中，表現出當時官方與民間對上天的態度<sup>134</sup>。情形主要有二：其一是抱怨上天之不仁，其二是贊頌天道的偉大。

### （一）抱怨上天不仁

周人對上天的抱怨，主要是出於對政治及自然災害的不滿與不安。

#### 1. 對政治的抱怨

《小雅·節南山》：「昊天不傭，降此鞠誼。昊天不惠，降此大戾」<sup>135</sup>。

〈節南山〉是批評周朝一位姓尹的太師官之作，指責尹太師虐待百姓。詩人遂因抱怨上天不公平、不施恩惠，才讓太師尹掌權。又謂：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sup>136</sup>

由於詩人感到社會動盪不安，無日無之。亂象瀕瀕出現，遂使到百姓深感不安。這是出於當權者不理國政，詩人遂抱怨上天不憐恤百姓，仍讓尹太師之流濫權，虐待百姓。《小雅·巧言》謂：

<sup>130</sup> 《尚書·大誥》：「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意謂「豈能認為我懂得天命」？

<sup>131</sup> 寧王指文王，意謂文王遺留給我一個大寶龜殼，可用它占卜而知曉天命。

<sup>132</sup> 《尚書·大誥》：「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sup>133</sup> 「越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卜宅指占卜建洛邑的位置。得卜謂卜出來的結果是吉。經營指進行測量的運作。

<sup>134</sup> 「雅」指正樂。《小雅》乃民間之歌樂，《大雅》則為官方之歌樂。

<sup>135</sup> 不傭，即不公平。鞠誼，非常混亂之意。不惠，指不施恩惠。

<sup>136</sup> 「不弔」，謂不憐恤百姓。「亂靡有定」謂社會混亂而尚未回歸於安定。「式月斯生」，謂使社會不安的事情每個月發生。「俾民不寧」，謂百姓感到沒有安倚。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sup>⑪</sup>。無罪無辜，亂如此幪<sup>⑫</sup>。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幪，予慎無罪。

詩人強調百姓沒有犯罪，可是無辜百姓卻受到由社會動盪而產生的各種禍患。

## 2. 對饑荒的抱怨

《小雅·雨無正》因饑荒而抱怨上天不仁，故說：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sup>⑬</sup>。這是說，上天降下饑荒，不向百姓施大恩德，導致各國民不聊生，哀鴻遍野，這都是上天所降下的暴虐，沒有經過深刻考慮的。《大雅·蕩之什》的〈雲漢〉篇謂：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后稷不克，上帝不臨<sup>⑭</sup>。

這是詩人因天旱，天氣酷熱，人民難於忍受，遂抱怨上天不照顧百姓。由此可見，在周人的心目中，上帝不一定是至善。

### (二) 讚美上天之偉大

#### 1. 上天庇佑有德之人

《詩經》中對上帝作出正面肯定之處頗多，例如：

- (1) 天道默默運作：《詩經·大雅》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sup>⑮</sup> 這是強調天道玄遠，其運作持久永在。又《大雅·文王之什》的〈皇矣〉篇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這是說，皇天上帝以威嚴監視四方，以求百姓安享太平<sup>⑯</sup>。
- (2) 天道強調德範：《大雅·文王之什》的〈文王〉篇：「文王在上，於昭于大。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裡謂周文王在天之靈，其德範仍光照大地。周朝雖然是一個舊邦，但是不斷維新，永遠自強不息。
- (3) 天以道德律規範百姓，且上天也喜歡有德之人。故《蕩之什·烝民》：

⑪ 「曰父母且」，謂上天要像父母一樣對待下民。

⑫ 「無罪無辜，亂如此幪」，幪是大的意思，「亂如此幪」指大災難。全句謂百姓沒犯罪，卻受到這麼大的禍患。「無罪無辜」及「予慎無罪」，均強調百姓之無辜。

⑬ 「浩浩」，指浩大，其意與「昊天」相若。「不駿其德」謂上天不向百姓施大恩德。「斬伐四國」謂危害四面八天的國家。「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謂上天降下暴虐之事，沒有經過深刻考慮。

⑭ 蟲蟲謂旱天地氣酷熱，難於忍受。

⑮ 《詩經·大雅》〈周頌·維天之命〉。

⑯ 「赫」為威嚴之意。之莫謂社會太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sup>143</sup>」

- (4)上天視人以德：《大雅·文王》又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周人繼殷人而得天下，這裡強調在殷王朝尚未喪失政權之前，其國君之德，是配合上天之意旨的。後來殷王朝的統治者，因缺乏德行才被上天所遺棄。反之，周武王滅商，因有德而得天命。又由於周王能使百姓安居樂業，所以上天就不厭惡周王。故又謂：「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sup>144</sup>，「天命匪解」謂上天之命令是不會鬆懈的。
- (5)政權轉移，也以德為本：《大雅·大明》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生。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此詩的要旨在於所謂「天難忱斯，不易維生」句。根據《毛詩·鄭氏箋》，此句乃謂「天命無常，惟德是予耳」。周之文、武有德，故上天讓文王、武王有天下；與之相及，商王朝也因缺德而失天下。上天不是一旦給予誰掌權，便永遠讓其得天下。故謂「天難忱斯，不易維生」。由此可見，統治者得失之間，全視乎德與不德<sup>145</sup>。

## 2. 面對天道必須誠謹恐懼

《詩經》中有多處告誡吾人，指出天道威嚴，制惡懲奸。例如：

- (1)視天意不可違，《大雅·板》謂：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往）。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這是說：當上天發怒之時，你不可視為兒戲，必須鄭重其事。當上天變動其旨意時，你不可視而不見，仍舊任意妄為。偉大的上天明白一切，顯現一切，祂總是分秒不離開你。所以，你必須小心言行<sup>146</sup>。

- (2)上天的網羅，就在吾人身旁：

《大雅·蕩之什》的〈瞻卬〉，詩人就有類似的告誡：

<sup>143</sup> 「烝」民指百姓。

<sup>144</sup> 語出《詩經·大雅》〈周頌·閔予小子〉之〈桓〉。《毛詩·鄭箋》：「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孰之年，陰陽和也」。又謂「天命為善不解倦」。

<sup>145</sup> 《毛詩·鄭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其微應昭哲於天」。又謂：「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下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惟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sup>146</sup> 《毛詩·鄭箋》：「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與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汝之所為善惡，可不慎乎」。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sup>⑭</sup>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一語，意謂上天對人是很優厚的，但對壞人，則張著網羅來捉拿。「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一語，則謂上天的網羅其實就在吾人身邊，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這是詩人告誡吾人，要行為謹慎，不可任意妄為，否則必遭天譴。

## 六、結 論

綜合上述的分析，則在「甲骨文」與「金文」，以及《書經》與《詩經》中，所表現出先秦華夏民的宗教信仰，其重要環節如下：

### （一）甲骨文與金文中的宗教信仰

藉著上述的展示，說明了華夏民族有文獻可徵的早期宗教觀。首先，「帝」的概念已出於殷高宗武丁時代。「帝」字在甲骨文字又稱為「上子」、「上帝」、或簡稱為「上」。吾人現在把卜辭與金文中的上帝觀，綜合說明如下：

#### 1. 人間與自然界的主宰

古代農業社會，雨水或缺雨對農作物產生重要的影響，在卜辭中，殷人相信上帝掌控著雨水。不降雨就成為旱災，故殷人遇到天旱時，便認為這是出於上帝的掌控。雨水對於生活在簡單農業社會的人來說，是最敏感的自然界現象，古人對「上帝主宰著雨水」的信仰，其實可推廣為是一種可稱為「上帝乃自然界的主宰」的信仰。此外，上帝能賜福與降禍，能使王朝興亡，故上帝在殷人的心目中不僅是自然界的主宰，而且同時也是人間的主宰。

#### 2. 殷人是相信多神的

如河神、土地廣神及日神等。所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sup>⑮</sup>。所謂「先鬼而後禮」，是說商王朝重視祭祀之儀軌多

<sup>⑭</sup> 降罔之罔即網字。「天之降罔」，謂上帝降下羅網，捉拿壞人。

<sup>⑮</sup> 見《禮記·表記》。

於對君臣朝會的禮節。《禮記·表記》對般人尚鬼一事，可在甲骨文字中得到印證。值得重視的是：般人雖然有多神的信仰，但是，卻以上帝為最高的神明。

### 3. 上帝與天道

到了周初，上帝的觀念逐漸與「天」的觀念混合，對於這個問題，可見於以目前所發現的最早銘文，可就是《大豐殷》。

### 4. 在金文中，上帝有下述幾項屬性：

- (4.1) 上帝具有豐盛的美德。
- (4.2) 上帝或皇天是可畏的，但祂不是任意妄為的暴君。天授命給殷王或周王，乃以他們的德行爲依據。就以《孟鼎銘》之所言爲例：般人之所以「墜命」，並非上帝虐待般人，而是由於般人「率肆於酒，從而失去老百姓的愛戴（喪師）」。另一方面，上天授命給周文、武，並非上帝對他們有特別的偏好，而是由於文、武的德範。總言之，上帝是站在正義力量的一方，以打擊無道之君，武王成功滅殷即是一例。
- (4.3) 在金文裏，吾人也不宜把上帝視爲具有喜怒哀樂的人格化之神。在鐘鼎銘文中，上帝基本上只代表著一個像徵公義、德行的神明，祂其實並無特殊的喜好。在猶太教及基督教的《舊約》的〈出埃及記〉及〈約書亞記〉裏，古猶太人的神是他們的保護神及戰爭之神，並且是嫉妒之神，祂不容許猶太人敬拜別的神明及偶像。但是，金文中的上帝顯然不是這樣。
- (4.3) 從一方面說，金文中表明上帝是藉著「天命」而表現祂的公義。在另一方面，周王的德行又非出於遵守上帝所「啓示」的律令，這就假定了人類德性自覺的可能性。此外，「天命」乃以德行爲依據。在這個意下，天命的流行與人類的自我造命沒有差別，這個假定避免了「定命論」的思想。若與古代其他民族的宗教思想比較，則古代華夏民族以德性取向的上帝觀，確是周人的宗教思想之一大特色。

除了甲骨文字及鐘鼎銘文之外，《書經》和《詩經》中，也有表達兩周時代宗教信仰的古代文獻。

## (二)《書經》與《詩經》所表現的宗教觀

《書經》與「金文」所表現的「天道」觀中非常相似，上帝的觀念逐漸與「天」的觀念混合。一方面強調統治者必須恪守天命，另一方面又指出天命不是前定的，而是以善惡為本。這是說，上天把政權交付給有德者。這種觀點也見於《詩經》，故有所謂「天難忱斯，不易維生」，強調統治者得失之間，全視乎德與不德。《書經·堯典》講及祭祀時，除上帝之外，尚包括天地四時之神明，與甲骨文字的資料相似，是一種多神教信仰。但是，金文《尚經·周書》與《詩經》的「天道」觀念，則接近一神教，這其實表明周人與殷人在宗教信仰上的根本差異。《詩經》中，詩人一方面常把政治動亂與天災人禍，歸咎於上帝不體恤百姓。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強調視天意不可違，天以道德律規範百姓，上天只喜愛有德之人，因而吾人必須服從天道。

## (三) 先秦哲學與先秦的宗教信仰

由此可見，西周社會已逐漸形成一神教，並以上帝意旨作為德範的基礎。這種天道思想，由墨子繼承下來，作為其所謂「天志」的理論基礎<sup>⑭</sup>。因此，順著「天志」或《書經·周書》、《詩經》的天道觀，先秦的華夏民族原可發展出「一神教」的宗教生活。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如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儒家以人文精神取代了宗教信仰。孔子不是要否定「意志天」的存在<sup>⑮</sup>，他曾強調君子有三畏，並以「畏天命」為三畏之首<sup>⑯</sup>，他又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sup>⑰</sup>。孔子所強調的，是人文意識，所以，他在論及鬼神時，便謂「敬鬼神而遠之」<sup>⑱</sup>，又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sup>⑲</sup>，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sup>⑳</sup>。至於生死問題，他說「未知生，焉知死」<sup>㉑</sup>。孔子強調的人文精神，是從禮、仁、忠、恕等原則展開德教的人文精神。到了孟子<sup>㉒</sup>，企圖為德教的人文精神進一步建立理論基礎，一方面提出四

⑭ 《墨子·天志上》：「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

⑮ 事實上，孔子是默認意志天的存在，只是強調人文之重要性而已。故《論語·子罕》：「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⑯ 《論語·堯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⑰ 《論語·為政》：「……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順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⑱ 《論語·雍也》。

⑲ 《論語·先進》。

⑳ 《論語·八佾》。

㉑ 《論語·先進》。

㉒ 請參閱鄭芷人：〈心性、佛性及真性〉，《東海哲學研究集》，第8輯（2001/6），pp.25-90。



端說，另一方面又以心性取代天道，這就是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sup>150</sup>。儒家既沒有開拓出宗教，然而，宗教生活卻又是人生的一個重要環節，故到了東漢，才一方面從印度傳入佛教，另一方面，道教也在中土醞釀而出<sup>151</sup>。

---

<sup>150</sup> 《孟子·萬章上》。

<sup>151</sup> 請參閱鄭正人：〈論宗教應該是甚麼？〉，《宗教哲學季刊》，第4卷第1期（1998），pp.1-25.

# The Religion of the Hua-Xia People in the period of Pre-Qin

Kuang Zhiren

## 【Abstract】

This paper entitled *The Religion of the Hua-Xia People in the Period of Pre-Qin* intends to analyze and to reconstruct the religious phenomena which date to lat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t is without doubt that relig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Pre-Qin religion is inextricably concerned with the studies of cultural, social,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at that time. The source materials of this paper are *jiaguwen* (which means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jinwen* (or *zhongdinwe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f *Shujing* and *Shijing*.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ere inscribed on the tortoise carapaces or ox scapulae found at the site of the last capital of Shang Dynasty near present-day Anyang, Henan Province, and the *jinwen* which became widely used during the late Shang and Eastern Zhou Dynasty (ca. 1150-771 B.C.) is represented by the inscriptions cast or carved on ancient bronze vessels (bells and tripod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oth of the *jiaguwen* and *jinwen* are pictographic scripts which provide us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topics of religion. Although the oracle bones reveal to us an early pantheon including deities of sea, mountain, wind, myriads of ancestral spirits and other nature power, they show also that the concept of *Shangti*, the High God, was developed at the time of Shang. The *jinwen*, *Shujing* and *Shijing* exhibit a monotheism at the time of the Zhou Dynasty, and God (*tien*) was characterized on the one hand as anthropomorphic deity who appeared as an arbitrary pow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as a guiding principle of man's destiny or fate. God, for instance, did not seem to have a special preference for the Zhou people over other people. God took the mandate away from the last king of Shang because he was oblivious to the welfare of his subjects, and gave it instead to the founder of Zhou dynasty, who was virtuous and kind to the people. His determination was arbitrary in the sense that the human fate was determined solely by the deeds that man had done. God related to mortals not as a principle (in the sense of fountainhead) of salvation, but as a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short, God was the overseer of man's mind and deed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kings. This concept of monotheism as well as religious thinking, however, were not maintained further by Confucians, although Mocius (*Moti*) regarded the will of God (*tienzhi*) as the ultimate norm in his ethical theory.

# 《詩經》之敘述視點及視點、 聚焦模糊詩篇詩旨問題探討

呂珍玉\*

## 【提要】

《詩經》中詩篇之寫作方式有抒情、有敘事，然多數詩篇仍以敘述為其本體，抒情為其外加色彩。本文借用敘事學視點與聚焦兩個名詞，探討《詩經》靈活的敘述視點，以及視點、聚焦模糊詩篇詩旨相關問題，期望透過本文觀察《詩經》在中國敘事傳統中的一些地位，並在歷來多重詩義論外試圖開啟另一觀察詩義的視角。

關鍵詞：詩經 視點 聚焦 詩旨

---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一、前言

通常以為敘述屬於小說之專利，其實任何一段話語都是一種敘述形式。詩歌雖以抒情為主，但亦不離敘述，《詩經》中許多詩是敘述與抒情甚至議論密不可分的。就拿最膾炙人口的敘事長詩〈氓〉來說，其中就有被棄女子從青梅竹馬、戀愛、結婚，至被丈夫休棄回家途中的故事敘述；也有桑之未落，桑之落矣，淇水湯湯，漸車帷裳之類的即景抒情；更有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之類感情受挫後的議論。而有關《詩經》詩旨的論述更是紛紜，令人莫衷一是。如歐陽修《詩本義》提出的四重詩義論<sup>①</sup>、魏源《詩古微》提出的五重詩義論<sup>②</sup>、龔橙《詩本誼》提出的八重詩義論<sup>③</sup>、皮錫瑞《經學通論》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sup>④</sup>等等，這些都是專門討論《詩經》因歷史因素和文化脈絡而形成多重詩義的重要著作。而一般文論、詩論探討詩歌言外之意的論著尚不知凡幾<sup>⑤</sup>。委實讀者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可能受到個人的學識、經驗、背景、情境，以及對文本的宣示義和啟示義瞭解差異而有不同的解讀<sup>⑥</sup>，想要探求作者本義可能只是一種不太可能實現的理想。個人在閱讀《詩經》時，面對紛雜的詩旨，發現除了前人所提出造成詩義難明的種種論點外，尚有屬於閱讀時最為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有些詩敘述者為誰（視角）？和作者在文本中選擇被看的對象為何（聚焦）？不是那麼容易說得清楚，因而造成歷來說詩者各持不同看法。於是想借用敘事學的敘述人稱觀點（簡稱視

① 參《詩本義·本末論》，歐氏將先秦兩漢時期所形成的詩義析分為由詩人之意、太師之職、聖人之志、經師之業等不同階段所衍生出的四種不同詩義。

② 參《詩古微·毛詩明義一》，魏氏指出《詩經》有經由作《詩》者之心焉，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心，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心焉。

③ 參《詩本誼》序言，龔氏提出有作《詩》之誼、有讀《詩》之誼、有太師采《詩》瞽矇諷頌之誼、有周公用為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託之誼、有引《詩》以就已說之誼。

④ 詳參《經學通論》第二篇《詩經》頁1。

⑤ 詳參車行健先生〈論詩義之多重與詩本義之詮釋〉一文，該文引劉勰、皎然、朱自清、葉嘉瑩、梅祖麟、劉若愚等人討論詩義之多重性質甚詳，本文對此問題不再贅述。

⑥ 有關宣示義和啟示義詳參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第六頁〈中國詩歌的多義性〉。袁氏所謂的宣示義是詩歌借助語言明確傳達給讀者的意義，啟示義是詩歌以它的語言和意象啟示給讀者的意義。宣示義一是一，二是二，沒有半點含糊。啟示義包含雙關義、情韻義、深層義、言外義，詩人自己未必十分明確，讀者的理解未必完全相同，允許有一定範圍的差異。宣示義是一切日常的口語和書面語共有的，啟示義在文學作品中，特別是詩歌作品中更豐富。

點或視角)和聚焦兩個術語來討論這個問題。根據楊義《中國敘事學》的說法,所謂視角是從作者、敘述者的角度投射出視線,來感覺、體察和認知敘述世界的;假如換一個角度,從文本自身來考察其虛與實、疏與密,那麼得出的概念系統就是:聚焦和非聚焦。視角講的是誰在看,聚焦講的是什麼被看<sup>⑦</sup>。本文借用這兩個名詞,用以觀察《詩經》的多樣敘述視角,所呈現的文學美感,以及其中幾首視點與聚焦模糊詩篇的詩旨問題,作為另外一種探討多重詩義之嘗試。

## 二、《詩經》中的幾種敘述視點

傅修延先生《先秦敘事研究: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一書以為《詩經》中雅頌大部分詩篇可歸於“宏大敘事”,而國風主要是“私人敘事”<sup>⑧</sup>。他同時認為三百篇的敘事呈現濃郁的“感事”色彩,用“抒情詩”概括並不合適,因為抒情性只是附著其外的美麗毛羽,就本質而言抒情的敘事仍是敘事<sup>⑨</sup>。個人十分同意他的看法,因此利用敘事學的視點和聚焦兩個術語來探討《詩經》中相關問題。張素貞女士《細讀現代小說》一書,將小說的敘述觀點大略分為--第三人稱全知觀點、第三人稱全知有限觀點、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第一人稱自知觀點、第一人稱旁知觀點、客觀觀點、混合式觀點等七種<sup>⑩</sup>。《詩經》中的敘述觀點雖然不及如此豐富多樣,但亦頗具變化,大略有以下幾類:

### (一) 第一人稱敘述觀點(自知觀點)

《詩經》中以第一人稱為視點的詩篇約一百八十餘首,分佈在風、雅、頌中。敘述時用我、予(或予小子、予...自稱)、卬、寡人、朕、余,或省略人稱代詞等,而尤以用我最為常見,略舉詩例如下:

#### 1. 我

嘒嘒草蟲,趯趯阜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⑦ 參楊義《中國敘事學》頁 245。

⑧ 參該書頁 107。

⑨ 參該書頁 111。

⑩ 參該書頁 26。

降。〈召南·草蟲〉<sup>①</sup>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小雅·鹿鳴〉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周頌·賡〉

## 2 予（或予小子、予...自稱--予+同位名詞）

葛生蒙楚，蔕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唐風·葛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周頌·小毖〉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周頌·閔予小子〉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商頌·那〉

## 3.印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邶風·匏有苦葉〉

樵彼桑薪，卬烘于燧。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小雅·白華〉

## 4.寡人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先君之思，以勗寡人。〈邶風·燕燕〉

## 5.朕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與就之，繼猶判渙。〈周頌·訪落〉

## 6.余

...不念昔者，伊余來墜。〈邶風·谷風〉

## 7.省略人稱代詞

此類詩篇雖未見第一人稱代詞，但敘述者身份不難辨識，仍是「我」在獨白。

<sup>①</sup> 本文引用詩篇全採屈萬里先生《詩經證釋》之分章及新式標點，以下不再附註。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召南·小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鄘風·干旄〉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衛風·有狐〉

有頍者弁，實為伊何？爾酒既旨，爾饋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悅懌。〈小雅·頍弁〉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

《詩經》甚至後來的詩歌何以以第一人稱自敘形式為多？不難理解是因為第一人稱敘述，往往與觀察合而為一，最容易楔入事實，呈現出來的感情最為真實，在以言情為主的詩歌中最容易表現傷感、憤慨、相思等等自我內心情緒。這些情緒透過自我敘述，娓娓道來，語言親切真摯，亦最為接近敘述者內心的真實世界。

## （二）（第三人稱）全知觀點

小說以全知觀點為最基本與最普遍之敘述類型，因敘述者對人物的心理、事件的背景瞭若指掌，可用掌握全局的姿態敘述故事。在《詩經》中使用全知觀點，僅次於第一人稱自敘觀點，並且和第一人稱自敘觀點同樣的在風、雅、頌中不乏使用情形，亦分別略舉如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周南·樛木〉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鄘風·相鼠〉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王風·中谷有蓷〉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唐風·伐檀〉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小雅·天保〉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綏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文王〉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周頌·清廟〉

全知敘述觀點，往往較第一人稱自述來得冷靜客觀，乃因敘述者置身事外之故，可以高高在上觀察所敘人物之內心感情，或議論所敘人物之行

爲等。例如棄婦詩〈谷風〉、〈氓〉皆以第一人稱自敘方式穿透人物內心，敘寫其悲苦怨悔之情，棄婦形象生動，引發讀者對其不幸寄予無限同情。但以全知觀點敘述的〈中谷有蓷〉，省略人物遭遇過程的細節，只敘被棄婦人屢屢感嘆被棄之不幸；末句遇人之艱難矣，則議論女子共同的命運—嫁個好丈夫何其困難，以夫爲天的必然悲劇性了。兩種不同敘述觀點，營造出各自不同的情感氣氛。

### （三）第三人敘述觀點切換至第一人敘述觀點

《詩經》中亦有少數詩篇開始時用全知敘述觀點，後來觀察角忽然切換與推移，彷彿有個隱藏文後的敘述者忽然出現，而以第一人稱自述方式，有時甚至顯露自我姓名及作意，生動的表達自我的情感，或評論前面的論述。例如：

#### 〈召南·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首章)

林有樸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次章)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三章)

此詩一二章以第三人視角觀察並敘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青年男子追求女子的一個畫面。末章忽用女子第一人稱視角，並輕聲細語要男方勿過急躁，情境生動逼真，彷彿有一個真實的畫面突現讀者眼前。

#### 〈小雅·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於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首章)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次章)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三章)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四章)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五章)

此詩首章以第三人視點敘述征夫常懷有所不及之心，次章以下則轉換視點，由征夫自我敘述四處奔波訪查意見以補不足。

#### 〈小雅·鴻雁〉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歸，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首章)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次章)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三章)

此詩一、二章亦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敘述之子賑濟安撫流民，末章轉



以之子第一人自敘觀點說出內心爲人所猜忌之苦楚。

又如以下幾首詩，皆是前幾章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敘述，而末章出現作者姓名自述作意。〈小雅·巷伯〉詩序：「詩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末章：「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詩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末章：「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除以上例子外，觀察視角之切換與轉移，亦能達到較爲特殊之諷刺效果，例如：

〈陳風·株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首章）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次章）

此詩首章以設問形式，由第三者（詩人）詢問陳靈公、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何以去株林。答以去找夏徵舒。詩人由懷疑口氣，轉以相信之口氣說出那些人去株林找夏徵舒，而非夏姬。可是第二章敘述之角度轉換爲陳靈公等人自敘乘馬、乘駒、說于株野、朝食于株。於是彼等和夏姬朝夕淫泆不堪行爲，以自我暴露形式呈現，亦表現首章詩人對其言在疑信之間。方玉潤《詩經原始》對此詩的表達技巧，持高度之肯定，曰：

靈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姬事見春秋傳，而此詩故作疑信之謂。非特詩人忠厚不肯直道人隱，抑亦善摹人情，如見忸怩之態，蓋公卿行淫，朝夕往從所私，必有從旁指而疑之者，即行淫之人亦自覺忸怩難安，故多隱約其辭，故作疑信言以答訊者而飾其私。詩人即體此情爲之寫照，不必更露淫字，而宣淫無忌之情，已躍然紙上，毫無遁形，可謂神化之筆。<sup>12</sup>

可見視角之切換轉移，除避免平鋪直敘外，亦可達到高妙之諷刺效果。又在第三者全知敘述中，爲讓所敘人物呈現，亦可以切換由敘述中人物以第一人稱自敘方式敘述，使人物靈活呈現，栩栩如生。例如

〈大雅·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節錄首章）

<sup>12</sup> 參《詩經原始》頁634-635。

詩首先由詩人之觀察與視角敘述，續戎祖考至章末，轉以王之視角敘述，次章以後又轉由詩人第三者觀察與視角敘述至結尾，整首詩敘述靈活不呆板。

#### (四) 多元視角

所謂多元視角是若干個角色視角和敘述者視角在動態中組合，即前述張素貞女士所謂之混合視點。《詩經》中除了以上幾種敘述觀點外，亦偶有採用混合觀點，在同一事件中借由不同的敘述者敘述，呈現多元視角，讀者可由不同的敘述話語中拼湊出事情的整體印象。舉幾首詩為例：

##### 〈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首章)

伐木許許，釀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祭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次章)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待我暇矣，飲此湑矣。(三章)

第二章「我」與第三章「我」顯非同一人，若依姚際恆《詩經通論》的說法「微我弗顧」「微我有咎」為問詞的話，那麼第三章「我」為諸父諸舅，待我暇矣，飲此湑矣，即回答第二章不能前來飲宴乃不得空暇<sup>13</sup>。此詩為問答形式之多元敘述。

##### 〈小雅·杕杜〉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首章)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次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三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四章)

此詩前三章前四句以征夫第一人稱敘述方式，陳述征戍之苦，後三句

<sup>13</sup> 詳參《詩經通論》頁179，「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謂「寧得不來乎！無乃不我肯顧也？」「微我有咎」謂「無乃以我有咎也？」自反之意較前益深。

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思婦之盼望，而未章又以思婦之視角敘述憂心與期盼征夫之切，整首詩的敘述角度不斷的跳動。

〈魏風·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首章）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次章）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三章）

此詩首二句以行役者之視角敘述其對家人之思念，第三句以後則三章分別從父、母、兄之敘述角度，叮嚀他在外行役宜謹慎小心，早日歸來，無死於外。以雙方之視點敘述，並巧妙的以對話方式呈現，一樣相思，兩處情愁，征戍對征夫及其家人之傷害不言而喻，此種表達方式尤為特出。

〈小雅·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首章）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旄矣。彼旃旄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次章）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旄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三章）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四章）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五章）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六章）

此詩前四章由征夫以第一人稱「我」敘述，第五章轉為思婦憂念征夫口吻，至於末章由何人敘述，恐怕很難確定，既可屬征夫，亦可屬思婦，更可視為詩人口吻。整首詩由於敘述視角有多次變換，更能呈現這場戰爭在各階層人們心目中所引起的反響。

另如〈魯頌·閟宮〉（詩長不引）其敘述方式先由第三人稱視點敘述姜嫄之德，后稷教民稼穡，古公亶父遷岐，文王、武王之事功。接著以武

王之視點對周民說：「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接著寫成王，以成王之敘述觀點對周公說：「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之後至詩之結尾又以第三人稱敘述角度歌頌魯侯(伯禽)之事功。

除了敘述角度的靈活變化之外，《詩經》在寫作技巧上亦往往以轉移敘述對象來呈現真摯動人的感情，試以以下二詩爲說明：

〈衛風·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首章)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次章)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三章)

焉得萱草，言樹之北。願言思伯，使我心痠。(四章)

此詩以思婦第一人稱爲敘述角度，首章敘述之對象應是一般大眾，思婦向他們誇耀丈夫英武，執殳出征爲王前驅；但次章以後敘述之對象轉移爲其夫(伯)，寫盡相思之情。

〈鄭風·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首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次章)

此詩以女子第一人稱爲敘述角度，首二句敘述對象爲一般第三者，述說狡童不與她言、食，但後二句敘述之對象轉移爲狡童(子)，讀者似乎可以感受到她帶著愁苦撒嬌語氣，向狡童訴說因爲他的緣故而使她不能餐、息。

經由上文分析《詩經》的敘述視點，我們發現早在周代的詩人就已經利用各種不同的觀察角度和敘述角度將所見所感之事，以靈活多變具有文學美感的藝術形式呈現，使得詩中人物聲容若現。其他在興喻、剪裁取影、結構、呼應、對話、對比、襯托、鋪陳等等寫作技巧應用上亦十分純熟，較諸先秦時代簡潔質樸的敘述詩歌如〈擊壤歌〉、〈彈歌〉、〈南風歌〉、〈麥秀歌〉等，尤顯不凡成就。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敘述長詩〈悲憤詩〉、〈孔雀東南飛〉，尤其是〈孔雀東南飛〉的多元視點、剪裁合宜、雙線結構、穿插巧妙、前後呼應等敘事技巧的運用，使得詩篇呈現結構弘麗、內容動人、遣詞雋妙等藝術特色，被沈德潛《古詩源》推崇爲「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長詩也。淋淋漓漓，反反覆覆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王世貞《藝苑卮言》以極高評價評云：「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聖也。」

但何以在漢魏以後敘事詩有條件量產？而且出現不少如〈陌上桑〉、〈婦病行〉、〈孤兒行〉之類的佳作？論者或許提出諸多因素，因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容略而不談。但可以肯定的是《詩經》的敘事藝術向來不為學者重視，像劉大杰的《中國文學史》就以「在中國的詩歌史上，成績最好的是抒情詩，作品最少又較遲的是敘事詩，詩經的篇數雖是不少，除了祀神饗宴的樂章以外，大多數是抒情短詩…。」<sup>14</sup>個人以為《詩經》敘事技巧已處於萌芽之後的發展階段，在我國敘事詩發展歷史上是一個重要而不容忽視的里程。

### 三、視點與聚焦模糊詩篇舉例討論

根據楊義《中國敘事學》的說法視角是從作者、敘事者的角度，投射出視線來感覺體察和認知敘述世界，而聚焦是換一個角度，從文本自身來考察其虛與實，疏與密，…視角講的是誰在看，聚焦講的是什麼被看，它們的出發點和投射方向是互異的。《詩經》中以第一人稱敘述和（第三人稱）全知敘述模式最為常見，至於多元敘述或一些對話體詩篇其敘述者為誰？經常造成人們認知不一，而對詩義有不同的理解。有些詩讀者也不容易瞭解作者何以要選擇這樣的聚焦敘述，由於視點和聚焦模糊情形常同出一詩，因此我們把兩個問題放在一起討論，茲試以以下七首詩篇為例觀察：

#### （一）〈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首章）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次章）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三章）

陟彼砠矣，我馬瘡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四章）

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以為二三四章和首章結構不同，應是誤合兩詩<sup>15</sup>。此說未必能取信於人，猶如他懷疑〈召南·行露〉首章為誤合一樣<sup>16</sup>。我們觀察《詩經》多變化的視點之後，更不應僅從表面形式判

<sup>14</sup> 參《中國文學發達史》頁182-183。

<sup>15</sup> 參該書頁404-406〈詩經的錯簡〉第一條，有關〈卷耳〉的討論

<sup>16</sup> 參該書頁406-410〈詩經的錯簡〉第二條有關〈行露〉（附論〈式微〉），前於孫氏雖有王柏、王質懷疑此詩應無今日所見之第一章，但後人對諸氏之說亦多批評，同於〈卷耳〉不必然定為誤合兩詩。

定，更何況《詩經》中不乏 ABB 曲式詩篇<sup>17</sup>。此詩首章「我」和二三四章我是否為同一人？甚難定奪。也許至少可以作以下兩種瞭解：

### 1. 四章「我」皆為征夫

此說缺點是將首章採卷耳的人說成征夫，較不符合詩中一向以女子從事採摘工作之習慣；但若對照〈小雅·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也就不成問題了。亦有陳昌寧先生〈詩經隱語新探〉一文，主張採物是一種尋覓，懷人亦是一種尋覓，都是希望得到尋覓的對象，由於心理狀態的相同，它們的替代成為可能。而將「卷耳」虛化作為懷人隱語，而非寫實，將此詩簡單理解為一個男人的思鄉之作。<sup>18</sup>

### 2. 一章「我」為思婦，二三四章「我」為征夫

至於以思婦或征夫為視點，則各家所見略有不同，略述於下，以見讀者接受之差異：

#### (1) 主以思婦為視點者

如此首章為實寫，二三四章是思婦從對面設想的虛構形式。以下諸家的意見類此：

何琇《樵香小記》：「此必大夫行役，其室家念之之詩。」<sup>19</sup>

戴震《杲溪詩經補注》：「感念君子行邁，憂勞而作也。」<sup>20</sup>

陳啓源《毛詩稽古篇》：「婦人思夫之詩。」<sup>21</sup>

方玉潤《詩經原始》：「此當是婦人念夫行役而憫其勞苦之作。」<sup>22</sup>

程俊英《詩經譯注》：「這是一位婦女思念她遠行的丈夫的詩。她想像他登山喝酒，馬疲僕病，思家憂傷的情景。」<sup>23</sup>

#### (2) 主以征夫為視點者：

屈萬里先生《詩經詮釋》從行役者思家一面立說：「此當是行役者

<sup>17</sup> 所謂 ABB 曲式係指首章異於其後各章相同詩義之複沓形式。《詩經》中此種曲式除〈卷耳〉、〈行露〉外，尚有〈衡門〉、〈宛丘〉、〈車鄰〉等篇，不過前兩篇首章和其後各章銜接痕跡比較不明顯，因而前人有懷疑為錯簡或誤合兩詩造成；而後三篇稍露銜接痕跡，深思之可以找出彼此意思的連貫。

<sup>18</sup> 該文發表於《經化師專學報》1994年第4期。

<sup>19</sup> 參《樵香小記》卷上頁3。

<sup>20</sup> 參《杲溪詩經補注》卷上頁8。

<sup>21</sup> 參《毛詩稽古編》，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七九，第八十五本頁340。

<sup>22</sup> 參《詩經原始》頁179。

<sup>23</sup> 參《詩經譯注》頁8。

思家之詩。首章述家人思己之苦，二、三、四章則行役者自述思家之情也。」

屈先生之見和唐詩中諸多羈旅在外者思家，往往從對面設想家人思己之作相合，如高適〈除夕〉「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白居易〈至夜思親〉「想得家中深夜坐，還應說著遠行人。」

(3)主思婦與征夫並為視點者：

錢鍾書《管錐篇·毛詩正義六十則》：「嗟我懷人，又稱所懷之人為我…，葛藤莫辨，扞格難通。…實則涵詠本義，意義豁然。…男女兩人處兩地而情事一時，批尾家謂之“雙管齊下”，章回小說家謂之“話分兩頭”，紅樓夢第五回鳳姐仿“說書”所謂“‘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sup>24</sup>

此詩是否有一全知視角在敘述所看到個別的「我」呢？若是如此，《詩經》的敘述方式已開後代話本小說模式之先例。錢先生的瞭解方式，也為我們開闢了詩的多義多解，趣味盎然的情趣。在〈卷耳〉的舞台上，我們看到了思婦征夫分處不同的空間，訴說著自己的內心思念，而詩人巧妙的將兩個畫面剪接在一起了。後來戲曲舞台可以同時分割為幾個不同空間演出或電影的蒙太奇剪接技巧，皆是此藝術技巧之應用。

個人以為此詩三章我皆為征夫，較合於整首詩採用第一人稱一致的敘述角度；但第二種瞭解不論從對面設想或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則較具文學藝術美感。

## (二)〈鄭風·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首章)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次章)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三章)

此詩以對話體呈現，除首章首二句女曰、士曰註明敘述者之外，他皆省略，因而敘述角度不易辨識，加上末章突然轉移一二章對話話題，作者

<sup>24</sup> 參《管錐篇》頁67~68。

在此將聚焦轉移，因而連二三章的「子」是否同為一人，也有些模糊，於是歷來注家詮說詩旨十分紛歧。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弋言加之，與子宜之。」：鄭《箋》：「言，我也。子謂賓客也。」第二章以下之「子」，鄭《箋》皆訓為「賓客」，照鄭玄的說法和「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首章之「子」從對話順序及意思的貫串來看，應為女稱士，婦人稱呼其夫，「士」與「賓客」顯然不為一人，而鄭玄將毛序的「德」說成「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此係漢人以美刺、道德教化說詩之故。如果從對話的正常連續以及詩意的貫串看，我們很難同意首章和次章的「子」不為同一人。

後代注家對此詩之敘述者及詩旨討論甚多，茲整理幾位注家之見如下：

### 1. 朱熹《詩集傳》

敘述者：

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

詩旨：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

### 2. 王質《詩總聞》

敘述者：

大率此詩婦人為主辭，故子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

詩旨：

當是君子與朋友有約，夫婦相警以曉，恐失期也。

⑮ 以下引用資料參《詩集傳》頁205-208。

⑯ 以下引用資料參《詩總聞》，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六十六，第七十二本頁500。



### 3. 方玉潤《詩經原始》

敘述者：

觀其詞義「子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詞。

詩旨：

首章勉夫以勤勞，次章宜家以和樂，三章則佐夫以親賢樂善而成其德。

### 4. 屈萬里《詩經詮釋》

敘述者：

次章為男子之語，三章為女子之言。

詩旨：

此男女相悅之詩。

朱熹、王質、方玉潤三家皆主「子興視夜」以下為婦人之詞，對詩旨的看法也大致主張婦人欲其君子親賢樂善。屈先生主張次章為男子之詞，詩旨為「男女相悅之詩」異於舊說，就敘述角度而言有可取之處。雖然他只說「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為女子之言，但未說明「將翱將翔，弋鳧與鴈。」為誰之言，以他說第二章為男子之言來觀察，此句似應為男子之言，因為「弋鳧與鴈」和「弋言加之」弋鳧鴈為男子之事，而上下兩「弋」相承接。至於「宜」(治饋)是否男子不得為之，尚難定論，但接續首章「子」為女稱男，二章似為女子之言為妥。至於第三章敘述者為誰？「知子」為誰？由於聚焦模糊，到底在這裡什麼東西被呈現？作者想要表達什麼？朱熹等三家主張敘述者為女子，此「知子」為與其夫友善之賢士，如此訓釋雖然義猶可通，而且聚焦選擇好賢樂善，亦頗具積極教化之意義。但整首詩連讀下來，敘述話題似乎離開了次章。屈先生雖主此章敘述者為女子，但未釋「知子」，從他所說的詩旨觀察，應指「士」，所以在《詩經詮釋》本篇第二條，他根據《荀子》釋未婚夫為「士」，進而將「士」說為「情人」，此句「知子」為女子稱她的情人。屈先生的說法雖然較合於敘述情境，但也不敢說他的說法一定對，其他三家的說法就錯了。因為我們難曉詩中人物對話之前提、背景、現場環境等等狀況，縱能瞭解文字的宣示義，也無法確切知道背後之思。讀《詩經》愈發同意王夫之所說的：「作者用

⑲ 以下引用資料參《詩經原始》頁468。

⑳ 參《詩經詮釋》頁145-146，「女曰雞鳴」第七條、第十二條及第一條註釋。

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sup>29</sup>何況此處作者選擇的聚焦為何？我們毫無著力點去作確認。

### (三)〈鄭風·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首章）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次章）

本詩以（第三人）全知視點敘述，但中間讓焦點人物女與士對話，突破板滯的敘述，而在「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又未註上士或女之語，因而歷來注家對此句話的視角看法不同如下：

#### 1.鄭《箋》

…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

#### 2.朱熹《詩集傳》

…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

#### 3.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

既且二字當為暨之訛。《小爾雅》「暨，息也。」暨與暨通。《大雅·嘉樂》「民之攸暨」，《傳》「暨，息也。」左氏成二年，昭二十一年《傳》並引《詩》「民之攸暨」，杜注「暨，息也。」暨暨皆愒之假借，《說文》「愒，息也。」暨與觀相對成文，女曰觀乎，勸其往也，士曰暨，勸其息也，蓋士初未去，但言欲止息，故女又言洧之外，洵訏且樂，以勸其往觀，若如

<sup>29</sup> 參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三《詩經證釋》頁1—《詩譯》第二條。

<sup>30</sup> 參《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82。

<sup>31</sup> 參《詩集傳》頁224。

<sup>32</sup> 參《毛詩傳箋通釋》頁456。

《箋》云，士曰已觀，則洧外之樂士已知之，女不復以洵訐且樂勸之矣！暨从且，與且形相近，又與且往觀乎文相連，因訛為既且二字，漢張遷碑既且亦暨字之訛，與此相類。

#### 4. 郭沫若《卷耳集》譯為：

—女的說：「朋友我們去看看吧！」男的說：「我已經去了，要回家；但是我再陪你到洧水那邊，那兒真是有趣，火熱朝天。」<sup>33</sup>

郭氏以為此兩句乃士所言，女子未去洧之外，何以知道洧之外洵訐且樂，所以為男方主動遷就之詞。

個人以為「且」可通「徂」，作「往也」，亦可以常義釋為「姑且」，女子聽說男子去過了，再邀男子一同前往。馬瑞辰以為既且為暨之訛，以張遷碑薄弱孤證，較難信服於人。何況作「既且」於文意亦通，且在文句的對稱上，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似乎比單用「暨」整齊。又他懷疑鄭《箋》士曰已觀，則洧外之樂已知之，女不復以洵訐且樂勸之。這樣的說法亦不盡合人情，一個人受邀重遊舊地乃常有之事，更何況是情竇初開，熱情洋溢的女子邀約。郭沫若持相反之見，以為女子未去洧之外，何以知道洧之外洵訐且樂，此亦過於拘泥。修禊乃每年盛事，猶今台北元宵燈會，雖今年尚未去過，豈不能以過往經驗知曉？本詩由於敘述角度的跳動，在平板的第三者全知觀點敘述中，忽然讓其中所述之人物對話，若不標示說話人，常有可能形成視角的模糊。以此例言，作女再邀之辭，反能彰顯女子之熱情。

#### (四) 〈鄘風·蟋蟀〉

蟋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首章)

朝蟻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次章)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三章)

依毛鄭之見，此詩為（第三人稱）全知視點，指責淫奔無貞潔之信之女子，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朱熹的說法無異於毛鄭，更於其上增添程子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的道德批判。方玉潤《詩經原始》：「此詩舍卻宣姜，別無他解，蓋與新臺相為唱答耳。」又說：「新臺以刺宣姜，故詩人又設

<sup>33</sup> 參《卷耳集》頁 32

爲宣姜之意，代答新臺，互相解嘲，亦諷刺中之一體也。」<sup>34</sup>方玉潤以宣姜事跡與此相類，而將舊說（第三人稱）全知視點，轉爲以宣姜爲視角，並以史證詩，這是不錯的發現，只是難以證實必爲詩人代宣姜而作以答〈新臺〉。屈萬里《詩經詮釋》：「此蓋既嫁之女，而拒其他求婚者之詩。」<sup>35</sup>則比較保守的把視角說成既嫁之女，如此要較舊說合於文意。《詩經》中多首出現「女子有行」，都用於女子自稱出嫁，有別於他稱「之子于歸」<sup>36</sup>，因此本詩視角爲既嫁之女子。由於此詩曲式較爲特殊，前兩章後半複沓，第三章另起新調，若以符號表示爲 AAB 式，根據筆者統計《詩經》中以此形式表現的詩篇共十七首<sup>37</sup>，此式以第三章爲尾聲，全詩意旨大都在尾聲部份，卒章以見志。此式往往卒章和前數章銜接不緊密，形成詩意上下脫節現象，聚焦十分模糊，因而賦予讀者閱讀空間加大。下面討論的〈齊風·甫田〉亦爲形式相同的 AAB 式。

假若此詩視點爲女子，「女子有行」爲其自稱出嫁，則此詩第三章「乃如之人」絕不可能是「女子」，因不可能自己指責自己。毛鄭、朱熹未認清本詩視點，說成指責淫奔無貞信之女子，並不正確，被指責的對象應是第三章的「之人」（是人），各家說法中以屈萬里先生《詩經詮釋》最接近詩義。舊說未能對「有行」作正確瞭解，因而弄錯觀察視角。今日讀《詩經》更應用周密的方法歸納相同詞語用例，畢竟在正確瞭解詞語含義之下，一切的討論方站得住腳。

## （五）〈齊風·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首章）

<sup>34</sup> 參《詩經原始》頁 371

<sup>35</sup> 參《詩經詮釋》頁 93。

<sup>36</sup> 如〈邶風·泉水〉「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衛風·竹竿〉「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皆用於自稱；而「之子于歸」用於他稱之例甚多，不煩枚舉。

<sup>37</sup> 筆者統計 AAB 不完全疊詠體係採較爲嚴格之標準，如末章和前幾章僅與句相同，或與句雖不同，其後敘述複沓者，均未予計入。屬於此種形式之詩篇有：〈葛覃〉、〈汝墳〉、〈采芣〉、〈野有死麇〉、〈燕燕〉、〈蟋蟀〉、〈大車〉、〈子衿〉、〈雞鳴〉、〈東方未明〉、〈甫田〉（齊風）、〈匪風〉、〈下泉〉、〈裳裳者華〉、〈隰桑〉、〈芣之華〉等共十六首。

<sup>38</sup> 如〈邶風·泉水〉「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衛風·竹竿〉「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皆用於自稱；而「之子于歸」用於他稱之例甚多，不煩枚舉。詳參郭芹納〈詩經中的于歸和有行〉一文，《蘭州大學學報》1980 年 2 期。

<sup>39</sup> 筆者統計 AAB 不完全疊詠體係採較爲嚴格之標準，如末章和前幾章僅與句相同，或與句雖不同，其後敘述複沓者，均未予計入。屬於此種形式之詩篇有：〈葛覃〉、〈汝墳〉、〈采芣〉、〈野有死麇〉、〈燕燕〉、〈蟋蟀〉、〈大車〉、〈子衿〉、〈雞鳴〉、〈東方未明〉、〈甫田〉（齊風）、〈揚之水〉（唐風）、〈匪風〉、〈下泉〉、〈裳裳者華〉、〈隰桑〉、〈芣之華〉等共十七首。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次章）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三章）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四章）

此詩採第三人稱全知視點，但各章敘述之焦點爲何人？各家看法不一：

1. 鄭《箋》以爲首章非文姜，次章非齊襄，三、四章非魯桓。③⑧
2. 朱熹《詩集傳》以爲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③⑨
3. 嚴粲《詩緝》以爲四章皆刺魯桓。④⑩
4. 方玉潤《詩經原始》以爲首章非齊襄，次章非文姜，三、四章非魯桓。

④①

個人以爲造成各家對於各章敘述焦點所論不一之故，或是由於對「興」句取義和字詞訓解差異之故、或是純從個人接受和感受，而加以批判之故。像嚴粲《詩緝》以爲四章皆刺魯桓，純從魯桓不能約束文姜，而使她婚後仍延續和襄公間的不軌行爲。完全未對此事件的其他二位關係人加以批判，似乎不是很公允的看法。

如果我們從文字的宣示義來觀察，首章興句「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說法十分可取。他以南山喻國君之威嚴，以雄狐喻齊襄，則失人君之度。又「由歸」馬瑞辰以爲猶言「于歸」。「曷又懷止」的「懷」，毛《傳》：「懷，思也。」鄭《箋》：「懷，來也。」馬瑞辰亦以《箋》說爲是，《方言》：「來，齊魯之間曰懷。」此處「懷」該作何講，頗難抉擇。若以興句喻齊襄，此處所敘當是其所爲，似作常義「思」爲允。如是首章指責齊襄不該在其妹嫁魯後，仍不能斷絕對她的思念。若依鄭《箋》之見，似乎指責文姜不該在出嫁後仍回齊國會見其兄，如此和興句喻齊襄就不一致了。

次章興句「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取義爲何？由於毛鄭的說法過於

③⑧ 參《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95-197。

③⑨ 參《詩集傳》頁238。

④⑩ 參《詩緝》頁91。嚴氏謂釋序言：「大夫去國，其心蓋有不得已者。襄公之惡不可道矣！齊之臣子難言之，故此詩不斥其君之惡，而唯歸咎於魯桓，與敝苟意同。後序以雄狐爲指齊襄，故云鳥獸之行，非也。」

④① 參《詩經原始》頁519-520。

曲折，難以令人接受<sup>④2</sup>。屈萬里先生《詩經詮釋》懷疑屢綏兩物皆結婚時新娘所製以贈新郎者，如是則此章興句焦點在文姜。以下則指責文姜既嫁於魯，何又回齊從其兄。鄭《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如是解「從」難脫增字解經，不能令人同意。朱熹《詩集傳》：「…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因而他以為刺襄公。就「從」字的解釋來說較鄭《箋》合於實際，但將「從」訓為「相從」，亦是增字解經。個人以為此處馬瑞辰的說法最好，亦可批評鄭《箋》、朱《傳》之非，謹引如下：

瑞辰按：《詩·君子陽陽》《傳》由，用也；庸訓為用，即為由矣，謂由之以嫁於魯也。《說文》從，隨行也；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桓十八年《左傳》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是夫人姜氏從公如齊之事。詩曷又從止，正指夫人從公如齊而言，《箋》謂襄公送從之，非是，襄公無從文姜至魯之事…。

④3

就興句、「從」字之訓解和史實而言，次章應以刺文姜為是。

末兩章各家之說法皆以為非魯桓，主要由於詩中有「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設問之對象為魯桓，責問句「既曰告止」、「既曰得止」亦針對魯桓，文意較為清楚之故。因此像方玉潤《詩經原始》說：

魯桓、文姜、齊襄三人者、皆千古無恥人也。…故此詩不可謂專刺一人。首章言齊襄縱淫，不當自淫其妹，妹既歸人而有夫矣！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懷之有乎？次章言文姜即淫，亦不當順從其兄，今既歸魯而成耦矣！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返齊而從兄乎？後二章言魯桓以父母命憑媒妁言而成此婚配，非苟合者比，豈不有聞其兄妹事乎？既取而得之，則當禮以閑之，俾勿歸齊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從其入齊，至令得窮所欲而無止極，自取殺身禍乎？故欲言襄公之淫，則以雄狐起興；欲言文姜成耦，則以冠履之雙者為興；欲言魯桓被禍，則先以藝麻興告父母以臨之，析薪興媒妁以鼓之，而無如魯桓之懦而無志也，何哉？詩人之大不平也，故不覺發而為詩，亦將使千秋萬世後知有此無恥三人而已，又何暇為之掩飾其辭，而歸咎於一哉！<sup>④4</sup>

因此〈南山〉詩的敘事聚焦，透過興句、歷史背景、字詞訓解等，應

④2 參《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96，毛亨傳，鄭玄箋。

④3 參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480。

④4 同註39。

該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

## (六)〈齊風·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首章)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次章)

婉兮孌兮，總角卬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三章)

此詩係(第三人稱)全知視點，但第三章敘述之聚焦各家見解不一。本詩和蟋蟀詩一樣屬 AAB 曲式，因第三章尾聲和前二章意思連貫發生斷層，再加上說詩者的不同經學背景，讀者的個人接受不同，於是眾說紛紜，至少有以下幾種看法：

### 1.主刺國君

(1)《詩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sup>45</sup>

(2)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無田，齊人刺魯莊公也。」<sup>46</sup>

### 2.主做事應循序不躐等

朱子《詩集傳》：「…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不達矣！」<sup>47</sup>

### 3.主懷人

(1)傅斯年《詩經講義稿》：「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sup>48</sup>

(2)屈萬里《詩經詮釋》：「此蓋喜遠人歸來之詩。」<sup>49</sup>

(3)王靜芝《詩經通釋》：「此詩乃安慰離別之人之詩。前二章勸勿作徒勞之懷念，三章設想遠人將不久歸來，則將見其成長而弁也。」

<sup>45</sup> 參《十三經注疏·詩經》頁 197。

<sup>46</sup> 參《詩經世本古義》，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十一本頁 755。

<sup>47</sup> 參《詩集傳》頁 238-239。

<sup>48</sup> 參《詩經講義稿》頁 87。

<sup>49</sup> 參《詩經詮釋》頁 172。

50

(4)陳延傑：「一若懷念遠人者。夙昔婉孌童子已自長成，而遠人尚未歸。」<sup>51</sup>

#### 4.主勤勉於業，無荒於嬉

陳應棠《詩風新疏》：「詩中前兩章重點在無思遠人一語，而卒章在突而弁兮一語。前兩章在戒好高慕遠，而卒章在戒玩忽時日。全詩乃警惕人業須專精，及無荒於嬉也。」<sup>52</sup>

#### 5.意旨不可知

方玉潤《詩經原始》：「此詩詞義極淺，盡人能識。惟意旨所在，則不可知。」<sup>53</sup>

面對同一首詩，就有五種不同主題之見，而各主題之下又有不同看法，固然令人沮喪，追求作者原意，或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我們為本詩註釋時，若先掌握字詞之宣示義，一二章首二句興取義為無種大田，種大田力有未逮，徒然雜草叢生；以興三四句敘寫懷遠人，遠人不至則徒然心勞，如果將主題放到懷遠人，似較近乎宣示義。至於第三章因為話題轉移太厲害，作者選擇的聚焦不明顯，讀者難以知道作者說話的情境背景，到底這個婉孌總角之人，是否為相思之對象，抑是作者以婉孌童子突而弁兮打比方，安慰其所思之人亦將如童子很快成長，遠人亦不久將歸來。但面對懷遠人主題之下四說，我們幾乎無法確定何說近乎詩旨。

方玉潤對詩旨持保守看法，或許因此而起。至於毛詩序、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則是以一國之事繫於一人之本，賦予美刺教化功用說詩。朱熹所謂戒時人厭小惡大忽近圖遠；或陳應棠所謂戒好高慕遠玩忽時日，應是在首二章以思遠人為主的宣示義外的言外義聯想了。

### (七)〈邶風·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首章)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次章)

<sup>50</sup> 參《詩經通釋》頁219。

<sup>51</sup> 轉引自楊師承祖《詩經講義》(未出版)頁242。

<sup>52</sup> 參《詩風新疏》頁242。

<sup>53</sup> 參《詩經原始》頁522-523。



右手執籥，左手稟翟。赫如渥赭，公言：「賜爵。」（三章）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四章）

此詩之敘述者應為第三者詩人，因為舞師不可能自我矜誇「碩人」。前三章由詩人視點敘述他所觀察舞師表演萬舞的過程，至於末章視點與聚焦由前三章的敘述轉為抒情，固然可看成是繼續由詩人以全知視點透視舞師之內心，亦可瞭解為詩人自述愛慕舞師之內心抒發，於是末章的敘述焦點不明，而影響各家對詩旨看法不同。再加上第四章西方美人是誰？至少有以下數說：

### 1. 上句美人為周室之賢者，下句美人為碩人

(1) 鄭玄《箋》：「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

鄭玄《箋》：「彼美人謂碩人也。」

(2) 孔穎達《正義》：「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為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sup>54</sup>

### 2. 西周盛王

(1) 朱熹《詩集傳》：「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sup>55</sup>

(2) 姚際恆《詩經通論》：「西方，西周。美人，西周王者。鄭氏以上美人為周室之賢，下美人謂碩人，非也。美人者，美德之人，猶聖人、彥士之稱，後世以婦人色美亦稱美人。集傳曰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徇後世之說反謂以婦人指君，可謂循流而忘源矣！靜女篇美人之貽，謂美其人之貽。」<sup>56</sup>

### 3. 舞師

(1) 聞一多《風詩類鈔》：「西方似指宗周。美人就是上文稱為碩人的舞師。就第三章看，這詩的作者無疑也是一位女子。左傳載令尹子元會想用萬舞來蠱惑

<sup>54</sup> 以上見《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01。

<sup>55</sup> 參《詩集傳》頁95。

<sup>56</sup> 參《詩經通論》頁63。

新寡的夫人（莊二十八年），足見這種舞對女性可能會發生力量。」<sup>57</sup>

(2)王靜芝《詩經通釋》：「言山則生榛，下濕之地則生苓，為物之生各因其地之適也。而今善舞者則由西方而來，蓋西方為周之興起之地，文物鼎盛，故能生此善舞之人，有此盛美之舞也，故曰觀此舞則引起何思？思西方之美人矣！」<sup>58</sup>

第三章詩人想呈現什麼？無法從模糊的聚焦觀察。但鄭玄、孔穎達將上下美人作不同訓解並不恰當，至於美人是西周盛王或舞師？因為不能確知作者選擇何種聚焦？作意為何？大概無法得知正解吧！

#### 四、結語

歷來論述詩義多重之作不勝枚舉，本文期望換個角度，應用敘事學視點與聚焦兩個名詞，來觀察《詩經》的敘述技巧及詩旨模糊問題。研究發現雖然是以抒情為主的詩歌，但它的敘述方式仍極為靈活，除以常見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第一人稱自知視角敘述外，還常使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切換至第一人稱自知視點，或多元流動視點等敘述方式，展現《詩經》時代不凡的詩歌創作藝術，在我國敘事文學的傳統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透過幾首視點與聚焦模糊詩篇的考察，發現雖然有些也和字詞訓詁、興句瞭解、以史證詩、言外義深層聯想有關，亦呈現少數詩篇難以判定視角為誰的問題，若能加以分析敘述視角，對詩義瞭解與欣賞將有一定的幫助。又對於文本主題選擇的聚焦，亦是各家解說詩義分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十七首卒章見志的 AAB 曲式，聚焦尤為模糊。因此探究文本中什麼東西被呈現，不失為更貼近作者創作意圖之詮釋方法。當然不乏視點與聚焦無從確定之詩篇，如是讀者就更能進出其中，各以己意得之了。

<sup>57</sup> 參《風詩類鈔》頁 20。

<sup>58</sup> 參《詩經通釋》頁 105。

## 參考書目

### 一、《詩經》注釋相關書籍及論文

1.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詩經》，藝文印書館，未註出版年月。
2. 朱熹：《詩集傳》，藝文印書館，1974年4月三版。
3. 歐陽修：《詩本義》，四部叢刊本，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經部，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年出版。
4. 王質：《詩總聞》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十六本。
5. 嚴粲：《詩緝》，商務四庫珍本。
6.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十一本。
7. 戴震：《杲溪詩經補注》，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
8.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藝文印書館影印光緒十三年二月廣雅書局刻本。
9.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十五本。
10. 何琇：《樵香小記》，收入《學福樓齋雜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
11. 姚際恆：《詩經通論》，廣文書局，1993年10月三版
12. 方玉潤：《詩經原始》，藝文印書館，1981年2月三版
13. 龔橙：《詩本誼》，半厂叢書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08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14. 聞一多：《風詩類鈔》，收入《聞一多全集》，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8年2月港初版。
15. 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79年12月一版二刷。
16. 傅斯年：《詩經講義稿》，收入《傅斯年全集》，聯經出版社，1980年出版。
17. 郭沫若：《卷耳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一版一刷。
18. 王靜芝：《詩經通釋》，輔仁大學文院出版，1968年7月初版。
19. 屈萬里：《詩經詮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9月出版。

20. 錢鍾書：《管錐篇》，中華書局，1986年6月一版二刷。
21. 陳應棠：《詩風新疏》，稿本未出版。
22. 楊瑞嘉：《龔橙詩本誼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23. 車行健：《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里仁書局，2002年2月25日初版。
24.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一版五刷。
25. 陳昌寧：〈詩經隱語新探〉，《綏化師專學報》，1994年第4期。
26. 王碩民：〈試析詩旨歧義現象產生的原因〉，《安徽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4期，1998年。
27. 夏傳才：〈國外詩經研究新方法論的得失〉，《文學遺產》，2000年6期。
28. 車行健：〈論詩義之多重與詩本義之詮釋〉，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第23期，2000年6月。

## 二、語文學相關書籍

1. 《爾雅》，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2. 《方言》，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3.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九
4. 董洪利：《古籍的闡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一版三刷。

## 三、文學理論與作品閱讀相關書籍及論文

1. 傅修延：《講故事的奧秘—文學敘述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1月一版一刷
2.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一版一刷。
3.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2月再版。
4. 楊義：《中國敘事學》，收入《楊義文存》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北京一版
5. 徐亮：《意義闡釋》，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年6月一版一刷。
6. 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東方出版社，1999年12月一版一刷。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Narrative Focaliza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How It Focuses/Defocus the Themes**

Lu Chen-Yu

### **【 Abstract 】**

The nature of *The Book of Songs* (*Shih Ching* 詩經)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lyrical narrative poetry, with narrative as its main body and lyricism as its outer appeara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focus on these two aspects of this great Chinese classic, analyzing the narrative focalization as embodied in it; how it uses various perspectives to focus or de-focus the main theme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that *The Book of Songs* plays in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to open another horizon to look into the thorny issue of ambiguity in its mean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focalization.

**Keywords** : *The Book of Songs* , narrative, theme of the poetry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44卷 頁63-89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年7月

## 棄婦的悲歌

### ——試析唐代詩人魚玄機與臺灣詩人王香禪

許惠玟\*

#### 【提要】

本文嘗試由魚玄機與王香禪二人的相似之處作為比較基點，希望從二人的身份、遭遇及時代背景來探討，當婦女被棄時，其因應之道與心理轉折的過程。此外，不同的時代背景(唐代及日治)對於婦女的創作，會產生何種程度的關涉？二人在被棄之後，是否各自發展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詩作風格？

從詩作來看，魚玄機勇於表達自己的感情，毫不矯揉與做作，這種生命情調的激昂，和其「女冠」的身份，以及唐代開放的社會背景關係密切。此外，對於魚玄機本身「女性意識」的呈現，我們也應予以高度肯定，她的作品抒寫真誠、坦白、大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閨閣文學中含蓄內斂的一面，因此我們可以說她的詩作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以此標準檢視王香禪，其所受的社會與身份包袱，遠較魚玄機來得沉重，魚玄機「被棄」之後，在追尋真愛的過程中「屢仆屢起」，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令人激賞。而王香禪在「被棄」之後的作品，在在反應出因為情場不得志，而埋首於佛教之中，以之作為一種「逃避」的態度，二者相較之下是比較消極的。日治時期「女性意識」並不因其距離現代較近而有所提升，反因長時期的深化醞釀，形成更加牢不可破的圍籠，從魚玄機到王香禪，其「女性意識」的不升反降，更可以看出這樣的遞嬗變遷。

唐代風氣的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魚玄機敢於追求所愛，熱烈直接的詩風。反觀王香禪，由於所處的日治時期，是一個雙重迫害壓抑的時代，使她無法真正地暢所欲言，詩風趨向內斂深沉。而二人在被棄之後，的確各自發展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詩作風格。在各自所處的時代中發顯自己的光芒。

關鍵詞：棄婦 魚玄機 王香禪 唐代 日治

\*吳鳳技術學院講師

## 一、前 言

在中國文學的洪流中，女性文學一直處於邊緣地帶，正如台灣文學剛開始起步的時候，所面臨的「邊疆化」、「邊緣化」一樣，而「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文學更是「邊緣中的邊緣」，作品數量相形之下少了許多。儘管女性作品流傳下來的並不多，但也有一些例外，身處於中國「唐代文學」邊緣的魚玄機及台灣「台灣文學」邊緣中的邊緣的王香禪，正是其中的翹楚。魚玄機素有唐代三大女詩人之譽，往來酬唱的文人極多，後因「殺婢案」喧騰一時。王香禪除了是台北有名的藝旦之外，亦具詩名，常與當時文人有所唱和，並在報上引起幾次不小的關注風波（一為與羅秀惠離婚事件，一為自稱鄙人事件），二人在當時的知名度均很高，也引起相當重視。本文之所以選擇以魚玄機及王香禪作為比較，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尚有以下幾點：

- （一）二人均曾嫁為人婦，處於婚姻關係的狀態之下。魚玄機於 15 歲時嫁給李億為妾。王香禪則嫁給當時台南舉人羅秀惠為妻。
- （二）二人均在婚後為丈夫所棄。魚玄機在婚後不到三年，即因大婦不容，而被李億送到咸宜觀為女道士；王香禪與羅秀惠婚後同樣不到三年，即因府城才女蔡碧吟的介入，以離婚收場。二人均遭逢被丈夫遺棄的命運。
- （三）魚玄機被李億送到咸宜觀為女道士，是道教形式的「出家」；王香禪在離婚之後一度為尼，是佛教形式的「出家」，二人都曾遁入空門。
- （四）就社會背景來說，魚玄機、李冶、薛濤並稱為唐代三大女（冠）<sup>①</sup>詩人，是《全唐詩》中少數的女性詩人；而王香禪與蔡碧吟同時，和張李德和、石中英、黃金川等，亦是日治時期少數的女性古典詩人之一，不管是唐代或是日治，均誠屬鳳毛麟角。
- （五）魚玄機之死，乃因其笞殺婢女之故（懷疑婢女與其情人有染）；而

<sup>①</sup>「唐女冠，指的是唐代，曾通過正式入道儀式的道教女性修行者。」參見林雪鈴，《唐詩中的女冠》，天津出版社，2002年9月一刷，頁13。楊莉，《「女冠」芻議：一種宗教、性別與象徵的解讀》一文，對於「女冠」一詞出現的時間、出處作了詳細的考證，收於《漢學研究》第19卷1期，2001年6月。

王香禪的婢女則和其再嫁丈夫謝介石育有一子。二人都曾被隨身婢女介入感情生活。

(六) 二人均與當時名士聞人有著密切接觸，並形成佳話，魚玄機和溫庭筠；王香禪則和連橫。不可否認，溫庭筠及連橫在其各自的朝代都有著不小的名氣。

當然，不可諱言的，魚玄機與王香禪之間也有不同之處：

- (一) 二人遁入空門的形式不同：魚玄機為道教（女冠），王香禪則為佛教（一度為尼）。
- (二) 二人後來的遭遇不同：魚玄機在成為女冠之後，放浪形骸，與文人雅士多有酬作，後因笞殺婢女綠翹，為溫璋所殺；王香禪則在離婚後，再嫁謝介石。

若就身份來說，薛濤為妓女，和王香禪類似，但因薛濤並未結婚，也沒有婚後遭棄，因此就同質性來說，魚玄機和王香禪相似程度更高，頗能類比。

因此，本文將以二人相似之處作為比較的基點，希望從二人的身份、遭遇及時代背景來探討，當婦女被棄時，其因應之道與心理轉折的過程。此外，不同的時代背景（唐代及日治）對於婦女的創作，會產生何種程度的關涉？二人在被棄之後，是否各自發展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詩作風格？這樣的風格在婦女文學中佔有什麼樣的地位？

## 二、易得無價寶，難得有情郎—魚玄機詩作探析

### (一) 魚玄機生平簡述

魚玄機，字幼微，一字蕙蘭，長安人。生於唐武宗會昌四年，卒於唐懿宗咸通九年（西元 844-868），得年 25 歲。

關於魚玄機的生平，以梁超然〈魚玄機考略〉考證最詳，亦較具可信度。文章分別就「魚玄機與溫璋考略」、「魚玄機行蹤考略」、「魚玄機交游考略」三個部分進行論述，嘗試為魚玄機的詩作作繫年，在分析其作品特色與內涵上提供了極大的幫助。至於魚玄機的準確卒年與死因，曲文軍〈道士魚玄機的準確卒年〉及梁超然〈魚玄機考略〉均作過詳細考證，確定在



咸通九年（西元 848 年）因「犯殺婢罪」被溫璋判處死刑<sup>②</sup>。

## （二）魚玄機詩作特色

### 1. 魚玄機詩作中的情感糾葛

在感情生活上，魚玄機對於李億花費最多感情與心思，因而當李億棄她而去時，內心的苦悶自不待言，目前留存下來，最為研究者所探討的作品為寫給李子安的五首詩作。

〈寄子安〉云：

醉別千卮不浣愁，離腸百結解無由。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

聚散已悲雲不定，恩情須學水長流。有花時節知難遇，未肯厭厭醉玉樓。

從「醉別千卮不浣愁，離腸百結解無由。」就已經先點出全詩的基調在於「愁」，愁思的原因則是因為「離腸百結」之故。在花開時節卻無心賞花，心頭所念所繫只有李子安而已，「有花時節知難遇」是因「蕙蘭銷歇歸春圃」的緣故，「醉玉樓」承「醉別千卮」而來，而從「聚散已悲雲不定，恩情須學水長流」，則約略可以看出二人的情感或有「觸礁」的情形產生。

在〈春情寄子安〉提到：

山路欹斜石磴危，不愁行苦苦相思。冰銷遠磴憐清韻，雪遠寒峰想玉姿。莫聽凡歌春病酒，休招閑客夜貪棋。如松匪石盟長在，比翼連襟會肯遲。雖恨獨行冬盡日，終期相見月圓時。別君何物堪持贈，淚落晴光一首詩。

梁超然曾對這首詩的繫年做出以下的定位：

「行苦」、「獨行」、「比翼連襟會肯遲」、「終期相見」等。從詩意不難看出，這是魚玄機獨自上路去同李億相見。……此詩係魚玄機獨自啟程鄂州追尋李億，上路后之作<sup>③</sup>。

〈隔漢江寄子安〉與〈江陵愁望寄子安〉二詩大約同時，都是魚玄機與李億隔江分離之後所作，詩中充滿了分離與不得相見的無奈情緒。〈隔漢江寄子安〉云：「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憶空吟。鴛鴦暖臥沙浦，鸚鵡閑飛橘林。烟裡歌聲隱隱，渡頭月色沉沉。含情咫尺千里，沉聽家家遠砧。」從「江南江北」、「相思相憶」即可看出詩人與情人處於分隔的狀態中；〈江

<sup>②</sup> 參考梁超然，〈魚玄機考略〉，《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1997年，曲文軍，〈女道士魚玄機的準確卒年〉，《江海學刊》5期，1997年。

<sup>③</sup> 參考梁超然，〈魚玄機考略〉，《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1997年，頁20。

陵愁望寄子安〉說：「楓葉千枝復萬枝，江橋掩映暮帆遲。憶君心似西江水，日夜東流無歇時。」是以流水之流表示愁思之流無窮無盡，可以想見創作者想見卻不得見的心傷。

至於〈情書寄李子安〉提到：

飲冰食藥志無功，晉水壺關在夢中。秦鏡欲分愁墮鵲，舜琴將弄怨飛鴻。  
井邊桐葉鳴秋雨，窗下銀燈暗曉風。書信茫茫何處問，持竿盡日碧江空。  
吳存存對於此詩的解釋為：

她向李億表示自己對分手的恐懼和憂慮，企盼著能通過回憶過去曾有的美好時光來重喚起對方的愛情……李億曾從事河東幕，攜魚玄機前往，所以詩中有『晉水壺關在夢中』之句，但從詩的最後一句看，這首詩可能作於她與李億隔漢江而居的時期。其實，一段已經開始冷卻的愛情要重新燃燒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魚玄機的鄂州之行是淒涼孤獨的，她與李億的終於分手可能就在這個時期④。

這推斷大抵是不錯的，而林雪鈴在《唐詩中的女冠》一文中如是說：這五首魚玄機寫給李億的情詩，可以說內容相當的一致，都是表達自己對李億的深情與相思，言下雖然不無怨怪，但主要還是希望李億能對自己多些眷顧。從這裡，我們可以很強烈的感受到魚玄機對李億深厚的感情，並且瞭解到李億在將魚玄機送到咸宜觀後，漸趨冷漠的態度，一熱一冷，魚玄機於似乎是陷溺在這種明知絕望又懷抱無限冀求的自毀情緒中了，她的詩作雖然書寫的面向不算窄，有詠物，有贈答，有寫景，但是所流露出來的情感，卻一致的傾向於哀怨感傷，可以說心中滿懷的抑鬱扭曲，感染到了她的所見、所聞、所感，以致她怎麼寫都逃不開的灰暗的思想籠罩，雖然強作歡笑，也是帶苦悲，雖然故作散逸，但總是不見開朗，一部唐女郎魚玄機詩，猶似是棄婦的獨幕哀鳴⑤。

即已點出魚玄機詩作中，所謂「棄婦」心緒的特點。事實上這些作品的標題都具名「子安」，因此對象極為明確，但是較有疑議的作品有二首，一首是〈贈鄰女〉，這首詩另有一個標題是〈寄李億員外〉，可能是魚玄機寫給李億的作品，但是為什麼會有二個題目？姚玉光，〈歷史的誤解，時間和角色的雙重錯位——魚玄機《贈鄰女》別解〉提到：

那麼，這首詩到底是〈贈鄰女〉還是〈寄李億員外〉呢？我認為，這兩種可能

④ 參考吳存存，〈女性意識與情愛悲劇〉，《歷史月刊》1998年11月號，頁99。

⑤ 參照林雪鈴《唐詩中的女冠》，天津出版社，2002年9月一刷，頁168。

都存在。它可能是寫給其中的一個人，然後因為喜愛此作，在切合於同類情景時，又把它贈寄給了其中的另一個人。關鍵的問題不是一詩二贈，也不是一詩二題，而是在於如何解釋詩的內容，才能使詩的內容在二題同在時，都能得到順理成章合乎邏輯的理解<sup>⑥</sup>。

論者將〈贈鄰女〉的時間由下獄時提前到魚玄機出家前，當是較為可信的。由於這一首詩的爭議極大，為避免重複論述，筆者擬於下文再詳細敘述，於此將暫不探討。

另一首為〈酬李學士寄簞〉，白軍芳在〈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談魚玄機和她的詩〉一文中提到：「還有一些考據證明〈酬李學士寄簞〉和〈迎李近仁員外〉也似寫給李億的。<sup>⑦</sup>」，筆者對於這一點抱持懷疑的態度，除了梁超然在〈魚玄機考略〉中提到：

此李學士為誰？考之《翰林學士壁記》，似系李鶯。李鶯咸通六年為太常寺少卿、弘文館學士，咸通九年出院為江西觀察使。李鶯為弘文館學士時，魚玄機在咸宜觀，有機緣相交往。今李鶯存詩不多，尚未發現與魚玄機交往的詩文<sup>⑧</sup>。

這是比較保守的猜臆，在此筆者想補充的是，這裡的「李學士」當不太可能為李億，試看魚玄機寫給李億的詩作，幾乎在標題中都標明「子安」（李億的字），而上文提到有疑議的〈贈鄰女〉，其別名是〈寄李億員外〉，也是直接標明李億的姓名，由此來看魚玄機的寫作命名習慣，或可認為，這裡的學士與李億當非同一人。至於李近仁並非李億，歷來也有相關論證。

上述的五首寄李子安的作品，探討者相當多，其中彭衍綸〈憶君心似西江水——漫談魚玄機〉<sup>⑨</sup>，一文針對這五首詩作做過詳細賞析，由於與筆者論點差異性不大，因此於此不再重複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打毬作〉：

堅圓淨滑一星流，月杖爭敲未擬休。無滯礙時從撥弄，有遮欄處任鈎留。

不辭宛轉長隨手，卻恐相將不到頭。畢竟入門應始了，願君爭取最前籌。

這是一首作於和李子安分離前的詩作，敘述觀看李億比賽打毬的作品，「堅圓淨滑一星流，月杖爭敲未擬休」、「無滯礙時從撥弄，有遮欄處

⑥ 參考姚玉光，〈歷史的誤解，時間和角色的雙重錯位——魚玄機〈贈鄰女〉別解〉，《中國典籍與文化》38期，2001年，頁8。

⑦ 參考白軍芳，〈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談魚玄機和她的詩〉，《陝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期，2000年，頁45。

⑧ 參考梁超然〈魚玄機考略〉，《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1997年，頁25。

⑨ 參考彭衍綸，〈憶君心似西江水——漫談魚玄機〉，《中國文化月刊》263期，2002年2月，頁38-61。

任鉤留」都是敘述打毬時的情況，而「卻恐相將不到頭」、「願君爭取最前籌」則是希望丈夫可以獲勝的期許。這是寫二人還在一起時的情誼，也是少數提到早期生活的詩作。以此和前面五首寄子安的作品相較，不難看出詩作中所展現的轉折，和丈夫在一起時的種種歡樂愈多，日後分離時的獨自煎熬的痛苦也就愈深。

從魚玄機的詩中，還可以看出的是，她在被李億送入道觀之後，與其他男性也有往來，較為著名的是溫庭筠，在魚玄機的集子中，有二首寫給溫庭筠的詩作：

〈冬夜寄溫飛卿〉云：

苦思搜詩燈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滿庭木葉愁風起，透幌紗窗惜月沉。  
疎散未閑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幽棲莫定梧桐處，暮雀啾啾空遠林。

因「苦思搜詩」而「不眠」，因「不眠」而看到紗窗外的景致是「滿庭木葉」，更遠處看到、聽到的，是找不到梧桐棲息的鳥，只能繞著樹林盤旋。這是極為幽淒的心緒。暗傷自己的身世如林中鳥般，無可依託，雖然表面上「疎散未閑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但事實上卻隱含著許多的不得已。魚玄機這首作品很有暗傷身世的意味。歷來研究者對於魚玄機與溫庭筠間是否有男女之情，有著許多猜臆。有的人從年紀上認為二人相差二十餘歲，應不可能有男女之情存在，也有人認為年齡不是問題，二人可能情愫暗生。從這首作品來看，如果魚玄機愁思的對象是指溫庭筠，那麼說二人之間沒有進一步的感情，恐怕是有問題的。然而，有沒有可能，魚玄機藉由寫信給溫庭筠，表達自己「被棄」或「無依」的情緒，而衷情對象其實另有他人，溫庭筠只是扮演「傾聽」的角色？

她的另一首〈寄飛卿〉如是說：

堦砌亂蛩鳴，庭柯烟露清。月中鄰樂響，樓上遠山明。珍簟涼風著，  
瑤琴寄恨生。嵇君懶書札，底物慰秋情。

同樣在夜深人靜的晚上，空氣中飄著些微涼意，伏案寫詩給對方，但對方卻「嵇君懶書札」。「嵇君」可以指溫庭筠，也可以指其他男性，這在詩意解讀上是不相衝突的。筆者在此對於魚玄機和溫庭筠的關係採保留態度，由於資料太少，詩意解讀上又二者皆可通。因此不急於論斷，待來日有更多資訊，再據以定論之。至於鍾惺評〈冬夜寄溫飛卿〉時說：「如此反非怨恨之情矣，幽意自閒，深情既冷，可使歡怨兩忘。」大抵是不錯的。

相較於溫庭筠的混沌不明，魚玄機對於李郢的二首作品，作風可謂大

膽豪放：

〈酬李郢夏日釣魚回見示〉：

住處雖同巷，經年不一過。清詞勸舊女，香桂折新柯。道性欺冰雪，  
禪心笑綺羅。跡登霄漢上，無路接烟波。

而〈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

無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處弄船歸。自慚不及鴛鴦侶，猶得雙雙近釣磯。  
吳存存對於這二首詩所做的解釋相當詳盡，吳氏說：

（這二首）皆為自薦之詞，寫得十分大膽而纏綿……沒有故作羞澀的曖昧，沒有在道德約束下的矜持，她那主動的情懷，熱烈的情感都在詩中袒露無遺，表現方式有時幾近於民歌。一般來說，我們確實很難在古代女詩人的集子中看到這樣的詩作，也是只有在唐代那樣開放的社會裡才有可能出現的現象。宋代以後開始接受理學思想的評論者普遍認為魚詩有傷輕薄，孫光憲甚至罵她「乃娼婦也」《北夢瑣言》。然而如果我們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看，在宋以後，我們又那裡能找到這樣由女性口中流瀉出的自由的天性？詩人從來很難用世俗道德來約束，而唐代社會給他們提供了自由創作的廣闊背景。……《唐才子傳》言「時京師諸宮宇女郎，皆清俊濟楚，簪星曳月，惟以吟詠自遣，玄機傑出，多見酬酢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魚詩在今日看來可謂彌足珍貴<sup>10</sup>。

鍾惺在評〈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曾說：「題是垂釣回寄贈，卻得如此綺麗，是觸處抹殺不得多情二字。」是相當公允的，魚玄機的「綺麗」、「多情」在這二首作品中表露無遺。

從詩作來看，魚玄機與李近仁也有密切的關係：〈迎李近仁員外〉說：  
今日喜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焚香出戶迎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

從「喜時」、「喜鵲」、「燈花」可以想見作者歡欣愉悅的情緒；而「焚香出戶迎潘岳」則可以看出作者「主動積極」、「敢於示愛」的一面，至於「不羨牽牛織女家」，進一步點出二人情意纏綿，如膠似漆的情誼。文字雖然淺白，但情意卻頗為真摯。然而魚玄機與李近仁的感情同樣也是無寂而終，無怪乎鍾惺說：「如此而猶遭棄斥，吾不知其尚有心胸否也。紅顏薄命，為之深慨。」的確令人惋惜。

和前詩的熱烈相反的，則是與李鷺的關係。〈酬李學士寄簾〉寫道：  
珍簾新鋪翡翠樓，泓澄玉水記方流。唯應雲扇情相似，同向銀床恨早秋。

<sup>10</sup> 參考吳存存，〈女性意識與情愛悲劇〉，《歷史月刊》1998年11月號，頁101-102。

「珍簟」、「翡翠樓」、「雲扇」、「銀床」等詞，可以明顯看出作者優渥的家境，卻也同時點出「早秋」般的淒冷，這是因為「珍簟」、「雲扇」的使用是有時間性的，當炎熱的夏天不再，轉而是清冷的秋天時，自然無須再用到這些避暑的器物，對「珍簟」、「雲扇」而言，當然會「恨」秋天的早日到來。這是用豪華而充滿「冷」意的「景」，來襯出作者的「被棄」之「情」。詩中雖然多描寫景物，但作者寓情於景，其實很能看出詩中的那股憂怨之意。不過若逆向回溯，當不難看出，現在之所以感到淒清，自然是因為之前有過濃烈感情的緣故。因為有著先前熱烈情感的相襯，才會在此刻愈發孤寂。如果之前的感情是平淡的，當然不會有著麼強烈的孤寂之感。因此若說魚玄機與李鶯有過情感上的糾纏，是不會有太大問題的。無怪乎鍾惺會說：「絕句如此奧思，非真正有才情人，未能刻劃得出；即刻劃得出，而音響不能爽亮，輾轉費解，則亦使人不能豁然，則不如不刻劃也。此其道在淺深隱顯之間，尤帶有秀氣耳。」

至於魚玄機與國香的關係，則有著不同的說法，原因在於國香究竟是男是女，其實不是很確定，筆者在此將國香認定為男性歌伎。

〈寄國香〉說：

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雨中寄書使，窗下斷腸人。山捲珠簾看，愁隨芳草新。別來清宴上，幾度落梁塵。

從「相思又此春」、「斷腸人」約略可以看出這樣的線索。在情感的深度上，女性對於「男女之情（愛情）」及「女女之情（友情）」的感受是有落差的，能夠到「斷腸」的程度，恐怕「男女之情」的成份要高於「女女之情」。因之筆者以為，國香是男性歌伎的成份遠較女性歌妓為高。此外，從前面提到的「相思」、「斷腸人」也可想見，魚玄機與國香處於「分別」的狀態下，因此會需要「書使」傳音訊，會有「愁」思的產生。

以上所述為魚玄機生命中的幾個重要男性。她與這些男性之間有著情感上的糾結，進而影響了其詩作的意涵，在魚玄機的生命中，似乎一再遭遇「被棄」的命運，雖然她勇於主動追求所愛，卻不表示她會因此得到幸福。因此在詩中所透顯的，有許多都是被棄的哀怨與愁思。

至於其他的作品並未標明對象，但可由詩意中看出魚玄機的情思，因此一併探討。在此必須先釐清的是魚玄機詩中所表現的「愁」，是否多指為「情愁」？有沒有可能有其他感情類型存在？如友情？愛國之情？關於這一點，筆者以為，從魚玄機的生命經驗來看，她的著重點幾乎放在個人

情感著追求上，是自我的，也可以說是自私的，詩中其實缺乏對家國社會的關注。除了一首〈遊崇真觀睹新及第題名處〉提到「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有「恨不得爲男兒身」的惋惜以及〈浣紗廟〉的藉古鑑今之外，實在少有關於國家社會的創作。然而，這並不影響魚玄機詩作的價值，女性詩人重於自我情感的書寫，並以此議題爲創作大宗，當和男性詩人以家國爲創作重心一樣，這是緣於客觀上先天性別區分的緣故，無關乎孰優孰劣。評斷重心當在於意境本身的開展，以及是否忠於自我的創作上。筆者承認，魚玄機由於描寫對象及重心多放在自我的情思，以致於格調無法有太大開展。但是，和其他女性詩人，甚至一部分男性詩人相較，她敢於呈現真實的自我，表現對情感的熱烈追求，這樣的價值在女性文學的歷史上，無疑是相當珍貴的。

不管是「秦樓幾夜愜心期，不料仙郎有別離。」「水柔逐器知難定，雲出無心肯再歸。惆悵春風楚江暮，鴛鴦一隻失羣飛。」（〈送別〉）的孤獨無依之感；或是「恨寄朱弦上，含情意不任」、「灼灼桃兼李，無妨國士尋」、「門前紅葉地，不掃待知音」（〈感懷寄人〉）的感嘆知音難覓，情歸無著；抑或〈暮春即事〉中的：「深巷窮門少侶儔，阮郎唯有夢中留。香飄羅綺誰家席，風送歌聲何處樓。街近鼓鞳喧曉睡，庭閑鶻語亂春愁。安能追逐人間事，萬里身同不繫舟。」渴望被愛卻又不可得，身如不繫之舟，飄茫於人海之中的悲哀。我們都可以看見，在情場上屢屢不如意的魚玄機，在心情上有蒼涼，有傷悲，她在婚姻關係上是一位「棄婦」，在其他的感情生活上也是如此。

再看〈閨怨〉：「簾燕盈手泣斜暉，聞道鄰家夫婿歸。別日南鴻纔北去，今朝北雁又南飛。春來秋去相思在，秋去春來信息稀。烏閉朱門人不到，砧聲何事透羅幃。」及〈寓言〉：「紅桃處處月色，碧柳家家月明。樓上新妝待夜，閨中獨坐含情。芙蓉葉下魚戲，蟬竦天邊雀聲。人世悲歡一夢，如何作得雙成。」二詩，表達的也是相同的情緒。

## 2、魚玄機詩作中的隱居情懷

至於以下四首爲魚玄機詩中，少數關於道教隱居生活描寫的作品：前三首作品可以視爲一個整體來看。〈題隱霧亭〉：「春花秋月入詩篇，白日清宵是散仙。空捲珠簾不曾下，長移一榻對山眠。」這一首詩，鍾惺評曰：「景事皆寫得有雅致。」而〈夏日山居〉寫道：「移得仙居此地來，花叢

自遍不曾栽。庭前亞樹張衣桁，坐上新泉泛酒杯。軒檻暗傳深竹徑，綺羅長擁亂書堆。閑乘畫舫吟明月，信任輕風吹卻回。」黃周星對此詩的評論是：「有如此勝地受用，不知想作何事？」

再看〈導懷〉：

閑散身無事，風光獨自遊。斷雲江上月，解纜海中舟。琴弄蕭梁寺，詩吟庾亮樓。叢篁堪作伴，片石好為儔。燕雀徒為貴，金銀志不求。滿杯春酒綠，對月夜琴幽。逸砌澄清沼，抽簪映細流。臥床書冊遍，半醉起梳頭。

從詩句來看，大致可以想見，魚玄機身處的修道道觀是一個景致宜人，靜謐恬淡的好地方。在這樣的地方修道，連帶也會使得內心清明澄澈起來。然而，若隱去作者的名字，不知道作者的身份，實在很難看出作者其實是一位女道士。換句話說，詩句中呈現的修道成份其實很淡薄，在魚玄機的所有詩作中，要找出和修行有關的詩作，其實並不容易，從這裡可以看出魚玄機因遭棄而入道的「被迫性」，及她不願書寫相關生活的一種「反抗性」，這無疑是對自身情感遭遇的一種隱含的「控訴」。

至於另一首描寫入道之後生活的詩作，為〈愁思〉二首：

落雨紛紛暮雨和，朱絲獨撫自清歌。放情休恨無心友，養性空拋苦海波。長者車音門外有，道家書卷枕前多。布衣終作雲霄客，綠水青山時一過。

自嘆多情是足愁，況當風月滿庭秋。洞房偏與更聲近，夜夜燈前欲白頭。

鍾惺評曰：「衰風之氣，覺滿目皆有感傷處。看其不諱多情故其自嘆亦以多情為足愁耳。夜夜燈前，不必言頭白，當亦凝愁萬斛矣。」和前面不同的是，這裡的愁思滿懷，當是剛入道的作品，和前面幾首已經習慣修道生活的詩作相比，怨懣、煩心的情緒躍然紙上，吳存存說她的「放情休恨無心友，養性空拋苦海波」二句「完全沒有進入到宗教的境界」<sup>①</sup>，大抵是不錯的。

最後，筆者嘗試做一個總結，在魚玄機的詩作中，詠情敘愁的詩作佔了極大的比例，在寫作格局上，這是一個很大的侷限，因為面向不夠寬廣。但是，魚玄機在一些作品表達的真實情感，是少在其他女性詩人的創作看到的，如代人悼亡的詩作<sup>②</sup>或是和詩<sup>③</sup>，都是少見的佳作，文字及比喻也頗為貼切優美，可以從中看出她的才性，但是由於本文焦點集中放在她身

① 參考吳存存，〈女性意識與情愛悲劇〉，《歷史月刊》1998年11月號，頁99。

② 有〈代人悼亡〉、〈和新及第悼亡詩二首〉。

③ 有〈和人次韻〉



爲「棄婦」的遭遇與相關著作，因此有許多不錯的作品必須略而不論。魚玄機的感情生活一再受挫，這些情緒的起伏都可以從詩中窺知其轉變，我們會看到她的愁思、哀怨、悲傷…，但也可以看出她的不後悔，她的往前衝，她的積極主動。雖然被迫出家，但是這樣的身份卻反而提供了她交友上的方便，文人對於女冠的好奇，增加了她交遊的機會，因此不能不說是一種「因禍得福」。但是也由她的出家是一種被迫，因此少能在詩作中看到她對於修道生活的描寫，更遑論她會因修道而看破紅塵，有所體悟。筆者對於魚玄機最大的肯定來自於：她能夠真誠的面對自己的人生，不矯揉，不隨波逐流，能夠在詩中保有真正的自我，不在乎別人異樣的眼光，這是魚玄機詩作的特色，也是她迥異於他人作品的價值所在。

### （三）箋釋者眼中的魚玄機

筆者在論述過程中較爲好奇的一點，在於後人爲魚玄機詩作所作的箋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由於箋釋作者爲男性，不免帶有男性主觀立場來看女性所寫的詩作，因此在某些詩作的評論上，會看到一些衛道的、男性本位的、道德批判的詞語出現，頗值得玩味。事實上，這些男性箋釋者對魚玄機的評價，正可以看出男女雙方在面對情感的態度。

在魚玄機的箋釋者中，以鍾惺在《名媛詩歸》中所做的評價最多，立場也較爲公允。較有疑議的則是黃周星，這個部分我們會在下面提到，於此先不贅述。除了上述二人之外，楊肇祉、戴南邨、方回、胡應麟、陸時雍、紀昀等亦有所評論，這些研究者的關注，在某一程度上反應出魚玄機作品的漸受重視，這或許算是一種對她作品的肯定。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種「肯定」指的是研究者持平的，無關身份的對這一詩人作品的關注，而非由於評論者是「男性」，而魚玄機是受到「男性」肯定的這一基點上，這是需要先說明的。鍾惺等人的評論者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成二部分：一是就其創作技巧來探討，一是就作品內涵來討論。爲了方便檢閱，筆者在此擬以表格呈現：

評論者	創作技巧	作品內涵
鍾惺《名媛詩歸》	〈賦得江邊柳〉、〈寄國香〉、〈浣紗廟〉、〈情書寄李子安〉、〈暮春有感寄友	〈贈鄰女〉、〈寄劉尚書〉、〈賣殘牡丹〉、〈寄李學士簾〉、〈春情寄子安〉、〈冬夜寄溫飛

	人)·〈江行〉第一首·〈題隱霧寺〉·〈早秋〉·〈隔漢江寄子安〉·〈送別〉二首·〈和人次韻〉	卿)·〈和友人次韻〉·〈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愁思〉·〈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重陽遇雨〉·〈感懷寄人〉·〈迎李近仁員外〉
黃周星《唐詩快》	〈賦得江邊柳〉	〈贈鄰女〉·〈江行〉·〈和新及第悼亡詩〉·〈夏日山居〉·〈暮春即事〉
楊肇祉《唐詩豔逸品》		〈贈鄰女〉
戴南邨《唐風采》		〈贈鄰女〉
胡應麟《詩藪》	〈春情寄子安〉	
陸時雍 《唐詩選脈會通評林》	〈江行〉第一首	
方回《瀛奎律髓》	〈題任處士創資福寺〉· 〈訪趙鍊師不遇〉	
紀昀	〈訪趙鍊師不遇〉	

在此先說明的是，這一份表格的畫分，有著筆者本身的主觀判斷標準，有些詩作在評論者的角度上，是否真如筆者所畫分，實可再商榷，在此筆者採取籠統的畫分方式，其目的在於便於論述，故不擬於「分類恰當與否」這一點來做為探討重心，這是必須先提出的。另外，從上表詩作數量來看，扣除還沒有人評論的 16 首詩作，在現今可掌握的魚玄機 46 首詩作中，約有 30 首已被討論，約佔 2/3 左右，比例不可謂不多。由歷來箋釋評論者對魚玄機的評價來看，可以分成正面肯定及爭議性評價二大類。正面肯定部分依次羅列如下：

### (一) 正面肯定

- 1、趙世杰在《歷代女子詩集》：「詞氣清新俊逸，女中庾鮑。」
- 2、《唐才子傳》云：「觀其意志激切，使為男子，必有用之才。」
- 3、鍾惺評〈情書寄李子安〉曰：「緣情綺靡，使事偏能豔動。此義山能為之，而玄機可與之匹。」
- 4、胡應麟評〈春情寄子安〉：「余考宋七言排律遂亡一佳，唐惟女子魚玄機酬唱

二篇可選。諸亦不及云。施肩吾百韻在二作下。」

5、鍾惺評〈隔漢江寄子安〉：「玄機蓋才媛中之詩聖也。」

不管是「女中庾鮑」、匹之義山，抑或比為男子，其實都是先預設一個「男優於女」的標準，然而才依此作為價值論斷，推定魚玄機因為才情可以比擬這些男性，所以作品是好的。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和整個文學環境以男性詩人為主流不無關係，我們實毋須在此點上予以苛求或批判。筆者在此想提出的是，不管是整本詩集風格的「清新俊逸」，或是單首詩作的「意志激切」、「緣情綺靡」，恰恰都可以看出魚玄機風格的多樣性，而由這些評論者給予魚玄機的評價，正可以為其在文學史上覓得一個不錯的定位，顯示魚玄機的詩文仍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

## （二）爭議性評價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攻擊魚玄機：「婦女從釋入道，有司不禁，亂禮法，敗風俗之尤者。」這是以男性衛道的眼光來看魚玄機的生平經歷。就詩作本身來看，有幾首作品是有爭議的，筆者認為可以羅列出來詳細探討。

### 1、〈贈鄰女〉（又名〈寄李億員外〉）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歷來研究者對本詩評論如下：

鍾惺：「嬌在無端生想便有，痴在全由慧性使成，非有才有色人，不能容易到也。」

楊肇社：「字字傷神。」

黃周星：「魚老師可謂教猱升木，誘人犯法矣，罪過！罪過！」

戴南邨：「有心則難，有心則必一心矣。」

胡震亨《唐音癸籤》：「魚最淫蕩，詩體亦靡弱。」

這一首作品是歷來爭議性最大，評價也最為不一的地方。頗令人玩味。「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是魚玄機的名句，也是她在經歷感情創傷的一個領悟，不過弔詭的是，領悟是一回事，能夠實際超越情感的羈絆又是另外一回事。魚玄機並沒有因為在感情上受創，有了這層體會而自我封閉，反而令人感覺到她愈挫愈勇，積極追尋真愛的那分衝勁，因此會有「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的期許。在這一點上，鍾惺、楊肇社、戴南

邨的評斷無疑是比較持平的，肯定她的勇於追求幸福，也心疼她的接連受創。而黃周星與胡震亨的評斷則是就末二句而來，認為魚玄機朝三暮四，沒有女性矜持，這是一種衛道的看法，在這種觀念底下，自然難以碰到詩作真正深層的底蘊。

## 2、〈江行〉二首

大江橫抱武昌斜，鸚鵡洲前萬戶家。畫舸春眠朝未足，夢爲蝴蝶也尋花。  
烟花已入鸚鵡港，畫舸猶題鸚鵡洲。醉臥醒吟都不覺，今朝驚在漢江頭。

陸時雍：「末句最佳，種情無復餘地。」

鍾惺曰：「（第一首）要知題是江行，而詩又側入下二句，了不似江行詩中語，卻不得不認作江行詩，則其才情可知矣。」

黃周星《唐詩快》：「豈非妖冶之尤！」

這一首詩作中，鍾惺及陸時雍是針對詩作的寫作技巧來評斷，較無疑義，有問題的是黃周星的評語，他說本詩「豈非妖冶之尤」，則令人玩味。詩作的內容所寫，當是作者遊歷所見所聞，第一首的「大江橫抱武昌斜，鸚鵡洲前萬戶家」純粹寫景，三句點明時間在清晨，地點在畫舸，末句抒情，如果黃星周的解法是將魚玄機自己比喻爲蝶，而飛入花叢任意尋花（情郎）的話，從他的衛道標準來看，當然是「妖冶之尤」了，問題是，〈江行〉的寫作時間當在魚玄機要前去找尋李億之時，若是如此，則「尋花」的「花」字應解爲李億較恰當。如此，則這首詩應該看成是魚玄機的思君之作，和「妖冶」與否當無關才是。至於第二首則較傾向敘景，爭議不如第一首大。

## 三、三載癡心今日醒，任他薄倖覓鸞絃——王香禪詩作探析

### （一）王香禪生平簡述

王香禪，本名「罔市」，後名「夢癡」，號「留仙」，與羅秀惠結婚前至離婚後，常以「黛卿」之名發表詩作，而今人多稱其「香禪」名號，生卒年不詳。關於王香禪的生平，據吳品賢的考證，可信者爲：嫁台南舉人羅秀惠，後因羅秀惠另結新歡（府城才女蔡碧吟），故與羅離婚。於1911年左右再嫁謝介石。1912年隨夫赴大陸，1914年轉往天津，1932年偽滿州國成立，謝介石任外交部長，稍後即改任駐日大使，不久後即到日本，

1945 年日本戰敗，謝介石被捕，王香禪則下落不明<sup>14</sup>。

王香禪的詩作，據吳品賢的蒐尋，約有五絕 3 首、七絕 69 首、五律 2 首、七律 13 首、詞二闕<sup>15</sup>，數量可謂不少。為集中論述焦點，本文重心將放在王香禪與羅秀惠離婚後到與謝介石再婚前（即 1909 年 8 月羅蔡議婚之後到 1911 年 12 月再嫁謝介石）這一段時間的詩作。此外，王香禪後期作品有不少透露出長伴青燈的意味，這當和謝介石感情疏離，內心苦悶有關，雖然謝介石並未在婚姻狀態中拋棄王香禪，但在感情生活卻早已棄之，因之這部分的詩作也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之中，並嘗試將其與前期作品相較，以釐清其心境轉折。

## （二）王香禪作品特色

從作品分期論之，王香禪有關「棄婦」心理的描述，約可分為二個階段：

（1）第一階段是：王香禪與羅秀惠離婚到再嫁謝介石的這段期間。其愁思的主要對象為羅秀惠。這一階段的作品類型又可分為前後二期：

第一期是指 1908-1911 左右的作品，此時作品主題傾向於「對愛情的失望」，另一類較為特殊的是，作品寫作時間因為是在秋季，故而題目多以「秋」（或菊）為主，不同於第二期中常出現的「春」（季）。

第二期為 1911-1912 的作品，作品主題已出現「長伴青燈」之意，並以實際「斷髮」作為心跡的表明。此外，題目常出現「春」季或「書懷」等類型。

至於「集句」詩一體也為王香禪所偏愛，主要仍出現在第二期，第一期僅有一首。

（2）第二階段為再嫁謝介石之後的心理轉折。這階段的愁思對象為謝介石。

此外，為了突顯王香禪詩作中對於情感轉折的幽微描寫，筆者嘗試從其詩作本身做比較，以探求「被棄」這一事件，對其生命經驗與詩作風格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因此筆者所採用的方式，是先以作品時間作分期，然後再以同一期中的詩作和它期「同型」作品相較，以了解在同一「素材」

<sup>14</sup> 王香禪生平資料參考吳品賢〈無端惹得多情淚，彼是瀟湘一後身——王香禪及其詩淺探〉，《台北文獻》直字第 136 期，2001 年 6 月。

<sup>15</sup> 參考吳品賢〈無端惹得多情淚，彼是瀟湘一後身——王香禪及其詩淺探〉，《台北文獻》直字第 136 期，頁 146，2001 年 6 月。

底下，面對不同的境遇，王香禪本身會有怎樣的描寫？以下將以「時間」為經，以「同主題詩作」為緯，嘗試爬梳王香禪的詩作特色。

第一階段指王香禪與羅秀惠離婚到再嫁謝介石期間。如前所述，時間斷限為 1909.08-1911.12，而這階段又分為前後二期：

第一期是指 1908-1911 左右的作品，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最具王香禪「棄婦」心情的詩作為二首〈秋感〉（一七絕，一為七律）。

〈秋感〉<sup>①⑥</sup>五首：

惡緣錯認是良緣，空自深閨鎮日嗔。真個黃金為世界，多姿畢竟遜多錢。  
悔教柳色暗粧樓，一段歡情化作愁。縛繭重重難自解，可憐清福不曾修。  
紅顏薄命古今多，盤錯愁根喚奈何。原望生生為羽翼，那知情海有橫波。  
青春美景去如煙，恩愛雖長只百年。三載癡心今日醒，任他薄倖覓鸞絃。  
繁華儂是過來人，暫借風塵住此身。青眼悔逢窮阮籍，有情教識比丘真。

從「惡緣錯認是良緣」、「多姿畢竟遜多錢」、「那知情海有橫波」、「三載癡心今日醒，任他薄倖覓鸞絃。」等句，不難看出王香禪在面對蔡碧吟介入自己婚姻生活時的憤怨及無奈，縱有萬般姿色，才情萬千，終究抵不過良人變心的腳步，與金錢社會的現實。這幾首詩作情緒直接，文字淺白，怨懟之情溢於言表。在王香禪與羅秀惠剛離婚時，這些詩作最能看出她被棄的愁思。而另一首〈秋感〉<sup>①⑦</sup>，同樣也在表達這樣的思緒：

不堪舊事幾回頭，春恨纔過又感秋。淡淡黃花香老圃，明明碧蘂豁吟呻。  
風吹落絮黏紅袖，月上疏桐蘸畫樓。萬種幽愁難解釋，夢魂隨雁去悠悠。

自己飄零的身世，正如落絮隨風飛逝，毫無依託。而「月上疏桐蘸畫樓」所表現出「缺月掛疏桐」的孤寂心情，恰與「幽愁」呼應。無怪乎作者會說「不堪舊事幾回頭」，而希望「夢魂隨雁去悠悠」，過去的一切可以如「雁渡寒潭」一般，「渺無留跡」。然而，對一個從風塵中從良的女子而言，「安定」，該是多大的想望？當自己所賴以支柱的「天」崩塌時，有什麼是她可以依憑的？什麼才是不會傷害她的？這二首〈秋感〉的寫作時間只隔五天，雖然語氣之中都不免有被棄的忿懣情緒，但是又有不同。後一首〈秋感〉的寫作心情已經平靜許多，因此語氣不如前一首強烈，顯示作者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之後，已經慢慢接受這樣的事實，雖然心境上不

①⑥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419號，1909.9.19，署名黛卿女士。

①⑦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423號，1909.9.24，署名黛卿女士。

見得能調適得多好，但至少在詩句上已經不再有過激的語氣產生。這樣的轉變對王香禪詩風的成長，有著重要的作用，詩人在創作時，是要經過時間的淬練，才能使詩作本身的蘊涵更為豐富，語氣強烈的詩句雖然能夠直接地表達情感，但畢竟少了那份含蓄隱微的蘊境，因此，王香禪的詩風能夠由直接轉為內斂，不能不說是一種成長。

而稍後的〈憶菊〉<sup>18</sup>提到：

斜陽老圃惹閒思，遙想迎霜放幾枝。寂寂塞陌空月色，瀟瀟暮雨過秋期。  
有懷晚節宜借隱，無限幽情只自知。記否白衣從外至，帽簷欹壓酒盈卮。

從「有懷晚節宜借隱，無限幽情只自知」約略可以看出王香禪因情場失意所產生的落寞與想要隱遁的作為，這首詩的出現，在王香禪本身的心情轉折上，起著承先啓後的作用，其中所透顯出來日益冷靜的情緒，已經為日後王香禪的「斷髮」、「禮佛」埋下伏筆。

第二期為 1911-1912 的作品，作品主題已出現「長伴青燈」之意，並以實際「斷髮」作為心跡的表明。這是屬於第一類的創作主題：其中以〈無題集句〉<sup>19</sup>為最早：「清池皓月照禪心，不受塵埃半點侵。光景旋消哀怨極，世緣終淺道根深。」關於「集句詩」這一題材，我們於後文將有所探討，故於此先不做贅述。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王香禪在詩中所表現的「參禪」心態，從「清池皓月照禪心，不受塵埃半點侵」、「道根深」可以看出她欲借「長伴青燈」來擺脫世俗紛擾的糾纏，「世緣」當為「世緣」之誤，從「光景旋消」、「哀怨極」、「世緣終淺」都可以瞥見她的心酸與無奈，「出家」並不是因為「看破紅塵」，而是因為「被紅塵所遺棄」，在面對「被棄」的心傷之餘，還得面對世俗種種不信任的眼光，無奈的她，也只能以「斷髮」明志，強調自己「自外」於這是非之處，以及堅定的禮佛之心。〈斷髮書感〉<sup>20</sup>有云：「絮果蘭因往事微，拈花一笑悟禪機。青絲剪斷情俱斷，不管旁人說是非。」「此心如水平池清，暮鼓晨鐘好結盟。了卻塵緣長繡佛，修將因果待來生。」而〈禮佛詞〉<sup>21</sup>也同樣表達這樣的心境：「堂前稽首拜慈雲，自揀檀香寶鴨薰。謝絕鉛華無一事，心經默誦到宵分。」

從「青絲剪斷情俱斷，不管旁人說是非」、「此心如水平池清」、「謝絕

<sup>18</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460號，1909.11.9，署名王黛卿。

<sup>19</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45號，1911.2.4，署名女士王香禪。

<sup>20</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87號，1911.3.19，署名女士王黛卿。

<sup>21</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89號，1911.3.21，署名女士王黛卿。

鉛華無一事」不難看出，王香禪決定出家的背後，實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存在。除了先背負的情傷之外，文人所給予的注目壓力，或許也是她想逃避的一個主要原因吧？身為從良的藝旦，不管多麼潔身自愛，總是必須承受別人異樣的眼光，人們或許會臆測，從良又被棄之後的王香禪會不會「重操舊業」？抑或「修潔自好」？會成為「蕩婦」或「節婦」？筆者以為，王香禪在被棄之後所背負的，恐怕不是「棄婦」這麼單純的婚姻事件而已，其中或許隱含了社會的許多批判價值觀。吳品賢對於這幾首作品曾提到：「……她『斷髮』與追求者不斷有關，企圖表明禮佛誠心，但反而引人注目。」<sup>22</sup>王香禪雖想清靜禮佛，但大環境上顯然不太允許。從報紙上眾多的「和詩」盛況或可窺知一二。為節省篇幅，本文不在此多做贅述，這部分可與吳品賢之短篇論文互相參照之。

同樣的出家情緒在〈感事集句〉<sup>23</sup>中：

夢裡春風恨裡天，傷心紫陌竟成烟。塵緣已作枯禪寂，願同靈山禮佛前。

一場幻夢悟前因，彈指年華廿六春。欲把深情訴大士，可容寶筏渡迷津。

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從二月到六月，隨著王香禪被棄之後禮佛到斷髮，除了要面對自己被棄的無奈與自怨外，也無時不承受著文人的目光。

但是，筆者極為好奇的是，除了「出家」一途，王香禪難道沒有其他的方式去面對自己生命的斷傷？在面對生命的挫傷時，王香禪選擇的是一般傳統女性常選擇的路—出家。這個選擇表面上看起來有其「自主性」，因為王香禪有權選擇「要出家」與「不要出家」或除了出家以外的路。問題是，王香禪為什麼會選擇這麼一條路？筆者以為，王香禪的選擇是「被迫」的，是非「自願」的，她的出家，「逃避」的心態顯然大於「頓悟」的體驗。前面提到，由於知名度高，加上身分的特殊，王香禪的婚姻狀況及之後的遭遇，都暴露在眾人的目光中，等著被檢視、被定位，如果不能潔身自好，就可能像蔡碧吟一樣，在報紙上被大加撻伐，甚至被唾棄。而王香禪身上所背負的包袱，除了當藝旦那段「不光榮」的過去，要避免被拿出來做文章之外，就是嫁入舉人之家後，所面臨的社會壓力了。此外，她所身處的日治時代，又是歷史上「雙重迫害」的時代，許俊雅在《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研究》曾如是說明：

<sup>22</sup> 參考吳品賢〈無端惹得多情淚，彼是滿湘一後身—王香禪及其詩淺探〉，《台北文獻》直字第136期，頁146，2001年6月，頁129。

<sup>23</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66號，1911.6.8，署名香禪女士。



日據時期的台灣，重男輕女之風極為盛行，考其緣由，蓋有二端：中國傳統以男人為主的社會，以三從四德要求女子，以無才無學獎勵女子，使得大多數的女子因無知無學而愚昧庸弱，不能自立，為男子所輕視。此其一。甲午戰爭之後，國土淪陷，日本式的「大男人主義」又跟著東瀛的船堅炮利橫行台灣，影響了台灣男子的觀念。此其二。這二項因素相益相乘，使得日據時期五十年間，台灣女子遭受重重壓迫、束縛，地位、形象比以往更卑下；生活、命運比以往更淒慘。<sup>24</sup>

這是王香禪所處的大時代背景，當然，和其他日治女性不同的是，王香禪是識字的，具有文學素養，和一般「無才便是德」的傳統女性不同。然而，弔詭的是，她之所以識字，和其是「藝旦」的身分却不無關係，所以表面上，她的「能學」雖是一種「突破」，但其實卻是一種遭受迫害的「假象」。她似乎因為識字能文，所以不如一般女性的悲慘、受限，但事實上，身處於煙花之中，尊嚴一再被踐踏，這樣的遭遇並不會比一般女性來得好。在整個中國 / 日本及禮教 / 男性沙文主義的束縛下，王香禪並沒有任何喘息或得以超越的機會。在當時整個台灣當時對於女性的限制，並沒因為新思潮的引進而稍稍鬆懈，「貞節觀念」（或三從四德）反而隨著時間而日益深化。既然無法「以死明志」（因為不值得），為了證明自己「清白自守」，當然就只能選擇另一個方式—頓入空門，這其實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作法。

相較於這時期的出家斷髮之舉，王香禪晚年的禮佛又透顯出什麼樣的心境？有沒有不同？我們可以以她在第二階段所做的〈繡佛詞〉<sup>25</sup>做一對照：「宿語初晴日半斜，木犀香度碧窗紗。九華燈下珊瑚筆，描就西天稱意花。」和第一階段的禮佛出家相較，這時期的出家或許算是「真正」出家吧，我們不再看到「夢裡春風恨裡天」、「欲把深情訴大士」的情傷，也不再看到「不管旁人說是非」那種在意別人眼光的心態，有的只是在天氣初晴，日半斜的傍晚，身居香煙裊裊的屋內，透過碧窗紗所見的恬適景象。那是一種經由「寓景於情」的筆法來描述心情上的「淡然」，是對世事的不在意、不掛心。如此才能在九華燈下就著珊瑚筆，一筆一畫描繪出心中的西方極樂世界。王香禪在前後期所表現參禪禮佛，心態上有著截然不同

<sup>24</sup> 許俊雅，《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 601-602。

<sup>25</sup> 本詩出自《臺灣詩薈》第 1 號，1924.02，署名王香禪。

的轉變。和謝介石的婚姻關係平淡，雖然不再被休離，但在情感之上卻是漸行漸遠，在經歷了與羅秀惠離婚的風風雨雨之後，此時的王香禪對於感情，已經不再抱著太大的希望，能夠在經歷情關之後幡然頓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的方式。從這一類作品，不難看出王香禪生命的轉折與成長。

第二類創作主題以「抒發感懷」為主，代表作品為：〈書感〉<sup>26</sup>及〈書懷〉<sup>27</sup>。這一類作品的情緒是承接前面的主題而來，從發表時間可以看出，這是王香禪在表明禮佛斷髮之後沒有多久的作品，若是心甘情願看開而禮佛，何以語句上會有這麼憤懣的情緒？這恰可與上述筆者所說做印證，由於王香禪並非自願出家，對情感也不是真的看開，因此心境上一直無法釋懷，情緒自然也在「看開」與「看不開」之間游移。〈書感〉中說：「鎮日寂寥抱悶思，鏡臺顧影淚珠垂。一庭花瘦人憔悴，同病相憐更有誰。」藉由李清照「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典故，明白指出作者的「悶思」是因為男女之情的緣故。而「珠淚垂」顯示作者的心情並未平復。「同病相憐更有誰」，除了想知道有誰跟自己「同是天涯淪落人」外，也隱喻著希望「憐惜自己」的人，就是那位遺棄自己的人，這該是多矛盾的感受？〈書懷〉則說：「一回哀怨一傷悲，薄命如花角溷時。長夜無眠思往事，淚盈翠袖血絲絲。」「獨自徘徊燕子樓，留春無計使人愁。紫釵典盡人觀見，破鏡重圓已白頭。」由「破鏡重圓已白頭」可以看出王香禪在此時仍希望羅秀惠能夠回頭再續情緣，其「棄婦」的心緒清楚可見。

第三類的作品則集中於傷春悲秋中的「傷春」部分，相關作品有<sup>28</sup>：〈殘春〉<sup>29</sup>、〈殘春〉<sup>30</sup>、〈春感〉<sup>31</sup>等首，從時間上看，這些詩句的基調和前面一類相似，因此不再多做敘述，從「愁聽啼鶯燕子樓」、「闌珊春思上眉頭」、「舊事到心難自解，頻將紅淚濕羅巾」、「忽見飛紅落絮飄」都可以看出和前面相同的情緒。值得一提的是〈惜春〉<sup>32</sup>：

落絮飄紅墜溷塵，可憐誰復葬花人。無端惹得多情淚，彼は瀟湘一後身。

<sup>26</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01號，1911.4.3，署名香禪女士。

<sup>27</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02號，1911.4.5，署名香禪女士。

<sup>28</sup>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95號，1911.3.28另有〈晚春〉一首，署名女士王黛卿，因原件不清，無法辨識，故只能暫存題目，無法討論其內容。

<sup>29</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02號，1911.4.5，署名香禪女士。

<sup>30</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10號，1911.4.13，署名香禪女士。

<sup>31</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14號，1911.4.17，署名香禪女士。

<sup>32</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21號，1911.4.24，署名香禪女士。

這首作品中可以和下面幾首詩互相參校，她的〈祭花〉<sup>33</sup>詩：  
如花命薄表同情，絮酒招魂兩淚傾。最是惱人腸斷處，杜鵑啼血一聲聲。

〈葬花〉<sup>34</sup>詩

綠紫紛紛瘞綠池，芳園春盡客空悲。箏琶過耳尋無跡，蜂蝶離魂弔豈知。  
手把花鉏愁脈之，淚盈紅袖血絲絲。一坏淨土歸清淨，杜宇聲聲腸斷時。

〈問花〉<sup>35</sup>詩

果真解言語誰知，秋月春風敢恨思。豔福如卿能幾許，可曾羞殺玉人兒。

同樣都能看出看出王香禪有自比為「黛玉」的想法，以花自比，藉由花的飄零無依來寓託自己的不幸遭遇，正如黛玉的薄命一搬。其實頗能看出她面對生命痛苦時的那分消極心緒。

第四類作品為「集句詩」，主要有〈集句〉<sup>36</sup>：「珍重書音卅六鱗，多君愛護十分真。可憐碧海青天夜，往事回頭倍愴神。」〈集句〉<sup>37</sup>：「真成薄命久尋思（王昌齡），冷暖年來只自知（林洪）。卻恨含情掩秋扇（王昌齡），白雲何處更相期（李益）。」〈暮春集句〉<sup>38</sup>：「梨花春雨掩重門，畫閣輕寒繡被溫。燕子不來花落盡，萋萋芳草憶王孫。」及前面提過的〈無題集句〉及〈感事集句〉。

集句詩雖然是「遊戲詩」的一種，不見得能顯示作者的「原創性」，但是仍然可以從作者「有意」集結而成的詩作看出其創作意圖。「可憐碧海青天夜，往事回頭倍愴神」、「真成薄命久尋思」、「燕子不來花落盡，萋萋芳草憶王孫」都可以看出她在這段時間的心境。

從題材來看，雖然可大致分類，但其創作核心並不脫出「被棄」的概念。王香禪本身的創作，可以看出其明顯轉變的是在第一類作品。

## 四、結 論

由以上論述可知，魚玄機的詩作呈現直接、熱情、坦率的風格，她的

<sup>33</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17號，1911.4.20，署名香禪女士。

<sup>34</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287號，1909.4.17，署名女士王香禪。

<sup>35</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823號，1907.9.29，署名香禪。

<sup>36</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14號，1911.4.17，署名香禪女士。

<sup>37</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21號，1911.4.24，署名香禪女士。

<sup>38</sup> 本詩出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966號，1911.6.8，署名香禪女士。

生命經驗和王香禪相比，呈現的是截然相反的情調。魚玄機早年嫁給李億，遭李億拋棄之後，她轉而自主地追求所愛，不管是與溫庭筠、李郢、李近仁，抑或是李鶯，她都勇於表達自己的感情，毫不矯揉與做作，這種生命情調的激昂，和其「女冠」的身份，和唐代的社會背景不無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很少能在魚玄機的詩作中看到道教的宗教思想，這一點似乎和其「女冠」身份不甚搭合，原因大抵為：魚玄機的「出家」是「被迫」而非自願，儘管「女冠」身份帶給了她交友的便利，但在宗教修行上，這並不是魚玄機自發性的行為，因此她並不是「清心寡欲」、「潛心修行」，而是「放浪形骸」、「遊戲人間」。自然詩作之中對於道教修行生活的描述並不甚多。除此之外，儘管魚玄機勇於追求所愛，但是可惜的是，她幾乎都「所託非人」，因此多半處於「被拒」的狀況下。對於魚玄機本身「女性意識」的呈現上，我們應予以高度肯定，她的作品抒寫真誠、坦白、大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閨閣文學中，含蓄內斂的一面，因此我們可以說她的詩作開了一個新的局面。此外，她的「女性意識」的提升，雖是緣於「被棄」的外在因素，但仍不可否認其「主動」追求幸福的一面，和其他被棄後女性的怨懟、自責相較，魚玄機無疑地在面對自己的感情上，是忠於自己的。

以此標準檢視王香禪，早年淪入風塵，後洗淨鉛華，先嫁台南舉人羅秀惠，與羅仝離之後再嫁謝介石，其所受的社會與身份包袱，遠較魚玄機來得沉重，魚玄機「被棄」之後，在追尋真愛的過程中「屢仆屢起」，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值得令人激賞。而王香禪在「被棄」之後的作品，在在反應出因為情場不得志，而埋首於佛教之中，以之作爲一種「逃避」的態度，二者相較之下是比較消極的。此外，因為感情上的挫折，使得王香禪「主動」萌生頓入佛門之念，這種心情並表達在詩作之中。針對這一個差異，筆者一再思索的是，儘管王香禪是「主動」出家，看似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問題是，這項舉措是她自己「有意」地自我安排「出路」，抑或是一種「消極厭世」的「逃避」？事實恐怕比較接近後者。若然，則王香禪並無法擺脫世俗價值觀的評價，其「女性意識」的較為隱微，自是不爭的事實。可惜的是，日治時期「女性意識」並不因其距離現代較近而有所提升，反因長時期的深化醞釀，形成更加牢不可破的圍籠，從魚玄機到王香禪，其「女性意識」的不升反降，更可以看出這樣的遞嬗變遷。

值得一提的是，二人的詩作風格均和李義山相關，鍾惺在《名媛詩歸》

中評魚玄機〈情書寄李子安〉一詩云：

緣情綺靡，使事偏能豔動。此義山能為之，而玄機可與之匹。

王香禪亦然，連橫在《臺灣詩薈》第二號之「餘墨」<sup>39</sup>曾言：

稻江王香禪女士曾學詩於趙一山。一山，老儒也，教以香草箋，朝夕詠誦，刻意模仿，及後遇余滬上，袖詩請益。余謂欲學香奩，當自玉臺入手，然運思構思，數章定律，又不如先學玉溪，遂以義山集授之，香禪讀之大悟，繼又課以葩經，申以楚詞，而詩一變，今則斐然成章，不減謝庭詠絮矣！

一個是詩作風格近李義山，一位則是詩學李義山。魚玄機與王香禪的相近處又多一點。

由此可知，不同的時代背景（唐代及日治）對於婦女的創作，的確產生相當程度的關涉。魚玄機所處朝代及她所具的身分，為她的追求情感與文學創作提供了極高的便利性。唐代風氣的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魚玄機敢於追求所愛，熱烈直接的詩風。反觀王香禪，由於所處的日治時期，是一個雙重迫害壓抑的時代，使她無法真正地暢所欲言，詩風趨向內斂深沉。而二人在被棄之後，的確各自發展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詩作風格。在各自所處的時代中發顯自己的光芒。

## 參考書目

### 一、魚玄機

#### （一）期刊

1. 彭衍綸：〈憶君心似西江水--漫談魚玄機〉，《中國文化月刊》263期，2002年2月，頁38-61。
2. 賴嘉麒：〈試析「三水小牘」女性悲劇人物（上）（下）--以步飛煙、綠翹、魚玄機為例〉，《中國語文》，83卷6期（498），1998年12月，頁79-86；84卷1期（499），1999年1月，頁77-82。
3. 賴漢屏：〈營妓、女冠、詩人--唐代才女李冶、薛濤和魚玄機的詩作〉，《明道文藝》205期，1993年4月，頁50-57。
4. 張仁青：〈唐代詩壇兩紅顏：薛濤與魚玄機〉，《國文天地》，3卷10

<sup>39</sup> 連橫，《臺灣詩薈》上冊第二號，1924年3月，成文出版社，頁100。

- 期(34), 1988年3月, 頁41-49。
5. 〈歷代三秦才女及其著作(4): 魚玄機、王氏、屈淑、武氏〉,《陝西文獻》, 51期, 1982年10月, 頁59-60。
  6. 梁超然:〈魚玄機考略〉,《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 1997年。
  7. 夏春豪:〈論魚玄機詩〉,《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 1997年。
  8. 曲文軍:〈女道士魚玄機的準確卒年〉,《江海學刊》5期, 1997年。
  9. 劉加夫:〈唐代女詩人魚玄機〉,《文史雜誌》5期, 2000年。
  10. 白軍芳:〈殷勤不得語, 紅淚一雙流——談魚玄機和她的詩〉,《陝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期, 2000年。
  11. 姚玉光:〈歷史的誤解, 時間和角色的雙重錯位——魚玄機《贈鄰女》別解〉,《中國典籍與文化》38期, 2001年。
  12. 趙莉:〈評魚玄機作品的女性意識〉,《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期, 2001年。
  13. 邱瑰華:〈論唐代女冠詩人的社會交往與創作的關係〉,《淮北煤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期, 2000年。
  14. 岳齊瓊:〈從唐女冠詩歌看女冠詩人崇道的內在動因〉,《社會科學研究》4期, 2000年。
  15. 楊春蓉:〈唐代女仙與唐代女冠探析〉,《天府新論》6期, 2001年。
  16. 邱瑰華:〈“唐代女冠詩人”界說〉,《淮北煤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期, 2001年。
  17. 楊莉:〈「女冠」芻議: 一種宗教、性別與象徵的解讀〉,《漢學研究》第19卷1期, 2001年6月。
  18. 李豐楙:〈唐人葵花詩與道教女冠——從道教史的觀點解說唐人詠葵花詩〉,《中外文學》16卷6期,
  19. 李孟君:〈唐代詠女性詩所反映的婦女現實生活——以後妃、宮人、姬妾、娼妓為例〉,《建國學報》17期, 1998年6月, 頁15-31。
  20. 吳存存:〈女性意識與情愛悲劇〉,《歷史月刊》1998年11月號, 頁96-102。
  21. 王雅資:《唐代閨閣詩歌研究》, 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000年6月15日。

## (二) 書籍

1. 《全唐詩》，明倫出版社，1971年。
2. 陳文華校注：《唐女詩人集三種》，新宇出版社，1985年10月。
3. 林雪鈴：《唐詩中的女冠》，文津出版社，2002年9月。

## 二、王香禪

1. 吳品賢：〈無端惹得多情淚，彼是瀟湘一後身--王香禪及其詩淺探〉，《臺北文獻直字》136期，2001年6月，頁121-159。
2. 邱奕松：〈王香禪與詩〉，《臺北文獻直字》，93期，1990年9月，頁141-152。
3. 聞樂：〈連雅堂與王香禪〉，《中外文學》，4卷2期，1975年7月，頁42-57。
4. 師古：〈連雅堂與王香禪〉，《臺北文物》4卷4期，頁21-23，1956年2月。
5. 陳運棟：〈談藝且王罔市到詩人王香禪〉，《臺灣人物叢譚》，陳運棟撰，七燈，1978年4月。
6. 林藜：〈王香禪失意情場〉，《寶島蒐古錄》，林藜撰，臺灣新生報，1978年2月。
7. 宣建人：〈釵橫夢亦香一記「玩春園」王香禪女士〉，《臺灣人物誌》宣建人著，省府新聞處，1987年10月。
8. 吳品賢：〈府城才女蔡碧吟〉，《台南文化》新50期，2001年3月，頁36-64。
9. 吳品賢：《日治時期臺灣女性古典詩作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

## Lament of deserted women

— trying to analyze two female poets Shyuan Ji, Yu in Tang Dynasty and Shiang Chan, Wang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Hsu Hui-Wen

###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take the similarity of Shyuan Ji, Yu and Shiang Chan, Wa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mparison;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thesis—— when a woman is deserted by her husband, what action will she take and what kind of the procession of transition in her mentality will she have. Furthermore, to what degree that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eras (Tang Dynasty and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relate to literary creation will be. When both of them were deserted, did they develop different and unique style of poetry?

From Shyuan Ji, Yu's poetry, she is brave in expressing her feelings without affectation. Such tone of life is spirited; it highly relates with her position of "female Taoist priestess" and wide-open society background in Tang Dynasty. Besides, we should ap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self" in Yu's poetry highly. Her poetry is sincere, candid and bold. On a level, she surpassed the reticent part of boudoir literature.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Yu's poetry initiates a brand new prospect.

To examine Shiang Chan, Wang with the same level, she bore a heavier burden of social status and community than Shyuan Ji, Yu's. After Yu was deserted, she fought again and again in spite of setback in searching for true love, and never cared about judgment of common customs. It is worthy of being appreciated tremendously. However, Shiang Chan, Wang's works after she was deserted shows her attitude—— when she cannot do well in the field of love, she will shirk into world of Buddhism as a way to escape. By contrast, Wang is passive.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self"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did not be lifted because it was near the present age. On the contrary, the bonds on female have become too strong to break because it enhanced and deepened through a long period storing. From Shyuan Ji, Yu to Shiang Chan, Wang, the status of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self" did not lift but descend; we can observe the trend more clearly.

The open-wide atmosphere in Tang Dynasty put a premium on Shyuan Ji, Yu to have courage to search for her love on a level. To set off by contrast, Shiang Chan, Wang wa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which was constrained under doubled pressure. It made her cannot pour out all that she want to say so the style of Wang's poetry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roverted and deep. However, when both of them were deserted, they had developed different and unique style of poetry. They shined in their own era.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90—107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林和靖詠梅詩對後世相關詩題創作的影響

歐純純\*

## 【提要】

林和靖是北宋初年的隱逸詩人，他留下八首詠梅詩，數量雖然不多，但在梅花的歌詠上，卻有著很大影響，此影響主要可分為三點：一是林和靖其人、其詩，已成為梅花典故的一種，多為後人運用；二是林和靖詠梅著重於梅枝、梅影的描繪，並將梅花置於月下、水旁，在水、月、梅等意象共同疊加下，使梅花的審美視角更加開闊，呈現更豐富的內涵；三林和靖以隱者身分，與梅為友，不慕榮利，潔身自愛，使梅花產生疏雅高潔與隱者意象。這些特點，在後代詠梅詩作中常可見到，可看出梅花的精神特質愈來愈飽滿，這都是林和靖詠梅對後代相關詩題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林逋 林和靖 詠梅詩 梅花 意象

---

\*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 一、前言

最早的詠梅詩作出現於南北朝，是為鮑照的〈梅花落〉，其他如何遜、吳均、庾信等都有相關作品，此期歌詠梅花多著重於時序變遷的觸動，以及梅花鬥雪的堅毅特質。<sup>①</sup>至唐，承續六朝以下的詠梅內涵，有的表達時序變動、歲月之感，如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李商隱〈憶梅〉等；有的表達梅花堅貞鬥雪之特質，如張九齡〈詠庭梅〉、朱慶餘〈早梅〉等，在題材與數量上都得到一定的發展，但此時梅花還不是被歌詠最多的花朵，詠梅詩大量出現，及其內涵趨於成熟要至宋代。宋代以後，梅花受到詩人廣泛的注意與歡迎，主要包含兩項原因：首先，宋代工商繁榮、娛樂需求大增，賞梅、藝梅成為文人雅尚，梅花成為園林主要的景觀，帶動了詠梅發展；其次，宋代詠梅專著問世，如范成大《石湖梅譜》、張鑑《玉照堂梅品》等，使梅花的人格特質、意象內涵、精神特質等趨於完備，確立了梅花百卉之首的地位，梅花成為文人喜愛歌詠的對象，所以宋代詠梅的作品快速增加。由此可知，梅花受到歌詠與重視，是宋代詩壇的特色之一。除了上述兩項原因之外，北宋初期的隱逸詩人林和靖，對於宋代詠梅風氣之提升亦有著催化作用，這與他用更多變的視角來歌詠梅花，有著密切關係。林和靖除了歌詠梅花的香味之外，梅枝、梅影亦成為觀照對象，加上將梅置於水旁、月下，使梅花的審美視角更加開拓；另一方面，他隱者的身分，使梅花與隱者結合，亦增加了梅花的意象內涵。本文要介紹的，正是北宋初年林和靖的詠梅詩，他歌詠梅花不但使梅花的特質得到進一步的開掘、梅花詩的意境愈加擴大；而且他的詠梅詩句，也得到後人的引用或化用，至於他的姓名、字號、居所，亦成為歌詠梅花特有的典故內容，對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

林和靖是一位隱逸詩人，放浪形骸，與梅為鄰、為友，二十年不至城

<sup>①</sup> 例如南朝宋鮑照的〈梅花落〉：「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此處以雜樹與梅樹相互對比，言雜樹零落逐寒風，梅樹霜中能作花，突顯出梅花耐寒鬥雪的堅貞特質。又如南朝梁何遜〈揚州法曹梅花盛開〉：「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朝灑長門淚，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處以「驚時最是梅」、「應知早飄落」表達梅花引起詩人對於時序變遷的感觸，並有著傷春惜逝的悲情感傷。並以「銜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呈現梅花犯寒綻開，無懼霜雪的堅貞特質。

市，終生不娶，博學多聞，屬於真正的隱者，受到世人的敬重。他歌詠自然山水，呈現出淡適恬靜的生活態度，梅花詩即是此類作品中的一種。從他的詠梅詩中，可看出詩人愛梅、與梅為友的情感，且將梅花的情態刻劃的相當傳神，這種真情投入的描寫，使他詠梅詩受到後人的重視，並多被後人引用。另一方面，林和靖的隱者形象，無爭的處世態度，也使得梅花疏雅高潔的形象與隱者意象確立。所以不管是梅花意象的營造，或梅花典故的運用，還是梅花情態的歌詠，林和靖詠梅詩都對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以下我們先就林和靖詠梅詩提出分析，讓我們了解他詠梅的特色，進而探討其詠梅對後世的影響。

## 二、林和靖生平及其詠梅詩

### (一) 林和靖生平

據《宋史》記載林和靖生平云：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澹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或曰『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跡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sup>②</sup>

林逋是北宋時的隱逸詩人，他不追求榮利，不要求聞達，為詩不為名世，以恬淡自適的生活態度，獲得世人的敬重，也贏得北宋仁宗的推崇，於是在他卒後，賜諡和靖先生。林和靖行書寫得好，又喜愛作詩，但這些都不是為了流傳後世，而是真的以詩文抒發性靈。也因如此，如今流傳三百多篇的詩作，<sup>③</sup>都是他人偷偷幫他保存蒐集的，相信林和靖所作的詩文，應遠多於這些篇章，只是未能完全被他人蒐集到罷了。而我們也慶幸還好有這些好事者，幫我們保留了這些詩作，讓這些作品今日能呈現在我們眼前，使我們能進一步了解，林和靖詩歌對後世的影響。

② 《宋史》，頁 13432，〈列傳〉第 216，卷 457，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

③ 林逋的詩作，今查閱《全宋詩》，總可得三百零二首，僅存詩句的部分，有十聯，單句者有二。可見林逋今所得見詩詩作，僅三百餘首。

林和靖最爲後人所稱道的，就是他是一位真正的隱者，也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文人，他的歸隱不是爲了沽名釣譽，而是真與山林爲伴，二十年不及城市而怡然自得者。或有友人造訪其廬舍，友朋總清談終日方去。所以他的詩作，主要可分爲兩大類，一類是與友人唱和、寄贈、送別等作品；另一類則是以自然山光景物爲歌詠對象，此類作品顯見林和靖放達、淡適的隱逸生活。這裡要特別論述的，即是林和靖歌詠自然山水的「詠梅詩」。其實「詠梅詩」在今存三百多篇的作品中，僅占八首，數量雖不多，但對於後代「詠梅詩」的歌詠，卻有很深的影響。

## （二）林和靖的「詠梅詩」

林和靖的詠梅詩，今日僅存八首，我們要了解其對後代的影響，必須先觀其詠梅作品有那些特色，以下先對林和靖的「詠梅詩」作一分析：

<山園小梅二首>：

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剪綃零碎點蘇乾，向背稀稠畫亦難。日薄從甘春至晚，霜深應怯夜來寒。  
澄鮮祇共鄰僧惜，冷落猶嫌俗客看。憶著江南舊行路，酒旗斜拂墮吟鞍。<sup>④</sup>

（冊二，卷一〇六，頁一二一八）

<又詠小梅>：

數年閑作園林主，未有新詩到小梅。摘索又開三兩朵，團樂空繞百千迴。  
荒鄰獨映山初盡，晚景相禁雪欲來。寄語清香少愁結，為君吟罷一銜杯。

（冊二，卷一〇六，頁一二一八）

<梅花>三首：

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  
人憐紅豔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  
幾回山腳又江頭，繞著孤芳看不休。一味清新無我愛，十分孤靜與伊愁。  
任教月老須微見，卻為春寒得少留。終共公言數來者，海棠端的免包羞。  
小園煙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麝臍。湖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  
畫工空向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慚愧黃鸝與蝴蝶，只知春色在桃溪。

（冊二，卷一〇六，頁一二一八）

④ 《全宋詩》，頁1218，卷10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二版二刷。以下關於林逋的詩作，皆從本書引出，故不再註明出處，以此註為主。

<梅花> 二首：

宿靄相粘凍雪殘，一枝深映竹叢寒。不辭日日旁邊立，長願年年末上看。  
蕊訝粉綃裁太碎，蒂疑紅蠟綴初乾。香罽獨酌聊為壽，從此群芳興亦闌。  
孤根何事在柴荆，村色仍將臘候并。橫隔片煙爭向靜，半粘殘雪不勝清。  
等閑題詠誰為愧，子細相看似有情。搔首壽陽千載後，可堪青草雜芳英。  
(冊二，卷一〇八，頁一二四三)

從以上八首「詠梅詩」可歸納出幾點特色，(一)是梅花在此有遺世獨立，淡適無爭的形象，如：「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澄鮮祇共鄰僧惜，冷落猶嫌俗客看。」、「橫隔片煙爭向靜，半粘殘雪不勝清。」以「眾芳」、「俗客」烘托出梅花「鄰僧惜」、「爭向靜」、「不勝清」的獨立、淡適形象。(二)詠梅的特有形容詞，如：「『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湖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其中的「疏影」、「橫斜」、「橫枝」、「斜入」等，都是用以詠梅樹的枝幹，在寒冷灰暗的冬季裡，抵抗著寒風，崢嶸獨立，其中「橫斜」、「橫枝」的「橫」字，正表現出這種堅毅不屈的精神。另外「疏影」、「斜入」則展現梅樹光禿禿的枝樞，在徹骨寒風中，綻放出雪花般的花朵，在此枯寂的氣圍裡，「疏」字、「影」字，為梅枝增加了孤寂感，而「斜」字，則使枝樞增添了生命力。(三)喜愛描寫梅花之香氣，如：「暗香浮動月黃昏」、「寄語清香少愁結」、「陣陣寒香壓麝臍」，其中的「暗香」、「清香」、「寒香」等，都是對梅花香味的形容，展現梅花的香味，是清新、淡雅，有別於其他花朵的濃郁、強烈，將梅花雅致、出塵的特質呈顯出來。(四)以「孤芳」、「孤根」來指稱梅花，如：「幾回山腳又江頭，繞著孤芳看不休。」、「孤根何事在柴荆，村色仍將臘候并。」以「孤」字來表現梅花，「孤」本有「獨」之義、「特」之義，所以「孤芳」、「孤根」除了指梅花在嚴寒酷冬中自開自落的孤獨、孤靜義；也有耐寒不屈的獨特義，充份展現梅花在詩人心目中的特殊意含。(五)詩人將自己融入詩中，成為詠梅詩中的一景，且將愛梅之心呈現出來，如：「幾回山腳又江頭，繞著孤芳看不休。」、「不辭日日旁邊立，長願年年末上看。」、「搔首壽陽千載後，可堪青草雜芳英。」以「幾回」、「日日」、「年年」表現詩人「看不休」、「旁邊立」的愛梅心情，並以千載之後，自己化為塵土時，還能與「青草雜芳英」，表達出自己生死皆願與梅相伴的期許。

從上文的論述，可看出林和靖的「詠梅詩」賦與梅花遺世獨立、淡適

無爭、疏雅高潔的形象，而詩人隱居山林，與世無爭，其追求的生活態度，正與梅花呈現出來的精神相符，所以從字句中，處處可見詩人精神與梅花合一，再再展現詩人孤特雅淡的人格特質。梅花之所以能與詩人的精神特質相合，源自於梅花本身具有的特徵，是如吳曉所言：「意象的自足性，所謂自足，是指意象獨力的表現性，這種表現性不是由人類的情感附加上去的，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特徵，是事物客觀上與人類的情感相通，具有如格式塔心理學所說的『異質同構』關係，因而能表現人的情感。」<sup>⑤</sup>因梅花本身在萬物凋零的寒冬綻開，是堅毅不拔的展現，其白色花朵如雪花般，是清雅的呈現，淡適的清香，是脫俗的呈顯，又其山林野地的生長環境，更有了遺世獨立的味道。因為梅花本身具有這些特徵，所以容易與人們的感情相通，尤其遇到一位隱逸詩人，他們的精神自然有了相互的呼應，也成就了林和靖的梅花意象。這樣的梅花意象，經過時間的融鑄考驗，當後人歌詠梅花時，常會想起林和靖；或想起林和靖時，常會聯想到梅花。這種物我互相影響的結果，對於人物形象的確立，還有梅花意象的深化，都達到相輔相成的目的。

### 三、林和靖詠梅詩對後世詠梅的影響

林和靖的「詠梅詩」，對於後人歌詠梅花，不管是梅花典故的運用、梅花意象的營造、梅花情態的歌詠等，都產生不小的影響。以下我們將林和靖詠梅詩對後世詠梅的影響，分為三點說明：（一）詠梅典故的形成與運用；（二）梅與水月結合，梅枝、梅影成爲觀照視角；（三）梅花疏雅高潔與隱者意象形成等。

#### （一）詠梅典故的形成與運用

後人一提到林和靖，就會聯想到他與梅花的關係，所以後人歌詠梅花時，常會歌詠到林和靖，所以林和靖已成爲詠梅典故的一種。其表現形式，包含直呼其名以入詩；或點化其詩句入詩；或以其居住地來呈現等。以下舉例說明。

<sup>⑤</sup> 吳曉：《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頁 29，〈二、意象作為符號〉，台北：書林出版社，1995 年 3 月。

## 1. 直呼其名以入詩

就直呼其名以入詩而言，包含「和靖」、「林逋」、「逋仙」、「林和靖」等不同的表現形式。先看「和靖」表此典故者，以李綱⑥〈梅花二首之二〉為例：

數枝玉雪小溪濱，先得陽和一點春。冷豔幽姿難與並，暗香疏影孰為鄰。

廣平不害心如鐵，和靖須知句有神。亦對寒芳動詩興，卻嫌標格太清真。⑦

李綱這首詩運用典故的地方有二：一是「廣平不害心如鐵」句，另一是「和靖須知句有神」句。首先「廣平不害心如鐵」是關於梅花鐵石心腸的典故，見於皮日休〈桃花賦序〉，其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石心腸，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⑧說明梅花能讓像唐名相宋廣平這樣鐵石心腸的人，變得清麗婉約，呈現柔情的一面。所以這裏的「廣平不害心如鐵」，正是「廣平心如鐵不害」之義，說明即使鐵石心腸的人見到梅花，也會變得婉約柔媚，是梅花感化人的展現。另一方面，就「和靖須知句有神」而言，即是林和靖典故的運用，是「和靖句有神須知」之義，直接讚美林和靖的詠梅詩，是句句如有神，能將梅花的姿態精神展現無遺。此處除了肯定林和靖詠梅詩的成就外，更顯露出梅花清真柔雅的格調。

以「林逋」表梅花典故者，如陸游⑨〈開歲半月湖村梅開無餘偶得五詩以煙濕落梅村為韻之三〉：

梅花如高人，妙在一丘豁。林逋語雖工，竟未脫纏縛。乃知尤物側，

天下無傑作。老我懷不舒，樽前幾開落。⑩

此詩說明「林逋語雖工，竟未脫纏縛。」是因「乃知尤物側，天下無傑作。」此處言林逋語之工妙，即是肯定其詠梅詩為佳作，又言其未脫纏縛，是因為像梅花這樣的尤物⑪，實難以用語彙將其道盡，此處強調出梅花實在高

⑥ 李綱，字伯紀，號梁谿居士，為北宋末南宋初時人。忠勇愛國，北宋亡後，力主抗金，反對合議。著有《梁谿集》。參《宋史》，頁11241-11274，卷358、359，〈列傳〉第117，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⑦ 《全宋詩》，頁17545，卷15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⑧ 皮日休：《皮子文藪》，頁九，〈桃花賦序〉，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7月。

⑨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為南宋著名的愛國詩人。力主抗金，多不得志。著有《劍南詩稿》。參《宋史》，頁12057-12059，卷395，〈列傳〉第154，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⑩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26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

⑪ 范成大在其《石湖梅譜》中言：「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頁1，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

妙不可即，真為天下尤物。這裡運用林逋的典故，似貶而實褒，因為在陸游眼中，梅花的高妙處，連詠梅詩寫得最傳神的林和靖，亦無法呈現出來，錯不在林和靖，而是在於梅花實已到達言語不可描繪的造化之境。此處林和靖典故的運用，直接以「林逋」表達出來，並沒有談到其詠梅詩如何，也無使用到他梅詩中的詩句，而是以林逋表達其詠梅詩的所有風格，肯定林逋詠梅詩的成就。

以「林和靖」表此梅花典故者，如（明）王淇〈梅〉：

不染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sup>⑫</sup>  
此詩將梅花擬人化，言其如隱居的高人，遠離世俗，獨居野店遠水旁，但因誤交損友林和靖，將其形於歌詠帶入世俗，從此之後，不時有人詠之、探之，原來遺世獨立與世無爭的生活形態，於是被迫改變，甚至引起後人爭相歌詠，於此不絕。此詩以輕鬆詼諧的口吻，說明詩人愛詠梅的情況，而此詩呈顯的題旨，正是表達林和靖詠梅詩對後世的影響，且此影響至深且遠。

以「逋仙」表此梅花典故者，如清施士洁<sup>⑬</sup>〈憶梅〉：

歲寒松竹故交稀，偕隱逋仙夙願違。我憶梅花花憶我，含香應待主人歸。<sup>⑭</sup>  
松、竹、柏人稱歲寒三友，但詩人在此卻言與松、竹沒有什麼交情，其主要原因，是因為詩人的心早就被它物所佔據，此從「偕隱逋仙夙願違」句可看見，詩人原來想與愛梅甚深的林逋仙人，相約偕同隱居於山間野店，一起賞梅、詠梅，但卻無法如願，點出詩人心中掛念的，正是林逋仙人與梅花。我們當然知道，林和靖不可能出現在清朝與詩人相偕同遊，所以這裡所意味的，就是林和靖隱者風範與愛梅精神，詩人追求在乎的即是此。既然事與願違，詩人今天僅能「我憶梅花花憶我」，與林和靖、梅花相互思念，並期望梅花能懂得自己的心思，等待有朝一日，擺脫塵世羈絆，能如林和靖般回歸大自然與梅花的懷抱。這首詩的典故運用，即是取林和靖隱者風範及其與梅為友的內涵。

## 2. 點化其詩句以入詩

此種典故的呈現方式，主要是將林和靖詠梅詩中的詩句，經過截取，

<sup>⑫</sup> 陳香編：《梅詩九百首》，頁92，台北：國家出版社，1995年10月。

<sup>⑬</sup> 施士洁：名嘉應，字溪舫，號芸沅。清朝臺灣人，生於臺南，原籍晉江。光緒三年進士，點內閣中書。著有《後蘇龕文稿》、《後蘇龕詩稿》等。

<sup>⑭</sup> 施士洁：《後蘇龕合集》，頁290，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3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



或經過點化，讓人見之，能明白林和靖詠梅的精神特色者。此類的表現形式，主要以林和靖〈山園小梅二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句被運用的情況最普遍，經過詩人選取點化後，主要包含「橫斜」、「疏影」、「疏影橫斜」等幾種呈現方式，以下舉例說明。

以「橫斜」表此典故者，如陸游〈題施武子所藏楊補之梅〉：

補之寫生梅，至簡亦半樹；此幅獨不然，豈畫橫斜句？<sup>15</sup>

這首詩屬於題畫詩，以「豈畫橫斜句」，說明整幅梅花畫的佈局，所謂的「橫斜句」，即是指林和靖詠梅詩中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水邊籬落忽『橫枝』」、「屋簷『斜入』一枝低」，這樣的雅淡的景致。可以想見，這幅畫沒有整棵的梅花樹，而只有一枝橫斜疏影的梅枝，除去繁複表現簡單，脫掉繁華留下清新，展現出一幅清雅脫俗的梅花畫。這裡的「橫斜句」是整首詩的精神呈顯處，因一句「橫斜句」，其實已含括了林和靖詠梅詩所呈現出來的梅花形象—高雅、清新、淡適。而這些形象全部投入此題畫詩中，將這幅畫所展現的風格，表露無遺。這樣的典故運用，更讓人體會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優美景致。

以「疏影橫斜」表此典故，如楊萬里<sup>16</sup>〈雪中看梅〉：

犯雪尋梅雪滿衣，池邊梅映竹邊池。要尋疏影橫斜底，揀盡南枝與北枝。<sup>17</sup>

楊萬里這首詩，描寫自己犯雪看梅，雪花飄飄，寒風颼颼，大地一片銀灰，再加上如雪般白透的梅花，是梅是雪，本難看得清，故詩人說「要尋疏影橫斜底，揀盡南枝與北枝。」表現的正是詩人在風雪中找尋梅花的心情。所以這裡「要尋疏影橫斜底」中的「疏影橫斜」，代表的即是梅花與梅枝。楊萬里在此運用林和靖詠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句中的意含，同樣以「疏影橫斜」代表梅花。可見林和靖典故運用的痕跡。

### 3.以其居住地來呈現

林和靖隱居於西湖孤山，《西湖志纂·孤山勝蹟》言：「孤山，在西湖中，一嶼聳立，旁無聯附，為湖山最勝處。……上多梅花，為宋林和靖放鶴處。」<sup>18</sup>可知林和靖於西湖孤山種梅養鶴，過著淡適的隱者生活。所以

<sup>15</sup>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7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9 月。

<sup>16</sup> 楊萬里，字廷秀，名其讀書之室曰「誠齋」，學者稱誠齋先生，南宋人。著有《誠齋集》等。參《宋史》，頁 12863-12870，卷 433，〈列傳〉第 192，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

<sup>17</sup> 楊萬里《誠齋集》，頁 7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四部叢刊本。

<sup>18</sup> 胡祥翰編：《西湖志纂》，頁 181，卷 3〈孤山勝蹟〉，台北縣：文海出版社，1975 年，中國名山勝蹟志叢刊。

後人常以西湖、孤山，或西湖之隱者來表林和靖的風範，這樣的典故呈現，就如黃季剛先生所說「逮及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於訓詁，繼而引錄成言，終則綜輯故事。」<sup>19</sup>不但林和靖詠梅詩被點化襲用，成爲「引錄成言」的典故，他隱居西湖的隱者風範及隱居事蹟，也被後人傳唱，成爲「綜輯故事」的典故。所以林和靖的詠梅典故，包含「西湖高士」、「西湖疏影詩」等表現形式。

以「西湖高士」表此梅花典故者，如劉克莊<sup>20</sup>〈梅花五首之三〉：

籬邊屋角立多時，試為騷人拾唾遺。不信西湖高士死，梅花寂寞便無詩。<sup>21</sup>  
此詩不同於一般的詠梅詩，它沒有針對梅的外形、香味、顏色、精神等進行描繪，而是將自己爲詠梅而詠梅的心理歷程作一描述。詩人在屋角望梅獨立，只爲求得詠梅佳句，他說「不信西湖高士死，梅花寂寞便無詩。」這裡的「西湖高士」即是指隱居西湖的林和靖，因他是一位隱者，所以以高士稱之。詩人不相信在詠梅大師林和靖死後，便無人能再寫出膾炙人口的詠梅佳構，所以自身方立籬邊，爲文造情。就字面看來，詩人真的是爲文造情，但就整首詩呈現的風格而言，卻展現詩人詼諧戲謔的味道，此詩的美感即從此表現出來。所以我們可說，這首詩雖然敘述多於言情，但因典故用得高妙，將梅花的所有美感，托於西湖高士一句中，雖未明說，意韻卻相當深遠。

以「西湖疏影詩」表梅花典故，如楊萬里〈正月三日驟暖多稼亭前梅花盛開之二〉：

絕愛西湖疏影詩，要知猶是未開時。如今開盡渾無縫，只見花頭不見枝。<sup>22</sup>  
此詩首句即言「絕愛西湖疏影詩」，這裡的西湖疏影詩，就是指隱居西湖孤山的林和靖詠梅詩，詩人以「絕愛」表達他對林和靖詠梅詩的喜愛。且詩人以對比的手法，以林和靖詠梅詩所謂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湖水倒窺『疏影』動」等，這樣梅花稀疏孤獨的形象，與眼前「只見花頭不見枝」梅花盛開情況互相比較，確實將梅花盛開的繁榮景象呈顯無遺。此處林和靖詠梅詩典故的運用，展現的是另一種風貌。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知林和靖的梅花典故，展現的面向非常廣，不管

<sup>19</sup>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頁192，〈事類第三八〉，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5月。

<sup>20</sup>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南宋人。嘗因詠〈落梅〉詩得禍，閑廢十年。參《全宋詩》，頁36133，卷303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sup>21</sup> 《全宋詩》，頁36243，卷303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sup>22</sup> 楊萬里《誠齋集》，頁11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四部叢刊本。

是直呼其名以入詩；或點化襲用其詩意；或以居住地來呈現等，表現形式又各自不同，可知林和靖詠梅的典故不但被引用的相當普遍，也發展出許多不同的面貌，這都足以證明，林和靖詠梅已成為特定的梅花典故，且得到後人的認同與運用。

## （二）梅與水、月結合，梅枝、梅影成為觀照視角

梅花戰冰鬥雪而開，所以文人詠梅多半以霜雪同詠。但林和靖詠梅，將水、月帶入賞梅的視角內，在月下賞梅，在水邊觀花，如此烘托出清新雅潔的梅花形象。另一方面，前人詠梅多著重於梅的花及香上，但林和靖將梅樹的枝桠，梅樹的影子，描進詩作中，將梅花孤寂崢嶸的美展現出來，使梅花多了更豐富的審美視角。

林和靖梅花與水月結合的詩句，就是其〈山園小梅之一〉：「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聯，將梅花的清新與水的淨澄相映，且將梅花的雅靜與月光的柔和相襯，如此將梅花清新雅潔的形象呈現出來。就如《花與中國文化》一書所說：

此詩聯是自古以來公認的詠梅絕唱，它不儘傳神地刻畫出梅花的姿態，還營造了一種超凡入聖的審美意境極致，梅花的特質與其周遭的時空氛圍，已全然融為一體，具有著高度渾然的協調性。<sup>23</sup>

可看出林和靖水、月、梅景致的共同烘托，使梅花的特質被突顯出來，也就是程杰所說：「『水』不只是一個植物生長的環境，『月』的作用也遠不是一種光色氣氛的擬似詞，而是一個比雪、霜、冰、玉等都更具文化積澱的境象。置身其營造的『語境』，梅花被賦與了清雅超逸的精神意蘊，從而上升為高逸人格的寫意符號。」<sup>24</sup>由此可知，林和靖將水月梅共同營造的詠梅詩句，雖然僅此一聯，但卻不會減低它在詠梅上的價值，反而成為詠梅的最佳意境，成為後人詠梅常運用的模式。如梅堯臣〈依韻和正仲重臺梅花〉：

不見黃鸝度，寧防粉蝶凌。月光臨更好，谿水照偏能。<sup>25</sup>

又如蘇轍〈次韻王適梅花〉：

江梅似欲競新年，照水窺林態愈妍。霜重清香渾欲滴，月明素質自生煙。<sup>26</sup>

<sup>23</sup> 何小顏：《花與中國文化》，頁91，〈麗質天成 應期而開 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sup>24</sup> 程杰：〈梅與水月一個詠梅模式的發展〉，頁113，江蘇社會科學，四期，2000年。

<sup>25</sup> 《全宋詩》，頁3097，卷25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不管是梅堯臣的「月光臨更好，谿水照偏能。」或蘇轍的「照水窺林態愈妍」、「月明素質自生煙」都將溫和潔淨的月光與雪白的梅花相映，此情此景又藉由水面映照出來，如此水、月、梅相互烘托映襯，形成一幅靜雅脫俗的圖畫。由此我們也可發現，梅花高雅不流於俗的特質被突顯出來，如此成就了梅花清雅超逸的人格形象。

就林和靖描寫梅花枝桠與梅影而言，誠如何小顏所言：

宋代隱士林逋的〈山園小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疏影參差，橫斜屈，推崇梅姿的這一種風骨神韻，盡在這『疏影橫斜』中道盡矣。<sup>27</sup>

可知林和靖的〈山園小梅〉詩中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聯，不但包含梅與水、月的歌詠模式，也包含了梅枝、梅影的描繪。除此之外，其〈梅花之一〉：「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是梅與水結合，及梅枝的描寫；又〈梅花之三〉：「湖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是梅與水結合，及梅枝、梅影的描繪。從此可以發現，林和靖描梅枝喜以「橫枝」、「一枝」來形容，「橫」字、「一」字予人勁直之感；描寫梅影，喜置於水邊，「疏影橫斜水清淺」、「湖水倒窺疏影動」水面上的梅影「疏影清」、「疏影動」，給予人淡雅逸靜之感，使梅花有了超凡脫俗的風骨神韻，就如程杰所說：「正是在梅花冷蕊幽香的基礎上，發現了疏枝橫斜，才建立起梅花淡雅、高潔、冷峭、清瘦美的整體認識。」<sup>28</sup>所以林和靖對於梅枝、梅影的歌詠，使梅花冷峭、清瘦的美被發掘出來，讓梅花的審美視角更加廣泛與完整。在林和靖之後，梅枝、梅影也成為文人詠梅喜歡歌詠的內容。如（北宋）蘇軾〈和秦太虛梅花〉：

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sup>29</sup>此詩以「竹外一枝斜更好」的「一枝斜」來表梅花，詩人著重的正是梅枝的描繪。又（南宋）陸游〈分韻作梅花詩得東字〉：

淺寒籬落清霜後，疏影池塘淡月中。<sup>30</sup>

此處的梅花是從水中倒影呈現出來的，水中梅的倒影，伴著娟娟月色，所以說「疏影池塘淡月中」這是梅影與水、月共同氛圍的營造，展現雅潔超

<sup>26</sup> 《全宋詩》，頁 9963，卷 85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sup>27</sup> 何小顏：《花與中國文化》，頁 91，〈麗質天成 應期而開 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 月。

<sup>28</sup> 程杰：〈林逋詠梅在梅花審美認識史上的意義〉，頁 106，《學術研究》，七期，2001 年。

<sup>29</sup> 《全宋詩》，頁 9332，卷 80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sup>30</sup>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9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9 月。

逸的形象。又如（明）王冕〈白梅〉：

瘦鐵一枝橫照水，疏花點點耐清寒。雪晴月白孤山下，幾度清香拄仗看。<sup>③①</sup>  
此詩以「瘦鐵一枝橫照水」來表梅枝，其中的「瘦鐵」、「一枝」、「橫照水」都是梅枝的形象塑造，將梅花勁瘦清峭的特質展現出來。另一方面，梅枝「橫照水」也包含水中倒影的梅枝刻劃，是梅枝與水的共同詠唱。而「雪晴月白孤山下」句中，有著孤山月下觀梅的描繪，此展現出林和靖隱居西湖孤山觀梅的典故，也將梅與月的歌詠模式呈現出來，所以從此詩中，我們除了看到梅枝、梅影的刻劃，也看到了水、月、梅的雅致圖畫。

綜上所論，林和靖詠梅將梅與水、月結合，梅枝、梅影成爲觀照視角，這樣的詠梅特色，影響著後人對於梅花的描繪，使後人歌詠梅花時，常運用水與月來共同烘托，梅枝、梅影也成爲主要描寫對象，此使梅花詩的意蘊更加深遠，內容展現更爲多面。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發現，梅與水、月結合的歌詠模式，與梅枝、梅影的刻劃，常爲詩人共同運用，所以同一首詩中，就可能兼具此二者之特色，可知此二種詠梅形式實是相輔相成，已成爲詠梅的專屬特色，這都是林和靖詠梅對後代的影響。

### （三）梅花疏雅高潔與隱者意象形成

梅花有著花早、色素、香清、枝勁的特點，當我們見到早發潔白的梅花在皚皚雪地中綻開，散佈著淡淡幽香，其枝條崢嶸的擎起天地，使我們產生疏雅高潔之感，就如范成大在其《石湖梅譜》中說：「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枝怪奇者爲貴。」<sup>③②</sup>但唐代以前歌詠梅花，多著重於梅花所引起時序遷動的種種觸動，及梅花鬥雪的堅毅特質，對於梅花疏雅高潔的特點卻少有發掘。這要到林和靖詠梅後，才突顯出這個特色。林和靖詠梅將梅花置於水旁月下，使雅淡的梅花，與水、月的晶瑩澄澈、冰清玉潔相互烘托渲染，使梅花有別於凡花，有了人格化的意蘊，產生疏雅高潔的意象。再加上林和靖本身就是一位品格高潔的隱者，以他本身的人格特質去歌詠梅花，與梅爲友，使梅花也具有高潔的意蘊。另一方面，梅花於霜寒苦雪的高山遠水間自開自落，宛如歸隱山中的隱者，梅花如隱者般的意象於此也可看出。由上的論述可知，林和靖本身隱者格高的特質，以及梅花淡雅超逸的特色，二者互相呼應，所以當林和靖與梅爲友，

③① 張璠選注：《王冕詩集》，頁170，台北：華正書局，1987年7月。

③② 范成大：《石湖梅譜》，頁4，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

且將梅花置於月下水旁形於歌詠時，梅花疏雅高潔與隱者的意象於是形成。

我們在林和靖的詠梅詩中，除了見到梅與水、月共同烘托外，我們也看到他對梅花格高雅潔的推崇，如〈山園小梅之一〉：「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以梅花的清新玉映與霜禽偷眼、粉蝶斷魂相對比，如此以呈現出梅花之脫俗高雅，俗物不敢褻玩之情景。又如〈梅花之三〉：「湖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慚愧黃鸝與蝴蝶，只知春色在桃溪。」以黃鸝與蝴蝶只知尋春於桃李應覺慚愧，來突顯梅花疏雅高潔，與凡花有別之情況。以下我們就針對後人對於梅花疏雅高潔與隱者意象的創造，舉例說明。

先就梅花疏雅高潔的意象而言，以張道洽<sup>33</sup>〈梅花〉詩為例：

疏疏竹外枝，短短水邊籬。南雪若相避，東風殊不知。蘭筓皆弱植，  
桃杏總凡姿。坐歎逋仙遠，清宵費夢思。<sup>34</sup>

詩人詠梅以蘭、筓、桃、杏與之對比，因蘭筓不耐風寒，桃杏姿色平凡，都無法與具耐寒精神，且高雅脫俗的梅花相比較，由此展現出梅花疏雅高潔的意象。同時詩人也由此高潔的梅花，進而想到愛梅的隱者林和靖，說到「坐歎逋仙遠，清宵費夢思。」逋仙即是林逋，和靖先生，因這位懂得欣賞梅花，喜愛梅花林和靖，早以羽化成仙，今日還有多少人能懂得欣賞這超凡脫俗的梅花？還有多少人真心喜愛這疏雅高潔的梅花呢？此詩即是藉由梅花疏雅高潔的意象，來展現其因不流於俗，而少有人懂得欣賞的感嘆。又如陸游〈梅花絕句之二〉：

月中疏影雪中香，只為無言更斷腸。曾與詩翁<sup>35</sup>定花品，一丘一壑過姚黃。

<sup>36</sup>

這首詩中的「疏影」即是指梅花而言，陸游不明言梅花，而以明月下的疏落枝影，在雪夜裡飄香，把這樣的梅花形象描寫出來，呈現出詩歌的含蓄之美。當然梅花之美，本來就是含蓄內斂的，所以當與最美豔的姚黃（牡丹花）相比較時，其高下立判，丘壑可知。梅花有別於美豔的牡丹，在對比下展現出疏雅高潔的意象。

<sup>33</sup> 張道洽，字泽民，號實齋，南宋人。其詠梅詩相當多，《全宋詩》中存96首。參《全宋詩》，頁39247，卷329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sup>34</sup> 《全宋詩》，頁39248，卷329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sup>35</sup> 這裡的詩翁即是指曾幾而言，陸游在此詩後註曰：「曾文清公嘗問予：『梅與牡丹孰勝？』予以此答。」

<sup>36</sup>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8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

就梅花隱者意象而言，如陸游〈雪中尋梅之二〉：

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風饕亦自如。正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貴不關渠。<sup>37</sup>  
這首詩將梅花的隱者意象，非常具體的呈現出來，以巢父、許由<sup>38</sup>，來指稱梅花為花中的隱者。我們都知道，巢父、許由都是歷史上著名的隱者，他們不慕名利，選擇歸隱山林，為後人所景仰。所以此詩直接以花中的巢許輩，來表具有隱者風範的梅花，這不但代表梅花同樣具有隱者的特質，更同樣具有如巢父、許由般的節操。而此詩意象塑造的完成，是由「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風饕亦自如」等淡適無爭的氣圍營造，至點出「花中巢許輩」、「富貴不關渠」等隱者風範而告完成，是屬於輻合式的輻輳組合方式。

以不染纖塵表梅花的隱者意象者，如楊萬里〈郡治燕堂庭中梅花〉：

林中梅花如隱士，只多野氣無塵氣。庭中梅花如貴人，也無野氣也無塵。

不疏不密隨宜了，旋落旋開無不好。<sup>39</sup>

此詩將梅花分為林中梅花與庭中梅花兩方面論述，將二者的特質呈現出來。首先，林中梅花如隱士，而庭中梅花如貴人；又林中梅花多野氣無塵氣，而庭中梅花無野氣也無塵氣。不管是隱士也好、貴人也好，此梅花的共同點，是都無塵氣，這也表示無塵氣是所有梅花的共同特點。而所謂無塵氣，即是與凡塵俗世有別的特質，即是一種出塵遺世獨立的風格，這樣的特質與風格，呈現出來的正是梅花如隱者、如貴人、如高人的意象。所以本詩的隱者意象呈現，是首兩句與三四句，兩兩相組，表達相同的意念，是屬於并置式對句相組的順接組合方式。<sup>40</sup>

梅花的疏雅高潔與隱者意象，都具有人格化的精神意蘊，這都在林和靖詠梅後漸漸形成，使梅花的精神內涵更加飽滿，並得到後人的認同與運用，這都是林和靖詠梅所造成的影響。

<sup>37</sup>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9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

<sup>38</sup> 巢父，傳說為唐堯時隱士，在樹上築巢而居，時人號曰巢父。堯以天下讓之，不受，又讓許由，亦不受。見（晉）皇甫謐：《高士傳》，頁11~14，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新一版，叢書集成初編本。

<sup>39</sup> 楊萬里：《誠齋集》，頁11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四部叢刊本。

<sup>40</sup> 就并置式對句相組的順接組合方式而言，如本詩「林中梅花如隱士，只多野氣無塵氣。」二句，第一與第二句要表現的是同一內容，即是隱士般的特質，這特質在二句的描述中完整的呈現出來，即是并置式對句相組的順接組合方式。這與并置式對句相組的逆接組合方式，以相對的內容（一正一反）呈現是不一樣的。

## 四、結論

林和靖的詠梅詩，今日可見者雖然只有八首，但對後代卻有很深的影響，他的名字、詩歌，常被引用或化用，成為梅花典故的一種，在宋代之後人人知曉，當詩人歌詠梅花時，常取此典故入詩，以表現個人的情志；另一方面，林和靖是一位隱者，不慕榮利，怡然自得，與梅花獨自開落於山林間，都給人遺世獨立之感，具有疏雅高潔的品格意象，所以後代詩人也常以此表達自身的志節。就梅花的形象而言，在林和靖的筆下著重梅枝、梅影的描繪，有著橫斜、疏影、橫枝、斜入、一枝等形象，使人們對於梅花的審美視角，由梅花花色、花香的關注，擴大到梅枝、梅影，不但突顯出梅花整體的美感，也展現梅枝崢嶸獨立的形象，與梅影扶疏的情態，將梅花冷峭勁直的內涵呈現出來。就詠梅的意象疊加而言，即是水、月、梅的共同渲染烘托，林和靖將梅花置於月下水旁，皎潔明月與淨白的梅花相映，此純靜澄澈的白互相映照下，使梅花有雅靜高潔之感，就如《應用色彩學》對於白的色彩意象，有如下的陳述：「白色具有光明、純潔的意象，代表著善良和正義。」<sup>①</sup>可知梅、月烘托造就梅花高潔的意象；如果再將梅花靜潔的白與冷峭的枝條共同映於水面，水、月、梅所成就的景致，就使梅花有了疏雅高潔的意象呈現。

林和靖詠梅詩的影響，不管是梅花典故的運用，或梅花審美視角的開拓，或梅花疏雅高潔與隱者的意象內涵，都使得梅花在外在形似上的描繪，與內在神似的精神意蘊追求，達到進一步的發掘。梅花能成為宋代常被歌詠的花卉之一，林和靖對於梅花特質的開創，扮演著關鍵角色。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1. 皮日休：《皮子文藪》，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7月。
2. 范成大：《石湖梅譜》，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

<sup>①</sup> 李銘龍：《應用色彩學》，頁32，台北：藝風堂出版社，1995年5月。



3. 胡祥翰編：《西湖志纂》，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中國名山勝蹟志叢刊。
4. 《古今圖書集成》，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
5.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5月。
6. (明)田汝成輯：《西湖遊覽志餘》，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6月。
7.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
8. (晉)皇甫謐：《高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一版，叢書集成初編本。
9. 張堃選注：《王冕詩集》，台北，華正書局，1987年7月。
10. 楊萬里：《誠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四部叢刊本。
11. (清)施士洁：《後蘇龔合集》，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3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
12. 吳曉：《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台北，書林出版社，1995年3月。
13. 李銘龍：《應用色彩學》，台北，藝風堂出版社，1995年5月。
14. 陳香編：《梅詩九百首》，台北，國家出版社，1995年10月。
15.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16. 《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二版二刷。
17. 何小顏：《花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 二、論文

1. 歐純純：〈陸游與楊萬里詠梅詩比較研究〉，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2. 程杰：〈梅與水月一個詠梅模式的發展〉，《江蘇社會科學》，4期，2000年。
3. 程杰：〈林逋詠梅在梅花審美認識史上的意義〉，《學術研究》，7期，2001年。

The yong-mei poetry of Lin, he jing have influenced  
the ideological spirit of plum blossoms for later period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Chun-chun Ou

ABSTRACT

Lin, he jing, a recluse poet of early Bei Song Dynasty, wrote eight plum poems in his life to praise the respectable characteristic of plum blossom.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analyzed in three parts: First, Lin, he jing, the name and his poems have become a relevant image that typifies the totality of the beauty of plum blossoms, demonstrated a symbol of aesthetic metaphor for future generations. Secondly, in his poems, Lin, he jing focused more on the embodied illustrations the details of the branches and the shadows of plum tree from the poetic viewpoints of, for example, "under the moon," "beside the water," and so forth. He has extended and enriched the aesthetic capacity by overlapping the layers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agines. Thirdly, as a recluse poet, he has expressed in himself a live model of plum, the noble plant as well as a noble personality, with integrity, insight imagination and un-negotiabl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These three metaphorical patterns also can be applied in viewing the beauty of plum praising poems ever since, and have influenced the ideological spirit of plum blossoms for later period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Key words : Lin bu, Lin he jing, Yong-mei poetry, Plum

# 生死關懷與生命美典的書寫

## ——以方苞傳、祭文、哀辭、墓表、墓誌銘為視域

林淑貞\*

### 【提要】

本文旨在透過方苞所敘寫的傳、祭文、哀辭、墓表、墓誌銘等文體來考察中國人對生死關懷與生命美典的書寫。進行理序：一、先論方苞攸關生命文體之書寫，分析各式生死文體之形式義蘊，再指出人物書寫類別及其觀察視域；二、論述方苞生命美典書寫的內容，先從生命關懷分析人物型範，再從生平際遇分析書寫對象之遭逢；三、釐定方苞書寫生命典範之意義與價值；四、重估方苞書寫生命美典之策略。

**關鍵詞：**方苞 生死關懷 生命美典 文體 墓誌銘 哀辭 祭文 傳記

---

\*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一、緒論

生，不可選擇；死，無可逃避，在天宇地宙中，生死命限，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什麼樣的人世作為，可為型範？什麼樣的生命風姿，可為生命美典？而什麼樣的關懷，可令生者動容，死者安頓？生命的長度不可更變與選擇，生命的型範，卻可以透過人世的修為，永垂不朽，在一世之中，百齡之內，寓寄逆旅，倏如白駒，榮枯既不可強求，戚戚一生所為何來？汲汲一世，豈能不畏憂思勞役？而熙來攘往的生靈中，每一個存在的生命皆是獨特而殊相的，不僅面目迥異，連生命氣質、道德理想、體貌行為皆各自不同。在勞勞一生中，人，既不可避免客觀環境的僵蹇碰撞，亦不能脫逃於生存的命限，富貴榮祿既不可期、不可求，則什麼樣的生命歷程，可作為人世典範？什麼樣的生命美典，可輝映千古？

中國攸關生死書寫的文體當中，在劉勰《文心雕龍》中即有銘箴、誄碑、哀弔之撰著，吳訥《文章辨體》及徐師曾《文體明辨》亦有傳、哀辭、墓誌銘、行狀、誄、墓碣文文體之辨析，可見，論述各種文體的典籍中，未曾捨棄生死書寫此類文體。而在各種選文或總集中，亦未忽略這些文類之遴選。例如姚鼐《古文辭類纂》共有十三類七十四卷，其中相關者有傳狀類（三十七至三十八卷）二卷，碑誌類（三十九卷至五十卷）七卷，哀祭類（七十二卷至七十四卷）三卷，三類合計有十二卷之多，約佔六分之一的比重；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凡十一類，有哀祭（卷十六）一卷，傳誌（卷十七至二十一，含銘、碑、傳、墓表、事略等文類）五卷，二書皆備列這些文體選文，由是可知，各種攸關生命書寫的文類一直被關注著，雖然內容體例容有轉移變更，但是，其重要性未曾自中國的文類中消歇殆盡。

一般而言，攸關生命書寫的文類中，依自述與他述來分，大抵可劃分為兩系，一是自己寫自己的自敘、自傳、自祭、自狀文等；一是書寫他人之傳、祭、哀辭、墓表、墓誌銘、碑、行狀、事略、誄、弔文等，前者一定為生前所記所寫，後者雖有生前之書寫，然多為死後追記死者生前事蹟所寫。自己書寫自己生命歷程，多為表述自己理想抱負，或耿介不阿之性情，或銘記刻骨難忘之事，或書寫自己如何體悟生命，如何看待生死事大，

是一種向死亡探尋生命意義之書寫。而書寫他人之生死文體，除多為親朋故舊追思死者所寫，或有懿德足式，或事略足為後世楷模者，皆擲筆為文，以記豐功偉業或奇言異行。基於此，一般被視為為死者歌功頌德的傳、哀辭、墓誌銘、墓表、祭文此類生命書寫的文類，究竟可否觀察出中國人對於生命美典的歌頌？本文擬從桐城派開山祖方苞的著述入手，主要是因為方苞以義法揭示後學，使桐城流衍清代成為一代文派，同時又為清代程朱學說的承繼者，無論從文章義法或內容義理觀察，皆具有代表性，故以方苞書寫的傳、哀辭、墓誌銘、墓表、祭文來觀察，冀能窺視中國人對於生死文體的應用及生死關懷、生命美典的書寫。

方苞字靈臯，晚年自號望溪，安慶桐城人，生於康熙七年（1668），卒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十二歲。三十九歲會試中進士第四名，揭榜後聞母病，未預殿試而歸，四十四歲因作序戴名世《南山集》而羈刑部十五個月，判死刑，幸李光地力救，康熙以「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赦免。仕宦三十年，歷康、雍、乾三朝，任職文學侍從、武英殿修書總裁、翰林院侍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七十五歲還鄉。方苞以古文義法揭示後學，成桐城文派之初祖，自言「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據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二所云，其為古文，取法韓愈，謹嚴簡潔，氣韻深厚，力尚質素，以經學義理為根柢，尤以「言必有物，言必有序」為圭臬，世推為古文巨擘，為後世所宗，洵為知言。方苞精通三禮，《桐城文學著述考》卷一列有《周官集注》十二卷、《周官辨》一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疑》四卷、《喪禮或問》一卷、《儀禮析疑》十七卷、《春秋通論》四卷、《望溪文集》十八卷等，著作宏富，尤以經學類為多。惜後世關注者，多集中論其古文義法及其與桐城之關涉。

本文考察方苞全集中的生命書寫，以文集為主，其中包括《方望溪全集》十八卷、《望溪集外文》十卷、《望溪集外文補遺》二卷，凡三十卷，茲將各卷臚列於〈附錄二〉。在此三十卷當中，有關生死書寫之墓表、祭文、哀辭、墓誌銘、紀事等作品，幾乎有十四卷之多，比率約二分之一，可謂佔量豐富<sup>①</sup>，本文擬循著此類文章逆尋方苞對生命美典的觀察<sup>②</sup>，茲

<sup>①</sup> 本文所使用版本為《方苞集》（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在下列的卷數中，攸關「紀事」一類，或有以「事件」為主，或有以記「人物」遭逢事件為主，二者迥不相侔，僅以與人物有關之事略為論述；又，各卷中，有與其他文類合卷者，例如《方苞集集外文》卷八列有論一首、送序三首、傳一首、記一首、家訓三首、

將論述的卷數與內容臚列如下：

### 〈附錄一〉方苞攸關生命美典書寫之卷數對照表

方苞文集	卷八	傳 15 首
	卷九	紀事
	卷十	墓誌銘 30 首
	卷十一	墓誌銘 20 首
	卷十二	墓表 24 首
	卷十三	墓表 20 首，碑碣 9 首
	卷十六	哀辭 12 首，祭文 8 首
	卷十七	家傳誌表哀辭 15 首
方苞集·集外文	卷六	紀事
	卷七	墓表 4 首，墓誌銘 14 首
	卷八	傳 1
	卷九	哀辭 2 首，祭文 3 首，
集外文補遺	卷一	墓誌銘 4 首，墓表 2 首，哀詞 1 首
集外文補遺	卷一	墓誌銘 4 首，墓表 2 首，哀詞 1 首

以上不同文體計有：碑、傳、哀辭、家傳、誌銘、墓表、墓誌銘、祭文、紀事等，除上述諸類文體之外，尚有行狀、墓碑文、墓碣文、誄、弔文之類未備於方苞文中，故不贅述。③

## 二、方苞攸關生命文體之書寫

### （一）各式生死文體之形式義蘊

雜文三首等，凡十二篇，而「傳」僅有〈康烈女傳〉一首，亦臚列其中，可見一卷之中列有諸種文體，故卷數之統計、比率之分析僅為大體估計，非確實之篇數計量。

② 至於其論述禮法、家規，或與生命有關者，例如在〈家訓〉中「制男女之防」、「以禽獸為防」、「凡來婦者，父母歿，則不得歸寧」，或在〈祠禁〉中指出子孫居喪須守古禮，夫婦僅能白日相見，違者鞭撻，此皆其為禮而設防，然本文所論以「生死關懷」、「生命美典」為論述中心，暫時割捨不論，而以上列各類文體為主。

③ 請參見〈附錄二〉方苞全集卷數對照表

方苞文集中攸關生命書寫的文體有碑、傳、哀辭、家傳、誌銘、墓表、墓誌銘、祭文、紀事等等，由於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體例要求，我們根據劉勰《文心雕龍》、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來考察不同文體間的書寫功能與作用性質。

文體不同有如上述，而方苞集中亦針對不同的對象而有不同的書寫內容，以下分析之。

## 1. 傳

據徐師曾《文體明辨》所云，「傳」之書寫內容，或記山林里巷或記隱德弗彰者，或事微而可垂戒後世者，皆為書寫對象。從形式意義來討論，「傳」可分為「有贊」與「無贊」二類，「有贊」者，例如〈孫徵君傳〉，無「贊」者，例如〈白雲先生傳〉、〈左仁傳〉、〈三山林湛傳〉等。從傳主之多寡，又可分為合傳、獨傳及附傳三種，在方苞的書寫當中，「合傳」有〈四君子傳〉寫王源、劉齊、張自超、劉捷等四人，〈二山人傳〉則寫李鏞、石永寧二人，獨傳有〈孫積生傳〉、〈光節婦傳〉等。

從傳主之類型來畫分，大抵可簡分為四類，一是名士奇人，二是達官顯宦，三是節婦烈女，四是方外之士。例如記載名士奇人之奇行偉蹟者，有〈孫徵君傳〉敘寫孫奇逢的性情，是位「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方苞加強記述者，以孫奇逢有經世之略，其質行後學有記，故僅記其學問、性情及出處進退之態度。又如〈白雲先生傳〉記張怡才學博，獨身寄攝山僧舍，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之耿介性情。方苞為節烈婦女所寫之傳記亦多，例如〈金陵近二支二節婦傳〉、〈廬江宋氏二貞婦傳〉、〈光節婦傳〉、〈二貞婦傳〉等。至於記方外人士者有〈蘭穀傳〉、〈沛天上人傳〉等，由於名士奇人或有人書其論學之書，故方苞刻意與之區隔，以其行為卓犖不凡者方書寫之。

綜言之，傳，以人物傳記表述方式為主，凡具有忠孝才德者，或事跡雖微，而可為法戒者，或平居山林里巷者，或有隱德而弗彰者，或有細人而可法者，皆為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至於傳主之書寫以合傳、獨傳或以附傳方式呈現，不拘一式。④

④ 根據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中針對「傳狀類」指出：「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

## 2. 紀事

「紀事」類，一般可區分為兩類，一是以記某一事件為主，例如有〈記開海口始末〉文，二是以某一人物所發生之事為主，例如有〈左忠毅公逸事〉、〈高陽孫文正公逸事〉、〈石齋黃公逸事〉等，此處所論，自是以人物為主述之「紀事」為主，方苞所記，又可分為四類：一是名士，例如〈記李默齋實行〉、〈石齋黃公逸事〉等；二是節烈之婦女，例如〈書萬烈婦某氏事〉、〈西鄰愍烈女〉等；三是市井無名氏，例如〈逆旅小子〉；四是公卿名宦奇士，例如〈湯司空逸事〉、〈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記徐司空逸事〉等；其中所側重的摹寫內容，在於以「事」來紀「人」，內容或記其特殊際遇，或記其卓犖功績，或紀其罷官始末，或紀其德政者，甚或有方苞自抒遭逢感言者，例如〈敘交〉、〈獄中雜記〉、〈結感錄〉等篇，因方苞曾牽連《南山集》一案，得以洞識人情冷暖，凡此盡抒於內。

## 3. 墓誌銘

「墓誌銘」，前後凡有六十八篇，是方苞各種文體中書寫最多者<sup>⑤</sup>，墓誌銘的書寫功能在於敘寫人物之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卒葬年月，與其子孫大略，埋於墓穴中，作為山河遷變辨識之用。方苞文集中，大抵墓誌銘多為他人託寫之作，自發性地敘寫較少，且所述大抵皆依體例書寫，採「先文後銘」的方式呈現，先述其世系、事略，再述其親族子孫及葬期，末則附寫「銘」，以韻文總紀其生平梗概。至於書寫的人物上自名士、名臣，下至市井男女，或為名宦親族，或為鄰里故舊，或為友朋姻親，皆為書寫的對象，範圍較廣。

## 4. 墓表

「墓表」，凡五十二篇，無論有無官職，皆可紀錄書寫，體例同於碑碣，是屬於一種鐫刻在墓碑上的文體，與「墓碣」略有不同，「墓碣」是專寫五品以下之官員，至於有銘或無銘皆可。敘寫內容亦是記錄其籍貫、

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由是可知，「史傳」原為達官名人立傳，迄韓、柳以圻者、種樹者為傳，使「史傳」走向「平民化」，迄清朝，在對象上又有特定，一是記載有品位者的行誼，一是記載實錄者，至於能否記載，則以「生平賢否」為判，實際上，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無論是書寫對象或內容，已逐漸趨向平易化、簡易化，而未必以「賢否」為判。

⑤ 究其因，方苞素負重望與文名，時人託寫，以要重於世。



世系、事略、末紀其子孫、旁支、卒葬時、地等。觀察方苞所記人物，多為名士、名宦兼及命婦孺人等。姚鼐《古文辭類纂》中的「碑誌類」，指出：「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指出「誌」，可立墓表上或埋於墓穴中，「銘」之用法與之相同，後世分之，姚氏以為失義之舉，然後世皆以此為用。

## 5. 哀辭

「哀辭」，凡三十篇，用以寓寄傷悼之情，長短不拘，以傷有德不壽，或幼未成德而敏惠可譽者。方苞書寫體例採「前文後辭」方式為之，「前文」多為散體，「後辭」多為韻體，楚（騷）體亦有之，大抵皆表述一份追思感念之情，所寫對象多為親朋故舊，遂記下惓惓難遣之感懷。

## 6. 祭文

「祭文」，祭奠親友之辭，寓哀傷之情，文體則散、韻、駢儷、楚體、雜言體皆可。姚鼐《古文辭類纂》卷七十二以下為「哀祭類」，指出最早書寫在《詩經》之中，其云：「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sup>⑥</sup>楚人之辭指屈原之作，並推崇後世惟有韓愈、王安石之創作能繼《詩經》有成。方苞所敘寫之祭文大抵以「四言韻文」呈現，表現出整飭簡潔之筆力。

根據上述方苞所採用生死書寫的文體，再參照吳訥《文章辨體》及徐師曾《文體明辨》二書所釐析的各種生命書寫文體，成〈附錄三〉，附於文末，可資參考。

### （二）人物書寫類別及其觀察視域

根據上文所述，我們可歸納方苞人物書寫的類別及其觀察人物的觀點。

#### 1. 依書寫對象是否相識，分為識者與不識者二類

與方苞有交接往來之生平故交者或因緣偶識者，多為親人子孫託寫，以記其生平事略或嘉言懿行者。例如：〈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黃公墓誌錄〉開宗明義即云：「右副都禦史黃公既歿之逾年，其子廷桂因李枚

<sup>⑥</sup> 姚鼐《古文辭類纂》（臺北：世界書局，無出版資料）

臣來請銘」、〈王大來墓誌銘〉乃王蒼平為其季弟王大來請誌生平。亦有與方苞未識或同為鄉里之人，聽聞其事蹟，例如〈西鄰愍烈女〉、〈書萬烈婦某氏事〉等，或感其生平事故，自發性的為文書寫，以為感念存記。例如〈逆旅小子〉描寫卑微生命，因兄長不悌，致寒冬號寒而身故之事。然而，所記仍以舊識為多。

2. 依書寫對象是否有職官，分為官員職司、命婦、孺人或親族女子、庶民皂隸二類

墓誌銘、傳、紀事、哀辭、祭文所寫的對象二類皆有之，例如〈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銘〉、〈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為有職司者或命婦所寫，而〈鮑氏姐哀辭〉、〈鮑氏妹哀辭〉、〈亡妻蔡氏哀辭〉等則寫親族而無封誥者。

3. 依書寫對象之性別，分為男性與女性二類

男性以記名士、名宦、親朋故舊為多。例如〈萬季野墓表〉、〈兵部尚書法公墓表〉、〈舒子展哀辭〉等。女性書寫對象，或因父蔭或因夫、子貴盛而得以銘記事略，亦有市井小民、婢、嫠等，因事蹟節烈或事誼感人，方苞特別書之，以為後世楷模者。例如〈彭夫人文〉、〈康烈女傳〉等。

4. 依書寫對象之特質，分為道德成就、事功成就、學術成就三類

所謂的道德成就，是以德行足為範式者，例如勤奮向上之野夫，或兄弟恭、仗義疏財之名士，或重名節、輕死生之持苦守節或以身殉節之節烈貞女等。或耿介不阿，守恆如故之有司。例如〈四君子傳〉、〈左仁傳〉、〈白雲先生傳〉等。所謂的事功成就者，或指仁民愛物之官員，或以身殉國者，或有功業於親族者，凡有建樹者皆屬之。例如〈兵部尚書範公墓表〉、〈余處士墓表〉等。所謂的學術成就者，是以學術生命為主，努力著書，卻又無所求於功名利祿者。例如〈田間先生墓表〉、〈王處士墓表〉等。

綜合言之，方苞書寫人物的時間跨度，橫亘明末清初、鼎革之際、亂世中的人物事蹟，以及雍乾太平之世人物型範皆為其書寫的對象。例如〈明故兵部侍郎中劉公墓誌銘〉、〈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等皆是。

考察方苞所書寫的對象，是以「追記」方式留存人物鮮活感人的事蹟

⑦。所謂「追記」書寫的素材來源有二，一是根據書寫人物之親友故舊所

⑦ 所謂「追記」是指時間點的後設。無論是方苞親自交接往來的傳主，或由傳主親人口述再寫出的作品，皆是時

提攝、存記之事蹟予以文字記錄，一是根據方苞親自交接往來，回思往事所記下來的事蹟。無論是透過親友轉述事蹟，或是方苞親自交接往來，其中所面臨的即是，事實與書寫之間是否有出入，亦即書寫時，可能採擷部份或是片段式的影像留存，此中即涉及歷史的、事實的真實性，文學之真，未必是事實之真，但是與生命交感的真誠性，即是文學所要發揮之處。方苞的書寫策略，即是透過文字的敘寫，為這些奇人異行、達官顯要、節烈貞婦、為民勞生的人物找到可供存記、憑弔的事蹟，使這些人物能因書寫而流傳後世，其意義性，一則是為銘記對象的家族留存真誠交感的生命歷程，一是敘寫生命美典，作為留傳後世的型範。縱使是受託而寫的墓誌銘，或是哀辭、墓表等，意在表彰事蹟美典，容或有諛辭出現，但是，方苞在書寫時，即是一種策略之運用，因文字可以千秋不朽，即在其流傳性程度越時空限定。

同時，我們從方苞敘述的話語來考察，可以知道，以第二、三人稱的視域來寫傳主，較能從容地、避開矯情的表述，使閱者如面對一則形象鮮明的動畫，一一為我們展示生命美典的歷程，我們亦可在字裡行間，體契每一個生命美典及方苞的生死關懷。然而書寫的過程也必定經由作者揀擇可用素材加以組構而成，是故《自傳契約》中談到敘述話語時指出：「在揭露事實的同時也在掩蓋事實，使事實具有一種禁忌的詩意」（頁 75）意即敘述時，作者會選擇性地挑選材料作為敘述的素材。職是之故，我們閱讀方苞所書寫的人物事蹟，是經過方苞主觀判定後所呈現出來的內容，與真正的事實是否相孚？我們既無法有效驗證，也無須去驗證，文本（text）呈現的樣貌，即是作者刻意留存的部份。方苞曾云：「君之行既無所徵信，而詩易無成書，故屢請而未之諾也。……乃略道其祈嚮及事之眾著於鄉而無所容其偽者，俾礪於阡，以示言之不可苟焉。」（〈黃耕山墓表〉）即能深刻反省書寫人物之徵實及其可信度。

統言之，方苞書寫的人物，從人文空間的跨度觀之，士庶階層、方內方外人物，皆一一含納其中；人物的典範，不僅限於官員職司者，尚有市井小民，或有奇言異行足為典範者，皆一一收攝其中。我們由方苞所書寫的內容來體察方苞觀察人物的視點，以知其所建構的生命美典為何？

---

間點的「先在」，而敘寫傳、祭、哀、墓誌等的時間點皆在其後。

### 三、方苞生命美典書寫內容

#### (一) 從生命關懷分析人物型範

死亡，可分為三類：一、腦死，二、心死，三、當記憶和認知程式的實體受傷到不可恢復程度時，即可宣佈死亡來臨。（《理論生死學》頁 19）此一定義落實在生命現象的表述。既然生命是一種認知程式，那麼，什麼樣的生命表現，是方苞所關注的？什麼樣的生命美典是方苞提攝表揚的？人世一生，必在時空中游走、挪移、變動並且成長、遭遇串聯成生命的歷程，每一個獨特的生命，皆有其殊異的生命遭逢與歷程，我們根據方苞關懷的人物，由近而遠、由小而大，畫分為數類進行論述。

#### 1. 表彰德行皆美之個人生命典範

每一個獨特的生命，最關懷的或生活的重心即是自己的生命之意義與生存之問題。在方苞書寫的人物類型中有節婦烈女或頗有氣節者，或有昂然挺立生命風姿者，凡此皆歸屬本類。例如〈書萬烈婦某氏〉，寫某氏為江東巨室婢，早寡守貞二十年，會其主人犯罪當與妻子謫戍，其妻求某氏以身代戍，某氏允之，但自充解後，與男主人陸行必異車，水行必異舟，逆旅必異室，其主人戲言何不同寢相處，烈婦察其主人心意不悛，越日，夜中自經死。是為守主婢之名份，而守節自經，面對此一烈婦，方苞乃稱讚其：「中道潔身，泥而不滓」。（頁 243）又如〈西鄰愍烈女〉寫某婢之主母與人私通，烈女數切諫，後謀並汙之，以死拒，乃杙抉而死，投置東鄰宅後方塘中，後疑獄明查，乃申其冤。又如〈王大來墓誌銘〉寫王某以明道美其身，質行雖美，而無所藉以成，方苞亦書之。又如〈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寫蔡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飢，敝衣粗食，視窶人或甚焉。或如〈禮部尚書贈太子傅楊公墓誌銘〉寫楊公生平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又如〈杜蒼略先生墓誌銘〉寫杜芥，方壯喪妻不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裏巷間，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偶然過戚友之間，見坐上有盛衣冠者，即默默離去，不攀附、不賁緣。

以上所示現的美典有二，一是面對生命苦難所示現的生命韌性，二豁

顯出質行皆美的品格，凡人在面對苦難時，對治的方式有數：一是悲苦無奈、無力抗拒，摧陷在悲情中；二是昂然面對，順應逆境，挺身而出。三是重新創造積極的生命處境，脫困而出。我們看到上面數個典型，寧以生命換取節義之名，或是盡忠告而善導的職責，或是充份表現盈滿豐美的德性以抗拒生命中的困頓偃蹇，凡此，皆是一己生命挺立風姿的典範。

## 2. 扶姑舅、恤族人以延續家族生命之典範

在個人偃頓時，或許尚能以一己之力成就生存的憑藉，但是，如果要堅持為他人而活，或為整個家族而奮鬥，其生命的韌性，恐非常人能承負者，但是，在方苞的書寫當中，旌揚了許多為家庭、家族養家活口的嫠婦，其生命遭逢人世最不堪的際遇，但是，卻能憑一己之力，脫困而出，使得家庭或家族得以延續命脈，設非有堅忍卓絕之毅力，恐難成之。例如〈呂九儀妻夏氏〉寫夏氏之夫死於仇，夏氏將死之，然堂有舅姑，室有二子，父母篤老而無兄弟，則其死，雖當於義而傷於恩，遂自持門戶，撫姑育子，使家族能免於難。又如〈謝母王孺人墓誌銘〉寫王孺人守寡三十六年，與三子一女在家道中落窶艱憂懼中存活，又積軫鬱，成痼疾二十餘年不瘳，自少而壯而老，未有一日之恬安，而不以恟愁自苦。又如〈金陵近支二節婦傳〉寫王氏年十九歸方氏，夫亡數月，孤子載育，教督甚厲；寫鄧氏年二十四始嫁，夫死撫幼，窶艱而存。〈二貞婦傳〉寫任氏年十七歸符氏，夫踰年而死，姑楊氏，亦孀，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而夫之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為之母，為之師，凡二十年。〈高節婦傳〉寫段氏夫死時方十七歲，有二子，貧無所依，售嫁時物，作板屋於中衢僦居，撫二子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後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為小吏，以罪謫遠左，段氏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段氏年已九十。凡此皆為節婦撫孤之例。又如〈劉古塘墓誌銘〉寫劉氏早喪母，家貧，母家給田數十畝，少長，覓食自活，以田歸庶弟，既為諸生，得時譽，學使者、大府常以重幣延，歲時歸家，解裝，遇親交，隨手盡，俄而乏絕，飢不餐，晏如。此類皆寫孝親、撫孤、友悌楷模之典範。

至於疏財仗義，延續家族生命以撫恤族人為主者，其例亦多。〈白玫玉墓誌銘〉寫白玫玉五世不離居異財，玫玉終世客遊，齋裝皆盡之族姻朋友。〈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寫魏方泰襁褓失母，終身哀慕，序譜牒，建

宗祠，置祭田，恤族屬孤貧，延及朋友，鄉人式之。〈潘函三墓誌銘〉寫潘蘊洪近歲窘空，數典衣，道逢廢疾窶人，即使持去。嘗遊江西，鄰舟覆，挈其夫婦子女，行千里而致其家。授經齊、魯間，積百金將歸，會大祲，死者相望，惻然出傭力瘞埋，罄其裝。此皆以己力擴及族人或廢疾窶人。

### 3. 救民倒懸以成就社會生命之典範

例如〈巡撫福建都察右副都禦史黃公墓誌銘〉寫杭湖二州連饑，民心搖搖，黃公勸富民分災而禁貧民之群聚要索者，其後又逢海賊鄭盡心聚黨出沒，公刻日獨進，懸賞格得其魁者千金，抵廈門，厲氣巡軍，鄭盡心為黨密捕。凡此皆為國為民之舉。又如〈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寫其議論慷慨，自為諸生，即以民物為己任，及從清恪公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眾服而莫知其自公。又如〈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誌銘〉寫張鎬居廣州三年，士民日致薪米果蔬用物，不可抑止，及卒，無親屬在側，時大府已更，群吏憫傷，共棺斂。士民驚呼，群聚而哭之。張君廉潔自守，家故窮空，其子聞喪，久不能奔，自大府群吏及士民鹹出力以禦君柩歸其鄉，而以賻之餘屬守土吏買田以給其妻子。為生民請命者尚有〈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曾調江蘇糧道，弊絕民喜，會淮揚水災，制軍、撫軍於要地多委其拯濟，遷江蘇按察使，明允無留獄。富商大豪姦私暴露，欲巧法彌縫，李公復移調，不數月而歿。〈莊復齋墓誌銘〉則寫其急民之病，勤事以死，而無負於君，生不作於人，死不愧於天的典範。

以上諸例因社會位階之殊異，而有不同的風範表現，然皆以生民為念之型範。

### 4. 開啓學術生命以傳承歷史慧命之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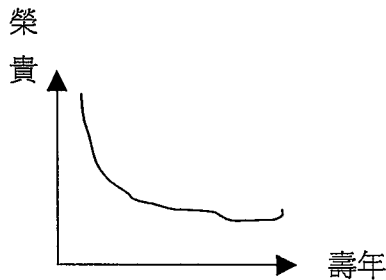
方苞亦精撰刻鏤對學術之堅貞執著，或秉持傳承歷史命脈為己任者之書寫，搦筆和墨，為我們寫下鮮活的典型，例如〈王生墓誌銘〉寫王兆符慮母老病，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矻矻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瘵傷，一發而不可救葯。又如〈沈編修墓誌銘〉寫沈立夫少好柳文，及識方苞粗見古人義法，又聞〈周官〉之說，而知其可後者，奉母以歸，畢餘力於斯。〈光祿卿呂公墓誌銘〉寫其讀書青要山凡數十年，所居特室，臨窗設幾，坐下二足跡深寸許，幾穿其磚。〈教授胡君墓誌銘〉寫其口未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奧曠，眾人所難明者，能記辯之。〈李剛主墓

誌銘〉記李璩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為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方苞一言而幡然改轍。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為學者典範。

## （二）從生平際遇分析方苞書寫對象之遭逢

從上述方苞關懷、書寫的對象觀之，人世之偃蹇，固所難逃，而生平之際遇有起有落，反而能豁顯昂揚的生命風姿。生平際遇，無論是個性使然，或是外在環境遷變，我們根據方苞書寫傳主歷經之人世遇合起伏跌宕，可概述為下列數種類型。其中，所用之「升」或「降」是指：一、指仕宦之途之變化，或先升後降，或先降後升等類型；二、指經濟景況之變化，指先富後貧或先貧後富等變化。縱軸指仕宦或經濟之貴賤、富貧，橫軸指向量時間之流移。

第一類型：先升後降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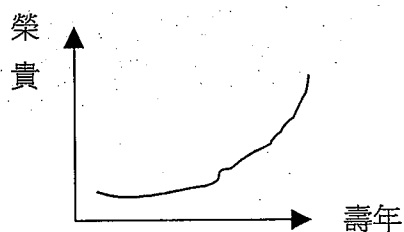


在此類型中有先榮貴，後回歸平凡者，例如〈白雲先生傳〉寫張怡以諸生授錦衣衛，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不屈，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不知山中有是人，即是由榮貴而自甘歸隱山中。或如〈四君子傳〉中的劉齊名重太學，然與友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躡而不悔，雖無爵位，然而學行可祀於鄉之典型。或如孫奇逢曾為孫承宗幕府，密上書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魏忠賢大懼，泣禦床，阻承宗於中途。後又固辭國子祭酒徵，率子弟躬耕夏峰。又如〈潘涵三墓誌銘〉中所敘寫的潘涵三先富後貧，在貧困典衣渡日之時，凡遇廢疾窶人，亦以助人為先，不自思貧苦。或如〈二山人傳〉中的石永寧，己雖貧，益救族人。或如〈余石民哀辭〉敘寫余石民受學載名世，因《南山集》牽連入獄，破家遘疾死獄中，卒前數日猶購宋儒之書，危坐尋覽，顛

危之際，不以功利為離合，垂死務學不怠，能絕偷苟，不以嗜欲為安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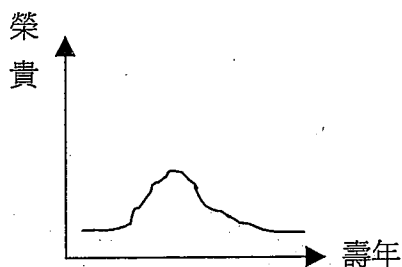
這些典範，一、從經濟家世而言，是指原先家世甚佳，後來每況愈下，終至家道中落，究其原因，其一是敘述的主人翁的氣質使然，不善經營，或不事生產。其二是家遭變故，或國家遭逢隍隴變局，致使家道中落。其三是主人翁仗義疏財的特質，散盡千金，濟貧扶弱使然。二、從仕宦遇合而言，先榮貴，後自甘隱淪或貶謫左遷，其面對態度，儼然又可呈現兩種類型，一是怡然自持；一是一蹶不振，或是汲汲營營於瑣碎小事。而方苞所書寫的對象，自然不會是一蹶不振者，或是追逐蠅頭小利者，其所敘寫的對象，自有一番傲骨，能在人世逆流中，展現生命風姿者。例如上述之張怡、劉齊、孫奇逢，皆歷經先榮貴後平凡的歲月，但是卻能怡然自適。此中遭逢雖有昇降，然，方苞並不以榮枯為高標，反而重視其輕榮富、重節義之一面，故對於這些特殊風範者多所刻摹。

### 第二類型：先降後升型



本類型者，家道由衰而盛，所緣借的力量是主人翁自己努力爭取而得，若是貞節婦女則多因夫、子、孫貴盛，或獲取功名而能聲名聞達於世，逆轉家道，使能有成。例如〈金陵近支二節婦傳〉中的王氏，年十九歸於方氏，夫亡數月，其子方生，撫孤成進士，官戶部主事，一生辛勞得償。又如〈高節婦傳〉寫段氏夫死時年僅十七，無宗親相助，撫二子以成，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為小吏，入罪謫遷遼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其孫發憤成進士，贖父以歸，方得安享榮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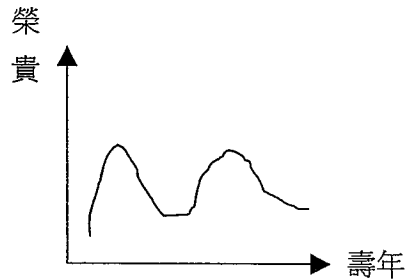
### 第三類型：起伏跌宕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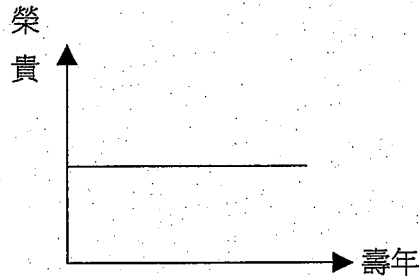
本類型是由衰而盛再由盛而衰，所示現的是人世際遇之波折，然而不論所遇是平順或是偃蹇，皆須有面對的勇氣。例如〈四君子傳〉敘張自超困舉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慍色，近五十歲始登甲第，後不肯試為吏，又性格明決，不欲為，眾莫能奪，所欲為，雖困不以自悔，且注金活族人數百，晚歲家道中落。又如〈二山人傳〉寫李錯初買田以耕，授田貧者，曾自請屯黑河，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後移家潞，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鄰裏未得一識其面。〈舒子展哀辭〉寫其父謫戍踰年死，母窶艱阻勉，使就鄰塾，既冠成進士，入翰林，後為人所排，十餘年不舉，雖不得意，肆力於詩，風格近唐人。方苞書寫這些遭逢起伏的人物，自是有抗衡外在變局之卓異特質，足供後世景仰，在面對危困或變亂時，不喜不慍，自得自怡。

#### 第四類型：波瀾變化型



例如〈蘭穀傳〉寫顧溥畹為顧國藩之子，九歲授四書，十三歲授《易》及〈太極圖〉，尋遭疾類癩者，捨為僧，有瘳；十八歲與冒巢氏詩社。父母未歿，遊必有方，聞喪歸殯葬，即廬墓側。曾隨師侍輦下注佛經，工訖，請還山，凡十二年成《易說》二十卷。康熙六十一年冬，入賀萬壽節，聖祖登遐，乃於城東偏構精舍，貯所注易以授其徒，數年跡不出戶。〈廬江宋氏二貞婦傳〉寫李氏許字宋嗣熙，聞夫夭亡，不欲生，父母知不可奪志，許成其志，始納食飲，屏居小樓，凡十四年，逾三十歸夫家，復以從祖母撫四世七歲之孤以養嗣莢母曹氏。凡此遭遇起伏波折頻繁，經過大起大落，看待人世的方式，必異於一般人，同時，其處世的態度與心理亦應有強力的挫折忍受度，足以面對世變。

### 第五類型：平實型



此一類型無所謂隆升衰落，即是不昇不降，可分為三：一、一生不遇型，故無所謂的升降，例如〈四君子傳〉中的王源，王源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病其不習時文。以貧不得不託跡諸公間，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諸公陰擯之，一生與世參商，極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棄妻子，為汗漫遊，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二是貧困無昇榮型，例如〈金陵近支二節婦傳〉中的鄧氏獨撫孤子遵衢，而遵衢棲遲裏巷間，頗知砥名行，窶艱而志在作善。三、一生榮貴，故無昇降之跡，例如〈沛天上人傳〉為京師講經大師，冠蓋往來，即是居處榮貴與尊崇時，能處之若無事者，胸中炯然，語皆有稱量，間及民生利病，並世人物。內府有疑獄、胥吏構陷嚇眾、強吏建閘瀑河村落流漂，皆正言發之。重刻藏經，量材授事，立法程工，有條不紊，故書之。

以上所析，為方苞書寫人物之生平遭遇，雖未能概括所有的際遇類型，然不以榮貴、卑賤定其成就。

生命的品格 (character) 可區分為先天之氣質、性向及後天之習慣品格，當人在遭遇外在環境挫折時，往往會呈現其特有的生命品格，此即是人格特質，所謂的人格特質是指：「獨特、具持久性的個人內、外在特性；能夠影響個體在不同情境中的行為。」<sup>⑧</sup>，弗洛伊德曾指出人的生存環境充滿衝突與危機，人格必順著二條路向來完成妥協與調整，一是昇華，一是抑制，前者是調適自己順應新挑戰，期能與社會結構相融相攝；後者以壓抑情性的方式，自現實世界中退縮，避免挫折與碰撞，在方苞的人物書寫當中，我們體察出「昇華」作用對人格的正面提撕，闡發出人性的光輝，

<sup>⑧</sup> 請參見《人格理論》(臺北：揚智，1997)頁11。原書為Dune Schultz, Sydney Ellen Schultz著，陳正文譯。

無論個人遭逢榮富、貧賤，或是社會位階榮顯、卑下，或是年壽短長者，方苞對於有卓異的人格特質者，皆有深刻摹寫，其中包括：仗義疏財、豪邁不羈、勤奮向上、守節堅貞等人格特質特別推崇。這些特質反應在生活知能、知識知能、情感知能、甚或是交際往來之態度或是道德修養、人生的職責時皆能挺立風姿，雖然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對治方式或面對情境自有不同，然而皆能反映出獨特的生命風格。

#### 四、方苞書寫生命典範之意義與價值

所謂的生存活動是指爲了延續生存所產生的一切活動，是人類天生的本能，在此一自然本能的追求當中，往往會爲了物欲及生理欲求之滿足而產生「生物人」的自然衝突，爲了轉化此一自然衝突，遂有道德、禮法之設置，因爲有社會規範，又轉出倫理價值的觀念。由於有倫理價值的規範及社會的制約功能產生，人勢必在互動的群居生活中形成倫理觀念。而人與人之互動的倫理價值僅是超越物質需求，往上追求情感與安全的需求，在此之外，尚有精神活動與需求，解除人類生存的意義與困惑，所以精神價值的追求是存在活動中的最高標，開發出三個面向，一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價值可以作爲生命的終極關懷，二是哲學思考的精神價值，可以改善、提昇、超越現實世界的限制，提供、嚮往理想價值的觀念，三是藝術創意的精神價值，以藝術性活動提供美育的精神追求。職是之故，人不僅僅是生理物欲式地生存，尙會關涉到存在的精神思考以及美、善生活的追求與改善。<sup>9</sup>是故人類活動的基礎類型與價值類別，可以簡分爲三種類型，一、生存活動與物質價值，二是生活活動與倫理價值，三是存在活動與精神價值。<sup>10</sup>我們可從〈大學〉揭示四綱八目作爲處世圭臬，其用意即在脫離物質追求及生理欲求，往上推擴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境域，此中所揭示的是社群與倫常之互動關係；人與自己、人與家人、人與社會，乃至於人與國家天下，此一由親而疏，而近而遠的倫常關係，即在建構親疏等第之不同，而在倫理價值之中，又推展出精神理想的追企，「治、平」

<sup>9</sup> 請參見陳秉璋、陳信木合著《價值社會學》（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8）第十七章〈價值觀念的來源及其形成過程〉，頁275—287。

<sup>10</sup> 請參見陳秉璋、陳信木合著《價值社會學》（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8）第十八章〈人類活動的基礎類型及其所促成的基本價值類別與特質〉，頁289—298。

是士人終身的理想職志，揭示中國人追求的人生理想與目標，但是，外在客觀環境，未必能與之相應，縱有官職在身，亦未必能順遂心志，常有顛沛流離，席不暇暖的景況。另有一種類型則是不屑科舉之業，自行其是，飄流四方，奔走天涯；浪跡無蹤者，甚或自隱無名，以著述為業，而又不願聲名流傳於外，自甘隱淪於山野之中。或有節烈貞婦，為守節而生，或為扶持家丁而活，貧困自守，展現生命的韌性與強度。

檢視方苞對於死者之描寫，多以事略為主，但是，在面對死生之事時，方苞甚少談及生與死的觀念，對於死的態度，抱持接受而未多加闡述的立場。書寫內容以肯定書寫對象的生前嘉言懿行之事蹟為主，因為死者的生前行為，是唯一可供憑弔與追思的印記，摒除這些，只能是空泛的追思想念而已，唯有留存的事蹟才可成為具體思懷的主體，此所以碑、傳、銘、記、墓表之文側重在生前事蹟之表率，以書寫奇行異言為主，而祭文、哀辭雖以傷悼為主，但是仍須以真實的事件為導向，方能寫出刻骨銘心的感念。

方苞對生命的尊重，不僅僅是榮利富貴者託寫墓誌銘或哀辭，對於市井小民、貞夫烈婦亦表現關懷的慈憫。在位者，能堅持守恆，誠可記載；在野者，能挺立生命風姿，顧盼自雄，亦有可記之事略；至於市井街婦能守一家之堅貞，或持家活口，或正義凜然，亦不乏其人，此皆為可書寫之典範，夷考其實，方苞記載生命美典之關懷重心，可撮約為下列數端。

### （一）發潛德之幽光

方苞曾感慨忠臣義士在家國變故時，常有變節之事，然人之顯晦，以事件之大小而不可強求，方苞慨嘆有居處幽下者，其節行為人所忽，遂發而為文，以發潛德之幽光，例如〈左仁傳〉云：「因歎自古忠臣義士遭變節，載在史策不可勝數，而發揚震動於後人之耳目者，代不數人。蓋其名之顯晦，一視所遇之事大小以為差，而有不可強者焉。至於草野閭巷之人，或志與事幾於聖賢之徒，竟以居下處幽，為眾人所忽，而其跡遂泯者，蓋不可勝道也。」（《方苞集》卷八，頁 221）是故方苞所記，未必皆為豪貴宦達之士，或為街鄰小婢，或為逆旅小子，或為閭里族人，或為奇絕怪僻之人，所記以事繫於人，冀能將此不為人知之行誼留存於世。

### （二）用力人紀，盡職當為

方苞肯定士農工商各有職司，苟能用力於人紀，盡職當爲，即是學習，未必一定入庠序方稱爲學。其在〈孫積生傳〉云：「古者秀民皆聚於庠序學校，而周公復設司諫之官，巡問觀察，以辨眈庶之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漢氏之隆，孝弟力田與方正賢良相次，其風蓋依古以來。方徵君講學夏峰，自野夫牧豎，以及鄉曲俠客胥商之族，有就見者，必誘進之。良以天下無不可以學可以不學之人，而農工胥商苟能用力於人紀，而盡其職之所當爲，即是，可以謂之學也。」（卷八，頁 225）是故所記人物典型，以其義之所當爲而不辭卻者，皆書之。

### （三）旌揚危變婦人之氣節

對於富貴之人旌揚父母，或舉節孝，皆是錦上添花之事，但是對於家族危變之際，方知婦人之擔荷之重，紀衣食、持門戶、撫孤弱，卻以貧窶孤微而未能旌揚。方苞在〈金陵近支二節婦傳〉對於變危之婦人，擔負之重，曾云：「凡天之命或速或淹，而終必同軌，乃道之不變者也。……二節母無一隴之植，近支無總、小功之親，母家亦窶艱，即執德能堅而才不足以紀衣食、持門戶，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居常者不覺，遭危變然後知婦人擔荷之重如此。」（卷八，頁 227），復次，在〈二貞婦傳〉亦云：「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卷八，頁 230—231）肯定貞婦遭事自持較之士之檢身尤難。

對於冤獄而死之婦人，亦有相當憐憫之心，在〈高烈婦傳〉云：「自古婦人之義皆以死而彰，魏氏則既死而猶暗鬱。易曰：『日中見沫』又曰：『載鬼一車』聖人繫辭以爲世戒，有以也夫！」（卷八，頁 231）指出自古婦人皆因死而彰其義，然而高烈婦反因死而莫得申其冤，甚可憫焉，故特書其事。

### （四）表彰方外人士之儒行

方苞爲傳統儒士，對於方外人士偶有論及，主要以其能行儒術、利生民。例如〈釋蘭穀傳〉云：「觀其志行術業氣象，則儒衣冠者多愧矣！故傳其事以告吾儕，又以識先帝陶冶眾萬，一善不遺，作人之化，蓋及於方

外焉。」(卷八, 234) 正說明釋蘭穀之志行術業, 同於儒家作人之化, 特書其行。又如〈沛天上人傳〉云:「觀上人之篤於人紀, 不忘斯世斯民, 而才足以立事如此, 皆先聖先賢所諄復而有望於後儒者也, 而儒之徒未數數然也。……故專錄其儒行, 而推闡佛說以張其師教者, 概不著於篇, 蓋其徒某某之所譜, 具矣。」(卷八, 頁 235) 所載亦是以「儒」為標準, 反映出方苞強烈的儒家性格, 並以此尺規丈量天下人之行為標準。

### (五) 記友之義以駁正世人偏仄

〈結感錄〉記方苞於康熙辛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入獄之後, 親舊友朋之交接往來事宜, 感慨而言:「考之於經, 凡諸父諸舅, 道同而志相得者, 皆名為友; 既為友, 則有相死之義, 有復讎之禮, 況急難相先後哉!」例如與白玫玉一見如故, 與之語連日夜, 至戚某詫焉, 方苞笑曰:「假餘以急難叩門, 其坦相受者, 必白君也; 執而訴官者, 必吾子也。」諸姻戚聞之, 皆以為過言; 及方苞遭難, 戚某果避之若浼, 然後信前言之不妄。曾因《南山集》牽連入獄, 故而對於人世炎涼感慨遂深, 至於相國李光地曾為時所忌, 得謗過人, 甚有根觸, 知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 而深拒枉尺直尋之議 (〈安溪李相國逸事頁 688〉), 故方苞力為其辯。

不同位階的人, 在面對生命苦難所示現的生命韌性或對治的方式, 容或不同, 但是個人情操之堅持及堅貞弘忍之毅力, 皆是開發生命的力量與知能, Samuel Smiles 在《品格的力量》中指出, 品格是個人和民族的力量泉源, 即是正面肯定有品格者之表現張力, 我們從方苞所書寫的對象, 歸結其品格特質時, 可擘分為下列數種型範:

1. 辨正是非, 不順應時流, 表現擇善固執的堅持。
  2. 改變內在性情, 以面對現實的挑戰, 或勇於遷善, 改正自己偏仄的視野與觀點。
  3. 逆流中開展出新的進境, 使生命活水常新、常注。
- 這些特殊的生命美典, 皆是方苞關懷書寫的對象。

### (五) 方苞書寫生命美典之重估

我們重新審視方苞所書寫人物的價值, 可從兩方面省思, 一是正面肯定方苞之書寫策略者, 二是反面駁斥其所採之視域者, 以下分別論述。

## 1. 肯定方苞書寫生命美典之視域

何謂生命呢？基本上可分為生物與非生物兩大系統說法，第一種是非生物論者主張生命力是由軀體之外的靈魂在運動著，使人體各部位有活力運動，死亡即是被解釋為生命力消逝和靈魂出竅。<sup>⑪</sup>第二類生物論，主要是從細胞來看待生命，例如史耐登（M. Schleiden, 1804—1881）等人於一八三八年提出「細胞是生命的基本結構單元」，肯定生命是由細胞物質結構而成的。其後，由於哲學家 and 生物學家所持「生命的不可定義性」被肯定，已不再爭辯生命的定義何在，但是大家仍較喜歡用哲學或神學的語言談生命，認為生命有三個基本特質，一、與其餘個體密切關聯、吸引、交往或相反排斥；二、一個內在的完整結構，是一個生物；三、通過不斷努力的自我超越以達更高形式的自我實現或自我改造。是故生命之存有，不僅是物質結構存有更是超越形軀我，以求自我實現，創造自我的過程中彰顯存有的意義。透過方苞敘寫，可以肯定人格風範之生命美典在於開發生物性的生命以渡越精神生命。

人生最大的命限在於：生不由自己決定，而死亦非自決，但是在時空的命限中，冥冥之歲命雖不可自己掌控，人應如何面對死亡？人會如何面對死亡呢？楊鴻台在《死亡社會學》第六章〈死亡心理〉中指出人對死亡的态度有五種類型：一、恐懼悲觀型，二、順從接受型，三、計畫安排型，四、尋求解脫型，五、坦然豁達型。<sup>⑫</sup>在這五種類型中，能夠昂首坦然地面對死亡，畢竟非易事，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孔孟二聖指出人世存在的意義在於所追求的「道」或「捨生取義」，縱一死猶不悔。袁陽在《生死事大——生死智慧與中國文化》第三章中指出儒家的終極關懷的轉移和世俗理想的建立化解了人類對生死的恐懼<sup>⑬</sup>。顏翔林在〈死亡價值追問〉一章中指出孔子以「殺身成仁」為價值，基督教以「善者入天堂」<sup>⑭</sup>，而靳風林在《窺視生死線——中國死亡文化研究》則指出儒家在道德價值的開拓中超越死亡，道家則對生死命題的審美觀照而能超越死亡，道教文化則在虛幻夢境中求仙運動以

<sup>⑪</sup> 請參見《理論生死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9）第一章，頁8—13。

<sup>⑫</sup> 死亡社會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12），頁113—4。

<sup>⑬</sup> 生死事大——生死智慧與中國文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12），頁63—91。

<sup>⑭</sup> 《死亡美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10），頁39—46。

達不朽，佛教則從苦難哀歌到極樂涅槃以渡化死亡，是故不同的教義，有不同對治人生的態度，亦有超越死亡的方式。<sup>15</sup>

然而，平凡的販夫走卒、閭巷小婦豈能識此大理？他（她）們在面對生命的困境時，或生死抉擇時，能否體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在方苞書寫的人物中，無論是潛隱在庶眾底層的鄰里婢婦、閭閻小民，或是朝廷命官，爲了爭取忠貞節烈之名譽，或以義舉行世，可以放棄生命，以完成生命價值，此一自我超越命限的抉擇，是常人所難，而愛國之士、節烈之女、市井之民，皆可爲此而自我犧牲，此一超越生死命限，而能揮灑出一片亮麗光彩，足供世人憑弔，方苞感念此節烈而輕死生之舉，遂爲之留記，這些特殊典範能祛除對死亡的恐懼，而以節烈自存，或爲國，或爲家，或爲個己之名節，皆凸顯其不懼死之心態，他（她）們雖是在世之歲時短減，卻贏得千秋萬世的矚目。

除了超越死生，對於摒除貧富貴賤以成就存在價值人物亦持肯定態度，人世榮辱，非一己之力所能操持，但是追求榮富而摒棄貧賤卻是人人之所欲，可是，能超越物質的享受而追求永恆心靈的平穩安頓，卻是常人所難，方苞所記人物之中，有視榮富如敝履，自甘淡泊者，其不以一世榮辱爲榮辱，而能在貧賤中怡然自得，誠非常人所能，值得肯定。復次，對於卓犖行誼以豐潤人世意義人物亦抱持肯定態度，另有表現堅貞卓絕之能力，爲民請命，爲國盡忠者，其存在的價值不僅渡越生活與生存的困限，更能開發更多人存在的意義，其價值自是難能可貴。

## 2. 重估方苞生命書寫之視域

方苞所論，最爲人詬病者，應是對貞節禮法之重視，其在〈康烈女傳〉云：「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共薑，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爲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獯也與！」（集外文，卷八，頁 761）方苞之論有異於歸有光（1507—1571）之看法，歸氏以爲女子未嫁死夫，是爲非禮，然而方苞卻旌揚其能成就節義，究竟孔子、曾子之意何在？若以今之女性主義者，必大糾謬之，方苞以死守禮法爲節

<sup>15</sup> 《窺視生死——中國死亡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義之舉，甚悖於今世，然方苞所持之義何在？方苞所書之貞節烈女，究竟是悖於倫常或是扼殺情性？詮解者各自有見，然方苞自有一套說法，指出狂狷之舉正在此中，過猶不及皆然。或云：「人之大倫五，以吾所聞見，惟婦死其夫及守貞終世者為多。」（頁 241）正指出當時婦人以死節守貞為常。或如「自古婦人之義皆以死而彰」（頁 231）正說明婦人死而義彰，豈非人倫之悖乎？此亦後世詬訾方苞死守禮法之迂。

事實上，「貞節觀」，「貞」即是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者，「節」即是已嫁從一而終，夫死不再醮者；「烈」即是遇強暴凌辱而能以死相拒、或夫死自盡殉身者。此一貞節觀念在唐代並未形成，當時盛行寡婦再嫁的風氣，<sup>16</sup>至於貞節觀念到何時才興盛呢？據陳剩勇所云，應是經過一段漫長歷史的演化。宋明理學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即是抑制人欲，以應合天理人倫，在明代有意識地提倡貞節觀及寡婦守節之獎勵，故明代婦女自小即被要求謹守婦道，恪守三從四德，在這種文化傳統和社會境域中，即發展出方苞筆下所刻摹女子的形象，必以節烈自持，<sup>17</sup>由於明代逐漸興盛此一貞節觀，故歸有光起而逆反之，在〈貞女論〉開宗明義即言：「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震川先生集》卷之三論議說，頁 58—9）指出「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所謂的「以身許人」即是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者；並指出終身不嫁是乖陰陽之氣，傷天地之和。並援舉《禮記》曾子與孔子之對答，說明女子未廟見而夫死，女子應如何自處？孔子說明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當歸葬於女子氏之黨，表示不成婦，不得繫於夫家，故知「女未嫁而不改適，為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有以為不嫁不適可勵世，歸有光駁斥先王並無此禮，必是後世所言。由是可知，對於節烈婦女的不能改適，歸有光並不認同。而方苞在文中一再旌揚守寡嫠婦之堅貞行為，即是明清以來對貞節觀念的要求。

然而，倡導現代女性主義者不禁要問，為什麼女人必得守此貞節，成就此一家一姓，而壓抑自己？難道女人必得像兔絲般柔弱地依附於某一姓氏呢？是不是社會的道德觀成為為吃人的禮教？抑或中國儒家的傳統原

<sup>16</sup> 根據《新唐書·公主表》所記載，公主寡居再嫁者有二十多人，其中兩嫁者有二十三人，三嫁者有四人，可見當時風氣。轉引自〈理學「貞節觀」、寡婦再嫁與民間社會——明代南方地區寡婦再嫁現象之考察〉陳剩勇作，《史林》，2001年第二期，頁 22—43。

<sup>17</sup> 同前注。

本即是為男性結構的體制，從不為同為「人」類的「女人」設想？事實上，生命的價值，往往取決於個人對於生命意義的認知，成就別人，犧牲自己，往往是一種自我價值的肯定，人的生命價值不在乎其長短，而是在乎如何經營，才能豐厚生命的底層，在層層疊疊的社會階層中，女人的能見度不高，唯一可重估生命價值的方式，即是大是大非的抉擇，而那些抱持「貞、節、烈」態度的女子在社會風氣使然之下，往往會選擇以節烈的方式展示生命的風華。

復次，方苞以儒化觀點作為取捨圭臬，亦值得商榷，方苞對佛道人士之看法，取決於人世作為，且充滿了對聖賢氣象之追企祈嚮，或是對名士風範表現出無限崇敬之意的態度值得重新省思儒家教化的權衡性。

## 六、結 論

生命從「有」到「無」，無論是販夫走卒、街井小民、閭巷婦女或是位居要津之達官顯貴，乃至於自隱無名的村夫漁樵，當生命銷歇殆盡之際，親族必難捨其驟離，或是追思感念其生前行誼，深懼時移事往，一切淪失在歲月之流，遂以紀念的書寫方式，為這些感念的親族友朋留下最美的行跡，留下光輝的姿影，供人憑記，或有事誼感人，型範可嘉，方苞亦主動敘寫，以供世人感念憑記，這種書寫，成為一種紀念性質的文體，其意義原本僅是為親族留存追念的憑藉，但或有因事蹟動人或貞烈可旌，遂成為人世型範，永垂不朽。時間終會流逝，記憶終究無法久存，藉由「書寫」留存印象，藉由「書寫」將記憶延展時空的面向，使書寫的意義由親族，而向閱讀者無限地、逐漸地擴大其所映照的光譜。典範之意義，不在時代之今昔遠近，而是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方苞以其交接往來的人物為書寫對象，為每一個曾經存活過的人物記載他們鮮燦的生命歷程，這些人物雖已成為過往，但是，經由文字留存，他們鮮明的形象依然存映在歷史中，成為我們追企感念的對象，也形成生命美典，永遠映照出人性的光輝。

方苞攸關生命書寫之文體形式，包括傳、紀事、墓誌銘、墓表、哀辭、祭文等六項，皆遵循前人對文類體式的要求來撰述，其觀察視域、敘寫模式則採用「追憶」方式，以記下傳主的行誼，其書寫的內容，依人物型範分類，凡有：一、表彰德行皆美的個人典型，二、延續家族生命的型範，

三、能救民於倒懸的型範，四、以開發學術生命之型範等四型；從人物生平際遇來分析，則有：先升後降型、先降後升型、起伏跌宕型、波瀾變化型、平實型等五種，這些類型突顯方苞生命書寫之意義與價值在於：一、發潛德之幽光，二、用力人紀，盡職當為，三、旌揚危變婦人之氣節，四、表彰方外人士之儒行，五、記友之義以駁正世人之偏仄，我們若重新省察方苞的書寫視域，一方面可以肯定其對生命價值的書寫，一方面亦可駁斥其對貞女烈婦之過度要求，以及以儒化觀點來衡量世人行爲，似有偏頗。雖則如此，但是，我們在閱讀這些人物典型時，仍可以感受到這些鮮活人物的形象。例如女人以死明志、明節（〈書萬烈婦某氏事〉），或以其生，能撫孤持家，來肯定婦人之生，猶賢其死（〈呂九儀妻夏氏〉），或是貧居陋巷，亦不改其志（〈杜蒼略先生墓誌銘〉），或其行爲輕財重義，飢不得餐，亦不改其志（〈劉古塘墓誌銘〉），或友其弟兄，或嘗遭家禍，獨身當之，流離毒痛幾死而不忍累群弟，難既解，益勤家事，督課子弟（〈記李默齋實行〉），或以鼎革之際，礫於州城外西南隅大路旁槐樹下，其樹至今尚存，故老過之，猶或爲歎歔流涕（〈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或無所施於世，而行能已著於家，雖孤特，不能容物，然不攀宦達，行身端直，以文學知名（〈王生墓誌銘〉）等等，皆非爲達宦巨族而作。

昔人雖遠，然典型猶在，透過方苞的書寫，爲我們留存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影像，這些圖像構成中國庶民階層中的典範，形成一股潛流，激發人性光輝，映照在歷史斑駁的長廊中，供我們無限感念與追思。

### 〈附錄二〉方苞全集卷數對照表

方望溪全集	卷一	讀經 27 首
	卷二	讀子史 28 首
	卷三	論說 14 首
	卷四	序 23 首
	卷五	書後題跋 26 首
	卷六	書 32 首
	卷七	贈送序 20 首，壽序 6 首
	卷八	傳 15 首
	卷九	紀事 9 首

	卷十	墓誌銘 30 首
	卷十一	墓誌銘 20 首
	卷十二	墓表 24 首
	卷十三	墓表 20 首，碑碣 9 首
	卷十四	記 22 首
	卷十五	頌銘 8 首
	卷十六	哀辭 12 首，祭文 8 首
	卷十七	家訓 4 首，家傳誌表哀辭 15 首
	卷十八	雜文 12 首
集外文	卷一	奏劄 9 首
	卷二	奏劄 11 首
	卷三	議 8 首
	卷四	序 21 首，跋 10 首
	卷五	書 26 首
	卷六	紀事 15 首
	卷七	墓表 4 首，墓誌銘 14 首
	卷八	論 1，送序，傳 1，記 1 首，家訓 3 首，雜文 3 首
	卷九	哀辭 2 首，祭文 3 首，銘贊頌 8 首，賦 1 首，詩 15 首
	卷十	尺牘 23 首
集外文補遺	卷一	書後 5 首，書 6 首，送序 2 首，墓誌銘 4 首，墓表 2 首， 哀詞 1 首，尺牘 4 首，聞見錄 3 則
	卷二	讀書筆記，史記評語

### 〈附錄三〉生死書寫文體對照表

文體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傳	以記載一人之事，以忠孝才德之事， 或事跡雖微，而可為法戒者，立傳以 垂後世。	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 細人而可法，則皆為之作傳以傳其 事，寓其意。
哀辭	寓傷悼之情，有長短句及楚體之不	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或以有才

	同。	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則譽止於察惠，不勝務，則悼加乎膚色。文用韻語。
墓碑	《事祖廣記》指出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而名云耳。	唐制五品以上官用之。葬者既為誌以藏諸幽，又為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
墓碣	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	五品以下官用之，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為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為，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頌並序，皆碣體。
墓表	有官無官皆可，敘寫學行德履。	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
墓誌銘	埋於壙中，行文嚴謹，敘寫世系、歲月、名字、爵裏，以防陵谷遷改。	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裏、行治、壽年、卒葬年月，與子孫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地，以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謂之誌銘。
祭文	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	祭奠親友之辭。古之祭祀，止於告饗，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韻語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

## 參考書目

### 一、書籍

1. 歸有光著、周本淳點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9月。
2. 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

3. Risieri Frondizi 著、黃蘊譯：《價值是什麼：價值學導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6 年 2 月再版。
4. (美) 馬斯洛 等著、林方主編：《人的潛能和價值：人本主義心理學譯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年 9 月一版三刷。
5. (美) A. 馬塞勒等著、任鷹等譯：《文化與自我——東西方人的透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 6 月。
6. 陳秉璋、陳信木：《價值社會學》，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 8 月。
7. (美) 悉尼·喬拉德等著、劉勁等譯：《健康人格：人本主義心理學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年 8 月。
8. (美) 斯蒂芬·歐文著、鄭學勤譯：《追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0 月。
9. 袁陽：《生死事大——生死智慧與中國文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10. 齊格蒙·包曼著、陳正國譯：《生與死的雙重變奏——人類生命策略的社會學詮釋》，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 4 月。
11. 徐中玉主編：《本原·教化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2 月。
12. Duane Schultz、Sydney Ellen Schultz 著、陳正文譯：《人格理論》，臺北，揚智文化公司，1997 年 6 月。
13. 恩斯特·卡西勒著、甘陽譯：《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7 年 11 月四刷。
14. 楊鴻台：《死亡社會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15. (明) 吳訥著，於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5 月。
16. (明) 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5 月(與《文章辨體合刊》)。
17. 顏翔林：《死亡美學》，上海，學林版社，1998 年 10 月。
18. 《中國讀書人的理想人格》，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8 月。
19. 靳風林：《窺視生死線——中國死亡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年。
20. 陶在樸：《理論生死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
21. 尉遲淦主編：《生死學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0 年 3 月。
22. 張分田：《亦主亦奴——中國古代官僚的社會人格》，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 月。

23. Samuel Smiles 著，劉曙光、宋景堂、劉志明譯：《品格的力量》，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1 年 2 月。
24. (法) 菲利浦·勒熱訥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 10 月。
25. 王陽著：《小說藝術形式分析：敘事學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年 3 月。
26. 李建盛：《理解事件與文本意義——文學詮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年 3 月。
27. 章啓群：《意義的本體論——哲學詮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年 3 月。
28. 韓震、孟鳴岐著：《歷史·理解·意義——歷史詮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年 3 月。

## 二、期刊

1. 鍾慧玲：〈《詩經》中女性角色期待的探討〉，《中國文化月刊》第 172 期，1994 年 2 月。
2. 熊賢關：〈儒家傳統中的婦女觀〉，《哲學雜誌》第 24 期，1998 年 5 月。
3. 陳剩勇：〈理學「貞節觀」、寡婦再嫁與民間社會——明代南方地區寡婦再嫁現象之考察〉，《史林》2001 年第 2 期。

(本文曾於 2003 年五月三日元培科技學院「第二屆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宣讀，時當台灣地區 sars 肆虐之際。經重新刪改、校正而成。)

## Lament of deserted women

— trying to analyze two female poets Shyuan Ji, Yu in Tang Dynasty and Shiang Chan, Wang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Lin Shu-Chen

###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take the similarity of Shyuan Ji, Yu and Shiang Chan, Wa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mparison;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thesis— when a woman is deserted by her husband, what action will she take and what kind of the procession of transition in her mentality will she have. Furthermore, to what degree that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eras (Tang Dynasty and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relate to literary creation will be. When both of them were deserted, did they develop different and unique style of poetry?

From Shyuan Ji, Yu's poetry, she is brave in expressing her feelings without affectation. Such tone of life is spirited; it highly relates with her position of "female Taoist priestess" and wide-open society background in Tang Dynasty. Besides, we should ap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self" in Yu's poetry highly. Her poetry is sincere, candid and bold. On a level, she surpassed the reticent part of boudoir literature.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Yu's poetry initiates a brand new prospect.

To examine Shiang Chan, Wang with the same level, she bore a heavier burden of social status and community than Shyuan Ji, Yu's. After Yu was deserted, she fought again and again in spite of setback in searching for true love, and never cared about judgment of common customs. It is worthy of being appreciated tremendously. However, Shiang Chan, Wang's works after she was deserted shows her attitude— when she cannot do well in the field of love, she will shirk into world of Buddhism as a way to escape. By contrast, Wang is passive.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self"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did not be lifted because it was near the present age. On the contrary, the bonds on female have become too strong to break because it enhanced and deepened through a long period storing. From Shyuan Ji, Yu to Shiang Chan, Wang, the status of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self" did not lift but descend; we can observe the trend more clearly.

The open-wide atmosphere in Tang Dynasty put a premium on Shyuan Ji, Yu to have courage to search for her love on a level. To set off by contrast, Shiang Chan, Wang wa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which was constrained under doubled pressure. It made her cannot pour out all that she want to say so the style of Wang's poetry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roverted and deep. However, when both of them were deserted, they had developed different and unique style of poetry. They shined in their own era.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138—158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從《廣雅疏證》看王念孫的詞族研究

徐興海\*

### 【提要】

王念孫是中國訓詁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明確地提出研究漢字與字形、字音之間的關係時，應該以字音為主要線索。聲音在漢語訓釋學上的地位第一次被如此顯著地提出。《廣雅疏證》是其訓詁學的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此書中第一次如此集中地討論了聲音與訓詁之間的關係，第一次如此集中地研究了漢語的辭彙以聲音為紐帶而形成的詞族現象，為訓詁學研究另闢蹊徑。本文主要通過對於《廣雅疏證》中所提出的詞族的研究，以說明王念孫對於中國訓詁學的貢獻。

**關鍵詞：**王念孫 廣雅疏證 訓詁 音韻 詞族

---

\* 江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漢語是世界上最為優秀的語言之一，但是清代以前的傳統的訓詁學更多地從字形上研究，注意到其辭彙數量之大，組詞能力之強，表意之豐富，往往致力於從這一點上論證漢語之無與倫比。以現代語言研究的觀點來看，這種觀點顯然有失偏頗。因為作為語言，漢語應該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言語，一個是書寫文字，僅僅依賴於對字形的研究來說明漢語言就會產生很大的偏差。如果漢語之表意，既借助於字形，又依賴於字音，那麼對於二者之仰賴是否輕重有別呢？如果有所區別，又孰輕孰重呢？對於此一問題的答案有不同，簡而言之，對於此一問題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學派，一個以文字為中心展開論述，以為漢語的字形字義是表意的基礎，可以稱之為文字中心論；一派以語音為中心展開論述，以為漢語的語音是表意的基礎，可以稱之為語音中心論。許慎《說文解字》是文字中心論的代表作，王念孫則是語音中心論的代表人物，其所著《廣雅疏證》（以下簡稱《疏證》）是代表著作，而其在此書中對於詞族的研究又是最具代表性的。《疏證》所著力論證的就是：表示同一意義，又具聲音上聯繫的一組詞，即是詞族。本文即意在對於《疏證》中的詞族研究作一闡釋，說明王念孫此一研究之重要性。

## 一、訓詁之旨，在於聲音

王念孫生於乾隆九年，卒於道光十二年，享年八十九歲。字懷祖，號石渠，又作石臞，高郵州（今江蘇高郵）人。父安國，雍正二年一甲進士，乾隆初年官至吏部尚書。念孫少年時隨侍在京，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四歲時即口授《爾雅》，八歲時讀《十三經》畢，旁涉史書文籍，無不該覽融通。父親使其師從皖派領袖戴震，受聲音、文字、訓詁之學，熟於「漢學」之門戶。可說是少年時即已打好一生做學問的基礎。曾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分古音為二十一部，史稱其音韻學超出段玉裁之上：「于支、脂、之三部之分，段氏《六書音韻表》亦見及此；其分至、祭、盍、緝為四部，則段書所未及也。」<sup>①</sup>王念孫通過為《廣雅》作「疏證」成《廣雅疏證》，提出了漢字表義「以聲音為紐帶」的規律，尋

① 《清儒學案·石臞學案》卷一百。

求開拓「以古音得經義」之新道路，從而使得漢語言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表現了高度的創造性。

王念孫總結《疏證》之主旨云：

竊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為音，音別為義，或望文虛造而為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匙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②

《疏證》最大貢獻即在於此，王念孫之創造亦在於此。王念孫之語言學體系迥別於此前的研究，即植根於此。

當代語言學家王力對重形不重音的觀點予以徹底的清算，並且推許段玉裁、王念孫進行了一場訓詁學的革命，使其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文字本來只是語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脫離了有聲語言的關係，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質。但是，古代的文字學家們並不懂得這個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個概念必須有固定的寫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東西；一個字如果不具備某種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種概念。這種重形不重音的觀點，控制著一千七百年前的中國文字學（從許慎時代到段玉裁、王念孫的時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孫，才衝破了這個藩籬。文字既是代表有聲語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義的可能：不但同聲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義；甚至意符、聲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還可能是同義的。這樣，古代經史子集中許多難懂的字都講清楚了。這是訓詁學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訓詁學推到嶄新的一個歷史階段，他們的貢獻是很大的。③

王念孫之研究與先前有了根本的變化，提出了「詁訓之旨，本於聲音」的綱領以代替先前的以形為主的綱領，這是一個突破，也是對先前訓詁學的否定。這一綱領抓住了訓詁學研究的根本，因之發前人所未發，示前人所未明，為漢語言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因其疏證採取了實證的科學方法，所以實現了否定之否定，使語言學研究上升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

清代以前的訓詁學，都是獨立地研究一個一個的字和詞，而沒有對相

② 《廣雅疏證·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5月。

③ 《中國語言學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p156-157。

關的詞作貫通式的總體研究，缺乏宏觀把握。《說文解字》從字形上提示字與字之間的關係，說明「部首」對一個字表義所起的重要作用。清初，顧炎武首先將音韻之學應用于經學研究，開闢了以聲求義的新路子。戴震繼起，將音韻、訓詁、文字融會貫通，使語音中心論有了自己的地盤。但是真正使音韻之學發揚光大，使其成爲訓詁學研究的主力，成爲科學的體系，還有賴於王念孫的研究。他的《疏證》，當然還有《讀書雜誌》，《釋大》，王引之轉述之《經義述聞》，但主要是《疏證》，在中國訓詁學史上豎立了一個里程碑，使以聲音爲紐帶研究字與字之間的學說爲學術界所矚目。從許慎到王念孫，經歷了16個多世紀。

王念孫對訓詁學最大的貢獻，是科學論證了「詁訓之旨，本於聲音」的道理，因之「本立而道生」，這個「道」，就是音韻學，以音韻學爲基礎建立訓詁學，使得訓詁學從對一個一個的字，昇華爲一組詞一組詞的研究，進一步闡發了文字演變遵循聲音這一客觀規律。

## 二、《疏證》之聲訓研究

詞族研究與聲訓有著密切的聯繫。其一，其所研究的物件相同，即都研究事物之稱名，不同的是，聲訓研究的是一個詞與某一事物的關係，而詞族研究所要提示的，是一組詞與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探究這一組詞之間有無聯繫，靠什麼聯繫？其二，詞族研究是聲訓的發展與提高，它捨棄了猜測性，更多了科學性，把本來看似不相關的不同事物的稱名放在一起，提示它們之間的聯繫。

漢字的發生發展，是一個由少到多的增量過程，其中的軌迹是什麼？新增加的字與原來的字之間有無關係？如果有，是什麼關係？詞族研究所要回答的就是這些問題，它要追溯到起名、稱物之原來狀態，分析並提示同類稱名與字之間的關係。

黃侃《聲韻略說》指出漢字「形、聲、義三者之中，以聲爲最先，義次之，形爲最後」，他指出對漢字的應當遵循「循聲求義」之路徑：

形、聲、義三者之中，以聲爲最先，義次之，形爲最後。凡聲之起，非以表情感，即以寫物音，由是而義傳焉。聲義具而造形以表之，然後文字萌生。昔結繩之世，無字而有聲與義；書契之興，依聲義而構字形。如日、月

之字，未造時已有日月之語。更分析之，聲則日、月，義表實闕，至造字時，乃特製日、月二文以當之。因此以談，小學徒識字形，不足以究言語文字之根本，明已。

王念孫之詞族研究，即「循聲求義」研究之最精彩部分。依黃侃之說，此種研究方「足以究言語文字之根本」了！

## （一）以聲訓的方法發明詞族

所謂聲訓，是一種循聲音而求語義的訓詁方法。運用此一方法的前提是假定文字只是語言的書寫符號，是語言的外在形式，而聲音才是語言的內在形式。詞與詞之間發生關聯，主要是詞與詞的表義相近或相同，外在形式（如偏旁）是一個方面，但更大量的是以聲音作為紐帶。

中國古代的聲訓，濫觴於《易經》，集大成於東漢劉熙《釋名》。此後一千六百年至王念孫方使之脫離唯心主義的體系，成為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將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無論從訓釋物件的範圍上，還是從其數量上說，《疏證》所運用的聲訓都是極為可觀的。《疏證》不僅引證劉熙《釋名》共達三百四十餘處之多，本身又聲訓三百四十餘條，數量實為驚人，簡直可以成為一部新《釋名》。

現將《疏證》所用聲訓條目以《釋名》分類，每類各舉數例，排列如下，以對其總體情況有一個認識：

釋天：秋之為言愁也。暮之言冥漠也。

釋地：埒之言界埒也。坑之言康也。畎之言穿也，穿地通水也，故通穀亦謂之畎。

釋水：溇之言濡濕也。汜之言訖也。瀨之言厲也。湍之言過也。瀆之言竇也。波之言播蕩也。

釋丘：陵之言陵遲也。埒之言宰也，宰亦高貌也。陵之言隆也。墻之言般也。岡之言綱。嶺之言領也。

釋道：術之言率也。隊或作隧，隧之言遂也，遂，達也。迳之言杭。

釋形體：顏之為言岸然高也。項之言直項也。脰之言豎立也。頷之言合也。脅之言夾也，在兩旁之名也。勝之言旁也。膊之言輔也。骨之言覈也，覈與核同。骸之言亦核也。

釋姿容：闕之言閒也。貯之言佇也。翫之言委曲也。

釋長幼：殼之言孺也。媠之言媒也。

釋親屬：郎之言良也……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壻之胥也。倩之言婧也。

釋言語：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媯之言妙也。拓之言碩大也。臨之言隆也，封之言豐也。兗之言渾也。方之言荒，撫之言撫也。養之言陽陽也。甬之言庸也。

釋飲食：糗之言炒，糲之言憊也。糗之言浮流，糲之言疏，皆分散之貌也。糜之言靡細也。粘之言曼胡也。棘之言末也。

釋采帛：彤之言融也，赤色著明之貌。赭之言明著也。白之言明白也。黝之言幽也。黯之言闇也。

釋首飾：禪之言單也。羣之言圍也，圍繞要下也，故又謂之繞領。緄之言混成也。裨之言保，保亦衣也，故衣甲者謂之保介。紵之言禁也，綦之言戒也，戒亦禁也。

釋宮室：霤之言瓏玲也。堂之言堂堂也。聰之言通，聆之言靈也。牖謂之窗，窗檻謂之櫺，義取諸此也。除之言敘也，階級有次敘也。庑之言亦聚也，聚者積也。垣之言環也，環繞於宮外也。院之言亦環也。

釋牀帳：幃之言遮罩也。筵之言延也。

釋書契：判之言片也。

釋用器：案之言安也，所以安置食器也。棹之言卑也。盂之言迂曲也。箸者絡也，猶今人言籬。巖之言盛受也。械之言函也。梲之言薦也。箱之言輔相也。鏡之言劓也。鑿之言斬也。劃之言過也，所割皆決過也，鈎子戟謂之戈，義與此同也。

釋樂器：鍾之言充也。歛之言揄也。詠之言永也，所謂歌永言也。

釋兵：殳之言投也，投亦擊也。挺之言挺也。鞬之言鍵閉也。醫之言蔽翳也。鞞之言遮罩也，亦刀劍削之通名。鋏之言剗也。

釋車：鞣之言鈎也，拘也。軒之言扞蔽也。輦之言連也，連者引也，引之以行故曰輦。輦之言盤，鞞之言紆也。輶之言藩屏也。輪之言員也，運也。

釋船：舫之言方也。舶之言博大也。舩之言浮也。枕之言橫也。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

釋疾病：瘥之言顛也。癩之言掣，癩之言縱也。

釋喪制：橫之言容也，義與匱匱同。櫬之言親也。禭之言盛受也。被之言拂也。輅之言跋也。禭之言墀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疏證》所舉可歸入聲訓者，還有一些為《釋名》之分類所不能歸併，另立釋草木、釋禽獸兩類。

釋草木：稗之言幹也，禾之幹也。私之爲言室也，敬也，不相黏著之詞也。私從禾山聲，山、宣、散三字古聲義相近。蒲穗形圓，故謂之萑，萑之爲言團團然叢聚也。

釋禽獸：謂之蚺蜒者，言其行蜿蜒然也。蟲屈曲搖掉而行，故舉以相況。蚯蚓之行屈曲，故謂之蜿蟺，又謂之蜿蜿。白與蚺聲之轉，蚺之爲言猶白也。鮑之言白也。鷁之言搖，急疾之名。麿之言兒也，弱小之稱也。

(二) 以下所舉王念孫的聲訓之例是以音求義，不限形體。與《釋名》相同的是，也利用了形聲字的聲符，也有三種方式：

1. 用聲母釋聲子，例如：

頷之言合也。

隧之言遂也。

澳之言奧也。

2. 用聲子釋聲母，例如：

秋之爲言愁也。

莫之言愒也。

疑之言擬議也。

3. 用同聲母的字相訓，例如：

檝之言段也。

遼之言駿也。

漂之言標。

《疏證》還常用被訓釋字和另一個字結合起來組成一個片語，用以解釋這個字的意義，例如：

援之言援引。

颺之言颺颺也。

隤之言摧隤。

險之言險巖也。

此處所用訓釋方法是以詞族釋詞，它所訓釋的詞常是組詞能力很強的詞，且所能組成的許多詞表示的意義之間懸殊很大。用這種方法，爲的是限定並明確詞義的方向。

《疏證》除直接引證《釋名》，有時還暗引，如「堂之言堂堂也」條即暗引《釋名》「堂謂堂堂高顯貌也」。《疏證》的有些條目則是爲了糾正和補充《釋名》，如「聰之言通，聆之言靈，牖謂之窗，窗欄謂之櫺，義取諸此也」，而《釋名》：「窗，目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相較而言，《疏證》的解釋就更合理些。又如《疏證》：「垣之言環也，環繞於宮也。」《釋名》：「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二者解釋的角度就有所不同。又如《疏證》：「杈之言錯也。」《釋名》：「叉，杈也。」此一例《疏證》的解釋即是對《釋名》的補充。

劉熙著《釋名》，其目的是探求事物命名的根本原因，尋求一條聲音和意義對應的規律，以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劉熙似乎已覺察到字形、聲音和字義三者之間，聲音和字義之關係更爲密切一些，因而做出了大膽的探索。這種勇於求取的精神是可貴的。然而，他對聲音和字義之間關係的認識並未提高到理論上來，同時，他所用的方法又是唯心主義的，他從自我的意識和感覺出發，隨便地找一個同音或音近的字去解釋一個詞的意義，以爲這樣以來詞的本義就會隨自己的意志而轉移。

(三) 王念孫最廣泛地應用了聲訓，然而卻與《釋名》有許多根本的區別。他以聲求義，以聲音爲紐帶，以科學研究中所常用的演繹法去論證。如卷一：「大也」條：「拓之言碩大也。拓曹憲音托……《說文繫傳》引《字書》云：『拓，張衣令大也。』《玉篇》：『拓，廣大也。』《太玄玄瑩》云：『天地開闢，宇宙拓坦。』《漢白石神君碑》云：『開拓舊兆。』《文選·魏都賦》注引《倉頡》云：『斥，大也。』《莊子·田子方篇》：『揮斥八級。』李軌音托。《漢書·揚雄傳》云：『拓迹開統。』拓、斥並與拓通。《魯頌·閟宮篇》：『松桷有烏。』《毛傳》云：『烏，大貌。』徐邈音托，義亦與拓同。」

拓、斥、拓同聲，故得通假，又例舉多書證明托之音之字同訓。又如「末也」條：「蔑之言微末也。《顧命》云：『眇眇予末小子。』《漢書·韋玄成傳》云：『於蔑小子。』是蔑即末也。蔑與憊通。」蔑屬入聲屑韻，明母，末屬入聲末韻，明母。蔑、末同母，故得通假。此例也是以例證說明自己提出的聲訓結論。



(四)《疏證》對自己聲訓的結果都以多種例證說明，孤證不立，這就大大地排除了《釋名》聲訓的猜測性。

《疏證》對聲訓的結果還證以今言俗語。如「蛻之言脫也，今俗語猶謂蟲解皮為蛻皮矣，猶謂鳥獸解毛為毳毛。」「郎之言良也……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滓之言逼，謂逼取其汁也，今俗語猶云滓米湯矣。」「椽之言段也，今人言木一段兩段是也。」「判之言片也，今人言版片是也。」「客者絡也，猶今人言籬。」這些例證也說明王念孫有明確的歷史觀念，並以之去研究語言學。

《疏證》還以人名訓詁的方法去論證聲訓的結果，如卷一「樂也」條：「養之言陽陽也。……養與陽古同聲，故孫陽字伯樂矣。」

《釋名》以某一字為一義類，而《疏證》以某一音為一義類，以聲求義，以聲音為紐帶，組成一個詞族，凡同族之字皆可同訓。正如王力《中國語言學史》所指出的：「事物得名之始，固然是任意的；但到了一個詞演變為幾個詞的時候，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語音上發生關係的了。」「這就牽涉到『詞族』的問題。」

### 三、詞族研究

王念孫對聲訓的研究，正是進入了對詞族的研究。他汲取了《釋名》合理的東西，沒有原地踏步，而是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使得聲訓的研究方法擺脫了偶然性和猜測性。

#### (一)《疏證》發明同聲者同一詞族

- 1.如「凡言闐闐者皆盛之義也」。見卷六上「闐闐，盛也」條《疏證》：  
凡盛貌謂之闐闐，盛聲亦謂之闐闐。《說文》：「闐，盛兒也。」又云：「嗔，盛氣也。」引《小雅·采芑篇》：「振旅嗔嗔。」今本作「闐闐」。《爾雅》注云：「闐闐，群行聲。」左思《魏都賦》云：「振旅鞦鞦，反旆悠悠。」《問喪》云：「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楚辭·九歌》云：「雷填填兮雨冥冥。」《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泛泛溟溟從高旂。」應劭注云：「溟溟，盛貌也。」《易林·賁之蹇》云：「填填，火燒山根。」郭璞《江賦》：「汗汗涸涸。」《廣韻》引《字林》云：「涸涸，水勢廣大無際之兒。」是凡言闐闐者皆盛之義也。

是條《疏證》論證凡是與「闐闐」同聲之詞皆具「盛」義。「盛貌」轉為「盛聲」是引申，是同一詞所表示意義之轉移。其餘之「嘖嘖」、「鞫鞫」、「填填」、「溷溷」、「汨汨」即《疏證》所謂之「凡言闐闐者」，即與「闐闐」有聲音聯繫之詞，均具有同樣的意義，都表示「盛」的意義。這些表示同一意義，又具聲音上聯繫的一組詞，即是詞族。

這條《疏證》從引證《說文解字》開始，其所注「闐，盛貌」可以看作是抽象義；「嘖，盛氣」，是表示抽象意義的傲氣。「闐」、「嘖」有聲音上的聯繫，皆有「盛」意。可以說《說文解字》已經客觀地記載了詞族內部轉換的事實，但是卻未曾予以提示。只是到了《疏證》，才將過去字書已經紀錄了的現象予以系統地研究，發明了以聲音為紐帶，詞語轉換的規律。

2.《廣雅》同一條中表示「盛」之義的還有「鏘鏘」一詞，王念孫對此作疏證時盡情發揮，指出凡與「鏘鏘」同聲音者時，既可以表示樂器之聲音，又可以是車聲。在表示容貌時，既可以是舞蹈的樣子，又可以是美好的樣子，又可以是明亮的樣子。揭示與「鏘鏘」同聲音者其字雖不同，但聲音的紐帶把它們聯繫起來，形成一個家族。它們所表示的具體各別的意義都是同一個抽象意義形而下之後，向不同方向的具體化。其疏證如下：

凡聲之盛謂之鏘鏘，故鶯聲謂之鏘鏘。《小雅·采芑篇》：「八鶯瑤瑤。」《庭燎篇》作「將將」，《大雅·丞民篇》作「鏘鏘」，《商頌·烈祖篇》作「鶴鶴」是也。樂聲謂之鏘鏘。《小雅·鼓鍾篇》：「鼓鍾將將。」《周頌·執競篇》：「佩玉將將」是也。車聲謂之鏘鏘。《楚辭·九辯》「前輕輶之鏘鏘」是也。凡貌之盛亦謂之鏘鏘，故行貌謂之蹻蹻。《曲禮》：「大夫濟濟士蹻蹻。」《鄭注》云：「皆形容止之貌。」《釋文》「蹻蹻本又作鶴，或作鏘」是也。舞貌謂之蹻蹻。《說文》「蹻」字注引《臯陶謨》「鳥獸蹻蹻」，今本作「蹻蹻」，《史記·夏紀》作「鳥獸翔舞」是也。高貌謂之將將。《大雅·絲篇》：「應門將將。」班固《西都賦》：「激神嶽之蔣蔣。」馬融《廣成頌》「峨峨磴磴，鏘鏘堆堆」是也。美貌謂之將將。《魯頌·閟宮篇》：「犧尊將將。」《正義》云：「將將然盛美。」《管子·形勢解》云：「將將鴻鶴，貌之美者」是也。明貌謂之將將。《荀子·王霸篇》引《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用之光明」是也。是凡言鏘鏘者皆盛之美也。

3.《廣雅》之同一條，又有「駉駉、驛驛、業業、翼翼、奕奕，盛也」之訓。王念孫雖然沒有說「凡言駉駉者皆盛也」，但指出駉駉、驛驛與釋

繹通用，又謂「奕奕猶驛驛也」，「奕、繹、斲並同義」，「案奕奕亦憂盛滿之貌，義與怲怲同。怲怲與彭彭古同聲」。揭示這幾個詞之間在聲音上的聯繫，它們仍是一組。疏證如下：

《小雅·采薇篇》：「四牡騤騤。」《傳》云：「騤騤，強也。」張衡《南都賦》云：「駟飛龍兮騤騤。」《周頌·載芟篇》：「驛驛其達。」《爾雅》作「繹繹」，《舍人》注云：「穀皆生之貌。」是驛驛為盛也。《小雅·采薇篇》：「四牡業業。」《傳》云：「業業然壯也。」《大雅·常武篇》云：「赫赫業業。」《小雅·采芣篇》：「四騏翼翼。」《箋》云：「翼翼，壯健貌。」《信南山篇》：「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箋》云：「與與、翼翼，蕃庶貌。」《大雅·緜篇》：「作廟翼翼。」《箋》云：「嚴顯翼翼然。」《後漢書·樊准傳》引《商頌·般武篇》：「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云：「《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又《小雅·信南山篇》云：「疆場翼翼，黍稷彧彧。」《大雅·文王篇》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常武篇》云：「絲絲翼翼，不測不克。」《孔子閒居》云：「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皆盛之義也。單言之則謂之翼，義見卷一「憑，滿也」下。奕奕猶驛驛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斲，萬舞有奕。」《傳》云：「斲然盛也，奕奕然閑也。」《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奕奕，盛貌。」《小雅·車攻篇》云：「四牡奕奕。」《大雅·韓奕篇》：「奕奕梁山。」《傳》云：「奕奕，大也。」《魯頌·閟宮篇》：「新故廟奕奕。」王肅注云：「奕奕盛大。」《周官·隸仆》注引作「寢廟繹繹」。奕、繹、斲並同義。《小雅·頍弁篇》：「憂心奕奕，憂心怲怲。」《傳》：「奕奕然無所薄也。怲怲，憂盛滿也。」案奕奕亦憂盛滿之貌，義與怲怲同。怲怲與彭彭古同聲，馬盛謂之彭彭，亦謂之奕奕，憂盛謂之奕奕，亦謂之怲怲矣。

4. 卷六上「闐闐，聲也」條《疏證》可與以上同卷「闐闐，盛也」條之「凡言闐闐者皆盛之義也」相互補充。疏證如下：

凡群行聲謂之闐闐。《說文》引《小雅·采芣篇》「振旅嘒嘒」，今本作「闐闐」。《爾雅》注：「闐闐，群行聲。」左思《魏都賦》云：「振旅鞀鞀，返旆悠悠」是也。車聲謂之鞀鞀，《易林》云：「轟轟鞀鞀，驅東逐西」是也。雷聲謂之填填。《楚辭·九歌》云：「雷填填兮雨冥冥。」《九辯》「屬雷師之闐闐」是也。崩聲謂之田田。《問喪》云「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是也。凡言闐闐者並同義。……猶闐闐也。故車聲、雷聲、崩聲、群行聲皆謂之闐。

此例之「凡言闐闐者」，是謂闐闐、嘒嘒、鞀鞀、填填、田田均以聲音為紐帶，可以互轉，表義相同。是凡與「闐闐」同聲者皆為同一詞族。

是處《疏證》所發明《廣雅》均以「闐闐」爲主語詞的兩條有內在的聯繫，揭示了不僅嘖嘖、鞫鞫、田田、填填、汙汙與闐闐爲一組，而且這個家族還應該加入一個詞，即「鞣鞣」，因爲「鞣鞣猶闐闐也」。此亦是一種前後照映、相互貫通的方法。

## (二) 將《廣雅》同一條中兩詞各自形成的詞族合一個大的詞族

1. 卷四下有「幾、尾、總、紗、系、紉、緜、麼，微也」條，《疏證》謂：

總紗系紉細皆絲之微也。總之言恍惚，紗之言眇小也。《孫子算經》云：「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總、忽，紗、秒並通。《說文》：「秒，禾芒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間不容翮忽。」《正義》云：「翮當作秒。秒，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漢書·敘傳》「造計秒忽」，劉德注云：「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皆微之義也。《顧命》云：「眇眇予末小子。」僖九年《左傳》云：「以是藐諸孤。」《方言》：「眇，小也。」又云：「秒，小也，凡木細枝謂之秒。」郭璞注云：「言秒梢也。」《爾雅·釋鳥》注作鷦鷯。《周頌·毳篇》：「肇允彼桃蟲，拏飛維鳥。」《毛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鷦之疊韻爲鷦鷯，又爲鷦鷯，皆小貌也。《文選·長笛賦》「儵眇睢維」，李善注以儵眇爲合目，睢維爲開目，是凡言眇者皆微之義也。……

紉之言蔑也。《廣韻》引《倉頡篇》云：「紉，細也。」《君奭》：「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鄭注云：「蔑，小也。」《正義》云：「小，謂精微也。」《逸周書·祭公解》：「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追學文武之微德也。」《法言·學行篇》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二云：「憊，小也。」《周語》：「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韋昭注云：「蔑，小也。」與憊同。今人謂小視人爲蔑視，或曰眇視，或曰忽視，義與總紗紉並同。《法言·先知篇》云：「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絲作晒。」眇絲，即總紗紉，故《漢書·嚴助傳》：「越人絲力薄材。」孟康曰：「絲音滅。」《玉篇》：「穢，面小也。」《說文》：「穢，麤也。」《方言》：「江淮陳楚之間謂木細枝爲蔑。」注云：「蔑，小貌也。」《衆經音義》卷十引《埤蒼》云：「蔑，析竹膚也。」字通作蔑。《顧命》：「敷重蔑席。」鄭注云：「蔑，析竹之次青者。」《玉篇》：「鷦，

鷓鴣也。」亦通作糶。《方言》：「桑飛，自關而西或謂之糶雀。」注云：「即鷓鴣也。又名鷓鴣。糶言糶截也。」《廣韻》：「鷓，小也。」鷓與糶截同，即鷓鴣之轉也。《荀子·勸學篇》：「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楊倞注云：「蒙鳩，鷓鴣也。」蒙亦鷓之轉，蒙鳩猶言鷓雀。

以上《疏證》中包含兩條「凡言某者」，即「凡言眇者皆微之義也」和「凡言蔑者皆微之義也。」分別以紗、秒、藐、眇、杪、鈔、鷓、鷓爲一詞族，又以紕、蔑、懷、繇、鷓、糶、鷓爲一詞族，這兩個詞族都具有「微小」的意義，都各自以一個聲音爲紐帶。

同時，這兩個詞族又可以合成爲一個大詞族，因爲兩者之間又有聲音的聯繫：「今人謂小視人爲蔑視，或曰眇視，或曰忽視，義與總紗紕並同。」可謂「蔑視」即「眇視」，又可謂「藐視」，同爲聲音之轉。

2. 卷二上又有「蔑，小也」條，其疏證與「凡言蔑者皆微者之義」略同，所舉例證略同。「小」即「微」也，或即義同而字通。此條可與前兩個詞族匯合爲一更大詞族。其《疏證》如下：

憊、私、策、夔者，《方言》：「私、夔，小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梁益之間，凡物小者謂之私，江淮陳楚之內謂木細枝爲蔑，青齊兗冀之間謂之夔，燕之北鄙、朝鮮、冽水之間謂之夔。」蔑與憊同。郭璞注云：「蔑，小貌也。」《法言·學行篇》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又《君奭》：「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鄭注云：「蔑，小也。」《正義》云：「小謂精微也。」《逸周書·祭公解》：「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追學文武之微德也。」《說文》：「憊，輕易也。」輕易亦小也。今人猶謂輕視人爲蔑視。《周語》：「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韋昭注云：「蔑，小也。」蔑與憊同。又《廣韻》：「總，莫結切。」引《倉頡篇》云：「紕，細也。」《玉篇》：「鷓，面小也。」《說文》：「糶，麤也。」《衆經音義》卷十引《埤倉》云：「蔑，折竹膚青者。」《顧命》：「敷重蔑席。」鄭注云：「蔑，折竹之次青者。」《玉篇》：「鷓，鷓鴣也。」字亦通作憊。《方言》：「桑飛，自關而西或謂之憊鷓。」注云：「即鷓鴣也。」憊言憊也。《廣韻》：「鷓，小也。」鷓與憊截同。《荀子·勸學篇》：「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楊倞注云：「蒙鳩，鷓鴣也。」蒙鳩猶言鷓雀，蔑、蒙，語之轉耳。《爾雅》：「蠓，蟻蠓。」李善注《甘泉賦》引孫炎注云：「蟲小於蚊。」是凡言蔑者皆微之義也。

3. 「小也」條《疏證》所發明另外幾組因爲同義之詞而音同之例，更有說明「凡某義同者表此義之詞音同」的意思，見下文：

凡物之銳者皆有小義，故小謂之嬰。《釋器篇》又云：「石鍼謂之柴。」《廣韻》嬰、柴並音姊宜切，其義同也。小謂之織，故利亦謂之銛，銛屬亦謂之銛。《漢書·賈誼傳》：「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晉灼注云：「世俗謂利爲銛微。」《說文》云：「銛，銛屬也。」小謂之策，故刺亦謂之策。《爾雅》策刺注云：「草刺針也。」《方言》：「凡草木刺人者，北燕、朝鮮之間謂策。」小謂之銳，故兵芒亦謂之銳，草初生亦謂之莠。小謂之眇，故木末亦謂之杪，禾芒亦謂之杪。是凡物之銳者皆與小同義也。

按：尖銳的東西，給人以小的印象，小與尖銳之銳建立了詞義上的聯繫。因爲有此詞義上的聯繫，因之表達同一義的嬰、柴同音，織、銛同音，眇、杪、杪同音。

《疏證》以上幾條所發明之詞族，梁啓超稱之爲「引申」，謂其理論根據亦是「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又謂「吾嘗略爲探索，謂宜從音原以求字原。」其《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原》一文詳求詞族擴展之途，論述極爲詳悉：

同一發音之語，其展轉引申而成之字可以無窮。《爾雅·釋天》「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王國維云：「霧、霧、晦，一聲之轉也。晦本明母字，後世轉入曉母，與微、霽諸字同。」蓋霧音當讀如慕（吾粵語正然），晦音當讀如每，皆由唇發音，而含有模糊不明的意味。由是而晚色微茫不明者謂之暮；有物爲之障而不能透視者謂之幕；不可得見而徒寄思焉，謂之慕；此一引申也。晦亦謂之冥，閉目而無所見則謂之瞑；瞑久而知覺全休止者謂之眠；此又一引申也。冥亦謂之昧；眠亦謂之寐；此又一引申也。視而不明謂之蒙；雨之細而不易見者謂之濛；視官本身不明者謂之矇；矇之甚者謂之盲；此又一引申也。細而難察者謂之毛；矇亦謂之眊；年老而意識作用疲缺者謂之耄；此又一引申也。意識有所蔽而錯亂者謂之瞽，亦謂之謬；不自知其瞽謬而任意以行者謂之貿貿然；此又一引申也。難察而致誤者謂之迷；視官中有障刺者謂之眯；此又一引申也。晦冥亦謂之靈；深入而至視線所不及謂之采；全掩覆而不可見謂之埋；此又一引申也。睡眠而仿佛若有所見，其狀態恰如霧中看物者謂之夢；雖醒而作夢態者謂之瞢懂，謂之瞢騰；醉態謂之醲酏；此又一引申也。細而難察者謂之微（讀如眉，粵語猶然），重言之謂之微茫；微之甚者謂之渺，謂之杳，重言之謂之渺茫，謂之杳冥，謂之芴漠；尤甚者謂之泯，重言之謂之泯沒，謂之磨滅；此又一引申也。微亦謂之末，水之霏屑如霧者謂之沫；此又一引申也。迷之重言謂之迷離，謂之迷糊，謂之迷茫，或謂

之模糊，謂之麻糊；此又一引申也。迷而求之謂之摸，重言之謂之摸索；此又一引申也。凡微末之物如霧等，皆物之細屑也，故屑物謂之磨，謂之礪；物之磨成屑者謂之糜，謂之靡；小而不可見之物謂之么麼；鬼物隱約閃爍不可確見者謂之魔；此又一引申也。草本植物，其葉碎屑者謂之蘼蕪，謂之綿馬；木本植物，其葉碎屑者謂之木髦；魚之小者謂之鯁（俱見《爾雅》）。鳥之小者謂之綿蠻（見《詩毛傳》）。蟲之小者謂之蟲虻，尤小者謂之蟻蠊，其別一種謂之脈望（望讀盲去聲，粵語猶然）。兩之小者謂之叢粟，其實只是一語之異寫耳，此又一引申也。草木初茁不甚可察者謂之萌，其細英謂之芒；光之細碎隱約閃爍者亦謂之芒；此又一引申也。無所知謂之冥；人之無所知者謂之民（《禮記》鄭《注》云：「民者，冥也。言冥無所知。」），亦謂之氓（《詩》：「氓之蚩蚩。」）；此又一引申也。於是凡蒙昧之民族則加以此名，謂之髻，謂之蠻，謂之苗，謂之閩，此又一引申也。既視察不明，則只能付諸疑問，故對於不能確知之人或地，則曰某人某地；疑問所用字曰無，曰毋（古讀如模，粵語猶然）。或添字以足其意曰得無，曰將毋；白話則轉為麼，為嗎；某字或轉為甚麼，為什麼；此又一引申也。

### （三）發明物形同者其命名即相似

卷二下「短也」條《疏證》提出一個通則，即「蓋凡物形之短者其命名即相似，故屢變其物而不易其名」。這一通則從事物之特徵出發，指出凡事物具有同一特徵者其命名之詞相同。實際上，這命名之詞是指這些詞的聲音相同或相近，仍是以聲音為詞義之紐帶，只是觀察的方向有不同而已。與前邊所舉詞族的例子有不同，乃前例是從聲音出發，「凡某聲者皆某某義」，而此例中則從事物出發，從事物命名之詞出發，得出「凡某某義者其稱名之字音同或音近」的結論。

如卷二「短也」條《疏證》：

黜者，《方言》：「黜，短也。」注云：「蹶黜，短小貌也。」《玉篇》音知劣切，云「吳人呼短物也」。又云：「矧，短也。」《莊子·秋水篇》「遙而不閔，掇而不跂。」郭象注云：「遙，長也。掇猶短也。」《淮南子·人間訓》「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殺。」高誘注云：「殺，短也。」並字異而義同。《說文》：「窳，短面也。」《廣韻》：「頽，頭短也。」《衆經音義》卷四引《聲類》云：「憊，短氣貌。」義亦與黜同。今俗語謂短見為拙見，義亦同也。黜與侏儒，語之轉也，故短謂之侏儒，又謂之黜；梁上短柱謂之掇，又謂之侏儒，又謂之儒；

蜘蛛謂之蠖，又謂之蝥，又謂之侏儒。《爾雅》：「梁上楹謂之楹。」《釋文》：「楹本或作祝。」《雜記》：「山節而藻祝。」《鄭注》云：「祝，侏儒柱也。」《釋名》云：「楹，梁上短柱也。」楹猶侏儒，短，故以名之也。《方言》云：「龜，龜蝥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龜蝥，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龜蝥，或謂之蠖。蠖者，侏儒，語之轉也。注云：「今江東呼蠖蝥，音楹。」《玉篇》云：「蠖，蜚也。」蓋凡物形之短者，其命名即相似，故屢變其物而不易其名也。……凡物之直而短者謂之蹶，或謂之黜……故短貌謂之蹶黜，獸前足短謂之蹶，頭短謂之黜，無左右臂謂之子子，其義並相通也。

是條《疏證》中所舉表示「短」義之黜、矮、楹、「並字異而義同」，又窳、顛、儗「義亦與黜同」，又有楹、蠖等，並為一個詞族，此一詞族表示同一義。

#### (四) 其他所發明的詞族

《疏證》所發明的詞族很多，又在「凡言」的冠詞下例舉了一些詞族：

##### 1. 有稍加論證者

「凡言幾者皆微之義也」，見卷四下「幾，微也」條《疏證》。是條中之幾、仇、噉、璣、鐵為一詞族。

「是凡言蕭者皆衰之義也」，見卷二「蕭，衰也」條《疏證》。

「是凡與剗、剗二字聲相近者皆空中之意也」，見卷三上「剗，屠也」條《疏證》。

「凡言揮者其義皆與飛相近也」，見卷三上「翬，飛也」條《疏證》。此條之論證所得出結論，揚棄了字的形體，不再著眼於其得義之偏旁，而求其聲，有與「翬」同音者則義同。

「凡言窠者皆空中之義」。是謂與「窠」同聲之「科」、「窠」皆有「空中」之義。卷七上「窠，巢也」條《疏證》：「《說文》：『窠，空也。一曰鳥巢也。』凡言窠者皆空中之義。說見卷三『科，空也』下。」

「凡言呂者皆相連之意」，謂與「呂」有聲音關聯之旅、紹、柶為一詞族，皆有相連之意。見卷七上「柶也」條《疏證》。

「凡言堪受者即是容盛之義」，見卷三上「堪、龕、受，盛也」條《疏證》。

「凡言閃者皆暫見之義也」，見卷三「覩，見也」條《疏證》。



「凡言叔季者皆少之義也」，見卷三上「叔、季、幼、稚、孩，少也」條《疏證》。

「是凡言紘者皆系束之義也」，見卷三上「紘，束也」條《疏證》。

「凡言藿者皆聚之義也」，見卷三下「聚也」條《疏證》。

以上所引《疏證》的例子可以證明，「凡言」是指有聲音聯繫的詞，這些詞雖然寫法不同，但通過聲音這一紐帶可以求證其是一個詞族。既是一個詞族，就有血緣關係。

## 2. 其它冠以「凡言」而發明的詞族：

凡言角者皆有獨義也。

凡器之鼻謂之紐。

凡言聞者皆大開之貌。又：舸者洪大之稱，門大開謂之聞，大杯謂之聞，大船謂之舸，義相近也。

凡言幪者皆障蔽之意，衣蔽前謂之幪，床前帷謂之幪，車裳帷謂之幪，幪謂之幪，其義一也。

凡器足謂之樹，樹之言跗也。跗，足也。

瑕者，赤色之名，赤云氣謂之霞，赤玉謂之瑕，馬赤白雜毛謂之駮，其義一也。

凡言嬾者皆齊平之意。

凡鐵之空中而受柄者皆謂之盞矣。

鑿者銳末之名。

杷為掎聚之名也。

笙者精細之名。

紫者銳末之名。

龠者中空之名。

凡物之短者謂之矧。

凡言霈者皆中空之義。

凡言慙者皆惡之義。

凡言厲者皆惡之義。

凡與琴同聲音皆有禁義。

凡與暉同聲者皆有光明之意。

凡言黎者皆遲緩之意。

凡言攬者皆銳之義。

凡言踦者皆在旁之義。

凡言南者皆任之義。

凡言角者皆有觸義。

凡言闕者皆止之義。

凡言朔者皆復蘇之義。

“凡言”者，所有一例也，顯然王念孫希望通過聲音這一紐帶來建立漢語詞與詞之間的關係。

## 四、結論

### (一) 漢語言有其規律，其規律是以語音為紐帶

漢字難寫難記，號稱難學。然而不識字的孩子，沒有學過語法，就已經能夠說許多話，掌握好多辭彙，表達很豐富的思想內容。這說明漢語言必定有其內在的規律，無論是語音、句法還是辭彙，都有某種模式。而這種模式卻又是很簡單，應用性很強的。也證明人們在學習語言的時候，首先是從語音開始的，以語音為線索，進而掌握辭彙。辭彙的掌握依賴於聲音。

從語源學的角度來考察漢語，也應該是語言的表達在先，文字的產生在後。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語言便相隨產生了。漢語言的產生肯定要比漢文字的產生要早得多。甲骨文是我們現在所知最早而且已經成爲一個體系的文字，它對應于殷商時期。這樣就產生一個問題，從元謀猿人或者更晚一些的北京山頂洞人，直到商代產生甲骨文字之前的幾十萬年之間，我們的祖先是怎樣進行感情交流的呢？僅僅依靠手勢語的交流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借助於聲音語言，即言語。一個人的言語如果要使別人能夠理解，他所發出的聲音，聲音所要表達的意思，一定要遵循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規律。一個人要成爲社會中的一分子，他要與社會相交流，他所發出的聲音及所要表達的意義，應該是社會公認的。要實現這一目的，對於言語的要求必然是，以聲音為紐帶。也只有以聲音為紐帶才能够形成爲既為社會所公認而且最爲簡捷的交流之路。

從辭彙數量的增加來考察，必定是由少到多，在此增加的過程中，後

來新增加的詞必定與原來的詞發生聯繫。一方面是字的形體上的聯繫，比如同一偏旁的筆畫的增加。但是這種方法增加的數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則是字的聲音上的聯繫，顯然，依從這一條道路更加寬廣，所造成的字更多，更加不受形體的限制，可以更好的適應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的需要。

## （二）王念孫的詞族研究是漢語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王念孫之前就已經有人開始了詞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劉熙的《釋名》。但是劉熙的研究僅僅是模糊的感覺到了一些什麼，並不能認定其已經進入了自覺的科學的研究。清代有王念孫之師戴震明確的提出漢語的研究之中，應該於聲音義之中，以聲音為紐帶。但是他的研究也只是指出了方向。與王念孫并稱的段玉裁在詞族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只有王念孫才對形音義三者之間的關係清理出了一個明晰的線索，並且以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例證來予以支援，論證了在漢語中有大量的詞族存在。王念孫對詞族的研究說明他在試圖尋求語言的內部規律，企望描繪出以聲音為紐帶的一種基本的模式。

雖然王念孫在進行詞族的研究，但是，他並沒有使用諸如“詞族”這樣的詞語，也沒有從自己對於詞族的研究中提煉出更多的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或者使其更加明晰化。

## （三）王念孫的詞族研究，尚有很多開發空間

我們對於王念孫所進行的詞族研究還沒有很好地展開研究，還有許多課題應該去做。王念孫要建立的是一個龐大的體系，這個體系依靠他的所有著作來支撐。本文所涉及的僅僅是《廣雅疏證》一書，僅僅是其著作中的一個小部分，僅僅涉及其語言研究體系的一個側面。同時，本文的研究，也僅僅是初步的，帶有探索性質。從這一意義上說，對於王念孫的語言成就之研究，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去做。

## 參考書目

1.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
3. (清)王先謙補正：《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4.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
5. (宋)陳彭年、丘雍編：《宋本廣韻》，北京，中國書店，1982年影印。
6. (清)王先謙集疏，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
7. (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中華書局，1986年版。
8. (清)王引之撰：《經傳釋詞》，中華書局，1956年版。
9. (清)王念孫撰，羅振玉輯印：《高郵王氏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 (清)王念孫撰：《讀書雜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 (清)王引之撰：《經義述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2. 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版。
13.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 周大璞：《訓詁學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 丁聲樹編錄，李榮參訂：《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
16.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版。
17. 張君和選編：《張舜徽學術論著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8. 徐複主編：《廣雅詁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9. 趙振鐸：《讀廣雅疏證》，《中國語文》，1979年第4期。
20. (英國)尼爾·史密斯、達埃德爾·威爾遜著、李穀城等譯：《現代語言學〈喬姆斯基革命的結果〉》，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3年版。
21. 胡繼明：《〈廣雅疏證〉研究同源詞的成就與不足》，《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22. 張令吾：《王念孫〈釋大〉同族詞研究舉隅》，《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3月。

# Observation to Wangniansun's Study of a Family of Words from Revision and Replenishment of Guangya

Xu xing hai

## 【Abstract】

Wangniansun was such an important figure whose book was regarded as the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 He definitely put forward that the study of sound should be the main clue when we made research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 and its form and sou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atus of sound has been emphasized so strikingly. Revision and Replenishment of Guangya wa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books of hi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 In this book he first made a concentrated discuss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nd and the explanation of words in ancient books and also first made a detailed focus on the phenomenon of a family of words which was formed by Chinese diction through the ties of sound. by doing this he provided a particular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valuated Wangniansun'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a family of words which was posed in Revision and Replenishment of Guangya.

**Keywords :** 《廣雅疏證》 Revision and Replenishment of Guangya

詞族 a family of words

訓詁學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

訓詁 explanation of words in ancient books

漢字 Chinese character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44卷 頁159-182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年7月

## 彈詞小詞《天雨花》的女性書寫特徵

朱我蕊\*

### 【提要】

彈詞小說《天雨花》作於清朝康熙初年，原序中有女性作者陶貞懷的署名。其序後經學者考證為偽作，陶貞懷的作者名因而被推翻。但據此並不足以排除作者為女性的可能。國內彈詞研究學者胡曉真所建構的女性彈詞文學史，以乾隆年間所作的《玉釧緣》為第一部可知的女性彈詞小說。鮑震培二〇〇二年甫出版的《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中，根據外證，推論《天雨花》作者為浙江無錫的女作家，但並未針對文本考察其書寫的性別特徵。

本文根據文本分析，考察《天雨花》的書寫策略，認為作者有意藉由女子的義勇精神、才學智巧，與以理服人等特質，塑造女性自主的形象；又透過一夫一妻家庭模式的安排，以及對男權借禮教之名行鉗制女性之實的揭發，意圖補償女性在現實文化秩序中欠缺的尊嚴，宣揚兩性互等的理念；作者且細膩記述女性的思維觀點、日常生活、身心變化、母姊情誼，及戀愛婚姻等，全面呈現了女性的人生體驗與生活面貌。綜觀其書寫策略，高度符合於女性主體發音、女性自主意識、女性觀點見解、男女主客變易、書寫自我體驗等女性書寫特徵；也具備了胡曉真所歸納的明清女性彈詞傳統所慣有的女性英雄、家居生活、母女關係、才子佳人等題材要素。本文足以為鮑震培所提出《天雨花》作者為女性的推論提供內證，則明清可知的第一部女性彈詞小說，即可由《玉釧緣》推前百年為《天雨花》。

**關鍵詞：**彈詞、《天雨花》、陶貞懷、女性書寫、性別認同

\* 僑光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專任講師、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 一、前言

「彈詞」是一種「講唱文學」<sup>①</sup>形式，起源於佛家的「變文」<sup>②</sup>，明清至民初流行於以吳地為主的江南諸省。彈詞於書場表演時，由一至三個演員以三弦或琵琶伴奏，多以第三人稱手法敘事，唱段韻文與口白散文交錯「連用」<sup>③</sup>，韻文部份以七字體為主，間有加以三言的「襯字」。

明清時的吳地，社會經濟文化繁榮，人口因經濟活動而向城鎮集中，市民收入增加，且緊張的生活節奏有調節的需求，文化消費因而出現新穎、多元的變化。彈詞的風格多細膩纏綿，不論是經年累月的彈詞演出，或長篇累牘的彈詞小說閱讀，皆迎合當時男女市民每日消遣的需求，更是終日閒居在家的婦女打發餘暇的最佳娛樂，因而成為當時吳地婦女文化生活的重心。彈詞演出的繁榮，也進一步激發了知識女性的仿效創作。這一方面是因為明清的閨秀詩歌創作空前繁榮，女詩人於作詩之外，容易跨文體寫作類似七言詩體的七言韻文體彈詞；一方面則由於當時女性的彈詞創作群體正逐漸凝聚，因而激發了個別知識女性追求敘事創作的自主意識。

討論彈詞須先釐清「實際演出」與「案頭閱讀」兩種不同功能的分途定名問題，周良建議將「這種在彈詞作為說唱已經流行之後出現的仿作，即並非為演唱而作，寫作後也並未演唱過」的作品，仿魯迅稱文人仿作話本小說為「擬話本」的方式，稱為「擬彈詞」<sup>④</sup>，以與演出的「彈詞」有所區別。胡曉真則整理鄭振鐸、李家瑞、趙景深、阿英等學者的彈詞分類，歸結彈詞為兩種：一為可供演出的「唱詞」；一為僅供閱讀的「文詞」。胡

① 「講唱文學」是韻散兩種文體交織而成，演出時且說且唱，且必定為敘事體。有關界定詳見葉德均著：《戲曲小說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下冊，頁625。

② 「彈詞」一詞，最早見於明萬曆間臧晉叔所刻元末楊維禎的《四遊記彈詞》，其中《仙遊》、《夢遊》二錄序說：「若有彈詞，多警者以小鼓拍板唱於九衢三市，亦有婦女以被絃索，蓋變之最下者也。」引見阿英著：《小說二談》，《小說閒談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83。

③ 所謂「連用」是指韻、散的敘事功能連接，其中韻文不只是為歌唱，也是不可缺少的敘事部分，而非如鼓子詞、諸宮調的韻散敘事重複（「複用」）。詳見葉德均著：《戲曲小說叢考》，下冊，頁629。

④ 「擬彈詞」之稱，最早見於周良：《蘇州平彈舊聞鈔》（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良另於〈評彈稱謂辨析〉（《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學報》，第17卷，第2期，2000年6月，頁85）亦論及此。胡曉真曾談到美國學者 Nancy Hodes 於1990年「創造了自己的術語『擬話本』（simulated tanci）」（見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3期，1995年8月，頁54），其實周良早於1983年即有此稱。

曉真將「文詞」類的彈詞專名之為「彈詞小說」<sup>⑤</sup>，並獨立為一文類，視為書面敘事文學的一種，本文沿用之。由於彈詞小說的創作者及閱讀者均以女性為多，因此胡曉真稱彈詞小說為「象徵性的女性文學」、「被賦予了性別的文類」。<sup>⑥</sup>此性別屬性與其通俗文學的文體地位，注定了彈詞小說在文學史中被邊緣化的命運，歷來研究者如鳳毛麟角，台灣最受矚目的彈詞研究者為胡曉真，自 1995 年以來，持續從女性文學的視角進行彈詞系列研究。由於胡曉真到目前為止的研究大抵以女性執筆的彈詞小說為主，因此如《天雨花》這部原序中有女性作者陶貞懷署名，卻被鄭振鐸、阿英等學者考證原序為偽作的清初彈詞小說，胡曉真至今並未列為研究對象。

⑦

《天雨花》為清代極受歡迎的彈詞小說，清人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引《閩媛叢談》語云：「(《天雨花》)一韻到底，洵乎傑作也。」<sup>⑧</sup>讚譽《天雨花》作者的文才驚人；蔣瑞藻又引述乾隆詩人陳文述〈西泠閩詠〉所云：「『南花北夢，江西九種』，梁溪楊蓉裳農部語也。『南花』謂《天雨花》，『北夢』謂《紅樓夢》，謂二書可與蔣青容九種曲並傳。」<sup>⑨</sup>時人以《天雨花》與《紅樓夢》及蔣士銓的《藏園九種曲》<sup>⑩</sup>相提並論，由此可知《天雨花》所受歡迎。

《天雨花》署名陶貞懷所作的原序固然已考證為偽作，但並未足以推翻作者為女性的可能。鮑震培二〇〇二年甫出版的《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推論《天雨花》作者應是浙江無錫的才華女子，而陶貞懷則為其筆名而非真名。<sup>⑪</sup>但此外證的推論尚未有針對文本書寫特徵的分析以為印證，本文因而擬細究文本，分析《天雨花》的性別書寫特徵，以與鮑震培

⑤ 「彈詞小說」一詞清代即有，阿英也曾使用，但並不專指供閱讀的案頭作品，而與「彈詞」一樣是為泛稱，胡曉真則用以專指只供閱讀的案頭彈詞。詳見胡曉真：〈才女微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頁 53。

⑥ 胡曉真：〈才女微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頁 59。彈詞研究者胡曉真、許周鶯都認為，女性創作彈詞是有意識的文體選擇，因為女性「因缺乏閱歷、視野狹窄，無力與男子詩文詞章相匹敵，難以在文壇上佔據應有的地位。」（見許周鶯：〈論明清彈詞文化與吳地婦女〉，《蘇州大學學報》，1996 年，第 2 期，頁 98），因此「自創不同傳統，以求跳出男作家早已掌握的（白話小說）形式」（胡曉真：〈才女微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頁 59）。

⑦ 胡曉真根據鄭振鐸否定《天雨花》作者為陶貞懷的說法，認為《天雨花》作者為女性的說法不可靠，因而未將之列於女性彈詞作品加以考量。（胡曉真：〈才女微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頁 55）

⑧ 清·蔣瑞藻撰：《小說考證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卷一。

⑨ 引同前註。

⑩ 藏園為蔣士銓之號，其所著九種曲，包括《臨川夢》、《冬青樹》等。

⑪ 鮑震培撰：《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天津：天津社科院出版，2002 年版），第 232-237 頁。



的推論相為佐證，則《天雨花》作者為女性的論點即可確立，而胡曉真所提出《玉釧緣》（約 1770 年以前作）為已知最早一部作者為女性的彈詞小說的說法，便可推前到康熙初年（1661-1680）成書的《天雨花》。<sup>12</sup>此《天雨花》作者的性別論證，對於明清女性彈詞小說史的建構，實具有關鍵性意義。

## 二、《天雨花》的版本與作者問題

《天雨花》的版本，據李平查證，共有六種，最早為嘉慶九年（1804）遺音齋刻本。<sup>13</sup>李平考量各種刻本的疏漏誤謬，最後取六種中的商務印書館鉛印本與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書局石印本為主要依據，並參校道光二十一年（1841）宏道堂與同治六年（1867）緯文堂兩種刻本，編校成《天雨花》，收入由趙景深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出版的《中國古典講唱文學叢書》。該本不分卷三十回，七至十二言聯目，前有梁溪陶貞懷於清順治辛卯（1651）年作的自序。今存另有四卷六十回本，七至十二言聯目，前有一九三四年南匯朱太忙序，無陶貞懷自序，為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標點本，收入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中國通俗章回小說叢刊》。本文考量內容的完整性、刊印品質，及韻、白字體清楚區隔等因素，選擇以李平編校本為依據，以下凡引用該書情節或引文，皆直接標註冊數及頁碼於後。

關於《天雨花》的作者，歷來有四種異說：一、梁溪陶貞懷（據遺音齋刻本（1804）自序）。二、浙江徐致和太史（據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引《閩媛叢談》）。三、浙中閩秀某（據孔廣林嘉慶五年（1800）《女專諸》雜劇序）四、江西安福縣女子劉淑英<sup>14</sup>。以上四說中，以陶貞懷一說的流傳最廣，但據阿英〈讀《天雨花》舊抄二十六回本札記〉<sup>15</sup>及李平編校《天雨花》前言的辯証內容，已知署名陶貞懷之自序確為偽作。李平

<sup>12</sup> 胡曉真根據研究《玉釧緣》的多處證據，而將鄭振鐸所說《再生緣》是所知最早女性彈詞小說的說法往前推為《玉釧緣》。（胡曉真：〈閱讀反映與彈詞小說的創作——清代女性敘事文學傳統建立之一隅〉，台北：《中央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1996年3月，頁319、324、325）

<sup>13</sup> 見李平編校：《天雨花》，《中國古典講唱文學叢書》（趙景深主編，河南新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前言，上冊，頁7。

<sup>14</sup> 此說由熊德基提出，見《〈天雨花〉作者為明末奇女子劉淑英考》，《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4輯。

<sup>15</sup> 見阿英撰：《小說二談》，頁179。

認為「陶貞懷」應為作者的化名，因為彈詞的前身即宋代的「陶貞」<sup>16</sup>，作者既借「陶貞」這種文體寄託情懷，故而化名「陶貞懷」。至於另三種的作者說法，李平認為都有難以立足之處，因此對於《天雨花》的作者性別及姓名問題，並未作出確論。<sup>17</sup>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對於《天雨花》的作者問題作了更精闢的考辯，他推翻了「浙江徐致和太史或某男化名」與「江西其女子劉淑英」的兩種可能，並根據嘉慶五年（1800）孔廣林最早提出《天雨花》作者為「浙中閩秀某」的說法，以及嘉慶九年（1804）遺音齋刻本原序中「梁溪陶貞懷」的署名，認為《天雨花》作者為浙江無錫（別名梁溪）人文薈萃之地的女性作家，由於當時彈詞作品尚未有署名的習慣，且地方縣誌中也未有關於陶貞懷的姓名線索，因而陶貞懷為其筆名而非真名。<sup>18</sup>

至於《天雨花》的創作年代，據李平推測應在康熙初年（約1661-1880）。因作品中每以黯淡心情哀歎朱明政權氣數已盡，而對照明末抗清的思潮確實延續至順治末、康熙初，作者的匿名正符合此時代特徵，因清兵南下之初，奉行高壓政策，作者不能不有所顧忌，直到康熙中後期，施以懷柔政策，才出現如《桃花扇》敢於具名頌揚史可法抗清死節之作。李平也進一步認為《天雨花》作者應是對晚明官場政治與士大夫家庭生活有一定熟悉程度的貴族遺民，親身經歷明清交替的變局，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同樣痛恨奸權誤國，哀傷民族不幸，因此藉由東林黨人的角色，回顧亡朝歷史。<sup>19</sup>

以上學界前輩有關《天雨花》作者與創作年代的立說精闢，尤其鮑震培浙江無錫女作家的作者新說，以及李平對作者出身晚明官宦家庭的分析，足為本文研究的基礎。以下將從文本內部分析其鮮明的女性書寫特徵，以為《天雨花》作者為女性的說法提供更堅實有力的內證。

### 三、《天雨花》的女性書寫特徵

<sup>16</sup> 「陶貞」，亦作「陶真」，為宋時由變文演變而來的七言體，即「彈詞」的前身。在宋代與「評話」的區別在於「陶貞」為唱說兼施，擊鼓以助興；「評話」則以白話道說，不事談唱。

<sup>17</sup> 有關李平對於《天雨花》作者的詳細考證，見《天雨花》，上冊，頁1-3。

<sup>18</sup> 鮑震培撰：《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天津：天津社科院出版，2002年版），第232-237頁。

<sup>19</sup> 以上有關《天雨花》創作年代及背景，見《天雨花》，前言，上冊，頁8。

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究竟是男性作者筆下的「被講述者」，或為女性作者在性別立場上的自我表述，其實在形象的塑造上便可見端倪。也許我們不能說凡是符合貞潔、賢淑、柔順等傳統男性視角的美好女子形象，皆出自男性手筆——因為那種形象在男權主宰的社會中已成為一種絕對的評價標準，即使女性作者也可能遵循此主流價值觀以品評自我性別；但是，反男性傳統視角的女性形象——比如說勝過父權與夫權的智慧與勇氣、違反禮教猶給予正面評價的女性形象，以及打破女性與男性之間歷來穩固不變的「客體」與「主體」，「從屬」與「自主」的兩性關係等等——卻不太可能出自男性之筆。陳曉蘭〈女性：作為話語的主體〉一文說：

許多男性大師真誠地關心婦女、同情婦女。然而，不論是其男性身分影響著他們對女性的認識與理解，抑或是他們所採取的實際的表現手法，都事實上依然使婦女成為被描述的對象，審美的客體，男性某種概念、情感的載體，成為沒有所指的「空洞能指」，沒有話語權力的傀儡，因而，女性事實上依然處於沉默狀態。

……沉默之打破只有在女性作為婦女講述、成為話語的主體而自我言說時才有可能。<sup>⑩</sup>

「打破沉默狀態」的女性角色描寫，既然只有在女性作為話語的主體時才有可能，則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否能突破男性社會的傳統價值觀，便成為作者性別推論的重要依據。即以中國男性文人筆下女性形象較為突出的作品為例，六朝宮體詩對女性軀體姿態細緻摩寫，其以女性為物、為審視對象的男性視角自不待言；就連北朝樂府〈木蘭辭〉寫木蘭的英勇沉著，末尾仍需強調木蘭對溫婉女兒身份的復歸，以迎合男性的主流價值觀。男性詩人在代言體的詩歌中，得以佈置一種女子自我表述的形式，較為貼切的呈現了女性的心思，如李白〈長干行〉寫少婦在季節流轉中的細膩深情，杜甫〈新婚別〉寫新嫁娘以愛情堅定丈夫的鬥志等等，但這些詩中的女性，生命悲喜全然依繫於丈夫，全篇儘管是女性第一人稱的敘述，但卻是「客體」身份的敘述，一如所有的閨怨詩中的思婦，其實都只是依附征夫、遊子等「主體」而得以相對存在的「客體」。再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蓮，雖佔有重要篇幅，但卻是作為審視明代淫風亂俗的對象；〈紅樓夢〉中十

<sup>⑩</sup> 陳曉蘭著：〈女性：作為話語的主體〉，《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237、240。

二金釵的情性雖各有鮮明細膩的刻畫，卻都是從屬於賈寶玉的客體。以上這些突出女性形象的男性作者，儘管有些對女性命運是發自真誠的關懷，但都不免呈現將女性物化、對象化、客體化的男性中心的書寫特徵。

《天雨花》中致力刻畫的主要角色左儀貞，其智勇雙全，以理服人，顛覆禮教，克勝父權的女性形象，突破了傳統男性社會對女性的頌揚標準；其生命自主，使父親、丈夫相對成爲從屬客體的兩性關係架構，也迥異於男性作者的書寫特徵。《天雨花》的女性形象塑造與兩性關係架構，突顯了左儀貞的角色是作爲婦女而自主性的說話，打破了男性筆下女性的「主體沉默狀態」，鮮明指向敘述主體是爲女性的最大可能性。

以下詳細分析《天雨花》中左儀貞的形象塑造，以明其突破傳統男性視角的觀點，以及顛覆男性中心的書寫中，以男性爲「自主」、「主體」，女性爲「從屬」、「客體」的兩性關係。

## （一）塑造女性自主形象

### 1. 女性為勇行義

《天雨花》的中心人物在儀貞，明顯是作者做爲「自我呈現」(Self-Representation)的人物形象。她出身官宦富貴之家，不僅姿容出眾，文學才藝無所不能，且言談犀利，機變智巧，尤其富有正義感，不畏威權，勇於爭辯，甚且捨己爲人，無懼犧牲，只要她認爲合理當爲之事，即使身受鞭笞亦執著無悔，因而在理學盛行的年代，幾度觸犯名門閨秀的嚴格教條，而與作爲道德禮教化身的父親左維明發生衝突，情節因而迭生波瀾，左儀貞鮮明的義勇形象也益發得以突顯。

如第十三回，寫她與姊妹違背父親告誡私遊花園，事發之後甘願承當主謀角色代人受過；第十四回，爲救援在晉家備受婆婆虐待的堂姊孝貞，擅私自改父親的信件，左儀貞也有「縱然查出其中弊，拚教責罰我擔承」（中冊，頁 531）的負責心態。同十四回，又寫左儀貞隻身刺殺圖謀篡位弑君的奸臣鄭國泰，大罵奸臣道：「我今日慷慨前來，將匹逆鱗而蹈白刃，如國家有福，奸臣死儀貞之手……」（中冊，頁 556）儘管左儀貞義勇行刺的描寫不免有所誇飾，但正可看出作者有意讓不凡的女子承擔忠國除奸的大任，以反駁國家大事唯有男子足以勝任的傳統觀念。第二十二回，寫左儀貞私自釋放被父親囚禁於後花園的母親後，父親大發雷霆，將以戒尺對

女兒痛加懲處，左儀貞卻面不改色，說之以理，最為精采：

孩兒今日之事，實難辭責；但父親若是鎖別人，孩兒不敢這般大膽。怎奈鎖門的是父親，被鎖的便是母親，而若坐視母難，倘或母親責備起來，卻何詞以對？今日違逆父親，現蒙責備，兒亦無辭。惟是非曲直，極待爹爹分割明白了，再責儀貞，亦可使長些學問。若說以長臨幼，以強為勝，則今日之事，是父強母弱。萬一母強父弱，爹爹竟被鎖在園中，孩兒還是開門的是，不開門的是？（下冊，頁 888）

這番辯辭，姿態是柔性有禮的，內容卻是據理而勝的，尤其「萬一母強父弱，爹爹竟被鎖在園中」的設問，在想像中構建了統治男權有朝一日崩解的情勢，更是尖銳挑戰了傳統社會中男主女從的關係架構。彈詞中盛怒父親對此質問啞口無言，體罰也因此偃息，如此的情節發展透露了作者的別有用心，顯然作者是有意藉由一位精明幹練的朝臣對女兒膽識的「臣服」，表現對女子見義敢為精神的欽重，以及當女性主體發音時的巨響恢弘。又如第二十四回，寫婆婆虐待秀貞，還打算出賣媳婦以換錢財，儀貞、德貞、靜英等姊妹接續怒罵秀貞婆婆，以為秀貞出不平之氣等等，凡此皆可看出《天雨花》作者是有意且成功的塑造了女性群體的義勇形象。

作者給予左儀貞等女性角色仗義直言的發音權，在幾次與嚴峻禮教或邪惡勢力的衝突中，她們秉持正義，不畏威權，濟弱扶貧，對社會的實質貢獻，其實是作品中所有位高權重的男子所比不上的。作者如此刻意突顯女性義勇形象的書寫策略不容忽視。

## 2. 女性才智為美

傳統禮教思想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傳統才子佳人小說總強調女子的貞順、美貌，或耐勞，才能得到男子的愛情，擁有幸福的人生。《天雨花》對於女性角色，儘管也有「冶容堪絕世」、「花容美十分」等關於外貌的形容，也以「貞靜幽閑」讚許女子的德性，女子也有「誣人名節好傷心」的委屈，甚至當奸惡上門逼婚之時，儀貞母親竟命丫頭：「通報小姐，令其盡速自盡。」（中冊，頁 548）但這些都只佔全書輕微的份量，作者顯然對於幾個主要的女性角色，更費筆墨強調的是她們的熟讀詩書，精通辭賦，從左維明的妻子桓清閨、女兒左儀貞、德貞，姪女秀貞，到御史黃持正之女黃靜英等皆然。情節發展中也常穿插眾家女子所作詩文書信，展現女子才學。其中最為突顯的是左儀貞的文才，她六歲即能為小詩對句，八歲時

熟諳書史，下筆成文，十三歲代父親草擬文稿，掌管書信，於琴棋書畫亦無所不能。有次她為維護行為失檢的兄弟，也寫下題贈妓女的詩篇，後被父親發現而怒罵，但父親心下也不禁稱許：「蓋因妮子才甚敏，所以她身不怕人。」（上冊，頁 368）當年輕的桓楚卿心儀左儀貞時，他欣賞她的是：「貞靜幽閑沒處尋，錦心繡口才如海，百家諸子盡皆能，行藏舉止多似父，佔斷乾坤第一人！」（中冊，頁 430）著重的也是她的才情與博學；後有丁九與桂香欲設計構陷儀貞時，對儀貞其人的描述為：「花前一笑花無色，月下行來月掩明。幼年她父親教學，狀元鼎甲作先生，詩詞歌賦般般會，品竹彈絲件件精。醫卜星象通皆曉，天文地理盡分明。迷鸞刺鳳無不妙，九流三教盡知聞。」（中冊，頁 502）這些讚譽除了指其美貌與巧藝之外，主要誇美的仍是她良好的教育與廣博的學養。此外，作者還對儀貞的機變智巧多所著墨，使她成為高潮起伏情節中，解救危機的關鍵人物。如第十四回寫鄭瑤仙率眾晉左府搶人時，母親姊妹一再勸儀貞切莫出面現身，但儀貞卻能冷靜思考，分析情勢：「不好，那狂父既擁多人，帶刀懸斧打進門來，已是個必搶之勢；母親若是知機，只該與她謙恭異順，緩退其師，方可再生良策。誰知一時按捺不定，竟與反面起來。既反了面，必無善退之理。如今沒奈何，只得待我自送出去，與她搶去罷了。」（中冊，頁 548）最後她果然憑藉著勇氣與謀略安然脫險。

《天雨花》不但沒有「才德相妨」之類窄化女性的思想，甚至書中還多處借傳統禮教化身的官宦男子之口，稱道女子的才學智巧，透顯作者以女子才智為美的用心。如第一回左維明初拾桓清閨遺落之扇，見其扇上題詩〈牡丹吟〉，便讚歎道：「我思女子之中，若通些文藝，畢竟脫俗，就是不美，自有一種文雅可觀，料不是油鹽醬醋的惡氣，必然言談舉止，都帶些林下清風。」（上冊，頁 23）左維明對女兒儀貞，表面上雖常訓以《禮記·內則》之類的禮教規範，告誡云：「機械巧偽非女德，賣弄聰明豈可稱？」（中冊，頁 533）但其心中卻不免常驚讚女兒的敏智聰慧，如第十八回，寫左維明讀了女兒代表妹所寫贈別詩後的反應：「左公目視儀貞女，暗思妮子太聰明……」（中冊，頁 711）第十二回，左維明考量楚卿與貞儀的婚配，擔心的竟是：「桓郎才貌盡堪稱，嫌他情性多柔懦，不及吾兒智術深。」（中冊，頁 432）第七回，左維明對夫人說起儀貞：「質地非凡是性成，千伶百俐多機變，心性剛強氣又英，能言快語兼有意，天賦聰明此女身。」（上冊，頁 268）第十五回，十八歲的儀貞為暗殺奸臣鄭國泰而入

金鸞殿，滿朝文武先是因她的艷色明姿而驚呆，後又爲她「腹內文才海樣深」（中冊，頁 566）而稱奇。

這些關於儀貞才學智巧的推崇，篇幅遠多於其容貌、貞潔或德性的描述，說明了作者對於女性的評價視角，並不依循傳統社會的男性觀點。其差異的意義在於，女性的才學智巧，是其主體得以覺醒並發音的有利條件，也是塑造自主形象的憑藉；而傳統男性觀點對女子外貌、貞潔或德性等的看重，則是將女子物化、對象化、客體化的審視視角。藉由這兩種視角的比較，彰顯了《天雨花》的作者珍惜女性才智，成就女性自主的用心。這種用心上承了明代才女梁小玉在〈古今女史序〉中爲女子所說的道話：「夫無才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論。」

### 3. 女性有理得勝

《天雨花》中，許多女性或因性別，或因出身，或因性格而屈居弱勢，而身受父權、夫權、惡權等男性威權的壓制或迫害，但作者讓這些弱勢女子凡在理字上站得住腳的，終能獲致勝利，得以改善境遇，或洗刷冤屈。如第二回寫鄭國英仗勢調戲江湖女，江湖女將他拳劈面打，四位公子喝責道：「妳們不過是江湖上賣技之人罷了，怎敢這般大膽？」江湖女反駁道：

清天白日，調戲閨女，便告到皇帝座前，只怕也說我們打得有理，你們這些讀書人都走開些，不要來之乎者也，可知姑娘的拳頭，是從來不認得貴人的。  
（上冊，頁 68）

這段犀利的言辭，藉由既爲賣藝的低下階層，又身爲女性的雙重弱勢主體發音，揭示了有理得勝的崇高價值觀，超越了知識份子爲貴、賣藝人爲賤，男性爲強、女性爲弱的主流社會觀，說明作者否定既有威權的意圖。又如第二十八回，寫王禮乾的陰謀強娶，孫玉仙即使被施以鞭笞暴行而「鞭痕滿面流鮮血」，也不願屈從，終得左維明出面解救。第二十九回，左維明爲懲處出嫁後虐待婆婆的女兒婉真，逼迫她投河，左儀貞諷刺父親：「爹爹便做人中虎，也合山中去吃人。不應踞坐家門內，兼之但吃自親生。兒等兄妹人四個，哪夠爹爹幾次吞。」（下冊，頁 1204）在存活有理的理據上，儀貞居於優勢地位，反擊了父親以禮教爲名而過度嚴懲子女的作爲。

《天雨花》中的女性角色執理不讓，因此居於高度說服力的位置。結合前述義勇、才智的形象，而與男性作者筆下的女性角色相比，《天雨花》中的女性，不是一種被描述的對象、審美的客體，或男性某種思想觀念的

載體，而是能夠憑藉理智，爭取優勢，不再緘默，能自主行事的主體。如此書寫策略，透露了女性的寫作視角與性別觀點，與男性話語操縱下所呈現女性角色的傀儡形象大不相同。

## （二）維護尊嚴的兩性關係

### 1. 婚姻中的女性尊嚴

《天雨花》對女性受婚姻戕害的描寫亦多，如第二回，寫董蘭卿因父親熱衷於追求名利，將她視為累贅，竟不顧未婚夫病勢垂危的現實，將她嫁出「冲喜」，沒想到新郎就在洞房花燭夜身故，董蘭卿從此成為寡婦，受盡婆婆凌辱，最終哭訴無門而投環自盡。又如左儀貞的母親桓清閨，儘管她的丈夫左維明是清正廉明的士大夫，剛直不阿，潔身自好，又樂於為人主持公道，但對自己的妻子卻以禮教嚴酷控制，視妻子為附庸、囚人。因為她婚前的一場春日遊園，遺落了一把題詩扇，左維明因而有緣見識她的才華與美貌，並愛慕而提親；但婚後他卻始終不能原諒自己的妻子未婚時拋頭露面的出遊，甚至大意遺落扇子，遭他人撿拾。他婚後多次以此事訓斥妻子，不讓她再出門遊春：「遊山玩水男子事，內家豈可外邊行？吾門世代無此例，從無婦女出閨門！桓家小姐今歸我，自合吾家禮要遵。」甚至當桓清閨已是兒女成群的中年婦人時，有一次到自家花園賞春，左維明也怒冲冲地將她反鎖在漆黑無人的荒園之中。左維明對妻子的嚴酷控管，反映出當時即使是知識份子的家庭，妻子也只被視為傳宗接代、生兒育女的工具，妻子儘管物質生活優渥，但精神上卻空虛鬱悶，自主性幾被剝奪。

若說《天雨花》藉由婦女在婚姻中所受的折磨，控訴婚姻對女性的箝制與殘害，則書中宣揚的一夫一妻制，便是對婚姻中女性尊嚴的挽救與維護。《天雨花》精心安排了一種邏輯概念，即凡書中的正人君子，概不納妾。如第四回，寫主要人物左維明既不狎妓，也不納妾，甚至老夫人命婢女魏桂香為其侍妾，桂香也心嚮往之，維明還力抗母命，不願接納。可憐桂香一片癡情，只得作計使維明醉酒，再假冒左夫人之身與維明同寢，詐使為妾一事既成事實，結果事後竟遭維明踢打施刑，嚴正訓誡。這種藉由男性主角的意願，而對一夫多妻制表現激烈違抗的書寫策略，是男性作者的書寫中所未曾得見的。又如第一回，寫山寨大人吳謀欲娶妾時，壓寨夫



人賽流星氣極詈罵大王：

流星一見重重怒，勃然直立跳翻身！銅鈴兩眼圓睜起，打掃雙眉行倒行。  
手指大王喝住了：「你既然押寨有夫人，如何又搶妖嬈女，放我夫人哪裡存？」  
大王聽說忙陪笑：「娘娘不必怒生嗔，此女搶來作偏妾，妳身只是正尊宮。」  
流星大喝：「休胡說！誰家強盜這般形？大妻小妾雙押寨，我娘娘容不得這樁情！」（上冊，頁 40）

這番說辭理直氣壯，展現了妻子自我闡釋的主體性，果然逼使大王退讓，爭取到婚姻中兩性互重的尊嚴。其後大王抓到杜公子假扮的民女時，又一次動了娶妾的念頭：

（大王）便道：「娘娘！這一個婦人，沒有方才的標致，妳容我納了罷。」  
賽流星聽了微微含笑，指著左公子道：「大王，你若容我納了這個男子，我便容妳納了那兩個婦人。」（上冊，頁 41）

這段說辭改以輕鬆反諷的口吻，以納男子作為丈夫娶妾的交換條件，傳達了兩性均等的婚姻觀。

《天雨花》作者似有意以納妾與否作為男子品行的評判標準，凡官宦男子之不納妾者，皆出於自制，鄙俗男子的納妾慾念則有賴正妻管束。作者一夫一妻的婚姻觀，打破了傳統社會夫主妻從的婚姻模式，賦予了為妻者掌有丈夫納妾的制約權，使她在婚姻中被箝制的自主性，得以稍有伸展的空間。

## 2. 禮教鉗制女性

《天雨花》中對於女子在家庭中受禮教制約甚至迫害的描述頗多。書中幾次詳敘了官宦家庭的女兒教養規範：「氣象安祥禮貌彬，端端正正來坐定，環佩無聲不動裙……昏定晨省於父母，退攻女事要勞動，尊前侍坐容和緩，肅然恭敬刻存心。」（下冊，頁 1022）如此行止嚴謹的教養規範自然不及於男孩。書中還多次指出《禮記·內則》的教條正是夫權、父權箝制妻、女的範本與依據，如第三回，左維明教訓妻子桓清閨云：「大抵凡為女子者，只宜韜藏深閨，不出中門。那《內則》篇中數語，必該凜遵方是。」（上冊，頁 98）第二十四回，寫左儀貞姊妹私下教訓虐待姊姊的婆婆，左維明得知後，盛怒責打，還命姊妹跪下背誦《內則》，若無法熟背，則要再罰，如此嚴苛的管教，連儀貞的丈夫桓楚卿都不禁抱怨岳父的處罰不盡人情：「這般教訓實難禁！既已打了堪抵罪，如何還要跪攻文？」

《內則》篇中言和語，盡言女德婦儀文。因她今日行差事，使讀該篇愧彼心。自然令妹不肯念，叫她何面可開聲？」（下冊，頁 974）楚卿以身為禮教約束之外的中肯姿態，為儀貞姊妹代言了被父親庭杖所禁制的音聲，也為沉重禮教枷鎖下的女性發抒了不平。

《天雨花》最慘無人道的情節，莫過於多起父親逼女投河自沉的慘劇，如第十二回，寫黃靜英收到表兄杜順卿愛慕的詩箋，其父黃持正不經調查即認定女兒與侄暗有私情，毒打不招之後，竟親押女兒逼令投河。第十四回，黃持正又因寵妾巧蓮與人私通，亦逼令沉入江心。第二十九回，寫左維明察知三女婉貞倚勢欺凌婆婆，亦以強迫女兒投池的絕命方式加以嚴懲。第十九回，丫環鳳樓冒充三小姐的身分而與王禮乾有染，事發後，左夫人認為鳳樓「罪不致死」，但左維明竟一怒之下，即命家將砍下鳳樓首級，供眾侍兒傳看，至於罪魁禍首王禮乾，除了幾句冷嘲熱諷的數落之外，卻未受任何懲罰。

以上有關禮教吃人的諸多情節，審判權與行刑權皆操之於父親或丈夫之手，為禮教而受鞭笞刑罰或至被迫沉水以死者，則全為女性；反觀與女子發生曖昧關係的男子，即使是主動挑逗或甚至施以脅迫的一方，亦安然而退，不受罰則約束，諷刺了禮教大防對兩性制約的極度不平等。尤可注意者，《天雨花》中死於禮教制約的女子，皆非自覺羞辱而主動求死，而是受手執禮教大法的男權逼迫使然，這點與男性作者筆下的失身女子多為自主尋死的書寫不同。《天雨花》藉由女子的頻繁慘死，控訴了男權社會以禮教為名，對女性生存自主權的強制主宰。

### 3. 男性政爭的犧牲品

《天雨花》敘事以晚明宮廷爭鬥為主軸，書中政客慣以美人計陷害政敵，身受脅迫者多為女子中的極弱勢者，如妓女、宮女，她們往往成為男性政治鬥爭的工具及犧牲品。如第九回，寫權相方從哲為消滅左維明，迫令妓女賈秀鶯冒充己女，而後殺之，反誣左維明以強姦不遂殺人之罪。又如第二十二回，寫權傾中外，威震乾坤的賊臣魏忠賢，唆使四宮娥刺殺左維明，致使四個無辜女子喪生，而幕後主嫌魏忠賢卻得皇親力保而留住性命，正是：「皇恩又赦魏奸臣，只杖四十仍閹割，宮女西曹身首分。」（下冊，頁 823）話語間反諷了強者對弱者的利用與操弄。第二十六回，寫魏忠賢的親信崔呈秀為趨奉忠賢，竟甘願驅使自己的侍妾巫娥、月妹設下圈

套，勾引左維明的兒子、女婿等五人，結果計謀被左維明識破，崔呈秀沒事，巫娥、月妹卻被縊死，作了犧牲。在這些政治惡鬥中，儘管權力慾望與邪惡計謀全出自男性，但計謀的施行卻常利用弱勢女子作為手段，事若成，成者不在她；事若敗，犧牲卻在她。她們的命運操縱於「他者」之手，而「他者」則為強權與男性的疊合。諷刺的是，政客儘管掌有權勢，對女子施以脅迫，卻實質上懦弱的依賴著她們的犧牲提供保護。

《天雨花》寫出許多女子因性別上的邊緣與弱勢，而受禮教或強權脅迫，無力自主的悲劇命運模式。亞里士多德《詩學》詮釋悲劇具有對不良哀憐情緒和恐懼情緒的「淨化」(catharsis)作用，悲劇先激發了這些情緒，然後清除它們。<sup>①</sup>《天雨花》諸多女子身受家法懲處，甚至逼令投水的悲劇描寫，或正有當時禮教家庭女子宣洩情緒的「淨化」作用。而且《天雨花》女性悲劇的頻繁描述，正如米勒(J. Hillis Miller)所說：「如果我們需要故事來理解我們的經歷的含義，我們就一再地需要同樣的故事來鞏固那種理解。」<sup>②</sup>《天雨花》作者有意重複呈現男性社會秩序中，處於相對弱勢的女性悲劇，正是一種鞏固讀者理解女性處境的策略運用。

### (三) 反映女性生活面貌

#### 1. 女性身心與生活

胡曉真認為彈詞小說的重要性全在細節部分，從《玉釧緣》以來，即創立了女性彈詞小說「描繪居家生活的女性觀點」<sup>③</sup>的典範。但成書早於《玉釧緣》的《天雨花》中其實早已寫出許多不同身分女性的日常生活及心思，反映出女性在文化秩序中向來因邊緣化而被漠視的觀點與見解，為一般以男性為話語主體的歷史或小說所少見。

如第七回，寫不識詩書的民婦周氏，百無聊賴的坐在窗前：

見了許多書史，就拿起一本來看看，往案上一擲道：「不知花花綠綠，是些什麼？不知甚人造下了這件東西！引得男子漢終日對了他眼中觀看，口內嘮語，不到房中與妻子作樂。我幾時發個狠，點一把火來，把他這些簿子，燒個罄盡，方才暢快。」(上冊，頁269)

作者藉此質樸婦人的主體發音，消遣全體男性知識份子，所說的卻是知識

<sup>①</sup> 詳見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88。

<sup>②</sup> 引同前註，頁93。

<sup>③</sup>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頁69。

男性社群所聽不到——也不屑傾聽的一種真摯心聲。

作品中也反應了知識男性對女性社群的彈詞閱讀嗜好所抱持的鄙夷態度。第二十五回，寫婉真從養父母家回到左家時，特別帶了一書箱的彈詞小說、傳奇，左維明翻看之後，「見那唱本上邊，離不了月下偷期，藍橋密約；至小說傳奇，亦不過是佳人才子，愛貌憐才之說居多。」便說：「此書豈是閨娃看？部部淫詞艷曲文！」（下冊，頁 1017）竟命人將書全都燒了。作者借此透漏了彈詞等通俗文學在一般識字婦女階層做為日常消遣所受歡迎的程度，也藉左維明反諷了知識男性對彈詞這種女性讀物的成見與排斥，他們即使對深愛的家中女眷，也從不會以開放的心胸，去嘗試了解她們在家中漫漫長日所需求的精神寄託。《天雨花》作者撰寫此部長篇彈詞的創作行為本身，事實上已表達了對彈詞文學最具體的愛好與認同，也等於是對現實社會中如左維明之類的父輩——那些只鼓勵受教育的女兒創作詩詞雅文，而鄙夷彈詞小道的父輩——表現了最堅決的抗議。

李平曾就《天雨花》中官宦家庭生活及朝廷國家大事的詳盡描寫，推論作者應出身官宦之家。依照上例中左維明焚毀彈詞的行為描寫看來，《天雨花》作者所認知的知識男性，對彈詞的態度是極為排斥且禁制的，就此而論，則《天雨花》的作者自然不可能是男性，否則作者耗時費日以完成此長篇巨製的創作行為本身，豈不與其筆下所寫知識男性對彈詞的觀點有所矛盾？本文認為這點是《天雨花》的作者當為女性的有利內證。對照書中主要角色左儀貞的出身與識見，極有可能即為作者的自我投射。而且，女性作為書中主角與敘述人，而在主體上混融為一，也確為女性書寫的一大特徵。

《天雨花》對不同身分與年齡的女性心思，各有貼切細膩的描寫，如第二十五回，寫寡婦秀貞被迫與兩個幼兒離分時的傷心欲絕：「兩兒不得隨母去，含包眼淚苦盈盈，小姐走得兩三步，回頭看看兩親生，寸腸千斷心如割，兩行珠淚暗中傾：『可憐兒女垂髫少，離卻娘親怎得生？必然狼籍都斷送，絕了亡夫後代根！我行哪有歸來日？步步如登枉死城，早知今日仍如此，不若從夫早喪身。』」（下冊，頁 1006）將滿心牽掛的母愛衷腸寫得淋漓盡致；又如第二十四回，左儀貞教訓了虐待姊姊的婆婆袁氏之後，丈夫擔心她將受丈人責罰，她卻說：「……人家女兒嫁出，遭惡陵逼者，每每母家與之爭鬧，乃人情之常。」（下冊，頁 962）貼切表達了一般出嫁女子希冀得到母家支援的立場與心態。又如第二十九回，寫左婉貞虐

待婆婆，作者以叨敘日常菜譜的方式，表現媳婦在飲食上對婆婆的刻薄。婆婆吃的是：「粗糲飯」、「一碗湯水，青菜上浮略有幾片豆腐，沒油沒醬，猶如青草一般，此外別無他物。」媳婦吃的則是：「一碗海參來燴鴨，一碗鮮魚一蟹羹，一盤乃是糟鵝肉，蝦腐鮮湯熱氣騰！還有小菜三四色，飯如玉粒碗中盛。」（下冊，頁 1183-1184）如此鋪陳菜色等瑣碎家務的寫作手法，透露了作者熟悉中饋的身份背景，以及視飲食瑣事為生活要務的居家視角，這自然是女性作者最為擅長的。

《天雨花》甚至極其生活化地敘寫女性生理期的計算，以及懷孕期間的禁忌等性別取向鮮明的題材。如第七回，桓清闈對左維明說：「你自七月中回轉，至今兩月有餘零，天癸不來身倦甚，算來有孕在其身。胎教需當循古禮，生子聰明勝過人。相公需去書房歇，晚間莫進內房門。」（上冊，頁 245）第二十一回，更詳細敘述左致德妻周氏臨盆的經過：

夫人身孕多沉重，……專心只等要臨盆，正當二月初一日，初更時分腹中疼，穩婆早在家中候，大家等待在房門。致德二爺耽驚恐，坐在中堂聽信音，人蔘湯共催生湯，連連送上與夫人。誰知夫人腹內緩緩疼痛，不見轉動胎元。二爺時刻使僕婦進來問安，心下甚是憂疑。左茂妻道：夫人腹中疼有兩個更次，還不轉胎，只怕臨盆尚早，……穩婆道：「正是，方才看夫人脈息，尚未離經，只怕是試產，也未可知。」……頓覺腹中疼得緊，胎元轉動要翻身。……夫人腹內多疼痛，胎元墜下脈離經，扶上臨盆來得快，一連三陣子離身。啼聲清響人人曉，穩婆接捧手中存，連聲報喜生公子，喜煞周氏夫人身。（下冊，頁 823-824）

這些有關女性生理狀況的精心描述以及盛大處理的方式，表現了作者對女性身體的珍視與熟知。作者藉由傳宗接代的神聖意義，崇高了女性身體的地位，而那作為男性的致德二爺在迎接親生的過程中，除了心下憂疑，以及作為人蔘湯、催生湯的傳遞者之外，並無法提供實質的力助，真正助生有功的穩婆與左茂妻，仍為女性。作者藉此建構了以女性為主軸的生活秩序，同時也與女性透過書寫自身體驗以書寫自我的寫作慣性若合符節。<sup>24</sup>

《天雨花》細數家庭日常瑣事以及女性身、心狀況，表現了關照日常、叨叨不休的女性書寫特徵。女性群體形象在此生活面貌的細膩刻化下鮮明

<sup>24</sup> 女性藉由書寫自我體驗以表現自我的相關論述，詳見艾萊恩·霍夫曼撰：《新女性主義批評》（紐約：Pantheon 出版社，1984 年），第 136 頁。

呈現，而個別事件的鋪陳發展又能區隔出個別女子的質性差異；反觀書中男性形象除了左維明之外，相對女性而言都較為模糊而淡化，突顯了女主男輔的性別觀點與書寫策略。

## 2. 自我性別認同

《天雨花》作者賦予了主要的女性人物左儀貞極為鮮明的主體性，如第二十四回，儀貞姊妹瞞著父親魯莽教訓了虐待姊姊的婆婆袁氏，後被父親責打，父親認為她們應使夫君前去代看便可，儀貞聽了笑道：「女婿看了，與我何干？」母親又說，兩個女兒被父親責罰時，不知女婿是什麼心情？儀貞道：「母親真個好笑，打了我等，卻與女婿何干？」（下冊，頁 1002）從儀貞的答話中可看出作者賦予儀貞的獨立自主人格，並不將自己定位為依附丈夫而存在。又如第二十五回，寫桓楚卿不樂意儀貞經常返回娘家而叮嚀她務必當晚便回程，儀貞聽了微笑說：

若得歸來必定行，恐防姊妹攀留住，不能放我便回程；相公休得來如此，

莫作閨中女兒形。百年夫婦事正久，情深哪更厭離群？（下冊，頁 1044）

儀貞婉言但堅定表達了自我行止自主的人格意識。儀貞作為自我生活和情感的主宰，與夫君的日常相處維持一種平衡自主的模式，這種女性角色對自我性別的自信與認同，未嘗不是作者的一種自我呈現。

胡曉真曾論女性彈詞小說網絡中，從《小金錢》、《玉釧緣》到《再生緣》，都創造了女英雄的題材，成為女性彈詞中別具意義的文學傳統，而這些傳統則構成彈詞女作家的一種「作品內部對話系統」。<sup>25</sup>《天雨花》第十四回中，左儀貞作為女專諸（刺客）計殺奸臣的英雄事蹟，較前述諸作更早揭示了彈詞的女英雄題材傳統，或許正是由它啟動了女性彈詞的對話系統，其意義不容忽視。

左儀貞在行刺奸臣鄭國泰之前，曾發一段豪氣干雲的豪語：

他（鄭國泰）只道世間女子皆無志，人人都像秀貞身，脇之以威能懼怕，啖之以利便回心。豈知女子非常志，賽過英雄男子身！三軍可以來奪帥，匹夫立志不能更！只等他身來到此，管取奸臣身手分。（中冊，頁 560）

儀貞行刺的過程更有壯烈的描述：

儀貞便定睛看了奸賊，勃然大怒，立起殺心！不覺渾身用力，右手握劍，

<sup>25</sup> 胡曉真：〈閱讀反映與彈詞小說的創作〉，頁 328、318。

左手指定鄭國泰道：你這奸賊，膽敢弑君篡國，又敢戲我女中英雄。奸賊，你此刻且吃我一劍！

言罷之際時重拂劍，劍尖挑下秀鬢，剛剛露得咽喉出，電閃風馳下絕情。纖纖玉手雙擎起，凜凜寒光一道橫，一劍砍來無阻礙，儀貞小姐心大驚！

只見那老賊，在被中雙手往上一抬，兩足朝下一登，更無聲響。……忽然床頭一陣熱血，如噴涌一般竄出。儀貞急急退步，早被血噴滿頭面，胸襟上也見鮮血淋漓。忙取燈近床一照，早見國泰首級滾在半邊，床中熱血汪洋，流來淌去。（中冊，頁 570、571）

這些表彰儀貞英勇的描寫，或不免有誇張的成分，但其誇張正可見作者建構虛擬想像世界的策略運用。在此想像世界中，作者改變了陽剛陰柔、男主女輔的性別定位，由女子來發抒英勇豪氣，並具體承擔為國除奸的重責大任，此策略指向了一種自我性別認同的書寫意識。儀貞行刺成功後，一眾宮娥心驚又快意，齊聲叫道：「左小姐，真是乾坤第一女中英，大明列祖聞知得，豈不敬明朝一位大忠臣！」（中冊，頁 572）作者藉由弱勢的宮女群體為女英雄致上掌聲頌美，也等於是為文化秩序中向來屈居附庸弱者的女性群體，進行了一場對自我性別引以為豪的認同宣示。

### 3. 相為支柱的女性親情

《天雨花》對於女性情誼有許多細膩動人的描寫，以多處著墨的母女親情為例，第二十二回，左儀貞甘冒被父親責打的下場，斬關落鎖，解救被父親鎖閉園中的母親。父親得知後責罵她「引誘」母親至園中玩耍，「不能規諫母親，反為領袖」；又說：「汝母從來忠厚，我看她今日行事，與平日大不相同，這長學問的去處，我亦不必明言。」（下冊，頁 890）是從反面點出了儀貞與母親的親密共同體關係；第二十四回，寫左夫人為兩個女兒將受父親責罰而擔心不已，長歎道：「生男育女無好處，吃盡虛驚到長成，可知骨肉相連意，打了兒身我也疼！」（下冊，頁 970）貼切道出為娘親者心繫於女兒的細密心思。第十二回，黃靜英被頑守禮教的父親逼迫自沉，母女訣別之語，更是迫人衷腸：

小姐深深四禮畢，上前抱定母親身，兩行珠淚如泉湧：「啊呀，母親呀，妳枉養孩兒十九春！豈知今日遭非命，逼空橫事禍來侵？今朝死別生離去，可憐白首送青春，罔極之恩難補報，相期來世做兒孫。母親啊，兒今一死無別念，只是心中難撇母親身。妳琴瑟不調十九載，從今後誰來與妳伴晨昏？惟望母親

來保重，莫念孩兒薄命人！母親在世如安樂，兒歸泉下也安寧。冤魂若有三分曉，定逐陰風返故庭。」……裴氏夫人刀刺心，雙手抱住親生女，我的嬌兒不絕聲：妳也死來我也死，黃泉路上一同行！森羅殿上呈陰狀，告那黃持正一人。夫人說罷心火冒，趕上前扯住姓黃人！劈面兩掌高聲罵：狠心老賊罵連聲，黑天冤枉坑人命，你今逼死我親生……（中冊，頁 458）

從靜英的回憶話語中，可以體會母女相依相持的情感為母親不幸婚姻中的重要安慰，一旦失去女兒，母親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支柱。母女關係是女性彈詞傳統中富有深意且慣用的題材，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曾有所論。《天雨花》作者對於母女親密相依的情感多所著墨，也再次豐富了《天雨花》所具備女性彈詞傳統的要素。

母女情深之外，姊妹情誼的描寫亦多。如左儀貞曾為解救姊妹而多次發揮急智，甚至甘冒違逆父命的罪名，都是姊妹手足摯情的表現。儀貞、德貞與寄住家中的黃靜英，更是「三人品字牽連定，出來進去必同行。有何要事來商酌，結為一黨在閨門。」（中冊，頁 529）當靜英寄住兩年之後將別去時，含淚盈盈，舉杯敬謝儀貞說：「二載同居感大恩，提撕愚姊知文墨，閨中師友兩相親。今朝一旦來分手，孤身一個轉家門，香閨誰與同歡笑？繡閣孤單勝一身。」又敬德貞說：「形同坐守將二載，義重恩深怎忍分？愚姊雖則回家去，難撇同胞連袂情，從今後挑針窗下無伴侶，步月庭前只一人！何時再得重歡會？依舊團圓永不分。」辭別的沉重表現了姊妹朝夕為伴的緊密依靠。作者若非女性，怎會如此盛重舖敘閨閣歲月的日常從事，又如何能將姊妹長夜聽雨共話的私密情感，傳達得如此細膩深刻？

#### 4. 豐富人生的愛情與婚姻

《天雨花》從左維明與桓清閨、杜順卿與黃靜英，到杜楚卿與左儀貞等，有許多青年男女登對的感情描寫。其中最為美滿幸福的愛侶莫過於左儀貞與桓楚卿，他們因兩家本為世交，長輩早有屬意配對，兩人的成長過程也有機會培養了止乎禮的感情默契，第十八回更以長篇細寫其洞房花燭夜的恩愛纏綿，正是才子佳人典型的美滿結局。但正如胡曉真所說：「才子佳人結合的本身並不是女作家處理的最終關懷」<sup>26</sup>，《天雨花》於美滿

<sup>26</sup> 胡曉真：〈閱讀反映與彈詞小說的創作〉，頁 323。



結合之後，也仍繼續鋪展婚後夫妻的相處對待，如第二十四回寫儀貞、德貞受父親責罰，跪讀《禮記·內則》，楚卿為妻心疼不已，說：「我等做了人家兒子，也從不曾經過這般嚴訓；不想岳父對嫁出的女兒，都要這樣認真的。」與德貞夫婿王禮乾等著看妻子好戲的心態形成對比，難怪儀貞兄長左永正在旁聽了要感嘆：「兩位東床兩樣心，一邊夫婦恩義重，一邊夫婦薄情人！」（下冊，頁 974）此外，如前文曾引第二十五回，儀貞為回娘家一事與夫婿所起爭執，亦為婚姻生活中瑣屑而寫實的情境。

《天雨花》寫青春男女私情掩捺不住，卻又懼於禮法而不便明訴的困頓，經常藉由賦詩傳情以為抒解。如左維明年輕時於留春園拾獲桓清閨題詩的扇子，欣賞其詩雅、人美，便題詩於後，借花寓意，以讚佳人；紅雲冒充左秀貞而與周帝臣私通時，周帝臣相贈的粉紅綾手帕上，也寫著詩文以銘記海誓山盟；杜順卿也是藉由花箋紙上四首新作短詩向黃靜英暗寓情意；王禮乾也曾題詩於牆上，向他誤以為是德貞的丫環鳳樓表明愛意。只是，這些傳達愛意的詩篇，一旦被帶著禮教大帽的長輩發現時，莫不被稱為「歪詩」或「淫詞」，更有甚者，竟成為足以揭發女兒暗與人通，並迫令以死的證據。

如果說前文所述懷孕、生產的情節是作者體驗自我身心狀態的一種書寫意識，則書中的愛情與婚姻便是作者體驗自我情感經歷，豐富自我人生的一種想像或補償。女性在心神搖蕩的愛情滋味中，感受人生情感的波瀾壯闊；在婚嫁的新生活中，體驗兩性磨合的糾葛與家業責任的莊重。這些不同階段的體驗或喜或悲，積累成豐富的人生，也織構出《天雨花》這部以大時代中的女性人生為主軸的長篇巨製。

#### 四、結 論

本文根據文本分析，考察《天雨花》的書寫策略，發現作者突出女性仗義勇為的精神，彰顯女性的才學智巧，使女性在與男性威權的衝突中往往以理取勝，成功塑造了女性自主的形象。作者又極力維護婚姻中的女性尊嚴，控訴禮教對女性的鉗制，諷刺男性利用女性作為政爭的手段，顯見作者意圖提高女性在文化秩序中的尊嚴，以建構互等的兩性關係。書中且關照女性的瑣碎生活與思維觀點，宣示女性群體的自我性別認同，吐訴母

姊妹間相互扶助的堅實情誼，抒寫戀愛與婚姻的情感體驗，可謂實錄了女性的人生體驗。作者運用如上的書寫策略，鋪陳出動盪時代中以女性為主軸的人生架構，也突出了女性主體的發音踴躍，其中主題人物左儀貞，作為自主意識鮮明的女子，甚至取代男性，成為救國除奸的英雄。《天雨花》尤其指明了一條活路，即凡女性若得有足夠的學識、理智與勇氣，則能卸除禮教的沉重枷鎖，並在男女主從的文化秩序中贏得尊嚴，認同自我。全書儼然構建——或想像了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文化秩序。

舊說《天雨花》為陶貞懷所撰的說法，由於原序已被認定為偽作而被推翻，但仍不足以排除作者為女性的可能。考察《天雨花》的書寫策略，與女性研究學者所曾概括的女性書寫特徵——如女性主體發音、女性自主意識、女性觀點見解、男女主客變易、書寫自我體驗、以叨叨不休的方式作為女性情誼交流的橋樑等，極度吻合；也與胡曉真所歸納的明清女性彈詞的傳統要素——如女性英雄、家居生活、母女關係、才子佳人等——若合符節。這些書寫特徵或許個別而言，未必足以推斷作者的性別，但是當它們集中出現在一部作品中，則作者為女性的可能便遠大於男性——即使是有意為女性讀者市場寫作的男性。這些顯著而豐富的女性書寫特徵，適足以支持鮑震培所論《天雨花》作者為女性的新說。也唯有作者是為女性，方能解釋何以書中對於禮教盡強調其威脅女性生存的殘酷面；又以父親將女兒的彈詞讀本全數燒毀的情節，突出父權對彈詞這種女性文學型態的對立與威脅；且男性不論智愚忠奸，全被寫成負面的性格——或固執成見，或氣度偏狹，或好色貪財，或奸險懦弱；而女性則多呈現正派形象——即使少數反派的女性也是遭男性利用所致。

明清彈詞的主題一般分為「講史」與「羅曼史」兩類，講史多為男性所作，羅曼史則多出女性之筆。但《天雨花》卻獨特地跨佔了講史與羅曼史的格局，它儘管以女性的英勇才智與生活情感為主軸，而穿插才子佳人羅曼蒂克的情愛與婚姻，但也歷述了晚明宮廷的「三大案件」<sup>⑦</sup>以及宮廷中不同派系的權力鬥爭，甚至諷刺帝王的荒淫與昏庸，表達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對於《天雨花》的女性作者如何有能力兼攝「講史」與「羅曼史」兩類主題的問題，清代閩秀詩人王璠〈讀史〉一詩，提供了書香儒門、官

<sup>⑦</sup> 分別是萬曆 42 年 (1615)，男子張差擊傷宮內侍者的「梃擊案」；萬曆 48 年 (1620)，光宗誤服李可灼所進紅丸而暴卒的「紅丸案」；以及同年選侍李氏拒絕遷出皇帝所居乾清宮的「移宮案」。

宦世家的女兒閨閣讀史的生活面向：

足不逾閨圍，身未歷俗塵。茫茫大塊中，見聞苦拘束。少小依膝下，士自無專督。信口誦詩書，義解不求足。但當趨庭時，談古意相屬。世宙亦云遙，往事難更僕。十二萬年中，是非分兩局。某者流清芬，某者貽羞辱。南董筆一枝，千秋有定獄。風雨自搜羅，得意必抄錄。自笑女子身，乃如書生篤。學問百無能，探討姓所欲，豈但填枵腹，或可棄芳躅。遙遙一寸心，前修自勉筋。可見閨閣女子讀史以自遣、自娛也自勉的情形。明清才女每喜互稱「女史」，也是這種風氣的反應。據此則可強化作者為明末官宦家庭女兒的假設合理性，如此便可吻合作品既熟諳明末宮廷大事（女性作者從父兄處聽聞），又能以女性主體響亮發音的寬闊內涵。

本文分析佐證了《天雨花》作者為晚明官宦人家女兒的說法，則成書於康熙初年的《天雨花》便成為可知最早的女性彈詞小說，而胡曉真以成書於西元 1770 年以前的乾隆年間的《玉釧緣》為第一部女性彈詞小說的說法，亦將得以再推前約百年為康熙初年所作的《天雨花》。

此外，我們也不應忽視《天雨花》書寫女性所透露的積極意義。左儀貞儘管主體鮮明，但其才學膽識、優渥生活與美滿婚姻等完滿人生的要素，仍是得自於父親的栽培與造就。作者在此對女性傳達了一種觀念：唯有先將來自男性威權的制約，成功轉化為自我成長的助力，方能成就自我，建構主體。這幾乎是傳統中國父權社會中，成功女性的人生模式典型。

28

## 參考書目

1. 李平（編校）：《天雨花》，趙景深（主編）：《中國古典講唱文學叢書》，河南新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
2. 清·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據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複印。
4. 胡士瑩（編）：《彈詞寶卷書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28 詳見拙作：〈放逐舊日中國——林徽音《模影零篇》探析〉，《第一屆通觀洞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僑光技術學院，2001，頁82-94。

5. 趙景深：《彈詞考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6. 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下冊，台北，中華書局。
7. 阿英：《小說二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8.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
9. 鮑震培：《清代女作家談詞小說論稿》，天津，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2年。
10.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版。
11.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3期，1995年8月。
12. 許周鶻：〈論明清彈詞文化與吳地婦女〉，《蘇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13. 胡曉真：〈閱讀反映與彈詞小說的創作——清代女性敘事文學傳統建立之一隅〉，台北，《中央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
14. 周良：〈評彈稱謂辨析〉，《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學報》，第17卷，第2期，2000年6月。
15. 〈女性書寫／書寫女性〉，《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學刊》，第5卷，頁33-52，2002年9月。

##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Writing of the Tan-Ci Novel *Tian-Yu-Hua*

Chu Wo-Hsin

### 【Abstract】

Tan-Ci novel *Tian-Yu-Hua* was writte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original preface contained the signature of the female author Tao Zhen-Wuai. The preface however was later proven to be a fake by scholars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The assertion of Tao Zhen-Wuai being the author was therefore overthrown. But this alone however can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uthor being a woman. According to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an-Ci novel constructed by domestic scholar Hu Xiao-Zhen, *Yu-Chuan-Yuan*, which is written in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earliest known female Tan-Ci novel. Based on external evidence, Bao Zhen-Pei inferred in his recent book *A Study on Tan-Ci novels which written by Female Authors in Qing Dynasty* published in 2002, that the author of *Tian-Yu-Hua* was a female from Wuxi, Zhejiang Province. But he didn't examine the sex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review of the writing strategies of *Tian-Yu-Hua* based on text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e author was deliberately shaping an independent female image by portraying women's qualities such as courage, intelligence, and persuading people with reason. And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a monogamous family model and the exposure of the fact that men are actually using their rights to suppress women in the nam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s and values, the author tried to compensate for women's dignity in real order of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The author portrayed in great detail women's thoughts, daily lif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mother- and sisterhood, love and marriage, which presents the whole life and living experience of women. The writing strategies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writing style such as subjective voices, self-consciousness, female perspective and views, subject-object transpositions of women and men, and self-experience writing. And it also included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s typical of female Tan-Ci novel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mmarized by Hu Xiao-Zhe, such as women heroines, family lif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and the match of a beautiful lady with a talented young ma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internal evidence for Bao Zhen-Pei's assertion that the author of *Tian-Yu-Hua* is a woman. And therefore, the first traceable female Tan-Ci novel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n be dated back one hundred years from *Yu-Chuan-Yuan* to *Tian-Yu-Hua*.

**Key words :** Tan-Ci novel, *Tian-Yu-Hua*, Tao Zhen-Wuai, Female-writing, Sexual-identification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44卷 頁183-203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年7月

## 藍鼎元《東征集》的文學表現

林翠鳳\*

### 【提要】

藍鼎元於清初隨軍來臺救平朱一貴事件，期間參與帷幄，代擬文書，事平後輯為《東征集》一書，成為了解朱案的重要歷史文獻。《東征集》歷來多注重其文獻的歷史價值，本文嘗試另闢一徑，從文學表現的角度切入，分別就篇章意涵與文學美感兩大方向進行初步探索。

《東征集》共收六十篇作品，內容絕大多數為說理性兼實用性散文，尤其以論辨體(政論)為主。文章偏屬於陽剛的風格，彰顯了征戰的背景氛圍；條理周密的結構，則運用辨證等方法，強化了見解的說服力。總體而言，《東征集》立意正而理脈通，理脈通而氣勢盛，兼具「意」、「理」、「氣」三體，是一部富於美感特質的文學佳構。

關鍵詞：藍鼎元 東征集 文學表現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共同科專任副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 一、前言

清康熙 22 年（1683）清廷領臺之後，對於臺灣的治理頗為消極。然而朱一貴事件的發生，使得清廷震驚，也進一步思考臺灣問題。其中，隨軍來臺的參謀藍鼎元事後編著有《東征集》、《平臺紀略》兩部著作，可說是最重要的紀錄和參考。兩書內容呈現了藍鼎元對收平朱案的建議和相關軍中文書、事平後經理臺灣的種種議論，以及清軍征討朱案的歷程紀錄。大體上藍鼎元主張積極治臺，他的言論在當時與後來都成為清廷治臺措施的重要參考；在學術上，兩書也成為後世了解朱一貴事件的第一手官方史料，其文獻價值十分珍貴。

就《東征集》而言，自清代以來諸家研究，幾乎都是著眼於其反映歷史的文獻意義，透過這部書，回溯當年事件的真相或意義。然而《東征集》文章本身的書寫，或者說是文學美感的藝術表現，在吾人所見的前人研究中，似乎比較乏人關注。這其實是另一個應該探索的議題。

細讀《東征集》集中諸作，其寫作手法往往動之以理，說之以情，間之以威脅利誘，內容豐富，氣勢雄貫，令人感到一氣呵成，十分淋漓暢快。藍鼎元的文筆才情，令人激賞。如此名著，其文學成就必有可觀之處。而文學之美與文獻之真可以是一體的兩面，藍鼎元《東征集》應是一部兼具歷史真實與文學美感的難得佳作。

## 二、藍鼎元與《東征集》

藍鼎元，字玉霖<sup>①</sup>，別字任庵，號鹿洲，世居福建漳浦縣之萇谿<sup>②</sup>。生於清康熙 19 年（明永曆 34 年，1680）8 月 27 日未時，卒於清雍正 11

① 據 1984 年福建省漳浦縣人民政府在湖西鄉藍鼎元墓旁所立之說明上書：「藍鼎元，字義霖」。此為他處所未曾見，不知其根據為何。或為音近筆誤所致也未可知，茲存之。見許雪姬訪問《藍敏先生訪問記錄》第 170 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年 6 月初版。

② 萇谿應即長卿，藍姓開基祖所在地。在今漳浦縣萇谿鄉。清代康、雍年間，藍理（1649-1720）、藍廷珍（1663-1729）、藍鼎元（1680-1733）一門豪傑都對臺灣有相當的貢獻。據載「湖西鄉申請為少數民族（畲族）」、「藍廷珍是畲族人」，惟據聞藍鼎元在臺後裔藍敏並不認同。引文前者見《藍敏先生訪問記錄》第 173 頁，後者見《漢聲（中文版）》第 21 期《臺灣的漳州人專集》第 72 頁，1989 年 6 月。

年(1733)6月22日辰時，享年54歲。<sup>③</sup>

父藍斌，縣諸生，學者稱文庵先生，早歿。母許氏，守節撫孤，恃女紅度日，茹苦含辛。藍鼎元感奮勵志，刻苦自立。康熙43年(1704)應童子試，拔得頭籌；同年冬天沈涵督學，復拔第一。曾召入使院，分校諸郡，沈涵讚為「國士無雙，人倫冰鑑」。康熙46年(1707)張伯行撫閩，建龍峰書院，延請九郡一州之有學行者，纂訂先儒諸書，獨藍鼎元、蔡世遠<sup>④</sup>二人禮遇有加，曾謂：「藍生確然有守，毅然有為。良才，吾道之羽翼也。」康熙49年(1710)起，藍鼎元杜門讀書十一年。

藍鼎元著作豐富，包括有：《女學》六卷、《東征集》六卷、《平臺紀略》、《棉陽學準》五卷、《鹿洲公案》二卷、《鹿洲初集》二十卷、《修史試筆》六卷等。其作品多成於公務之餘，所謂「《女學》最先出，《平臺》、《東征》成於征臺幕府，《學準》、《公案》成於潮、普署中，《鹿洲初集》則分年而輯成之，《修史試筆》則在京與高安相國編定《歷代名臣傳》所成也。」<sup>⑤</sup>其中與臺灣關係最密切的，為《平臺紀略》、《東征集》兩書，內容是藍鼎元隨同藍廷珍(1663-1729)征臺平定朱一貴事件的真實紀錄。

康熙60年(1721)夏4月19日臺灣朱一貴等人起事於鳳山，當時「李勇、吳外、鄭定瑞、王玉全、陳印等五十二人，即黃殿莊中奉一貴焚表結盟，各招黨羽得數百人，立賊幟書『大元帥朱』<sup>⑥</sup>，夜出岡山襲劫塘汛」<sup>⑦</sup>，自此迅速蔓延全臺，並震動朝廷，急速大會舟師，由浙閩總督覺羅滿保坐鎮廈門，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藍廷珍<sup>⑧</sup>率軍前進臺灣，終於在同年6月16日進抵鹿耳門，試圖撫定動盪。

當藍廷珍奉命總領水陸大軍兵員丁壯上萬人等準備出發平臺時，有感於之前族弟藍鼎元預言有證<sup>⑨</sup>，於是邀請同行。藍鼎元從此隨軍來臺，參

<sup>③</sup> 據《平臺紀略》藍雲錦撰〈行述〉第14頁。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第14種。1958年4月。

<sup>④</sup> 蔡世遠(1682-1734)，字聞之，世居漳浦梁山，人稱梁山先生，亦稱梁村先生。康熙48年(1709)進士，官禮部右侍郎。雍正12年(1734)卒，年52，諡文勤。乾隆4年(1739)入祀賢良祠。見高雄師範大學1988年碩士論文藍國榮《藍鼎元研究》第46-47頁。

<sup>⑤</sup> 見《平臺紀略》藍雲錦〈行述〉，第15頁。

<sup>⑥</sup> 〈朱一貴供詞〉：「取□□□□姓朱，聲揚我是明朝後代，順我者必□□□□定數了。」《明清史料》戊編第一本，第107頁。

<sup>⑦</sup> 見藍鼎元《平臺紀略》第2頁。

<sup>⑧</sup> 藍廷珍後官至福建水師提督，今漳浦湖西鄉頂雲村的「提督府」即其官宅，現已列入縣級保護。見《平臺紀略》第10頁；又《漢聲(中文版)》第21期《臺灣的漳州人專集》第72頁。

<sup>⑨</sup> 見藍廷珍〈舊序〉：「予巡哨南洋，舟中起雷，甚不懌。玉霖為予解曰：『威震東方，聲聞四海之象，兄其建勳業于臺灣乎？』越月，聞臺警(按，指朱一貴事件)，始壯其言。」《東征集》第4頁。

另參藍鼎元《與荊璞家兄論舟中起雷書》，《平臺紀略》附錄，第45頁。



贊幕僚，所有書檄、文告、露布幾乎皆出其手。

當官兵跨越海峽，登陸安平之後，竟一路攻城掠地，勢如破竹，所戰皆捷。僅僅七日之內，便收復早已為朱氏一黨所掌控的臺灣府治，再過十餘日並生擒朱一貴等人。在朱一貴集團內部分裂日益嚴重的基礎上，官兵七日平臺顯得更加順利。茲製「七日平臺大事記簡表」以明其概略。

### 七日平臺大事記簡表

年月	平臺大事記	備註
康熙 60 年辛丑夏 4 月 19 日	朱一貴等千餘人揭竿樹旗，夜出岡山襲劫塘汛。百姓有投順者，達二萬餘人。殺林富、馬定國，破鳳山，迫府治。全臺譁然大震。	朱一貴事件始
5 月朔日辛酉	雙方大戰春牛埔 <sup>⑩</sup> ，台灣總兵歐陽凱殉，府治遂陷，官兵潰敗。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暨大小官兵千餘人，并戰船四十餘號、商漁艇艦無計，齊赴澎湖。	
5 月壬戌、癸亥	澎湖將弁亦各出家屬渡廈門。提督施世驃見難民到廈，方知臺變。	
5 月 27 日丁亥	南澳總兵藍廷珍到廈。	
6 月 10 日庚子	進會提督施世驃於澎湖。合計大小官兵 24000 餘人，船 600 餘號。	
6 月 13 日癸卯	官兵發澎湖。	
6 月 16 日丙午	官兵潰敵，入鹿耳門，進趨安平。	
6 月 17 日丁未	官兵乘潮入安平。	七日平臺始
6 月 18 日戊申	大戰四鯤身、七鯤身。朱軍艦燬敗走。	
6 月 19 日己酉	大戰安平、二鯤身。朱軍退府治。	
6 月 20 日庚戌	施世驃以密報欲往西港仔 <sup>⑪</sup> ，藍廷珍急言進謀。	

<sup>⑩</sup> 春牛埔約在今台南市勝利路東半段兩側，當清代府城大東門迤北一帶。見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第 27 頁。台北：自立，1993 年 3 月一版一刷。

<sup>⑪</sup> 西港仔在今台南縣西港鄉。

6月21日辛亥	藍廷珍率 5500 餘人夜進西港仔。	
6月22日壬子	藍廷珍兵分八隊並進衝殺，大戰蘇厝甲 ⑫。朱軍大潰。 施世驃傳令水陸官兵並進攻府治。	
6月23日癸丑	官兵俱會府治，赴廈報捷。	七日平臺告捷
6月25日乙卯	上諭至閩。	
閩6月朔日庚申	捷報至廈門。	
閩6月7日丙寅夜	楊雄詒朱一貴回溝尾莊⑬，潛以水灌其砲，夜五鼓，會官兵逐擒朱一貴等。縛置牛車赴八掌溪呈交提督。	
後記	朱一貴等後檻送廈門，解京正法，俱凌遲處死，家屬同坐。	
依據文獻：1.藍鼎元《平臺紀略》、《東征集》 2.〈朱一貴供詞〉⑭ 3.連橫《台灣通史》〈朱一貴列傳〉、〈歐陽凱列傳〉、〈藍廷珍列傳〉⑮		

就清廷軍事成果而言，這實在是一場成功的戰役！其謀略果決、議事精到，令人讚賞，而原因則端賴於軍事上的周密統觀全局，指揮調度得宜，繼之以將士用命，終能成就豐偉功業。身居前線領軍的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與參贊擬文的幕僚藍鼎元、陳夢林，可謂居功最大。⑯劉家謀《海音詩》曾題詩詠讚藍鼎元道：

戎馬書生氣浩然，軍中草檄筆如椽。功成不復論酬賞，大海歸來月滿船。

事件平息之後，藍鼎元彙整此一期間相關書信文件六十篇，刻為《東征集》六卷⑰，以存文獻。藍廷珍〈東征集舊序〉曾言：

予胸中每有算畫，玉霖奮筆疾書，能達吾意。又深諳全臺地理情形，調遣指

⑫ 蘇厝甲在今台南縣安定鄉蘇厝村。

⑬ 溝尾莊在今台南縣佳里鎮附近。

⑭ 見《明清史料》戊編第一本第107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年3月。

⑮ 見連橫《台灣通史》第740~756頁。台北：黎明，1985年1月初版。

⑯ 楊雲萍《臺灣史上的人物》〈藍廷珍〉亦認為：「藍廷珍和施世驃……似是頗有受到廷珍的族弟藍鼎元的影響。」第94頁。台北：成文，1981。

⑰ 據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藍廷珍〈舊序〉稱：原「擇其可存者百篇，付之剞劂」。後雍正十年(1732)秋新刻本，經刪選後，存六十篇行世，今日通行者即為此。參見《東征集》〈舊序〉、〈王序〉，第2、4頁。

揮，並中要害，決勝擒賊，手到成功。當羽檄交馳，案牘山積，裁決如流，倚馬立辦。猶且篝火，連宵不寐，而籌民瘼。海外軍中，風沙腥穢，兄弟相對，竟日念念地方，不自知其苦也。予憂臺北空虛，玉霖議以半線以上，設縣添兵，與陳君少林修志時所見吻合，而玉霖尤大聲疾呼，不啻舌敝穎禿，更欲於竹塹、羅漢門<sup>18</sup>、郎嬌增置兵防。蓋於地方利病，無所不用其心如此。……讀《東征》一集，可以觀弟之苦心。<sup>19</sup>

可見集中作品既是藍鼎元身為幕僚代總兵擬撰的文書，其間也多有藍鼎元帷幄謀略、參議機宜的個人見解。因此〈四庫全書提要〉直言道：「《東征集》六卷皆進討時公牘書檄，雖廷珍署名，而其文則皆鼎元作。」<sup>20</sup>

此外，藍鼎元歸閩之後，見市井群眾對台灣朱一貴事件之始末經過訛傳錯謬，謠言紛紛，於雍正元年另編成《平臺紀略》一書，以自身「東征逾載，躬歷行間」<sup>21</sup>的確切經歷，挺身釐清事實，還原真相。《平臺紀略》依據編年次序詳述朱一貴事件始末，此書與《東征集》合為此次平臺大役的史筆雙璧。歷來研究朱一貴事件者，無不以藍鼎元此兩部著作為主要根據。雖然藍鼎元自謙為「稗官野史」<sup>22</sup>，然則藍鼎元親入行伍，秉筆直書，完成第一手資料，以一家之言，深得後世史家的徵信，其文獻價值卓然可觀。

藍鼎元雍正元年（1723）拔貢，後分修《大清一統志》，並受吏部尚書授文華殿大學士朱軾賞識，於雍正五年（1727）春三月保舉引見，拔擢為廣東普寧縣令。任內治劇盜、懲豪猾、斷疑獄，以其性亢直，數與上官忤，至受誣成獄。後得昭雪，經再薦，署廣州知府。可惜，甫一月而卒！竟未能一展長才<sup>23</sup>。雖然如此，藍鼎元以其一生事功與文章之卓越，而名列《清史稿》中。<sup>24</sup>

藍鼎元為在臺藍姓宗親之嫡祖，其長子藍雲錦在朱一貴事件時曾隨其父來台<sup>25</sup>，「稍後即回大陸。雲錦公在鹿洲公過世後，帶族人來屏東里港定居。……雲錦公選擇里港，乃因里港和漳浦風物相似，實基於原鄉感情

<sup>18</sup> 今高雄縣內門鄉。

<sup>19</sup> 見《東征集》藍廷珍〈舊序〉第4頁。

<sup>20</sup> 見《景印四庫全書》〈平臺紀略 附東征集提要〉，第369-558頁。台北：商務，1986年3月初版。

<sup>21</sup> 見藍鼎元《平臺紀略》〈自序〉，第3頁。

<sup>22</sup> 見藍鼎元《平臺紀略》〈自序〉，第3頁。

<sup>23</sup> 參胡巨川《臺灣逸史附言》第99頁。高雄：春暉，2001年7月初版。

<sup>24</sup> 見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列傳71〈藍廷珍列傳〉附，第2648頁。出版者不詳。

<sup>25</sup> 見《平臺紀略》藍雲錦〈後序〉，第35頁。

之故也。」<sup>26</sup>其第八世嫡孫藍高川之女藍敏小姐曾於 1989 年 10 月親赴藍鼎元出生地謁祖，曾記述其當時所見曰：

離開種玉堂（按：種玉堂為藍氏家廟之所在，也是藍家在漳浦的總祖祠），繼往鼎元公的出生地，只見屋宇破爛，中間有一簡單的祖廳，兩邊廂房住了很多自稱是鼎元公的後裔，雖然鼎元公有六個兒子，但他們都沒有族譜，所以我不知其是否確為鼎元公的後裔。眼前所見的破瓦舊舍，竟是偉大的祖先鼎元公的出生地！我遙想祖先小時生活的窘困，心中非常難過。

繼往湖西鄉祭拜鼎元公之墓。墓已二百五十六年，墓碑和墓桌仍相當完好，但墓園已被墾過，在墓碑左邊，有後來漳浦人民政府所鐫之說明：『藍鼎元，字義霖，號鹿洲，雍正年恩進士授中憲大夫，曾任廣州知府，著書《鹿洲集》、《鹿洲公案》等書，具有歷史研究價值，應予以保護。（保護範圍：周圍 10 米）』因此我乃決心修葺墓園。<sup>27</sup>

藍鼎元身後尚且得以保存至今，足見其事功、文學之成就，在長久以來一直受人景仰。則所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語），在藍鼎元的身上，已經得到最佳的證明了！

### 三、《東征集》的文學表現

藍鼎元《東征集》在歷史文獻上的成就，歷來素有美譽。他透過親身經歷觀察，所提出的平臺與治臺主張，大多切實可行，故常為當局所採納。這是由於他能「立足現實又不忘歷史」的綜觀能力所以致之。<sup>28</sup>雖然他本身並未能擔任直接經理臺灣的要職，但他積極治臺的主張、著書立說的高見，卻能對清廷當局的治臺措施給予具體而深遠的影響。例如：康熙 60 年（1721）的實施保甲之制與團練之法；雍正元年（1723）的增設彰化縣；雍正 11 年（1733）淡水同知的移駐竹塹；雍正以後的設立官莊；乾隆八年（1743）的增加官吏養廉之費……等等<sup>29</sup>。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 51 年（1786）十一月林爽文事件發生之後，清高宗於 52 年（1787）閱覽藍鼎元《東征集》，對書中所論臺灣情勢

<sup>26</sup> 見《藍敏先生訪問記錄》，第 180 頁。又，藍雲錦墓在今高雄中寮山，見藍國榮《藍鼎元研究》第 309 頁

<sup>27</sup> 見《藍敏先生訪問記錄》，第 170 頁。又，據其所鐫知墓碑說明立於 1984 年。

<sup>28</sup> 見林其泉〈略論藍鼎元的治臺主張〉第 89 頁，《臺灣研究》總第 24 期，1993 年 12 月。

<sup>29</sup> 參黃秀政〈論藍鼎元的積極治臺主張〉，第 117 頁。《臺灣文獻》28 卷 2 期，民國 66 年 6 月。

及經理方略，深感認同，認為頗有可採，於 5 月 30 日諭閩浙總督宜詳加參酌採行以治臺灣；清高宗於數日後又讀《平臺紀略》，再度諭令參閱借鏡，朝廷因此而特重圍堵、招撫等方面的事務。可見乾隆皇帝對於藍鼎元著作是十分賞識與借重的。相對的，亦足以具體見出藍鼎元對臺灣的經理見解，在清代治臺政策的制訂上，扮演著積極重要的角色，其影響臺灣，意義十分重大。這也難怪〈四庫全書提要〉會著眼於《東征集》內容的實用特性，盛讚說：「至今資控制之力，亦可為有用之書，非紙上談兵者矣。」

⑩

朱一貴事件前後，清廷官兵所以能締造七日平臺的佳績，以及妥善處理善後，有效爭取臺灣利益，除了得力於謀略者的擅長擘畫，用事者的同心合作之外，實際上，當時賴以聯絡上下，往來討論的文書，也佔有重要的傳聲功能。假若文書冗長雜蕪，陰弱無力，甚至詞意錯混，語焉不詳，則如何能在瞬息萬變的戰局裡確實溝通，有效佈局，戰果恐怕令人質疑。而軍事上的文字除了應該做到清晰達意的基本要求之外，最好也能同時兼具文學美感的運用，或是強化氣勢以懾人，或是訴諸情懷以感人。軍事文書，特別是對外公告的篇章，不論對象是將領、官兵或百姓，其實還肩負著心理戰的任務，可以具有傳達策令、鼓動民氣、宣示心志，甚至是導引視聽、屈人於不戰之先等作用。歷史上著名的漢高祖〈入關告諭〉、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史可法〈復多爾袞書〉等等佳構，早已屢屢展現出文學作品在殺戮戰場上所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因此，《東征集》作為一部成功戰役的文獻輯錄，其文學藝術層面的表現，格外值得吾人關注。

歷史文獻通常著重於史學的歷史價值呈現，文學則要求具備美學的感染效果傳達；歷史文獻在求真，文學在求美；真實不一定是美的，美的可能不夠真實；但求真與求美，也不盡然是必定衝突的。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史學巨作，往往表現出撼人的文學感動力，最具執牛耳地位者，非司馬遷《史記》莫屬，此早已得到古今學界的公認；而自古以來多少文學佳構，其實原本是作為實用的歷史文獻來書寫，包括奏疏、詔告、書信、題記、傳狀、銘誄、碑誌等等，不勝凡舉，歷史文獻與文學美感經常是合二為一的。就《東征集》應用性質特別突顯的特色而言，吾人便先從分類的意涵觀察與美感的表現手法兩方面，著手探討：

⑩ 見《景印四庫全書》〈平臺紀略 附東征集提要〉，第 369-558 頁。

### (一)分類的意涵觀察

《東征集》全書六卷，共六十篇，俱以散文寫作。總體來看，根據內容觀察而言，除了少數遊紀文章，絕大多數為說理性散文，表現出征戰期間諸項措施的協調或要求；再根據應用的形式而言，則大體是以實用性散文為主體，均為藍鼎元隨軍參謀期間的各級往來文書。茲擬透過多樣層次的分類，俾便概觀其意涵：

1、就編排體例綜觀，全書大體是依據時間發展的順序，並兼顧文體同異而歸納之。卷一 9 篇，將綏靖前後大事提領綱目，速往速結，似乎有意藉此突顯七日平臺之迅捷；卷二 10 篇，均為播告將弁的檄文，可見治軍領兵之方策；卷三 8 篇均為事平之後，經理善後的告覆書信，關係著多項剿撫措施；卷四 11 篇亦為善後告覆書信，特別關係著臺地戰後保安政策的規劃和布局，思索理路畢現；卷五 12 篇同為善後文書，賞罰分析兵民諸事；卷六 10 篇彙輯來臺地理見聞，既紀錄其好奇冒險，也寓托經濟軍國的用事思索，最末附看語 3 篇序事審斷，條顯功過。讀者依次閱覽全書，可有如隨軍征討，彷彿親體戰情的變化起伏。

2、就行進時間分野，以朱一貴被清軍擒獲為界線作劃分，除了紀遊諸篇無從全然確知其時間外，統觀其他各篇，則前期涵括一、二卷，作品有 19 篇；後期涵括三至六卷，文章計達 34 篇，顯示出實際上平臺之戰時程短，要求明確，而善後剿清經理的層面廣，諸事龐雜，《東征集》的確頗能精要取樣，反映政府官軍處理朱一貴事件的始末作為；前期以檄文為大宗，後期以論文為最大多數，顯示出前期以有效應戰為首要目標，後期則以長治久安的規劃為討論重點；再配合以前期幾乎皆為短文，後期則頗見洋洋灑灑之長篇，計算後期文章的篇幅，大約平均每篇為前期的雙倍，這似乎透露出清朝官軍團隊氣氛在兩階段上的差異，即前期力求紀律嚴明，上下同心，如〈與施提軍論止殺書〉之屬；後期則顯示各層級意見不盡協和，所論多有懸殊，甚至需要到疾言力諫的境地，如〈論臺鎮不可移澎書〉之屬。

3、就行文標目歸類，可歸納為六類，即：書信 33 篇、檄 13 篇、露布 3 篇、諭 1 篇、紀 7 篇、看語 3 篇。透過不同的文件型態，因應不同的形勢需求，也表現不同的訴求目的。全書以登錄往返書信數量最多，透露出政策制定過程的往復討論；檄為聲討敵人的軍中文書，公開宣導戰略目

標，統一部眾心理，同時反映出戰情緊急，羽檄頻飛的緊張態勢；露布也是檄文的一種，指可以公開昭彰的軍中告捷文書<sup>31</sup>，書中所錄三篇洽分屬七日平臺的前、中、後三期，高奏凱旋之歌，鼓舞軍民士氣，最能充分張揚官方一路風發，英雄得意的氣概；諭令一篇告閩粵民人，亟止分類械鬥的惡況，情理法並敘，期能由根底杜絕；藍氏初抵海東，諸紀所述觸及臺地四方，又觀其內容，議論似不下於述景，則諸紀或可視為藍鼎元關於臺灣地理要塞的察考之作；看語乃審斷之評語<sup>32</sup>，隨人功過不同，各有賞罰，端在力求敘事評理，依法秉公處置。通觀全書各篇，可謂以治軍經世的主旨通貫之，非關清興遊戲，頗能具體表露當站在歷史關鍵時刻時，領袖人物殫精竭慮的忠誠。

4、就文體歸類區別之，則包括有四大類，為：論辨體(政論)31篇、檄移體16篇(含檄13篇、露布3篇)、詔令體6篇(含札2篇、諭1篇、看語3篇)、遊記體7篇<sup>33</sup>。「論」的特點，劉勰認為是「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文心雕龍·論說》)，《東征集》中的論文佔全體的半數以上，具體呈現出官員彼此思慮論辯的層面，實最能顯現思考者對局勢的掌握程度，也同時考驗了執筆者表陳邏輯條理的議論能力；檄文露布崇尚「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文心雕龍·檄移》)，藍氏諸作並濟剛柔，兼顧理氣，往往因人陳辭，意欲顯示企圖；令諭斷語必為上級對下級告知的文書，其言如法，多帶有強制接受的色彩，藍鼎元雖代長官擬文，多能把守分寸，力求剛正果決；遊記體內容可以不完全是親身經歷，但相關於地理山川、人情風俗的描述，以及作者的觀感想望，幾乎可說是寫作時的必要條件。藍鼎元諸紀多臺地行跡之紀錄，所言深入內山水沙連，遠達北臺竹塹、後山花東，臺地之奇景異情，躍於紙上，而其用心亦伴隨述景諸語托出。

## (二) 美感的表現手法

《東征集》書寫於兵荒馬亂之際，完成於急迫窘促期間，既無暇捻鬚

<sup>31</sup> 露布，謂詔書、簡牘等不封緘者，或指軍中告捷的文書。《文心雕龍·檄移》：「檄者，繳也，宣露於外，繳然明白也。張儀繳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見第332頁。台北：三民，1996年2月再版。

<sup>32</sup> 清代黃六鴻撰《福惠全書·釋看語》：「看語即審單也，亦曰讞語。其法：或先斷一語而後敘事，或先敘事而後斷，必須前後照應，有貼狀附審者，亦須一一序入，而又要不失首詞位置，猶乎作文之有輕重也。大約據招供以序事，依律例以斷罪，辯論精詳，使無駁竇，能事畢矣。」台北：九思，1978年。

<sup>33</sup> 本文文體分類依據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一書，參第35-229頁。台北：文史哲，1987年10月初版。

推敲，也不容延遲擱置，所謂「奮筆疾書」、「倚馬立辦」<sup>34</sup>者也。在文獻存真的前提下，若還有從容潤飾文辭的時間，恐怕也只有刊刻付梓之前的有限修辭而已。在烽火熊熊的環境下寫作，少了點琢磨文辭的優雅，卻多了些直抒胸臆的爽快，直接考驗著作者文思的敏捷，以及下筆的速度。非思慮明暢、文筆迅捷者，恐怕難以勝任。王者輔說得好：

從來軍中不言文，非謂無用文地也；戎馬倥傯，事機呼吸，何暇選言駢辭，為文章以名於世。雖然，固有之。古人誓師，可垂為經；號令教條，皆有文理。是以磨盾草檄，傳為美談；而傳脩期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先哲以英雄艷之。<sup>35</sup>

因此軍用文書能同時表現文理與美感，實屬不易，若有則必具可觀之處。王者輔十分讚賞《東征集》，他以「學適於世用，而心常存乎世道人心；詞不尚浮夸，而論切中乎人情物理。」（〈序〉）來讚譽藍鼎元的成就。而《東征集》這一部深具時代性意義的文獻，其在文學美感的表現上著實有出色的表現，試就其文學特點分析如下：

### 1. 富於陽剛的風格

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1731~1815）拈出「氣」字以論文，認為天地之道在於陰陽剛柔，而文章為天地之精華，也自有其陰陽剛柔的表現，他在〈復魯絜非書〉<sup>36</sup>中詳細論述道：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濇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

姚鼐揉合天道與文藝，將天象的觀察運用到文氣的體會上，雖然不免有些抽象，卻指出了一個文學欣賞的可貴角度，趨向於注重「讀者對作品中審

<sup>34</sup> 見《東征集》藍廷珍〈舊序〉第4頁。

<sup>35</sup> 見《東征集》王者輔〈序〉第1頁。

<sup>36</sup> 見姚鼐《惜抱軒全集》第71頁，上海，1936年。



美特質的感受」<sup>①7</sup>。以此觀照《東征集》中各篇，多為因應朱一貴事件的戰事發展需求而完成的，是強迫性的外在寫作動機所使然，作品在先天條件上已經因為客觀環境與氣氛的關係，而有極大的陽剛表現的可能。若分析篇章之寫作，可從二方面加以考察：

### (1)在主題思想上

文章寫作以確立主題思想為最關緊要。王夫之說得好：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二內編之二）

作文猶如帶兵之以中軍主帥為首腦，須以主題思想引領創作前進。《東征集》的形成背景來自於跨海征討臺灣朱一貴起事，因而集中諸篇章的大主題也自然是環繞在力求致勝清肅的訴求上。

治軍注重號令嚴明，迅速確實。《東征集》為出軍時的筆墨，觀其文確實態度嚴肅不苟，目標明確一致，同時力求上下齊心凝聚，胸懷端正坦蕩。往往發出雷霆般的巨吼欲以喝退敵人，指揮千軍萬馬往往胸有成竹，志在必得。藍氏雖是文官，但其謀而後定不退讓，為所當為不遲疑的智略與精神，卻自然展現出陽剛武勇的典型。

《東征集》諸文題目，雖然極有可能皆擬就於事件之後，但既是出自於藍鼎元定稿，也可反映作者攝掇篇章內涵意指的態度，觀察諸篇率皆能清楚指陳內文主旨，如〈檄台灣民人〉、〈答道府論陳福壽入山書〉、〈紀虎尾溪〉……等；甚或直書任務目標為題，諸如〈與施提軍論止殺書〉、〈檄南路營近兵阿猴林〉、〈檄查壘甲流民〉、〈檄北路將弁大搜羅澳門諸山〉、〈復制軍論築城書〉、〈請班師書〉、〈請權行團練書〉……等，從題目中已經昭然揭示行動的進程或見解的取捨，由此可見文中所述多為軍務方略等嚴肅課題，思索考量都環繞相關議題，未有風花雪月情事。

試觀其敘述言語，多有思想肅整、措辭嚴正者，藉以表達堅定的態度。例如追討杜君英時，檄文內明示：

本鎮總統大兵，殺賊安民，是其專責，斷不容山陬海澨，尚有竄身草澤，伸頭縮頸於光天化日之中，貽地方以去惡未盡之誚。君英一日不出，本鎮一事

<sup>①7</sup> 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姚鼐--(陰陽剛柔)這種理論和風格，都具有印象派審美主義的強烈傾向，而批評注意力的焦點從作家與宇宙的關係(第一階段)，轉移到讀者對作品中審美特質的感受(第三階段)。」第85~87頁。杜國清譯，台北：聯經，1985年第二次印行。

未了，不殺不休。（〈檄施恩陳祥諭撫杜君英〉）

句句義正辭嚴，不容妥協，執事專注，不留餘地。此檄一出，對象鎖定，態度強硬，如發雷霆，官軍全力追剿，任務隨即發動。

即使是對上級做法不能認同而陳說己見時，其意見仍然十分明確，例如：朱一貴事件後對此前棄地逃叛官員的姑息輕罰，藍鼎元深深不以為然，於是上〈論臺變武職罪案書〉，表白心迹，直言不諱：

棄地逃歸、在臺從賊，一概輕擬。……婦人之仁，其實可笑！國家刑賞異用，所以鼓勵臣節，為斯世存三綱五常，使知禮義廉恥之外，尚有誅謬可畏耳！有春夏而無秋冬，則四序不成；有慶賞而無刑威，則亂賊接踵。故魯人肆菁，春秋譏之；惟佛氏慈悲，買虎蛇放生而已矣！---應否從寬從嚴，執事自有定見，不必以某言為疑，某止表白其心迹。

不佞於曲從，有所為亦有所不為，藍鼎元以嚴遵法紀，以維護世道人心的大我為思考，反而突顯了婦人之仁的可笑可鄙。

## (2)在行文氣勢上

曹丕〈典論論文〉曾指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於文猶如氣之於人，氣盛則壯，氣弱則卑。兩軍對峙，講究氣勢，清軍以其師出有名而理直氣壯，主意既定而下筆滔滔，正所謂「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李翱〈答朱載言書〉）。加上藍鼎元運文時馳時張，能放能收，常使文章浪波起伏，迭起高潮，使得氣勢強貫，自能展現威壯的魄力。

例如：「巨砲雷轟震壘而山崩地坼，輕舟驚擊奮揚而瓦解灰飛。白刃雜以火攻，烏合因而獸散。」（〈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門收復安平露布〉）兩句浩浩十一字的長句，一氣呵成，如長川大洋，來勢洶洶；緊接著兩句六字的短句僅及前句一半，在律動上的陡縮，形成節奏上有趣的變化。前者句中意象以巨砲震雷對比輕舟飛鷺，強烈的崩裂對比輕揚的飛散，大與小、重與輕、影與音、天與地，綜合著懸殊的對比，衝擊出激昂的情緒；後者再以白與紅、合與散的對比，凝聚短兵相接，速戰速決的快感。戰場上緊張的肉搏，與抒爽的凱旋，經由強烈的氣勢傳達出具體的臨場感。

克復府治時，藍鼎元在捷報上飛筆疾書：

我師威武奮揚，左翼右翼，一人可以當千；大砲連環齊發，陸軍水軍，三矢仍看餘二。屍填巨港，亭觀等于雞籠；戈倒沙灘，棄甲齊於龜佛。（〈鯤身

西港連戰大捷遂克府治露布》)

真是軍威浩蕩，恰似崩山斷河之勢，彷彿兵士個個精銳，以一當百；而其軍備精良充裕，綽綽有餘。士氣鼓揚，朱黨潰似塵粉；易如取卵，凱歌即將連奏；戰後清剿，藍鼎元主張從嚴誅除起事參與者，他說：

海外反側地，非樹威不足彈壓。奸徒無所畏懼，將何以為定亂之資？可以仁慈之治治之！吾于就撫者加之恩，力擒者棄諸市，情法分明，任其自擇，庶可淨盡根誅耳。……正惟好生，不得不以殺止殺。亂賊不殺，害及善良，刑法將安所用？而亂賊尚不可殺，則又何賊不可為？」（〈與台灣道府論殺賊書〉）

一路讀來嚴肅峻厲，冷若冰霜，字裡行間，殺聲連連，宛如迅雷之瞬將奪魂，氣勢強悍，難以遏止。實際上在文字的裡層，卻是憂國憂民，保境安邦的一片苦心，既非嗜血揚威，更非無情肅殺，直若金剛護法的庇祐黎民。

另外必須特別一提的是，主張陰陽剛柔之說的姚鼐認為：文章以陰陽互相調和者為善，至陰或至陽之文都不是追求的目標，他說：

一陰一陽之為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復魯絮非書〉）  
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又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債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海愚詩鈔序〉）

天地萬物並含陰陽，往往陰中帶陽，陽中帶陰，互有相容相併。天道若此，世道亦然，文道不殊。《東征集》瀰漫陽剛之氣，而其間雜糅以陰柔。這主要來自於藍鼎元常能將心比心，因而在行文語氣上出之以平和柔軟之詞，在處置措施上得饒且饒多留餘地，甚至是賞罰判決上將功折罪不嗜殺，文章所在多能見及其溫和體貼的心思，使冷漠的戰局別見一股暖流。

例如：當結集閩、浙、粵三省大軍浩浩蕩蕩揮戈直逼臺灣之時，藍鼎元先行佈告一封給全臺百姓的公開信〈檄台灣民人〉中，卻一開始就以悲憫的語言體貼民心，他寫道：

檄告台灣民人：土賊朱一貴作亂，傷害官兵，竊據郡邑；汝等托居肘下，坐受摧殘，無罪無辜，化為醜類，深可憐憫！本鎮總統大兵，會同水師提督施尅旗剿滅，為汝等蕩敵邪穢，共享太平。非有立意殺戮、苛求於百姓之心，汝其自安無畏。

文中無軍將耀武揚威之惡，也無官僚頤指氣使之醜，只有一團惻隱，無比同情而已。表露出作者仁慈柔軟的內在心腸，為緊張對峙戰局中的廣大百

姓，頓時憑添庇蔭，注入生機。檄文基於安民，繼之以開設多重接納管道，歡迎良民來歸，在陳述具體做法前的一段話，更加深入體貼，他絮絮言道：

為念汝等賢愚不一，或有抗節草澤，志切同仇，或不得已畏死脅從，非出本願；若使崑岡炎火，無分玉石，誠恐有乖朝廷好生之德，且非本鎮靖亂救民之心。為此不追既往，咸與維新。

在對朱一貴集團嚴加撻伐，誓言彌平其變的堅定中，藍鼎元的文字又同時表露了對民眾視如己親的關懷與接納，一如清風甘露，嘗試展現誠意以慰撫不安的心靈。全篇〈檄台灣民人〉恩威並施，張弛相用，嚴峻威嚇中又不失慈柔體恤，誠乃剛中帶柔之佳作。無怪乎王者輔以「平臺第一妙著」<sup>38</sup>稱譽之。

總體而言，《東征集》在整體主題內容上嚴肅凝聚，明確端正；在行文氣勢上強悍高亢，雄壯威武，偏屬於陽剛的風格。這主要因為它是征戰之下的產物，沙場上血淋淋的肉搏殺戮，與文案上運籌帷幄的慷慨陳詞，同樣攸關局勢的起伏及最後的成敗，絲毫不能掉以輕心，生死的考驗，迫促的局面，尤其身當短兵相接的時刻，全力搏鬥的英豪分外難掩其陽剛的特質。

## 2. 條理周密的結構

藍鼎元原為閩中儒者，思想歸宗程朱，嚮往濂洛風範。<sup>39</sup>康熙 46 年 (1707) 福建鰲峰書院修成，受邀為纂訂先儒諸書，當時巡撫張伯行禮遇有加，曾謂：「藍生確然有守，毅然有為。良才，吾道之羽翼也。」<sup>40</sup> 其人品由此可見一斑。而所謂文如其人，有守有為的性格恰如文章之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於兵馬擾擾、視聽囂囂之際援筆，仍能思路清晰，循序漸進，也側面顯示出藍鼎元處事沉穩冷靜的個性。<sup>41</sup> 對於這一點，藍廷珍十分欣賞，特別於〈序〉中回憶道：

予胸中每有算畫，玉霖奮筆疾書，能達吾意。……當羽檄交馳，案牘山積，裁決如流，倚馬立辦。猶且篝火，連宵不寐，而籌民瘼。

綜觀《東征集》諸文的結構大體端肅平正，其脈絡發展清晰，首尾相互

<sup>38</sup> 見王者輔評〈檄台灣民人〉，《東征集》第 5 頁。

<sup>39</sup> 參見藍國榮《藍鼎元研究》第四章第 139-170 頁。

<sup>40</sup> 參見《平臺紀略》藍雲錦〈行述〉第 6 頁。

<sup>41</sup> 劉雨《寫作心理學》：「外界的聲音如果超過了一定的分貝，就會在作者大腦中產生干擾和噪聲污染作用，破壞作者內部注意的穩定性，影響其構思效率。」第 272 頁。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4 年初版。

呼應，作為官方公告或正式往來的文書，是十分恰當的。茲就其促成結構緊密的二大理法分述如下：

### (1)辨證方法的運用

藍鼎元在臺諸作以論辨文為最多數，論辨之文目的在說服讀者，採納己見；即使是檄文、露布、諭令、看語等性質有所不同的文章，也無不要求盡量做到自圓其說，以期使人心悅誠服的境界。要達到此一目標，除了為文須先立意，接著便須努力辨明是非，釐清疑慮，終究定奪取捨，闡明意旨。這一段暢通事理的過程，頗能反映作者對於事務的見解是否先已了然於胸。

先秦諸子思想勃發，往往能說擅議，足資參考。其中，提倡「兼愛」說的墨子首先建立了有組織系統的論辨技巧<sup>42</sup>，「三表法」即是重要的代表，他說：

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墨子提出的方法，強調了運用在論辨文組織方法上的三要點，即：第一，說話有據；第二，察考實情；第三，注重實用。三表法深入於縱向的歷史經驗，立足於橫向的現實事況，而建立起對未來的應用的有效性，可以說是順應時間流向，運用貫通過去、現在、未來的人性體驗所建立起來的論證方法。此外，三表法與強調所謂正、反、合的辨證法是相類通的，所謂「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是從正面尋求依據；「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是從側面或反面等多角度，搜查不同於正面的看法；「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就其終極運用的可能作綜合審斷。則「本之」為正說、「原之」為反說、「用之」為綜合，不亦宜乎！

邏輯性敘述有助於表現理路的暢通，環覆的運用辨證法則可讓事理愈辨愈明。墨子即使沒有潤飾華麗的詞藻，透過三表法的層層論析，無形中產生巨大的說服力，足以打動廣大人心，後起的墨家因而蔚為顯學。三表法辨證的應用和效果，其實墨子自身成就便是最好的例證。取此三表法檢視《東征集》作品，竟見王者輔早已指出：

<sup>42</sup> 參見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第102頁。

余獨喜是書成於戎馬倥傯，事機呼吸之餘，而整暇從容，有古人誓令遺意；且能使東寧山川形勢瞭如指掌，不必身親其地而歷歷如在目前；又言皆有用，非徒為無益之虛談也。

王氏此言歸納評論藍氏作品的優點，恰恰好符合了三表法的訴求。雖然未知是否王者輔即是以三表法套用評讚之？但藍鼎元作品中的擅於辨證，確實是歷歷可指。

著名的〈論臺鎮不可移澎書〉一文可說是很好的例子。此封書信除起首客套語不論，其議論重心以朝廷部臣下達的「臺鎮移澎」憲令為正，所謂「本之」；以藍鼎元親身登陸台灣、深入民情的經驗和觀察，分析臺澎現實地理為反，所謂「原之」；以部議執行的可見後果，提出嚴正警告，並明確作出「臺鎮不可移澎」的具體建議為合，所謂「用之」。經過如此辨證之後，臺灣位置的攸關大清安危，已昭然如在目前，臺鎮移澎命令之膚淺，也令人無法苟同。此文見解最後終能撼動朝廷，使得政策及時懸崖勒馬，臺灣日後的治安方能有較強固的憑依。文章，果然是「經國之大業」（曹丕〈典論論文〉語）。

再如〈論征臺壯丁停餉歸農書〉，直可謂為兵請命。回溯當初為募集兵丁千餘人許以名利，今事成正待論功行賞，卻欲以停餉解散，若命令一出，失信於兵，恐將招致難以收拾的後果，因此藍鼎元急速修書一封請即收回成命。藍鼎元運用反覆辨證，一再對比今昔，並陳正反後果，呈現出若真執行上命之後的可能情況，突顯此令的不當：

此曹招募之初，原許給與各糧，造入兵籍，俾出死力以建功名。（昔-本之-正）……今地方事定，正功行賞之秋，酌酒相慶，望功加部劄者不知凡幾。一旦停止月糧，令回農畝，將無視為空中霹靂，可驚可愕之事乎！（今-原之-反）……

小人無知，嘵嘵有詞，謂事急欺我以出征，（昔-本之-正）事平束我于高閣。昔許我官，今吝我糧。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烏盡弓藏，復見今日。（今-原之-反）

使千餘人俛首遵命，覓舟配載，亦已駭人耳目。（本之-正）萬一掉臂弗依，勢難終止。懾以兵威，遂成變亂。（原之-反）……

某謂此千餘人萬不可棄。……似不如仍留在伍，汰內地各營老弱以補之。（用之-合）

正反辨證的結果，使得事理欲加明晰，這不僅關乎政治的舉措而已，尤其

暴露出官宦的傲慢自大，失信無禮，若此諸人讀此信當覺汗顏啊！

## (2)系統佈局的鋪敘

完成一篇佈局周密的文章，首先要能化繁為簡，提綱挈領；接著要能順序井然，言之有理；終究達到首尾完備，渾成一體。這樣的歷程符合初現、發展、收束的自然規律，展現出一種順序美，與人類心緒情感的波動規律、理智思考的推進規律，都是相協和的，這也可謂是一種美感享受。如此可以說周密完整的敘述，是讀者內心自然的期望。也因此，正式文書力求四平八穩，正是符合這樣的基本內在心理。因此，即使馬前落筆何其緊急，或善後經理何等龐雜，只要先做到了靜心立意，繼之以章法技巧的運用得宜，則文章辭達氣順的目標，應該也能雖不中亦不遠矣。

對於結構的安排，劉勰認為應該做到：

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莽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裡一體。此附會之術也。（《文心雕龍·附會》）

為文若可做到提綱挈領、井然有序、渾然一體，便能使讀者一目了然，掌握重點。對於論辨文而言，結構佈局之完備尤其重要。以藍鼎元沉穩的性情、過人的識見，助之以有系統的陳述技巧，則其行文條理之清晰、說服力之強勢、影響力之綿遠，也自然能夠有跡可循了。不論短製或長篇，起結完備，首尾呼應，是《東征集》中許多篇章的共同特色。

例如〈覆制軍臺疆經理書〉一文可為典型。除了文章首尾的前言、結語之外，論事則逐條陳列上級來函的指示，以「伏讀憲諭」摘錄諭令重點，再以「今竊議」、「今所宜更議」、「今擬」、「妄為酌議」等語詞區隔，舉述臺地古來的歷史變遷、現時的地理實況，與執行時的可能困難，逐一商議，剖析利弊，精算情勢，最終斬截直言，具體建議。全文綱舉目張，理路條暢，心無模稜，胸有定見。有條不紊的系統佈局，使議論格外細膩分明，即使屢屢衝撞上意，卻在相互對比之中，益發彰顯其識見的可行性與正確性。

再如朱一貴事件善後，上令將起事者所在地之羅漢門、黃殿莊等毀屋、焚田、驅民，以收淨空封鎖之效。藍鼎元書中直言此是「因噎廢食，乃為全身遠害」，明白標出六大「可慮」，逐一力陳其中弊害，廓清思考盲點，這彷彿六道利箭，一一摧破上諭，其勢難遵行，已不言可喻。

又如鑒於朱一貴之起事，上諭擬將臺地兵備添防。藍鼎元亦深感必要，但他進一步指涉全臺，分區擘畫，自郎嬌(今恆春)起佈置兵員之外，尤其應在諸羅以上增設一縣、淡水則設巡檢，兼顧雞籠山後，言簡意賅，格局遠大，展現出對臺地長治久安之經略懷抱，也切中治安之要點。後來雍正元年(1723)頒布設置的彰化縣、北路三營，正是朝廷聽取其建議後的重大決策。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全文雖長達 4300 多字，所涉諸事紛雜龐大，讀來卻能要言不煩，明快淋漓，甚至理氣暢貫，令人意猶未盡。析之可各為短論，合之可化為長篇，其要在於各節體系獨立，述論章法縝密，加以所論深具見地，本文允為藍氏《東征集》的重要代表作。

再有〈論臺中時事書〉最是綱舉目張，一目了然。第一段開門見山便將欲述之時事一一標舉，謂：

臺中時事，有大可慮者三：米貴兵單、各官窮蹙、政務懈散，而又將有移鎮澎湖之舉，是合之而四矣。

其後依此順序逐一鋪敘，剖析時事可慮之處，並提出修補之見，關心之情，溢於言表。

## 四、結語

《東征集》脫稿於兵馬倥傯之際，應用於兩軍對決的關鍵時期，立論往往攸關大局，牽一髮而動全身，六十篇既是紀錄朱一貴事件的珍貴歷史文獻，也是台灣早期少見優秀的宦游文人的散文作品。沙場文學的嚴整端肅、俐落果毅，實在大大有別於太平時代的日常案頭寫作。

《東征集》作品多數要求高度的實務應用性，就政務方略往來發表的論文，都有其明確且具時效性的訴求，其篇章發表後的效果常常是明顯且立即的，這絕對不是紙上談兵。「實用」成為《東征集》最鮮明的基礎特色，偏屬於應用性散文。

書文往來是當時決定政策的重要討論管道，然臺灣地處海表之外，舟車交通不便，十分勞煩，論札上下往來宜言之有物，《東征集》作品便是以文武官員之間往來議事的書信為最大數量。在全書六十篇作品中，絕大多數為說理性兼實用性散文，尤其以諮議磋商的論辨文字為最主要，間及



少部分的山川賞覽的遊記。基本上，藍鼎元是以經理臺地的角度，作為《東征集》寫作的基礎眼光。因此在文章中少見遣興抒懷的柔情，而多能見其經略擘畫的剛健胸襟。在此經國濟民的端肅格局下，其文章趨向於陽剛風格的表現，確切彰顯了當時征戰的背景氛圍；而其作品佈設條理周密的結構，則適切地運用辨證等方法，有效強化了見解的說服力，藍氏在識見卓越出眾、展述細膩有序兩方面，具體呈顯出了雙重的優異成績。

藍鼎元在運思屬文上，大體立意正而理脈暢，理脈暢而氣勢盛，可謂兼具「意」、「理」、「氣」三體，使其篇章在文學上表現出意正、理暢、氣盛的陽剛特質，文學成績卓然可觀，足以與其歷史文獻成就相輔相成，藍鼎元《東征集》實屬難能可貴之作。

如《東征集》一般優秀的台灣傳統漢語散文，歷來亦頗有可見，例如：江日昇《臺灣外記》是一部生動活潑的歷史小說、郁永河《裨海紀遊》是一部優秀寫實的遊記文學，再有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吳德功《瑞桃齋文集》等等，皆別具特色，各有可觀。固然詩可以為史，文又何嘗不是呢？散文的表現與詩歌各成異趣，其形式多樣與內涵多元，都使散文字具有極大的廣度與深度。尤其在台灣特殊的地理環境、與變遷的歷史歷程為背景之下，長期以來台灣傳統漢語散文的寫作，無非也是歷史書寫的重要側面。放觀歷來地方志中浩浩卷帙所採錄或所參照<sup>43</sup>，詩文必然都是最重要的內容與材料。而藍鼎元《東征集》之作，既深具史學文獻的價值，又兼涵文學藝術的美感，可說是台灣傳統漢語散文中的典型之作。

台灣傳統漢語文學的形式，大體上不外乎詩與文兩大類。台灣歷來詩歌數量之豐富早已眾所周知，《全臺詩》的編纂即是具體的呈顯；然而台灣歷來散文作品的分析研討或彙編綜觀，卻仍然深感不足。如果有朝一日也能有《全臺文》的編修，則台灣傳統文學豐富的內涵，便能有更加完整的展現。

（本文參考書目已詳見附註，不再複列。）

<sup>43</sup> 參吳福助《清代纂修臺灣方志徵引詩文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

# The literary appear about Ting-Yuan Len's “ The collection of east subjugation ”

Lin Tsuey-Feng

## 【Abstract】

Lan Ting-Yuan came to Taiwan with the Ching government's forces in the Chu I-Kuei event. During the event, he participates in planning and wrote legal papers. After the event, he published a book, called “The collection of east subjugation”, and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y records about the Chu I-Kuei even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took care of history record values, but now, my paper try to develop a new way in literary appear, includes the work meaning and the esthetic sense.

”The collection of east subjugation” has 60 writings; most of the theme are prose both of preaching and useful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argumentation prose. Those writings trend to the tough style, the style shows forth the war's atmosphere; the arrangement of ideas is careful and thorough, that used dialectic and emphasize author' observation. In conclusion, “The collection of east subjugation” has symmetric logical, than the circulation system is high readable, than the fervor is violent. The works of Lan Ting-Yuan is a nice literature that full with esthetic sense.

**Key words** : Lan Ting-Yuan , ”The collection of east subjugation” ,  
literary appear

## 施士洁 〈臺江新竹枝詞〉探析

向麗頻\*

### 【提要】

施士洁是清代臺南地區的知名詩人，與其父施瓊芳俱為進士出身，成為臺灣歷史上的一段佳話。1894 年清廷甲午戰敗將臺灣割讓予日本，施士洁不願當異族統治之民，選擇內渡大陸回歸祖里，終生不回臺灣，致使內渡後作品時時流露去國懷鄉的哀思。筆者在觀察其內渡作品同時也發現不少涉及風月主題的書寫，其中又以〈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最具代表性。陳香編著《臺灣竹枝詞選集》曾將其與〈赤嵌竹枝詞〉、〈安平竹枝詞〉、〈臺南竹枝詞〉等並置，筆者認為並不妥當，因「臺江」非指「臺南」而言，〈臺江新竹枝詞〉係歌詠福州臺江區的勾欄豔事。清代竹枝詞以吟詠風土者居多，若將「風土」一詞賦予更豐富的內涵，那麼就內容而言，〈臺江新竹枝詞〉實可納入清代竹枝詠「風土」的一環。但就其語言特質看，又不像大部份的風土竹枝那般質樸、口語化，它的詞采典雅，確實不同於清代主流的竹枝寫作模式，是一組精緻的文人式竹枝詞。

關鍵詞：施士洁 臺江 竹枝詞

---

\*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講師

## 一、前言

施士洁（1856-1922），名應嘉，字漢舫，號芸況，晚號耐公，祖籍泉州府晉江縣西岑人（今福建省晉江縣石獅市），祖父施菁華時始渡海來臺，卜居臺南赤崁樓畔石蘭山館（今臺南市新美街）。清光緒3年（1877年）考取進士，與其父施瓊芳前後輝映，成為臺灣歷史上唯一一對父子進士。然施士洁終無意仕進，隔年乞養回臺。先後任彰化白沙、府城崇文、海東三書院掌教，栽培後進，許南英、丘逢甲、汪春源等皆曾出於門下，連臺灣道唐景崧都仰慕他的文名，多次親訪，與施士洁往來唱酬。因其出生日期恰與宋朝蘇軾同月同日（十二月十九日），遂以「後蘇龕」冠其各類著作之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收編為《後蘇龕合集》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215種刊行。

乙未（1895）割臺時，施士洁不願當日本統治之民，選擇內渡回歸祖里，終生不回臺灣，晚年客居鼓浪嶼，困頓抑鬱以終。施氏篤愛鄉邦，內渡後作品時時流露去國懷鄉的哀思，「懷鄉」實為施氏後半生作品所反映的重要主題。就恥為異族之民這點，施氏展現了他的民族氣節。<sup>①</sup>但在觀察其內渡作品同時也發現不少風月主題的書寫，《後蘇龕詩鈔》中有古近體詩1612首，經筆者統計其中涉及風流韻事者約有百首，大都與福州臺江的生活背景有關，其中又以〈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最為知名。<sup>②</sup>

陳香編著的《臺灣竹枝詞選集》曾說：「施士洁此三十二首〈臺江新竹枝詞〉，細敘句闌豔事，又屬大膽創格，使竹枝脫離樸質之野，邁向香奩幽徑。」<sup>③</sup>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也說：「清代竹枝詞大都

① 筆者曾在2002年東海大學中文系舉辦的「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研討會」撰文〈施士洁乙未內渡懷鄉詩探析〉細論此一問題。

② 關於施士洁的風流韻事《聯合報》記者王甘菊曾有如下的訪談記述：「施瓊芳有子施士洁也是進士，故台南人習稱施瓊芳為『老進士』，施士洁為『小進士』。但老、小進士的性格卻完全不同，老進士施瓊芳方正自持，莊嚴守禮，事母至孝，且不干調分外事，只娶一室。小進士則風流倜儻，愛管閒事，總共有十個太太。」（參考王甘菊〈台南米街父子進士〉，《聯合報》，1992年12月28日，受訪者：施燦基、施燦森兄弟（施士洁是其伯公）。）印證施氏作品中有〈金縷曲〉（哭謝姬浣霞）序云：「姬來歸十年矣。丁酉五月，予客臺江，養痾媚香樓上。姬以是月朔日，疫死西岑。予讀家書，病增劇。媚香主人親為量藥稱水，款惜備至。予既悼姬之年雖命薄，而又感主人之交久意真也。口占此闕以示主人，彼此共為一哭而已！」前調〈哭郭姬燕玉〉云：「謝姬歿二十日，姬亦染疫而歿。」（頁336-337，指《後蘇龕合集》中的頁碼，以下均同）〈悼張姬〉七絕十首之一：「九子星中小影孤，後庭下陳表區區。能令粥粥群雌伏，絳口持門勝丈夫！」（頁171）等諸詩，至少可看出至少有謝浣霞、郭燕玉、張氏等三名姬妾。姬妾成群之說自不虛言。

③ 見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95。

寫客觀的風土，像施士洁、連雅堂的竹枝詞幾乎都是寫男女在勾欄之間的豔事，……這些是異於當代的竹枝詞而別創新調。」<sup>④</sup>而施士洁自訂題目為「新」竹枝詞，顯然與陳香、翁聖峰的觀念相同，認為自己這組詩是「別創新調」。那麼這就引起筆者的興趣，究竟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在形式內容上是如何創新？又或者就竹枝詞的發展源流看，它有何繼承與變異之處？施士洁這組香豔刺激的竹枝詞，只是突顯作者是個好色之徒而已嗎？筆者關注此一主題絕不是要藉此鑒定批判作家的個人道德行為，是希望就文藝的觀點釐清上述提出的錯綜複雜問題，並且提供做為「作家研究」更進一步更多面的分析，使人更瞭解、貼近當時臺灣文壇三大詩人之一施士洁的生命情調。

## 二、〈臺江新竹枝詞〉寫作地點考辨

陳香將施士洁這三十二首〈臺江新竹枝詞〉選入《臺灣竹枝詞選集》中，是極不恰當的，觀諸同集中其他的竹枝詞作品，全是描寫臺灣在地的風土民情，但施士洁這一組竹枝詞，除了作者本身是內渡的臺籍文人外，所描寫的時空內容卻與臺灣無關。在目錄編排上，陳香將〈臺江新竹枝詞〉與〈赤嵌竹枝詞〉、〈安平竹枝詞〉、〈臺南竹枝詞〉等並置，不知情者恐將誤以為「臺江」係指「臺南」<sup>⑤</sup>而言。

首部研究臺灣竹枝詞的專著，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書中已提出「臺江」非指臺灣，係指福州。<sup>⑥</sup>然翁著實著眼於宏觀的臺灣竹枝詞發展，無法對單一的作品做細膩的鉤沈，人們亦無法進一步瞭解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的寫作時空背景。那麼〈臺江新竹枝詞〉的「臺江」究竟何所指呢？

〈臺江新竹枝詞〉的「臺江」係指福州市的臺江區一帶，臺江地名據《臺江區志》記述：五代後梁開平二年（908），王審知在福州築「夾城」，在城南寧越門（今南門兜）「登南城翹望，有臺（指「釣龍臺」或稱「越王臺」<sup>⑦</sup>）臨江。」「臺江」（或稱「南臺江」）由此得名。臺江，原名白

④ 見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頁29。

⑤ 清代臺南府與安平之間，本有一內海稱「臺江」，後因泥沙淤積已連成一片陸地。

⑥ 參考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頁162。

⑦ 《福州府志·卷五山川》記錄云：「『釣龍山』在『惠澤山』之南，一名『南臺山』，崇阜屹立，俯瞰大江，舊記

龍江，在福州城南，閩江流至洪塘，分歧為二，北行者經釣龍臺為臺江，納北上眾流，過鼓山，復與南行者（烏龍江）合流，匯於馬頭江，以達於海。⑧臺江地區，早年河道縱橫交錯，水上運輸方便，鴉片戰爭（1840）之後，被列入「五口通商」之一，更成為國際商貿聚集的重要口岸，貨棧、店舖密集，至今仍十分繁榮，百貨大樓、商廈林立。

「臺江」既是商貿集中的地區，自然隨著商業活動而來的社交娛樂行業，如酒樓妓院等，也就應運而生。施士洁詩集中有不少涉及臺江冶遊的作品，如〈上巳日陳香雪會元招游臺江〉、〈清明日，鍾壽若太史招同陳香雪庶常、林鹿儔、陳青湘、林可山三孝廉、林小輪上舍作展花朝臺江雅集詩〉、〈臺江本事詩，□□□□檢討韻〉、〈臺江錄別〉等，可看出施氏若到福州慣常與舊雨新知到臺江尋歡買醉的習性。〈閩游客胡恂如廣文署中話舊〉詩云：

琴尊北海稱賢主，絲竹東山感寓公。依舊臺江春色好，老人星映美人虹

（結伴南臺歌樓買醉）。（頁157）

施氏更毫不隱諱直言自己是「臺江的鶯花帥」，彩雲紅袖殷勤款接，朋侶吟詩唱酬，紙醉金迷、聲色歡愉，還有什麼比這更快樂的呢！〈柬香雪、壽若兩太史〉詩云：

臺江我是鶯花帥，閩苑君為翰墨侯。萬感本來同一夢，兩情於此足千秋。

桃根姊妹相迎接，楊柳樓臺競唱酬。此樂真能忘老死，世人秉燭夜曾遊！

（頁92）

福州的「臺江」直如金陵的秦淮河畔，臺北的大稻埕⑨。另外，從作品中的文字尋繹探求，發現〈臺江新竹枝詞〉第八首提到「蒼霞洲」地名，亦可進一步證明此詩敘述空間並不在臺灣：

蒼霞洲畔短長橋，處處龍舟蕩畫橈。羅襪凌波觀競渡，萬花影裏一垂髫。

（第8首）

漢越王餘善於此釣得白龍，以為瑞，因築臺曰「釣龍臺」，後人呼為「越王臺」。（中國方志叢書第7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12月，頁89。）

⑧ 參考李鄉瀏編著《福州地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二刷，頁129、195。

⑨ 臺北大稻埕，因瀕臨淡水河，亦稱「稻江」，日治日期成為台灣茶、樟腦出口及貿易進口的最大集散地，無論接風洗塵或商務洽公多半在酒樓或「藝旦間」中進行，《三六九小報》第94期曾有此記載：「吾台花界之沿革，恆視商業之盛衰而相推移，在昔商業之盛，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近今則首推島都大稻埕，而花界亦然。」熱絡的商機，為藝旦帶來很好的淘金環境，當時有這麼一句流行語說：「不曾見過藝旦面，不算去過大稻埕」。（關於大稻埕的風月活動可參考筆者另篇論文〈〈三六九小報〉所呈現的臺灣藝旦風情〉，《中國文化月刊》第261期，2001年12月。）

「蒼霞洲」，位於福州市臺江區南部江濱地段，本為沖積沙洲，後淤積成陸地。地名相傳由觀賞倉山晚霞倒映江中而得名，「蒼霞晚照」是明代「南臺十景」<sup>⑩</sup>之一。「羅襪凌波」用的是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的典故，整首詩描寫端午節時，施士洁擁著年輕（垂髻）、美貌（羅襪凌波）的歌姬到蒼霞洲觀賞臺江的龍舟競渡。明代曹學佺<sup>⑪</sup>曾有〈臺江觀競渡〉詩云：「人看龍舟舟看人，人行少處少船行。有時泊在柳陰下，蕭鼓寂然聞水聲。」可見自明代以來，這裡即是福州舉辦端午節慶典活動所在。

### 三、就內容層面論〈臺江新竹枝詞〉非「大膽創格」說

依據陳香的說法〈臺江新竹枝詞〉屬「大膽創格」，翁聖峰也認為「這些是異於當代的竹枝詞而別創新調」。清代竹枝詞的創作觀念受著名詩人及詩論家王士禛的影響極大，王士禛《帶經堂詩話》指出：「竹枝詠風土，瑣細詼諧皆可入，大抵以風趣為主，與絕句迥別。」<sup>⑫</sup>再審視清代臺灣詩壇的竹枝作品，如郁永河的〈臺灣竹枝詞〉及〈土番竹枝詞〉等，儼然就是王士禛竹枝理論的實踐，<sup>⑬</sup>清代竹枝詞確實以吟詠風土者居多。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在題材上既非「采風問俗」，在語言上也不「詼諧風趣」，或許正因如此，作者遂將這組詩定名為「新」竹枝詞，相對於清代的竹枝主流來看，它屬於「大膽創格」，然而就「竹枝詞」的發展源流而言，施士洁這組詩並無創新之處。

竹枝詞本四川巴渝（唐代的夔州）一帶民歌，唐代幾位詩人如杜甫、白居易、劉禹錫等曾先後來到此謫居仿作，而有文人竹枝作品傳世，竹枝詞的創作歷代相承，變成「詩」文類中的一項「次文類」。以竹枝詞較早而知名的作品劉禹錫現存的十一首〈竹枝詞〉看來，它們在內容題材上可

<sup>⑩</sup> 福州臺江區南部，亦簡稱「南臺」，臺江區東南有「瀛洲」，福州著名的風景區「鼓山」，廈門鼓浪嶼有「鹿耳礁」等，這些容易與臺灣造成混淆的地名，在解讀臺籍內渡文人作品時，應加以細心辨明。

<sup>⑪</sup> 曹學佺（1573-1646），字能始，號雁澤、石倉居士，侯官人（今福州），明萬曆 19 年（1591）舉人，萬曆 23 年（1595）進士。南明政權時，授太常卿，為禮部尚書，清軍攻入福州時自縊，著有《石倉全集》。

<sup>⑫</sup> 見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九答問》，臺北：清流出版社，1976 年 10 月。

<sup>⑬</sup> 郁永河，浙江仁和人，清康熙 36 年（1697）因採硫渡臺，著有《裨海紀遊》、〈臺灣竹枝詞〉十二首、〈番社竹枝詞〉二十四首。茲舉兩首郁永河描述臺地風土的竹枝詞以驗其說：「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生來曾不識衣冠，裸體年年耐歲寒。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團圓。」據翁聖峰對於臺灣竹枝詞的統計與觀察，也證實大部份的竹枝詞與「采風意識」有密切的關係。（參考《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第三章第一節方志采風與清代臺灣竹枝詞〉，頁 47-64。）

以被歸納為以下三方面：一、描寫「男女情愛」，如「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二、記錄地方的「風土民情」。如「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間。銀川金釧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三、「感懷身世」，表達自己對世態人情及被貶銜怨的內心感嘆。如「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回。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還。」雖然宋、元、明、清歷朝各自有不同側重的發展，竹枝詞的寫作內涵大抵不出以上三種。<sup>14</sup>以下分別就此三項來檢視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所描寫的內容：

### （一）男女情愛

臺灣割日，施氏於光緒 21 年（1895）九月初五日西渡，未回原籍泉州晉江縣西岑之前，暫住廈門，於年底才回故里與家人眷屬會合。稍後參加商會，往來福州、廈門間，主辦貢燕業務。這組詩大約作於清光緒 33 年（1907），施士洁時年 53 歲，施氏內渡至〈臺江新竹枝詞〉的寫作年代（光緒 22-32 年，42-52 歲）約有十年的時間，曾五次造訪福州，<sup>15</sup>光緒 32 年（1906）這次特別與舊識胡恂如<sup>16</sup>父子過從甚密，經常結伴至臺江的歌樓酒館尋歡買醉。施士洁這一組詩是描寫到妓館狎遊的經歷，內容盡是男女相處的歡娛膩愛，展現旖旎香豔的情調。以下試舉數首詩，以見一斑：

半禡羅裳著意紅，小開卿莫罵東風。個儂非想非非想，祇在花魂宕漾中。

（第 3 首）

合歡雙蠟照深更，暱枕羞聞喜爆鳴。驚起比鄰諸姊妹，悄開窗戶探春聲。

（第 5 首）

消受嫣紅得未曾，巫雲楚雨總瞢騰。句闌第一婁羅歷，繫足原來有赤繩。

（第 7 首）

<sup>14</sup> 張家豪〈竹枝詞探析一以劉禹錫〈竹枝詞〉為對象〉一文對竹枝詞的演變特質有一段切要地描述可茲參考：「任何的文類其內涵在經過時間與空間的洗禮之後，便會產生不斷地演化、變動，並非一成不變的。竹枝詞的發展過程相當漫長，而各朝代所表現的特色亦因此而各有不同，如元、明兩代的竹枝詞出現許多歌詠男女感情的作品，特別是描寫水上『郎情妾意』的主題，而清代的竹枝詞則多是寫客觀的風土，甚至亦出現描寫男女豔事、詠懷史事等突破傳統的竹枝詞作品……這些作品雖然異於傳統的竹枝詞而別有創新，然而仔細考察之後，仍可發現其『異中有同』，也就是它們在異於傳統之外，仍具有竹枝詞的共通性，這其中的癥結點可能是因為竹枝詞的作者雖然都認同竹枝詞該描寫該地方的風俗，但是每個人對於『風土』的內涵指涉的理解不盡相同，才會出現各種不同形態的竹枝詞。」（《中文研究學報》第 2 期，1999 年 6 月，頁 144。）

<sup>15</sup> 見《後蘇龕合集》〈贈墨仙〉詩云：「十年五度榕城別，送客江頭淚不乾！」「墨仙」即胡恂如之子，以商戰雄於香港。（頁 158）

<sup>16</sup> 見《後蘇龕合集》〈閩游客胡恂如廣文署中話舊〉詩云：「秀才康了尋常事，君我同時有淚痕（辛未與君歲試臺、影兩邑，各冠童軍；旋以意外風潮，被斥不錄）。三十年前鯤海夢，那堪白首話榕門？」（頁 157）



既然施氏寫的是妓家風月，當然有不少引人遐思的情色畫面，羅裳半開想入非非、床上的巫雲楚雨等等，十足活色生香。有時施氏並不僅只逢場作戲，甚至動過金屋藏嬌的念頭，可惜他太窮了，<sup>17</sup>付不起贖身錢。既然現實上無法如水宿鴛鴦般形影不離，那麼懷裡揣著美人的照片總可以吧！呈現出詩人鸚鵡情深癡情的一面。如詩云：

天錢欲借聘仙娥，誰向冰人假斧柯？空有阿嬌金屋想，老窮其奈阮修何！

(第 31 首)

輒然開卷見崔徽，行篋新攜小影歸。此是長房真縮地，永報鸚鵡不相違。

(第 32 首)

這類針對狎客與妓女的情色描寫或將被視為浮豔妖冶之詞，在詩歌的傳統中，應較接近「香奩體」<sup>18</sup>與「宮體詩」<sup>19</sup>，似乎與歌詠風土，語言質樸的清代竹枝詞觀念沾不上邊。不過，若迴溯竹枝詞發展史，元末竹枝詞名家楊維禎<sup>20</sup>已有這類反映食色享樂的作品，楊維禎平時狹妓放縱，「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所疾。」〈西湖竹枝歌〉之一云：「鹿頭湖船唱報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為郎歌舞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吳下竹枝歌〉亦有纏綿緋側的詩句：「寶帶橋西江水重，寄郎書去未回儂。莫令錯送回文錦，不答鴛鴦字半封。」清人翁方綱認為：「竹枝本近鄙俚……楊廉夫乃以浮豔得之。」更可清楚看出施士洁〈臺江新竹枝詞〉的因襲痕跡，它僅僅不符合清人對「竹枝詞」的主流看法，在竹枝詞的發展史上並不具有「創新」的意義。

## (二) 風土民情

- <sup>17</sup> 內渡後的施士洁轉徙流蕩，一事無成，常寄寓在臺籍友人家中，因而時有阮籍途窮之概，如〈疊前韻柬厚菴〉(頁 97)云：「客中十事九無賴，誰慰窮途老阮籍！」〈次林五峰廣文韻〉(頁 105)云：「浮塵滾滾渺鍾期，雅怨騷懷不自持。儘有苦心工鍛句；總無媚骨學趨時。生難阮籍空囊守，死便劉伶短鋤隨。白眼看天吾倦矣，為君乃復一中之。」〈感事書懷，再疊前韻寄介堂，並質琛笙、允白〉(頁 226)云：「匆匆過隙白駒如，歲事催人臘雪初，阮籍豈應傷末路？袁安猶可臥窮廬。濁醪竟夕難成醉，禿穎多年不中書。一笑歸來彈劍劍，孟嘗門下食無魚！」
- <sup>18</sup> 晚唐詩人韓偓(844-923)《香奩集》，多為豔詩，後人遂稱此一詩風為「香奩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列有「香奩體」，釋云：「韓偓之詩，皆裙裾脂粉之語。」
- <sup>19</sup> 「宮體詩」為南朝齊、梁時期出現的一種詩風，梁簡文帝蕭綱(503-551)所作的詩，辭藻華瞻，內容輕佻放蕩，不少描寫宮中歌妓舞女的生活情態，引起大臣們群起仿作。徐陵(507-583)把這些詩收入《玉臺新詠》，故「宮體詩」又稱「玉臺體」。
- <sup>20</sup> 楊維禎(1296-1370)，元山陰人，字廉夫，號東維子。因讀書鐵崖山，又號鐵崖，晚年自號老鐵。泰定四年(1327)進士，元末為江西儒學提舉。著有〈西湖竹枝歌〉九首、〈吳下竹枝歌〉七首、〈海鄉竹枝歌〉四首，其中以閒居杭州西湖時寫的〈西湖竹枝歌〉流傳最廣，當時南北名士屬和者百餘家，後來這些創制輯成《西湖竹枝詞》二卷行世，明清兩代競相傳刻，廣泛傳播，直接影響了東南一帶的詩風變化。(參考王忠閣〈元末《竹枝詞》的繁榮及其文化意蘊〉，《中州學刊》總 112 期，1999 年 7 月，頁 105)

自從清代著名詩人及詩論家王士禛提出《竹枝》「泛詠風土」之說後，許多詩人競相以竹枝詞形式書寫各地的山光水色、風俗民情、歷史文物、氣候物種等等，動輒數十首甚至幾百首。由於寫實的特質，竹枝詞保存了豐富的民俗資料。〈臺江新竹枝詞〉勾勒出一個特定時空的社交娛樂生活，正如翁聖峰所說的妓家生活也可視為「描寫另一種生活層面的風土詩」。

①

筆者曾依據 1930 年至 1935 年臺南發行的《三六九小報》〈花叢小記〉（專門刊載「藝旦」活動）專欄對臺灣藝旦的生活概況和行為模式有過初淺的觀察，發現〈臺江新竹枝詞〉中所描寫的妓家生活與臺灣的藝旦頗多相似之處。寫於 1934 年的劉捷〈臺灣藝旦社會學〉有如下一段記載：

現在，在對岸的福州有白面娼、清唱軒，相當於臺灣的藝旦，專門賣藝，在上海有堂子、長衫、腰二，在廈門有童子班，由臺灣前往操業的藝旦，稱閩旦。<sup>②</sup>

福州與臺灣藝旦同質的行業稱「白面娼」，臺灣藝旦能詩能文能彈唱，〈臺江新竹枝詞〉（第 9 首）亦說：「曲中絃語訴喃喃，才上歌場已不凡。」可見福州的高等妓女也要求彈琴、唱曲的技藝。而臺江的風月場也不遑多讓，如：

酒人狼藉到杯盤，解得憐儂下箸難。忍俊不禁消夜局，自熬杭粥勸加餐。  
（第 23 首）

昨宵剝啄倚床聽，牢守顛當喚不應。慣打茶圍夫己氏，教他一喫閉門羹。  
（第 20 首）

拇戰轟雷鬥酒軍，爭先破敵奏奇勳。替郎強飲防郎醉，知道尋常量幾分。  
（第 28 首）

繡鞋窄窄鳳頭如，恰稱圓膚六寸餘，綺席散歸佯步蹇，挽郎親送上藍輿。  
（第 29 首）

① 見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都是歌筵香奩之體，連雅堂的〈臺南竹枝詞〉亦以寫時下男女風情為主，吾人大可不必為賢者諱或是附會風雅，自可將這些作品視為描寫另一種生活層面的風土詩。」（頁 144）筆者將〈臺江新竹枝詞〉的內容分為三種，其中第一類「男女情愛」和第二類「風土民情」，恐造成分類觀念上的混淆，「男女情愛」不也算是「風土民情」的一部份嗎？因此筆者有必要進一步說明分類的原則，「男女情愛」部份所側重的是作品中所顯現的男女交往情感，屬於詩的內緣研究，而「風土民情」部份主要觀察作品所透露的臺江區的情色文化，屬於詩的「社會」研究。第三類「感懷身世」在性質上與前者同。

② 參見劉捷〈臺灣藝旦社會學〉，鄭清文譯，《聯合文學》第 3 期，臺北：聯合報社，1985 年 1 月，頁 89。〈三六九小報〉第 206〈閩江花叢〉亦有此一說：「本地（閩江）妓女，均稱白面，若外江歌妓，能唱京腔者，則稱堂子，聲價各異。」

宴席上佳人擋酒勸飲，拇戰轟雷的熱鬧情境，鮮明活現。臺灣藝旦大多有自己的藝旦間，可以準備簡單的果點與清粥，在藝旦間裡接客，不過，多數是「出局」到各大酒樓、餐館裡陪酒助興。正宴結束若意猶未盡，可轉移到美人的香閣繼續「消夜局」，在臺灣稱為「二次會」。而如果不想大擺宴席也行，則直接到美人住所「打茶圍」，在臺灣稱為「點煙盤」<sup>25</sup>。這種陪侍也不限定以市區作為活動範圍，他們往往相偕出遊。前述提及的〈臺江新竹枝詞〉（第 8 首）攜佳麗到蒼霞洲看臺江裡的龍舟競渡即是一例。這些歌姬並不是純粹賣藝不賣身，若遇到合意又出得起錢的對象，也允許共度春宵，上述詩中寫某個慣「打茶圍」的「夫己氏」（意指某人），來遲一步，室中已有入幕之賓，遂吃了閉門羹。

妓女們的身價取決於她的色與藝，因此從小學習彈唱等技藝外，有的也會和名師學習吟詩填詞，以便附文人學士之風雅。文人墨客，喜歡召她們出局或到其香閣飲酒唱和，欣賞詩文，留下不少韻事。施士洁另有〈咫園和痕字韻疊韻答之〉（頁 159）詩云：「人面桃花似去年，又箋『香草』學莘田。群雌見我新詩扇，一日臺江萬口傳（臺江宴集，以咫園所贈詩扇傳示歌姬）。」亦顯現臺江群妓的文化水準。

### （三）感懷身世

施士洁曾在六十歲時寫下〈耐公六十自祭文〉（頁 387），對於自己的一生做如下深哀沈痛的呼告：

嗚呼耐公！生慚人傑，死愧鬼雄。六旬無用，一竅不通。生不如死，膏恨長終！回思少壯，吐氣如虹，二十登第，三十從戎。不圖轉瞬，萬念皆空，桑田滄海，歷劫重重！四十避地，五十飄蓬，不仕不隱，不商不工，不樵不牧，不釣不農；淵明無菊，宏景無松，嵇康癖懶，阮籍途窮。琴焦爨下，錐伏囊中，一生磨蟻，到處泥鴻，駢枝贅拇，朽禿成翁。而今已矣，漏盡鳴鐘，天人交迫，貧病相攻。神州莽莽，萬丈塵紅，浮沈人海，曼衍魚龍。掀髯一笑，頭腦冬烘，強裝瘡啞，故作癡聾；目不欲視，耳不欲聰，貞我困厄，篤我罷癯。昔賢八十，尚兆非熊。繫予小子，花甲剛逢，業不加廣，爵不加崇。形骸木偶，眷屬萍蹤，老而自弔，大耄嗟凶！

<sup>25</sup> 「點煙盤」是指上藝旦間時，藝旦的家人（通常是老媽）會捧出煙盤請客人吸食鴉片，客人為答謝藝旦家人的熱心款待，就拿錢放在煙盤上作為回報。後來鴉片被禁止後，就改放香煙、瓜子、蜜餞等物。（參考柯瑞明〈台灣藝旦紀事〉，《台灣風月》，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年1月一版二刷，頁125。）

施氏內渡後，在臺灣奠下的產業、名位與尊崇一時煙消雲散，生命頓如飄蓬，轉徙於福、泉、廈各地，卻一事無成，老來貧病交迫，面臨中年人生的轉折與失落，酒色無疑是他排憂解悶的最佳途徑。若就內容上分析，〈臺江新竹枝詞〉中兒女情長與與身世感懷二者實是結合的，即借溫柔鄉來消解胸中鬱結。如詩云：

秋霜偏向客衾生，難遣中年以後情。怪底詩人寒瘦相，累卿擁背到天明。

(第30首)

名士的落拓與名妓的沈淪易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昇起同病相憐的情愫：

曲中絃語訴喃喃，才上歌場已不凡。綺歲便為商婦感，有人老大濕青衫！

(第9首)

柝聲催過四更天，燭底溫存尚未眠。瞥見枕屏雙影瘦，郎儂同病愈相憐。

(第25首)

狎妓冶遊本是唐朝士人無傷大雅的嗜好，社會道德、政府法律均不禁止，亦無關乎個人聲譽名節，以晚唐杜牧（803-852）的〈遣悲懷〉為範例：「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此詩中呈現的自我嘲弄與無可奈何之歎，正是那一時代士人的共態。老、病、窮的詩人僅剩的只有名氣而已，妓女們也好結交才子名士以自抬身價，而溫柔鄉中也確能暫時提供逃避社會現實的避風港。施士洁的狂蕩，正展現一種末路英雄及時行樂、自我麻醉的心態。<sup>24</sup>

## 四、〈臺江新竹枝詞〉的寫作特色

### （一）連章組詩形式

施氏的〈臺江新竹枝詞〉是一組由三十二首七言絕句組合而成的連章體組詩。<sup>25</sup>第一首說「昌蒲綠酒<sup>26</sup>正酣時，浪跡臺江譜竹枝。一枕神雞游

<sup>24</sup> 林弘勳〈日治時期臺灣煙花史話〉一文對此有更深入的描述：「1895年臺灣改隸，這些傳統知識份子或是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而義不帝秦，或是受到日方壓制而苦無出路，總之，一股憂悶的遺民心態苦苦不能排遣，因而寄情詩酒、放浪形骸者所在多有。所謂『名儒碩彥，感國族之滄桑，哀功名之難遂，除了嘯月吟風而外，唯有寄情秦樓楚館中了。』而藝旦們所具備的傳統才藝則頗能符合需要，所以彼此唱和、互訴衷曲，名士與名妓共譜佳話。」（《思與言》33卷3期，1995年9月，頁98。）

<sup>25</sup> 翁聖峰曾將竹枝詞連章組成方式歸納有以下三種：「各章的組成方式分三大類：第一種方式是隨意所及，不刻意

子夢，定情誰是可人兒？」在內容上好似整組詩的引子，清楚交待寫作時間（端午節前）、地點（臺江）及主題（定情美人）。接下來寫流連妓戶的情景，中間曾一度離去，但不久又歸來，因此有「前度劉郎今識否？還將舊爪印新泥。」（第 22 首）之語，這一次的盤桓約到年底，詩中提到冬節「搓圓仔」的事：「雞黍家家局互酬，趁忙冬節小句留。憐卿摘粉搓酥手，持較粢團一樣柔。」（第 27 首），然後尾章說：「驟然開卷見崔徽，行篋新攜小影歸。」最後詩人帶著心愛的美人照片，踏上歸程。從來訪到離開，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構。

## （二）文人色彩濃厚

「竹枝詞」本流行於四川巴渝一帶民歌，多用於賽神活動，中唐詩人劉禹錫於唐穆宗長慶二年（822）貶官為夔州刺史時根據當地民歌改作新詞，<sup>②7</sup>後人仿效之，逐漸演化成介乎文人詩與民間歌謠之間的特殊詩體。從此，雖然不同時空，不同作者之間，會有不同風貌的「竹枝」作品出現，然而仔細體會其語言特質，無非就是擺蕩在文人竹枝與民歌竹枝之間的差異。

施士洁的〈臺江新竹枝詞〉是一組文人色彩極濃厚的竹枝詞，民歌式竹枝大都具有口語化傾向，然而施氏的作品卻大量用典，茲將〈臺江新竹枝詞〉用典情形表列如下：

序號	詩句	典故來歷
1	何處吹簫弄玉仙，年時十五月初圓？ （第 2 首）	▶吹簫弄玉：見漢《列仙傳》記載，秦穆公時，有簫史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結成夫婦。後來就用吹簫作為結婚的典故。
2	消受嫣紅得未曾，巫雲楚雨總蒼騰。	▶巫雲楚雨：戰國楚宋玉〈高唐賦〉云：

分別次序，各章作品的內容是各自獨立，沒有統屬關係。其次，在作品的前面或是後面一首敘創作動機，其他各章才實際述記土風；第三種方式是有些在作品本文並未交待創作動機，而是以序言的方式來表達。」（《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頁 160）

②6 用菖蒲葉浸泡的藥酒，傳說服之可避瘟氣。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記載：「端午節以菖蒲一寸九節者，泛酒以避瘟氣。」

②7 宋人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八十一·近代曲辭》記載：「竹枝詞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頁1140。）

	(第7首)	「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爲高唐客，聞君游高唐，願荐枕席。』王因而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3	羅襪凌波觀競渡，萬花影裏一垂髻。 (第8首)	▶羅襪凌波：見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4	綺歲便爲商婦感，有人老大濕青衫！ (第9首)	▶商婦青衫：語出白居易〈琵琶行〉：「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5	若論司空今見慣，不應豔福到癡人！ (第11首)	▶司空見慣：孟棨《本事詩·情感》云：「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禹錫)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倭髻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書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
6	郎比桃花輕薄甚，偏將人面比桃花。 (第13首)	▶人面桃花：唐崔護〈題都城南莊〉有「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詩
7	枕函私語假癡愁，未入高唐夢已酣。 (第14首)	▶高唐夢：同「巫雲楚雨」典
8	低首願爲紅拂拜，世間何處覓虬髯？ (第16首)	▶紅拂虬髯：事見五代前蜀杜光庭〈虬髯客傳〉。相傳隋末李靖以布衣謁越國公楊素，楊侍婢羅列，中有一執紅拂者，貌美，深情矚目李。李歸逆旅，夜五更，紅拂妓特來投，兩人相與奔

		歸太原。二人於旅舍巧遇虬髯客，與紅拂結為兄妹，以李靖得見李世民（唐太宗），謂李世民為真天子，難與爭鋒，因而離去，臨行語靖曰：「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貞觀中，傳言有人將海船千艘，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疑即虬髯客。
9	拌將薄命試阿芙，無分明珠換綠珠。 (第 21 首)	▶綠珠：晉石崇家歌妓，善吹笛，崇寵溺有加，築綠珠樓贈之。後石崇為孫秀所害，綠珠亦跳樓自盡。
10	前度劉郎今識否？還將舊爪印新泥。(第 22 首)	▶前度劉郎：南朝宋劉義慶《幽冥錄》言，相傳東漢時有劉晨、阮肇到天台山採藥，遇見兩女子，結為夫妻。歸家後知在山中已過七年。再重返天台，不見兩女子。唐劉禹錫〈再游玄都觀絕句〉有「種桃道士知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宋周邦彥〈瑞龍吟〉有「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唯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等句。 ▶舊爪新泥：脫胎自「雪泥鴻爪」典，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11	空有阿嬌金屋想，老窮其奈阮修何！ (第 31 首)	▶金屋藏嬌：漢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之，問曰：「阿嬌好否？」帝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唐李商隱〈茂陵〉詩云：「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後來稱男子有外寵為「金屋藏

		嬌」。
12	驟然開卷見崔徽，行篋新攜小影歸。 (第 32 首)	▶ 崔徽，唐歌妓，與裴敬中相戀，既別，徽因托畫家夏丘畫肖象寄敬中，不久抱恨病死。事見《全唐詩·元稹崔徽歌並序》。

「竹枝詞」雖經歷代文人點竄改作，或多或少染上文人色彩，但有時作者會刻意保留民歌風貌。施士洁這組詩辭藻典雅精煉，且大量用典，可說完全背離民歌俗化、淺化的特質，可被視為雅緻的七言絕句看待。若用七絕在平仄黏對上的嚴格規範與要求來檢視〈臺江新竹枝詞〉，將發現只有在第三十二首：「此是長房真縮地，永報鸚鵡不相違。」的「報」字不符格律而已。另外，它也不採民歌式竹枝詞慣用的比興手法，舉劉禹錫〈竹枝〉九首之二為例而言：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詩人即景言情，因物比興，眼前是開滿山桃紅花的山坡，及繞山環流的蜀江，聯想到「花紅易衰」喻郎的薄情，「水流無限」喻儂的多愁。一首詩四句，可分為前二後二的結構，有些民歌甚至前兩句的內容與後兩句一點也不相關，目的只是為了押韻。

## 五、結 語

施氏內渡後，寄情聲色，縱情詩酒，集中不少綺羅香豔作品。清代的竹枝傳統中，並非沒有描寫男女戀情的，但大都是仿民間山歌的形式口吻，描寫男女的相戀盟誓或閨怨哀思等等，像施士洁這樣大膽地將勾欄豔史，堂堂皇皇地放在詩冊刊世，看在衛道的士大夫眼裡難免驚世駭俗，視為大膽創新。然而〈臺江新竹枝詞〉中所寫不過是福州臺江娛樂文化的一面，若將「風土」一詞賦予更豐富的內涵，那麼就內容而言，〈臺江新竹枝詞〉實可納入清代竹枝詠「風土」的一環。

施士洁的竹枝詞基本上是在詩人本位上進行創作的，是寫自己的事，並不像具采風意識的竹枝寫作是「記錄者」的旁觀角色，往往不避方言土俗，展現質樸的民歌本色。施士洁竹枝詞的語言特質是向「雅化」一端傾



斜，是典型的文人竹枝詞，遣詞用句文雅不鄙俚，比較像精緻的七絕近體詩，民歌色彩相當稀薄。若從語言角度看，它確實不同於清代主流的竹枝寫作模式。

## 附 錄——臺江新竹枝詞（三十二首）

- 1、昌蒲綠酒正酣時，浪跡臺江譜竹枝。一枕神雞游子夢，定情誰是可人兒？
- 2、何處吹簫弄玉仙，年時十五月初圓？情天欲證童真果，三宿空桑亦夙緣。
- 3、半襜羅裳著意紅，小開卿莫罵東風。個儂非想非非想，祇在花魂宕漾中。
- 4、眼中紈袴少年場，刮膜如何向老儂。蜂蝶相隨渾不管，此身懶作楚蓮香。
- 5、合歡雙蠟照深更，暝枕羞聞喜爆鳴。驚起比鄰諸姊妹，悄開窗戶探春聲。
- 6、濃熏未麗透羅幃，花露勻鋪上睡衣。鼻觀真禪儂自領，鬢香幽絕汗香微。
- 7、消受嫣紅得未曾，巫雲楚雨總瞢騰。句闌第一婁羅歷，繫足原來有赤繩。
- 8、蒼霞洲畔短長橋，處處龍舟蕩畫橈。羅襪凌波觀競渡，萬花影裏一垂髫。
- 9、曲中絃語訴喃喃，才上歌場已不凡。綺歲便爲商婦感，有人老大濕青衫！
- 10、輕移綵鷁傍鷗鄉，坐愛明蟾臥愛涼。人月雙圓如此夜，教郎水宿學鴛鴦。
- 11、夜光生小掌中珍，鄭重千金未字身。若論司空今見慣，不應豔福到癡人！
- 12、江樓上坐暑都忘，雪藕冰梅取次嘗。別有文園消渴疾，丁香珠唾勝瑤漿。
- 13、平時厚重近方家，羞頰俄生兩朵霞。郎比桃花輕薄甚，偏將人面比桃花。
- 14、枕函私語假癡憨，未入高唐夢已酣。人靜屬垣猶有耳，怕郎絮絮不多談。
- 15、愛聽閒讀李十郎，詈他薄倖太荒唐。女兒偏具男兒性，忽地柔腸變俠腸。
- 16、依人燕子苦生嫌，奈此籠樊特地嚴。低首願爲紅拂拜，世間何處覓虬髯？
- 17、酒闌送客悄留髡，好夢連宵不見痕。慣向人前通啞謎，燈邊眉語最消魂。
- 18、猜疑影事費沈吟，萬種防閑刻骨深。梅子太酸蓮子苦，惱郎心即惜郎心。
- 19、珠蚌譎胎月漸虧，自家好事自家疑。那知緣想翻成病，繭盡春蠶不了絲！
- 20、昨宵剝啄倚床聽，牢守顛當喚不應。慣打茶圍夫己氏，教他一喫閉門羹。
- 21、拌將薄命試阿芙，無分明珠換綠珠。情種由來輕一殉，果然巾幗勝眉須！
- 22、別來比翼各東西，一歲何堪兩寄棲？前度劉郎今識否？還將舊爪印新泥。
- 23、酒人狼藉到杯盤，解得憐儂下箸難。忍俊不禁消夜局，自熬杭粥勸加餐。
- 24、佯羞似解戀香巢，一閃秋波影忽交。最是可憐還可惱，纖腰瑟縮被池凹。
- 25、柝聲催過四更天，燭底溫存尙未眠。瞥見枕屏雙影瘦，郎儂同病愈相憐。

- 26、偶然召集女賓朋，香國花王爲主盟。戲傍妝臺修短札，故煩紅袖一挑燈。
- 27、雞黍家家局互酬，趁忙冬節小句留。憐卿摘粉搓酥手，持較粢團一樣柔。
- 28、拇戰轟雷鬥酒軍，爭先破敵奏奇勳。替郎強飲防郎醉，知道尋常量幾分。
- 29、繡鞋窄窄鳳頭如，恰稱圓膚六寸餘。綺席散歸佯步蹇，挽郎親送上藍輿。
- 30、秋霜偏向客衾生，難遣中年以後情。怪底詩人寒瘦相，累卿擁背到天明。
- 31、天錢欲借聘仙娥，誰向冰人假斧柯？空有阿嬌金屋想，老窮其奈阮修何！
- 32、驟然開卷見崔徽，行篋新攜小影歸。此是長房真縮地，永報鸚鵡不相違。

## 參考書目

1. 施士洁：《後蘇龔合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3月。
2. 《福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第7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12月。
3. 黃武忠記錄：〈美人心事——「文人與藝旦」座談會〉，《聯合文學》第3期，臺北，聯合報社，1985年1月。
4. 吳漫沙：〈臺北的藝旦〉，《聯合文學》第3期，臺北，聯合報社，1985年1月。
5. 楊熾昌：〈臺南的藝旦〉，《聯合文學》第3期，臺北，聯合報社，1985年1月。
6. 劉捷著、鄭清文翻譯：〈臺灣藝旦社會學〉，《聯合文學》第3期，臺北，聯合報社，1985年1月。
7. 柯瑞明：〈臺灣藝旦紀事〉，《臺灣風月》，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年1月一版二刷。
8. 李廷錦選析：《楊柳青青江水平——歷代竹枝詞賞析》，臺北，開今文化，1994年5月。
9. 林弘勳：〈日治時期臺灣煙花史話〉，《思與言》33卷3期，1995年9月。
10. 林文龍：〈黃任《香草箋》對臺灣詩壇的影響〉，《臺灣文獻》第47卷第1期，1996年3月。
11. 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
12. 王鴻泰：〈青樓：中國文化的後花園〉，《當代》137期，1999年1月。

13. 汪應聚：〈楊維禎對竹枝詞創作的貢獻〉，《上饒師專學報》第 19 卷第 1 期，1999 年 2 月。
14. 張家豪：〈竹枝詞探析——以劉禹錫〈竹枝詞〉為對象〉，《中文研究學報》第 2 期，1999 年 6 月。
15. 王忠閣：〈元末《竹枝詞》的繁榮及其文化意蘊〉，《中州學刊》總 112 期，1999 年 7 月。
16. 余美玲：〈海東進士施士洁的詩情與世情〉，《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000 年 11 月。
17. 李良品：〈竹枝詞源流考〉，《重慶教育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4 期，2000 年 12 月。
18. 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 8 月。
19. 向麗頻：〈《三六九小報》所呈現的臺灣藝旦風情〉，《中國文化月刊》第 261 期，2001 年 12 月。
20. 龔斌：《情有千千結——青樓文化與中國文學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21. 李鄉瀏編著：《福州地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4 月二刷。

##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New Bamboo poem of Taijian” written by Shi Shi-Ji.

Hsiang Li-Ping

### 【Abstract】

Shi Shi-ji (施士洁) is a well-known poet from the Tianan are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fact that both he and his father, Shi Qiong-fang, were jinshi degree holders (third degree graduates in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won much praise in Taiwan's history. In 1894, China was defeated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lso known as Jiawu War), and the Qing Dynasty was forced to cede Taiwan to Japan. Unwilling to be ruled by colonial Japan, Shi decided to return to his fatherland in Mainland China and never returned to Taiwan. His literary work revealed considerable homesickness and nostalgia. The researcher realized that some of the poems focused on carnal pleasures. The 32 pieces of works in the “Taijiang Bamboo Poems”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all. In “Selection of Taiwan Bamboo Poem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Chen Xiang, the “Taijiang Bamboo Poems” was juxtaposed with the “Chihkan Bamboo Poems,” “Anping Bamboo poems” and ‘Tainan Bamboo Poems,’ but the author did not approve of it. “Taijiang” does not refer to “Tainan.” Instead, Shi eulogized over erotic affairs at brothels around the Taijian area in Fuzhou, Fujian. The bamboo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mainly praised indigenous landscapes and customs. If the term “indigenous” is defined in broad way, ‘Taijian Bamboo Poems’ can, therefore, be specifically categorized as bamboo poems of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language used by Shi was not as simple and colloquial as that of indigenous bamboo poems. Its language was delicate which differentiated it from mainstream bamboo poems at that time. In fact, Shi's bamboo poems are exquisite, and demonstrate his scholastic background.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222-246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帝國魅影

# ——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

黃美娥\*

### 【提要】

櫟社，是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詩社之一，王石鵬是櫟社社員中頗具知名度，但歷來卻鮮被研究的一位，本文利用當時的報章雜誌資料，嘗試勾勒這位曾經以《臺灣三字經》名聞一時的風雲人物之生平梗概。而在掌握其人其作的同時，筆者留意到王石鵬的政治意識其實存有流動認同的現象，此與櫟社中人素具強烈抗日精神的傳統形象有異。在追溯其人國家認同的建構歷程時，筆者發現流動認同現象之所以產生，實與石鵬熱衷新學以及高度肯定日人引進現代文明的心態有關；正因為「現代性」的魅惑，使先生在傾心現代化事物的同時，更加期盼日人能將此文明產物與制度一一輸入臺灣，以求達到同化之助，於是透過此種「同化」思維，遂加深了先生對於日本殖民母國的認同。另外，透過王石鵬的事例，筆者也留意到櫟社社員與櫟社精神之間可能存在的斷裂關係，也就是櫟社雖說具有抗日精神，但其實並不代表所有櫟社社員自始至終的表現都可以完全吻合詩社性格，尤其 1937 年後櫟社精神出現了不同以往之鞏固而有了模稜、鬆動的面向。凡諸種種，都是現階段從事櫟社研究所當注意者。

**關鍵詞：**櫟社 王石鵬 現代性 國家認同 台灣三字經

---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櫟社，是日治時期臺灣三大詩社之一，由於若干社員的作品曾經出版問世，且流通市面，便於取得，因此較諸瀛社與南社，具體可供探討的資料既多，目前所獲研究成果也就相形可觀。不過，雖然櫟社許多社員如林癡仙、林幼春、林仲衡、林獻堂、葉榮鐘、莊太岳、莊龍……等人，已經出現相關研究，但仍有未獲學界注意者，如二十餘歲時便因撰寫《臺灣三字經》而聲譽大噪，成為日治時期全臺頗具知名度人物的王石鵬，便是一例。歷來由於生平梗概不明，以及詩文作品未曾結集付梓，因此其人其作罕受關注，但在筆者爬梳日治時期報章雜誌後，發現王氏所發表的詩文作品頗多，目前所見至少有文章十篇，詩歌則高達三百數十首；內容題材除擊鉢作品之外，殆以山水記遊為大宗。

而更耐人尋味的是，作為一名傳統文人，王石鵬的生活模式雖與櫟社中人十分近似，但在面對日本政權時，卻有其個人的思維模式，與長期來櫟社社員予人堅守抗日立場的印象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擬以王石鵬的國家認同觀作為分析對象，期盼進一步觀察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在國家認同建構歷程中的諸多複雜面向，並藉此略窺部分櫟社社員可能曾經出現過的流動認同問題，以利重新思考櫟社社員與櫟社精神屬性間的關係。

至於「流動認同」，乃後殖民理論中常見的話語，部分人因為亡國或離鄉等因素，而對文化混雜現象別有觀察與體驗，進而導致多重認同現象，且不乏呈現衝突與對立情形，世界著名文化評論家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其回憶錄中，曾以「常動的水流」意象來比喻其身份認同是多元而流動不居的，並表示「我比較喜歡這意象，甚於許多人比較重視的那種固態自我的意象。」更自言面對多重認同時，曾經存有強烈無安頓意識的絕望感覺，最終才學會面對這些不諧和音，「偏愛不要那麼處處人地皆宜，而寧取格格不入」<sup>①</sup>。不同於薩依德之書寫《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A Memoir*）在於表露已能超越因多重流動認同所帶來困擾的喜悅自適，本文研究重點則欲再現日治時期因殖民因素而具現多元認同現象的櫟社詩人

① 二句引言皆參見薩依德著、彭淮棟譯《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A Memoir*）（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頁405。

王石鵬其「流動不居」的國家認同觀，進以說明複雜認同變化之所以產生的可能緣由。由於多元認同是呈顯流動的狀態，可能對立衝突，也可能結合運動，其實無法真正具象描述「多元認同」間彼此時時刻刻的流動變化情形或相抗張力；加上資料不足，以及筆者要藉由王石鵬其人其事重新檢討歷來所謂櫟社反抗精神社團屬性的便宜說明下，本文將對王石鵬的國家認同觀作較固定式的階段性考察與分析，其間論述難免顯得概約或簡化，甚而忽略了王石鵬出現流動認同時的困境、無奈，不過或許較能強烈凸顯本文的問題意識所在，達成一定的反思效果。

## 二、王石鵬生平簡介

王石鵬，字箴盤，號了庵，新竹人氏，生於清光緒三年（1877），因腦溢血<sup>②</sup>卒於日治昭和十七年（1942），得年六十六歲。兒時好刀劍，日取其父從軍殺賊用之短刀，配以遊戲，兒童皆不敢侮；及入私塾讀書，亦復如此，經塾師強奪乃去，可見性情<sup>③</sup>。十歲通韻語，塾師曾以「龍媒」二字嵌首尾令生徒作聯，石鵬率先完成，以「龍文猶憶楊稱姪，鳳友原憑葉作媒」獲冠，因此時有「王龍媒」之稱<sup>④</sup>。十五歲時，從遊於舉人鄭家珍門下<sup>⑤</sup>，追隨杖履，為執筆硯；其後再入明志書院，與後來擔任滿州國外交總長的謝介石為莫逆交，外人謂新竹有「雙石」，便指其二人<sup>⑥</sup>；而斯時二人又與同窗洪崇三出入必偕、坐論必共，故又有「竹城三逸」之號<sup>⑦</sup>。

乙未（1895年）滄桑，石鵬選擇避亂閩南，至明治三十年（1897）秋天，聞臺灣兵氣已銷，始奉親東渡回臺，寓居竹塹東南名勝古奇峰附近，名其室為「疊溪堂」，並自號「水月主人」<sup>⑧</sup>。此刻的王石鵬如同多數的遺民詩人一般，欲以隱逸不問人事的生活型態處世。這期間，還曾因「疊溪堂」鼠害頻傳，而效法韓愈〈祭鱷魚文〉之舉，撰寫〈討鼠檄〉向家神

<sup>②</sup> 參見傅錫祺〈櫟社友王君了庵挽辭〉，詩見氏著《鶴亭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256。

<sup>③</sup> 參見王石鵬〈國姓刀歌並引〉引言所述，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6月28日第1846號。

<sup>④</sup> 參見王松《臺陽詩話》上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原臺灣文叢本第34種，1994），頁7。

<sup>⑤</sup> 參見王石鵬〈翠臺岩記〉，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5年5月13日第1207號。

<sup>⑥</sup> 參見王松《臺陽詩話》上卷，頁61，同註4。

<sup>⑦</sup> 參見王石鵬〈送謝介石東上序〉，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10月11日第1935號。

<sup>⑧</sup> 參見王石鵬〈疊溪堂記〉，文載《臺灣新報》明治30年12月23日第387號。

焚告，三日後果無惡物，一時傳為奇事<sup>⑨</sup>。

不過，隱逸未久，王石鵬有感「國語」（即日語）學習之必要，便參加九月上旬新竹國語傳習所入學試驗，成為國語傳習所第二屆學生<sup>⑩</sup>；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畢業，由於期望未來可以成為一名教師，因此又入臺北師範學校繼續就讀。此後，遂通國語，成功接受日本新學與文字，明治三十五年（1902），還曾經筆譯日人橫山壯次郎所著《農學須知》一書，時人評價頗高<sup>⑪</sup>。而後，依據《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所載，自明治三十九年（1906）至四十五年（1912）間，王氏正式擔任公職，就任新竹廳雇員。

在竹期間，由於工於金石刻畫，兼善詩作，故在新竹頗具知名度；除前述謝、洪二人外，又與生同鄉、居同里之王松及松之族弟瑤京時相過從，人稱「三王」，石鵬自謂竹人幾無不識者<sup>⑫</sup>。《臺灣日日新報》亦曾載某停車場廁上有人以鉛筆題書「王石鵬乃第一流人物」，後雖查為傳聞<sup>⑬</sup>，但恰可證實王氏乃新竹知名人物，始有此戲謔韻事發生。此外，不只本地人知曉石鵬，即連日人亦都識之，如其與新竹縣首任知事櫻井勉便極為熟稔，時有詩歌往返，並常共同參與詩社吟會<sup>⑭</sup>，自道曾經「末席趨陪過十年」<sup>⑮</sup>；再者，王松《臺陽詩話》下卷也記載了一則事例：

投票選舉之法，即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之意。近見日本人所刊新竹案內一冊中有名士便覽，分門別戶，皆由眾人投票，擇其票數多者而選列之。所載詩人僅三名，永井完久、波越重之、王箴盤（石鵬）是也。箴盤固未嘗以詩人自居，而吾竹可稱為詩人者，亦不僅箴盤一人。究其所以當選之故，蓋箴盤每對日本人作隸書，即自錄其詩以應之，日本人知其名者既多；他雖有受選，終不能及其票數也<sup>⑯</sup>。

或許王松並不認為日人的投票公允，對於王石鵬獲得詩人頭銜也表質疑，

<sup>⑨</sup> 參見陳對山抄投、王石鵬撰〈討鼠檄〉，文載《臺灣新報》明治30年10月5日第322號。

<sup>⑩</sup> 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8，V04568\A026〈新竹國語傳習所第二回卒業式報告〉。

<sup>⑪</sup> 參見邱菽園〈農學須知跋〉，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5年7月17日第1262號。

<sup>⑫</sup> 參見王石鵬〈友竹行窩遺稿序〉，文見王松《友竹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122。

<sup>⑬</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5月11日第1807號。

<sup>⑭</sup> 參見詹雅能〈櫻井勉與日治前期的新竹詩社〉，教育部、新竹師院主辦「人·時間·空間 地方研究的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會議論文，頁11—頁17，2003.5.16。

<sup>⑮</sup> 語見王石鵬〈兒山先生十年前出守吾邑近因商務重駐竹城袂晤之下賦以記之〉，載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11月1日第2860號。

<sup>⑯</sup> 參見王松《臺陽詩話》下卷，頁57，同註4。



不過從上述引文中，卻可清楚得知進入日治時代的王石鵬與日人交往密切，因此日人知其名者甚多，甚至能與永井完久、波越重之兩位日人獲選為新竹三大詩人。

上述，大抵是王氏自少至長寓居新竹三十餘載的主要事蹟，大正五年（1916），由於中報「臺灣新聞」之聘，王石鵬乃移家台中<sup>17</sup>，開始長達十年的記者生涯<sup>18</sup>，日與中部文人密切往來，並積極參與各項詩社活動。大正十五年（1926）因林獻堂的推薦，於該年七月十八日正式加入素以民族意識著稱的櫟社為社員<sup>19</sup>；此外，也曾獲聘東墩吟社顧問<sup>20</sup>、台中櫟社副社長<sup>21</sup>，並擔任苗栗社詞宗達十餘年<sup>22</sup>，加上早在新竹期間，參與奇峰吟社（或稱古奇峰吟社）、竹社<sup>23</sup>的豐富詩社生活，使其一生寫詩無數，惜未結集付梓，作品散見各報章雜誌中。擊鉢之外，山水紀遊之作頗多，蓋與其癖好山水有關<sup>24</sup>。

晚年嘗為笑疾所苦<sup>25</sup>，除設帳授課，擔任教師外<sup>26</sup>，獨好佛隱僧龕，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苗栗法雲寺、台中寶覺寺、中壢圓光寺、月眉圓光寺……等，皆有先生行蹤<sup>27</sup>。而為使讀者容易瞭解釋迦在世之事實，體會佛陀人格之偉大，先生還會取材日人所著《異藏經》、《釋迦新傳》、《釋迦牟尼傳》等書，擇譯編寫成《釋迦佛歌》，內容以韻語書寫，共分三十四章，運用通俗而不傷大雅的方式表達，冀使眾人能領會佛陀之慈悲而深受感化<sup>28</sup>。一生著述，除前列《農學須知》、《釋迦佛歌》、《臺灣三字經》外，

17 參見王石鵬〈友竹行窩遺稿序〉，同註11，及《臺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5月19日第5708號。

18 參見王石鵬〈將遊大陸留別臺陽諸友〉：「垂老雄心未肯賒，征衫重整入中華。賣文十載方投筆，乘興三秋試泛槎。迂闊放翁無著處，汪洋莊子有生涯。此行豈為利名計，天許遙看海上花。」故知王氏擔任記者共計十年，詩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8月26日第9087號。

19 參見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70種，1963），頁26。

20 參見陳雪滄〈戲贈東墩吟社四顧問〉，註明四人是指王竹修、林仲衡、張笏山及王了庵，文載《詩報》昭和14年8月16日第207號。

21 台中櫟社社長為林子瑾，副社長王石鵬，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1月21日第8504號。

22 參見趙德昭〈斃王了庵先生〉：「栗社鷗群屬望深，那堪一夕嘆人琴。千篇郢正看遺墨，當時章句多受指正，十載評章費苦心。先生作社詞宗十有餘年。有子傳經香不滅，無詩救藥痛難禁。泉臺若遇黃衫客，為道鉢聲漸欲沈。」詩載《詩報》昭和17年5月6日第271號。

23 詳參《臺灣日日新報》上所載奇峰吟社及竹社活動之相關記錄。

24 時人皆知王石鵬性好山水，如謝介石〈答王君石鵬〉：「前身疑是飛仙侶，最愛乘風作遠遊」，詩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8月15日第3088號。

25 參見王石鵬〈東臺紀遊雜詠〉序言所述，文載《詩報》昭和14年5月3日第200號。

26 所收學生包括女性，參見林佩芬、楊嬌娥、林昭治等所寫之斃詩，詩載《詩報》昭和17年4月20日第270號。

27 由《詩報》上所載此段時間內作者遊歷唱酬作品內容推斷而得。

28 參見龔顯宗〈箴盤鐵筆王石鵬〉，文載《鄉城生活雜誌》第50期（1998年3月），頁54。

王石鵬尚有《了庵雜錄》、《女學揭要》<sup>29</sup>、《清宮遊記》<sup>30</sup>，惜或遭燬，或已佚，今皆不傳。

大抵，王石鵬在成爲櫟社社員前，已經活躍一時，頗具知名度，不僅熱衷吟詠，勤於創作，甚且能夠翻譯日文著作，堪稱一通曉新學的舊文人。相較年紀相仿的傳統文人而言，王石鵬快速吸收新知與敏捷學習日語之能力，實爲一般文人所不及；不過，這種高度強調新學的治學態度，日後也對其國家認同的傾斜產生一定的影響。

### 三、王石鵬的國家認同

從上述生平介紹中，可以初步了解王石鵬在清代時曾從清朝舉人鄭家珍（乙未時曾受日人侮辱，後離台）受業及入學明志書院，乙未割台後也選擇返回故里，基於過去受學背景及面臨滄桑世變的去就抉擇，在在顯現出他應該會是一位對於清朝政府仍有所認同的人，不過，返台之後的他，爲何快速學習異族語言文字，進入日人教育體系就讀，又樂與日人相交？此等行徑，有著「遺民詩人」所未當見的積極入世形象。究竟是什麼原因，使王石鵬作了改變？而除了前述事例之外，在日治期間，王氏還有其他相應於殖民體制的言行嗎？以下筆者先由三方面呈現日治以後王石鵬的國家認同觀，並嘗試說明其人政治意識產生變化的原因。再者，透過王石鵬的相關言行，筆者也將進一步思考櫟社社員與櫟社精神間有所扞格的問題。

1926年，王石鵬經林獻堂引薦加入櫟社成爲正式社員，後又於1932年出任理事<sup>31</sup>，可見其人之一切表現必深獲櫟社成員的肯定。但弔詭的是，日治時期的櫟社，歷來被研究者視爲「組織嚴密，素質整齊，特重操守氣節」<sup>32</sup>、「始終站在民族主義立場，維繫臺胞民族認同」的詩社<sup>33</sup>，

<sup>29</sup> 王松《臺陽詩話》上卷載其著有「了庵雜錄」，頁26、頁36，另《臺灣三字經跋》則提及王石鵬少作「女學揭要」四種，但乙未之役已燬。

<sup>30</sup> 參見龔顯宗前揭文，同註28，頁54。

<sup>31</sup> 參見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上，《台北文獻》直字第78期，頁256。

<sup>32</sup> 語見廖振富〈傅錫祺的生命情調與人生抉擇〉，文章收入《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32。

<sup>33</sup> 如鍾美芳：「同樣的，日據時代亦非無做砥柱於中流的詩社。始終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在漢文漸被禁絕的時代，堅持維繫並保持漢文，透過種種途徑、努力來維繫臺胞的民族認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應推當時詩社的中堅—櫟社。」以及「櫟社是日據時代臺灣最具規模的詩社，其組織嚴密，輕易不許人入社……」，同註31，頁244、

而王石鵬無論在入社前或入社後，其國家認同都存有向日本傾斜的現象，那麼，具有高度民族精神的櫟社何以還能夠接納先生並委以要職呢？箇中情形，耐人尋思，一切也將於下再議。

### （一）從日本本位書寫的《臺灣三字經》

明治三十三年（1900），二十四歲的王石鵬完成《臺灣三字經》，明治三十七年（1904）予以出版，這本以介紹臺灣地理為主的蒙書出版後，時人對此多表讚揚，成為王石鵬一生中最具紀念意義的大事，也是最有價值的貢獻，例如櫟社社長傅錫祺〈壽王箴盤社弟五十〉詩：

壯遊萬里倦登臨，北地風霜鬢髮侵。珥筆未忘曾共硯，異苔且喜竟同岑。一經囊括臺澎史，八法書傳翰墨林。我亦神歆錫多子，方君卻少二千金君著有臺灣歷史三字經又五十自述句云「男女平分十二兒」余現在則男六女四也<sup>34</sup>。

傅氏回顧王石鵬五十年的生涯，對於先生這本少作十分看重，故特於詩中拈出。更有甚者，在《臺灣三字經》絕版多年以後，尚有讀者呼籲重刊，可見其影響力，例如署名「懺紅」者（案：即台南文人洪鐵濤），在昭和9年（1934）4月29日第336號《三六九小報》上，發出感嘆：

余少時，曾見新竹王石鵬先生所著之臺灣三字經，仿蒙經之例，音節和諧，少年易於上口，必讀之教本也。十數年來，坊間不見代售，想已絕版久矣！近來鉅釘之書，災梨禍棗，而此書委之無傳，為著作界之痛恨事。有心人盍不起而重鑄之？

從文中的敘述，吾人可以明白王石鵬《臺灣三字經》曾經風靡一時，深深擄獲時人之心，成為少年必讀的教本，因此在此書出版三十年後，仍然有人呼籲重刊，可見其受歡迎與重視之程度。

細繹王石鵬這本當年叫好又叫座的《臺灣三字經》，從臺灣教育發展史來看，這是臺灣第一本以「臺灣」區域為書寫對象的蒙書，通篇內容毫不涉及道德教育的傳授，純為本島兒童展示認知臺灣地理的捷徑，不僅有別於歷來三字經側重人倫道德、歷史意識的寫作傳統而有其特色，更因成之於日人統治時期的臺灣而別具時代意義，值得肯定，此點筆者曾有專文討論<sup>35</sup>，此不贅述。

頁 254。

<sup>34</sup> 詩載傅錫祺《鶴亭詩集》上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121。

<sup>35</sup> 參見拙文〈童蒙教育的新頁—王石鵬及其《臺灣三字經》〉，臺灣教育史研討會會議論文，新竹教師會主辦，

而有關本書的具體內容，其正文皆係三字一句，主要以四句或八句為一小段，每段視需要附有註解，或指出詞源，或引伸辭義，或援引故實，或說明方位……。卷首並列有「舊政府行政機關圖」；卷末附錄「臺灣說略」，據吳幅員查考發現與「臺灣地輿全圖」所載各府縣輿圖說略文字相同，僅各題略去「輿圖」二字而已，係因未附輿圖的緣故<sup>46</sup>。因此，《臺灣三字經》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自編三字一句的韻文及其後附註的文字；其中，韻文部分，起自「爾小子，生於斯；地理誌，宜先知。舉臺灣，細參考；連沖繩，諸小島。」（案：為利閱讀，文中皆採用新式標點斷句，以下亦同）終於「能熟讀，非無益；智識開，宜遊歷。」共二〇三段，分別針對臺灣相關事項予以介紹。其實際內容，據王石鵬的規劃為：

首敘位置、名稱、治亂、沿革，繼敘蕃部種族、山川、物產及經濟上之事業，莫不略舉其端；雖曰地理，而歷史寓焉<sup>47</sup>。

書中所記包括臺灣的位置、名稱、治亂、沿革以及種族、山川、物產、經濟事業等，全都涵蓋其中；因此，《臺灣三字經》在性質上，雖以地理為主，但其實也隱括了臺灣的歷史。

透過《臺灣三字經》二〇三段文字的敘述，吾人可以發現全書中，王石鵬針對臺灣本島作一完整而豐富的介紹，使讀者可以充分認知臺灣的人、事、物，進而達到絕佳的啓蒙效果；而其中作者著墨較多的段落，亦即全文側重之要點，首為臺灣海岸、山脈、河川、湖泊……等天然地理環境的介紹，其次則是臺灣過去舊府縣都邑概況的說明，另外臺灣經濟產業與原住民之相關敘述篇幅亦多，可見王石鵬關注的焦點以及用心所在。藉由這些介紹，特別是臺灣天然地理環境以及豐富的物產的描述，如第八十七段「島之中，多礦物；大富源，漸採掘（臺灣島中礦物甚多，誠海外一大富源也）。」、第九十六段「竹一門，十餘種；諸花卉，亦甚茸，在山谷，竟密生，色爛熳，令人驚（深山空谷之中，花卉叢生，樟樹腹空，常有幽蘭生其上，香氣遙聞。又，百合花及旋花之類，處處皆有，其色爛熳可愛，令人一見悅目驚心，皆天然妙趣也。西洋人故稱美麗島）。」作者建構出一個「美麗島」、「大富源」的臺灣意象，使每位讀者在接納吸收本書的各種「臺灣知識」後，都將自然而然地喜愛臺灣，並引以為傲。

2001.9.26。

<sup>46</sup> 參見吳幅員《臺灣文獻史料309種題要》（臺北：大通書局，1977），頁75。

<sup>47</sup> 參見王石鵬《臺灣地理三字經序》，文見氏著《臺灣三字經》（台北：臺灣日日新報印行，1904）。

王石鵬筆下的「臺灣印象」十分美好，因此對於處於異族統治下的亡國之人，更添世變滄桑的感嘆與疼惜，不過也讓另一類的閱讀者即新一代的臺灣孩童，能夠對於這片土地有所瞭解和記憶。因此，當王石鵬以「臺灣」區域為題來進行書寫，藉由地理之美凸顯臺灣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時，在臺灣與中國出現分離關係後，這樣的視角其實有利建構臺灣本身的主體性，得與日本政權相抗，而不致為其所同化，可惜王石鵬用意不在於此。

首先，吾人發現有關本書的記時繫年，在臺灣分館館藏的明治三十七年（1904）刊本中，王氏大抵是採用日本天年來記載，如作者序文末尾原本記錄撰稿時間是「明治三十三年」，戰後發行的臺灣文獻叢刊本的《臺灣三字經》<sup>43</sup>則予以修改為「光緒二十六年」的中國紀年。藉由兩種版本的不同處，其實更加顯現了「改朝換代」必作的政治修辭的幽微意涵，例如：其一，明治刊本書前原有日人「米刃山衣洲先生校閱」字樣，今不復存；其二，文叢本曾更易若干「不合於時」的文字，如明治刊本「問罪師、遂興起、約賠償、事乃止」條下，提及「詔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事務都督，……又詔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特命全權辦理大臣，差遣清國……」，文叢本改為「日本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事務都督，……又命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特命全權辦理大臣，差赴清廷……」；又有「華民至、重栽培、稻一年、穫二回」條下原本言及「支那人」來台拓墾之事，則被代以「漢人」一稱；「考工業、大工場、製鹽腦、及茶糖」條下以「大陸」取代「支那」。大抵，藉由文字措辭的比較，吾人更加留意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刊本中，王石鵬有關日本紀年、支那人、詔……等語詞的使用，是較貼近日本本位立場的書寫。

除了上述現象外，《臺灣三字經》的內容也出現相近的傾向。以王石鵬曾經入學明志書院，且於乙未後選擇返回祖籍地的情形看來，其《臺灣三字經》在書寫臺灣時，理應置於「中國—臺灣—歷史—文化」的脈絡之下予以思考；但是仔細閱讀全書，出人意表的是，作者通篇行文立場，皆從日人本位出發，形成「帝國(日本)—臺灣—地理—文化」的文本結構，其背後的文化意義，頗為耐人尋思。就文中首段敘述臺灣的地理位置開始，王石鵬便已展現日本本位的思維模式，以「連沖繩，諸小島」來為臺灣「定位」，非從中國角度看臺灣。而第五段介紹臺灣在古代的稱呼，雖

<sup>43</sup> 臺灣文獻叢刊本列為第 162 種，於 1962 年出版。

然記錄了自唐至宋中國稱臺灣為「毘舍耶」之事，但也不忘存錄日本古代航海業者曾經稱呼臺灣為「高砂國」，以示古代日本便已知道本島的存在。八、九兩段在提及明末活躍於臺灣的海賊、海寇林道乾、顏思齊、鄭芝龍時，作者也敘及其人與日倭曾有糾結，關係密切。第十二段陳述荷人據臺史實，卻又特別舉出日人亦曾遭荷人劫掠，似乎有意透過此事建構日本亦是受害者的形象，藉以拉近其與臺灣的距離。第三十四段稱讚臺灣教育至日本領臺後，各處設立學校，而能「至今日，大改良」，稱讚日人治臺使島人受惠。第三五段介紹臺灣面積大小，特別提及與日本九州相伯仲。第一〇九、一一〇段回顧清同治年間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作者以「牡丹社，本無因；竟敢戮，小田民。」來記錄此事；從其措辭口吻看來，可知視牡丹社人為野蠻之族，而十分同情日人之無辜。第一四六段介紹臺灣西部沿岸的魚類時，所謂「魚之類，東洋齊」，指出與日本近海之處略同。第一六六段敘及臺北府時，雖然言及府城昔為清代劉銘傳所建，但更強調今之總督府設置於此後，商賈雲集，電燈通明，街上人力車往來不斷，已成臺灣第一大都會。

透過以上例證，不難發現王石鵬在敘述臺灣的位置、面積、名稱、物類……等項目時，都會將本島的情形與日本並論，使二者產生自然的聯結，此一敘述觀點，在有意無意間即淡化了殖民帝國與被殖民者間本然的敵對關係，進而衍生建構出「日本帝國」與「臺灣殖民地」地理情境的淵源與類似關係，使臺人對於日本帝國萌生熟悉感。

除了地理情境「相近性」的塑造外，在臺灣人文歷史的發展上，王氏也處處讓日人現身。不管是明末林道乾、顏思齊、鄭芝龍與日倭的互動關係，或荷蘭與日人的摩擦糾葛，這些情形對整個臺灣歷史而言，其實無關宏旨，微不足道，但作者卻選擇讓其在臺灣史上「顯影」，且在有限的篇幅中「發聲」。再者，有關牡丹社事件，王石鵬似有譴責本島原住民之意，對於被殺的日人感到愧疚；而回顧本地教育情況時，又認為現今日人普設公學校，是臺灣教育的大改良，為臺人帶來極大的恩澤；另，前清舊有府城的建設言，更以臺北為例，表彰日人引進現代文明，創造本島都會的富庶繁榮。凡諸種種，或可窺見作者企圖扭轉乙未之後，臺人心中「日本是侵略者、施暴者」的形象，冀能重新賦予日本帝國一個新面目。

不過，除了以上讓日人在臺灣史上頻頻顯影，藉以拉近，甚或美化日、臺雙方關係的書寫策略外，王石鵬在本文中也嘗試使用另一種角度來重新

建構清朝在臺的過往歷程，進而形成其特殊的「臺灣史觀」。相較於對日本治臺政績的正面評價，王石鵬面對「爲朝鮮，棄東土」的清朝政府，將其在臺二百餘年的漫長歷史，作了如下慘不忍睹的紀錄：

新版圖，民多亂；吳劉黃，相繼叛。朱一貴，稱巨魁；七日內，陷全臺。藍總兵、施提督，急東征，始盡蕩。天地會，林爽文，亦集黨，敗孫軍。諸羅民，助大紀，始錫名，稱嘉義。民好亂，如燈蛾，撲不盡，可奈何。陳蘇張，諸小醜，既滅之，旋復有。至同治，戴萬陞，又倡亂，限彰城。淡嘉危，如懸髮，曾丁林，率兵伐。至光緒，法兵來；偶失守，基隆開。孫劉林，相拒戰；寇既平，設車電。臺巡撫，劉銘傳，因清丈，人心偏；最猖狂，施九段，圍彰城，既敗竄。

不管是「民作亂」、「民好亂」等字眼的強調，亦或是一長串黨魁、官員名字的連續曝光，一部清人治臺史，已然被壓縮成一頁頁的亂史，在在鋪陳出臺灣與清朝政府，向來都處於無法和平共處的惡劣關係下。因此，即使是一般人較爲稱許的劉銘傳，王氏在提及其新政改革時，卻從負面議題下筆，強調因清丈而失了人心，於是一路書寫下來，《臺灣三字經》中的「祖國」實在顛預無能。至此，「歷史」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以清代之亂與日人之治差異呈現，「複寫」、「再現」之後，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發展，對於臺灣的新、舊統治政權也有了不一樣的評價。原來，「訴諸過去」無寧是「詮釋現在」的最佳策略。

是故，「改國權，爲民主；二百營，張旗鼓。大兵至，破諸營；南北路，盡蕩平。」對於臺灣民主國的應戰能力極盡嘲笑，日兵近衛師團的實力則多所稱讚，藉以說明日本取臺乃勢所必得；而清朝割讓臺地，亡國之痛雖然令人難忍，但王石鵬逕以「滄桑跡，恆變遷」世事多變的宿命論，來自我化解，就如同鄭成功的失敗不也是「天命移，非人力，所能爲」？那麼如此一來，「日人侵臺」無非也是天命，只得坦然面對，接受現實了。

至此，讓我們再仔細思索王石鵬《臺灣三字經》的創作要旨，文中有關臺灣地理環境優美、天然資源豐富的描寫，應是出於喜愛自己生長的地方，故欲透過本書傳遞相關訊息，得使日人統治下的島人，也能明白臺灣的過往與現代種種，進而認識故鄉、珍視母土；另外藉由書中臺灣優點的抉發，以及對日本政府的頌揚，毋寧也期盼日本政府能更努力經營本島，爲臺灣帶來進步與繁榮，莫要視臺灣殖民地爲敝屣。因此，王石鵬選擇以「臺灣區域」爲書寫對象，應當有其時代背景的考量，也因之本書產生了

重要的時代意義與價值，不僅是開啓臺灣童蒙教育的新頁而已。不過，《臺灣三字經》卻在行文表達上，出現以日本爲本位的書寫立場，令人不免對王石鵬的「臺灣史觀」感到焦慮，畢竟對於所有可能閱讀本書的讀者而言，其民族意識將會遭受挑戰，逐漸失去「反殖」與「去殖」的能力而不自知。

在今日看來，該書能夠率先以「臺灣地理」爲書寫對象，其實有利建構臺灣之主體性；但是王石鵬以「去中國化」的方式來浮現臺灣主體性的同時，卻又將臺灣歷史收編入日本帝國中，頓時又解消了其原本可以與殖民母國相抗拒的力量。是故，本書的出版固有其重要的時代性意義，但也存有令人爭議之處，尤其文中的書寫明顯站在日本帝國的角度發聲，著實令人印象深刻。不過，既然年少的王石鵬曾因《臺灣三字經》而聲名大噪，而該書又明顯存有以日本爲本位的書寫立場，那麼何以林獻堂會推薦王石鵬加入櫟社？而櫟社社長傅錫祺還以此書的創作爲王氏畢生重要成就，並給予極高評價？

## （二）東遊與西渡—日本現代性 VS 祖國情懷

中國與日本，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人而言，有著特殊的歷史情結與政治關係；因此，每當臺人前往此二地旅遊時，其內心世界往往有著深刻的感觸，透過這種心境的呈現，將有助觀察臺人在國家認同上變化的蛛絲馬跡。爲了更確切掌握王石鵬的心境變化，以下筆者便從其一生中至少二次東遊日本、三次西晉中原<sup>39</sup>的經驗談起，冀能一窺石鵬對日本與中國的認同態度。

### 1. 日本行

有關王石鵬的內地之行，雖然資料顯示至少有過兩次，但目前較清楚可見者僅大正三年（1914）與新竹鄭神寶相偕前去參觀大正博覽會一事<sup>40</sup>。關於此次旅遊，赴日前夕，先生特別提醒鄭氏：

東坡兩遊赤壁，夢得再到玄都，莫不各抒其所見，為詩若文以紀之。此一行也，事事物物，所得良多，盍不舉其感觸，以告我臺人，或可為同化之一助。

#### ④

<sup>39</sup> 王石鵬前往日本與中國遊歷的次數，係根據其〈沁園與余同生丁丑讀其五十自述詩不覺技癢次韻和之亦藉以自嘲也〉詩中自述，詩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5年8月8日第9434號。

<sup>40</sup> 參見鄭神寶〈東游隨筆〉，文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5月26日第5011號。

<sup>41</sup> 同上註。



由此可知王石鵬這次前往日本觀看大正博覽會的目的，固不止於觀光而已，更想將日本所見的新事物轉告臺人認識，俾能有利日臺之「同化」，故談話中特別建議神寶翔實記載一切見聞。在接受王石鵬的提議後，鄭氏按日隨筆記事，返臺後並將所得發表，名為〈東游隨筆〉；然石鵬個人卻未見有專文撰述，僅在鄭氏〈東游隨筆〉中存錄所寫唱酬詩作數篇，殊為可惜。

不過，先生雖然未若鄭神寶清楚撰寫觀光經過，但從鄭氏文中，仍然可見石鵬此行之大概。這一趟上國觀光之旅，石鵬與神寶於五月十七日自基隆搭乘亞米利加丸輪船出發，該船有六千三百噸，船內設有大餐廳、醫院、郵局、戲臺、運動場、無線電、吃煙室、休憩所，鄭氏言其「無不潔麗可愛」<sup>42</sup>，可見印象非常良好。二十一日抵達神戶後，兩人正式展開此次觀光之行，逐一觀賞博覽會之各項展覽。此次博覽會會場甚多，散逸各地，而每一會場又有多館陳列，甚為熱鬧，如上野內山第一會場，便有工業館、林業館、礦業館、博物館、水產館、教育學藝館、美術館、拓殖館……等<sup>43</sup>；第二會場則有染織館、農業館、運輸館、外國館、動力館、機械館……等<sup>44</sup>。由於博覽會場不少，且各館展覽內容豐富，如動力館與機械館陳列各種發動機，而運輸館則有鐵道、軌道、索道、水運、通信……等<sup>45</sup>，因此得使觀覽者瞭解日本現代化實業之進步。

在觀賞博覽會之餘，二人也前往神社、公園、圖書館、皇居宮城……等處參觀旅遊，其間對於日本環境的清潔甚為讚嘆，而旅途中遙望富士山時，鄭氏目睹富士山「白雲一片，環繞山腰，山上雪白如銀，繞日相映，益見清麗」，不禁有感而發：「故鄉無此好湖山，東都人士之有潔癖，好天然之美趣，高潔成性，瀟灑出塵，得無由此山川之靈秀所鍾乎？」王石鵬也表贊同<sup>46</sup>。此外，兩人在搭乘電車，或觀賞博覽會時，也注意到日人即使處於人眾混雜之處，卻不見衝突斥罵之聲，人人都有相愛相讓之心，與臺人動輒生怒、拳棒相加或惡言相向的情況迥異<sup>47</sup>。顯然，此次大正博覽會的觀光之行，石鵬真正見識了日本的國民性以及國內衛生良好、工業進

<sup>42</sup> 同上註。

<sup>43</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6月24日第5039號。

<sup>44</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6月29日第5044號。

<sup>45</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6月30日第5045號。

<sup>46</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6月14日第5030號。

<sup>47</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7月19日第5064號。

步、電化設備……等「文明開化」的一面，不僅滿足了原來對於日本上國的憧憬與嚮往，同時也在心中深化了對殖民統治母國的認同。

其實，早在石鵬未到日本前，心中便對日本上國的進步充滿想像，例如明治三十六年（1903），友人蔡汝修欲前往大阪觀賞博覽會時，先生作〈送蔡君汝修赴大阪序〉餞別，欽羨之餘，不免有感：

夫男子生當斯世，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凡一舉一動，必思有益於身心；不惟益於己之身心已也，亦宜裨益於眾人，故足之所經，目之所寓，皆須有痛癢關心之處。政府維新之初，有志者咸尋航歐米，爭先恐後，著述成書，以遺餉國人，務以彼之所長，以易吾之所短；藉彼之所有，以補吾之所無，一變再變，至於今日，實可與之並駕齊驅矣。此其始何嘗非出於數輩遊歷者，歸而開化之，俾全國得臻於文明之界？今大阪之開博覽會也，實足為本島大放光線。吾聞此會場之陳列也，分為十部，自農業、園藝、林業、水產、採礦、冶金、化學、染織、製造等工藝，以至機器、教育、學術、衛生、理財、美術等諸品及古代遺物，蒐羅甚富。……蔡君年少氣英，經濟之學，素蓄於胸中，客歲獨予所譯農學一書，謂其可以助島民殖產之進步，殷殷致意其志可知。頃大甲織席會社，及中部臺灣日報之設，君亦與有力焉，人多以事業家目之矣！且其口才便捷，能操國語，其與國人往來酬答，既無扞格之虞，目之所觸，心能會之，入此大智囊中，當必有所取擇。此一行也，學問智識，所益良多，異日載筆旋歸，必為本島振興實業，造四百萬同胞無疆之福，豈徒誇遊歷名區，飽嘗風月而已哉？予因有事入閩，恨不得與子同舟。……<sup>48</sup>

「觀賞博覽會」，本可將之視為觀光旅遊的純粹娛樂，但從上述說明，可以發現在王石鵬的思維結構裡，「博覽會」與「新學」、「現代文明」及「全島實業」、「同胞幸福」諸事自動產生聯結，因此對於「赴日觀光」也就寄予厚望，甚至強調若非自己有事纏身，否則「恨不得」也能前往，期盼之情溢於言表。

再者，石鵬之摯友謝介石於明治 37 年（1904）應臺灣協會之聘，前去東京擔任教習，專門教授準備來臺任職的日官學習臺灣土語，先生肯定謝氏此行的意義，有言：

吾觀二十世紀之時代，固學問競爭之世界，而亦為言語發達之世界，人群之口音者無論矣，甚至鳥音猿語亦莫不為博言家所探討。人無學問故不足以生

<sup>48</sup> 參見王石鵬〈送蔡君汝修赴大阪序〉，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6 年 4 月 21 日第 1489 號。

存，無言語又不足以行遠，故東西文明之士，多者能通各國方言，少者能諳一二種，所到之處，可藉以觀國風，察民情，而無捍隔難伸之患，今協會之設土語科也，何嘗不出於此意？為教師者，須盡教授之職，俾同學諸公，異日成效渡臺，或振興事業，與島人和衷共濟，社會上當大受影響；或服官臨民，上情下通，下情上達，得以直接通談，查知民間疾苦，而免譯者欺隱之弊。今日本島之譯者，或與為政者同其權，搖脣鼓舌，是非可因之而顛倒，不惟使在下抱不白之冤，亦徒負在上存保赤之念，此之為害，不可紀極。願介石有感於此，與東京士大夫，得相與以有成也。前程遠大，當此年富力充，正吾子所謂擔當宇宙之時，倘能於開課之餘，就正有道，再入專門學校，以吸收開化之新智識，亦屬一舉而兩得焉。……<sup>49</sup>

在這段文字中，先生表達了幾點意見，其一，先就語言的重要性談起，認為二十世紀的今天，是言語發達的世界，人們應當多加學習數種語言，此等與時俱進的敏銳感知能力，清楚顯現了王石鵬進步的眼光。其次，先生鼓勵謝氏往赴東京履職，並認為教授日人臺灣土語，可免日官執政時，受制譯者欺隱之弊，也能直接察知民間疾苦，可見石鵬站在日人與臺人「共蒙其利」的角度，「認同」並「肯定」謝氏接受日人之聘職。其三，王石鵬建議謝氏利用客寓日本之便，再入專門學校吸收「開化的新智識」，於此則是再次強烈凸顯先生對於新學追求的熱衷。

正由於內心對新學有著高度評價與肯定，而當時接受新學的最佳地點便在日本上國，因此當臺人要前去日本留學時，石鵬不禁流露欣喜期待之心，其〈潘君瀛梯將赴東京留學同僚觴之席上〉云：

由來愛國屬英賢，慷慨如君志益堅。健翮不辭翔萬里，壯懷準擬滯三年。前程遠大深期許，敷島風光結夙緣。負笈從茲分袂去，佇看奪錦賦言旋<sup>50</sup>。

先生真摯祝福潘瀛梯的東京留學之旅，並斷言其學成歸來必是前程遠大，而文中首句以「愛國英賢」來說明潘君行徑，無疑認為追求新學是有利報國的方式。

為了更加清楚彰顯王石鵬因為對於新學與現代文明的追求，以致影響了其國家認同傾向日本的立場建構，茲再以明治四十二年（1909）臺灣鐵道全通時，石鵬所撰〈祝鐵道全通式〉一文配合說明。該文內容強調鐵道

<sup>49</sup> 參見王石鵬〈送謝介石東上序〉，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10月11日第1935號。

<sup>50</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9月19日第2518號。

通暢，至少具有三方面的長處，其一，可收聲氣聯絡之便，利於運兵運械，將使匪害無所遁形，足以提升地方治安之效；其二，臺灣豐富物產利於流通運送，有益農、工、商業之活絡；其三，南北昔日溝通不易，文明發達、思想融合多受阻礙，從今人文輻輳，報紙易通，將能啓發無窮智識，獲致學業上的大進境。而在本文之末，先生更以昂揚之筆調，大抒鐵道文明所帶來的內心感動，以及對於日本政府恩澤的謝意：

有此三者（案：即上述三方面益處），本島前途之幸福，正未可量，安可無一言以祝之乎？況當舉行鐵道全通式之日，復得天演貴胄，令譽廣孚之閑院宮殿下親臨，此不獨為鐵道盛典增光，亦屬我全島臣民之榮也。行旌所指，到處歡迎，……凡我臺人，故宜捧滿腔之熱誠，傾平素之葵慕，……登彼新高山頭，齊聲而大呼曰：縱貫鐵道萬歲！閑院宮殿下萬歲！<sup>51</sup>

從接近新學、喜愛新學、留心現代文明，到讚嘆日本為臺灣所帶進的現代化設施，進而推崇日本治臺的德政，王石鵬日益浮現了向日本傾斜的國家認同趨向。

藉由上述說明，可以發現王石鵬由於高度推崇新學以及現代文明，因此在肯定日本統治所可能帶來進步的同時，也逐步深化了其對殖民母國的認同；而這種認同的背後，先生隱然有著期盼「日臺同化」的憧憬，所以在其將赴日本觀賞大正博覽會時，便要鄭神寶詳載日本各項事物以便回臺後轉知臺人，冀收同化之效。王石鵬的此種表現，呈顯了臺灣知識份子面對日人統治的政治現實下，自然而生的一種務實想法，只是此種想法終屬奢望，因為日人不可能給予臺灣殖民真正的幸福，其所有一切文明開化的展示成果，誠如先生等人在博覽會上所觀看者，皆屬日本國威的宣傳或在臺殖民政策正當性的辯護手段而已；因為所有現代性的巧妙之處，都將留於日本上國，臺人雖然知其為妙，但卻始終不知其所以妙<sup>52</sup>。也因此，不僅日臺同化終成泡影，先生的務實作法，更無法發揮知識份子面對日本政權所能展現的抗拒性思考，失去反殖能力而不自知，甚至漸漸造成國家認同的傾斜。

<sup>51</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10月24日第3146號。

<sup>52</sup> 有關日人所辦博覽會與臺人心境間的互動變化關係，呂紹理〈展覽會之臺：日治初期臺灣的產業展示活動〉（「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舉辦，2001.6.28-6.29）一文曾加闡述；而筆者在本文指出日人展覽活動之舉辦皆有其殖民統治目的，及臺人在觀賞博覽會時被挑起追求現代化之慾望而終不可得的結論，乃參考呂文研究成果而得。

## 2. 中國行

至於王石鵬前往中國的情形又如何呢？依據相關資料，先生三次前往大陸的時間分別是乙未之際（1895）、明治三十六年（1903）<sup>53</sup>以及大正十四年（1925）<sup>54</sup>。其中，乙未避難之際的作品，今已不復見，但後二次遊歷之作，《臺灣日日新報》上曾見發表，以下即藉此進一步觀察石鵬的「祖國情懷」。

石鵬自 1897 年回臺後，已經睽違祖國多年，明治三十六年（1903）終於有機會再返中國，尤其這是回臺接受日人統治多年後的初次返抵，因此百感交集。其於廈門所撰〈登鼓浪嶼懷鄭延平王〉云：

延平王氣已全無，小嶼彈丸列海隅。萬國衣冠爭競地新議為萬國公共地，四圍山水自然圖。洋樓架石凌雲起，鐵艦隨波向港輸。鼓浪有聲人不見，臨風遙憶淚沾濡<sup>55</sup>。

眾所周知，「鄭成功」是日治時期臺灣文人筆下眷戀故國、抗拒異族的最佳書寫對象，洪棄生、連雅堂、王松……，甚至賴和，都有相關詩作，因此憑弔鄭成功常是文人世變滄桑之嘆及追思故國的寄託象徵。王石鵬此首懷念鄭延平的詩作，自當也有緬懷祖國的情思。當詩人來到鼓浪嶼，由於此地曾是鄭成功駐軍之所，日光岩下尚有國姓井之遺跡，睹物思人，遂追憶起鄭延平王從前的種種事蹟，因此本詩描景之餘，更有強烈弔古之意；何況鼓浪嶼自 1902 年，即石鵬來此的前一年，已經成為「萬國公共租借地」，英、美、德、日、西班牙、荷蘭、奧地利……等國都曾於島上設立領事館，今昔之比，石鵬益發感觸良多。詩歌起首「延平王氣已全無」一句，已見詩人之洩氣與沮喪，予人沈重無力之感，透過鄭成功的殞落及王氣消失殆盡，說明足以與異族相抗的力量早已不復存，進而暗喻中原氣數將盡的事實，因為「萬國衣冠爭競地」，鼓浪嶼已經淪為各國列強的公共地。

在面對中國當下的現實環境時，同樣的失望心情也出現在〈遊虎溪岩書示吳席珍茂才〉詩中，其云：

<sup>53</sup> 參見王石鵬〈送蔡君汝修赴大阪序〉中提及有事入閩，同註 47。而所謂「有事」，可能是前去尋找東渡臺灣以後久未聚首之妹，其〈夜入東山尋妹子有感〉：「入門始覺夜方深，久別初逢感不禁。訪舊半登新鬼錄，聞言已改故鄉音。親朋滿座相探訊，兒女成行出拜臨。坐對燈前疑是夢，兩情默默淚沾襟。」詩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6 年 5 月 24 日第 1518 號。

<sup>54</sup> 參見王石鵬〈將遊大陸留別臺陽諸友〉，詩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 年 8 月 26 日第 9087 號。

<sup>55</sup> 詩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6 年 5 月 15 日第 1510 號。

中原大地起征塵，安得斯岩可寄身。小洞深藏伏虎像，高崗想有臥龍人。詩留石壁垂千古，花滿禪房過幾春。世態不堪回首問，只宜與佛證前因<sup>56</sup>。

回到故國，但見中原依然未靖，世態不堪，詩人有著無力以應時局的困頓感，遂有寄託佛理以求解脫的念頭。此處，吾人可以發現王石鵬心中對於故國深感痛心，在過往一切不堪回首的情況下，竟發出遁脫於佛的無奈語。但即使如此，詩人仍未真正放棄祖國，在〈泉州漳化學堂〉詩中，作者傳播了一線希望：

泉州風氣此開先，漳化堂成已數年。啟迪專輸新智識，參觀聊證舊因緣。東方早得文明象，南國從茲學業傳。保教由來堪保種，儲才應羨亞洲賢<sup>57</sup>。

透過傳輸新智識，保教便可保種，「南國」學業可傳，就可躋於文明之境。於此，與作者一貫推崇新智識的思想極為相符，只有藉由新學教育，中原祖國乃至亞洲，就能更加茁壯強大。

從以上幾首王石鵬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遊歷大陸時的作品看來，其間對於中國，或有失望無奈之心，但卻仍存有期盼再興之情，可知此刻的先生，並未淡忘祖國。

大正十四年（1925），王石鵬再進中原，同行者有傅錫祺、陳竹生<sup>58</sup>。繼前次遊歷閩南之後，先生此回前往上海、蘇州、南京、濟南、天津、北京等地，並有極長時間駐留京、津一帶，尤以北京為清朝舊都所在，自然不免觸景生情，如〈抵北京〉：

遊蹤纔到正陽門，穀繫肩摩近帝閣。綠瓦紅牆何壯麗，曾傳經始自金元。詩中緬懷故都，在綠瓦紅牆的建築中，一面尋找屬於清朝的歷史氣息，一面則遙想更悠久的過往。但是，倘若詩人的作品，都如上述充滿歷史記憶，則其心中的祖國情懷必然更加鞏固與強化，實則不然，在遊歷見聞中，石鵬也出現了如下的話語：

〈觀燕京諸宮殿〉

巍峨宮威壯邊陲，四代爭雄國祚移。卻笑皇居同逆旅，滯留仍是不多時。  
〈遊北海即西苑清之故宮在焉〉

帝業消沈剩故宮，離離禾黍總堪傷。上林花木誰為主，付與遊人弔夕陽<sup>59</sup>。

<sup>56</sup> 詩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6年5月23日第1517號。

<sup>57</sup> 詩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6年5月24日第1518號。

<sup>58</sup> 石鵬在燕京作有〈孟秋後一日偕傅君鶴亭陳君竹生同入群英茶園聽曲〉詩，故推測同行者至少有傅錫祺、陳竹生二人。詩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0月27日第9149號。

<sup>59</sup> 以上所引三首詩歌，皆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0月16日第9138號。

面對前朝舊都，雖然詩篇中仍存黍稷堪傷的遺民之痛，但卻也出現「皇居如同逆旅，滯留不多時」的戲謔之詞；甚且，直言道出清朝帝業已經消沈，僅餘故宮及上林花木提供遊人憑弔、賞玩，清朝舊都的空間神聖性已經墜落，代之而起的無寧更是旅遊的景點而已。因此，從此二詩中，可見大正年間此趟中國之行，石鵬孤臣孽子的心緒已淡。

回顧王石鵬西渡中國、東游日本的心境，可以瞭解詩人數度前往中國遊歷，顯見其對於祖國仍然關心，但回到現實中，臺灣已成日本殖民地，以及中國的日漸衰敗，這都已成不可移易的事實，因此當詩人緬懷鄭成功時，更加側重的是斯人不在的無可奈何，而不敢奢望現世中可以出現能夠驅逐異族的英雄；其後，甚至調侃割讓臺灣的清國，興亡一瞬如同逆旅，在言談中，已然失去了對於故國應有的眷戀與敬意。相反地，在日復一日消滅祖國情懷的同時，先生對現代化上國日本的憧憬與肯定，卻老早隨著大正博覽會的成行，益趨穩固，且因堅信「可為同化之一助」的想法，自然對於殖民母國的認同就更加明顯了。就在這一增一減的情緒變化中，愈發形塑出流動認同的狀態。

### （三）「櫟社」之外—擊鉢吟中的帝國魅影

觀察王石鵬國家認同觀的建構，筆者發現其傾向認同日本帝國之言論，如前引東渡之作或《臺灣三字經》，大抵是書寫於加入櫟社之前；而大正十五年（1926）七月，先生成為櫟社社員後，或許是否受到櫟社精神所感召，創作上便罕見此類作品，詩歌內容多半描寫山水之樂，或吟詠個人生活情趣，或屬詩友酬唱往來之紀實。不過，這種寫作樣態，大約持續至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又有所變化，「帝國」彷彿魅影，再度召喚糾纏著王石鵬的內在心靈；而其中較引人注意的是，先生的此類作品多半發表於櫟社之外圍團體「東墩吟社」的擊鉢吟會中<sup>60</sup>。

因為戰況吃緊，日人亟需臺人作為後援以報天皇，先生便也出現了附和國策的作品，如昭和十二年（1937）中日宣戰後，東墩吟社以〈銃後國民〉為題進行擊鉢活動，先生與會並撰有詩作三首：

<sup>60</sup> 東墩吟社是以櫟社為核心的外圍團體，創立於1929年，櫟社社員王石鵬、林仲衡、張玉書為該社顧問，參見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上，頁265及本文註18。另，除了王石鵬在1937年後所寫擁護日本政權之作多出現於此詩社所辦擊鉢會中，林仲衡亦復如此，詳參拙文〈中國、日本、臺灣—櫟社詩傑林仲衡詩歌的空間閱讀〉，文章收入《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2），則箇中關係值得進一步觀察與探討。

臨陣無緣作義兵，筆墨揮舞過餘生。匹夫本有安危責，後援何妨試共鳴。  
陣前破敵有精兵，陣後何人尚請纓。卻嘆老夫餘力少，無多貢獻把囊傾。  
未能仗劍早從征，坐待前途敵虜平。我輩民間一份子，宜籌妙策共輸誠<sup>61</sup>。

詩中流露不能前赴戰場殺敵報國的遺憾，因此呼籲民間百姓應當有所貢獻以爲後盾。又如昭和十四年（1939），東墩吟社舉行十週年紀念擊鉢吟，以〈吟詩報國〉爲題表達詩人襄贊時局的熱誠，石鵬作詩：

干戈未定感難禁，十萬雄師何處尋。我有佳章堪破敵，攻城自古重攻心<sup>62</sup>。  
面對戰事未靖，先生胸中有著百般感觸，如何能夠招募十萬雄兵殲敵報國呢？作爲一名詩人，只能借詩鼓吹從軍，這也是「協力作戰」的良方之一。

再如昭和十五年（1940）元月，東墩吟社又以鼓舞士氣、擁護國家體制的〈從軍〉爲題舉辦擊鉢吟，石鵬寫有二作如下：

焉用毛錐子，惟思建武功。威能伸大陸，義願捨微躬。爆彈驚歐亞，飛機振海空。此心甘愛國，豪氣自增雄。

大地干戈起，男兒義氣雄。安邦原素志，臨敵建奇功。毛筆先投去，戎衣已早充。偏師能致勝，報國見精忠<sup>63</sup>。

此回詞宗，係由傅錫祺與王竹修擔任，石鵬二首皆入選前十名作品。首作陳述報國不需具備脫穎之才，只要有心愛國，即可達成神聖使命；次首則呼籲干戈既起，所有男兒都有保家衛國的責任，應當投筆從戎，精忠報國。二首詩歌，旨意清楚，不過相較同時參加東墩吟社擊鉢的吟友，如陳魯詹「仗劍沙場去，捐軀答聖衷。示知皇國志，振起大和風。諸夏中南北，王師陸海空。諸君詢戰績，有日判雌雄。」、尤人鳳「忠勇皇君戰，勢如破竹同。營翻宵月白，風颺日章紅。麟閣功描像，沙場氣旺紅。惟祈戎馬息，海宇萬邦通。」<sup>64</sup>充滿歌詠聖戰的慷慨激情，王氏二詩，尙屬含蓄隱微。

除了上述創作宣揚皇民意識的詩篇外，王石鵬在擔任「東墩吟社」與「栗社」的詞宗時，也曾多次負責如「破敵」、「防衛團」、「國防服」、「賣金報國」、「吟詩報國」、「蓖麻報國」、「皇民奉公」……等宣揚國威、配合戰時體制詩作的品評工作，如此的舉措，似又可見其願意「配合」時局、迎合皇民化運動的作法。茲舉其在吟會中所擇選的前一、二名作品，藉以

<sup>61</sup> 參見《詩報》昭和 12 年 11 月 4 日第 164 號。

<sup>62</sup> 參見《詩報》昭和 14 年 4 月 1 日第 198 號。

<sup>63</sup> 參見《詩報》昭和 15 年 1 月 1 日第 215 號。

<sup>64</sup> 出處同上註。



略窺石鵬的政治立場：

▲東墩吟社 〈破敵〉 《詩報》昭和 12 年 11 月 4 日第 164 號

膺逞不義起雄師，拉朽摧枯競逐追。淞滬平津隨手得，先登高樹日章期。

——爾竹

海陸航空共出師，高翻到處日章旗。大和男子強無敵，踏破南支與北支。

——陳雪滄

▲東墩吟社 〈防衛團〉 《詩報》昭和 12 年 11 月 20 日第 165 號

非常時局戰時裝，守衛關心在故鄉。萬一四鄰聞警報，閭閻相助不張皇。

——張子民

銃後人人合作忙，危機先要未然防。自慚薄力膺徵秩，模範難教及遠方。

——李櫻航

▲栗社 〈童子軍〉 《詩報》昭和 15 年 8 月 1 日第 229 號

世界競稱強，兒童亦武裝。身心經鍛鍊，銃炮不驚惶。踴躍離家去，殷勤寔國防。功成名立日，衣錦喜回鄉。——劉肇芳

執刀騎竹馬，總角敢從戎。三尺軀何壯，八千膽更雄。彩衣知報國，白髮愧無功。乳氣休嗤臭。威揚武士風。——陳如璧

▲栗社 〈皇民奉公〉 《詩報》昭和 16 年 11 月 1 日第 259 號

大和魂耀日，勇士秉精忠。愛國英雄處，扶桑壯氣同。顯名看聖戰，拼命建奇功。盡在遵臣道，還將沐帝衷。——徐永年

敵前稱義勇，銃後務勞工。協力聯歐北，共榮圖亞東。丹心期報國，素志在精忠。建設逢今日，減私效大同。——厚山

以上透過王石鵬在東墩吟社及櫟社擔任詞宗期間所選前一、二名之作品，雖然並非先生個人之創作，但從中亦能略窺其配合帝國體制的一面。

綜觀王石鵬一生的行徑，乙未割台時擇返故國，回台時曾打算隱逸世外作一遺民；中年以後，參加素具抗日意識的櫟社，又至少三次回返中國，顯見故國意識仍存。然而，其《臺灣三字經》全從日人立場書寫；而日本鐵道全通式舉行時，又為文歌頌日人德政，高呼萬歲；東遊日本，則對於上國的現代文明頗為傾心，進而認同殖民母國；1937 年中日戰爭後，除個人吟詩報國外，又多次擔任東墩吟社與栗社呼應戰時體制、宣揚國威詩題的詞宗，在在顯見王石鵬心中，其國家認同實際有著流動的現象，對立、衝突並存，看似格格不入，卻又在不諧的運動中，自我尋求調和與定位，這正是日治時期被殖民後嘗試努力尋找應世之道的靈魂影像。

#### 四、結語—兼論櫟社研究的幾個問題

王石鵬是櫟社社員中頗具知名度，但歷來卻罕見相關研究的一位，本文利用日治時期的報章雜誌資料，嘗試勾勒這位曾經以《臺灣三字經》名聞一時的風雲人物。而在掌握其人其作的同時，筆者留意到王石鵬的政治意識其實存有流動認同的現象，此與櫟社中人素具強烈抗日精神的傳統形象有異。

在追溯先生國家認同的建構歷程時，筆者發現流動認同現象之所以產生，實與石鵬熱衷新學以及高度肯定日人引進現代文明的心態有關；正因為「現代性」的魅惑，使先生在傾心現代化事物的同時，更加期盼日人能將此文明產物與制度一一輸入臺灣，以求達到同化之助，於是透過此種「同化」思維，遂加深了先生對於日本殖民母國的認同。而從王石鵬的身上，吾人亦可見「現代性」對於當時的臺灣傳統文人的確深具誘惑力，足以影響其人國家認同觀的變化，值得進行更普遍的觀察與研究。

另外，頗堪玩味的是，王石鵬這種流動認同的情形，在加入櫟社前十分明顯，但 1926 年入社後，則轉為淡薄，此等改變究竟為何，因為資料所限，目前無法完整清楚說明，或許，櫟社以抗日精神為主調的詩社屬性對其有所影響，也極有可能。不過，1937 年後，擁護日本政權體制的國家認同觀又再出現於石鵬的言行中，卻也是不能不加面對的事實。

透過王石鵬的事例，筆者進而思考到現階段櫟社研究的相關問題。其一，歷來研究者頗為強調櫟社之抗日精神，並謂該社不輕易讓人入社，鍾美芳綜合歸納《櫟社沿革志》所載相關情形，認為新社員之加入，「須經社員推薦，於總會時提出，經多數社員認可，或則經理事會承諾。至民國十六年四月廿三日始明文規定『新入社員，須經社友一名介紹，提出總會，由出席社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決定之』」<sup>65</sup>如此看來，1926 年王石鵬經林獻堂推薦入社，雖不必經出席社友四分之三同意，但至少也是在多數社員認可之下入社，亦即表示櫟社社員多數接受了王石鵬。只是誠如本文所析，王石鵬在未入櫟社前，其實已經出版以日本為書寫本位的《臺灣三字經》，並且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如〈祝鐵道全通式〉一類具有「皇民化」色彩的文字，則如此表現，櫟社仍然可以接受入社，且對其與櫟社素具之民族意識的詩社性格有所扞格而不以為意，那麼櫟社之存在，是否未

<sup>65</sup> 參見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上，頁 256。

若吾人所想像般的自始至終強烈標榜民族意識？其本身之成社，實屬文學性社團，且無寧更以文學質性為重<sup>66</sup>；至於抗日屬性的形塑，恐怕是林幼春、蔡惠如、林獻堂、葉榮鐘、莊遂性等人相繼投入臺灣民族運動之後，才逐漸外燦出來的？否則，於此，如何合理化王石鵬得以入社的事實。

相似的情形，也可以蔡啓運<sup>67</sup>為例再作思考。蔡氏在櫟社草創時期便入社參與活動，至1906年正式成為櫟社九名創社元老之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sup>68</sup>及連橫〈蔡啓運先生事略〉<sup>69</sup>更載其為櫟社第一任社長，但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未曾記述此事，而鍾美芳則逕謂賴紹堯為櫟社第一任社長<sup>70</sup>。作為櫟社首任社長或創立成員之一，蔡氏在日治時期的言行，一改乙未之際參加臺灣民主國幫辦軍務的抗日態度，而採柔順以待的合作方式，故深受日人敬重，不僅曾於明治三十年（1897）四月因「慧敏處事，以得時宜」而受配紳章，十二月獲聘苑裡辦務署參事；次年（1898）更因獻出個人土地捐倡學租而受到日人表揚<sup>71</sup>；明治四十年（1907）九月則拜命苑裡區長<sup>72</sup>，由此可知蔡啓運的行事立場與國家認同傾向。

另外，從王石鵬的身上，吾人也要重新省思櫟社社員與櫟社精神之間可能存在的斷裂關係，也就是櫟社雖說具有抗日精神，但其實並不代表所有櫟社社員自始至終的表現都可以完全吻合詩社性格。事實上，除了先生外，櫟社三傑之一的林仲衡與社長傅錫祺在皇民化時期，也曾撰寫過較為傾日立場的詩篇，如林仲衡〈破敵〉、〈銃後國民〉、〈防衛團〉、〈賣金報國〉、〈吟詩報國〉等作，其中不乏歌頌日本強盛軍威、表彰防衛團的同心協力、

<sup>66</sup> 過去的相關櫟社研究成果，往往高度強調櫟社的民族氣節，但筆者本文的提出則希望藉由王石鵬的事例，重新省思在櫟社成員中是否真是多數具有民族氣節而使詩社有了抗日屬性，還是只是部分社員的突出表現，便贏得外界頗高的評價；相同的情形，正如瀛社之予人親日的印象，其實日治時期的瀛社二百多位社員中，也非人人有著親日立場，而更是主要幹部及部分社員的表現所致。因此，筆者認為現階段從事此二詩社之研究，實宜先拋開意識型態的框架，客觀回到文學論述上，然後再剖析其中抗日/親日精神屬性形成的過程，如此才不致予人凡是櫟社成員必具抗日精神、瀛社成員必親日的粗率印象，也更能看出時代環境中詩社屬性的形塑、消長的狀況。

<sup>67</sup> 關於蔡啓運之生平，拙文〈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1999）曾加探討，參見頁77—頁81。

<sup>68</sup>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5月15日第3614號、9月15日第3718號。

<sup>69</sup> 連橫〈蔡啓運先生事略〉：「戊申春，余來台中，獲與櫟社諸子遊，時以詩相酬唱，甚自樂也。故櫟社濟濟多士，而群奉蔡啓運先生為領袖……已而台中林癡仙、呂厚庵、賴紹堯、林南強、傅鶴亭共設櫟社，先生與焉，群以齒較尊，推為長。先生雖居苑裡，數往來新竹，己酉秋，竹人士謀設竹社，又推為長。……」文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5月2日第3929號。

<sup>70</sup> 參見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上，頁255。

<sup>71</sup>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1年5月7日第2號。

<sup>72</sup> 以上有關蔡啓運獲得紳章或出任公職的情形，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台北：臺灣日日新報，1916），頁167。

讚譽臺人縫製千人針及賣金報國愛國義舉的言論，相關情形，拙文曾加探討，茲不贅述<sup>73</sup>。又，擔任櫟社社長近三十年的傅錫祺，在遺民詩人的形象之外，也有「（1923年）皇太子殿下啓臺灣蒙以學者資格賜御果子」、「（1936年）十月一號爲地方制度改正施行一週年紀念日臺灣地區自治協會會長（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森剛二郎氏特表彰自治功勞者州各一人台中州下余受表彰授我銀盃一組」<sup>74</sup>等欣喜接受日人表揚的亢奮心情寫影；而當家人能夠爲國奔馳效力時，錫祺也極力肯定與支持，如〈五月十三號鈴兒以北京語通辯從軍（海軍）詩以示之〉所述：

生便懸孤意若何，男兒爲國肯蹉跎。班超有志投班管，宗慤雄心蹴白波。無使絲毫乖口耳，可能談笑息干戈。微勞勉效憑三寸，早晚思聽唱凱歌。

在詩中，傅錫祺強調男子爲國不可蹉跎，要早早立志報效國家，因此勉勵其子努力做好翻譯的工作，並盼早日聽到凱歌高奏。又，〈女外孫林素霞中選看護婦助手作此壯而勉之〉：

人生無男女，報國均有責。前人或有心，機會不易得。孫年十五六，名置高女籍。讀書明大義，忠孝溢胸膈。去年臘八來，國有外征役。學課適告完，女生服新釋。願逐志願兵，稍盡國民力。壯哉今日行，一舉雌伏翮。前途好自為，小心常翼翼。他時著良機，光寵及親戚<sup>75</sup>。

對於外孫女將擔任看護婦助手的工作，錫祺引以爲傲，認爲縱使是有心人也未必能夠獲此殊榮，要其孫女珍惜報國的良機；而在讚許孫女深明大義、滿腔忠孝之餘，更叮囑其要克盡國民之力，他日能有一番好前途，光耀門楣。

是故，透過上述王石鵬、蔡啓運、林仲衡、傅錫祺等櫟社主要幹部的相關言行，可知吾人在從事櫟社研究時，不能不正視櫟社社員與櫟社精神間的密合、分疏關係，也應特別留心 1937 年後櫟社精神不同以往之鞏固而有了模稜、鬆動的事實。或許詳細剖析櫟社在各階段所呈顯的民族精神意識的變化歷程，將是未來吾人從事學術研究時不能忽略的課題。

（本文初稿曾於 2001 年 12 月 8~9 日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宣讀，茲加增訂而成。又，本文參考書目已詳見附註，不再複列。）

<sup>73</sup> 關於林仲衡 1937 年國家認同傾斜的情形，詳見拙文〈中國、日本、臺灣—櫟社詩傑林仲衡詩歌的空間閱讀〉，頁 198—頁 206。

<sup>74</sup> 語載傅錫祺〈生平紀要〉，文見氏著《鶴亭詩集》，同註 2，頁 377、頁 380。

<sup>75</sup> 詩見傅錫祺《鶴亭詩集》，頁 225、頁 256。

# The Empire's Dream of Wang, Shi-Peng : A Poet's Constructing Hist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Haung Mei-Er

## 【Abstract】

LI Club was one of the three largest Poetry Club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f Taiwan. In LI Club, Shi-Peng Wang was a famous member, however, the critic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his works. This essay use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t that time with the purpose of depicting the life of this brilliant writer of Taiwanese Book of Three-Word-Character. Further, it is observed that an element of a flowing identity exists in the poet's ideology, which contrasts to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the anti-Japanese spirit shared among Li Club members. In the search of the poet's constructing hist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we discover that the poet is inclined to identify himself with the Japanese culture because of his enthusiasm to the New Study and his great appreciation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The poet expected that the Japanese would import the civilized products as well as modern systems to Taiwan so that Taiwan would benefit from the result of this cultural assimilation. Through the thinking of assimilation, the poet's will became stronger to identify with the Colonial Native Land-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by studying Wang's story, we also notice that a breaking relationship possibly existed between the Club and the Club's members. Even though the Club possessed the anti-Japanese spirit, it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that this spirit was shared by all the club members. Different from the Club's conventional solidarity, aspects of ambiguity and sense of looseness started to appear especially after the year of 1937. All the observations mentioned above are important issues for those researchers who are presently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LI Club.

**Key Words :** LI Club   Shi-Peng Wang   Modernity   National Identity  
Taiwanese Book of Three-Word-Character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44卷 頁 247-279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年7月

## 懷海德與後現代世界觀\*

俞懿嫻\*

### 【提要】

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是廿世紀西方一位偉大的形上學家;在面對當代西方哲學反形上學洪流之時,懷海德堅持形上學有其哲學的必要性與價值,這使他在當代哲學界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後現代哲學家」在批判「現代科學世界觀」之餘,宣稱哲學的工作便是在對構成世界觀的各種因素進行「解構」。舉凡觀念、理想、價值、意義、目的、人格、語言、文化等等,都成為他們「解構」的對象。懷海德雖與「後現代哲學家」一致,以批判現代科學世界觀及其預設為哲學發展的起點,但他仍肯定哲學形而上的思辨功能,並且堅信理性與經驗的結合,足以使吾人認識事物之間的關係。根據他的機體哲學,一切實有都是具備「自我創生能力的機體」,因之自然便是「創生的進程」,而自然的歷程便是宇宙的真相。懷海德稱他的哲學是「機體實在論」;他與後現代哲學家「反形上學」、「反實在論」以及「反理性論」的立場顯然有別。美國的懷海德哲學家認為走向「虛無主義」的「後現代主義」是「解構的」、「消除的」後現代主義(deconstructive/eliminative postmodernism),而懷海德哲學則是「建構的」、「積極的」後現代主義(constructive/positive postmodernism)。本文擬分三部分探討懷海德的「後現代世界觀」;首先將說明上述與懷海德「後現代世界觀」相關的「後現代科學理論」,其次說明懷海德對現代科學世界觀的批判,最後說明懷海德機體哲學中所顯示的「建構的後現代世界觀」。

關鍵詞：懷海德 機體哲學 形上學 後現代主義

\* 本文部份內容「建構的後現代世界觀」段係取自行政院國家科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懷海德形上學研究》(計畫編號：NSC91-2411-H-029-001)。

\* 東海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後現代」(postmodernity)是當代哲學中最受廣泛討論、而又最不明確的概念。首先「後現代」一詞衍生自「現代」(modernity)；談「後現代」必先及於「現代」。而「現代」(modern)一詞的字源是拉丁文 *moderni*，衍生自副詞「最近」(*modo*)，最早出現於西元第五世紀末至第六世紀，表面看來是個與「古代」(*antiqui*)對立的語詞。然而羅馬史學家卡西歐德(Cassiodorus)使用這個字說道：「在這『新』(現代)時代裏，『古』(古代)羅馬的道德與實踐...」，根據這裏的上下文，「現代」一詞並沒有和「古代」對立的意思，只是指人們以新的文理脈絡「轉譯」(*translating*)古代的智慧與實踐的做法。隨後「現代」一詞被用以指稱「基督化的歐洲」(*Christian Europe*)，以有別於之前的異教古文明。等到十四世紀文藝復興的時代，佩脫拉克(Petrarch)曾將西方歷史區分為中世紀的「古代」與當時的「現代」。這時他以「現代」一詞表示從黑暗的沈睡中清醒過來、一種人文覺醒的狀態；這時「現代」的概念不再與「古代」對立，反而是指人們藉著對古希羅文化的重新發現、文明的復活再生，將人文主義從中世紀黑暗的宗教信仰中喚醒。直到十七世紀之後，「現代」一詞才確定產生與「古代」不相容的意思。「現代」的概念包含了以下的涵義：以自然是被主宰的對象，而不是沈思冥想的對象；使自然數學化、物質化，反對最終因的解釋；認為知識的目的在追求健康、快樂、免於痛苦，而不是智慧；認為不受限制、自由地追求科學知識可帶來極大的社會利益，而不正義的來源是資源的稀少，這個問題可透過不斷改進社會與政治機制來解決。❶於是從十七世紀西方科學興起，開啓現代的紀元之後，直至今日吾人仍自許為現代人。「現代」的概念以肯定個人理性與社會進步，重視科學知識與物質自然為其特徵，而崇尚科學與民主，發展科技與自由經濟的現代化運動(modernization)，在西方歷經四百年的演變，終於成為銳不可擋的文明趨勢。

當代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提出「普遍歷史」(*universal history*)的概念，認為歐洲以外的地區終將在科學、藝術、政治或者經濟發展上，走上西歐文明的道路。這以「西方理性論」(*Occidental rationalism*)為指導原理的「現代化」的過程，是世界歷史的宿命。❷而面臨全球化運動一

❶ 參見 Robert B. Pippin, *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On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European High Cul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sil Blackwell, Inc., 1991), pp. 17-20. 原則上“modern”應譯作「現代」，“modernity”譯作「現代性」，“modernism”譯作「現代主義」，不過這三個語詞經常糾纏在一起，有時並沒有明顯的區分。

❷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pp. 23-26；又根據哈伯瑪斯的說法，「現代化」一詞約出現在一九五〇年代，是社會科學功能論

波又一波的浪潮，世界各地對「現代化」以及「西化」的熱切追求，似乎也印證了韋伯的說法。然而從廿世紀七〇年代晚期開始，歐美學界突然流行起「後現代」的思維。<sup>③</sup>「後現代」一詞似乎有兩種涵義，一是「在現代之後」，也就是說「現代」已然終結了，還有「在現代之後」的時代承續著「現代」的發展；另一是「超越現代」，也就是說「現代」並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究極境界，還有應有超越「現代」的發展。

無論是哪一種涵義，「後現代」顯然是與「現代」對立的概念。在哲學上也有與「現代」對立的「後現代」思潮，而其先驅人物最早甚至可以溯及十八世紀的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 1771-1776）與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西方哲學史向以笛卡兒（Rene Descartes）為現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頌揚科學理性，相信人類知識（如數學）的普遍有效性，肯定機械的物理世界以及自由的精神世界同時存在，也保留了「上帝」的神聖地位。凡此種種，均可視為現代思潮的表徵。然而休姆以否定先天理性、上帝、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等等概念，並否定外在世界的實在性等主張，導致破壞傳統世界觀的懷疑論。而康德則否定傳統形上學，對理性活動的範圍加以批判與限制，並以先驗主體性（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取代外在世界的客觀性，他們兩人均為後現代哲學思潮播下種籽。至於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德國觀念論（German idealism），崇尚美感、想像、意志、激情、慾望、直覺等非理性的人心作用，更顯示部分歐洲人對啓蒙運動以來「科學理性」至上的一種反動。此後，歐美藝文界發展出打破傳統、刻意叛逆、伸張個人意識、重視自覺的種種文學、繪畫、建築、音樂、舞蹈、戲劇、以及各類平面與立體藝術，乃至社會批判理論、心理分析學說種種活動，雖說號稱是「現代主義」的表現，但也正是「後現代主義」繼承「現代主義」的部分。

---

(social-scientific functionalism)的用語，用以指稱一套的社會變化的歷程，包括：資本和社會資源流動的形成、製造生產能力的提昇與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中央政權的建立以及國家認同的形成、政治參與權力的擴大、都市化生活與正式學校系統的形成、價值與規範的世俗化等等，參見 Jurgen Habermas, F. Lawrence tr.,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85), p. 2.

③ 事實上「後現代」一辭的出現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文藝評論家歐尼斯(Federico de Onis)以"postmodernismo"一辭形容一種「竭盡所能而又溫和保守的現代主義」(exhausted and mildly conservative modernismo)。到了一九五〇年代，美國藝文界有感於「現代主義」運動的蕭條，才提出「後現代主義」一辭展示新意，以期追求「現代主義」的新高潮。於是六〇與七〇年代的建築、舞蹈、繪畫、文學、電影、音樂、廣告，乃至各種形式的社會批判運動，均被廣泛地冠予「後現代主義」之名。由此可見從歐美大眾文化、藝文發展的角度來看，「後現代主義」並非與「現代主義」對立的概念，只是「現代主義」的延續發展、推陳出新。



由此可見「後現代」一詞涵義廣泛，而哲學上的「後現代主義」囊括了大多數的當代哲學，包括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卡那普(R. Carnap)的物理主義(physicalism)、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語言哲學、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詮釋現象學(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德洛茲(Gilles Deleuze)、德悉達(Jacques Derrida)、福科(Michel Foucault)等人的法國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蒯因(W. V. Quine)的美國邏輯行為主義(logical behaviorism)，以及洛帝(R. Rorty)的新實用主義(neo-pragmatism)等，均可納入「後現代主義」之列。而尼采(F.W. Nietzsche 1844-1900)作為二十世紀的先知、《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一書的作者，是在海德格之前、後現代主義的標竿人物。

自從尼采在其〈歐洲虛無主義〉("European Nihilism")一文中宣布「基督教的終結」(the end of Christianity)、「上帝死亡」(God is dead.)之後，海德格接著宣稱「哲學的終結」(the end of philosophy)，於是後現代哲學家們也紛紛提出「人的終結」(the end of man)、「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理性的終結」(the end of reason)、「現代的終結」(the end of modernity)等等說辭。加之語言意義解構論(deconstructionism)的提出，後現代主義遂瀰漫著全盤否定西方傳統價值信仰、歷史文化、人格理性的硝煙氣氛。後現代哲學雖然不是一無可取，在批判反省科技為害、打倒獨裁主義、關懷弱勢團體、解放受壓迫的性別與階級、以及重視生態環保等等議題上，後現代哲學家們可謂頗有貢獻。但不可諱言的是在顛覆傳統之餘〔即使以多元主義(pluralism)--價值與社會的多元--為掩護〕，後現代哲學已步上「虛無主義」的不歸路。「虛無主義」否定一切價值理想、觀念意義、企圖目的，唯遂一己情緒之好惡，必將喪失自我批判(批判「虛無主義」自身)或自我反省的能力，導致個人與社會的終極毀滅。

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是廿世紀西方一位偉大的形上學家；在面對當代西方哲學反形上學洪流之時，懷海德仍堅持形上學有其哲學的必要性與價值，這使他在當代哲學界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後現代哲學家」在批判「現代科學世界觀」之餘，宣稱哲學的工作便是在對構成世界觀的各種因素進行「解構」(deconstruction)。舉凡觀念、理想、價值、意義、目的、人格、語言、文化，都成為他們「解構」的對象。懷海德雖與「後現代哲學家」一致，以批判現代科學世界觀及其預設

為哲學發展的起點，但他仍肯定哲學形而上的思辯功能；並且堅信理性與經驗的結合，足以使吾人認識自然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根據他的「機體哲學」(philosophy of organism)，一切實有都是具備「自我創生能力的機體」(self-creative organism)，因之自然便是「創生進程」(creative advance)，而自然的歷程即宇宙的真相(process as reality)。懷海德稱他的哲學是「機體實在論」(organic realism)；他與後現代哲學家「反形上學」、「反實在論」以及「反理性論」的立場顯然有別。在美國的懷海德哲學家科布(John Cobb)與葛瑞芬(David R. Griffin)則認為走向「虛無主義」的「後現代主義」是「解構的」、「消除的」後現代主義(deconstructive/eliminative postmodernism)，而帕思(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懷海德以及哈茲洪(Charles Hartshorne)等人的哲學則是「建構的」、「積極的」後現代主義(constructive/positive postmodernism)。<sup>④</sup>這些後現代哲學家一致對現代科學的基本預設：如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以及「表象認識論」加以批判，同時也提出建構新世界觀必備素。其中，帕思與詹姆士是美國「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創始人，柏格森是法國的「生機論者」(the vitalist)，他們的學說雖然對於建構的後現代哲學有所貢獻，但對於思辯哲學的形而上傳統仍然抱持保留的態度。帕思與詹姆士反對傳統的形上學，柏格森的直覺論也有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傾向。唯有當代「機體哲學」與「歷程哲學」的奠基者懷海德，堅持思辯哲學的傳統，提供了一系統形上學，建構一個完整的後現代世界觀，值得吾人深究。

懷海德的後現代世界觀有其獨具特色的發展過程。身為一位數學家與科學家，他對現代科學以及科學新發現，如相對論、電磁場理論以及量子理論皆有瞭解。他曾對愛因斯坦相對論中的「同時性」(simultaneity)概念提出批判，也曾運用相對論中的「時空套具說」(theory of space-time continuum)以及馬克斯威爾(Maxwell)的「電磁場」概念，提出他的「事

<sup>④</sup> John Cobb, "From Crisis Theology to the Post-Modern World," *Centennial Review* 8 (Spring 1964), 209-20; David R. Griffin, "Post-Modern Theology for a New Christian Existence," *John Cobb's Theology in Proces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7), Introduction; Frederick Ferre, *Shaping the Future: Resources for the Postmodern Worl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6)。參見David Ray Griffin & John B. Cobb, jr. & Marcus P. Ford & Pete A. Y. Gunter & Peter Ochs,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eirce, James, Bergson, Whitehead, and Hartshorn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 33.

件論」(doctrine of event)。<sup>⑤</sup>原則上，這些現代科學新發現都是針對牛頓的「古典物理學」而起，可說是「後現代科學」的先驅。如果以牛頓的「古典物理學」作為「現代科學」與「現代世界觀」的基本預設，那麼「量子理論」可說是「後現代科學」與「後現代世界觀」的基本預設。早在廿世紀初懷海德在發展他的「機體哲學」時，便已深受這些「後現代科學」先驅的影響，並以批判現代科學的預設作為他哲學思考的起點。而懷海德以後的「後現代科學家」，如英國的量子論學家波恩(David Bohm)以及比利時的熱力學家普里哥金(I. Prigogine)，對懷海德的哲學也十分重視和欣賞。<sup>⑥</sup>他們可說都是深具人文素養的科學家，也一致認為科學與哲學的鴻溝可以透過「機體」的觀點加以化解。本文擬分三部分探討懷海德的「後現代世界觀」；首先將說明上述與懷海德「後現代世界觀」相關的「後現代科學理論」，其次說明懷海德對「現代科學世界觀」的批判，最後說明懷海德「機體哲學」中所顯示的「建構的後現代世界觀」。

## 一、後現代世界觀與後現代科學

哲學上的「後現代趨勢」早已有之，「後現代」一詞則出現較晚。根據葛瑞芬的說法，最早以「後現代」一詞形容懷海德哲學的是科布，見於他在一九六四年發表的〈從危機神學到後現代世界〉一文(“From Crisis Theology to the Post-Modern World”)中。他本人在一九七二年與七七年撰文介紹科布的說法時，也曾以「後現代」一詞形容懷海德的哲學，這可見於他的〈新基督教徒的後現代神學〉(“Post-Modern Theology for a New Christian Existence”)一文。他們對於「後現代」一詞成為解構的「後現代主義」的專利，似乎感到無奈。根據這項構想，廣義地說只要是對「現代」概念提出批判的，均可稱之為「後現代」。而懷海德的哲學之所以被形容為「後現代」，

---

<sup>⑤</sup> 參見 A. N. Whitehead,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Chapter 2, 3; Filmer S. C. Northrop, “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chilpp, Paul, A., ed. *The Philosophy of A. N. Whitehead* (Evanston &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167-207.

<sup>⑥</sup> 根據盧卡斯的說法，懷海德的哲學影響到物理學家與科學家，包括愛亭頓(Arthur Eddington)、吉恩(James Jeans)、普里哥金(Ilya Prigogine)、波恩(David Bohm)，他的思想也和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迪波吉(Louis deBroglie)、克派(Milic Capek)等科學家接近。受限於作者的科學知識，本文僅取其中與懷氏關係最為密切的兩位科學家，波恩與普里哥金加以討論。參見 George R. Lucas Jr., *The Rehabilitation of Whitehead An Analytic and 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Process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 47.

正因他以批判「現代科學世界觀」作為哲學起點，並且兼顧到科學的新發現。如果我們根據科學理論的發展，將「現代」簡單定義為「根據十七世紀伽利略、笛卡兒、培根與牛頓的科學思想所發展出來的世界觀」。這「現代世界觀」基本上是以「機械唯物論」(mechanistic materialism)、「數學形式主義」(mathematical formalism) 為其預設，認為自然的終極事實是處於絕對時空中的物質，其運動變化遵守機械的物理法則，得以數學測量描寫之。而「後現代」是指挑戰「現代科學」的「新科學世界觀」，包括受到愛因斯坦相對論、量子論或者熱力學第二定律等所影響而產生（或者與之相容）的「後現代科學世界觀」。這後現代世界觀，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認為時空不是絕對的、物理測量的架構，而是相對的「連續時空套具」(space-time continuum)，自然最終的事實不是物質，而是能量。根據「量子理論」，能量的活動並不依循機械因果的必然法則，只是基於「機率性地零散運動」(probabilistic, discrete movement)。至於「量子現象」更顯示觀察實驗的本身會影響到被觀察的對象；一個本來是粒子的電子可能表現為波動的行爲，而本來是波動的光線，也可能表現為粒子的行爲，端看它們所處的「實驗背景」(experimental context) 而定。如此一來，可以說事物的性質取決於其所處的實驗背景；而這項說法正違反了「機械論」以事物的性質獨立於實驗背景的論點。

根據英國物理學家波恩的說法，「量子理論」這項特性使科學家開始從「機體的」(organic) 觀點，而不是「機械的」(mechanic) 觀點，來看待自然。事物與其所處的背景脈絡之間有密不可分的交互關係，而不是單純地作為參照架構而已。機械論一向主張物質佔據特定的時空，彼此之間並沒有遠距離的作用，擁有所謂「定位性」(locality) 與「連續性」(continuity)。量子論則主張在某種情況下，即使遠距離的事物之間也互相關聯，即所謂「非定位性」(nonlocality) 與「斷續性」(discontinuity)。又量子論主張整體組織了 (organize) 部分，而部分也影響了整體，整體與其部分之間有內在關係，這與機械論的看法也不相同。⑦

「量子現象」展示出自然界無法以機械律加以解釋的另一層面，使我們可以發展出一「更為完整、非機械論的物理學」(more fully nonmechanistic physics)。「機械論」主張宇宙自然是由基本粒子（如原子、電子、夸克）

⑦ David Bohm, "Postmodern Science and a Postmodern World," in D. R. Griffin ed.,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57-65.

構成，這些基本粒子散佈於空間，彼此獨立，互相外在（external to each other），各據自性。基本粒子之間並沒有機體的關聯，因之無法形成一個整體，只像機器的零件而已。粒子之間以撞擊推動的方式，只是外在的相互作用，不至影響到粒子本身的性質。「量子論」的出現，打破了上述的機械觀。量子運動不是連續的外力作用，而是斷續的跳躍。量子同時具備質量與能量的雙重性質，也擁有「非定位性」。量子現象顯示部分與整體之間有「內在關係」，而不只是「外在關係」。根據這些不同於「機械論」的觀點，波恩於是發展出「牢不可破的整體觀」（a view of unbroken wholeness）來。「機械論」認為宇宙基本上是由分散的物體所構成，至於機體生命和心靈的發展乃是次要的。波恩則認為事實正好相反，內藏與發展的整體運動（“the unbroken movements of enfolding or unfolding, or holomovements”）才是基本的。就某種程度而言，整個宇宙主動地隱含在宇宙的每個部分；整體內藏於部分之中，而部分則會開展為一整體。因此宇宙中部分與整體之間的內在關連（internal relatedness）才是基本的，而「機械論」所主張的外在關係則是衍生的、次要的。前者顯示宇宙的「隱含秩序」（implicate/enfolding order），後者則顯示其「外顯秩序」（explicate/unfolding order）。波恩於是認為根據「量子論」，我們可以發展出不同於「機械論」的「後現代世界觀」。「現代世界觀」的思維模式是零散的、不和諧的、毀滅性的，而「後現代世界觀」則是「有秩序的」、「和諧的」、「創造性的」。事實上，自然與人文世界已內藏於我們的思想歷程之中；這世界正是我們生命意義的泉源。「後現代科學」如果採取整體的觀點，必能克服事實與價值、倫理與物欲的對立二分。<sup>⑧</sup>

波恩認為「量子論」動搖了「機械論」的宇宙觀；宇宙秩序不再是可認知的、可預測的鐵則，我們所能把握的只是局部的現象。這使得二十世紀的「現代心靈」（modern mind）傾向相對論與實用論，喪失了追求「絕對真理」的興趣，失去了整體人生的意義。人生失去意義，價值便無從安立。這使得社會陷入盲目動亂、互相毀滅的危機。波恩因此建議我們應該發展一「後現代世界觀」，以化解世界秩序瀕臨解體的困境。「現代世界觀」將人生意義與宇宙事實分割開來，而「後現代世界觀」則在將二者重新結合。物質與意識，事實與價值均為一體，不可分割。科學本身也有不可擺

⑧ Ibid., pp. 63-68.

脫的道德本質，真理和美德對科學知識而言，佔據相同的地位。<sup>⑨</sup>波恩的這些觀點，與懷海德的構想十分契合。懷海德曾受到這些「後現代科學觀」的影響，而他機體哲學的思想也正符合量子理論的理念，甚而可說他是這一派思想的先驅。

波恩不僅認同懷海德的機體思想，他也同意懷氏對「真際」的看法：真際即歷程。<sup>⑩</sup>不過量子理論是以「微觀宇宙」為解釋對象，不如熱力學更能說明「真際即歷程」的意義，而一九七七年諾貝爾獎得主普里哥金曾針對這點作過精闢的分析。他在與史坦格女士合著的《秩序出於渾沌》（*Order out of Chaos*）一書中指出，時間在現代物理學裏沒有地位。物質粒子所構成的宇宙是死寂的、被動的自動機器，受到可逆轉的（reversible）、因果的（causal）、決定的（determinative）物理法則所支配，而獨立於時間因素的影響之外。因此時間對現代物理學而言，只是一種常數架構（parameter），過去與未來可說同量等值。他的說法與懷海德對「簡單定位的物質概念」所做的批評一致。然而自從熱力學第二定律被發現之後，引進了「時間箭矢」（the arrow of time）的概念。從此時間便成為解釋自然不可或缺的因素，物質也不再只是被動的實體，而且能主動活動。普里哥金承認「後現代的自然觀」與柏格森和懷海德的形上學極為接近，但他自己仍會從科學的立場作更進一步的研究。<sup>⑪</sup>

這裡我們必須簡單說明熱力學的第二定律。根據「機械論」，在一封閉的系統中，質能守恆互換以及物體的運動都是「可逆轉的歷程」（reversible processes）。然而根據熱力學的第二定律，「熱能」在封閉或孤立系統中，會產生「不可逆轉」的變化，較熱的部分會朝向較冷的部分耗散其能量，直到該系統的溫度達到均衡為止。耗散作用（dissipative force）造成熱能失散，使原本保持均衡狀態的系統趨向混亂（disorder），即所謂「熵」（entropy）。如果把宇宙看做是一封閉系統，視其演化為一不可逆轉的歷程，那麼宇宙的「熵」將趨向於最大值。但演化的事實卻顯示宇宙日趨於高度複雜與組織化。因為所有自然的歷程處於開放系統中，而不是封

<sup>⑨</sup> David Bohm, "Postmodern Science and a Postmodern World,"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 60.

<sup>⑩</sup> David Bohm,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Ark Paperbacks, 1983), pp. 48-50.

<sup>⑪</sup> Ilya Prigogine and Isabelle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pp. 10-11. 普里哥金認為在古典物理學裡「時間」問題沒有地位，而對柏格森和懷海德這樣的哲學家而言，「時間」具有更為重要的角色。前者立場可稱之為「實證的」（positivistic），後者則可稱之為「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他本人擬採第三種立場，主張傳統物理學與化學簡化時間的演化，或是因為這些科學只考慮簡化的情況，而不曾顧及真相的複雜性。

閉的系統，因此「不可逆轉」的自然演化不是「耗散的」，而是「創生的」。事實上，任何新的事物或結構的出現，並不是出於處於「均衡狀態」（一系統中各種性質如溫度、壓力、密度均完全相同）的系統，而是出於「系統的不均衡」（far-from-equilibrium）。在不均衡的狀態中，物質不再是「盲目的」，開始「有知覺」，進而以各種不同方式對外在世界作種種反應。普哥金認為這項「不可逆轉的歷程」將時間引入了無時間性的機械宇宙中，使得物質不再接受機械的因果決定，而得到選擇機遇的機會。<sup>12</sup>相對於唯物機械論以「決定論」（determinism）、「簡單性」（simplicity）及「可逆轉性」（reversibility）作為解釋物質宇宙的核心概念，而熱力學則以「機遇性」（randomness）、「複雜性」（complexity）及「不可逆轉性」（irreversibility）作為解釋自然演化的核心概念。<sup>13</sup>

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核心概念為西方十七世紀科學興起以來，為了人文與科學，或者機械論與目的論對立二分的世界，搭起了新的橋樑。普里哥金認為懷海德正是少數相信科學與人文可相互結合而不對立的哲學家之一。懷海德觀察到自然的創化不可能只是出於永恆不變的物質粒子之間的運動變化，而事物在變化中仍有不變的成分在。哲學家的工作便在協調自然的「恆常性」與「變化性」；事物本身便是生成變化的歷程（process of becoming），「生成變化」便是「存有」的本質（Becoming is the essence of being.）。懷海德強調「事物」與「關係」兩者同樣是真實的，自然中的萬物彼此相互依存。從宇宙創生演化的觀點出發，懷海德和柏格森一致肯定那些更為開放、廣闊的科學概念，足以化除科學與哲學的二分對立。又懷氏的機體思想強調時間因素以及宇宙創生演化的事實，視實際為歷程，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核心概念「不可逆轉的歷程」關係密切。<sup>14</sup>普哥金對於懷海德機體思想的推崇，也顯示懷氏思想的「後現代性格」。原則上，懷海德的理想是以批判現代世界觀為起點，自然以建立新的「後現代世界觀」為目的。科布與葛

<sup>12</sup> Ibid., pp. 8-16.

<sup>13</sup> Ibid., p. 54.

<sup>14</sup> 普里哥金認為懷海德和柏格森同是反對機械論的哲學家，他們都極為重視自然創生演化的事實，以時間作為事物生成變化的本質條件。他們肯定存在最終的單元是「時段」（duration），而不是處於剎那之間的點塵。此外，普哥金也以愛因斯坦(Einstein)、普斯特(Proust)、佛洛伊德(Freud)、德日進(Teilhard)、帕斯(Peirce)等人，都是注意到時間因素的思想家。作者則認為愛因斯坦的思想仍不能擺脫機械決定論，佛洛伊德以文明進步只在壓抑盲目的本能衝動，無法保障個人的自由，「時間」的概念對他們而言，並沒有機體演化的涵義。參見 Ilya Prigogine and Isabelle Stengers, foreword by Alvin Toffler,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4), pp. 10-17.

瑞芬說他是「建構的後現代主義」的一位代表人物，誰曰不宜？<sup>15</sup>

當然這項「後現代」概念與不同於流行的「後現代」概念。葛瑞芬稱這樣的後現代主義是「建構的或者修正的後現代主義」，他說：「其所以優勝於『現代世界觀』，不在取消建立世界觀的可能性，而在借著修正現代世界觀的預設與傳統觀念，以建構「後現代世界觀」。建構的或者修正的後現代主義統合了科學的、審美的、以及宗教的直觀。建構的後現代主義不反對科學，只是反對『科學主義』（scientism），因為科學主義只容許科學提供我們建立世界觀的材料。」<sup>16</sup>科學以其特定的方法與解釋，揭露了自然的性質與法則，使吾人對於客觀世界的知識突飛猛進，得免於愚昧與迷信。然而隨之而起的『科學主義』，將所有人類經驗化約為科學知識，所有思維方式化約為科學方法。自然作為觀察、測量、預測、控制的對象，不僅自然自身的地位受到貶抑，連生活在自然中的人類也受到了貶抑。即如葛瑞芬所說：「在這樣的宇宙中，不僅沒有意圖、價值、理想、各種可能性與性質失去其地位，也失去了自由、創生、時間或者神聖性。甚而失去了規範與真理，一切的一切終究是無意義的。」<sup>17</sup>而懷海德早在廿世紀初便已觀察到這項危機，於是他開始對「現代科學世界觀」提出批判。

## 二、懷海德對現代科學世界觀的批判

懷海德哲學原以批判現代科學世界觀的基本預設——科學唯物論（scientific materialism）為起點。在早期自然科學哲學的著作裏：如《思想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1917）、《自然知識原理探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1919）、《自然的觀念》（*The Concept of Nature*, 1920）、《相對性原理》（*Principle of Relativity*, 1922），懷海德根據二十世紀科學的新發現：相對論與量子物理學，一再批評十七世紀西方科學興起以來的自然觀。在晚期的著作《科學與現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5）、《歷程與實際》（*Process and Reality*, 1929）中，懷海德不僅持續早期的批判，進而發展出新的「歷程

<sup>15</sup> David Ray Griffin, etc. eds.,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 2.

<sup>16</sup> *Ibid.*, x.

<sup>17</sup> *Ibid.*, p. 3.



宇宙論」(process cosmology) 或者「機體哲學」以取代這現代科學世界觀。<sup>18</sup> 本文將針對這些批判中最基本的三項議題加以討論：一是《科學與現代世界》中「簡單定位」(simple-location) 的概念與「具體性錯置的謬誤」(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二是《自然的概念》中「自然兩極的謬誤」(the fallacy of the bifurcation of nature) 的理論，三是《歷程與真際》中「空洞現行性的謬誤」(the fallacy of vacuous actuality) 的理論。

### (一)「簡單定位」與「具體性錯置的謬誤」

「簡單定位」的概念與「具體性錯置的謬誤」是懷海德在《科學與現代世界》一書中所提出的。早在一九〇五年〈論物質世界的數學概念〉(“On Mathematical Concepts of the Material World”)一文中，他便提到傳統古典物理學認為物質世界的終極存在(the class of ultimate existents)是由三類彼此互斥的單元(entities)---物質的粒子(particles)、空間的點塵(points)、以及時間的剎那(instants)---所構成，<sup>19</sup> 這「時-空-物質觀」(space-time-matter)是現代科學的預設，這也就是所謂的「微粒說」(the corpuscular theory)。根據「微粒說」，所有物體都是由極其微小的粒子所構成，而所有自然現象都可以用物體的運動加以解釋。<sup>20</sup> 「微粒說」的核心概念便是「三度進向的絕對空間」、「一度進向的絕對時間」和「物質粒子」。這樣的粒子概念在牛頓的《光學》(Optics)一書中說得最為清楚：

對我來說，上帝一開始就以固體的、有質量的、堅硬的、可穿透的、可移動的、具有大小形狀的、且具其他性質的粒子構成的物質，在空間裡以一定比例，根據祂的目的來構成事物。而這些基本粒子(primitive particles)既然

<sup>18</sup> 懷海德對「現代科學世界觀」的批判可見於他各個時期的著作之中。在他晚期出版的《歷程與真際》一書，他反對下列九種思維習慣：(一)對思辯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不信任；(二)相信語言是表達命題的適當方式；(三)主張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以及受到官能心理學所影響的哲學思考；(四)主述式的表達形式；(五)感覺主義的知覺論；(六)空洞現行性的學說(doctrine of vacuous actuality)；(七)將客觀世界視為由純粹主觀經驗所構成的康德學說；(八)歸謬論證中的獨斷演證(Arbitrary deduction in *ex absurdo* arguments)；(九)相信邏輯的不一致性顯示前面論證以外的某些邏輯的錯誤。這裡本文所討論的是與「現代科學世界觀」關係最為密切的「空洞現行性的學說」，其他部分也會涉及，只是邏輯與語言哲學的部分多屬衍生性的問題，將暫予擱置。參見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reface, xiii.

<sup>19</sup> A. N. Whitehead, "On Mathematical Concepts of the Material World," in *Alfred North Whitehead: An Anthology*, pp. 13-15.

<sup>20</sup> 根據微粒說，所有物體是由某種非常小的粒子或微粒構成，至於這微粒是否可以再分割，學者看法不一。在古典物理學裡，包括克卜勒(J. Kepler)、伽利略(G. Galileo)、波以耳(R. Boyle)、嘉山第(Gassendi)、惠更斯(Huygens)、牛頓都是原子論者，主張微粒不可再分割，笛卡兒與萊布尼茲則持反對的立場。參見 Sir William Cecil Dampier, *A History of Scie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是固體的，就遠比那些有縫隙的物體來得堅硬。<sup>21</sup>

「基本物質粒子」具有質量與不可穿透性，在絕對空間之中佔據一定點，在絕對時間之中佔據一剎那，正如懷海德在《科學與現代世界》裡所形容的，這個概念所預設的是：

以不可化約而又赤裸裸的物質或質料作為終極的事實 (the ultimate fact of an irreducible brute matter)，這物質在大塊之流中 (a flux of configurations) 瀰布空間。就其自身而言，這物質沒有感覺、沒有價值、沒有目的。它只是盲目地跟隨外在關係加諸其身的固定規則行事，而非出於自身的性質行事。<sup>22</sup> 懷海德稱這項預設即「科學唯物論」。處於剎那點塵的物質粒子，在時間或空間上有「不相連接的延展性」(the disconnection of extension in space or in time)；<sup>23</sup> 換言之，這物質粒子孤立存在，與任何其他因素無關。如此「科學唯物論」所謂自然的「終極事實」(the ultimate fact)，是於一剎那間散佈於廣袤的空間的物質，而這同一物質可於另一剎那間散佈於相同的空間之中。<sup>24</sup> 具有時空「不相連接的延展性」的物質粒子，即是具備了「定點定時」、「簡單定位」特性的物質，便是「科學唯物論」和「唯物機械論」的基本預設。懷海德解釋說：

我所謂「物質」或「質料」，就是指有「簡單定位」性質 (simple-located) 的事物。所謂「簡單定位」是指...時空所共同具備的特徵：物質可以毋須參照任何其他時空區域的說明，以一完全確定的意義，被指稱現在就在這個空間、就在這個時間，或說它現在就在這時空之中。...不管你怎麼決定，你所謂時空中一個確定的地點，就能恰當的說明某個物體與時空的關係，說它在此時此地，就「簡單定位」而言，便再沒有別的什麼好說了。<sup>25</sup>

如此「簡單定位」包含下列命題：(一) 事物的成分是物質，這物質是「物自身」，而且佔據一定時空。(二) 物質佔據的時空只是事物所在的指標，由於事物之間是分開來的 (discontinuously extensive)，因此與事物相關的時空也是分開來的。(三) 物質具有慣性 (inertia)，「簡單定位」了的物質只能根據機械法則「運動」(in motion)，但由於本身不具備主動性，因此

<sup>21</sup> Issac Newton, *Optics*, 摘自 Sir William Cecil Dampier, *A History of Science*, p. 170.

<sup>22</sup>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5), p. 17.

<sup>23</sup> A. N. Whitehead,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p. 1.

<sup>24</sup> *Ibid.*, p. 2.

<sup>25</sup>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 49.

不能「活動」(in activity)。

基於「簡單定位」的假設，物質宇宙是一孤絕的、靜態的、死寂的宇宙，只有許多不相連續的物質個體散佈其中，盲目地進行機械性的運動。懷海德指出這「不相連接的延展性」原理雖是「唯物論」的預設，卻與許多古典物理學的概念不相容。因為這原理預設了物質點塵存在於一絕對分離的時空系統之中，其中任何分離的兩個質點之間，沒有產生因果作用的可能性。而古典物理學的重要概念，如速度、加速度、與角動量(momentum)等等，都需要假設物質具備時空「連續的延展性」(connective extension)。如此一來，物質必需佔據一定體積的空間與一定時距的時間，而不只是佔據無延展性的點塵(volumeless point)與無時距的剎那(durationless instant)。速率與加速度等概念不只是關係到物質位置的改變，且關係到物質所處相對情境的改變。<sup>26</sup>孤立的物質概念足以威脅到因果機械論(causal mechanism)。<sup>27</sup>根據「因果機械論」，任何事物只要是由當前發生的事物(the happenings of the present)所決定，就會成為未來事物的特質。因先果後，先前的狀態必然決定隨後的狀態，這是「動力因」(efficient cause)的基本原理。<sup>28</sup>過去事件決定現在事件的發生，現在事件決定未來事件的發生，如此一來，過去、現在與未來又豈能各自為政？果然如此，歸納法與自然齊一律也會喪失其基礎。懷海德於是根據時空連續性原理，主張自然的事實建立在相關性(relatedness)之上，包括知覺本身，被知覺的自然事件，以及知覺意識覺察到的自然事件之間的時空關係，這些因素構成了事物的總體(totality)，其中的任何一個因素都與其他因素相關。<sup>29</sup>就「後現代科學」的觀點看來，懷海德所批評具有「簡單定位」性質的物質概念，有其「定位性」與「決定性」，但缺乏「連續性」。不過這「不連續性」只是威脅到「機械決定論」，使得自然瀰漫著彼此無關的物質粒子，喪失其整體性；卻並沒有因此使得粒子的活動得到更大的自由。

「簡單定位」物質的概念雖然威脅到古典物理學，但也為科學研究帶來極大的便利與成功。不過這項概念是高度抽象科學思想的產物，並不是自然的事實。抽象思想本身並不是一項「謬誤」，但我們如果把抽象概念

<sup>26</sup> Ibid.

<sup>27</sup> Ibid., p. 9.

<sup>28</sup> 參見 Milic Capek, *The Philosophical Impact of Contemporary Physics*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61), pp. 121-122.

<sup>29</sup> A. N. Whitehead,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 15-17.

看成是具體真實的事物，那麼就不免於陷於謬誤的泥沼之中了。懷海德稱這便是「具體性錯置的謬誤」。他解釋道，「簡單定位」的概念有兩大特徵：一是時空侷限在事物自身，而事物則處於此時此地，並且和其他物質點塵及其所處的時空無關，這就是「簡單定位」的孤絕性（isolability）、獨特性（uniqueness）和單一性（singularity）。二是凡是具有「簡單定位」性質的事物，便可以化約為科學的或邏輯的實體。這樣的實體一方面被空間化了，不含任何時間成分；另一方面被抽象化了，不含任何情境成分。然而上舉事物的這些性質只是高度的抽象概念；同樣的事物原來是極為具體的事實，但是經由抽象的邏輯建構，成為「簡單定位了的物質」（simple-located matter）。如果我們把抽象的概念看作是具體事實，那就犯了「具體性錯置的謬誤」。這項謬誤不僅在本體論上，導致各種不當的二元區分；在認識論上，也會造成可知不真實、真實不可知的嚴重後果。我們會把事物區分成自存的「實體」和依附實體而存在的「屬性」，進而區分事物本身具有的真實「初性」，和另因心靈而有的、可感覺的「次性」。事實上這是將心物高度抽象化的結果：物質成為一堆交錯排列的粒子，而心靈成為觀念、印象、或者感覺與料（sense-data）的集合體。科學的抽象作用固然有其功效，能幫助我們簡化複雜的現象，精確的進行測量與預測，但那終究是一種思考的工具而已。「具體性錯置謬誤」的產生，不在科學學思考本身，而在於把抽象的建構誤認為是具體的存在，把方法上的方便法門強加於複雜的真實界（reality）之上，並且把它看成是對真實界的正確描繪。這樣的謬誤正可以說明現代科學世界觀中「自然兩橛論」的難題。

## （二）自然兩橛論（Bifurcation of Nature）的謬誤

懷海德首先在《自然的觀念》一書中提到所謂「自然的兩橛」，也就是說把自然硬生生的分成「兩橛」。在本體論上，有引發感官知覺的「原因的自然」（causal nature），即物自身；以及感官知覺所得的「表相的自然」（apparent nature），即表相（appearances）。在認識論上，有初性（primary qualities）與次性（secondary qualities）的二分。「初性」是物體自身的性質，但無法為感官知覺所認識。「次性」則是物體可知覺的性質，但只是心理主觀的添加物（psychic additions），而不是物體自身的性質。「原因自然」與「表相自然」的區分可說是「自然兩橛」的因果論（the causal theory）；「初性與次性的二分」則可說是「自然兩橛」的心理添加論（the theory of

psychic additions)。如此一來「自然的兩概」導致可知的自然不真實，而真實的自然不可知的後果。<sup>30</sup>懷海德認為牛頓的光學正是屬於這類的理論；傳導事物可見性質的是細微的光粒子，可是我們所見到的卻是顏色。而洛克主張「初性與次性的二分」，更是「自然兩概論」有系統的發展。根據洛克的理論，「初性」包括固態性（solidity）、延展性、形狀、數量，以及動態性（mobility）等，是物體自身的性質。當「初性」大到可以為感官所知覺的時候，透過光粒子作用於眼睛之上，便可使人產生各種「初性」的觀念。「初性」內存於物體自身，無論是否有人知覺到它，都不影響到它的實在性，洛克因而稱之為「真實性質」（real qualities）。另一方面「次性」是由不可感知的「初性」（insensible primary qualities）作用於眼、耳、鼻、舌、身五官之上，使人產生色、聲、香、味、觸等觀念。「次性」依附人的感知而有，並不是物體自身的性質，如果沒有知覺者，「次性」就無法存在，洛克因而稱之為「可感覺性質」（sensible qualities）。<sup>31</sup>如此一來，「初性」雖然是物體自身真實的性質，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之下無法為人所知覺，是不可感知的；而「次性」雖可以為人知覺，卻不是事物自身的性質。自然因此被割裂為無聲、無色、無臭的粒子世界，和花香鳥語的感覺世界；前者真實而不可知，後者可知卻不真實。誠如懷海德所說：

如此說來，物體被知覺到的性質實際上不屬於這些物體，純粹是心靈的產物。如此，自然所得到的性質：無論是玫瑰的芬芳，夜鶯的低唱，還是太陽的熱力，真正應該歸屬我們的心靈。詩人完全錯了。他們應當對自己的心靈歌頌，把對自然的禮讚改換成對人心卓越表現的恭維。實際上自然是個了無生趣的東西，無聲、無味、無色，只是一群匆忙去來的物質，沒有目的，沒有意義。<sup>32</sup>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在本體論上採取「簡單定位」的物質概念，在認識論上便會產生「自然兩概論」的後果。「知覺表象論」（the representative theory of perception）、「知覺因果論」（the 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素樸經驗論」（naïve empiricism）、「實證論」（positivism）、「現象論」或者感

<sup>30</sup> A. N. Whitehead, *Concept of Nature*, pp. 30-32.

<sup>31</sup>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3), pp. 134-140. 洛克區分真實的性質（物自身）與可感的性質正是一「表象實在論」（representative realism）的立場。承續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洛克認為心靈無法直接認識事物其自身或實體，必須透過觀念（ideas）或表象（representation）的仲介，得到有關事物屬性與性質的間接知識。準此，事物其自身成為認識的原因，觀念或表象則是結果。

<sup>32</sup>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 54.

覺論 (sensationalism) 都因此而衍生出來。當代哲學中各種形式的實證論與感覺論，甚而心理學的行爲主義 (behaviorism) 都不脫這自然兩極的認識論。而在懷海德看來，這樣的知覺理論只說明了「知覺」的兩種型態：「立即呈現性」(presentational immediacy)「因果效應性」(causal efficiency)，並不足以解釋「知覺」的全貌。「知覺」還涉及與意義、概念有關的「象徵指涉性」(symbolic reference)。如果把複雜的「經驗」化約爲「知覺」，又將「知覺」限定爲「感覺」(sense-perception)，那將使心靈功能喪失其深度與廣度。這樣的做法，不但不能說明人的精神功能，也忽視了記憶、想像、意志、情感、直覺、評價種種心靈作用。站在「機體實在論」的立場，懷海德一面試圖以「知覺的關係論」(relational theory of perception) 取代「知覺的因果論」，<sup>33</sup>一面發展「知覺三態論」，以肯定「表相的自然」便是自然本身。自然只有一個，其中沒有「表相」與「原因」的區分。

### (三) 空洞現行性的謬誤 (Fallacy of Vacuous Actuality)

懷海德將「空洞現行性」定義爲：「缺乏主體立即性的實有 (a res vera devoid of subjective immediacy)」，或者缺乏主體經驗的實有；這個概念和「性質內存於實體」(quality inherent in substance) 的概念密切相關。<sup>34</sup>「空洞現行性」是從「簡單定位」的物質概念衍生出來的；換言之，從「唯物論」的觀點，任何物質都缺乏「主體經驗」、「主體感受」。時空只是物理測量的參照架構，物質的存在不會受現行時空因素的影響，物質與時空之間沒有「內在關係」。不僅此也，「唯物論」認爲物質是被動的、慣性的存在。物質與物質之間也只有外在的、機械的因果關係，而沒有任何內在關聯。物質本身沒有自發性 (spontaneity)，不具備任何引發自身變化的作用，足以顯示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而與此相關的「物質實體」概念，也只是靜態的托體，其性質寄託於實體，而與其他事物無關。我們有「綠葉」、「圓球」之類的概念，正是基於這「實體支托屬性」的預設。懷海德認爲無論是「空洞現行性」或是「實體」，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如果加以適當地運用，有極高的實用價值。但「空洞現行性」並不是具體的事實，事實是

<sup>33</sup> 詳見拙著，《懷海德自然哲學—機體哲學初探》，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九十年，第六章，〈對象論〉。

<sup>34</sup>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29, p. 167.

「離開了主體的經驗，就什麼都沒有了，沒有了，只是空空如也」。<sup>35</sup>

「唯物機械論」認為物質沒有主體經驗是基於常識之見，平常我們可以區分「有機的生命」(organic life)與「無機的物質」(inorganic material)。前者有意識、感覺、目的、意圖，有新陳代謝，能生長繁殖，後者則沒有這些變化。但懷海德卻認為所有的存在都是「機體」。「機體」，不論有生命或者是無生命，有機或者是無機，都會因為參與其他更大型的機體而改變其自身的「計劃」與「特質」。他說：

具體的實存 (the concrete enduring entities) 是機體，所以整個機體的計劃會影響那些進入機體之中附屬機體 (subordinate organism) 的特質。以動物為例，其心靈狀態進入整個機體的計劃之中，影響了其後進入附屬機體的計劃，乃至影響到最細微的機體，如電子。因之，在一有生命的軀體中的電子不同於在軀體之外的電子，因為前者受到軀體計劃的影響。<sup>36</sup>

根據懷海德的說法，無論是高級複雜的生命有機體，或是簡單的電子、原子、分子，都是彼此相關的「機體」。在自然界中，沒有獨立自存、與任何事物毫不相關的物質粒子。懷海德這項打破心物、有生命與無生命界線的做法，正是他與「生機論者」最大的不同。他曾批評「生機論」(vitalism) 任意將自然劃分為有生命與機械物質兩種領域，不免陷於不當的「心物二元論」。他說「生機論」事實上只是一種妥協；「生機論」允許「機械論」橫行霸道於整個無生命的自然之中，只有在有生命的個體裡限制「機械論」的勢力。但有生命的機體與死寂物質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線，足以劃分二者的不同。<sup>37</sup>在《科學與現代世界》中，懷海德稱他的這項構想為「機體機械論」(the theory of organic mechanism)，根據這個理論，物質粒子也許會根據普遍的法則盲目地奔馳，但也會根據其自身所處情境，照整體有機的計劃 (the general organic plans of the situations) 而作改變。<sup>38</sup>在《歷程與真際》裏，他提出宇宙最基本的實有是「現行單元」(actual entities)；「現行單元」渺小如虛空中的微塵，崇高如超卓的上帝，一體均為最真實的存在。正如普里哥金所觀察，他一方面反對將主體經驗界定為意識、思想和感官知覺，另一方面視所有的物理存在 (physical existence) 為具有享受、

<sup>35</sup>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167.

<sup>36</sup> *Ibid.*, p. 79.

<sup>37</sup> *Ibid.*, p. 69.

<sup>38</sup> *Ibid.*, p. 80.

感受、衝動、渴望、嗜欲的機體，其目的便在打破「科學唯物論」所劃下的心物界線。<sup>39</sup>這使得懷海德成為西方哲學史上，少數脫心物、主客二元困境的哲學家之一。

### 三、建構的後現代世界觀

「機體哲學」主張自然的終極事實是處於時空連續體中的「機體」。「機體」具有「主體立即性」(subjective immediacy)，乃經驗的主體，不是空洞的物質，這也便是科布與葛瑞芬所謂的「泛經驗論」(pan-experientialism)。<sup>40</sup>任何「機體」不僅與其他「機體」交相關聯，而且也與整個自然關聯在一起。「機體」最為顯著的特徵是在隨著時空的變遷，展開自我創造的歷程。整個宇宙自然的演化，也可視為是這樣的創生進程。站在機體哲學的立場，經驗不能化約為知覺，而知覺也不能化約為「感官知覺」或者僅是「感覺與料」的取得。經驗包括思想、判斷、記憶、情感、意志、想像、直覺、評價等等，而知覺則是多種條件配合下的產物。「知覺因果論」只能解釋最簡單的知覺關係（即知覺者與被知覺物之間的關係），卻忽略了產生知覺的時空背景、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條件。因此知覺的「因果論」必須為「關係論」所取代。懷海德的這些論點得到波恩以及普里哥金的重視，也提供建構「後現代世界觀」的線索。

根據「後現代科學」（尤其是量子論與熱力學第二定律）對「現代科學」唯物機械觀的批評，我們應可發展出更為整體的、複雜的、具有時間性與內在相關性的世界觀來。科布與葛瑞芬一致認為懷海德的思想提供了建構「後現代世界觀」的重要因素。唯限於篇幅，在此僅舉四點說明之：（一）後現代思辯理性；（二）泛經驗論；（三）知覺三態論（Three Modes of Perception）；（四）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

<sup>39</sup> Ilya Prigogine and Isabelle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p. 94.

<sup>40</sup> 懷海德曾根據培根(Francis Bacon)「知覺」以及巴克萊(G. Berkeley)「意義」(significance)的理論，發展出「攝持」(prehension)的概念。「攝持」是「非認知性的體會」(non-cognitive apprehension)，所有的實有都有「攝持」的功能。懷海德的這項學說，被學者詮釋為是「泛心靈論」(panpsychism)、「泛主體論」(pansubjectivism)，也就是「泛經驗論」(panexperientialism)。詳見下文。



## （一）後現代的思辨理性

「解構的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特徵是對現代理性的強烈批判與不信任。「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與「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充斥著解構的後現代哲學家的著作中。大多數的後現代哲學家似乎認為，「現代」的特徵是「科學」，而「科學」的特徵是「理性」。因此反現代的後現代哲學家對於理性，也就是「科學理性」，總是不假辭色。就這點而言，懷海德有不同的觀察。他認為「科學理性」本身也是反理性的；因為「科學理性」只追求事物發生的起源，而排斥「思辨理性」所追求的、事物的終極原因，且輕忽理性認識整體的功能。如他在分析西方現代科學起源的歷史時說：

宗教改革和科學運動可說是同一歷史革命的兩面，它們主導了文藝復興晚期的智性運動。基督宗教追求起源和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追求動力因以反對目的因，是這思想革命的兩面。...如果把這歷史革命看作是對理性的追求，那就大錯特錯了。正好相反，這完全是個反智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回到赤裸裸事實的思考上，回到中世紀思想僵化的理性上。<sup>①</sup>

現代科學運用理性，不在取得對宇宙人生更為完整、終極的看法，而在提出精確的方法，考察局部的事實。正如懷海德在《理性的功能》一書中所指出：

思辨理性的功能不受制於「方法」；思辨理性超越有限的理由，以深入事實背後的普遍理由，超越一切的「方法」，以瞭解所有研究事物性質的「方法」。...方法的理性往往自滿於該方法有成效的有限領域，...而思辨的理性則質疑方法的本身，以使其不安。<sup>②</sup>

事實上，科學的目的原是在尋求一套能完備地、精確地解釋經驗事實的理論，這樣的目的本身應當是「理性的」。只是科學家往往以為只要運用「科學方法」便可達到這樣的目的，懷海德認為這種想法卻是「不理性的」。如果我們不能對宇宙有完整的、形而上的理解，便無法清晰明確地了解任何構成我們宇宙經驗的命題。<sup>③</sup>然而「科學理性」的一大特徵便是在反對傳統形上學，也就是排斥尋求事物終極性的解釋，放棄對宇宙人生的整體認識。

①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p. 8-9

② A. N. Whitehead, *Function of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 pp. 65-66.

③ *Ibid.*, p. 68.

如果把「現代」界定為「我們可以樂觀的相信透過對事物精確的描述，便可知道事物的真相」，那麼放棄這項樂觀的態度，便可稱之為「後現代」。站在這個立場，「後現代」可說始於休姆和康德。<sup>44</sup>不過如果從懷海德的觀點看來，其實在現代科學肇端之始，「反理性主義」已有星火燎原之勢。休姆和康德只能算是現代「反理性主義」第二段落的代表人物而已，而尼采、海德格、德悉達等人的思想則可視為這「反理性主義」更為極端的表現。因此表面上「後現代反理性主義」對「現代科學理性」抱著批判的態度，但實質上卻是從現代反理性思潮導出的必然結論。

現代科學要求知識專精，各門學科彼此互不交通，使我們無法掌握事物之間的整體關聯。科學也不以掌握整體為目的。懷海德想建構的「後現代世界觀」，則在尋求知識的整體性與事物的相關性。<sup>45</sup>他認為唯有從整體的、機體的觀點出發，才能正確地掌握世界的真相。思辨哲學的目的在通觀整體；不同於各種科學以某些特定的事實為其研究對象，思辨哲學是以一切實現的（actual）與可能（possible）的事物為研究對象。根據這樣的信念，懷海德在《歷程與真際》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

思辨哲學在構作融貫一致、邏輯的、必然的普遍概念系統，借以詮釋吾人經驗的每個成份。思辨是哲學的根本功能；唯有思辨才能超越一切概念的對立與限制，解釋吾人的全面經驗。<sup>46</sup>

懷海德認為「思辨理性」所具體呈現的，是一套說明現階段宇宙普遍特質的「範疇系統」（categorical schemes），藉以解釋人的全面經驗。哲學的功能便是「宇宙論批判」（the critic of cosmologies），也就是對各種抽象思想的批判（the critic of abstractions），其目的在協調我們對於自然不同的直觀，使科學面對具體的事實。<sup>47</sup>

由此可見，懷海德的基本哲學信念與歸趨（philosophical commitment），和「解構的後現代哲學家」大異其趣。他曾為傳統理性功能辯護，並強調理性是文明的與合乎邏輯的思惟，是人類漸次由生物求生層次、發展到追求懿美人生的真正動力。<sup>48</sup>與此相較，「解構後現代哲學家」若不是將「理性」視為「科學理性」、「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甚或「溝通理

<sup>44</sup> John Cobb, "Alfred North Whitehead," in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 169.

<sup>45</sup> *Ibid.*, pp. 169-170.

<sup>46</sup>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3.

<sup>47</sup>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reface, p. 87.

<sup>48</sup> A. N. Whitehead, *Function of Reason*, p. 4ff.

性」，便是以理性為無稽之談、有待解構的對象。在他們看來，「非理性」（irrationality）才是主導人類活動的力量。

## （二）泛經驗論

在《歷程與實際》一書中懷海德曾說，他的整個形而上的立場便在駁斥「空洞現行性」的學說。<sup>49</sup>「空洞現行性」即前文所指傳統哲學的「實體」概念，以及現代科學的「物質」概念。這些概念的共同特徵是，它們的存在獨立於時空關係，時空只是一種參照架構，不會影響它們的性質。「實體」是所謂「變中不變的」、事物的同一性，而「簡單定位的物質」則不佔體積（volume）與時段（duration），僅處於剎塵之間。這些概念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並不符合具體事實。我們經驗到的具體事實是：所有的存在都佔據一段時間，以及定量的容積，而非剎那點塵。為了說明這項事實，懷海德先提出「事件」(event)的概念，作為「時空關聯體」(space-time relata)，且有「攝持」(prehension)的功能；「事件」與「事件」之間，因為時空的「延展連續性」(extensive continuum)，彼此之間有「內在關係」(internal relation)或者「內在相關性」(internal relatedness)。<sup>50</sup>接著他提出「機體」概念取代「事件」，最後又提出「現行機緣」(actual occasions)或者「現行單元」(actual entities)，作為「最終的事實」。

懷海德提出這些概念，其目的一方面是想要以「機體論」取代「唯物論」；另一方面是想要化解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笛卡兒將心物看成是絕然不同的兩個「實體」，造成了「心物二元論」。接受這二元論，就好像是相信「機器裏有個鬼魂」(“a ghost in the machine”)一樣荒謬。<sup>51</sup>如果把「實體」看作是「事件」，「心理事件」(mental events)和「物理事件」(physical events)之間就不會有那麼大的不同。<sup>52</sup>以有意識的經驗為例，每個經驗歷程中的「事件」彼此間是前繼後續的，有不可或分的整體關係。好比兩人談話，一連串「聲音事件」的發生，彼此前繼後續，直到最後一個聲音發出為止，聽者才能完整地掌握到說者的意思。這項「聽覺事件」很明顯地有「攝持綜合」(syntheses of prehensions)的作用，也就是聽者

<sup>49</sup>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xiii

<sup>50</sup> 詳見拙作，《懷海德自然哲學--機體哲學初探》，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九十年，第五章，事件論。

<sup>51</sup> David Griffin, "Introduction: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in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 5.

<sup>52</sup> John Cobb, "Alfred North Whitehead," in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 172

能主動地將已發出聲音之間的關聯綜合起來，使之成爲有意義的語句。至於沒有意識的「原子事件」，雖然不能與人類經驗相比，但因爲它們和其他事件之間的關係有一定的模式（pattern），而具有一定的特質。因此「原子事件」或者「次原子事件」之間的關係，也可視爲是一種「攝持綜合」的關係，而不是「實體」與「屬性」之間的關係。<sup>53</sup>

無論是「事件」，或「機體」，或「現行機緣」，或「現行單元」，都有其「時間性」（temporality），同時也是「經驗的點滴」（drops of experience）。<sup>54</sup>在懷海德看來，一切實有都在時間流逝的歷程中生成變化。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在這不可逆轉的歷程中，經驗的單元有成有毀。懷海德的這項學說被其後的研究者詮釋爲「泛心靈論」（panpsychism）、或者「泛主體論」（pansubjectivism）、「泛經驗論」（panexperientialism）。上舉語辭不會見於懷海德的著作之中，其中「泛心靈論」一詞最早是哈茲洪所提出的。根據哈茲洪的說法「泛心靈論」與「唯物論」的立場相反，主張一切實有都有感受、意圖，或者心理層面，包括那些常識上被認爲沒有心理層面的無機物在內（根據「唯物論」的說法，無機物只是一堆慣性物質的集聚，但事實上無機物有其特定的結構，可視爲具有最低程度的靈魂）。而懷海德的學說正屬於「泛心靈論」。<sup>55</sup>路易士福特（Lewis Ford）則認爲懷氏的思想開始雖是「泛心靈論」，但後來發展爲「泛主體論」。「泛心靈論」狹義地以爲一切實有均有其心理層面（All actual entities have mentality.），而「泛主體論」則廣義地認爲所有的事件均有知覺（攝持）、內在性（interiority）和本有價值（intrinsic value）。懷海德的「現行單元」既爲現行的立即經驗，那必然是擁有經驗的主體，因而可稱作是「泛主體論」；福特主張「泛主體論」是懷氏晚期思想的一大特色。<sup>56</sup>

科布和葛瑞芬認爲「泛心靈論」就是「泛經驗論」。「泛經驗論」主張就每個「事件」不需要外在事物便可自存看來，「事件」是物質性的；但

<sup>53</sup> Ibid., p. 173.

<sup>54</sup>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18.

<sup>55</sup> 參見 Charles Hartshorne, *Beyond Humanism: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8), pp. 165-177; Charles Hartshorne, "Panpsychism," in Vergilius Ferm ed., *A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p. 442-452; Lewis S. Ford, *The Emergence of Whitehead's Metaphys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p. 3.

<sup>56</sup> 福特認爲懷海德早先沒有分別「心理性」（mentality）和「主體性」（subjectivity）的不同，但在其晚期理論中，懷氏以「主體性」爲所有「現行單元」都具備的、自身生成變化的立即性，而「心理性」則指根據「現行單元」各自具有不同程度的複雜度和創新能力。至於「意識」則只有高度精神性的「現行單元」才具備，他們能享有智性感受（intellectual feelings）。參見 Lewis S. Ford, *The Emergence of Whitehead's Metaphysics*, p. 3, 38.

是就其內在的、爲其自身存在而言，它是有意識的，或者是具有心理性的。對外，它與其他個體以「動力因」的關係交互作用；對內，則根據「目的因」過著有意圖的生活。其中內外交蕩、動力因與目的因的相互衝擊。如此「事件」成爲一個經驗的主體，能根據自己的決定對動力因作出反應，同時它所經驗到的過去也會影響到它的未來。<sup>57</sup>「泛經驗論」提供科學解釋動力因以外的思考方向。科學不當受制於「唯物機械論」的信念，認爲自然單元沒有經驗、沒有本質價值、沒有內在關係，也沒有時間性；或者把自然法則看成只是自然單元作用後產生的表象，自然之中沒有目的因，沒有意圖，也沒有自由。<sup>58</sup>如果我們把自然單元看做是經驗的主體，便能擺脫「唯物機械論」的種種限制。

要而言之，從前述波恩和普哥金的理論看來，「後現代科學」正在尋求一個重視自然「時間性」、「內在相關性」、「複雜性」和「創新性」的世界觀。而懷海德的「泛經驗論」不僅能化解心物二元論的困難，且能符合這「後現代科學的世界觀」。

### （三）知覺三態論

先前提到，懷海德認爲「經驗」不能化約爲「知覺」，而「知覺」也不能化約爲「感官知覺」或者僅是「感覺與料」的取得；而「泛經驗論」正具體呈現了他的這項構想。傳統「感覺論」往往以爲「知覺」是以感官作爲取得外在世界知識的唯一途徑，懷海德卻認爲還有「非感官的」（nonsensory）的知覺型態。他說：「感官知覺雖然在我們的意識裏地位卓越，卻是非常膚淺的經驗。」<sup>59</sup>他還說：「如果我們發現非感官知覺的例證，卻又暗自將知覺等同於感官知覺，那將是阻礙系統形上學發展的致命錯誤。」<sup>60</sup>爲了更完整的說明「知覺」與「經驗」的全貌，懷海德於是提出「知覺三態論」，以取代現代哲學的「感覺論」。

懷海德認爲「知覺」有三種型態：一是「呈現立即性」（presentational immediacy），二是「因果效應性」（causal efficacy），三是「象徵指涉性」（symbolic reference）。其中前兩種涉及以外在世界爲認識對象的感官知覺，或稱「直接認知」（direct recognition）；「象徵指涉性」則涉及我們對

<sup>57</sup> David Griffin, "Introductio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p. 23-24.

<sup>58</sup> Ibid., p. 28.

<sup>59</sup> A. N. Whitehead, *Adventures of Idea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 212.

<sup>60</sup> Ibid., p. 231.

「感覺與材」所作的概念分析。又三種知覺型態中，「因果效應性」是「非感官」的知覺。<sup>61</sup>

所謂「呈現立即性」（也可反稱之為「立即呈現」immediate presentation），是指我們對外在世界的立即知覺。知覺透過立即感覺對我們呈現外物的種種性質；而我們立即經驗到的這個週遭世界，似乎被感覺飾以彌爾（John S. Mill）所謂的「感覺與材」。不過彌爾「感覺與材」概念，也就是休姆所謂的「印象」，並沒有涉及與可感性質相關的時空關係。懷海德的「呈現立即性」則特別重視知覺發生的時間性、知覺對象所在的空間延展性，以及知覺者和知覺對象之間的時空關係。<sup>62</sup>

所謂「因果效應性」（也可反稱之為「動力因果」efficient causation），是指對「呈現立即性」因果性的知覺，也就是對因果效應的直接知覺。針對休姆主張「因果關係」出於思想的習慣或者信念，康德主張「因果關係」是悟性先驗的範疇形式，懷海德特別提出知覺的「因果效應性」概念。雖然理論上有所不同，但休姆與康德一致認為「因果關係」不是知覺可以直接認識的對象。懷海德認為我們知覺到「立即現前」（immediate present）本身，便已預設了現前必須順應「立即先前」（immediate past）提供的「環境」。越是低級的生物，受到「先前環境」的影響越大。因此「因果效應性」是最原始的知覺型態，是機體對「環境」的順應；而這裡「環境」是指我們的身體與相關的器官，以及外在世界。對於像人類這樣的高級動物，「因果效應性」會和其他心靈作用相結合；譬如憤怒、憎恨、恐懼會使人「退卻」（retreat from），而吸引、愛、飢渴、熱切、享受會使人「朝向」（expansion towards）。我們的情感趨向，必伴隨著真實事物作用於我們身上的清晰認知。比如說我們討厭一個人，我們所討厭的不會是種種「感覺與材」的集合，而是引起我們討厭的那個人（a causal, efficacious man）。<sup>63</sup>總之，因先果後的作用，是知覺的先決條件。休姆顯然誤把「呈現立即性」當成是唯一的知覺型態，而把「因果效應性」看成是從前者衍生出來的。<sup>64</sup>事實卻正好相反，我們對於「立即先前」產生「非感官」的、「因果效應性」的知覺，總是先乎感官知覺。

<sup>61</sup> David Griffin & John Cobb,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p. 14-23; pp. 179-187.

<sup>62</sup> A. N. Whitehead, *Symbolism Its Meaning and Effec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7), pp. 15-18.

<sup>63</sup> *Ibid.*, pp. 35-56.

<sup>64</sup> *Ibid.*, p. 61.

至於所謂「象徵指涉性」，是指綜合前述兩種型態的知覺活動，這個知覺的類型涉及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的功能。懷海德認為人心本有象徵性的作用，當經驗中的某些成分激發起經驗中另一些成分中的意識、信念、情緒、與作用時，前者即所謂「象徵」（symbols），後者即所謂「意義」（meanings）。而心靈從「象徵」過渡到「意義」所發揮的有機功能，便是所謂的「象徵指涉」。「象徵指涉」是知覺者本有的主動綜合能力，<sup>65</sup>能將「呈現立即性」和「因果效應性」綜合成爲一個有意義的知覺。換言之，當我們直接認識到外在世界的種種性質，得到「感覺與材」之後，那些「感覺與材」引發我們經驗的種種感受，並涉及概念分析，這便是「象徵指涉」的作用。因此，直接認知本身，無論是「呈現立即性」或是「因果效應性」，都不會造成任何知覺錯誤。只有因爲「象徵指涉」錯誤的綜合作用，才會造成錯誤的知覺。懷海德舉例說「伊索寓言」中的狗，因爲誤認自己口中含的肉在水中的倒影是真的，正想搶食水中之肉時，反而丟失了口中的肉。這狗的「直接認知」並沒有錯，只是從「呈現立即性」到「因果效應性」的「象徵指涉」的作用錯了。只有這綜合作用才會造成錯誤；而「象徵指涉」正是受到先前給予事物所影響的、相當原始的一種綜合活動。<sup>66</sup>「象徵指涉性」雖然是知覺的基本綜合作用，但已涉及概念分析，因而可作爲思想與材。這時知覺的「象徵指涉性」和思想概念的架構以符合邏輯一貫性爲原則，便可得到對宇宙實際更爲完整的認知。<sup>67</sup>

懷海德的「知覺三態論」建立在「實在論」的基礎之上。他反對將知覺侷限在「感官」認識的範圍，或者將之等同於「感覺與材」。我們對於因果的知覺，雖然是「非感官」的，但卻是「感官知覺」的來源。我們對於有一外在世界真實存在的身體感受（bodily feelings），先於任何眼前的知覺，這便是「因果效應性」。我們所看見的，不會是「褐色的」、「圓形」的集合，而是「圓桌」，這便是「呈現立即性」。至於我們判斷這圓桌很結實，可以置物，看來適於放在客廳等等，則是「象徵指涉性」。總之，對懷海德而言，知覺的涵義廣泛，包括思想、判斷、直覺、感受、享受、滿足在內，可以說只要是現前的實際經驗，都是知覺。這樣的知覺概念，不僅豐富了我們的經驗內容，更能反映世界的真相。

<sup>65</sup> Ibid., p. 9.

<sup>66</sup> Ibid., p. 24.

<sup>67</sup> Ibid., pp. 64-65.

#### (四) 萬有在神論

西方思潮現代化的一大特色便是「世俗主義」(secularism)，現代人不再相信傳統宗教加諸自然與人的神聖性。<sup>68</sup>雖然現代科學與哲學原本容忍基督宗教的「上帝」，牛頓甚而利用「上帝」保障科學理論的正確性，但隨著「唯物論」和「無神論」的聲勢高漲，傳統的「有神論」也就日漸式微。然而在西方基督宗教有長達兩千餘年的文化傳統，是西方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人文價值和精神生活的基石，一旦受到毀棄，必然導致西方現代文明走向虛無主義的途徑。然而經過科學和現代化的洗禮，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回到前科學的時代，其傳統宗教信仰也無法滿足現代人的精神需求。如何化解科學與宗教、世俗與神聖的對立，成為刻不容緩的哲學課題。懷海德身為具有深厚宗教經驗的科學家，企圖以歷程宇宙論中的哲學之神，回應這項挑戰。

如前面一再提到，現代科學預設了「唯物機械的宇宙觀」，這使人與自然成為沒有目的、沒有意義的物質集合，而「唯物決定論」更剝奪了人的自由與道德自主性。然而西方傳統的「有神論」相信「上帝」是超自然的造物主，是自然秩序與道德法則的制定者，也是世界終極的審判者；這「人格神」(personal God)的概念難以符合理性的要求。<sup>69</sup>於是懷海德提出以「上帝」作為「形上原理」的構想，企圖從哲學的觀點揭露「上帝」的真實性質。他認為「上帝」不但是造物主，也是造物本身。「上帝」和所有「現行單元」一樣，既具有「心理」的層面，也具有「物理」的層面。「上帝」的心理層面是祂的「原初性」(primordial nature)，祂的物理層面是「後效性」(consequent nature)。根據機械因果律，每個「事件」都會受到先前「事件」的決定，過去會決定現在，現在會決定未來。但從機體哲學的觀點看來，「事件」是攝持的主體，在生成變化的歷程中雖然會受到過去的影響，事實的決定，卻仍保有對未來「可能性」進行選擇的自由。這時「上帝的原初性」提供這項選擇形而上的保障，在祂的「概念感」(conceptual feelings)中有無限潛存的「永象」(eternal objects)，足供「事件」或者「機體」進行選擇。如果實有只遵循盲目的機械法則，不斷地重

<sup>68</sup> 牛頓和波以耳等人認為，如果物質是被動的，又有慣性，那麼引發它們運動的一定是超自然的神。牛頓也以遠距離的自然單元之間會產生作用力，不是出於物質內在的力量。萬有引力顯示必有神存在，使得所有物質之間有互相吸引的作用。參見 David Griffin, "Introductio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p. 10-12.

<sup>69</sup> A. N. Whitehea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6), p. 61 ff.



複相同模式的行爲，那如何能解釋宇宙創生演化的事實？懷海德認爲唯有靠「上帝」一方面作爲「秩序原理」(principle of order)，維護現行宇宙的秩序，另一方面作爲「創新原理」(principle of novelty)，提供實有不斷創新的機會，才足以彰顯自然創化的事實。而「上帝」除了有「概念感」，還有「物理感」(physical feeling)，祂對現行世界的「物理感」便是祂的「後效性」。這「後效性」將現行世界統整爲一體，其中的「現行單元」雖然不完美，時時受到因果律的支配，但總會尋求與其「原初性」相結合，以發揮創新的功能。<sup>70</sup>總之，「上帝」的原初性與後效性，使祂既超越又內在於這個世界。

如此一來，懷海德的「上帝」概念發展成一「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所謂「萬有在神論」是指一種綜合「有神論」與「泛神論」的上帝觀。「有神論」主張「上帝」是創造世界、超越世界的無上存有，「上帝」本身純粹、永恆、絕對、完美、無限、完全實現。任何與上述概念相反的性質，均不適用於「上帝」。「泛神論者」如斯賓諾莎(Spinoza)則認爲如果「上帝」是唯一終極的實體，那祂必內在於「世界」，「世界」則是「上帝」的顯態(manifestation)。「萬有在神論」綜合這兩種觀點，提出「上帝」既超越又內在於世界的理論。「上帝」原爲難以言宣者，任何引發對立的概念，均不足以片面的表達「上帝」。而所有對立的概念相反相成，「上帝」既爲完全的實現，也是無上的潛存；既爲主動，又爲被動；既爲存有，又爲變化生成；既爲嚴格的絕對者，又爲普遍相對者；既爲永恆，又爲時變(temporal)。哈茲洪認爲懷海德的「上帝觀」和德國觀念論者謝林(F. W. J. Schelling 1775-1854)與費希那(G. T. Fechner 1801-1887)一致，可稱作是「萬有在神論」。<sup>71</sup>

基於「萬有在神論」的理念，懷海德形容「上帝」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如下：

「上帝」是恆常的，「世界」是變遷的；但說「世界」是恆常的，「上帝」是變遷的也對。

「上帝」是一，「世界」是多；但說「世界」是一，「上帝」是多也對。

「上帝」與「世界」相比，是真實卓越；但說「世界」與「上帝」相比，

<sup>70</sup>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345.

<sup>71</sup> 參見 Charles Hartshorne and William L. Reese eds., *Philosophers Speak of G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 1-16.

是真實卓越的也對。

「世界」內在於「上帝」；但說「上帝」內在於「世界」也對。

「上帝」超越「世界」；但說「世界」超越「上帝」也對。

「上帝」創造「世界」；但說「世界」創造「上帝」也對。<sup>12</sup>

懷海德的「上帝觀」在後現代引發一波新神學運動，雖然他的「上帝」本質上是哲學神，卻提供後現代基督教神學新的選擇。這當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韋伯曾以「解除世界的魔咒」(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來形容西方的現代化。「現代化」以科學為前提，使人擺脫了前科學時期的迷信與愚昧，不再受制於傳統權威與宗教信仰。科技的空前發展與進步，帶給人類生活巨大變革；社會生活民主化與科層體制化，經濟生活自由化與世俗化，生產方式科技化與知識化。這一切的一切使得人類不但依賴科學，甚而把科學當作是另一個「魔咒」了。雖然懷海德與解構的後現代哲學家一樣，會對現代科學的世界觀與科學理性的獨斷感到不滿，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否定理性的功能，更沒有放棄建立世界觀所必備的理念：觀念、理想、意義、價值、文化，甚至於上帝。追根究底，解構的現代哲學家大多以取消形上學為其哲學工作的前提，排斥傳統哲學的使命——追求普遍或終極原理以解釋萬事萬物、指導人生所行所為。他們抹殺形上學之為精神功能的表徵、價值理想的泉源這重大事實。而懷海德身為本世紀最偉大的形上學家，不但充分發揮了哲學的思辨功能，對於「現代科學」的新趨勢也極為重視。他的哲學打破了西方哲學傳統各種二元對立。舉凡因與果、實現與潛存、主與客、心與物、不定與決定、毀滅與不朽、實在與表相、私人與社會、整體與部份、內在與超越、動與不動、連續與斷續、變化與永恆等等，西方傳統哲學認為不相容的概念，在懷海德的哲學中均交鎖關連，互補相成。他的哲學顯然有別於解構的後現代哲學，堪稱之為「建構的後現代主義」。援此，美國的懷海德學者呼籲世人重視懷海德哲學，重視科學重施魔咒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之弊，庶幾發展出符合後現代科學的世界觀，進而重新建構科學與人文之間的橋樑，值得吾人肯定。

<sup>12</sup>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p. 348.

## 參考書目 (References)

- Bergson, Henri. *Time and Free Will, 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a of Consciousness*. F. L. Pogson (tran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1901.
- Blyth, John W. *Whitehead's Theory of Knowledge*.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41.
- Bradley, F. H. *Appearance and Real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Bright, Lawrence. *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Physics*. London &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8.
- Browning, D. & Myers, W. T., eds. *Philosophers of Proces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unge, Mario. *Causality and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8.
- Burt, E. A.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9.
- Capek, Milic. *The Philosophical Impact of Contemporary Physics*.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61.
- Christian, William A. *An Interpretation of Whitehead's Metaphys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Emmet, Dorothy M. (1932). *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Organism*.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 Ford, Lewis S. *The Emergence of Whitehead's Metaphys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 Griffin, David. Ray. & Cobb, jr., John B. & Ford, Marcus P. & Gunter, Pete A.Y. & Ochs, Peter.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eirce, James, Bergson, Whitehead, and Hartshorn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James, William.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lshire, Bruce W., e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 Johnson, A. H. *Whitehead's Theory of Realit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62.
- Kirk, James. *Organism as Reenchantment: Whitehead, Prigogine, and Barth*. New York, Peter Lang Pub., 1993.
- Kline, G. L., ed. *Alfred North Whitehead: Essays on His Philosoph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 Kraus, Elizabeth. *The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A Companion to Whitehead's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9.
- Kuntz, Paul Grimley. *Alfred North Whitehead*.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4.
- Lawrence, Nathaniel. *Whitehead'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
- Leclere, Ivor, ed. *The Relevance of Whitehea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1.
- Lowe, Victor. *Understanding Whitehea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 Lowe, V. & Hartshorne, C. & Johnson, A. H. *Whitehead and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0.
- Lucas Jr. & George. R. *The Rehabilitation of Whitehead An Analytic and Historical*

- Assessment of Process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 Mack, R. D. *The Appeal to Immediate Experience*.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5.
- Mays, W. *The Philosophy of Whitehea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9.
- McDermott, John J., ed.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8.
- Nobo, Jorge Luis. *Whitehead's Metaphysics of Extension and Solidar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 Palter, Robert M. *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Price, Lucien.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Boston, Little and Brown Company, 1954.
- Resse, William L. & Freeman, Eugene, eds. *Process and Divinity*. New York, Open Court Publishing, 1964.
- Santayana, George. *Reason in Science*. New York, Scribner's, 1906.
- Saxon, David S. *Elementary Quantum Mechanics*. San Fransico, Holden-Day, 1968.
- Schilpp, Paul, A., ed. *The Philosophy of A. N. Whitehead*. Evanston &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41.
- Schmidt, Paul F. *Perception and Cosmology in Whitehead's Philosophy*. New Jersey, New Brunswick, 1967.
- Shahan, Ewing P. *Whitehead's Theory of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King's Crown Press, 1950.
- Sherburne, Donald. W. *A Whiteheadian Aesthet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Sir Dampier, William Cecil. *A History of Scie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allack, F. Bradford. *The Epochal Nature of Process in Whitehead's Metaphys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0.
- Wells, Harry K. *Process and Unreality. A Criticism of Method in Whitehead's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King's Crown Press, 1950.
- Whitehead, A. N. *The Organisation of Thought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7.
- \_\_\_\_\_.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 \_\_\_\_\_.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 \_\_\_\_\_.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 \_\_\_\_\_.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5.
- \_\_\_\_\_. *Religion in the Making*.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6.
- \_\_\_\_\_. *Symbolism Its Meaning and Effec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7.
- \_\_\_\_\_.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9.
- \_\_\_\_\_. *The Function of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
- \_\_\_\_\_.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9.
- \_\_\_\_\_. *Adventures of Idea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3.
- \_\_\_\_\_. *Modes of Though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8.

- \_\_\_\_\_. *Essays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7.
- \_\_\_\_\_. *Essays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7.
- Wilmot, Lawrence F. *Whitehead and God Prolegomena to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Canada,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ilshire, Bruce W., ed. *William James The Essential Writing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 A.N. Whitehead and the Postmodern Outlook

Yih-hsien Yu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Tung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A. N. Whitehead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metaphysic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o has assumed his position by inveighing against the torrents of anti-metaphysics, and by defending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metaphysics in philosophical pursuits. Similar to many postmodern philosophers, who are discontent with the domi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modern world, Whitehead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criticisms on scientific materialism and its presupposition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his philosophical pilgrimage. However, unlike most of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ers, when questioning modern perversities, Whitehead did not commit himself to the task of decomposing the elements of which the modern worldview is consisted, such as ideas, reason, values, meaning, purposes, self, language, culture, etc., and thereby involved in another form of modern perversity. Instead, Whitehead contends that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is the primal function of philosophy that may offer a coherent, logical and adequate scheme in which every elements of our experience can be interpreted. He also believes that both rational and empirical factors are indispensable to our cognition that may grasp directly the interrelatedness among things. According to his philosophy of organism, every actual entity is a self-creative organism and nature is a process of creative advance. Process is reality, the ultimate fact of nature, which, however, does not exclude certain eternal factors from revealing its essences. It may well be argued that Whitehead's philosophy, once being dubbed as "organic realism," is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most of the contemporary postmodernists, who take an anti-metaphysical, anti-realist, or anti-rationalist stance and are constantly led to the cul-de-sac of nihilism. In the past decades, the Whiteheadian scholarship has been flour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ntrast between Whitehead's philosophy, taken as constructive/positiv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postmodernism, taken as deconstructive/eliminative postmodernism, has been made and examined. The present paper shared with the American Whiteheadians, John Cobb and David Griffin, in their views on the relevancy of Whitehead's philosophy to a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worldview which is also confirmed by some postmodern scientists.

**Key words :** Whitehead, A. N., Philosophy of Organism, Metaphysics, Postmodernism.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280-308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From English Orthography-Phonology Correspondence to Phonics Instruction

王啟琳\*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wo important issues in English orthography-phonology correspondence: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omplexity and regularity of such correspondence, and the aspects of pronunciation for which spelling provides limited clues. The former is explored by reviewing different frameworks of mapping the elements of sounds and spelling, followed b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cluding syllabification, adjacent sounds, and morphophonemics; the latter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of stress pattern, reductions, allophones, and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connected speech and sounds in isolation.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phonics instruction.

Key words : phonics, phonology, morphology, spelling

---

\*東海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 1. Introduction

Phonics is the knowledge of spelling-pronunciation relationships. It is also used to refer to the instruction of such knowledge. The regularity and irregularity within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very complicated and involve many factor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honics instruction, it is essential for English teachers to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English alphabet represents spoken sounds. This study present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English spelling-pronunciation analyses and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model which encompasses phon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factors to better explain and predict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eech sounds in spelling.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omplexity/inconsistencies of spelling-sound relationships include historical and non-historical factors. Historical factors have been reviewed in detail in the past (for example, Balmuth, 1982; Chung, 1999; Finegan, 1999; Fromkin and Rodman, 1993; Huang, 1998; Ing, 1997; Pennington, 1996). As stated in Finegan's analysis, the historical factors include the diverse origins of English with different spelling conventions and diachronic changes, such as vowel changes and silent letters that were once pronounced earlier in the history (see Table 1 for examples). Fromkin and Rodman also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lling reform" during the Renaissance on modern English orthography. Instead of making an effort to improve consistency in spelling-pronunciation relationships, as some other spelling reforms later in the history, such "reform" actually further complicated the situation by adding "silent" letters to English spelling based on Latin, Greek, or French spellings (see Table 2 for examples).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non-historical factors to examine the regularities and irregularities in spelling-pronunciation relationships. These factors include the number of phonemes versus the number of letters in the alphabet; morphological and phon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ffixation, syllabification, and adjacent sounds; and stress pattern. This study also looks into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sounds in connected speech and sounds in isolation and the limitations of orthography in representing such discrepancies. These analyses will be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n how phonics should be taught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able 1 Historical Factors in Irregular Spelling in Finegan's Analysis**  
(adapted from Finegan, 1999, p. 77)

<u>Examples</u>	<u>Origin</u>
-ee in <i>deed</i> and <i>seen</i>	System evolved in Wessex before the Norman Invasion
From <i>theef</i> to <i>thief</i> , <i>cwene</i> to <i>queen</i>	The Normans
From <i>gost</i> to <i>ghost</i> , <i>gastlic</i> to <i>ghastly</i>	Dutch influence from Caxton
From <i>samon</i> to <i>salmon</i>	Spelling reform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able 2 Examples of English Spelling Influenced by Latin, Greek, and French Spellings** (from Fromkin and Rodman, 1993, p. 381)

<u>Middle English</u>	<u>After the Renaissance "Spelling Reform"</u>
<i>indite</i>	<i>indict</i>
<i>dette</i>	<i>debt</i>
<i>receit</i>	<i>receipt</i>
<i>oure</i>	<i>hour</i>

## 2. Earlier Analyses of Spelling-Pronunciation Correspondence

English spelling does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to the approximation of spoken words. The regularity within the complex correspondence is crucial to language learners in decoding spelling to sounds in reading and encoding sounds to letters in writing. In this section, I will examine several earlier analyses of mapping elements in orthography and pronunciation, and discuss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each.

### 2.1 Number of Phonemes and Letters: Kuiper and Allan's Model

There are more than forty phonemes in spoken English in contrast with the twenty-six letters in English alphabet that represent the speech sounds. Thu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twenty-six letters to correspond to English phonemes one-to-one. Having the same letter or combination of letters to represent different sets of sounds is inevitable. However, the complex nature of spelling-sound connections is far beyond this one-to-many association pattern. Kuiper and Allan (1996), in a discussion of the complexity of English letter-phoneme connections, suggested the connections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phonemes and the number of letters in a word: 1) same number in perfect match, 2) same number in imperfect match, 3) more letters than phonemes, and 4) more phonemes than letters. To examine this model in detail, we need to see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elements of both the orthography and pronunciation of words in each of the four categories, as shown in Tables 3 and 4.

***Type One: Perfect match of numbers and elements***

Words of this type not only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letters and phoneme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s, but the mapping of each letter into each phoneme is a perfect match, such as the match between the letters in *get* and the phonemes /get/. This type of match is often seen in words with consonant-vowel-consonant (CVC) structure in both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Many earlier phonics drill books focused on this structure.

***Type Two: Same number of letters and phonemes in imperfect match***

Words in this category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letters and phonemes, ye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are not one-to-one. They may take the form of -VCe, such as *time*, with a diphthong and a silent letter, or they may be composed of a digraph (two letters representing one phoneme) and a diphthong represented by one letter, such as *shy*, which is spelled as CCV but pronounced as CVV; or, they may have a digraph, such as *ng*, or a silent letter and a letter representing two phonemes, such as *x* in the word *boxing*. Some words with unusual spelling can also fall into this category. An example is the word *one*, which is spelled as VCV but pronounced as CVC.

***Type Three: More letters than phonemes***

In this category, the number of the letters in a word is larger than the number of

phonemes they represent. The composition of words in this category may include either a digraph, such as *ng* in *sing*, or a silent letter, such as *w* in *write*. Or, it may also include both a digraph and a silent letter, such as the word *wrong*, which is spelled as CCVCC but pronounced as CVC.

***Type Four: More phonemes than letters***

This group of words may have one letter representing two phonemes, such as *x* /ks/ in *fox*, which is spelled as CVC but pronounced as CVCC, or *y* /ai/ in the monosyllabic word *my*, which is spelled as CV but pronounced as CVV. Some words with glides, such as *music*, spelled as CVCVC and pronounced as CCVCVC, also belong to this category.

Analyses using Kuiper and Allan's model clearly indicate that English spelling does not represent speech sounds with one-to-one letter-to-phoneme mapping. Only words of Type One provide a superficial image of a perfect match. Therefore, students, especially EFL students who have limited exposure to printed English texts and authentic English oral communications, should not be misled to believe that learning phonics equals learning to connect individual letters to individual phonemes.

**Table 3 Contrast of Structure and Number of Elements in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with Kuiper and Allan's Categorization**

Type of Correspondence	Example	Spelling	Sounds	N* of letters, N of phonemes
<b><u>TYPE 1</u></b>				
Perfect Match	<i>get</i>	CVC**	CVC	3, 3
	<i>won</i>	CVC	CVC	3, 3
<b><u>TYPE 2</u></b>				
Same Numbers	<i>one</i>	VCV	CVC	3, 3
Imperfect Match	<i>shy</i>	CCV	CVV	3, 3
	<i>time</i>	CVCV	CVVC	4, 4
	<i>boxing</i>	CVCVCC	CVCCVC	6, 6

**TYPE 3**

More Letters	<i>the</i>	CCV	CV	3, 2
Than Phonemes	<i>call</i>	CVCC	CVC	4, 3
	<i>thumb</i>	CEVCE	EVC	5, 3
	<i>aisle</i>	VVCCV	VVC	5, 3
	<i>wrong</i>	CCVCC	CVC	5, 3
	<i>bought</i>	CVVCCC	CVC	6, 3

**TYPE 4**

More Phonemes	<i>hi</i>	CV	CVV	2, 3
Than Letters	<i>box</i>	CVC	CVCC	3, 4
	<i>find</i>	CVCC	CVVCC	4, 5
	<i>music</i>	CVCVC	CCVCVC	5, 6

\*N= number

\*\*C = consonant/consonant letter, V = vowel/vowel letter

**Table 4 Letter-Phoneme Mapping with Kuiper and Allan's Categorization**

**TYPE 1**

Spelling	<i>get</i>	CVC
Phonemes*	gɛt	CVC

**TYPE 2**

Spelling	<i>boxing</i>	CVCVCC
Phonemes	baksɪŋ	CVCCVC

**TYPE 3**

Spelling	<i>wrong</i>	CCVCC
Phonemes	rɔŋ	CVC

**TYPE 4**

Spelling	<i>box</i>	CVC
Phonemes	baks	CVCC

\*As represented by K.K. Symbols.

## 2.2 Letter-to-Phoneme Associations

On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ound-spelling analysis is to map individual letters to individual phonemes. Such mapping usually yields the result of “one-to-many” correspondence. As shown in Table 5, one letter may represent many different sounds. The letter *a*, for instance, can be pronounced in at least eight different ways.

**Table 5 Examples of Irregular Correspondence**

<b>Letter</b>	<b>Phoneme*</b>	<b>Examples</b>
<i>a</i>	/ ə /	<u>a</u> go
	/ e /	<u>a</u> ge
	/ æ /	<u>a</u> pple
	/ ɑ /	w <u>a</u> ch
	/ ɛ /	<u>a</u> ny
	/ ʌ /	w <u>a</u> s
	/ ɔ /	w <u>a</u> rm
	/ ɪ /	im <u>a</u> ge
<i>c</i>	/ k /	<u>c</u> at
	/ s /	<u>c</u> ity
	/ ʃ /	o <u>c</u> ean
	/ tʃ /	<u>c</u> ello

Silent letters, mostly resulting from historical changes,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consistency of sound-spelling relationships.

**Table 6 Examples of Words with Silent Letters**

<b>Letter</b>	<b>Words</b>
<i>h</i>	<u>h</u> our
<i>w</i>	<u>w</u> rite
<i>t</i>	lis <u>t</u> en
<i>s</i>	is <u>s</u> land
<i>b</i>	com <u>b</u>
<i>p</i>	<u>p</u> sychology

<i>l</i>	sal <u>l</u> mon
<i>m</i>	<u>m</u> nemonic
<i>k</i>	<u>k</u> nock
<i>g</i>	des <u>g</u> n
<i>gh</i>	thoug <u>h</u>

There are a few consonants with one-to-one letter-phoneme associations. In a study of children's ability to read/sound out words, Liberman (1973) found that children made more errors in reading vowel sounds than consonant sounds. One salient reason is that consonant letters are much more reliable than vowel letters i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sounds they represent (see Table 7). However, when representing the same phoneme, the same letter may be pronounced differently when placed in different positions in a syllable, or when preceded or followed by certain sounds. For instance, the realization of /d/ for the first letter in *dad* (onset position) sound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for the last letter in the same word (coda position). The same phoneme /t/ is pronounced differently in *top*, *stop*, *pot*, *cotton*, and *letter*. The influence of adjacent sounds and position in a syllable will be discussed in 3.2.

**Table 7** Examples of Regular Correspondence

<b>Letter</b>	<b>Phoneme</b>	<b>Examples</b>
<i>b</i>	/b/	book
<i>d</i>	/d/	door
<i>j</i>	/dʒ/	just
<i>m</i>	/m/	me
<i>n</i>	/n/	no
<i>f</i>	/f/	for
<i>v</i>	/v/	of
<i>g</i>	/g/	go
<i>g</i>	/dʒ/	gem
<i>h</i>	/h/	hot
<i>h</i>	/ɸ/	hour

Consonant digraphs represent both regular and irregular correspondences, as shown in Table 8.

**Table 8 Examples of Consonant Digraphs**

<u>Letters</u>	<u>Phoneme</u>	<u>Examples</u>
<i>ph</i>	/f/	<u>ph</u> one
<i>sh</i>	/ʃ/	<u>sh</u> e
<i>th</i>	/θ/	<u>th</u> ink
<i>th</i>	/ð/	<u>th</u> is
<i>ch</i>	/tʃ/	<u>ch</u> urch
<i>ch</i>	/k/	<u>ch</u> ool
<i>ch</i>	/ʃ/	ma <u>ch</u> ine
<i>gh</i>	/f/	cou <u>gh</u>
<i>gh</i>	/φ/	thou <u>gh</u>

### 2.3 Phoneme-to-Letter Associations

For the same reasons demonstrat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this type of mapping can be predicted (see Table 9).

**Table 9 Examples of Individual Phonemes and Their Spellings**

<u>PHONEME</u>	<u>SPELLING</u>	<u>EXAMPLES</u>
/e/	aCC-	<u>a</u> ble
	aCe	<u>a</u> te
	ea	br <u>e</u> ak
	ei	<u>e</u> ight
	ai	<u>a</u> id
	ay	<u>a</u> y
	ey	pr <u>e</u> y
	e	fian <u>e</u>
/i/	e	m <u>e</u>
	ea	<u>s</u> ea

	ee	<u>see</u>
	eCe	complete
	eiCe	rece <u>ive</u>
	ieCe	belie <u>ve</u>
	eo	pe <u>ople</u>

/ aɪ /	i	hi
	iCe	hi <u>ke</u>
	y	my
	uy	gu <u>y</u>
	ye	by <u>e</u>
	ie	pie
	ei	height
	igh	hi <u>gh</u>
	ui	gu <u>ide</u>
	eye	<u>eye</u>

/ o /	o	go
	oCe	cl <u>ose</u>
	oa	ro <u>ad</u>
	ow	so <u>w</u>
	ew	se <u>w</u>
	ou	so <u>ul</u>

/ u /	o	to
	uCe	flu <u>te</u>
	oo	to <u>o</u>
	wo	tw <u>o</u>
	ue	gl <u>ue</u>
	ui	sui <u>t</u>
	ough	throu <u>gh</u>



/ɛ/	e	<u>g</u> et
	a	<u>a</u> ny
	ie	fr <u>i</u> end
	ai	s <u>a</u> id
	ea	br <u>e</u> akfast

/ə/	a	<u>a</u> bout
	e	o <u>p</u> en
	i	cab <u>i</u> n
	o	t <u>o</u> day
	u	cact <u>u</u> s
	y	anal <u>y</u> sis

/ʌ/	u	<u>c</u> ut
	oCe	co <u>m</u> e
	a	w <u>a</u> s
	oe	do <u>e</u> s
	o	mo <u>t</u> her
	oo	bl <u>o</u> od
	ou	to <u>u</u> gh

/æ/	a	b <u>a</u> t
-----	---	--------------

/ju/	you	<u>y</u> ou
	uCe	c <u>u</u> te
	oe	sh <u>o</u> e
	ew	f <u>e</u> w
	iew	vi <u>e</u> w

/k/	k	<u>k</u> ite,
	c	<u>c</u> at
	ck	cl <u>o</u> ck

ch	<b>ch</b> emistry
q	<b>q</b> uestion

## 2.4 Homophones and Their Spelling Patterns

Homophones are words that are pronounced the same yet spelled differently. The irregularity in spellings of homophones help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meanings represented by same pronunciation. For EFL learners, the existence of homophones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sounding out the whole word rather than individual sounds and letters when learning reading and pronunciation. One set of homophones may belong to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spelling.

### HOMOPHONES WITH DIFFERENT SYLLABLE STRUCTURE

CVVC/ CVCe

*mail/male*

*sail/sale*

*jean/gene*

### HOMOPHONES WITH DIFFERENT VOWEL LETTERS

*sun/son*

*see/sea*

*week/weak*

*lesson/lessen*

*no/know*

*heir/air*

### HOMOPHONES WITH SILENT LETTERS

*write/right*

*knight/night*

*hour/our*

*heir/air*

*no/know*

## HOMOPHONES WITH IRREGULAR SPELLING

*won/one*

*by/bye/buy*

*sow/sew*

*sole/soul*

### 2.5 Spelling rules

Much effort in the past has been devoted to formulating spelling rules to account for the sound-letter correspondence. Unfortunately, it is not an easy task. Most of the rules have limited applicability. One popular rule is that for the sequence *ie/ei*, which states, “*I* before *e* except after *c*, or when pronounced as /e/ as in *eight* and *neighbor*.” Though this rule is relatively more reliable than others, we can still find contradicting examples, such as *their* and *height*. Many rules are not only difficult to learn but also unreliable. The following examples are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complicated rules.

#### ***Example One: the “two vowel rule”***

This rule had been taught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for many years until some studies found the rule incorrect in more than fifty percent of the cases (Clymer, 1963; Wagstaff, 1994). The rule states, “When two vowels go walking, the first vowel does the talking, and the second vowel is silent.” This means that when two vowel letters appear in sequence in a word, the combination represent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vowel name of the first vowel. For example, the first of the two vowel letters in *boat* is *o*, giving the clue that the two vowel letters in this word are pronounced /o/. This rule works for words like *boat* and *sweet*, but not for words like *boil* and *sweat*.

#### ***Example Two: the “short vowel rule”***

Many phonics books with descriptive rules about judging where short vowels occur in a word state rules similar to the following: “If a vowel occurs in a monosyllabic word with no final silent *e*, or if a vowel is followed by two consonants, it is a short vowel.” Let u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rule. The first half

is more reliable than the second half, as most words spelled with letters in CVC structure represent a regular pronunciation in syllable structure of CVC. The second half, referring to either polysyllabic or monosyllabic words, is not as reliable. Among monosyllabic words, *hat* and *fill* are examples supporting this rule; *find*, *blind*, and *tomb* are examples contradicting the rule. Among polysyllabic words, *happy* and *anger* are examples supporting the rule; *table* and *danger* are contradicting examples.

#### ***Example Three: the “VCe” long vowel rule***

This rule is found in almost every phonics textbook. It is a relatively more reliable rule which states “A vowel is long when it is followed by a consonant and a silent letter *e* word-finally.” The contrasts of *bit/bite*, *rod/rode*, and *hat/hate* are good examples for this rule. However,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 to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Examples contradicting this rule can be found even in high-frequency words such as *have* (/hæv/ not /hev/), *come* (/kʌm/, not /kom/), and *move* (/muv/, not /mov/).

#### ***Example Four: the “silent g” rule***

This rule predicts that the letter *g* is silent when the combination of *gn* appears “in the middle or at end of a word.” (Pennington, p. 197) This rule applies to words like *sign*, *signing*, *design*, and *designing*, but not to words like *signature* or *designation*. In accounting for such discrepancies, we need to take syllabification and morphophonemic components into consideration. These morphophonemic factors will be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 later in this article.

### **3.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 comprehensive, well-rounded orthography-phonology analysis should include not just the elements or patterns of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It should also include phonological aspects and morphological aspects of sound-letter relationships. The analyses so far provide ample evidence that attempts to analyze orthography-phonology relationships need to go beyond segment-to-segment association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ll focus on analyses encompassing

phon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stress pattern and syllabification, and morphophonemic factors such as sound change in affixation. We will see that most spellings can be seen as systematic and manageable codes if we analyze them 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help account for the regularity behind the complicated surface forms.

### 3.1 Onsets and Rimes

A syllable can be divided into onset and rime (or rhyme). Onset is defined as the consonants before the nucleus vowel or syllabic consonant in a syllable; rime is defined as the nucleus and coda, if there is one. In other words, in a syllable, the consonant or consonant cluster that precedes the vowel is the onset, and the rest of the syllable is the rime (see examples in Table 9).

**Table 9 Examples of Onset and Rime in Monosyllabic Words**

<u>Onset</u>	<u>Rime</u>	<u>Written Word</u>
/ φ /	/o/	oh
/ n /	/o/	no
/ bl /	/o/	blow
/ φ /	/ok/	oak
/str/	/ok/	stroke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done on onsets and rimes as units for language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The findings have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identify whole rimes better than individual vowels (Adams, 1990; Wylie and Durrell, 1970), children decode consonant clusters in onset as one unit rather than as individual sounds (Wylie and Durrell, 1970), and the whole onset and rime units are easier to use in decoding than individual phonemes (Goswami, 1986; Goswami and Mead, 1990; Treiman, 1985, 1986).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supporting onsets and rime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phonemes, as the proper units for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spelling.

Take the word *stall* as an example. It is much easier and more feasible to

decode the print into sounds by dividing the word into onset *st-* and rime *-all*. Then apply analogy of pronunciation of the onset *st-* from known words such as *star* and *store*, and familiar rime *-all* in *ball*, *tall*, and *small*, and correctly sound out the new word *stall*. To better understand why onsets and rimes show more regularity in sound-spelling correspondence than individual phonemes, we need to look in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 **3. 2 Factors Affecting How Words Are Pronounced**

From the previous sections, we have seen ample evidence of irregularity in English letter-sound relationships. Such inconsistencies are hard to manage if we deal with only segment-to-segment mapping. However, a high degree of regularity in sound-spelling relationships can be found when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considered.

#### **3. 2. 1 Adjacent sounds**

Adjacent sounds are a determining factor of how a letter is pronounced in a word.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voiceless plosive / t / in *top*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stop*. The former is aspirated while the latter is not. The cause is the phoneme / s / preceding / t / in the second word. Adjacent sounds and the letters representing them also give many clues about how a vowel letter is pronounced. The letter *a* in *-all* and the letter *a* in *-ar* represent predictable pronunciation, / ɔ / and / ɑ / respectively, because of the letters following the vowel letter *a*.

#### **3. 2. 2 Position in a syllable**

A letter or a combination of letters may be pronounced differently when placed in different positions of a syllable. For instance, the letter *c* in the onset of a syllable can be pronounced as one of the following sounds / s / (*city*), / k / (*cold*), / ʃ / (*ocean*), / tʃ / (*cello*), while in the coda position, it can only be pronounced as / k / (*music*), except when followed by a “silent” *e* (*lace*).

The same phoneme being represented by the same letter may be pronounced differently when placed/occurring in different positions in a syllable. The letter *l* is pronounced as clear (light) /l/ when occurring in the onset position, as in *later*,

and as dark /l/ in coda position, as in *total*.

A consonant letter as part of a consonant cluster at a syllable boundary may become a silent letter, especially in casual speech, as the letter *t* in *Christmas*, or the letter *d* in *handkerchief*.

### 3. 2. 3 Syllabification (syllabication)

In English, the same letter combination can represent very different sounds depending on how the combination is syllabified in a word.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sequence *ea* in *eat* belongs in the same syllable and represents one phoneme /i/; the same sequence of spelling is syllabified into two syllables and represents two phonemes in the word *create*.

EA	E A T	C R E- A T E
AW	L A W	A- W A R D
OP	T O P	O- P E N

Another good example is the syllabification of the letter sequence *gn*. When the sequence *gn* is in coda position such as in *sign* and *design*, the letter *g* is silent. However, when the *gn* sequence is syllabified into different syllables, with *g* as the coda of the first syllable and *n* as onset of the second syllable, *g* is no longer silent, as are the cases in *signature* and *designation*. Though in both *signing* and *signature*, *gn* is word-medial and intervocalic, it precedes an inflectional affix *-ing* in *signing*, and a derivational affix *-ature* in *signature*. This serves as evidence that morphological factors are also involved in determining how words are syllabified.

### 3. 2. 4 Stress

Stress pattern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how letters are pronounced in words, particularly in predicting the vowel sounds (Dickerson and Finney 1978). Most of the vowels in unstressed syllables are pronounced as the reduced vowel schwa /ə/. In other words, the phoneme /ə/ can be represented by any of the vowel letters, or combinations of the vowel letter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 ə /: ago, parent, manicure, demon, bonus, analysis, precious, fountain

In predicting the vowel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of a word stem and its derivations, str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Vowel letters in syllables with primary stress are underlined.) We can see the vowel changes when the word stress shifts. The letter *o* is pronounced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in *phone*, *phonetic*, and *phonic*.

phone / fon /

phonetic / fə' nɛtɪk /

phonic / 'fɒnɪk /

In this section, we have seen many examples of vowel reduction. The issues of reductions will be discussed further in 4.2.

### 3.2.5 Morphophonemic Factors

Morphophonemics is “the variation in the form of morphemes because of phonetic factor” (Richards, et al., 1992, p. 237). How written words are pronounced is affected by their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ssimilations and resyllabification following the processes of inflections and derivations account for some variations in spelling-sound correspondence. The following section discusses how the formation of words determines the spelling-sound relationship by considering assimilation after affixation, stem/affixation contrast, and inflection/derivation contrast.

#### 3.2.5.1 Assimilation/dissimilation

One common example of assimilation in the spelling-sound relationship is the pronunciation of tense suffix *-ed*. The spelling of *ed* as a morpheme represents three allomorphs: /d/, /t/, and /ɪd/ (or /əd/). How the morpheme *ed* is pronounced is determined by the sound, not the letter, preceding it. It is pronounced as /ɪd/ when preceded by /t/ or /d/, as /t/ when preceded by a voiceless consonant other than /t/, and as /d/ when preceded by all other sounds. The pronunciation of /t/ is the result of assimilation to the voiceless segment



preceding it, while the pronunciation of / ɪd / is the result of dissimilation. The same process applies to the affixation of the plural marker *-s/es*, with three allomorphs / s /, / z /, and / ɪz /.

### 3.2.5.2 Word stem vs. affixation

Whether a letter sequence belongs to the same stem or is the result of affixation may determine how words are syllabified and pronounced. Morphological analysis help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from Finch (2000, p. 59): *fin-ger*, *an-ger*, vs. *sing-er*, *hang-er*. The sequence *ng* belongs to two syllables in the word stem in *finger* and *anger*, with letter *g* representing the onset of the second syllable. However, in *sing* and *hang*, the combination *ng* belongs to the same syllable as the coda, representing one phoneme / ŋ /. When affix *-er* is added to *sing* and *hang*, it forms sequence *-nger* identical to *finger* and *anger*. Yet their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are manifested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ame sequence *-nger*. We can see that when *-er* is a morpheme in the word, *-ng* in *singer* remains a digraph rather than being resyllabified into two syllables.

Stem:            *fin-ger*    *an-ger*  
Affixation:    *sing-er*    *hang-er*

### 3.2.5.3 Inflection vs. derivation

Another factor involving word structure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flection and derivatio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show letter combinations *ng* and *mb* in word stems, inflected forms, and derived forms. Note how the combinations are resyllabified into two syllables in derivations *sig-na-ture* and *bom-bard*, yet remain together as digraphs in inflections *sign-ing* and *bomb-ing*. After the digraphs are resyllabified into two different syllables, the silent letters in the stem become pronounced to reflect their new positions in the coda or in the onset.

<u>Stem</u>	<u>Inflection</u>	<u>Derivation</u>
<i>sign</i>	<i>sign-ing</i>	<i>sig-nature</i>
<i>bomb</i>	<i>bomb-ing</i>	<i>bom-bard</i>

### 3.2.6 Homographs and Grammar

Homographs are normally seen as a source of complication in analyzing English spelling and sounds. They have also been brought up time and again in discussions of spelling reform (for instance, Fromkin and Rodman, 1993, p. 380). However,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who are learning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the vocabulary at the same time, the variations in pronunciation for the same spelling pattern can be seen as an advantag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erving many functions, including differentiating tense, meaning, and parts of speech, as demon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homographs.

#### DIFFERENTIATING PARTS OF SPEECH

*live* / lɪv / (verb)

*live* / laɪv / (adjective)

*close* / kloʊ / (verb)

*close* / klos / (adjective)

*use* / juːz / (verb)

*use* / juːs / (noun)

#### DIFFERENTIATING TENSE

*read* / rɪd / (present)

*read* / red / (past/past participle)

#### DIFFERENTIATING MEANING

*lead* / lɪd / (to direct, to guide)

*lead* / led / (a kind of metal)

## 4. Aspects of Pronunciation Not Represented in Spelling

One major reason why spelling can only help learners guess approximate pronunciation, and why phonics instruction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is that there are many aspects of speech sounds not represented in spelling.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examine these aspects.

#### 4.1 Stress

To pronounce a polysyllabic word comprehensibly, correct stress placement is essential. Misplaced stress can interfere with comprehension, causing confusion in the contrasts of words such as decade/decayed, percent/person and, pronounce/pronouns. Unfortunately, English spelling does not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ord stress.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learn to pronounce the polysyllabic words with correct stress by listening to good models or by checking the phonetic symbols in their dictionaries. Polysyllabic homographs are also good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stress plays in pronunciation. Words such as *record* have more than one possible stress pattern, each yielding different vowel quality, with the noun pronounced as /`rɛkəd/ and verb pronounced as /rɪ`kɔrd/. Spelling does not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correct stress, which is a crucial part of correct pronunciation. Learners have to rely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text plus their existing knowledge of the different ways to pronounce the homographs correctly. Simply by looking at spelling is far from adequate. Ad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morphological and semantic context is needed to help predict the correct stress.

#### 4.2 Reductions

Reductions are another aspect in which spelling provides limited information. For instance, as reduced vowel /ə/ can be represented by any of the vowel letters depending on the word it appears in, spelling does not give helpful clues in predicting the schwa sound. In addition, there are other types of reductions not represented in spelling. Gilbert (1996, p. 5) listed the following examples to show “syllable reduction” not indicated in spelling: *chocolate*, *vegetables*, *business*, and *Wednesday*. These words all have one less syllable in pronunciation than in spelling. Another type of reduction not represented in spelling is the reduction of the word-initial phoneme /h/ in connected speech, 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h/ in the sentence *Is he going?* Yet another type of reduction normally not represented in spelling involves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spoken language and written language, with the former being less formal and the latter more formal. For example, the sentence written as *I'm not going to go* may better represent the

informal spoken form as *I'm not gonna go*.

### 4.3 Allophones

One phoneme may have several allophones. Voiceless plosives such as /t/ may have five or more allophones, although in print they are all represented by *t* or *tt* (see Table 10 for examples). There have been studies on the teaching of allophone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for example, Chang, 1994). The accurate pronunciation of allophones makes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pronunciation sound more “native like.” However, this is another area in which spelling does not help.

**Table 10 Some Allophones of the Phoneme /t/**

[ t <sup>h</sup> ]	<u>top</u>	aspirated
[ t ]	<u>stop</u>	unaspirated
[ r ]	<u>later</u>	flapped
[ ʔ ]	<u>written</u>	glottalized
[ t̚ ]	<u>cat</u>	unreleased

### 4.4 Co-articulation

Sounds in spoken words are different from sounds in isolation because speech sounds are co-articulated. Researchers and language educators agree that many phonemes can not be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without distortion or vowel epenthesis. As Rost (1990) states, “In decoding connected speech, matching sound to individual phoneme is inadequate since individual phonemes are not easily isolable.” (p.38). Citing studies by Liberman, et al., Eldredge (1995) also states that, “Phonemes are *co-articulated* (overlapped or merged) with other phonemes as we speak, so even a spectrographic analysis of human speech cannot detect them” (p.31).

Regarding the old-fashioned phonics instruction in which children are shown individual letters and taught to utter the individual sounds corresponding to the letters, Eldredge remarks, “Some teacher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alphabetic principle by teaching them to ‘sound out’ words. To sound out a word, children must first isolate all of the word’s phonemes, and then quickly blend them

together. However, neither children nor adults can isolate co-articulated phonemes without some articulatory distortion. This distortion occurs largely because many consonant sounds cannot be isolated without an accompanying schwa sound” (p.32). Eldredge’s comment echoed the following remarks made decades earlier by Bloomfield and Barnhart (1961, p.28) on the same issue.

“This sound is to be uttered either all by itself or else with an obscure vowel sound after it. Now, English-speaking people, children or adults, are not accustomed to making that kind of noise. The phoneme /t/ does not occur alone in English utterance; neither does the phoneme /t/ followed by an obscure vowel sound. If we insist on making the child perform unaccustomed feats with his vocal organs, we are bound to confuse his response to the printed signs. In any language, most phonemes do not occur by themselves, in isolated utterance, and even most of the successions of phonemes which one could theoretically devise, are never so uttered. English speakers do not separately pronounce the sound of /t/ or /p/ or of /u/ as in *put*, and a succession like /sp/, for instance, as in *spin*, does not occur alone, as a separate utterance. Learning to pronounce such things is something in the nature of a stunt,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earning to read. We must not complicate our task by unusual demands on the child’s power of pronouncing.”

The distortion and schwa epenthesis caused by attempts to pronounce segments in isolation does cause problem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pronunciation of words (Li, 2000), particularly in those with word-final consonants and consonant clusters.

Though spellings and speech sounds are segmented for convenience in analyzing spelling-sound relationships, we need to bear in mind the very different nature of speech and print. While letters in printed words are definitely discrete entities, sounds in spoken words are overlapped. Phonemic information is actually transmitted in a parallel, not linear, fashion. Thus, linear decoding of phonemic segments can only represent the abstract phonemes being matched to the overlapped sounds. A major implication this has for phonics instruction is the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misconception that individual phonemes add up to real connected speech.

The fact of co-articulation helps to explain why drilling students on isolated sounds provides limited help to students’ pronunciation of words. It also accounts for an important part of listening difficulty often experienced by EFL learners. As

Rost puts it, “Listeners who anticipate hearing ideal pronunciations of words will have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decoding connected speech since ALL PHONEMES CHANGE THEIR PERCEPTUAL FEATURES IN DIFFERENT PHONETIC ENVIRONMENTS. As such, any ideal phoneme is an unrealistic standard against which to match heard forms” (p. 37).

### **5. The Need for Phonetic Symbols**

In view of the inadequacy of pronunciati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pelling alone, language educators have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a set of clear and consistent phonetic symbols (Finegan, 1999; Fromkin and Rodman, 1993; Kuiper and Allan, 1996; Pennington, 1996), and the importance for EFL learners of learning phonetic symbols in order to be independent learners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 (Li, 2002).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studies and debates on the effects and relative superiority of phonetic symbols instruction vs. phonics instruction in the EFL context (Chu, 2002; Hsieh, 2001). According to the analyses of this study, phonics and phonetic symbols are best seen as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competing or mutually exclusive, components in EFL teaching. Each of them makes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learning of pronunciation, decoding print, and spelling. Both can be helpful when taught to EFL learners at the right time and in the right way.

### **6.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Phonics Instruction**

When phonics is taught to EFL learner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vide the i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ity of spelling-sound correspondence 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rather than the superficial, misleading “one letter, one phoneme” notion. Based on phoneme-grapheme analyses, it is suggested that a balanced approach, which combines the strengths of both explicit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by meaningful reading, is the ideal way of teaching phonics.

English spelling does give clues for sounds, but in a very complicated way.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pronounce the whole word before learning to associate spelling with sounds. Analogizing spelling patterns helps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o guess the approximate pronunciation from print. This is different from

learning how to pronounce a word or a sound “correctly.” The teaching of production of speech sounds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Phonics instruction should offer learners the opportunities to infer information, draw analogies, and learn to be independent learners. Therefore, a holistic approach involving reading stories and rhymes is recommended. Whole-word pronunciation should precede segmentation, and segmentation should precede blending. Also, teachers should avoid over-emphasizing segmentation and blending, since when the isolated sounds are blended into words, the result is a predictable, distorted pronunciation quite different from natural, correct speech.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one-to-one association of letters and phonemes is not an effective way to analyze or to learn sound-letter relationships. Instead, spelling patterns are more useful units for such tasks. In view of the complex nature of pronunciation-spell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phon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factors, it is necessary for teachers of phonics to study basic linguistics, particularly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helpful instruction and avoid passing on misconceptions about phonics (Huang 1998, Chung 1999). In addition, neither phonetic symbol instruction nor phonics instruction should precede beginning reading literacy. They should be offered after EFL students have built up a basic vocabulary repertoire large enough for them to relate the symbols to words in their oral vocabulary.

## **7. Concluding Remarks**

Regularity in spelling-sound relationships is best discussed using spelling patterns associated with pronunciation rather than linking individual letters to sounds. For the same reason, phonics instruction should focus more on teaching spelling pattern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letters and the sounds they represent. Onsets and rimes are better units for mapping than individual letters in phonics analysis. Any form of analysis of English orthography should consider phon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factors. A balanced approach focusing on both form and meaning is a better way to teach decoding print in EFL classrooms.

The analyses in this study have shown the limitations of relying on spelling alone in learning to pronounce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why spelling-sound associations should not be taught with the over-simplified one-to-one mappings. The analyses have also indicated how phonics instruction can be related to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and why phonics should NOT be deemed as synonymous with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 **Acknowledgements**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under Project Number 89-2411-H-029-021. The author is indebted to the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insightful comments.

### **References**

- Adams, M. J. (1990). *Beginning to Read: Thinking and Learning about Pri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almuth, M. (1982) *The Roots of Phonic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Bloomfield, L. and C. L. Barnhart (1961). *Let's Read: A Linguistic Approach*.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B. Y. (1994). *Learning of Five Allophonic Rules in English by Chinese EFL Studen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Taipei: The Crane.
- Chu, H. M. (2002). Assessing beginning EFL learners' phonics skills.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26:3, 35-57.
- Chung, R. F. (1999).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Elementary English Teaching*, 21-31. National Pingtung Teachers College.
- Clymer, T. (1963). The utility of phonic generalizations in the primary grades. *The Reading Teacher*, 16, 252-258.
- Dickerson, W. B. and R. H. Finney. (1978). Spelling in TESL: stress cues to vowel quality. *TESOL Quarterly*, 12 (2), 163-175.
- Eldredge, J. L. (1995). *Teaching Decoding in Holistic Classrooms*. London: Prentice-Hall.



- Finch, G. (2000). *Linguistic Terms and Concep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inegan E. (1999). *Language: Its Structure and U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Fromkin, V. and R. Rodman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5<sup>th</sup> ed.)  
Orlando, FL: Harcourt and Brace.
- Gilbert, J. B. (1996). *Clear Spee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swami, U (1986). Children's use of analogy in learning to read: A developmental stud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42, 73-83.
- Goswami, U. and F. Mead. (1992). Onset and rime awareness and analogies in reading.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7, 150-162.
- Hsieh, L. (2001). Teaching English pronunciation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An experimental 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eenth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98-112). Taipei: The Crane.
- Huang, T. L. (1998). A study of phonics in English reading.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p. 243-265). Taipei: The Crane.
- Ing, R. O. (1997).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Taipei: The Crane.
- Kuiper, K. and W. S. Allan.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Macmillan.
- Li, I. (2000). Some issues on teaching pronunciation to EFL childre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25, 4-15.
- Li, I. (2002). *American English Pronunciation*. Taipei: Far East Book Co.
- Liberman, I. Y. (1973). Segmentation of the spoken word and reading acquisition. *Bulletin of the Orton Society*, 23, 65-77.
- Pennington, M. C. (1996). *Phonology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New York: Longman.
- Richards, C. J., J. Platt, and H. Platt (Eds.) (1992).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Rost, M. (1990). *Listening in Language Learning*. London: Longman.
- Savage, J. F. (2001). *Sound It Out! Phonics in a Balanced Reading Program*. Boston: McGraw-Hill.
- Treiman, R. (1985) Onsets and rimes as units of spoken syllables: Evidence from

-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39, 161-191.
- Treiman, R. (1986) The division between onsets and rimes in English syllable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5, 476-491.
- Wagstaff, J. M. (1994). *Phonics That Works! New Strategies for the Reading/Writing Classroom*. New York: Scholastic.
- Wylie, R. E., and D. D. Durrell (1970). Teaching vowels through phonograms. *Elementary English*, 47, 787-791.

# 從英語字音字形對應分析，論字母拼讀教學

王啟琳

東海大學外文系

##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不同角度分析英語字音字形對應關係，探究影響對應關係的各種因素，並討論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字母拼讀教學，拼字教學、與發音教學上的意義。英文雖然是拼音文字，但音素的數目遠高於字母的總數，因而單一字母只對應單一讀音的方式並不可行。最常見的現象即是一種拼法多種讀音和一種讀音多種寫法。除了字源與音素變異等歷史性因素之外，影響拼字讀音對應關係的，主要是與音韻及構辭息息相關的音節分法、重音位置、相鄰音、全字節奏、及單音在音節中的位置等因素。學習字母拼讀，有助於看字推測讀音，與音標符號的一音一符，性質各異，但可相輔相成。字母拼讀教學，宜以聲母與韻母為單位與拼字對應。

**關鍵詞：**字母拼讀，音韻學，拼字教學，發音教學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309-337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From Reading to Hear-Say: Hemingway's Literature Marketing Strategy in Allying the Readers against the Critics

陳順龍\*

### 【Abstract】

At the two extremes of the book market, there have been writers of two kinds--the ones who have been able to hit the best seller list from time to time and, yet in whom the critics find very little interest. The other kind is those who, though being able to invite favorable critical reception, could sell only a few copies. Hemingway wants his works to be literary masterpieces and he also wants them to sell. Since there is always uncertainty that the critics might find him unfavorable, Hemingway decides to take the advantage of his stardom--by holding the critics in open contempt. By so doing, he is also sending an implied message to his readers: read me for whatever I am, and not what others/critics say I am. An intimacy between Hemingway and his readers is thus built up in Hemingway's literary reception, in which the critics, though still unavoidable, are much weakened by Hemingway's self-professed sovereignty. The impression that Hemingway imposed on the public, with his open contempt for the critics, made Hemingway bigger than his size. By a contrast effect, the giant shadow of Hemingway on the wall was thus able to turn the critics as a fierce watchdog into a tiny mewling cat.

This paper starts by discussing the nature of Hemingway's reputation,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Hemingway's reception anxiety as well as how he counteracted it, and ends by viewing how writing has meant for Hemingway as the means of being. Through this critical trial, the author expects to elucidate how a popular writer is made--or self-made, by the sustenance of self-driven publicity and propaganda.

**Key words :** Hemingway's reputation ; reception theory ; reception anxiety ; writing as the means of being ; publicity ; propaganda.

---

\*東海大學外文系講師。

## The Nature of Hemingway's Reputation

*Never talk, Jack, if you are a writer, unless you have the guy write it down and have you go over it.*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The Paris Review* (79), p. 97.

Hemingway has now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cultural totem in understanding what the world was like in the 1920s, 1930s, and 1940s. Because of his involvement in the two world wars, Hemingway gained a chance to demonstrate his versatility on a global level. As it is, Hemingway now is a spokesman of the lost generation, an unfading dweller of Paris on the Left Bank, an ever-touring guide to Spain and Italy, a boxer, a bull-fighter, a drinker, a hunter and fisherman, and a brave war reporter--all unified under the general heading of a writer. In other words, Hemingway impresses the public as a star kind of a writer, who often confuses people with his identity as a writer type of a star.

This thesis means to explore Hemingway's long journey of authoring himself into a great writer. By authoring I mean through his own writing, particularly on the act of writing, Hemingway created in the public the notion of his greatness as a writer. Included in my scope will be 1) the nature of Hemingway's reputation; 2) his writer's anxiety and his subsequent grappling with the critics; and 3) his enthusiasm in talking about writing and what writing means to him -- and should mean to everyone. If, as has been said, the greatest character Hemingway ever invented is Ernest Hemingway, this thesis highlights how the titanic size of Hemingway as a writer "character" is sustained by the public.

Seen diagrammatically, author, work, and writer could be viewed as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each encompassing the other. While individually an author exists only in relation to the creation of his book, the currency of his being a writer has more to do with the acceptance of his work by reader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 mean to argue that an author "dies" in a metaphorical sense when a book is completed, but his identity as a writer in the public frame of mind continues to live after his book goes to publication. In Foucault's terms, "They

[the authors] have created a possibility for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ir discourse, yet something belonging to what they founded" (114). The mechanism of Hemingway's success operates in two directions--setting forth from within and surging back to bring it to a climax from without. On the one hand, Hemingway is prominent in academia among critics, anthology edito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cause of certain stylistic idiosyncrasies that have become his trademark as an author. On the other hand, Hemingway's self-promotion as a writer, who, besides writing, is also engaged in other exciting activiti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anonization of him by the public at large.

In its most obvious sense, an author may seem to be the only source of his book, but this tends to overlook a richer cultural implication that lies benea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horship (or readership) actually involves many interacting factors. The allusiveness among authors themselves, marketing strategy of the publisher, public relations of an author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global as well as domestic--that determines each individual's buying power for books should all be included to the scope of authorship. Hence, a book relates to its author (and vice versa) as a nucleus pulsating in the web of numerous social factors. Foucault indicates:

in the sphere of discourse one can be the author of much more than a book--one can be the author of a theory, tradition, or discipline in which other books and authors will in their turn find a place. These authors are in a position which we shall call 'transdiscursive'. (113)

Viewed from this perspective, Hemingway is not only famous for the stories he wrote, but he is better known for his personal story as a public writer who takes on unsurpassed celebrity. To put it differently, this transdiscursiveness goes from discourses *by* Hemingway to discourses *on and about* Hemingway.

In a website featuring American legends, there is, unsurprisingly, an article on Ernest Hemingway in which the introduction appears as follows: "His *books* are seldom read today, and his *legend* almost a faded memory. Bu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Ernest Hemingway was a literary idol--and role model for young

writers who imitated his *sparse prose* and *adventurous lifestyle*"<sup>❶</sup> (emphasis mine). While *sparse prose* is a characteristic more to do with work (or text), *adventurous lifestyle* stands out as a quality more related to a writer in action--not necessarily writing. Nowadays,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may not necessarily know what books Hemingway had written, but they would have no problem relating his name to a great writer.

The name Hemingway has become a rhetorical term ful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fact, the nature of Hemingway's reputation--not necessarily hi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academia--is an overlapping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that speaks to a diverse group of readers from varied social contexts. As Foucault indicates in "What is an Author?", the influence that comes with a producer of text cannot be neatly confined to the frame of an author only in relation to his work.

Perhaps it is time to study discourses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ir expressive value or formal transformation, but according to their modes of existence. The modes of circulation, valorization, attribu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discourses vary with each culture and are modified within each. (117)

Another example comes from an article discussing the greenhouse effect from February 19, 2001. Jessica Reaves, a *Time* journalist, still uses present tense when she mentions Ernest Hemingway in connection to the disappearing snowcap on top of Mount Kilimanjaro. "Let's hope Ernest Hemingway, wherever he is, has a nice stiff drink--he's going to need one when he hears this news: The celebrated snows that drape the heights of Mount Kilimanjaro are melting at an alarming pace." Here Reaves assumes that a culturally equipped reader should have read or at least have known about Hemingway's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Man and nature have conspired," Reaves continues in the subtitle, "to shrink the icecap atop of 'one of literature's greatest mountains'." Hemingway brought his readers to Mount Kilimanjaro and was rewarded in return with canonization.

In 1959, two years before Hemingway's death, Charles Scribner, Jr. proposed

---

❶ "Hemingway: A Look Back." <http://www.americanlegends.com/authors/index.html>. Accessed 3/30/00.

the idea of a student's edition of Hemingway's short stories. Hemingway agreed and promised to write the preface. He worked on the preface for some time, had his wife type it, but proposed to extend the scope of the book from one originally meant for the students, to a collec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s it turned out, the preface, which took a form of lecture on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was boastful and condescending. Although the idea of the book was finally dropped, this preface was particularly revealing in terms of Hemingway's relationship with his readers.

Two years before his suicide, Hemingway had long been an established master. The fact that he decided to write his preface in the form of a lecture is symbolic of the master's life-long yearning for a direct dialogue with his readers. In a conversation, there are exchanges, subsequent modifications, or negotiations, whereas in a lecture, the speaker speaks to an audience that is pretty much a projection of the speaker's self in how he wants others to see him. The circuit of communication becomes one-way as far as its linguistic and formalistic performance is concerned, leaving the various responses of the actual readers technically impossible to pin down.

After pricking Faulkner and kicking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preaching the technique of necessary omission in the short story, Hemingway reaches the end of his preface: "Any other stories you find in this book are in because I liked them. If you like them too I will be pleased. Thank you very much. It has been nice to be with you" (*The Paris Review*, June 1981, 102). "What has been nice" is a situation that involves two parties--you and I. Here, *I* as the real grammatical subject is missing, but its presence is unmistakably implied by the ever constant *you*.

In his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Mikhail Bakhtin indicates that "any understanding is a correlation of a given text with other texts" (65). True, in the net of all things, everything connects. To understand Hemingway's obsession with being a writer, we must focus beyond the "correlation of a given text with other texts." Being a great writer is for Hemingway not only an artistic necessity, but also existential, involving a mechanism operating among the text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author and his



readers.

In a letter to Robert Cantewell in 1950, Hemingway has a manifesto that clearly professed his life-long image as a writer: "I want to run as a writer; not as a man who had been to the wars; nor a bar room fighter; nor a shooter; nor a horse-player; nor a drinker. I would like to be a straight writer and be judged as such" (*Selected Letters* 712). Very ironically, Hemingway is not just "a straight writer." Hemingway could hav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run as a straight writer and *not anything else*. Instead, he needed to delineate all the things he did not want to be remembered by. In fact, people who know of Hemingway are made up of readers and non-readers alike, the latter of which could perhaps better be categorized as "the audience," who have come to enjoy Hemingway's real life as an alternative narrative beyond the page. According to Bakhtin, there is a kind of listener postulated in the work, who is not "an empirical listener nor a psychological idea"; rather it is,

an abstract ideological formulation. Counterposed to it is the same kind of abstract ideal author. I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ideal listener is essentially a mirror image of the author who replicates him. He cannot introduce anything of his own, anything new, into the ideally understood work or into the ideally complete plan of the author. He is in the same time and space (as in any abstract ideal formulation), and therefore he cannot be an-other or other for the author, he cannot have any surplus that is determined by this otherness. (Enos 68-69)

True, Hemingway is not just the author of certain works; his media performance (interviews and speeches) and correspondence all serve as projections of his inner being. Seen in this light, the Bakhtinian "otherness" fits closely with Hemingway's author-writer projection. Furthermore, Hemingway wanted to be not only a writer. He wanted to be THE writer.

Toward the end of one of his earliest poems, "Roosevelt," Hemingway declares: "And all the legends that he [Roosevelt] started in his life/ Live on and prosper,/ Unhampered now by his existence" (*Three Stories* 52). In this poem, through prophesying Roosevelt's long-lasting fame, Hemingway is also proclaiming his unfailing confidence in the power of narrative (or legends--as the

poem exactly has it). His confidence might remind us of the confidence in the immortality through verse as was upheld by Shakespeare: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Sonnet 18). What has proven to be true with Hemingway is that after he shut the door of life behind him and stepped into history, his legend continued to live on--a result he had predicted for Roosevelt but turned out to be more applicable to himself. Before his suicide, Hemingway could have been pretty sure of the huge impact he had made -- not only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alone, but also on the global cultural currency, in which the name of Hemingway has irrecoverably become a logo. An article in *Life* in 1949 by Malcolm Cowley prophesied Hemingway's ever-lasting fame.

It is enough for you to do it once for a few men to remember you. But if you do it year after year, then many people remember you and they tell it to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remember and, if it concerns books, they can read them. And if it's good enough, it will last as long as there are human beings. (Philips 6)

In *Green Hills of Africa*, Hemingway also states this unfailing faith in the everlasting power of literature:

A country, finally, erodes and the dust blows away, the people all die and none of them were of any importance permanently, except those who practiced the arts ... A thousand years makes economic silly and a work of art endures forever... So what? So I would go on reading....  
(109)

If he had been right about the legends of Roosevelt that would "live on and prosper," Hemingway perhaps even more accurately prophesied the durability of himself in people's memories, at least still for a predictable span in the future. The ending of the quotation above clearly indicates Hemingway'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spensable part that reading has to play in the preservation of literature. Hence, when cultivating his authorship, Hemingway also nurtured his readership at the same time.

Hemingway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great writer, a brand name and a cultural commodity, whose name is remembered and face easily recognized by

people who may have never read him at all.

It is surprising to observe what great magic Hemingway has performed on his readers (and non-readers alike). People enjoy dropping Hemingway's na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have read him or not, just to be 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on a cultural level, or simply to avoid the embarrassment of not knowing him. Reading or knowing of Hemingway was a fashion when he was alive; after he was dead, Hemingway as a name took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an indicator of cultural literacy.

Few writers have enjoyed the ardent reception that was privileged to Hemingway as Matthew J. Bruccoli observed,

Late one August night in 1952, I noticed a small crowd around a Times Square newsstand where the next day's new magazines were being put out. The people were waiting to buy the *Life* issue with *The Old Man and the Sea*--which sold out 5,300,000 copies in two days. (*Conversations*, ix)

As it is, Hemingway's popularity makes him a public writer, or the American public writer, and hence, the world's. According to John Raeburn, a public writer is,

one who, having first established his preeminence as an artist, becomes honored by more people than those who ordinarily read books; his audience is a national one which cuts across divisions marked by class, social position, and education. (2)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oday, people use and perhaps abuse the name of Hemingway. In a suburban town by the sea in north Taiwan, there is a high-rise apartment building named after "Hemingway," read as *hai* (海 meaning sea)-*ming* (明 meaning bright)-*wei* (威 meaning might or force). The three syllables in the name of Hemingway are rendered into Mandarin and phonetically represented by three Chinese characters, meaning **Sea-Bright-Force** (海明威) respectively. This is a charming coinage, not just because of the pleasant denotation coming from each Chinese character, which is also pleasing to the Chinese ear. More importantly, the three characters, as a referent of a proper name, mean a top-notch cultural supremacy; it is the name of a Nobel Prize winner in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 **Sea** (海) also serves to subtly sugges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he builder believed that the name alone would increase the value of his building in the market.

One way or an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like to be associated with Hemingway--his works or simply his name, as Michael Reynolds recognizes:

Today Hemingway's name and face appear in strange and diverse places. More than a few problem drinkers salute Ernest as a patron saint without ever having read his fiction. At mahogany bars in Key West, Bimini, Havana, Madrid, and Paris, one still finds faces who claim to have shared a drink with Ernest, to have been at the bar the night before he said such and such. (Voss 3)

Yet, under the gigantic figure of Hemingway,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Hemingway's being a social phenomenon as a great writer? Brucoli, for example, has observed: "Those of us who grew up with the face of Ernest Hemingway on the covers of mass-circulation magazines feel a vacancy. While aggrandizing himself, he aggrandized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Conversations*, xii). Focusing on a different point in the loop of Hemingway reception, it is also possible to say that while aggrandizing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Hemingway aggrandized himself.

To explain the success of Hemingway, it is vital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audience. Early in the Twenties, Hemingway did start his way to stardom by exerting influence on his readers. However, the nature of Hemingway's readership gradually underwent a change that slanted toward the concept of an audience as Hemingway learned to control--if not necessarily to create-- his publicity machines, such as *Time*, *Life*, *Book-of-the-Month Club*, etc. As it turned out, the more Hemingway fed the publicity machine by selling his privacy as a commodity, the more he orchestrated a metamorphosis, in which the readership became leviathan in size to incorporate ardent news hunters who might not have cared about what he wrote or how well he wrote.

In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Hemingway indicates: "Never talk, Jack, if you are a writer." Directly following come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tatement as a conditional clause, which instantly subverts the preceding one-- "unless you have

the guy write it down and have you go over it." As a writer, Hemingway garnered a great deal of coverage by the media. And when this happened too often, the copiousness of his remarks finally made authorial censorship impossible. In his crescendo to an unmatched publicity as a writer, Hemingway might have been aware that, once given to the public, he no longer had the sovereignty over how the public would and could process him. The result, nevertheless, must have been pleasing enough for Hemingway because of the easy recognition that he enjoyed as a writer.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publicity is repetition as a reinforcement and Hemingway was aware of the strategy. He notes in *A Moveable Feast*: "I am trying to do it, so it will make it without you knowing it, and so the more you read it, the more there will be" (138).

## Boxing the Critics -- Hemingway's Reception Anxiety

*He [Robert Cohn] wrote a novel, and it was not really such a bad novel as the critics later called it, although it was a very poor novel.*

*--The Sun Also Rises, pp. 5-6*

This section examin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emingway and his readers. From a marketing point of view,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how demand affects supply. Undeniably the booming success of the Hemingway industry has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the complicity of readers. The first question to ask is: how far could a writer afford to be "self-made"? Behind the facade of a great writer who has obviously influenced a world of readers, could there be a mechanism working from the other way to influence Hemingway's writing in return?

According to Louis Philips, in Homer as in Hemingway, there has been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shows writers/poets sometimes do develop their story according to how their readers want it to be. Homer, for example, "asked his listeners to raise their hands to vote if they wanted Odysseus to blind Poseidon's son...they voted four to one in favor of blinding" (85). Two thousand years later,

the readers demonstrated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ir power in chang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asterpiece. According to Louis Philips' source ②, Hemingway had first intended to have Catherine Barkley give birth to a healthy baby and live with Frederic Henry happily ever after in *A Farewell to Arms*. But Max Perkins was concerned if readers would be happy with such an ending and had his staff ask thousands of readers to learn how they really wanted it to be. The majority decided that Catherine must die. In a letter to Maxwell Perkins dated June 7, 1929, Hemingway expressed his discontentment about the result of the poll, but nevertheless indicated his willingness in going with the tide.

Dear Max:

Got the poop three days ago. I think it ridiculous that the people have voted to allow Catherine to die. The novel is a bit too sad that way. *But if that is what the public wants, then I shall do the best to rewrite the final chapter.* After all I need money....

What about the weather? 40% of the readers preferred the novel to end upon a sunny day. 40% preferred a typhoon. 20 % were undecided.... (86, emphasis mine)

Robert Darnton claims that a printed book also has a life cycle; it is a "communication circuit that runs from the author to the publisher, the shipper, the bookseller, and the reader. The reader completes the circuit, because he influences the author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act of composition. Authors are readers themselves" (Davison 30). In fact, there exists a most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 While traditionally the author is taken as the one who exercises his intellectual power on his readers through the act of reading, there is undeniably a backwash of the readers' influence surging back to the author and shaping his writing and even his personality. William Charvat, when commenting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aders on the authors in America, indicates:

---

② Louis Philips' unidentified source in *English Journal* 79.5 (September 1990) is only valid if Ernest Hemingway had written more than two letters to Maxwell Perkins on June 7, 1929. In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by Carlos Baker, there is only one letter on the day in question, in which Hemingway commented on "Proofs for Correction" on the galleys. In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The Ernest Hemingway-Maxwell Perkins Correspondence* by Matthew J. Bruccoli, there was a second letter on the same day written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one above, and it contains nothing similar in content to the letter, which Louis Philips claimed to be also dated on June 7, 1929.

The general reader or the common reader (he who stands somehow between the avant garde and the consumers of mass diversion) has had a greater and mor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writer than his counterpart in Europe has had. This statement can be documented conclusively from internal evidence in the work of our greatest writers. (Railton 3)

Indeed, as Stephen Railton further intimates along this line:

The paradox of writing is that it is at once an intensely solitary and an utterly public act. Although I am alone at my desk, you are with me as I write this paragraph. I can shut the door to keep other people out of the room, but I can hardly exclude you from my consciousness. (3)

Foucault gives a very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an author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one we have gotten used to, saying that "the function of an author is to characterize the existence, circulation, and operation of certain discourses within a society" (117).

According to John Raeburn, Hemingway has an "acute awareness of the public response to his personality, and his sense of what this response meant, affected what he chose to write about and what he said when he did write" (13). Especially after 1930, Hemingway's works remained quite inclined towards this tendency. *Death in the Afternoon* (1932) and *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 are two nonfiction works in which the protagonist is Hemingway himself where he guides and instructs.

But before the issue of readership in Hemingway's texts can be comfortably talked about, it is vital to set apart critics from general readers. In every author's mind, there is always the uncertainty from the critic's part. Take Willa Cather, for example, who was deemed as canonical in the 1920s, but whose status declined in the 1930s (O'Brien 241). The reason was ideologically complicated. Perhaps because Cather's works did not reflect the aftermath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depression that came after it, critics then started to read her against hard-boiled writers whose writings demonstrated social and economical issues. As a result, Cather gradually developed a hostile attitude toward the professional critics and favored the nonprofessional readers. To a certain point, Cather went as far as not wanting her books to be read in the classroom for the fear that the

classroom as an institution might judge against her according to the "canonical" standards set up by the critics. The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 and reader for Cather was like one based on friendship. This possible tension coming from the critics' part in the subtle triangle among the author, critics, and general (nonprofessional) readers perhaps holds true for every writer, but Hemingway seemed to have a way around it.

Except for cases few and far between, like Emily Dickinson, most authors do write and expect to be read. The reader (singular in form but plural in indication) is thus a benefactor and adversary at the same time, give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some would applaud and some would hiss from a congregation of both the professional critics and general readers. Taken generally, readership assumes a protean nature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chance that the nonprofessional readers might be influenced by what the critics would have to say. Sometimes, the critics would gang up, thus forming an ever-present shadow of threat to the general idea of readership. Coleridge indicated in *Biographia Literaria* that,

Poets and philosophers, rendered diffident by their very number,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learned readers'; then, aimed to conciliate the graces of 'the candid reader'; till, the critic still rising as the author sunk, the amateurs of literature collectively were erected into a municipality of judges, and addressed as the Town! And now, finally, all men being supposed able to read, and all readers able to judge, the multitudinous public, shaped into personal unity by the magic of abstraction, sit nominal despot on the throne of criticism. (34)

Such a tension has been particularly true between Hemingway and the critics from the earliest. At the end of Hemingway's third story in *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My Old Man,"--the boy narrator, Joe, said after his jockey father had died from an accident in a race: "But I don't know. Seems like when they get started they don't leave a guy nothing" (46). Prior to this point, Joe was saddened by a conversation he overheard in which people were criticizing his late father. Their family friend, George Gardner, then reassured Joe that his father *is* indeed a good man. The story ended when Joe's father died. The ensuing action of how people would comment on his father was beyond Joe's control, no matter how



great Joe thinks his father must have been. Hence, the ending of "My Old Man" can represent Hemingway's reception anxiety as an author. Much as Joe was not certain of what people would say about his late father, Hemingway had no control over how the critics would respond to his work. Joe's worry came from the ill opinions regarding his father; Hemingway's worry was the possible negative comments from the reading public, particularly from the critics. Neither the author nor the character seemed to have real control over who was to say what. As it was, the critics could have been the hurdles standing in Hemingway's way to literary success. Hemingway, however, had his way to dispel this impasse-- by publicizing his open contempt of the critics in general so as to set up a mechanism in which he alone controls the quality of his own works. Thus, whatever Hemingway prompted the critics to say about his works--good comments as well as bad ones--equally adds to Hemingway's publicity. To those praising him, Hemingway took it for granted; to those with negative comments, he openly defied them.

At the two extremes of the book market, there have been writers of two kinds--the ones who have been able to hit the best seller list from time to time and, yet in whom the critics find very little interest. The other kind is those who, though being able to invite favorable critical reception, could sell only a few copies. Hemingway wants his works to be literary masterpieces and he also wants them to sell. Since there is always uncertainty that the critics might find him unfavorable, Hemingway decides to take the advantage of his stardom--by holding the critics in open contempt. By so doing, he is also sending an implied message to his readers: read me for whatever I am, and not what others/critics say I am. An intimacy between Hemingway and his readers is thus built up in Hemingway's literary reception, in which the critics, though still unavoidable, are much weakened by Hemingway's self-professed sovereignty. The impression that Hemingway imposed on the public, with his open contempt for the critics, made Hemingway bigger than his size. By a contrast effect, the giant shadow of Hemingway on the wall was thus able to turn the critics as a fierce watchdog into a tiny mewing cat.

In most cases, critics could influence or even shape a writer's readership by

the comments they give. Before Hemingway started his safari and deep-sea fishing, he began "wrestling" with the critics. And the weapon he chose was to publicize his privacy by playing hard to get. "Christ knows I hate this terrible personal stuff," Hemingway proclaimed in a letter to Edmund Wilson in 1924 (Wilson 123). He was then expressing his gratitude for Wilson's good comment on *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 (1923) as well as *in our time* (1924). In Hemingway's opinion, Wilson's review "was cool and clear minded and decent and impersonal and sympathetic" in contrast to other reviews which contained personal stuff that made him sick (123). An investigation has shown that reviews containing "personal stuff" that made Hemingway sick were found to be coming from nowhere. According to John Raeburn, Wilson's review was only the third of the Hemingway reviews; the other two were both published in *transatlantic review* and neither contained anything personal. While Hemingway takes advantage of his privacy being made public, he, however, often complains about the public intrusion of his privacy.

As a result, Hemingway's publicity as a great self-sustaining writer became far more noticeable than his actual literary achievements, in which the critics would have to play an indispensable part. None or few before Hemingway had ever dared such an enterprise: to manipulate the mechanism of literary reception in skipping the critics and by having the readers in his alliance -- and with such a great success.

As early as in 1924, in his first nonfiction contribution to *transatlantic review* titled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Hemingway called the critics "the eunuchs of literature." ③ By so saying, Hemingway was working against a convention in which "high culture in America has traditionally been regarded as a feminine preserve in which a truly manly man was not much interested" (Raeburn 52). The strategy here is apparent--to feminize by castration. The message was that Hemingway is the Man with testicles. In *Green Hills of Africa*, Hemingway praises the intellectuality of the New England writers, but also belittles them as being not masculine enough. In answering Kandisky's question as to who are

---

③ *transatlantic review*, 1 (May-June, 1924), 357.

some great American writers from the past, Hemingway reveals:

Emerson, Hawthorne, Whittier, and Company.... Also all these men were gentlemen, or wished to be. They were all very respectable. They did not use the words that people have always have used in speech, the words that survive in language. *Nor would you gather that they had bodies. They had minds, yes. Nice, dry, clean mind.* (21, emphasis mine)

The attempt to feminize is quite clear in "nor would you gather that they had bodies." In contrast, Hemingway implies that he uses "words that survive in language" and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ype of writer.

The eunuch label which Hemingway attaches to the critics finds its resonance in another correspondence. In 1925, the year before *The Sun Also Rises* was to make Hemingway a new booming literary star, he wrote to Sherwood Anderson:

All criticism is shit anyway. Nobody knows anything about it except yourself. God knows people 'who are paid to have attitudes toward things, professional critics, make me sick; camp following eunuchs [sic] of literature. They won't even whore. They are all virtuous and sterile. And how well meaning and high minded. But they're all camp followers. (*Selected Letters* 161-62)

Also in *Green Hills of Africa*, Hemingway expresses his reception anxiety toward those who might read him unfavorably. In a dialogue, Kandisky asks Hemingway:

Then you are happy?  
*Except when I think of other people.*  
Then you think of other people?  
Oh, yes.  
But you do nothing for them?  
No.  
Nothing?  
Maybe a little. (26)

In a letter to Scott Fitzgerald in 1934, Hemingway had a piece of advice regarding the critics' role: "For Christ sake write and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 boys will say nor whether it will be a masterpiece nor what ...let the spectators

yell when it is good and hoot when it is not you would be all right" (*Selected Letters* 408). Perhaps Hemingway's advice holds true for all conscientious writers. But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reiterating or preaching the message made it more than a personal belief. It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something with which Hemingway is identified.

The antipathy against critics accompanied Hemingway well into the last decade of his life. In a letter to Bernard Berenson in 1952, Hemingway complained:

reading the [reviews] is just a vice. It is very destructive to publish a book and then read the reviews. When they do not understand it you get angry; if they do understand it you only read what you already know and it is no good for you. It is not as bad as drinking Strega but it is a little like it. (*Selected Letters* 791)

The life-long interaction between Hemingway and his critics could perhaps best be understood metaphorically by the old man and the sharks--an interpretation which Hemingway disagreed as far-fetched, yet nevertheless illuminating. In fact, Hemingway did dismiss this type of symbolic reading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n 1952, Hemingway wrote to Edmund Wilson:

You know I was thinking about actual sharks when I wrote the book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heory that they represented critics. I don't know who thought that up. I have always hoped for sound, intelligent criticism all my life as writing is the loneliest of all trades. (*Selected Letters* 793)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however contemptuous and uncaring Hemingway might seem in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critics, he nevertheless followed closely what the critics had to say about him. For example, in an article i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 (29 October 1933), Horace Gregory praises Hemingway for having gained maturity. This statement invites Hemingway's discontent, because the term "has put on maturity" implies that maturity did not exist before. Hemingway condemns Gregory in a letter to Maxwell Perkins: "That bird says it is about middle aged people because *he himself* is middle aged" (Brucoli 202, emphasis mine). Another critic/writer, Max Eastman, allegedly

suffers a worse fate for having crossed Hemingway:

[Max Eastman] questioned Hemingway's manliness, not to his face but in print. Soon after, the two met by chance in their editor's office where Hemingway first used Eastman as a duster to clear the editor's desk, then wrestled him to the floor. (Brian 5)

Moreover, in a letter to Maxwell Perkins dated December 17, 1935, Hemingway made an apparent confession regarding the critics' antipathy toward *Green Hills of Africa*:

My book [*Green Hills*] was ruined by three things; First that price...

2<sup>nd</sup>--without even thinking about it I had offended the daily critics deadly and they ganged up on it. The sidicated [sic] critics did the same.

This was my fault. (Bruccoli 229)

Of course it is Hemingway's fault. "Without even thinking about it " is hardly an alibi at all because Hemingway describes the critics as "lice who crawl on literature" (*Green* 109). The message that lies beneath is in fact that he is a hero of real guts who dares to challenge the critics and is brave enough to lay the blame on himself. He demonstrates again his belittling attitude against the critics in yet another letter to Perkins, in which Hemingway first starts by a fake confession and proceeds to dismiss the critics by saying: "I know some of the critic thing too is my fault. I have been very snooty and they hate you for that too. Well anyway the hell with it" (Bruccoli 1996 264). This "I don't give a damn" attitude well explains Hemingway's arbitrariness in his intent to tailor his own readership, as the following quote will further demonstrate:

They are a nice lot--The professional male beauties of other years--Max Eastman--a groper in sex (with the hands I mean) a traitor in politics and--hell I wont [sic] waste it on them...You see what they cant [sic] get over is (1) that I am a man (2) that I can beat the shit out of any of it. *But Papa will make them like it.* Best to you--Ernest. (Bruccoli 190-91, emphasis mine)

As Hemingway cultivated an audience who are more interested in what he does than what he writes, the critics lost their battle against Hemingway, for if people do not care what Hemingway writes, why would they care about what the critics

think he writes? Thus, Hemingway was able to redirect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traditionally operating in the writer-reader-critic triangle into two parallel lines defined by Hemingway and critics and Hemingway and readers. When the audience grew to be far more interested in Hemingway the man, the critics could only be confined to Hemingway's works, outside which their voices, if not altogether unheard, are responded to with little interest from the general reading public.

## Writing as the Means of Being

*So never think one story represents my viewpoint because it is much too complicated for that....*

*--"To Russian Critic Ivan Kashkin, 1939," Selected Letters, p. 480.*

Besides writing literature, Hemingway writes about writing with high frequency to suggest that he is the only one who knows how to do it professionally. Bernard DeVoto observes that "Hemingway has written about writing, probably, more than any other writer of his time: he is much better at writing and we should all be richer if he would stick to it." ④ DeVoto's comment is appropriate in both giving credit to Hemingway as a great writer and suggesting that Hemingway's writing about writing is uncannily troublesome. Indeed, most notably in *Green Hills of Africa* and *Death in the Afternoon*, Hemingway theorizes heavily about writing. Because of the strong yearning to establish himself as a great writer, there must have been equally strong a desire of wishing to be read and listened to. In a Bakhtinian sense, "the ideal listener is essentially a mirror image of the author who replicates him" (Enos 68). In much of the same fashion, though seemingly giving advice on what makes a great writer as a general projection that is applicable to all, Hemingway puts much of himself into that general projection to equate himself to a great writer. In the identity of a master writer, Hemingway's talk about writing borders on how great writing is

---

④ "Hemingway in the Valley."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12. (October 26, 1935), 5. qtd in Stephens, p.152.

achieved, what constitutes a great writer and a good reader, mottoes to abide by to escape the teeth of the crit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Very often, Hemingway's writing theory verges on a kind of mysticism, especially when he tries to equate good [Hemingway's] writing to truth. The more one looks into it, the more one will find that Hemingway, instead of writing about Writing, is actually writing himself writing, beneath which I sense a strategic manipulation in trying to tell the reader how to read him as an Apollonian truth giver. A passage that exemplifies Hemingway's mastery in taking the reader under his will is in *Death in the Afternoon* where he preaches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bullfight--though without seeming to:

... so far, about morals, I know only that what is moral is what *you* feel good after and what is immoral is what you feel bad after, and judged by these moral standards, *which I do not defend*, the bullfight is very moral *to me* because I feel very fine while it is going on and have a feeling of life and death and mortality and immortality, and after it is over I feel very *sad but very fine*. (4, emphasis mine)

At first, Hemingway was saying what distinguishes moral and immoral depends on whether one feels good or bad after a certain experience. But then after a fast juggling of words--life and death and mortality and immortality--Hemingway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he did not even offer earlier. Instead of "good," the reader is given an unexpected "sad but fine." By so doing, Hemingway wisely bypasses a statement, which might invite antipathy: bullfighting is moral and good. In an ontological sense, "sad but fine" seems more of a personal concession than the notion of "good" that comes from the public domain. Bullfighting thus has become a matter of artistic taste, irrelevant of morality.

In fact, right in the beginning of *Death in the Afternoon*, Hemingway says:

But whoever reads this can only truly make such a judgment when he, or she, has seen the things that are spoken of and knows truly what their reactions to them would be. (1)

Hemingway strongly hints that it is appropriate for a reader to make a judgment only after 1) he/she ha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2) knows "truly" what his/her

reactions would be. The implication is: if you do not know what I write about, do not comment. The actuality is that any individual would have different reactions to a single situation and would naturally assum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thing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The truth, or Hemingway's truth, is that he wants total sovereignty over his readers.

In still another place, Hemingway similarly encourages the readers to go "open-mindedly:"

... but people will know the first time they go, if they go open-mindedly and only feel those things they actually feel and not the things they think they should feel, whether they will care for the bullfights or not.

(*Death* 10)

Here Hemingway is trying to control the reader's subjectivity and to subjugate him. "To go open-mindedly" can be paraphrased into "trust what I say." To those who should find Hemingway's domination too hard to take, Hemingway also prescribes a process of gradual adaptation. The quest for truth could go step by step, just like the training of a connoisseur would start by tasting "Sweet vintage and progressed to plainer vintage having the quality of honesty and delicacy and the light body of it on your tongue" (*Death* 11). The real lesson Hemingway is conveying is to follow the author. Bound thus by Hemingway's spell, the reader would eventually find himself mesmerized.

In *The Sun Also Rises*, Hemingway coaxes his readers into believing the validity of his story. In introducing Robert Cohn into the narrative, Jake Barnes raises a suspicion of Cohn's past history and challenged legends about Cohn's college days:

I mistrust all frank and simple people, especially when their stories hold together, and I always had a suspicion that perhaps Robert Cohn had never been middleweight boxing champion, and that perhaps a horse had stepped on his face, or that maybe his mother had been frightened or seen something, or that he had, maybe, bumped something as a young child.... (4)

Yet, he quickly dispels the cloud of doubt by saying:

but I finally had somebody verify the story from Spider Kelly. Spider



Kelly not only remembered Cohn. He had often wondered what had become of him. (4)

The implication here is to enforce a total sovereignty of the narrator (Jake Barnes/Hemingway) as a truth giver, though at first the information may seem doubtful. Here Hemingway creates a total trust in his reader. This type of trust and intimacy "between just you and me" is further reinforc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toya and Jake Barnes:

He [Montoya] smiled again. He always smiled as though bull-fighting were a very special secret between the two of us; a rather shocking but really very deep secret that we knew about. He always smiled as though there were something lewd about the secret to outsiders, but that it was something that we understood. It would not do to people who would not understand. (131)

The strategy here is to get the reader yearning for a membership in a secret club, into which complete belief in Hemingway's narrative is the only passport. With this type of trust between Jake and Montoya; and complete trust between Hemingway and his reader--one can transcend and forgive anything as Jake further revealed:

Montoya could forgive anything of a bull-fighter who had *aficion*. He could forgive attacks of nerves, panic, bad unexplainable actions, all sort of lapses. For one who had *aficion* he could forgive anything. At once he forgave me all my friends. (132)

According to Bakhtin, in the process of speech,

...knows neither beginning nor end. The outwardly actualized utterance is an island rising from the boundless sea of inner speech; the dimensions and forms of this island are determined by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the utterance and its *audience*. Situation and audience make inner speech undergo actualization into some kind of specific outer expression that is directly included into an unverbilized behavioral context and in that context is amplified by actions, behavior, or verbal response of other participants of the utterance." (Morris 60)

This Bakhtinian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utterance, audience, inner speech, and outer action proves intriguing when applied to the case of Hemingway in what he did to achieve what he wanted to be. For Hemingway, writing is the existential means of being and the kind of writer he wants to be is an intimate friend of his reader. Thus Hemingway often presents himself as the one-and-only initiator to his reader, whom he often addresses as you (be it singular or plural) for a conversational ease. By so doing, Hemingway was able to transform the role of his general readers who relate to him through the words on the page from a visual level, to that of an audience who not only read but also see and watch.

Because of this strong belief in the creative power of writing, or to be exact--*his writing*, there are a lot of hyperbolic rhetorical devices in his comments on writing. He uses impe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heavily for the purpose of exaggeration. All, most, must, never, ever, are among the most frequent Hemingwayesque words. For example, Hemingway said in *How It Was*, "Nobody really knows or understands and nobody has ever said the secret. The secret is that it is poetry written into prose and it is the hardest of all things to do..." (352). As it clearly stands, the phrase "nobody has ever said the secret" functions as a hyperbolic spotlight on the soloist. The actual speaker of the statement, which is "I," never appears. Yet because of the contrast effect worked out by "nobody...ever," the hidden "I" naturally assumes importance. In a letter to Ivan Kashkin in 1935, Hemingway indicates: "... writing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do as well as it can be done. It is a *perpetual challenge* and it is *more difficult than anything* that I have ever done--so I do it (*Selected Letters* 419). In another occasion, Hemingway says to Charles Scribner Jr.:

But it [writing] is a *hell of a disease to be born with*. I like to do it. Which is even worse. That makes it from a disease into a vice. Then I want to do it *better than anybody* has ever done it which makes it into an obsession. (*Selected Letters* 503-504)

The emphasized phrases show how often Hemingway attempts to assume an authoritative voice. One more concluding example for the present purpose appears in *By-Line* where Hemingway says, "The *hard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do*

is to write straight honest prose on human beings" (183).

To a great extent, writing for Hemingway is a means of being; it does not just imitate life as is long upheld in the mimesis tradition; rather, writing creates lif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imagine which side Hemingway would take in the ever-lasting debate of whether life imitates art or art imitates life. "All good books are alike," Hemingway intimates:

in that they are truer than if they had really happened and after you are finished reading one you will feel that all that happened to you and afterwards it all belongs to you. (*By-Line* 184)

Clearly, Hemingway is giving literature its utmost value by allowing imagination to soar over truth or reality as the above quote would justify: "truer than they had really happened." Very early on, Hemingway seemed to have entertained the idea that writing creates reality instead of imitating it. "You see," Hemingway told his father, "I'm trying in all my stories to get the feeling of the actual life across--not to just depict life--or to criticize it--but to actually make it alive" (*Selected Letters* 153). It is Hemingway's belief that a good writer, a term which Hemingway refers to himself, creates like God. In a letter to Maxwell Perkins in 1940, Hemingway declared in magniloquence: "I don't like to write like God. It is only because you never do it, though, that the critics think you can't do it" (*Selected Letters* 514-515). Obviously, Hemingway has put the greatest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logos*. Writing is not something that he does; it is also all there is to him. It is what he is.

In the second chapter of *Nausea* by Jean Paul Sartre, "Consciousness of Existence," the protagonist Roquentin says of the nature of storytelling:

For the most trivial event to become an adventure,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start telling about it. This is what deceives people: a man is always a teller of stories, he lives surrounded by his stories and stories of others, he sees everything which happens to him through these stories; and he tries to live his life as if it were a story he was telling. But you have to choose: live or tell. (*Nausea* 34)

"To live his life as if it were a story he was telling" serves to illustrate Hemingway's life, in which living means telling and vice versa. The existential

dilemma in the form of a dichotomy--to live or to tell--did not trouble Hemingway at all because he had them both and with such a great success.

A picture of Hemingway is particularly suggestive of the readership of Hemingway--at a desk against a closet which has a full-length mirror on its door, Hemingway is reading a page on the typewriter, which his left hand is holding. His right elbow rests on the desk and his thumb and index finger spreads tightly against the curve of his beard. He is meditating. If one could step into the picture and see right behind Hemingway, he would see that the mirror shows only one fourth of Hemingway's reflection. But from the angle at which the picture is taken--Hemingway at the 9 o'clock position and his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at 2 o'clock--one actually sees more of his face in the mirror than the real counterpart sitting at his desk. Whatever Hemingway is typing at his desk, the deepest running drive is perhaps not how a writer should write, but rather how he would like to be read--just like the master reading his work so intently, he does not see himself in full in the mirror. In all the things that he has said and done, Hemingway has undoubtedly demonstrated how important writing is. However, the tricky part is that he subtly piles the idea of *all the readers* on top of *his readers* to endlessly expand the territory of readership. Furthermore, he also blends the importance of *his writing* with that of *writing in general* to make himself seem like the president of a Great Writers' Club.

All his life, Hemingway has been infatuated with the quest of truth, which he often equates with good/his writing. But then what is the nature of Hemingway's truth that has so obviously obsessed him? According to Carlos Baker:

Hemingway's idea about truth was a literary notion and what he meant by truth, I think, was how it looked to him at a particular time, in that particular place. This he wished to get and catch, as it were, in amber, forever, so that it would not be lost. But I think he would have been the first, or at least the second to admit that what he meant was not universal truth in the Aristotelian sense at all. (Brian 61)

As a matter of fact, truth for Hemingway is pragmatic in nature and is constantly self-modifying, which is similar to what William James notes in his *Pragmatism*:

A new opinion counts as "true" just in proportion as it gratifies the

individual's desire to assimilate the novel in his experience to his beliefs in stock. It must both lean on old truth and grasp new fact; and its success...in doing this, is a matter for the individual's appreciation.  
(Brooks 1533)

What Hemingway has proceed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is an existential/rhetorical situation where human beings are forever caught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utterance has come to mean existence or, perhaps the other way round. In the end, Hemingway did not have an answer, either, as he indicates in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by saying: "I am not gambling with it. Or maybe I am. Who knows?" (*The Paris Review*, June 1981, 96).

Perhaps, whether to gamble is not the question Hemingway has for his readers, nor for himself. The main point is that he has been clearly heard -- though sometimes not without confusion.

## Works Cited

- Bakhtin, Mikhail. *The Bakhtin Reader*. Ed. Pam Morris. London: Glossary Edward Arnold Ltd., 1994.
- .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Professing the New Rhetorics: A Source Book*. Ed. Theresa Enos and Stuart C. Brow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1994. 63-74.
- Brian, Denis. *The True Gen*. New York: Grove Publishing Inc., 1988.
- Brooks, Cleanth, R.W.B. Lewis and Robert Penn Warre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Makers and the Making*. Vol. 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 Brucoli, Matthew J. "Introduction." *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Ed. Matthew Brucoli.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ix-xii.
- .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the Hemingway-Maxwell Perkins Correspondenc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 Charvat, William. *The Profession of Authorship in America, 1800-1870: The Papers of William Charvat*. Ed. Matthew J. Brucoli. Columbus: Ohio

-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Biographia Literaria*. Ed. John Shawcro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 Darnton, Robert.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Reading in America*. Ed. Cathy N. Davi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27-51.
- Foucault, Michael. "What is an Author?"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inb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101-20.
- Hemingway, Ernest.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The Paris Review* (June 1981): 85-102.
- . *By-Line*. Ed. William Whit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7.
- . *Death in the Afternoon*. 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Corporation, 1932.
- . *Green Hills of Afric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5.
- . *A Moveable Fea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 . *Selected Letters*. Ed. Carlos Baker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1.
- . *The Sun Also Ris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6.
- . *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 Paris: Contact Publishing, 1923. Bloomfield Hills, Michigan: Bruccoli Clark Books, 1977.
- Hemingway, Mary. *How It Was*. New York: Knopf, 1976.
- O'Brien Sharon. "Becoming Noncanonical: The Case Against Willa Cather." *Reading in America*. Ed. Cathy N. David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240-58.
- Philips, Louis. "Homer, Hemingway, Joyce, and the Literary Hotline." *English Journal* 79.5 (September 1990): 85.
- Phillips, Larry W. *Ernest Hemingway on Writing*. New York: Touchstone, 1999.
- Raeburn, John. *Fame Became of Him: Hemingway as Public Writ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Railton, Stephen. *Authorship and Aud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eaves, Jessica. "'The Dusty Rocks of Kilimanjaro' Just Doesn't Have the Same Ring." *Time* 19 Feb. 2001.
- Sartre, Jean Paul. *Nausea*. London: H. Hamilton, 1962.

Stephens, Robert. Ed. *Ernest Hemingway: the Critical Reception*. New York: Burt Franklin & Co., Inc., 1977.

Voss, Frederick. *Picturing Hemingwa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9.

Wilson, Edmund. *The Shores of Ligh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 從閱讀到聽聞

## ——剖析海明威與讀者聯手對抗評論家的文學行銷策略

### 【提要】

在書市裏通常有種兩極的現象，就是暢銷排行榜上的常勝作家，往往評論家對其興趣缺缺；而獲得評論家青睞與好評的，作品卻又賣得很差。海明威就是要自己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但是既然評論家有不喜歡他的可能，所以他就索性藉著自己的高知名度，公然藐視他們。如此一來便不啻是在對讀者說：你們只要讀我的作品就好了，別管評論家怎麼說我。藉此，海明威得以與其讀者建立親密、直接的關係。至於那些評論家，雖然仍有擋路的可能，其影響力卻已被海明威「主權在我」的態勢大大削弱。由於海明威公然藐視評論家眾人皆知，這讓海明威看起來比自己實際的身影要大上很多。像是在牆上的巨大影子，藉著對比的效果，就把原本是兇猛的看門狗（評論家），變成了喵喵叫的小貓。

這篇論文一開始先討論海明威聲名的本質，繼而分析海明威擔心不被讀者接受的焦慮以及他的對應之道，最後闡述寫作對海明威而言其實已變成了一種生存的依據。作者希望透過本文的探討來解釋作家為什麼會受歡迎—或是透過自我吹捧及宣傳手法讓自己受歡迎—的原因。

**關鍵詞：**海明威的聲名 接受理論 接受焦慮 書寫是一種存在的方式 知名度 宣傳手法。



# 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 を育てるプログラム

工藤節子\*

## 【提要】

本稿は、現行の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育成の授業実践に検討を加え、先行研究をもとにプログラムの理論的構築を試みたものである。このプログラムでは、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異文化が接触する際に発生する問題を解決し相互理解をしていく能力と定義する。学生たち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モデルに基づいて誤解や摩擦の原因を分析し、問題解決の方略をもとに解決方法を考える。分析の視点を広げ、認識の深化を図るために、カルチャー・アシミレーターとジャーナル、アプローチを採用する。また、グループによるプロジェクト遂行を通して行動能力を養う。

キーワード：

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 誤解 摩擦 原因分析 問題解決の方略  
カルチャー・アシミレーター (Culture assimilator) ジャーナル・アプロ  
ーチ (Journal approach)

---

\*東海大學日文学系専任講師

## 一、はじめに

グローバル化社会を迎え、異なる文化背景の人間が相互交渉する機会が増えている。相互交渉には、言語能力だけではなく、異なる文化背景の人々と円滑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する能力が求められる。そのため、近年日本語教育の分野でも、異文化理解、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の育成を目指したさまざまな実践報告が聞か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しかし、何をを目指しているのか明らかにせず、あいまいなまま教育が進められているという指摘もある<sup>①</sup>。また、多くの実践報告は、日本国内における留学生の適応を目標にした報告が多い。日本国外の大学ではいったいどのようなニーズがあり、何を、どのような方法を用いて教育を実践していくべきであろうか。

日本との文化・学術交流、経済交流が増えることで、異なる文化背景の人と接触する機会が増えると予想される台湾の日本語学科の学生たちのために、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育成するという目標から、筆者は2年前から「溝通方法探討」という科目を担当し、日本語学科の中で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養成する教育の実践に関わっている。本稿では、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育成に関連する文献を参考に、現在行っている授業を批判的に検討し直し、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とは何か、どのようにこれを養成していく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 二、問題提起

### (一) 日本人に感じる異文化

日本語学科の学生たちは、日本について学び、日本人と接触する過程で、ど

<sup>①</sup> 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異文化理解の実践報告について、倉知(1996)は、表層やテクニカルな側面だけが教育実践に応用されるばかりで、根底に流れる理論が何か、教育に取り入れる根拠や妥当性について深い議論がされていないと述べている。

のよう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を感じているのだろうか。最近日本に短期、長期で留学する学生が増えているが、彼らの多くは日本で感じ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違和感やショックを以下のように語っている。

- (1)ホームステイの家族はとても親切だった。ところが、日曜日はゆっくり寝ていていいと言うので、10時頃まで寝ていて起きていたら、家族が朝ご飯を食べずに待っていてびっくりした。皆でご飯を食べるならもっと早く起きるように言うべきではないか。他の友人にも聞いた話だが、ホースステイをしてとてもよくしてもらった家族がその後の手紙でも「遊びに来て」と言うので、遊びに行ったら、あまり歓迎されなかったという。日本人は社交辞令が多くて建前と本音の区別がつかない。(3週間の夏期研修に参加した3年生の学生)
- (2)1年間日本に行っている間に、よく「台湾ってどこにあるの?」とか「台湾でも箸を使う?」と聞かれた。それが1回だけ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ショックを受けた。(1年間の交換留学から帰国した4年生の学生)
- (3)大学院の卒業証書をもらう手続きをしていた時に、国籍に台湾と書けないため、中国を選ば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し、それがいやなら空白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言われ空白を選んだが、非常に屈辱感を感じた。(日本の大学院の修士課程を終えて帰国した卒業生)

(1)は、日台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違いにとまどいを覚え、日本人の言動に不信感を抱き始めた例である②。(2)は(自身の日本に対する関心の高さに比して)日本人学生の台湾に対する、あまりの無知、無関心な状況を知りショックを受けた例、(3)は異国において自身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が否定されるという状況を体験した例である。このような事例からわかることは、異文化接触の場面には、言語能力が優れているだけでは解決できない問題が存在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もちろん、外国へ行ったら外国語で話すことがまず要求される。しかし、外国語が話せても相手の行動様式の違いにとまどいを覚えることは多く、自分の理解を超

---

② 中島(2001)は、台湾の学生と日本人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摩擦をとりあげ、こうした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の日本語教育の必要性を説いている。

えた行動様式や価値観に、否定的な評価を下すこともある。また、人と人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だけではなく、国家や世界をどう認識するか、その中で自身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は何か、どうやって自己実現を図っていくのか、を考えることを余儀なくされる。

しかも、人は他者と出会い、異なるシステムや価値観、異なる文化に接してはじめてこのような違いに気づくのである。ある時は不快感を抱き、摩擦に発展することもある。そしてこうした不快な気持ちを放置し続けることは、偏見をもたらすだけではなく、言語学習にも弊害となる可能性が高い。Schumann(1978a)は、目標言語話者に対して社会的距離、心理的距離<sup>③</sup>が大きいと言語習得が制限される、と述べているが、相手、相手国に対して否定的な印象を持ち続けることは、その後の相互理解、言語習得を妨げる恐れがある。従って、外国語を教育する学科では、言語を教えるだけではなく、こうした相互理解の重要性を教え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特に、こうした問題は、仮に解決の糸口が見つかったとしても、自分だけが改善すればい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相手も変わ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双方向性のある問題だけに、異なる文化をどう受け止め、どう自己調整をし、問題解決をはかっていくかが重要になる。

## (二) 思いこみの危険

次は、理解に関する問題である。河村(2002)は、日本語学科の学生の卒論作成指導に関わる中で、学生たちが日本について固定化された言説を鵜呑みにし、批判的に物事を見ることなく対象を理解したと誤ってしまいう問題を取り上げている。日本語学科の学生の多くが、日本や日本人をテーマに学習をする機会が多いとすれば、固定化した見方で対象を見るのではなく、多様な視点でものを見る視点を培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そうでなければ、異文化に接した時に勝手な思いこみやステレオタイプから抜け出せず、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悪化させる恐れもでてくる。特に、学習者が海外から日本を見る際には、書物やメディアを通じた理解が中心になるが、こうした情報には偏りがあること、日本事情は

<sup>③</sup> 社会的距離は、社会的優越さ、文化的融合、居住予定期間など8つの要因、心理的距離は言語ショック、文化ショックなど4つの情意要因をもってはかるとされる。

流動的であることを理解する必要がある。マスメディアの弊害については、御堂岡（1995）も、記者のニュース選択、受け手のニーズ、伝達効率の良さを優先するために、往々にして偏りを生じ、ステレオタイプが助長されることが多いと警告している。情報の受け手側は、マスメディア情報の限界を理解し、批判的に見る視点を養う必要がある。

### （三）身近にある異文化

異文化は実は身近にある。国を離れなければ異文化は存在しないと思っている学生は、身近にある異文化に気づかず、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を放置するケースが多い。異文化とは何か。倉知（1990）によれば、文化とは、ある特定の集団によって歴史的に取捨選択、継承、共有、修正され、有形無形に送付されてゆく精神活動のプロセスないしプロダクトであり、個々の人間の認知枠を通して認識されるものである。つまり、文化とは、認識する個人によって感じられ方や受け止め方も異なり、文化の認識は様々な人間の総合的体験を通じて個々のうちに形成されていく可変的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sup>④</sup>。従って、異文化とは、自分の帰属する文化からかけ離れた異質性というより、むしろ個として異質性を感じる文化であり、何に異質性を感じるかも人によって違うと言えるだろう。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異文化というと、まず「国と国の文化の違い」がとりあげられることが多い。河野（1999）は、よく言われる「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授業で、「〇〇人対××人」としてあらかじめ教師が「異文化」を設定してしまうことの危険性を指摘している。実際、同じ国の中でも、年齢、性別、環境、立場、役割による違いを伴った文化は存在し、そうした文化に所属する成員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違いに戸惑うことは多いのである。例えば、多くの学生から、台湾では自分の進むべき道や行動様式について、親の発言権が強く決定にさからえないという悩みをよく聞く。また、教師のやり方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仕方に不満を感じても、上下関係を重視するのか、或いは成績を管理されているためか、積極的に問題解決をしようとする学生は少ない。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授業では、こうした身近な問題も文

---

④ 倉知（1990）

化の違いの問題ととらえることで、文化とは何かをあらためて考えさせ、問題の解決を図る能力を身につけさせたい。

### 三、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の成果と問題点

それでは、このような課題を達成するために、どのような教育プログラムを作るべきであろうか。筆者は、2001年から「溝通方法探討」⑤という科目を担当し、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開発のプログラム化に携わってきた。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⑥では、異なる文化をもつ相手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あり方を考え、問題解決をはかるという目標で、文献にあ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摩擦の事例⑦に加え、自身の周りにあ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⑧、台湾社会に存在する外国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⑨について原因を分析し、問題の解決方法を考えるという授業を行った。この授業における成果は、原因分析などの討論を多くしたことで他者の見方・考え方を知る機会を得、より複眼的な思考が可能になったこと、さまざま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を分析することで、洞察力、観察力を向上させ、今後遭遇するであろう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摩擦にも一定の心の準備ができたこと、教室の外の見学やインタビューを通して、学生が自身のステレオタイプ化した見方に気づく事ができたことである。しかし、分析と討論が中心になり、学生自身が異文化や摩擦を体験する中で実際に解決策を見いだしていくような活動が少なかったこと、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摩擦を解決する上での理論的な考察が不足していたことが問題であった。総じて言えば、異文化について観察力・分析力が増したが、自身が異文化と共生するために必要な行動能力が育ったとは言い難い。例えば、ある学生たちは、グル

⑤ 日本語学科2年生に設けられた選択科目。

⑥ 工藤(2002)参照。

⑦ 石田(1999)、多田(1995)、直塚(1980)、及川(1999)、大橋(1992)から学生の理解能力を考慮して事例を抜粋。

⑧ グループワークをめぐるメンバーの葛藤、教師と学生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摩擦、親子の進路をめぐる摩擦、アメリカの短期留学での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との摩擦、レストランの店員と外国人客の対応における誤解、航空機の墜落をめぐる会社側と遺族の対立などがあつた。

⑨ 外籍新娘、外国人宣教師、留学生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調査した。

ープで課題を遂行する上で、相互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うまくいかず、課題達成をする上で困難を極めた。これは、他者という異文化とうまくつきあえないために摩擦を生じさせ、その後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修復できなかった例である。こうした身近にある異文化と共生していく力をどうやって培っていくかも考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四、プログラムの再設計

そこで、過去の実践を反省的にとらえなおし、新たなプログラムの開発を試みる。2001年プログラムの問題点の一つは、目指すべき能力が明確になっ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に起因すると思われる。目指すべき能力を明確にし、学生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問題も含めて問題を掘り下げる方法論を模索する。

### (一) 目標

まず、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とは何かを明らかにし、目標を明確にする。Ruben (1976) は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の要素として、7つの要素（敬意、判断を保留して他人とやりとりができること、知識や感情は個人に固有のものと認識できること、共感性、対人関係構築役割、相互作業を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ること、寛容性）を挙げている。また、山岸 (1995) 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スキルより深いレベルで能力をとらえる必要から、異文化対処力の重要性を訴え、文化的気づき（自分の行動やものの見方、考え方が自分の属する文化に規定されていることへの気づき、異なる文化や人々に対する関心の強さ）、自己調整能力（異質なものに対して自己を調整して対処できること）、状況調整能力（職務や対人関係など個人をとりまく一般的能力）、感受性（相手に対する配慮、情緒の安定、共感性）の4つが重要だとしている。ここで共通に挙げられるのは、他者や自文化の気づき、異文化接触の際の自己調整能力、対人関係能力である。特に、山岸の「自分の行動やものの見方が自分の属する文化に規定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知ること」は、問題解決のプロセスに必要な要件であり、Ruben の言う「判断を留

保して他人とのやりとりができること」も、異文化に出会った時に必要な態度だと言える。判断を留保せず安易に結論を下してしまうことは、ステレオタイプにつながるだけではなく、新しい世界を知る窓を閉じ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ため、複眼的な思考や不確かな状況にも耐えられる寛容性がもてるかどうか重要な鍵になるだろう。

一方、実践報告の例では、浜田他（2001）が日本の大学で実践する多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育成の授業で、その目標を「人類共通の課題に協力して取り組むために自己を知り、他者を知り、相互に尊重する関係を築きながら行動する能力」とし、相互に理解し行動する能力を掲げているが、こうした能力開発の目的を考えれば、異なる文化の「理解」にとどまるのではなく、異文化を知りお互いを尊重し「行動する」能力まで含めて目標化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ろう。

以上、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まとめ、この授業で目指す能力を「異なる文化をもつ相手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あり方を考え、互いに理解し共に生きる能力」と定義する。そして、これを達成するために以下のような認知・態度、知識、行動面での下位目標を掲げる。

### <認知・態度>

- ・自分にとっての異文化とは何かを考える。
- ・異質なものに接した時の心の状態を知りどう調整するか学ぶ。
- ・複眼的な思考を心がけ、判断を留保することを学ぶ。
- ・ステレオタイプの特徴と原因を知る。
- ・自分の行動やものの見方が自分の属する文化に規定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知る。

### <知識>

- ・異なる文化の人々が接する場合、どのような問題が発生し、どのような問題解決をしたらいいかを知る。
- ・異なる文化の接触を通して得られる有益なものを知る。
-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しくみを知り、摩擦の原因を分析し、その解決方法を考える。

### <行動>

- ・自身が抱え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問題の解決をするために、何が必要か



を考え、実際に実行してみる。

- ・他者との共同作業を通して相互に理解し、尊重しながら目標を達成することを学ぶ。

## (二) 授業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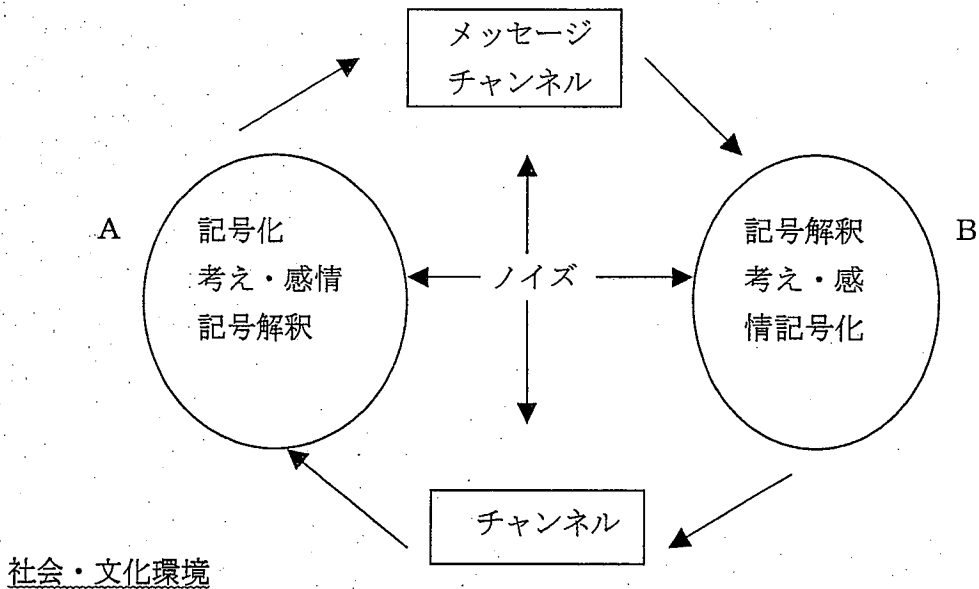
次に、目標をどう具体化するかを述べる。この中で、学生たちにとって比較的容易に達成できるのは知識面での目標であろう。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摩擦の事例は、文献なり、人から聞くなりして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認知・態度や行動面での達成は、認知面での変化や行動能力の育成が伴うため容易ではない。こうした点を考慮に入れ、異文化接触論の文献や実践例をもとに、以下のようにプログラムを構築する。

授業内容は大きく三つに分かれる。①最初のセッションは、異文化とは何かを考えること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仕組みを理解すること、②第二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摩擦を知り、その原因を考えること、③第三は問題解決をはかることである。正解は一つではなく、多元的な視点で解決方法を考えることで自身の抱える問題の解決も図る。

### 1. 第一セッション

この授業の目的を説明し、「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は何かを考えさせる。その際に、「文化とは何か」、「自分にとっての異文化」とは何かを考えさせる。また、日常の人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困難を感じたことを内省させる。次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は何か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モデルをもとに学習する。石井（1987）が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モデルとして採用しているのは、次ページのようなモデルであ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双方向性のものであり、送り手は考えや感情を言語その他の体系に記号化（encode）して、音声言語、文字言語、視、聴、嗅、味、触などから、適切なチャンネル（channel）を選んでメッセージを送る。受け手は、そのメッセージを記号解釈（decode）する。その後、自分の経験や文化の影響を受けた価値観に基づいて解釈した後に、それを相手にフィードバックする。この間、コミュニケーシ

オンを妨げる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ノイズ<sup>⑩</sup>が発生することがある。こうし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モデルで、さまざまな誤解や摩擦の事例の原因を分析して見る。例えば、異なる言語でしか話せない人間、いわゆる外国人同士の会話は、記号化、記号解釈の時点で、相手の言うことがわからず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ならない。ある程度外国語を知っていて自分では記号化したと以为自己でも、適切な表現ではない場合、或いは言葉が足りない場合、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ルールが異なる場合には、適切に記号解釈されないケースも出てくるだろう。また、親子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摩擦では、記号化、記号解釈に問題がなくても、価値観、経験、社会的通念によって意味解釈に齟齬を生じることが多い。



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モデル (『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石井敏 (1987) p.69)

ところで、記号化には言語以外に顔の表情、身振り、相手との間の取り方など非言語的手段もある。人間の情報理解の65%は、非言語的

<sup>⑩</sup>日中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けるノイズの例は陳岩 (2002) に詳しい。

手段を通したものとされるが<sup>①</sup>、外国語を学ぶ学生は、言語ができない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ないと信じ込んでいる学生が多いため、こうした手段を使って積極的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図るよう勧めるのも、このセッションの目的の一つである。

## 2. 第二セッション

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関連書物や映画、ドラマ、ニュース、新聞に出てく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摩擦の事例を紹介する中で、学生に自分の経験を振り返らせ、身近に存在す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に気づかせる。尚、ここでは、言語文化、社会習慣、考え方・価値観の違い、情報量の違い、ステレオタイプ化された言動に見られる事例を、なるべくバランスよくとりあげる。また、年齢や性、役割の違い以外に政治的対立、利害の対立がもとになっている事例も取り上げ、誤解や摩擦が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どの部分で、なぜ、どのように発生したかについて分析をする。長谷川（1994）は、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教育のために作成されたビデオを使った実践報告をしている。これは、ある日本人と日本人とは異なる文化的背景を持つ人物を登場させ、相互交流の過程において生じる誤解や摩擦などの現象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それを見た学生が原因を考えるとというもので、個人が無意識のうちに自文化の価値観や通念に縛られて行動していることを気づかせるものである。こうしたビデオは、顔の表情や、話し方、雰囲気などがわかりやすいため、臨場感をかきたてるだけではなく、目的を絞った討論ができるので大変有効であろう<sup>②</sup>。

## 3. 第二セッション 事例の分析を深め、認知・態度育成に貢献する手法

こうした教室活動以外に、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では、教室の外に出て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観察する、当事者に直接インタビューをする、調査にでかける、などの活動を行った。メディアや書物からだけ

① マジョリー・F・ヴァーガス（1987）

② 日本で使われるのは欧米人を登場させたものが多いが、台湾で使う場合は台湾人を登場させたビデオを作成するのが望ましい。

ではなく、実際に自分の目で見て認識をしていく活動を重要と考えるからである。こうした活動は、学生たちの観察力を研ぎ澄まし、思考を活性化させ、認識の変化に貢献する可能性をもっていることが、学生たちのノートからもうかがわれる。以下は、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で学生たちが教室外の活動の後に書いたノート⑬の一部である。

「私たちは子供達と一緒に輪になって座り、台湾と日本の違うところについて話した。その中で彼らの感覚は率直だった。でも私は彼らが日本のほうを偏愛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た。これは自分の中でもう一度検討してみるべきことだと思った」(台中の日本人学校の授業に参加した日のある学生のノート)

「異なる文化背景の人間がいっしょに生活をすると食いちがいや誤解が多いと思うが、今日の彼らの話を聞いて、私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障害が発生するのは悪いことではないと思った。少しして再び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始めた時、彼らはもっと多くのことを学ぶ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う。国際結婚も悪くないなと思った」(国際結婚をしている夫婦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問題を聞いた後の学生)

「インタビューに行って一番大きな収穫は、僕の考え方が変わったことかもしれない。外籍新娘⑭を相手の結婚について、僕たちはいいイメージをもっていなかったが、実際に話をしてみても、彼らは一生懸命お互いを理解する努力をして生活を築いていることを知った。愛があれば国境は超えられると思った。」(外国人花嫁の配偶者に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た男子学生)

「今日の話を聞くとあまり問題がなさそうだったが、これは表面的な見方ではないか。・・・私がちょっといやだと思ったのは、奥さんのことを「おとなしくていい子⑮」と言っている外籍新娘の夫が多かったことだ。「おとなしくていい子」というのは、子供に対していう言葉ではないか。やっぱり外籍新娘をもらう結婚は、金銭が作り上げた虚栄か。」

⑬ 活動の後に感想や疑問、意見などを自由にノートに書かせたもの。原文は中国語。

⑭ 台湾に近年増えている東南アジアからの花嫁たちを指す。

⑮ 「很乖」という中国語。

「(外国人花嫁の配偶者に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た女子学生)

「今日の先輩の話を聞いて(日本での留学生生活に)強烈な異文化を感じた。でも別の角度から見れば、こうした経験は自身の文化の外に出てはじめてわかることだと思う。こうした摩擦は自分に「化学変化」をもたらすと思うので、おもしろい気もする」(先輩による日本留学時代に体験した摩擦を聞いた学生)などである。

これらのノートは、他者の生き方に触発された学生たちの思考過程や心理状態を、教師が知る教育的手段になるだけではなく、学生たちにとっては、自らの思考過程を書くことで内省し、その日の印象をさらに鮮明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人は書くことで自分と対話し既成の知識を更新し、記憶を強化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からである。倉知(1991)は、「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開発のために」と題する論文の中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そのものの深層構造や異文化接触から、異文化理解に至る学習者の心的な過程を重視した教育活動を展開させるためには、学習者の目的文化との接触の機会を拡大するだけではなく、接触の深化をも同様に追求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と述べ、学習者が自身の心理状態をつづるジャーナル・アプローチ(journal approach)を提唱している。倉知の述べるジャーナル・アプローチは、学習者の日本語による日記(ジャーナル)に教師が内容的なフィードバックを与え、教師と学生が相互交渉を繰り返していくというもので、この授業で活動後に書かせているノートとは基本的に性質の異なるものだが、体験を綴りそこで感じたこと、考えたことを書き記すことで内省を深め、思考を活性化する役割があるという点では共通している。しかし、倉知が述べるように学習者が書いたものに対して教師が個別にフィードバックを与えていくことは重要であろう。2001年の授業では個別にフィードバックをする時間的ゆとりがなかったが、今後は、学生の認識の変化や意識の深化を図るために、教師がノートの中でできる限りのフィードバックを与えつつ、必要があればクラスで取り上げ、全員の討論で内容を深めていきたい。いずれにしても、こうしたジャーナル・アプローチの応用は、自身との対話を深め、文化への気づき、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摩擦に潜む問題の深い分析を可能にする方法論である。

#### 4. 第三セッション

最後に、これまでの知識や分析、討論で培った知見をもとに問題の解決方法を探る。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では、カルチャー・アシミレーターの手法を取り上げ、原因の分析と解決策を図る活動を行った。カルチャー・アシミレーターとは、アメリカのトリアンディス(Triandis, H.C.)らが開発した手法で、多くは、二つの文化における習慣の違いや誤解や摩擦の事例を具体的に描写した読み物と、それに対する質問及びその答えとなる4つの解釈、そしてそれに対する解説をつけた異文化適応のトレーニングの教材<sup>16</sup>である。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では、事例として挙げられた身近にあ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について、4つの解釈及び解決方法もグループごとに作らせて発表させたが、同じ事例でもグループによって解釈が異なるため、多様な視点を学ぶことができる。カルチャー・アシミレーターの手法については、自分の文化を捨てさせ、新しい文化の見方(認知のしかた)を強制する訓練であるという批判<sup>17</sup>もあるが、カルチャー・アシミレーターを学生たちに作成させるという手法をとると、逆に多様な見方が存在することを確認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多様な見方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は、安易に結論づけない、批判的に検討し直すという視点の育成にもつながり、効果的である。

#### 5. 第三セッション 問題解決に向けた分析

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摩擦には、感情的な問題や心理的な葛藤が伴い、さまざまな要因が複雑に絡み合っているため、その解決方法を探るのは容易ではない。ここでは正しい答えを出すことが目的ではなく、答えを探すために考えるプロセスに意義があるのだが、それにしても社会的経験の少ない学生たちだけで解決方法を考えるのは困難を極める。そこで、ある程度解決の糸口になるような枠組みを教師が提示す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異文化を体験した人たちがどのような摩擦を生み、その結果どのようなことが発生しているのか、また、それをどのように克服したかなど、異文化接触の研究の一部を紹介するのも一つの方

<sup>16</sup> Culture assimilator. 三角(1997)に実践報告例に詳しい。『外国人留学生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ハンドブック』(1992)もこの形式で書かれている。

<sup>17</sup> 佐野(1992)

法である。例えば、新倉（2001）は、「在日留学生の対人葛藤と解決ストラテジー」において、心理学の知見をもとに留学生と日本人との間で生じる異文化間葛藤を分析し、どのような解決方略を用いているかを調査した。それによれば、方略には、説明、説得を含む総合方略、懐柔方略、分配方略、攻撃方略、同調、回避、第三者介入など7つの方略がある。例えば、指導教官との葛藤が生じた場合、社会的な上下関係があることもあって、留学生の多くが「同調」、「回避」方略を採用しているという。ただし、こうした方略はストレスを増幅させ、摩擦をさらに深化させる結果になることが予想され、根本的な問題解決にならない。金田（1998）も、留学生が異文化に接触する時どのような対応をしているかを調査しているが、摩擦の認知からその対応まで9つの枠組み<sup>18</sup>を作り分析している。この調査によれば、摩擦を体験した人は、問題解決に至らない「摩擦回避」や「不快な気持ちを抱き続ける」などの対応をしていることが多く、摩擦解決の難しさをあらためて感じさせる。しかし、こうした消極的な方略も一時的なものではあるが、「方略」の一つであり、また、こうした方略をとる場合は抜本的な解決が望めないため、どうしたら本当に解決できるかを討論する必要がある。例えば、こうした問題について、既に同じ問題に遭遇した人で、問題解決をした人や心理学や異文化接触研究の専門家を招いて話を聞くこともできる。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では、日本に行った先輩に日本で遭遇した摩擦の話を聞くと同時に「あなたならどうやってこ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か」を皆で討議し、その後本人がどのように問題解決をしたかを聞いた。こうした方法は身近なレベルで他者の生き方を学び、問題解決の方法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今後も積極的に取り入れていきたい。

また第一セッションでとりあげた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モデルにたちかえって問題の所在を討論するときに、AとBの考えや価値観が違うから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が発生するのだ、という短絡的な考え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と解決はできなくなるため、この図をさらに深

<sup>18</sup> 誤解が起こった時点での対応で①放置するが記憶に残る、②自分で解釈・理解につとめる、③解釈を他者に求める、④不快になるが何も言えない、⑤うまくやりかえず・切り抜ける、⑥不平を言う、不快な気持ちを表現する、誤解を経験した後の対応で、⑦納得し、不快な感情はなくなる、⑧不快な気持ちを抱き続ける、⑨同様の摩擦を回避する

く具体的に解釈し直すことが求められる。例えば、言葉や文化習慣が違っても、つたない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通して心が通じ合うことはあり、逆に言葉が通じていても、偏見やステレオタイプ化した見方、権力を伴った行動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ゆがめ、阻害する原因になるため、こうしたテーマも取り上げ討論したい。

## 6. 行動能力の育成

異文化を理解するだけでなく異文化の中で問題解決を図り、自己実現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このプログラムの最終的な目標である。そのためには、既に述べた三つのセッションの中に、学生たちが主体的に関わり、目標を達成していけるようなプログラムを組み入れていく必要がある。浜田他(2001)の実践報告では、留学生と日本人学生が共に、テーマ設定、討論、情報収集、報告といった一連のプロジェクトを通して、相互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すること、行動すること、文化に気づくことを奨励している。目指すプログラムでも、なるべく多様な文化背景をもつ学生がいっしょに作業できるような環境を作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例えば、共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テーマを決め、プロジェクトを遂行する過程で、自分を知り、他者に感じた異文化とどう取り組み、問題解決していくかを内省していくという活動は、非常に有効な方法である。また、こうした共同のプロジェクト以外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摩擦の事例、問題解決の討論に、ゲストを呼び、実際に話を聞くというセッションがあるが、こうしたゲストの手配や交流の企画、教室の外への調査に際しての計画運営を、学生に任せるという方法も有効である。現在進行中の2002年のプログラムでは、学生がゲストと交渉し調査の場所を探すという活動を進めているが、学生たちは初めての経験に不安を抱きながらも、意欲的にこうした作業に関わり、行動能力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を見せている。これ以外に、学生自身が抱え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を授業のはじめに確認して、それを1年間活動する中で内省し問題解決を図っていくという課題を個別に与えることも重要である。自身の抱え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を、クラスメートや教師に開示することは難しく、教師もどのようにアドバイスし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ない、という困難はある。しかし、授業の中で見聞きすること、経験をす



ること、討論することで、解決の糸口を探すことは可能であり、何よりも、自分自身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問題に気づき、解決をはかっていくことが真の行動能力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 (三) 評価

評価とは何か。古川(1998)によれば、評価は測定、評価、調整の3つの段階から成る。ある目標に向けて程度や数値を測定し、その意味を解釈し改善のために調整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り、測定の方法は2種類考えられる。一つは、例えば、言語習得を目指したプログラムであれば、テストで言語能力を測定したりする他者評価がある。もう一つの測定方法は、自身がその外国語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中で使ってみて達成感を得たり落ち込んだりする、という自己評価である。そして、それを解釈して、どういう方法で学習をするかを考え、方法を考え直したりすることが調整というステップになるのだろう。では、この授業の目標とは何か。この授業では、認知・態度、知識、行動と3つの領域で目標を掲げたが、言語能力の測定と違い、目に見えない能力をどうやって評価するかが問題になる。山岸他(1992)は、異文化対処力を測定する試みを報告しているが、これは質問紙に事例を提示し、その場面でどのように行動するかを尋ねたり、SD法の反応のパターンを分析したりする方法である。山岸らは、その試みで一定の妥当性と有用性を示すデータが得られたというが、こうした研究はまだ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あり、異文化間能力の概念化と測定方法の模索が今後もまだ続くと言う。また、Koester, J., & Olebe, M. (1988) も、The Behavioral Assessment Scal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BASIC)という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間能力を測るテストについて言及しているが、このテストが一定の信頼性はあるものの実施上の困難があること、他者評価であることで当事者の認識がおろそかになる、などの限界を指摘している。こうした点から考えると、内省の深さや態度の変化、行動能力など、目に見えない能力を他者が測るのは、現時点では大変難しい。従って、評価は、他者評価(教師、クラスメート)と自己評価(自分自身)を総合して行うのが妥当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例えば、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では、観察者である教師が学生たちの書いたノートやレポート、行動を評価し、口頭発表で学

生同士が評価したものを総合的に評価し成績に反映させた。一方、自己評価の部分は成績には反映しないが、学生がこの授業を通してさまざまな他者と出会い、いっしょに何かをやっていく中で自身の認識の変化や学習したことを感じ取っていくものである。例えば、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に参加した学生たちは、自身が学んだことについて、以下のように記述している。

「以前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は言葉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たが、実はジェスチャーとか、いろいろな手段が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のは、この授業をとったおかげだ」

「この授業でいろいろな人の意見を聞くうちに、相手と話をしているときに、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もすぐ結論を出さずに、どうして?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るようになった」

「この授業では思考能力が増えたし、一つの物事には視点はたくさん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これは形がないけど、ものすごく役にたつことだと思う。それから報告能力も高まったと思う」

「これからは摩擦に遭った時にも冷静に分析していい方法を見つけようと思う。他には戸外の調査に出かけるのは、いい経験の累積になると思う。内容の理解だけではなく、物事の対処のしかた、問題解決のし方を学ぶ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う」

「クラスメートといっしょに討論したり発表の準備をしたりして、他の人といっしょに行動することを学べてとてもよかった」

「摩擦や誤解の原因は一つではないことを知った。こうした事例の分析を通して自分ならどうするかを考えたが、これは今後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大きな助けになると思う」

これらのコメントがどの程度信頼性のあるものかは誰にもわからないが、本人が今後他者と出会い、自身と向き合い、外の世界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していく中で生かされていく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今後はしかし、他者との出会いと異質性との格闘、調整、行動能力という実

際の能力をどうやって自己評価していくか、どうやってその気づきを促していくか、をさらに明確に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

## 五、おわりに

以上、日本語学科で学ぶ学生を対象に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の育成を目指したプログラムを提案した。2001年のプログラムを批判的に見なおし、異文化の認識の深化と問題解決を促す方法論を探る中でプログラムの再構築を試みた。今回の試案をもとに、さらなる改善に向けて実践を積み重ねていきたい。しかし、当然のことながら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は、こうしたプログラムだけで育成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く、日常生活のさまざまな人との出会いや体験を通して育まれるものである。教師は、学生たちがそうした日常性の中で出会う異文化経験を生かして行動能力を身につけていけるように、見守っていきたいものである。

尚、今回のプログラムでは、異文化をどう認知し、理解、調整を進めるかを中心に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考えたが、言語文化の違いがもたらす誤解も少なくないため<sup>19</sup>、日本と台湾の言語習慣の違いに焦点をあてた研究も今後進めていきたい。

またプログラムの発展性について言えば、言語運用能力育成との関連でこのプログラムを行っていく可能性も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る。今回のプログラムは、会話や作文のような言語技能の習得を目指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ため、資料や教師の指示を日本語で行う以外、2年生の日本語力を考慮して、学生の発表や討論、ノートやレポートの記述を中国語で行っている。しかし、学生のレベルに合わせて、討論やレポート執筆も日本語で行う活動に発展させることもできる。その場合は、専門の学習と言語の学習を組み合わせた部分的イマージョンプログラム<sup>20</sup>として実行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り、今後はこうした可能性にも挑戦してみたい。

<sup>19</sup> 西原 (1994) に詳しい。

<sup>20</sup> Immersion program. 専門科目を第二言語を使って教える方法。バイリンガル教育でよく使われるが、一般の言語教育に応用されることもある。専門科目の内容を深めながら第二言語の習得が進むと言われている。尾崎、J.V.ネウストブニー (1986) に詳しい。

## 参考文献

- 石田武臣 (1999) 『外国人問題弁護ノート』 アルク
- 石井敏他 (1987) 『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有斐閣選書
- 及川朋子他 (1999) 『おどろ気ももの木台湾日記』 毎日新聞社
- 大橋敏子他 (1992) 『外国人留学生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ハンドブック』 アルク
- 尾崎明人、J. V. ネウストプニー (1986) 「インターアクションのための日本語教育—イマージョンプログラムの試み—」 『日本語教育』 59号 日本語教育学会
- 金田智子 (1998) 「異文化と接触するとき」 『留学生教育』 第3号 広島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
- 河村裕之 (2002) 「異文化理解を考える—日本文系卒業生論文指導にまつわる一視点—」 『淡江日本論叢』 第9輯 淡江大学
- 倉知曉美 (1990) 「学習者の異文化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日本語教育』 71号 日本語教育学会
- (1991) 「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開発のために」 『異文化間教育』 5号 アカデミア出版会
- (1996) 「異文化間教育学と日本語・日本事情の接点を求めて」 『異文化間教育』 10号 アカデミア出版会
- 工藤節子 (2002) 「日本語学科における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授業の実際」 東アジア日語教育研究会
- 河野理恵 (1999) 「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しての「日本事情」 『21世紀の「日本事情」創刊号』
- 佐野秀樹 (1992) 「カルチャーアシミレーター」 『現代のエスプリ—国際化と異文化教育—』 至文堂
- 多田洋子 (1995) 『外国人留学生のカルチャーショック』 南雲堂
- 陳岩 (2002) 「中日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ける自文化・自言語のノイズについて」
- (2001) 「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ける文化能力養成について」 『北星学園大学経済学部北星論集』 第39号

- 直塚玲子 (1980) 『欧米人が沈黙するとき』大修館
- 中島清明 (2001) 「気持ちに通じる日本語へ向けた日本語教育」  
『中日文化』第20号 中国文化大学
- 西原鈴子 (1994) 「在日外国人と日本との言語行動的接触における相互  
誤解のメカニズム」  
平成5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B)研究成果  
報告書
- 新倉涼子 (2001) 「在日留学生の対人葛藤と解決ストラテジー」  
『千葉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第7号
- 長谷川典子(1994) 「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教育のためのビデオの  
制作」  
『異文化間教育』8号 アカデミア出版会
- 浜田麻里他 (1992) 「多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養うために」  
『大阪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研究論集 多文化社会と  
留学生交流』第5号
- 古川ちかし (1998) 「自己評価—自律とネットワーク」『社会の中の日本  
語教育』凡人社
- マジョリー・F・ヴァーガス (1987) 『非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新  
潮選書
- 三角友子 (1997) 「日本語学習者に向けたビデオ・カルチャー・アシミ  
レーター」の作成」  
『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第10号 神田外  
語大学
- 御堂岡潔 (1995) 「異文化間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異文化接触の心  
理学』川島書店
- 山岸みどり (1995) 「異文化間能力とその育成」『異文化接触の心理学』  
川島書店
- 山岸みどり他 (1992) 「異文化間能力測定の試み」  
『現代のエスプリ—国際化と異文化教育—』至文堂
- Koester, j., & O'lebe, M. (1988) The behavioral assessment scale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2.

- Ruben, B. D. (1976) Assessing communication competency. *Groups & Organization Studies, 1,*
- Ruben, B. D. (1989). The study of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Tradition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3.*
- Schumann, J. H. (1978a) *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bury House, Rowley, Mass.

# 培育異文化間溝通能力之課程設計

## 【提要】

本文以至目前為止之相關研究及筆者之實踐經驗為基礎，檢討關於養成異文化間溝通能力課程之課題，並嘗試建構課程設計之理論架構。本文將異文化間溝通能力定義為，解決於接觸異文化時所生問題及尋求相互理解之能力。本課程之設計內容為，使學生以溝通模式為基礎，分析異文化間溝通上產生誤解與摩擦之原因、並以解決問題之策略思考解決方法。為使學生增廣分析之視點、加深對問題之認識，本課程採用 culture assimilator 與學習記錄(journal approach)方法，同時亦透過使學生組成小組完成其預定計畫之方法，培養學生付諸行動的能力。

**關鍵詞：**異文化間溝通能力 誤解 摩擦 原因分析 解決問題策略  
Culture assimilator 學習記錄 (Journal approach)。

# The programme aimed for foster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discuss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fostering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present the refined program for it. I defin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s an ability to solve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o seek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flict using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to implement the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to solve conflicts. Culture assimilator and Journal approach will aid students in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analyzing aspects and understanding. In addition, the group project will require cooperation of participants, and will increase their performance ability.

**Keywords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Misunderstanding, Conflict, Analysis of cause,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Culture assimilator, Journal approach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44巻 頁362-389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年7月

# 『日本書紀』判断文

北川修一\*

## 【提要】

これまで『日本書紀』の区分論においては音韻的特徴、用語、慣用表現などによって成果があげられてきたが、文法についてはごく一部の項目が検討されたのみであった。拙稿では最も使用頻度の高い文法事項の一つである判断文を対象に、『日本書紀』が漢語史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に位置付けできるかを明らかにし、『日本書紀』の執筆者が規範とした言語を確認した上で、いわゆる倭習の各巻毎における分布、また倭習を引き起こした起因などについて考察した。

キーワード：漢語史、判断文、“是”、「は」、倭習

---

\*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学系講師

## 一、はじめに

現代漢語の判断文は“我是学生。”のように、“是”を系詞として用いる。しかし、上古漢語①（先秦から西漢まで）では、このような“是”は未発達であり、NP1とNP2（NPは名詞成分を表わす）を並列させれば、NP1はNP2であるという判断文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た。また判断文をより明確にするために、主語②の後に“者”或いは、文末に“也”という標識を用いることもあった。現代漢語の判断文に用いる“是”は西漢を経て、六朝時期には非常に普遍的に文献に用いられる形式である。拙稿で判断文と称する場合はこの“是”字を用いた判断文を指す。

拙稿の目的は第1には『日本書紀』において、このような判断文がどのよう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か、判断文を基準として『日本書紀』は漢語史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に位置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という問題を検討することである。また更に附言すれば、拙稿は系詞“是”の成立と発達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の基礎のもとに、『日本書紀』がそれらにどのように位置付けられるかを描写したものであるため、『日本書紀』の中で、漢語史において先行研究で十分に検討されていない項目を発見した場合には、判断を今後の研究に待つことにする。非中国人の手になる部分、成分を多く含む『日本書紀』により、漢語史における問題を検討することは危険だからである。

また第2の目的は、漢語文献とは言っても、日本において非中国人（日本人、或いは朝鮮半島からの帰化人の可能性も大きい）によって執

① 拙稿では中国語を意味するのに、時に漢語という呼称を用いる。単独で用いる時はこれまで一般に用いられている中国語という用語を用いるが、中国語の文法史の時代区分においては、中国において「上古漢語」（先秦から漢代）「中古漢語」（六朝時期）「近代漢語」（唐代から元明あたりまで）「現代漢語」（清から現代まで）のように区分、命名され、日本でもそれをそのまま「漢語」として受け入れていることが多いこと、またこれを「中古中国語」（音韻研究で六朝から宋代）「近代中国語」（日中語彙交流史で清末民初）のように便宜的に「漢語」を「中国語」と置き換えた場合、括弧内に記したように、中国語研究における別分野での用語と混乱しやすいためである。

② 「は」によって示される成分は主題であるが、判断文をなす「は」は主語とみておいて問題はないであろう。拙稿で主語と称するのは、拙稿「6. “是”＋形容詞・動詞」で述べた倭習で他の格成分の主題化が見られるため、それと区別するためでもある。

筆された部分には、これまで幾つかの指摘がなされているように、本来の漢語の語彙、語法からは逸脱した、いわゆる倭習が見られるのであるが、判断文に関連する倭習にはどのような現象が見られるか、また中国人執筆部分（ $\alpha$ 群）と非中国人執筆部分（ $\beta$ 群）にどのような用法上の違いがあるかを指摘することである③。

この第2の目的は、前述の第1の目的と大きく関連する。つまり、『日本書紀』において、所謂漢文（中国語で言う“文言”）と異なる言語現象を発見した場合、それが所謂倭習であるのか、それとも中国語のもともとの変化であるのか、これまでの研究では厳密に分けていないものもあるからである。拙稿では、倭習の抽出と検討は『日本書紀』が漢語史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に位置付けられるか、換言すれば『日本書紀』の執筆者が基準とした中国語はどの時代のどのような言語であったかを確認してから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考えるからである④。

## 二、指示代名詞 + “是”

漢語史において、判断文に用いられる“是”がいつ現われたかは意見の分かれるところであるが⑤、指示代名詞を主語に持つということは系詞“是”が完成したとする非常に重要な基準となる。何故ならば、系詞“是”はもともと指示代名詞から派生したため、「指示代名詞 + “是”」という形式が見られた場合、“是”も指示代名詞と考えると、「指示代名詞 + 指示代名詞」となり、語法上矛盾が生じるからである。先秦の出土文献に“是是…”という形式が見られることから先秦時期のある方言では既に系詞“是”が完成していたとする説もあるが、他の

③ 『日本書紀』各巻の区分論には諸説あるが、拙稿の目的は森博達氏の中国人による $\alpha$ 群と非中国人による $\beta$ 群という区分の方法に近いので、これに習った。詳しくは森博達1999などを参照。尚、『日本書紀』は国史大系本を用い、引用の際には前後巻の別と頁数、及び $\alpha$  $\beta$ の区分を括弧内に記した。

④ この倭習と中国語における変遷（中国の各時代の口語）の問題については北川修一2003で検討し、愚見を述べた。

⑤ これまでの諸説をまとめ、検討したものに郭錫良1990があり、詳しい。これまでの研究 系詞“是”の成立時期とその認定基準に重点がおかれ、その派生的用法については必ずしも詳細に描写されているとはいえず、拙稿本文に見ていくように、『日本書紀』の用法を中国語史に照らす場合も、求むべき基準が見あたらない場合が多かった。中国語史における問題は今後の課題としておきたい。

語法現象から見ると先秦出土文献の語法は先秦伝文献の語法と大きく異なる部分があり、これをそのまま伝世文献を主とした漢語史の中で位置づけることには問題なしとは言えない側面もあり⑥、出土文献の語法の全面的な研究が待たれる。

『日本書紀』で指示代名詞が“是”字判断文の主語となる例は多くない。

### “此是”（3例）

- (1) 此是驅使奴等所為，非新羅。（後 p.111 α）
- (2) 此是經歷數年上宮王等為蘇我鞍作囿於胆駒山之兆也。（後 p.205 α）
- (3) 此是伊勢大神之使。（後 p.207 α）

“此”が主語となる場合は、上古漢語と同じく、“是”を用いない場合が多い。“則”“誠”“即”“皆”などの副詞を用いる場合もある。

### “此○”（副詞を用いない例、9例）

- (4) 此筑紫水沼君等祭神也。（前 p.31 β）
- (5) 此太古之遺法也。（前 p.38 β）
- (6) 此出雲臣，土師連等遠祖也。（前 p.39 β）
- (7) 此茨城国造，額田部連等遠祖也。（前 p.39 β）
- (8) 此大三輪之神也。（前 p.48 β）
- (9) 此世人所謂反矢可畏之緣也。（前 p.61 β）（前 p.67 β）
- (10) 此古之遺式也。（前 p.119 β）
- (11) 此物部氏之遠祖也。（前 p.128 β）

### “此則”（4例）

- (12) 此則筑紫胸肩君等所祭神是也。（前 p.27 β）
- (13) 此則美濃国喪山是也。（前 p.67 β）
- (14) 此則吉野首部始祖也。（前 p.119 β）
- (15) 此則吉野国隙部始祖也。（前 p.119 β）

⑥ 例えば、伝世文献では、反復疑問文は唐代で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るが、先秦出土文献では既にこれが見られると言う。北川修一 2001:pp.250-251 参照。

“此誠”（1例）

（16）此誠千載一会之期。（後 p. 70 α）

“此即”（2例）

（17）此即伊勢崇秘之大神也。（前 p. 35 β）

（18）此即倭直部始祖也。（前 p. 113 β）

“此皆”（3例）

（19）此皆良田，雖經霖旱，無所損傷。（前 p. 36 β）

（20）此皆礪地，雨則流之，旱則焦之。（前 p. 36 β）

（21）此皆汝之功也。（後 p. 147 β）

“此乃”（1例）

（22）此乃人生常分。（前 p. 390 α）

“此是”は以上のように3例のみであったが、全てα群に見られた。“是”を持たない判断文はα群に2例、β群に18例である。このように“此”を主語に持つ判断文は表現上、β群にも必要であった。であるにも関わらず、β群に“此是”が見られない理由として次のことが考えられる。

“是”には指示代名詞の用法と、系詞の用法があり、以下に見るように『日本書紀』ではα群β群を分たず、系詞は多く見られる。そのためβ群の筆者は、“是”の系詞の用法を認識しながらも、“是”には別に指示代名詞としての用法があるため、主語が“此”である場合、“是”の指示代名詞としての用法が意識され、例えば現代の漢文訓読で行われる「これはこれ…」というような二つの近指の指示代名詞が並ぶことを避けた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 三、人称代名詞 + “是”

先に述べたように、指示代名詞が主語となった用例は“是”の指示代名詞から文法成分へと変化した一つの重要な基準であるが、人称代名

詞も、“是”に先立つNPが既に、複雑な形式でないことから、既に系詞と見なす基準となる。

“汝是”（8例）

- (23) 天照大神怒甚之曰：“汝是悪神。”（前 p. 23β）
- (24) 汝是躬行濁悪而見逐謫者。（前 p. 38β）
- (25) 汝是可畏之神。（前 p. 43β）
- (26) 是時大己貴問曰：“然則汝是誰耶？”（前 p. 48β）
- (27) 迺知汝是汝之幸魂奇魂。（前 p. 48β）
- (28) 汝是目勝於人者。（前 p. 70β）
- (29) 汝是誰之子耶。（前 p. 75β）
- (30) 汝是貴神。（後 p. 49α）

“吾是”（15例）

- (31) 吾是男子。（前 p. 5β）
- (32) 吾是国神。（前 p. 40β）
- (33) 对曰：“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前 p. 48β）
- (34) 吾是天神之子。（前 p. 79β）（前 p. 79β）（前 p. 80β）（前 p. 80β）
- (35) 吾是天神之孫也。（前 p. 89β）
- (36) 吾是汝兄。（前 p. 92β）
- (37) 吾是乃兄。（前 p. 140β）
- (38) 吾則是国王也。（前 p. 178β）
- (39) 吾是国中之強力也。（前 p. 211β）
- (40) 吾是大足彦天皇之子也。（前 p. 211β）
- (41) 吾是現国人之子也。（前 p. 216β）
- (42) 吾是去来穗天皇之孫。（前 p. 401α）

“我是”（2例）

- (43) 今我是日神子孫。（前 p. 114β）
- (44) 我是倭国域内所居神。（前 p. 160β）

以上が『日本書紀』に見られる「人称代名詞＋“是”」全用例で、“汝

是”が8例、“吾是”が15例、“我是”が2例見られた。これらのうち、“汝是”の7例全て、“吾是”の9例が、巻1「神代上」、巻2「神代下」に集中している。巻1、巻2は用語上の特色から、中国語（の会話）を解した日本人の手になると考えられ、区分論でも特別に扱われる場合があるが、この他“吾是”の6例も、“我是”の2例も非中国人によって書かれたとされるβ群に見られ、α群には“汝是”1例、“吾是”1例のみである。

まず、第1に問題となるのは、代名詞の用法の趨勢として、上古漢語で格機能の差違により使い分けられていたという“我”と“吾”、“爾”と“汝”は、格機能の消失により、中古漢語では“我”と“汝”が多数を占めるに至り、『日本書紀』でも、その点については略、中古漢語の用法を反映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が⑦、判断文の場合、二人称では“汝”が多数を占めるのに対して、一人称では“吾”が多数を占めていることである。第2に問題になるのは、どうして「代名詞＋“是”」はβ群に偏在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第1の問題については、中国語の語法からは明確に判断する基準が今のところ見つけられない。

第2の問題についても、これを中国語の語法から判断することは難しい。ただ、『日本書紀』の執筆者の記述方法、態度として、β群の執筆者、なかでも、巻1、2の執筆者は、直接対話を引用することを好んだことが想像される。人称代名詞を使うということは、注部分ならまだしも、本文中では執筆者の立場で「わたし」ということは有り得ず、登場人物に「わたし」「あなた」と言わせ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そのような場合、多くは対話の引用に見られるのであるが、α群の執筆者はそのような記述方法は用いず、β群の執筆者はこれを好んだという可能性がある。但しこれを証明するには、判断文のみならず、動詞文、形容詞文などについても検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あろう。

また人称代名詞の他に、代名詞に準ずる“妾”“僕”“朕”“君”“臣”、或いは単音節の語なども用いられる⑧。以下、用例を挙げる。

⑦ 『日本書紀』の代名詞の用法については北川修一 2002 を参照。

⑧ 人称代名詞とそのほかの呼称などの区別、定義などは北川修一 2002: pp. 156-157 を参照。

“妾是”（2例）

（45）妾是天神娶大山祇神所生兒也。（前 p. 65 β）

（46）妾是大山祇神之子。（前 p. 75 β）

“君是”（1例）

（47）君是誰者。（前 p. 88 β）

“臣是”（4例）

（48）臣是国神。（前 p. 112 β）（前 p. 119 β）

（49）臣是磐排別之子。（前 p. 119 β）

（50）臣是菴苴担之子。（前 p. 119 β）

“僕是”（1例）

（51）僕是一事主神也。（前 p. 365 α）

“弟是”（1例）

（52）弟是悉臨四方。（前 p. 168 β）

“朕是”（1例）

（53）朕是幼武尊也。（前 p. 365 α）

“客是”（1例）

（54）客是誰者。（前 p. 89 β）

“父是”（1例）

（55）父是天也。（前 p. 232 β）

#### 四、副詞＋“是”

系詞“是”の發達において六朝時期の特徴は副詞と共に用いられることである。また、“副詞＋是”の形式は、“是”が系詞へと發展する一段階と考える基準となる。なぜなら、上古漢語において、「NP1



+ “是” + NP 2」の“是”は“NP 1”を再度述べたものであり、“NP 2”に対しては語法上での主語である。そのため、これが副詞を持つ時は、「NP 1 + “是” + 副詞 + NP 2」の語順をとった。例えば、  
無以近人信其嘸嘸管見螢燭之明，而輕評人物，是皆亮彼上聖大賢乎？（『抱朴子・知止』）<sup>⑨</sup>

『日本書紀』にも次のような例が見られる<sup>⑩</sup>。

### “是即”（6例）

- (56) 其淚墮而為神，是即畝丘樹下所居之神（前 p. 14 β）
- (57) 其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男命、是即住吉大神矣。（前 p. 17 β）
- (58) 用此奉造之神、是即紀伊国所坐日前神也。（前 p. 34 β）
- (59) 吾当為汝輔之奉典神祇者，是即多臣之始祖也。（前 p. 140 β）
- (60) 高麗人為小身狹屯倉田部，是即以韓人、高麗人為田部。（後 p. 89 α）
- (61) 又晋武帝咸寧元年，見松滋，是即休祥。（後 p. 249 α）

### “是則”（2例）

- (62) 故以兄媛奉胸形大神，是則今在筑紫国御使君之祖也。（前 p. 284 β）
- (63) 近日暴惡者多在巷里，是則王卿等之過也（後 p. 351 β）

### “是実”（2例）

- (64) 汝所為君是実天神之子者，必有表物。（前 p. 128 β）
- (65) 恭敬三宝救黎元之厄，是実大聖也。（後 p. 160 β）

### “是若”（2例）

- (66) 吾所娠、是若他神之子者，必不幸矣。（前 p. 76 β）

⑨ 石毓智、李訥 2001:p. 27 から引用。

⑩ 用例を幅広く見るために、“是”の前置成分が子句（節）である用例も含めた。“是”の前置成分が子句（節）である場合については、本稿「5・無主語判断文」を参考。また連詞（接続詞）も此処に含めた。副詞と連詞は現れる位置が類似し、共時的にも歴時的にも関連をもつからである。

(67) 吾所娠、若非天神之胤者必亡。是若天神之胤者、無所害。  
(前 p. 79  $\beta$ )

“是亦” (1例)

(68) 復当昨日臣妻産時、鷓鷯入於産屋、是亦異焉。(前 p. 295  
 $\beta$ )

“是元” (1例)

(69) 任那是元我内家。(後 p. 162  $\beta$ )

“是雖” (1例)

(70) 汝是雖微、譬猶小火焼焚山野。(後 p. 62  $\alpha$ )

またこれを $\alpha$ 群と $\beta$ 群に分類すると、 $\alpha$ 群に3例、 $\beta$ 群に12例とかなり用例に偏りが見られる。「“是”+副詞」は中国語でも見られる語順であるが、中古漢語では次第に減っていったものである。

これらのうち、何らかの倭習である可能性のある例を挙げておく。まず(69)“任那是元我内家。”の例の主語は“任那”と単純な名詞であり、これを代名詞“是”で受ける必要性は低い。このような場合、一般的には“任那元是我内家”であるべきであろう。また(57)“其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男命是即住吉大神矣。”の主語は“其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男命”という単純な名詞の羅列であり、これを“是”という代名詞で復指したとは考えにくい。このことは副詞を持たず、系詞と認められる“底津少童命、中津少童命、表津少童命是阿曇連等所祭神矣。”(前 p. 17  $\beta$ )の用例と比較しても、一方は代名詞、一方は系詞として用いていたとは考えにくい。この他、主語が名詞化されている(59)(64)(65)(66)(69)(70)は倭習の可能性はある。これは恐らくは日本語では副詞の位置が比較的自由であるために、目的語の直前に置かれてしまったものであろうと考えられる。

以下に「副詞+“是”」の用例を挙げるように、『日本書紀』では圧倒的に、用いられる副詞の種類、その用例数ともに「副詞+“是”」が主であると言えよう。

元來、副詞の前に置かれていた“是”が「NP1+副詞+“是”+

NP 2」の語順に変化したということは語法的な主語はNP 1であると認識されていく趨勢にあることが言える。

牛島徳次 1971:p. 330によれば、六朝時期に見られる「副詞＋“是”」には“当”“応”“則”“即”“乃”“便”“誠”“必”“正・政”“疑”“方”“皆”“尽”“俱”“亦”“多”“或”“各”“直”“祇”“並”“故”“猶”“自”“最”“旧”“本”“近”“殆”“似”“既”“益”“若”“苟”“雖”などがある。『日本書紀』には、次の幾つかが見られた。

“本是”（2例）

（71）我知本是吾兒。（前 p. 80 β）

（72）童女君本是采女。（前 p. 361 α）

“必是”（4例）

（73）故今日夢也，必是事應也。（前 p. 180 β）

（74）菟夫羅媛必是神之心歟？（前 p. 235 β）

（75）兼取死神者必是罪矣。（前 p. 329 β）

（76）皇子豈違帝勅妄改而令。必是虚也。（後 p. 18 α）

“並是”（2例）

（77）即大日靈尊及月弓並是質性明麗。（前 p. 11 β）

（78）我母及姨並是海神。（前 p. 116 β）

“當是”（1例）

（79）災異所以悟人、當是明天告戒，先靈之徵表者也。（後 p. 57 α）

“凡是”（1例）

（80）小葉板皇子凡是天皇男女並甘王也。（前 p. 270 β）

“非是”（2例）

（81）弟所以来者，非是善意。（前 p. 27 β）

（82）疑汝二神非是吾处来者。（前 p. 72 β）

“蓋是”（8例）

- （83）至今所以久不来者，蓋是国神。（前 p. 81 β）
- （84）擬字未詳。蓋是槻乎？（前 p. 359 α）
- （85）以久麻那利賜末多王，蓋是誤也。（前 p. 388 α）
- （86）紀臣奈率者蓋是紀臣娶韓婦所生。（後 p. 56 α）
- （87）百濟本記云：“遣召烏胡跋臣，蓋是的臣也。”（後 p. 64 α）
- （88）故留己麻奴跪，蓋是津守連也。（後 p. 65 α）
- （89）此但曰直不書名字，蓋是伝写誤失矣。（後 p. 79 α）
- （90）秋於七月十三日，為蘇將軍所捉。而送去於唐国，蓋是無故持兵之徵乎。（後 p. 275 α）

“即是”（1例）

- （91）臣治平奉仕，即是無礼。（後 p. 121 α）

“皆是”（4例）

- （92）即對馬島、壹岐倒及處處小島皆是潮沫凝成者矣。（前 p. 6 β）
- （93）賊虜所拋皆是要害之地。（前 p. 120 β）
- （94）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後 p. 145 β）
- （95）若斯鳥獸及于草木有苻応者皆是天地所生休祥、嘉瑞。（後 p. 250 α）

“盡是”（1例）

- （96）凡此諸事盡是無状。（前 p. 34 β）

“雖是”（5例）

- （97）皇太子雖是我弟，安可欺乎？（前 p. 396 α）
- （98）雖是曰兄，豈先処乎？（前 p. 406 α）
- （99）吾父先王雖是天皇之子，遭遇迍邐。（前 p. 410 α）
- （100）移那斯、麻都雖是小家微者，專擅日本府之政。（後 p. 65 α）
- （101）佐魯麻都雖是韓腹，位居大連，廁日本執事之間。（後 p. 66 α）

“實是”（2例）

（102）母誓已驗，方知實是皇孫之胤。（前 p. 82 α）

（103）若從天降者，當有天垢，從來來者當有地垢，實是妙美之虛空者歟。（前 p. 89 α）

“未是”（1例）

（104）不有浮宝者，未是佳也。（前 p. 45 α）

“猶是”（1例）

（105）積善餘慶猶是無徵。（後 p. 292 α）

“宜是”（1例）

（106）夫汝処治顯露之事，宜是吾孫治之。（前 p. 72 β）

“亦是”（4例）

（107）其吉士亦是皇華之使。（後 p. 31 α）

（108）新羅情狀亦是所知。（後 p. 58 α）

（109）其亦是情歟？（後 p. 145 β）

（110）中臣德亦是同罪也。（後 p. 231 α）

“悉是”（2例）

（111）故彼五男神悉是吾兒。（前 p. 26 β）

（112）故彼三女神悉是爾兒。（前 p. 27 β）

“則是”（2例）

（113）吾則是國王也。（前 p. 176 β）

（114）汝独莫誼謹，必從群言，慎以勿違，則是天皇遺言焉。（後 p. 172 β）

『日本書紀』の“是”字は「NP1 + 副詞 + “是” + NP2」が多用され、「NP1 + “是” + 副詞 + NP2」が少ないこと、「NP1 + 副詞 + “是” + NP2」が見られないことなどから見ても六朝時期の用法を反映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

## 五、無主語判断文

判断文の基本的な形式としては先にも述べたように、「NP 1 + “是” + NP 2」であるが、「NP 1」即ち主語を省略して「“是” + NP」のように表わすこともある。張振徳・宋子然 1995 によれば『世説新語』では全体の 43% を占めるという。

庾答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世説新語・排調』）

### ①

また、先に「副詞 + “是”」の用例として挙げた幾つかが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このように、“是”が系詞として認められる条件を備えた形式で主語を持たない場合もあり、無主語の判断文が、“是”が普遍的に用い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とほぼ同じ時期に成立していたことが伺える。

『日本書紀』には無主語判断文と思われるものに、2種類ある。一つは“曰”“知”などの動詞の指す内容であり、このような場合には無主語判断文と見な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副詞 + “是”」の無主語判断文

(102) 母誓已驗，方知實是皇孫之胤。（前 p. 82β）

その他（11例）

(115) 欲使衆人皆知是吾兒。（前 p. 80β）

(116) 祈曰：“是倭国之物實，乃反之。”（前 p. 164β）

(117) 言于天皇：“是武埴安彦將謀反之表者也。”（前 p. 164β）

(118) 国人對曰：“是八代県豊邑亦尋其火。是誰人之火也。”

（前 p. 208×2β）

(119) 乃皇子曰：“是其所先也。”（前 p. 308.5β）

(120) 天皇召酒君示鳥曰：“是何鳥矣？”（前 p. 310.9β）

(121) 百濟俗号此鳥曰：“俱知。”是今時鷹也。（前 p. 311.2β）

(122) 天皇知是神，猶故問曰、…（前 p. 369.4α）

(123) 曰：“是燒佛像之罪矣？”（後 p. 115.5α）

① 張振徳 宋子然 1995:p. 415 から引用。

(124) 豊浦大臣妄推曰：“是蘇我臣将榮之瑞也。”（後 p. 205. 2α）

(125) 世人相謂之曰：“是隱流乎？”（後 p. 246. 7α）

もう一つは、次のような形式に見られるものである。

主語 1 + 述語 1, “是” + 述語 2。

このような形式が見られた場合、3つの可能性がある。1つ目は「主語 1 + 述語 1」は実際には名詞的に扱われ、「“是” + 述語 2」に対する主語になっている場合、2つ目は“是”は、上古漢語のように、「主語 1 + 述語 1」を重ねて指す代名詞である場合、3つ目は「主語 1 + 述語 1」と「“是” + 述語 2」は1つ目の想定とは異なり、子句と子句の関係を持つが、「主語 1 + 述語 1」或いは「主語 1」のみ、「述語 2」のみを2つ目の子句の主語と見なしながらも省略したものである場合である。このような形式に関しては先に「“是” + 副詞」の形式についても述べたが、このような3つの区別は事実上非常に困難である。<sup>⑫</sup>

具体的に用例を見てみることにする。

(79) 災異所以悟人、當是明天告戒、先靈之徵表者也。（後 p. 57α）

(104) 不有浮宝者、未是佳也。（前 p. 45β）

これらの例ではそれぞれ、“當是” “未是” という「副詞 + “是”」の形式になっているので“是”は代名詞ではないと見なせるが、また前に位置する成分が“所（以）”や“者”という形式名詞のような成分をとっているので、“災異所以悟人”（…という理由は）“不有浮宝者”（…なのは、…ということは）はそれぞれ主語であると見なすことができる。

しかし、このように名詞化されていない「主語 1 + 述語 2」を持った場合、「“是” + 副詞」で述べたような、“是”を主語と見なすか、系詞と見なすかという問題は判別が困難である。

(126) 仍喚綺戸辺納于後宮生磐衝別命、是三尾君之始祖也。（前 p. 188β）

(127) 其天火明命兒天香山是尾張連等遠祖也（前 p. 81）

<sup>⑫</sup> 査読者の一人から、このような文型では「主語 1 + 述語 1」は「“是” + 述語 2」に対する状況説明になっており、これを広義の主語であると思わせるとの意見をいただいた。共時的にはその通りであるが、通時的に見ると、この文型は明らかに NP を主語に持つものと異なり、どのような条件で、NP ではない、広義の主語が成立したのか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われるが、「はじめに」でも述べたように、この問題については『日本書紀』を基本資料としては検討し得ない。漢語史の問題として、今後の研究に待つ。

(126) では、“是”に先行する成分が、「綺戸辺を後宮に収めさせて、磐衝別命を生んだ」という子句で、それに続く子句は「(磐衝別命は)三尾君の始祖である」という意味を表しているように意味上の主語は“磐衝別命”であり、“仍喚綺戸辺納于後宮生磐衝別命”全体ではない。また(127)では「その天火明命児天香山」は「尾張連などの遠祖」であるというように「NP1+“是”+NP2」の形式であるが、このような、類似した表現の2つの用例において、一方を代名詞、一方を系詞と理解して用いていたとは考えにくい。次に別の例を見てみる。

(103) 若従天降者,当有天垢,従地来者,当有地垢, 実是妙美之虚空者歟。(前 p. 89α)

この用例では、“是”の前に位置する成分は「天から落ちて来たのなら、天垢がついているはずだし、地から来たのなら、地垢がついているはずであるが」のように、子句にはなっており、それに続く子句には具体的な主語は示されていないが、“是”は“実是”のように「副詞+“是”」の形式をとっており、“是”は代名詞ではありえない。

これらの特徴は全ての用例に見られるわけではないが、『日本書紀』では上に見てきたように、“是”が系詞としてかなり成熟していることから、上記の「主語1+述語1、“是”+述語2」形式の“是”は無主語判断文と見なしておくことにする。また「“是”+副詞」として既に挙げた用例、「副詞+“是”」として挙げた用例は省き、副詞を持たない“是”の用例のみに限定する。

### (一) 文末に助詞を持たない例(2例)

(128) 号曰媛蹈鞰五十鈴媛命, 是国色之秀者。(前 p. 131β)

(129) 受命天朝, 遠往絶域, 万里踏浪, 遥度弱水, 是常世国。(前 p. 192β)

### (二) 文末“也”にを持つ例(38例)

(130) 又給弟猾猛田村。因為猛田県主, 是菟田主水部遠祖也。  
(前 p. 132β)

(131) 立伊香色謎命為皇后、是庶母也。(前 p. 151β)



(1 3 2) 天皇勿復為愁国之治，是吾意也。(前 p. 160 β)

(1 3 3) 故拳義兵欲討汝逆，是天皇之命也。(前 p. 165 β)

(1 3 4) 立活目尊為皇太子以豐城命命令治東国，是上毛野、下毛野君之始祖也。(前 p. 169 β)

(1 3 5) 丹波国有五婦女，並貞潔，是丹波道主王之女也。(前 p. 181 β)

(1 3 6) 因改本姓謂土部臣，是土部連等主天皇喪葬之緣也。(前 p. 188 β)

(1 3 7) 仍喚綺戸辺納于後宮磐衝別命，是三尾君之始祖也。(前 p. 188 β)

(1 3 8) 因以命市河令治，是今物部首之始祖也。(前 p. 189 β)

(1 3 9) 其嶋人謂神，而為刀子立祠，是於今所祠也。(前 p. 192 β)

(前 p. 192 β) (前 p. 200 β) (前 p. 201 β) (前 p. 201 β) (前 p. 206 β) (前 p. 213 β) (前 p. 222 β) (前 p. 223 β) (前 p. 248 β) (前 p. 276 β) (前 p. 280 β) (前 p. 280 β) (前 p. 280 β) (前 p. 280 β) (前 p. 280 β) (前 p. 330 β) (後 p. 6 α) (後 p. 7 α) (後 p. 16 α) (後 p. 16 α) (後 p. 16 α) (後 p. 41 α) (後 p. 44 α) (後 p. 45 α) (後 p. 103 α) (後 p. 143 β) (後 p. 165 β) (後 p. 166 β)

### (三) 文末に“焉”を持つ例 (2例)

(1 4 0) 吾二人破国也。是後葉惡名焉。(後 p. 177. 9 β)

(1 4 1) 今朕之子与大臣之子同日共産，並有瑞，是天之表焉。(前 p. 295 β)

### (四) 文末に“歟”を持つ例 (1例)

(1 4 2) 然恐陛下屢幸於茅渟，是百姓之苦歟？(前 p. 346. 1 β)

これらのほか“是謂…” “是云…” “是言…” の形式の“是”は実際には“謂” “云” “言” の間接目的語であるので、指示代名詞と見なした。

## 六、“是” + 形容詞、動詞

“是”字句は判断文であり、言い換えれば名詞文である。形容詞文、動詞文は中国語では「主語＋形容詞/動詞」を用いればよく、その他に文の成分を示す標識は必要ない。“是”字句も、“是”を動詞の一種（系詞、判断詞）と考えれば動詞文の一つであるとも考えることもできるが、特に歴史的な変遷に着目して言えば、“是”字成立以前には、名詞文は、「A者、B也」という形式で表わし、更に“者”“也”を用いる必要は必ずしも持た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から、“是”は名詞文を表わすための標識であるとも考えることもできる。

また“是”字句が成立する前段階である、上古漢語において代名詞“是”は「NP1＋“是”＋NP2」という形式にも、「NP＋“是”＋VP」という形式にもいずれにも用いることができた。しかし、“是”に後置する成分で、NP：VPが『左伝』で22：78、『論語』で48：52、『荀子』で78：22であるように、先秦においても、時代がくだるにつれ、NPが多数を占めるようになり<sup>13</sup>、そして“是”字句が成立してからは大多数が「NP1＋“是”＋NP2」の形式で用いられるようであることは、前節までで見てきたとおりである。しかし六朝、唐代の中国文献にも目的語の位置にVPが立つ例が僅かに見られる。

殷中軍誦小品，下二百籛，皆是精微，世之幽滯。（『世説新語・文学』）

⑭

齐国大臣七十二相並是聰明志（智）惠。（『敦煌變文』）

言詞總是虛，此言並是實。（『敦煌變文』）

以上、それぞれ六朝、唐代の口語の資料として代表的であるとされる『世説新語』と『敦煌變文』から用例を挙げた。これらの用例の中で、注目されるのは、いずれも“皆是”“殆是”“並是”のように副詞と共

<sup>13</sup> 石毓智、李訥 2001:p. 19 による。

<sup>14</sup> 張振徳・宋子然 1995:p. 415 では相王謂二人：“可試交一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君其慎焉”。（『世説新語・文学』）をもこの例に挙げているが、“殆是…之固”で“固”は明らかに名詞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ので、拙稿ではこれを挙げない。

に用いられて、或いは既に副詞語尾とも見なせる可能性があること<sup>15</sup>、また目的語には“精微”“聰明志(智)恵”“実”など字数はそれぞれだが、動詞、或いは形容詞が単用されていて、或いは名詞的に用いている可能性も大きいことである。

また張振徳・宋子然 1995:p.416 によれば『世説新語』には強調に用いる“是”も3例(全体の2%)見られるという。

世称庾文康為豊年玉, 稚恭為荒年谷。庾家論云: “是文公称恭為荒年谷, 庾長仁為豊年玉。(『世説新語・賞誉』)

謝車騎問謝公: “真長性至峭, 何足乃重? 答曰: “是不見耳。阿見子敬, 尚使人不能已。” (『世説新語・賞誉』)

国宝見王緒問曰: “此与仲堪屏人何所道?” 緒云: “故是常往来, 無它所論。” (『世説新語・讒險』)

用例数も少なく『世説新語』のなかでも極めて稀な用例であるといえる。また、どのような条件で強調を表わす“是”が現れるのかも明らかではない。目加田誠訳注では次のような訳を与えている。

世間では庾文康(庾亮)を「豊年の玉」、弟の庾稚恭を「凶年の穀」だとほめた。しかし、庾家では、公康が稚恭を「凶年の穀」、庾長仁(庾統)を「豊年の玉」とほめたのだという。

謝車騎(謝玄)は謝公(謝安)にたずねた、「真長(劉惔)は性質があまりにも激しすぎます。どうしてそれほどまでに重んずるに足りましょうか。」謝は答えていった、「それは彼に会っていないからだよ。お前は子敬(王献之)に会ってさえ、感嘆せずにはおれなかったではないか。」

王国宝は王緒に会ってたずねた。「近ごろ、仲堪と人を遠ざけて何を話しているのだ。」緒は答えていった。「もちろんありきたりのつきあいで、格別の話を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れら3例ではともに会話の引用の最初に現れているので、文の初めに置かれているといえる。会話の最初に置か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是”に続く具体的な話者の説明内容は、相手が言った内容に対して行

<sup>15</sup> 但し、太田辰夫 1958:p.286 では、古い例として唐代の“春風也是多情思, 故揀繁枝折贈君”(韓愈詩)を挙げており、副詞語尾の“是”の成立時期として六朝時期はやや早すぎるかと思われる。六朝時期の「副詞+“是”」を副詞語尾と見なせるかどうかは今後の研究に待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っているものであり、例えば第2例で「それは彼に会っていないからだよ」(下線筆者)と補訳しているとおりであるが、会話の当事者二人にとって、具体的に指す内容が自明のことであるために、主語が省略されたもので、無主語判断文から派生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

一応、上記のような用法が中古漢語に見られることを確認した上で、『日本書紀』での用法を見ていきたい。『日本書紀』では、副詞語尾の可能性のあるもの、動詞、形容詞の単用で名詞化している可能性のあるもの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77) 即大日靈尊及月弓並是質性明麗。(前 p. 11β)

(96) 凡此諸事尽は無状。(前 p. 34β)

(104) 不有浮宝者，未是佳也。(前 p. 45β)

(145) 性是寛和。(後 p. 50.6α)

(143) 天国之子天稚彦是壮也。(前 p. 60β)

(144) 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前 p. 277β)

(91) 臣治平奉仕，即是無礼。(後 p. 121α)

(105) 積善餘慶猶は無徵。(後 p. 296α)

(146) 涯田臣之過者在於倭国被偷官刀，是不謹也。(後 p. 231β)

これらは、前述の基準に基づけば、およそ中古漢語の用法を反映した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以下、これらのとは異なる用法の“是”について検討していく。

## 1. “是” + 副詞 + 形容詞

(147) 上瀬是太疾，下瀬是太弱。(前 p. 17β)

(148) 磐筒男磐筒女所生之子経津主神是将佳也。(前 p. 62β)

(149) 夫生所愛命殉亡者，是甚傷矣。(前 p. 186β)

(150) 蝦夷是尤強焉。(前 p. 213β)

(151) 若事不成者，罪有於群臣，是甚傷焉。(前 p. 244β)

これらの例では“太”“将”“甚”“尤”という副詞を持っており、動詞、形容詞は単純な形式であるとは言えず、従って「副詞 + 形容詞」が名詞化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は考えにくい。

(70) 汝是雖微，譬猶小火焼焚山野。(後 p. 62α)

先に見たが、“雖是”の例(全部で4例)の場合は、“皇太子雖是我弟、

安可欺乎？”のように、“是”には名詞成分が後置され、判断文をなしている。しかし、“汝是雖微”は述語が形容詞であるので、“是”は必要ではなく、また“是”が“雖”の前に置かれているため、語尾である可能性もない。また主語が代名詞であるので、“是”は指示代名詞とも考えにくい。

## 2. “是” + 動詞

(152) 弟是悉臨四方。(『日本書紀』前 p.168β)

(153) 官船名枯野者，伊豆国所貢之船也。是朽之不堪用。(前 p.281α)

(154) 山背大兄是宜為天皇。(後 p.172β)

(155) 小緑臣、丹波臣是拙而無犯。(後 p.231α)

この例は副詞を持った例ではないが、述語部分に“而”で結ばれた“拙”と“無犯”という2つを持っており、やはり名詞化した例とは考えにく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2例目の“是”は“朽之不堪用”に対して主語である(つまり“是”は指示代名詞である)のか、無主語判断文の系詞であるのか、判断がつけ難いが一応挙げておいた。

(156) 韓郷之嶋是有金銀。(前 p.45β)

この例は所有や存在を表わす“有”字句であるが、このような文にも“是”は不必要である。

## 3. 主題化

(157) 夫汝所治頭露之事宜是吾孫治之。(前 p.72β)

(158) 誉津別王是生年既三十。(前 p.183β)

(157)では“汝所治頭露之事”は本来的には、動詞“治”の目的語であり、“之”が指す内容もこれである。目的語を主題化するために、文の頭に置いたものである。“宜是”という副詞語尾の可能性はあるものの、その後には“吾孫治之”という「主語+動詞+目的語」という形をとっている。

(158)は一種の主述述語文である。“誉津別王”は文全体の主語であり、“生年既三十”という説明をもつ。その説明の中に、更に“生

年”という主語があり、“既三十”という説明を持つ。しかし、中国語では文全体の主語も“是”で表わす必要はない。

このような用例の中の幾つかの用法は、或いは既に、中国文献に見られる正格用法で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今後更に検討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一般的な用法ではない何らかの「倭習」の可能性はある。そしてこれらの“是”は日本語の語法が中国語に混入したものであるのではなかろうかと思われる。倭習を引き起こした理由として次のようなことが考えられる。

瀬間正之 1994 によれば、日本上代文献の“者”は既に中国語そのものの用法を離れ、「は」を表わすの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の“是”についても、同じような誤解が生じ、系助詞「は」を表わすために用い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いか。

どのような現象がこのような誤解を導いたのか考えてみたい。まず、中国語（中古漢語以降）では判断文（名詞文）は、“是”という系詞を用い、「A是B」という形式を用いたが、その場合、日本語では主語を「は」により提示した。また形容詞文、動詞文は、中国語の場合、“是”などは必要なく、「主語＋述語（形容詞、或いは動詞）」の形でののであるが、日本語の形容詞文の場合、「は」を用い主語を表わし、動詞文でも主題化する場合には「は」を用いた。その他目的語でも主題化する場合には「は」を用いる。「倭習」の原因として考えられるのがこれで、本来的には不必要である形容詞文、動詞文或いは主題化された文において、「は」の影響により（『日本書紀』著述者の立場から言えば、「は」を表記するつもりで），“是”を用いてしま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 7, NP 1 + “此” + NP 2

上古漢語（系詞に成っていない、指示代名詞としての用法）では「NP 1 + 代名詞 + NP 2」には“是”の他、“斯”“此”など他の指示代名詞も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その中で系詞として発達したのは、“是”のみである。しかし『日本書紀』には僅かであるが、“此”を用いた例が見られる。

（159）世人慎収己爪者，此其縁也。（前 p. 37 β）

(150) 即以口女魚所以不進御者，此其緣也。(前 p. 91β)

(151) 天足彦国押人命此和珥臣等遠祖也。(前 p. 145β)

前の2例については指示代名詞である可能性もある。しかし最後の例は、“此”に先立つ主語が字数は多いが人名であり、語法的に複雑な構造をと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で、上古漢語として見てもおかしい。このような例ではやはり“是”であるべきである。この例もβ群の例である。

## 8. 否定判断文

判断句の肯定が基本的に標識を持たず、判断文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に対し、否定判断文は、“非”を用いていた。既に漢代には、これに変化が起こってきた。肯定判断文で“是”が発展するのに伴い、“非是”という形式が現れ、また“未是”という形式も生まれた。他に、“非復”のように、語尾“復”を持つ形も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日本書紀』には、非常に僅か見られる。

### “非是”

(81) 弟所以来者，非是善意。(前 p. 27β)

(82) 疑汝二神非是吾处来者。(前 p. 72β)

### “未是”

(104) 不有浮宝者，未是佳也。(前 p. 45β)

### “非復”

(152) 吾弟所以上来，非復好意。(前 p. 38β)

これら4例は総て神代紀に見られ、神代紀の口語性の高さの現われであると思なす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また現代漢語と同じ“不是”は六朝『世説新語』では見られないが、唐代『敦煌變文』で非常に多く見られる。『日本書紀』にはまだ見られない。『日本書紀』の言語の時代的な特徴を見る上で、“是”が見られないことは重要である。

## 9. その他の判断文

これまでに“是”の語法史上での位置を確認する例や、「倭習」の

可能性の有る例を見たが、もちろんそれ以外の判断文も多く見られる。特に特殊な現象は見られないので、用例はそれぞれ10例にとどめ、その他は出処のみを記す。便宜上、文末の語気助詞により分類し用例を挙げる。

(1)…是…(12例)

- (153) 吾名是猿田彦大神。(前 p.70β)
- (154) 其於秀起浪穗之上八尋殿而手珠玲瓏織紵之少女者是誰之子女耶?(前 p.82β)
- (155) 天皇素聞:“饒速日命是自天降者。”(前 p.128β)
- (156) 兄大彦命是阿部臣、膳臣、阿閉臣。(前 p.150β)
- (157) 宇泥咩巴椰、弥弥巴椰是未習風俗之言語。(前 p.349.8β)
- (158) 明是檜隈高田天皇女。(後 p.52.8α)
- (159) 姓是同姓,位是杆率。(後 p.81.8α)
- (150) 膳臣是皇華使。(後 p.81.4α)
- (151) 信是義本。(後 p.144.3α)
- (152) 百濟是多反復之國。(後 p.162.3α)
- (153) 大兄命是昔天皇所生。(後 p.216.2α)
- (154) 復於倭國被他偷刀是其紀臣。(後 p.230.7α)

(2)…是…也(34例)

- (155) 亦曰級長津彦命是風神也。(前 p.13β)
- (156) 此童女是吾兒也。(前 p.40β)
- (157) 天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前 p.59β)
- (158) 豐葦原中國是吾兒可王之地也。(前 p.66β)
- (159) 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前 p.70β)
- (160) 其天火明命兒天香山是尾張連等遠祖也(前 p.81β)
- (161) 所謂堅間是今之竹籠也。(前 p.88β)
- (162) 如為我造屋於海邊以相待者是所望也。(前 p.96β)
- (163) 種子命是中臣氏之遠祖也。(前 p.113β)
- (164) 弟磯城津彦命是猪使連之始祖也。(前 p.142β)
- (165) 弟稚武彦命是吉備臣之始祖也(前 p.148β)
- (前 p.150β)(前 p.211β)(前 p.221β)(前 p.261β)(前 p.347.3



β) (前 p. 348.1β) (前 p. 193β) (前 p. 200β) (前 p. 200β) (前 p. 201β) (前 p. 222β) (前 p. 222β) (前 p. 222β) (前 p. 271β) (前 p. 271β) (前 p. 271β) (前 p. 295β) (前 p. 352β) (後 p. 6α) (後 p. 6α) (後 p. 75α) (後 p. 127α) (後 p. 319β)

(3) …是…矣 (2例)

(166) 底津少童命中津少童命、表津少童命是阿曇連等所祭神矣。(前 p. 17β)

(167) 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後 p. 145β)

(4) …是…焉 (1例)

(168) 長髓是邑之本号焉。(前 p. 126β)

(5) …者是…也 (9例)

(169) 始為族悲及思哀者是吾之怯矣。(前 p. 21β)

(170) 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者是吾物也。(前 p. 26β)

(171) 其十握劍者是素戔鳴尊物也。(前 p. 26β)

(172) 時味耜高彥根神之妹下照媛欲令衆人知映丘谷者是味耜高彥根神。(前 p. 68β)

(173) 其事勝国勝神者是伊弉諾尊之子也。(前 p. 78β)

(174) 不得獸者是我之心也。(前 p. 347β)

(175) 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之始祖也。(前 p. 277β)

(176) 木満致者是木羅斤資討新羅時、娶其国婦而所生也。(前 p. 281β)

(177) 乃貢能匠者是猪名部等之始祖也。(前 p. 282β)

(6) …非…, 是… (1例)

(178) 夫任那之不赴召者非其意焉, 是阿賢移那斯、左魯麻都姦佞之所作也。(後 p. 64α)

これで、『日本書紀』に見られる“是”字判断文の用例を全て確認したことになるが、『日本書紀』では“是”字判断文は非常に、活発に用いられる語法形式であると言えよう。上古漢語では「A者B也」(“者”“也”は用いない場合もある)により判断文を表わし、それが“是”字判断文に移行して行ったが、過渡期的な段階には、“…者是…也”或いは“…是…也”、“…者是…”のように新旧の標識をともに用

いることがあった。『日本書紀』の用例では特に文末語気助詞との共起が著しい。『日本書紀』の“是”は未だ発達途中の側面を持つのであろうか。筆者は本稿二節から五節までで述べたように、“是”字はかなり発達した段階にあり、文末語気助詞との共起という現象は、ほかに理由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文末語気助詞を持つ是字判断文は多くの場合、上記のように氏族の祖先を述べるという慣用的な形式に用いられている場合が多いからである。この点については語気助詞の問題として今後の課題としておきたい。

## 10. おわりに

未だ非常に微妙な問題を含み、漢語史の研究を待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部分も多いが、最後に『日本書紀』に見られる判断句の特色をまとめておく。

まず『日本書紀』の漢語史における位置付けは、以下のような特色から六朝時期であるといえると思われる。

(1) 主語には指示代名詞、人称代名詞など単純な名詞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る。

(2) 「副詞＋“是”」と「“是”＋副詞」の語順では、用例数、用いられる副詞の種類ともに圧倒的に「副詞＋“是”」が多い。

(3) 無主語判断文が見られる。

(4) 否定判断文にまだ“不是”は見られない。

また、何らかの倭習の可能性としては次の点が挙げられる。

(5) “此是”という表現はβ群に見られない。

(6) 「“是”＋副詞」の語順はβ群に多い。

(7) 「“是”＋動詞、形容詞」がβ群に多く、係助詞「は」の影響が考えられる。

(8) “此”を系詞のように用いた例がβ群に見られる。

今後、この他の語法形式についても検討し、『日本書紀』の言語的な特徴を明らかにしたい。

## 引用文献

-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日本書紀』（前篇、後篇）吉川弘文館  
『世説新語校箋』徐震校注（筆者は文史哲出版社影印本を用いた）  
『敦煌変文』王重民等校録（筆者は世界書局影印本を用いた）

## 参考文献（五十音による）

- 石毓智・李訥 2001『漢語語法化歷程—形態句法發展的動機和機制』北京  
大学出版社  
牛島徳治 1971『漢語文法論（中古編）』大修館書店  
太田辰夫 1958『中国語歴史文法』朋友書店  
郭錫良 1990「關於繫詞“是”癩生時代和来源論争的幾個認識」『王  
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今《漢語史論集》所収，商務印書  
館，1997）  
北川修一 2001「中古漢語の不字句」『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  
62, pp. 239-260  
——— 2002「『日本書紀』の人称代名詞」『東海大学文學院學報』43,  
pp. 155-171  
——— 2003「『日本書紀』における中国口語と倭習の問題」『和漢比  
較文学』（査読通過、待刊）  
瀬間正之 1994「上代に於ける「者」字の用法——助辞用法から助詞表  
記へ——」『国語文字史の研究』2, pp. 31-53  
唐鈺明 1992「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中国語文』1992.5(230)  
（今『著名中年語言学家自選集 唐鈺明卷』所収，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pp.239-250）  
張振徳・宋子然主編 1995『《世説新語》語言研究』巴蜀書社  
目加田誠 1975～1978『世説新語』（上中下冊）明治書院  
森博達 1999『日本書紀の謎を解く』中央公論社

# 《日本書紀》的判斷句

北川修一

## 【提要】

到目前為止，在《日本書紀》區分論的相關研究中，無論是漢語音韻上的特徵、用語、慣用表現等都有顯著的成果。但關於語法卻只有極小部分被提出討論。在拙稿中，試圖以使用頻率最高的語法項目之判斷句為對象，釐清《日本書紀》在漢語史上的定位，且在確認《日本書紀》的撰寫者是以何種語言形態為基準撰稿之外，進而考察所謂「倭習」在各卷中的分佈及引起「倭習」的原因等問題。

關鍵詞：漢語史 判斷句 “是” 「wa」 倭習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390—396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評介

張顯成\*

書 名：《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

作 者：胡繼明

出版者：成都，巴蜀書社

出版時間：2003 年 1 月

「同源詞」或稱「詞源同源詞」(etymological cognate)，這一概念產生於印歐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中；漢語中又稱「同源字」。漢語同源詞是漢語內部由某一根詞及其孳乳詞、或孳生詞與孳生詞構成的一組詞，這些詞在語音和意義上相同或相關。漢語同源詞研究是傳統訓詁學和漢語詞彙史研究的尖端課題，其主要目的是探求漢語詞彙孳生繁衍的歷史和規律，探索已經湮滅了的構詞理據，因此，漢語同源詞研究是一個與漢語詞彙、詞義、語音等領域的研究密切相關的課題，它不僅涉及漢語音義結合的規律，還涉及漢語詞彙系統、詞義系統和語音系統的演變規律。

漢語同源詞的研究萌芽於先秦的聲訓，發展到今天科學的漢語詞源學的逐步建立，經歷了大約 2500 年的歷史。其間，漢末劉熙的《釋名》是先秦兩漢聲訓集大成的著作；宋代王聖美等人的「右文說」為漢語詞源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有清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取得了「右文說」的最高成就；明末清初方以智的《通雅》、清代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為漢語詞源學做出了特殊貢獻；近人章太炎的詞源學專著《文始》的問世，是漢語詞源學研究開始走上科學化道路的標誌。對這些在漢語詞源學史上

---

\*西南師範大學文獻所教授，重慶北碚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進行深入系統研究，是漢語詞源學史的重要課題，對深入認識漢語詞源學史和建設科學的漢語詞源學理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有清一代大儒王念孫的《廣雅疏證》，①「書中推闡『聲近義同』、『聲轉義近』之理，隨處皆是。其以聲音通訓詁，語多獨創，其詞源、詞族之研究，尤微不至。」②「《疏證》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指出《廣雅》裏的許多詞或音義並同，或音近義同，或音義相近，或字異義同，或音轉義通，它們都具有同源關係。」③胡繼明博士的新著《〈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以下簡稱《研究》），站在現代學術發展的高度，以現代詞源學理論為指導，對《廣雅疏證》的同源詞作了大規模成系列的分析、整理，對王氏研究同源詞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科學總結，可謂運用現代詞源學理論和方法研究《廣雅疏證》同源詞的一部力作。《研究》是胡繼明君的同名博士論文（四川大學中文系，2002年6月通過），由巴蜀書社（成都）2003年1月出版。該書篇幅46萬言。正文前分別是向熹教授的〈序〉（〈序一〉）和宋永培教授的〈序〉（〈序二〉）。正文分六大部份：引言、王念孫與《廣雅疏證》、《廣雅疏證》同源詞分析、《廣雅疏證》同源詞的類型及音轉和音義結合的規律、《廣雅疏證》研究同源詞的理論和方法、《廣雅疏證》研究同源詞的成就和不足。末為〈主要參考文獻〉、〈後記〉各一篇。細讀胡博士全書，感到特點鮮明且突出，下面僅就三個方面談談。

## 一、所用理論方法科學先進

現在許多研究同源詞的著作和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材料彙集的基礎上，對一組組同源詞詞與詞之間的語音關係和詞義關係進行簡單的羅列、排比，缺乏最為重要的一環，即詞源的探討，詞源的探討也就是造詞理據的探討。何九盈教授指出王力教授《同源字典》的缺點之一是：「各同源字組所收之字基本上是一種平行關係，沒有歸納出共同的核心義。……確

① 該書共十卷，前九卷為王念孫所作，最末一卷為其子王引之所作。

② 徐復：《廣雅詁林·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 胡繼明：《〈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向熹〈序一〉》，第1-2頁，巴蜀書社，2003年。

定同一組字的核心義還是很有必要的。」<sup>④</sup>王甯教授說：「一組待定為同源詞的語料，在已知它們的音同或音近關係後，判定它們之間的義通關係，便成為確立它們同源的關鍵；而把握義通的規律，從中探求派生詞的造詞理據，詞源探求的任務纔算全面完成。」<sup>⑤</sup>王甯教授認為，同源詞的義素可分為「核義素」和「類義素」兩類，核義素體現詞義的特點，類義素體現詞的事物類別。核義素是一組同源詞內各詞所共同具有的意義，是「核心義」，它表示的是該組同源詞的「義通關係」，即同源關係；而類義素是一組同源詞內各詞所具有的不同意義，它表示的是各詞之間的區別關係。由此可知，對同源詞核義素的歸納是非常重要的，不對同源詞的造詞理據即核義素進行探討，同源詞的研究是不完整的。《研究》共繫聯出《廣雅疏證》中的同源詞計 376 組，在詞源意義的分析方面，在運用傳統研究方法的同時，重點採用了王甯教授提出的義素分析法這一現代詞源學新理論，獲得了可喜的成功。例如「福：富：備」條（頁 73—75）：

《研究》首先闡述了王氏及前人的有關研究：

〈釋詁〉卷二下「福，備也。」疏證云：「福者，《說文》：福，備也。〈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曲禮注〉云：富之言備也。福、富、備，古聲義並同。……」

然後在進行語音分析後便進行義素分析：

詞義上，古人以「富」為「福」，「富」、「福」都得名於「備」，所以它們同訓為「備」，因為「齊備」纔「富有」，「富有」即是「福」。它們都有共同的意義核心「齊備」。

接著進一步分析道：

「福」的意義＝類義素「人事類」＋核義素「齊備」。

「富」的意義＝類義素「物質類」＋核義素「齊備」。

「備」的意義＝類義素「用具類」＋核義素「齊備」。

這樣的分析，清晰明瞭地表達出了「福：富：備」這組同源詞詞義的異同點，讓我們既知道了「福：富：備」共同的意義核心（核義素）為「齊備」，其類義素分別為「人事類」、「物質類」、「用具類」，不再像《廣雅疏

<sup>④</sup> 何九盈：〈二十世紀的漢語訓詁學〉，見劉堅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第 72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sup>⑤</sup> 王甯：〈漢語詞源的探求與闡釋〉，見王甯《訓詁學原理》，第 149 頁，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 年。

證》中用「古聲義並同」這樣模糊的術語和概念來表達而給予人的是不明確資訊。

同源詞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漢語詞彙孳生繁衍的歷史和規律，探求湮滅了的詞的理據，若不進行追源索流的歷史研究，理清源詞與派生詞、派生詞與派生詞形成的途徑和演變軌迹，而只停留在平面地繫源的研究狀態，是無法達到這個目的的。此目的是漢語詞源學研究的基本任務。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要像《研究》這樣進行義素分析，特別是要通過核義素的分析以尋求源詞，從而探求派生詞的造詞理據。所以可以說，《研究》對一組組同源詞逐一進行的義素分析，是從根本上抓住了同源詞詞義關係的本質，值得充分肯定。正如向熹教授所說：《研究》「語義分析採用義素分析法，並依王甯先生的見解，將義素分為核義素和類義素兩類，前者表現詞義的特徵，後者表現事物的類別，抓住了同源詞詞義的關鍵，同樣是正確的。」<sup>⑥</sup>

## 二、對王書同源詞進行逐一清理闡釋

《研究》對繫聯出的 376 組同源詞的排列以王力教授的三十韻部為序，各韻部之中又以喉音、舌音、齒音、唇音為次，從而使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條分縷析，次序井然。《研究》的研究物件，是王念孫《廣雅疏證》通過「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而綜合排比出的具有同源關係的一組組詞。作者從《廣雅疏證》列舉、分析的語言材料出發，參照先秦兩漢文獻語言材料及漢唐人註疏、清人集解等前人時賢的研究成果，對王念孫排比出的具有同源關係的一組組詞進行了盡可能的徹底整理和音義分析，追根溯源，補充書證，材料豐富翔實，論證透徹有力。例如「棨：鋒：峰」條（頁 163—164）：

《研究》首先列出王氏排比出的這組同源詞：

〈釋詁〉卷一下：「棨，末也。」疏證：「棨者，《玉篇》：棨，木上也。兵耑謂之鋒，山耑謂之峰。義並同也。」

然後列舉大量材料予以印證：

<sup>⑥</sup> 胡繼明：《〈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向熹〈序一〉》，巴蜀書社，2003年1月。



棊，《廣雅·釋詁一》：「棊，末也。」《玉篇·木部》：「棊，木上也。」《廣韻·鍾韻》：「棊，木上。」「棊」義為樹木之尖端。上古音為滂母東部合口三等。

鋒，《說文·金部》：「鋒，兵耑也。」段玉裁注：「兵，械也。耑，物初生之題。引申為凡物之顛與末。凡金器之尖曰鋒。俗作鋒。」《釋名·釋兵器》：「刀，其末曰鋒。」又：「劍，其末曰鋒。鋒，末之言也。」《書·費誓》：「鍛乃戈矛，礪乃鋒刀。」《左傳·定公十年》：「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杜預注：「以劍鋒末授之。」《漢書·蕭望之傳》：「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顏師古注：「鋒，刃端也。」「鋒」義為刀劍的尖端。上古音為滂母東部合口三等。

峰，《集韻·鍾韻》：「峯，或書作峰。」《說文新附·山部》：「峯，山耑也。从山，夆聲。」《六書故·地理二·山部》：「峯，山鋒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山高而銳曰峰。从山，夆聲。」李白〈蜀道難〉：「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峰」義為山的尖端。上古音為滂母東部合口三等。

由上可知，《研究》所列舉的疏證材料可謂豐富翔實，為王氏之說添補了大量書證，引類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於王書有功不少，故以此而論，謂《研究》為「《廣雅疏證》補續」，不為過矣。

《研究》在對同源詞進行了大量語言事實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了漢語同源詞的語音關係類型、音轉規律、語義關係類型、音義結合規律。將漢語同源詞的語音關係類型分為音同、音近、音同音近、音轉、音同音轉、音近音轉、音同音近音轉、混合音轉型等 8 類（頁 448—462）；將音轉規律分為聲轉規律和韻轉規律，聲轉規律包括準雙聲、旁紐、准旁紐、鄰紐，韻轉規律包括對轉、旁轉、旁對轉、通轉（頁 463—472）；將語義關係類型分為相同、相關、相同相關 3 類（頁 476—493）；將音義結合規律分為音同義關、音轉義關、音轉義同、音同音轉義關、音同義同、音近義關、音同音轉義同、音近義同、音近音轉義關、音同音近義關、音同義同義關、音同音轉義同義關、音同音近音轉義關、音同音近義同、音同音近義同義關、音近音轉義同等 16 種（頁 541—567）。這些都是在對同源詞的語音、語義關係進行充分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可信結論，是對王書同源詞進行徹底整理研究的結果。

### 三、對王書同源詞的研究進行全面總結歸納

《研究》站在中國傳統語言學發展史的高度，對《廣雅疏證》研究同源詞的理論、方法、成就和不足進行了品評和推闡。

《研究》從「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名之於實，各有義類」兩個方面對《廣雅疏證》研究同源詞的理論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論述。認為王念孫在「訓詁之旨，本於聲音」這一總理論的指導下，創立了「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的訓詁方法。對「名之於實，各有義類」這一探求漢語詞彙孳乳繁衍的重要理論進行了科學闡發和論證。（頁 568—572）

《研究》揭示了王書同源詞「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與創新」。指出主要有三大方法：一是「因聲求義，不限形體」；二是「沿流溯源，類聚群分，同條共貫」；三是「比類聲附，探求語源意義」。（頁 572—573）

《研究》指出，王書「揭示了漢語同源詞詞義的系統性和音義結合的規律性」。認為「王念孫雖然沒有像今天這樣明確使用『同源詞』、『詞族』這樣的術語，然而他在《廣雅疏證》中所作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同源詞的研究。他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漢語同源詞是成系統的，這個系統就是他在對『名之於實，各有義類』進行科學闡發和論證後提出的『命名之意』」。「此外，王念孫還注意到漢語詞彙的意義具有多義性特點，同一『聲符』可以構成多組意義不同的同源詞，……這是對漢語同源詞詞義具有多源性特點的揭示，也是對『同聲必同義』的反動，顯示了漢語詞義規律是共同規律和個別規律的有機統一體」。（頁 573—576）

《研究》指出，王書是「訓詁實踐的豐碩成果」。「王氏繫聯同源詞完全突破了字形的限制，從聲音和意義兩個方面出發，運用音義結合法、右文法、聲訓法、音轉法和綜合法等方法，追溯詞語的同源關係，取得了豐碩成果」，「他推求語源的成功實踐，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使人們看到了研究漢語同源詞的新方法和新途徑。」（頁 577）

《研究》在總結王氏研究同源詞成就的最後說道，王氏「無論是在理論建樹上，還是在研究方法上和訓詁實踐上，所達到的境界都是他以前和與他同時代的學者無法比擬的，他站在了那個時代的巔峰。他為近現代漢語詞源學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頁 578）

同時，《研究》也指出了《廣雅疏證》研究同源詞的不足，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術語使用的隨意性」；二是「同源詞與異體字、通假字概念不清，常常相混」；三是其「『古音』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頁 578—581）

由上可知，《研究》對王書同源詞的研究進行的總結是全面而恰當的，正如宋永培教授所說，《研究》「把《廣雅疏證》的成果、理論、方法放到中國傳統語言學發展史上來衡量與品評，尤其注重揭示與推闡《廣雅疏證》作為中國傳統語言學經典在總結古代漢語同源詞研究、指導當今漢語同源詞研究上特有的寶貴價值」。<sup>⑦</sup>這一評價是中肯的。

任何論著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足，《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例如：

《研究》運用王力教授（1900—1986）的 30 部古韻分類法來分析王念孫《廣雅疏證》同源詞，而未用王念孫（1744—1832）的 21 部古韻分類法來分析，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似有欠佳。因為既然要分析王念孫是怎樣研究同源詞的，則當用王念孫的古音觀纔最合適，纔更有利於揭示王念孫研究同源詞的客觀原貌。王力 30 部分類法晚出王念孫 21 部分類法一個半世紀，後出轉精，當然該利用，關鍵是該怎樣利用。竊以為作者可以先用 21 部古韻分類法來分析王書是怎樣研究同源詞的，在此基礎上，再用王力等後人音韻學最新研究成果來評判《廣雅疏證》對同源詞的研究，如是，則《研究》就會更添光加彩。若此著日後修訂，建議不妨一試。

《研究》用繁體字排印，此甚好，但個別字的繁簡轉化不當，如頁 568 行 8 誤將「里程碑」排作「裏程碑」。

《研究》整理並逐一論述的同源詞達 376 組，對所論的這些同源詞應該有個「索引」，方便於讀者查閱，但該書卻沒有，不能不說是一憾事。若今後修訂再版，建議能補上。

總的來說，瑕不掩玉，胡繼明博士的《研究》一書，可謂《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之集大成著作，值得一讀。

⑦ 胡繼明：《〈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宋永培〈序二〉》，巴蜀書社，2003 年 1 月。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397—401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簡帛發現與研究》評介

陳文豪\*

書 名：《簡帛發現與研究》

作 者：馬今洪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訂 價：人民幣 18 元

甲骨文、敦煌文書、簡牘及內閣大庫檔案，合稱四大新史料。1973 年 12 月馬王堆 3 號漢墓帛書出土後，由於書寫材料性質相近，所以有些學者將簡牘帛書合稱為「簡帛」，甚至提出「簡帛學」一詞。<sup>①</sup>因此，四大新史料應可改稱為：甲骨文、敦煌文書、簡帛及內閣大庫檔案。

簡帛既可合稱，但在已出版的相關概論性著作中，則仍是簡牘與帛書分別論述。例如：馬先醒：《簡牘學要義》（臺北：簡牘學會，民國 69 年）、林劍鳴：《簡牘概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9 月）、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9 月）、高敏：《簡牘學研究入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0 月）、王子今：《簡牘史話》（北京：大百科出版社，2000 年 1 月）、<sup>②</sup>陳松長：《帛書史話》（北京：大百科出版社，2000 年 1 月）。最近學者似已注意到簡帛合稱的問題，在撰述相關論述時也以簡帛命名，<sup>③</sup>而正式以「簡帛」命名而出版的第一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① 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設簡帛研究中心，出版的刊物稱《簡帛研究》；2001 年 8 月 16 日至 19 日在湖南長沙舉行的「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1901-2001）」均以簡帛為名。

② 介紹地區出土簡牘的概論性著作尚有：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 年 5 月）及王震亞：《竹木春秋—甘肅秦漢簡牘》（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9 年 7 月）。

③ 已出版的著作中，以簡帛命名的以專著為主，例如：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魏啟鵬：《簡帛〈五行〉箋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89 年 7 月）、趙建偉：《出土簡帛

本簡帛學通論著為《簡帛發現與研究》。<sup>④</sup>

《簡帛研究與發展》為「中國古文字三大遺存」叢書之一，<sup>⑤</sup>由〈概述〉、〈簡帛的發現〉、〈戰國、秦簡帛中的書籍〉、〈漢代簡帛中的書籍〉、〈簡帛中的律法和遺冊〉、〈簡帛中的文書〉、〈簡帛書法的藝術和辨偽〉、〈簡帛的終結〉、〈簡帛研究文獻〉及〈後記〉構成。

〈概述〉談的是簡帛的基本知識、簡牘制度、簡牘內容的分類和意義，作者認為簡牘沒有一定的制度，形制有簡、牘、觚、檢、楬。

〈簡帛的發現〉，介紹十九世紀末之前發現簡帛概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以來發現的戰國楚簡、二十世紀初以來發現的漢簡、二十世紀以來發現的三國魏晉吐蕃簡、二十世紀發現的兩次帛書。

〈戰國、秦漢簡帛中的書籍〉，介紹長沙子彈庫帛書、長臺關楚簡、慈利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王家臺秦簡中的古書，並針對《日書》做特別說明。

〈漢代簡帛中的書籍〉就銀雀山漢簡、馬王堆簡帛、阜陽雙古堆漢簡、張家山漢簡、武威漢簡《儀禮》、定縣漢簡、武威旱灘坡醫書、尹灣漢簡中的古佚書進行介紹，並說明這些書籍在古文字、文獻學及哲學、學術史研究上的影響與意義。

〈簡帛中的律法和遺冊〉先就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青川秦牘《為田律》、龍崗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大通上孫家寨漢簡、張家山漢簡中的律法及軍法、軍令等與律法有關者進行介紹。接著討論遺冊的內容，認為戰國遺冊的內容有三類：以登記衣物、禮器、食器和兵器為主者、登記物比第一類多出車馬器者、以登記車馬器和兵器為主者；漢代的遺冊有十多批，以馬王堆漢墓和鳳凰山漢墓出土者最有名，前者的遺冊有二類，一類直接記載器物名稱、大小數量，一類在簡上端有一小孔，在孔下有「右」(?)兩字，後寫上器物名稱、數量等。後者以 167 號墓的遺冊保存最完整，記載車、婢、奴、盛食物的漆、陶器、財物、裝果物和卵的籠子；最後附論告地策。

〈周易〉疏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89 年元月)、崔永東：《金文簡帛中的刑法思想》(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年 3 月)、王博：《簡帛思想文獻論集》(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5 月)、吳辛丑：《簡帛典籍異文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等。

④ 駢宇騫、段書安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資料篇、論著目錄篇》(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88 年 4 月)，雖以概述為名，但內容僅為出土資料及目錄的介紹，並未涉及理論的敘述。據筆者所知，以簡帛為名的通論著作，正在撰寫中的至少尚有三本以上，其中張顯成教授所撰《簡帛文獻學通論》，即將出版。

⑤ 叢書另二冊為：顧晉海：《甲骨文發現與研究》及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

〈簡帛中的文書〉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漢文簡牘的文書，主要是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尹灣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的文書內容，並指出簡牘文書有書檄類、簿籍類、案錄類、符券類，並對漢代簡帛文書的研究概況進行介紹；第二部分介紹佉盧文木簡及吐蕃簡牘的內容，指出吐蕃簡牘的內容有：經濟類、軍事類、氏族、部落、地名類、文書類、宗教類。後者針對佉盧文木簡及吐蕃簡牘的內容進行介紹。

〈簡帛書法的藝術和辨偽〉先就戰國簡帛的書法藝術、秦簡書法藝術、西漢時期的簡帛書法藝術、東漢時期的簡帛書法藝術等方面進行介紹，最後談及簡帛的辨偽問題。

經由內內容簡介，可略窺《簡帛研究與發展》一書具有幾項優點：

一、通俗中兼具學術性：由於叢書性質的限制，本書的撰著目標是以通俗爲主，但作者在通俗中仍力求符合學規範，在每章之後附有注腳，說明寫作徵引的依據，在〈簡帛的發現〉一章中的注腳高達 90 個。

二、提出簡帛辨偽的重要性：簡帛文獻除在學術研究上提供寶貴的資料外，因時代久遠，亦具有文物的價值，故利之所趨，造假的情形就無法避免。在簡帛學的研究上，對此問題的關注較少。概論性書籍也未見論及此者。胡平生曾爲文指出香港中文大學藏王杖簡係偽造，並進行考辨。<sup>⑥</sup>其正撰寫的《中國簡牘學》專著中亦列有辨偽專章，惜此書尚未出版，未能一窺胡先生的具體主張與看法。本書論及辨偽，點出問題的重要性，認爲要從材質、文字、內容幾方面入手，值得重視。

三、重視簡帛書法的研究：簡帛的出土，提供研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新材料，而書寫於其上的書法墨跡，也爲研究書法藝術者提供了大批實物例證，因此，已有學者對之進行研究，<sup>⑦</sup>編輯簡帛書法選，<sup>⑧</sup>或進行臨摹，<sup>⑨</sup>唯這些研究成果，在一般概論性書中，均未見著墨。就概論性書籍而言，本書是最早介紹簡帛書法藝術者。

<sup>⑥</sup> 胡平生：《香港中文大學藏王杖簡辨偽》，《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25日，第3版。

<sup>⑦</sup> 黎泉：《簡牘書法》（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趙正：《漢簡書法論集》（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鄭惠美：《漢簡文字的書法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73年12月，初版）。

<sup>⑧</sup> 簡帛書法選，除日本出版的「書道全集」中收錄者外，尚有：宇野雪村著、大庭脩解說：《木簡の書》（東京：同朋舍，1989年12月，第1版第1刷）、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每日新聞社、（財）每日書道會編集發行之《居延新出土書法木簡選》（1996年7月）、馬建華、趙吳成編：《敦煌漢簡書法精選》（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近年出版的簡帛書法叢書，有重慶出版社的「中國歷代書風系列」、上海書畫社的「簡牘帛書粹編」及文物出版社的「簡帛書法選」。

<sup>⑨</sup> 例如：吳頤人：《吳頤人漢簡書法》，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四、圖文並茂：本書共有彩色圖片 13 幅，黑白圖片 206 幅，圖版為已知同類書畫之冠，讀者可圖文對照，加深對內容的理解。

《簡帛研究與發展》一書雖具有上述的優點，但就概論性書籍的角度來觀察，本書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是相關資訊掌握不夠全面。此乃由於某些簡帛出土後，並未正式刊布簡報，或發布簡訊，因此，在進行有關簡帛發現的介紹時，往往無法完整報導，甚至出現錯誤，此係客觀環境造成，不能苛責作者。但為提供讀者正確的資訊，對這些不足之處不得不指出。關於此點，茲舉二例說明之：

一、作者在介紹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以來戰國楚簡的發現時，於頁 13 提及「1980 年湖南臨澧九里戰國楚墓出土竹簡數十枚」，其注腳出現一個引據失誤的現象。根據注腳，得知作者的依據是湖南省博物館、常德地區文物工作隊合撰：〈臨澧九里楚墓〉，<sup>⑩</sup>載《湖南考古輯刊》第 3 輯。按：臨澧九里楚墓群位於臨澧九里茶場附近，湖南省博物館於 1979 年、1980 年、1981 年對之進行過清理發掘。1980 年發掘的黃家山大墓，規模較大，發掘報告準備單獨整理，故〈臨澧九里楚墓發掘報告〉一文所報導的是 1979 年和 1981 年兩次發掘的情況簡報。根據文中第二節「隨葬器物」及文末所附「九里楚墓登記表」，得知隨葬器物有：

銅器：一百十三件。以容器、車馬器和兵器為主。

漆木器：六十餘件。有鎮墓獸、虎座、木俑、漆耳杯、漆案、漆盒、漆奩、漆几、漆瑟、梳、篋、笙、弓、漆甲、漆盾牌把手、木璧、器座、矢箠、殘木器。

玉石器：四十三件。有瑪瑙環、琉璃璧、玉璧、玉魚、玉珠、水晶器、礫石。

陶器：一百九十七件。有鼎、敦、壺、豆、罐、盆、鉢、甗、甌、勺、貝等。<sup>⑪</sup>

上述記載並未見有竹簡，因此，注腳所注的引文有誤。事實上，出土竹簡的是 1980 年 6-10 月發掘的 80 臨九 M1，<sup>⑫</sup>即編號為 80 九 M1 的黃山

<sup>⑩</sup> 按在內文中，文章全名為〈臨澧九里楚墓發掘簡報〉，在目錄作〈臨澧九里楚墓〉。

<sup>⑪</sup> 湖南省博物館、常德地區文物工作隊：〈臨澧九里楚墓發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第 3 輯，頁 87-111。

<sup>⑫</sup> 湖南省文物局：〈1979 年以來湖南省的考古發現〉，《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211。作者在本文注 139，注明資料來源為：「湖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資料」，說明這批材料尚未正式發表，和〈臨澧九里楚墓發掘簡報〉一文所載，80 九里 M1 的出土情況，準備單獨整理發掘報告的說法是相符的。

大墓。⑬這批簡牘的內容是遺冊，⑭大約有二十餘枚，但殘斷太甚，無法整理。⑮對於這個注腳的引文，作者可能是由他人著作引述而來，但未加以核對而致誤。

二、作者在本章論及定縣漢簡中的書籍時，於頁 74 云：「1981 年由整理小組發表了竹簡內容簡介，《儒家者言》釋文等文章。時隔十六年之後，1997 年又出版了《論語》。」這一段敘述，會讓人誤以為定縣竹簡的釋文，目前僅公布了《儒家者言》及《論語》，這並不符合實情。按：竹簡本《論語》於 1997 年 7 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文物》1995 年第 12 期刊登了《文子》釋文，輔仁大學哲學系並於 1996 年 6 月為此而召開「《文子》與道家思想發展兩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隨後在《哲學與文化》23 卷 8 期及 9 期分期刊載。⑯參加此會議的部分學者李縉雲、魏啓鵬、丁原植、陳麗桂、趙建偉等人，於會後又對《文子》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論文刊於《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這對竹簡本《文子》，或定縣竹簡的研究史而言是不容忽視的。

簡帛學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但理論性的著作仍存在不足的現象，任何一本理論性的著作出版，我們是懷著喜悅的心情來閱讀，並對作者的辛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簡帛研究與發展》一書作者進行的商榷，並非惡意的批評，是抱著互相研究及補缺的態度，期望為簡帛學的發展建立堅實的理論基礎。

⑬ 同注 11 引文，頁 87。

⑭ 同注 12 引文，頁 211。

⑮ 據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陳松長研究員於 2003 年 4 月 25 日發給筆者的 E-mail。

⑯ 1996 年 8 月及 9 月出版。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402-408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星光燦爛的文學天空

## ——《苗栗文學讀本》評介

許俊雅\*

書 名：《苗栗文學讀本（一）至（五）》

編 者：莫渝、王幼華

出版者：苗栗縣文化局

出版時間：1997 年至 2002 年 12 月

### 一、《苗栗文學讀本》的體例與內容

近來臺灣文壇不斷有文學選本、讀本的面世。歷來文學集多由出版社編選，如爾雅出版社長期經營年度小說選、《中國近代小說選》等選集，近年又由王德威編選《爾雅短篇小說選》及《典律的生成》。九歌出版社推出張曉風編的《小說教室》、詩人陳義芝編的《散文教室》。洪範書店由楊牧與顏崑陽編《現代散文選續編》。陳玉玲編選《臺灣文學讀本》（玉山出版社），二魚文化推出「台灣現代文學教程」系列，有《小說讀本》、《新詩讀本》、《散文讀本》、《當代文學讀本》、《報導文學讀本》，是專為大專院校通識課程所設計的教材。台中縣國民中小學台灣文學讀本則分為：兒童文學、地方傳說、新詩、散文、小說及導讀等卷（台中縣文化局出版）。

至於《苗栗文學讀本》則更早，1997 年出版了第一輯。《苗栗文學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讀本》的出版，可說是國內首現的區域文學讀本，在 1997 年 6 月到 2002 年 12 月間，共出版了《土地的戀歌》、《熱愛生命》、《扁擔專家》、《燃燈記》、《山路》五冊讀本。這是各界期待已久的文學讀物，然而要給「苗栗文學」編一個讀本，談何容易？「創作」方面，作品的種類和數量不可謂不多，要從中編輯若干選本，不愁沒有材料。可是，困難也在於作品汗牛充棟，悉心選擇具代表性的作品勢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而卷帙之浩繁亦可以想見。什麼樣的作品可以代表苗栗文學？《苗栗文學讀本》的編選工作，除了考量作家的籍貫、作品的題材外，對文學的藝術價值，對人類的生命的啓示，富含情意的薰陶和文學的想像也是編者用心之處。編者莫渝、王幼華以創作家、評論家和教學經驗豐富的教育工作者的身份，編選出極具特色，兼容詩、散文、小說的讀本，以細膩的心思深入挖掘作品的深刻內涵，並以深入淺出、素樸親切的文字，帶領讀者悠遊於文學天地。

《苗栗縣文學讀本》其編輯綱目，除書前的序文，書末的後記、「苗栗縣文字工作者資料」附表外。兩位編註者莫渝與王幼華分工負責「詩與散文」、「小說精選」兩大部分，莫渝所負責《苗栗縣文學讀本》各輯中的「詩與散文」，其內部體例依序為「作者內文」、「主題」、「作者簡介」、「註釋」、「導讀」與「思考」。大抵每篇選文依此體例，偶而「主題」與「思考」有所省略<sup>❶</sup>。小說卷體例稍異。在詩文類部分兼有古典、現代詩、西方翻譯詩作三種，共有 37 篇，其中古典詩共有 5 篇，現代詩則有 26 篇，翻譯西方詩作則有 6 篇。

散文部分未收錄古典作品，但有西方翻譯散文，其中現代散文共 51 篇，西方翻譯散文則有 3 篇，因此散文部分目前共收有 54 篇。值得注意的是，散文並不單純為抒情憶舊，其中不乏兼有自述自身文學觀念者，及文藝研究之類，如柏谷〈小說的極限和極限小說—附羅蘭·巴特作品及俳句改寫〉等共 6 篇，其中兩篇為翻譯性質。小說部分則相當地單純，共選 16 篇，其中有 3 篇翻譯。在篇數上或許是小說篇幅較長，因此無法選入太多篇。

以下就選本內容、入選作家及編選介紹的特色略述之。其一，就內容觀之，這套讀本選文標準，據莫渝所述是：「縣籍作家作品與翻譯，

❶ 例如第二輯《熱愛生命》中所選錄瓦歷斯 諾幹的〈在南庄〉一詩，並無主題與思考。

有鄉土和國族觀點，有歷史和人民迴響、大自然的描寫、親情的溫馨、勵志小品、求學經歷、勞工心聲、旅遊的歡欣等。」而編輯苗栗文學讀本的目的，在於推廣縣籍作家的文學作品，延續文學作品的生命力，透過類似教科書的指導，普及文學、提昇文學認識。選文中童年回憶的文章不少，如〈玉蘭飄香〉、〈風箏〉、〈夏日蟬吟〉、〈內灣吊橋〉；反映環境惡化的文章，如〈拾荒者〉、〈靈秀的後龍溪〉，在現代化的歷程裡，斷層牴牾是勢必難免的。幾乎是所有作家縈懷不去，難以擺脫的夢魘，他們以荒蕪貧瘠、溷穢污濁的意象描摩山城的變遷，凸顯在現代化急遽過程中，油然而生的失落、無奈、幻滅和絕望的感受。美好的記憶不斷消失，過往的記憶突然湧現，眼前的山城遂變得遙遠無法辨識。天籟成了刺耳的噪音，星辰化爲空氣中浮塵。農村鄉間早期的用具，〈磨〉、〈扁擔專家〉，都讓人重溫舊夢。編者也獨具隻眼選了苗栗文學之特色：客語詩如〈屋簷鳥〉、邱一帆〈故鄉〉等。

其二，就入選作家觀之，編者並不只推崇現當代知名的文學作家，對有潛力的新生代作家作品也選入讀本中，如甘耀明、解昆樺、高翊峰、劉正偉、蔡豐全、邱一帆、劉嘉琪這些頗具實力的年輕作家、詩人，便是可畏的新生力量。也唯有如此，苗栗文學才能更加茁壯。

其三，就編選介紹的特色觀之。編者對導讀部分掌握細部的文本詮釋，直接切入作品本身，讀出隱藏在字裡行間的訊息，解說流暢、清楚、精確，更難得的是取材視野廣闊、觀點詮釋貼切客觀。選爲範文的李喬、七等生小說均極好，導讀工作復比較這兩位作家的差異處。在「思考」題的設計上，亦頗有特色。如詹冰〈天門開的時候〉，提到「財子壽」，進而指引讀者進一步閱讀呂赫若小說〈財子壽〉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作法。莫渝翻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Baudelaire，1821—1867）的詩作〈信天翁〉，導讀時即引介洪素麗〈信天翁〉一文。廣博的學識可見。〈王幼華書簡〉一文的思考題，是：「美國小說家斯坦貝克（1902—1968）中篇小說《人鼠之間》（鼠和人，1937年），描敘流浪漢渴盼有塊自己的土地，找出這部小說和王幼華的〈天魁草莽錄〉，對照閱讀。」張福盛〈田園印象〉思考題：「找機會靜靜聆聽德布西的〈牧神的午後〉的序曲」，再細讀張福盛的這首〈田園印象〉，如果有興趣，再閱讀馬拉美的〈牧神的午後〉。」因之的延伸閱讀可說相當豐富有啟發性，也令人驚訝編者的博學深思。

相關的文學理論、寫作技巧的介紹也適當放入，同時每冊的「編後記」簡明扼要交代全書的編纂過程及各篇內涵，都是相當難能可貴。此外，藉著本地作家的翻譯，也讓文學更有世界國際視野。這是讀本甚為難得的編選眼光，誠如該書（第五冊）局長序：「人際關係的接觸與交往，是由近及遠的過程，這經驗使我們想從家鄉文學出發，擴及區域文學，延伸到國家文學、世界文學，讓文學成爲人際交流與歷史傳承過程中潛在對話的橋樑。」

## 二、若干建議——讓讀本有更多對話空間

五冊讀本，約選錄 64 位作家，114 篇作品，如果能熟讀、細讀，相信對當地文學文化必能有深入了解。爲了使讀本有更多討論機會，個人僅提若干問題共同來思考。

### （一）作者介紹

目前讀本入選作家，其次數兩次（含）以上的有：王幼華、江上、李喬、杜榮琛、沉櫻、林壬雨、林海音、邱一帆、洪志明、張典婉、張致遠、梁寒衣、莫渝、陳朝棟、黃恆秋、詹冰、蔡豐全、薛柏谷、謝霜天、鍾喬、羅浪等。這即面臨編選者如何對作者加以介紹，是文字完全相同呢？還是大同小異？或是有進階上的考慮，材料由少漸多，由淺而深？如「江上」，兩次入選散文，一次入選小說。散文兩次介紹，一次忠於日治當時學校體制，使用「公學校」一詞，另冊則使用「國民小學」。在小說處的介紹，則一律使用民國紀年，如一九三二年改爲「民國二十一年」。「柏谷」在第三冊頁 169 與 196 作者介紹，前處有「加入紀弦的現代派詩人群」。在第四冊薛柏谷另署筆名徐激，亦選入兩次，頁 163 譯者介紹謂：「同紀德遺著《回憶錄》乙文作者」，愚意應先介紹說明，此段文字移到同書頁 177。易言之，應是後頭的同於前述。而目錄上的作者署名，似乎也是應有體例可循，如柏谷、薛柏谷、徐激實爲同一人，對一般讀者恐將混淆不清。至於行文中的體例尤需統一，如戰後有用西元有用民國。

又如「林海音」在第四、五冊都選入其散文創作，第五冊作者介紹

除了補上卒年，反較第四冊爲少。又如「梁寒衣」，其著作《迦陵之音》，第二冊列爲「散文集」，第四冊列爲「短篇小說集」，彼此有出入。至於作家「沉櫻」（其本名陳鍊），或用「沈櫻」。早期字體「沈」具有沈、沉之意。沈櫻當然也可以讀同姓氏之「沈」，但筆名似乎是和「陳鍊」同音的。讀本中兩種筆名使用上不一致，究竟是「沉櫻」還是「沈櫻」？還是兩者皆有？都需再確定。「謝霜天」，本名謝文玖（第三冊），第二冊謂是「謝文玖」，或是校對之誤。

## （二）入選文類可再擴及

讀本選文獨缺「戲劇」類，鍾喬是此中佼佼者，但選文所選鍾喬之文與此無關。當然選文有各種考量，或許恰好無適當文章可選，或許是篇幅過長，但文類如果含括散文、新詩、小說、戲劇，獨缺戲劇終究不免有遺憾。至於篇幅，讀本自然不可能選入中、長篇小說。但不妨節選作品再做導讀介紹。尤其像李喬、吳濁流都是以長篇小說膾炙人口，也都是台灣文學經典之作，錯失入選機會實在可惜。此外苗栗客家山歌、民間傳說故事等民間文學都可以考慮選入。

## （三）選文安排位置

第五冊選入解昆樺〈群義·焚夜——霧社事件〉一詩，之後有關此詩之「創作意念」及「解說」，應放在此詩內，似不宜變成選文。〈向羅浪請益〉似也應列入作者羅浪的介紹或導讀裡，獨立爲選文，頗爲奇特。至於小說方面，在體例上似也可考慮與詩文類同有賞讀、思考。

## （四）「思考題」的問題

讀本思考題設計誠如上述，極具特色，但大醇小疵，爲求讀本的完美，謹提拙見供參酌。在賴江質的〈苗栗頌〉裡，編者說「將此詩與羅浪的〈山城〉，略做比較異同。」然其題目設計應是放在讀過下一篇羅浪的〈山城〉之後，比較合適。又如「日本文豪川端康成和臺灣作家吳濁流均有〈山月〉的短篇小說，找機會讀讀。」命題緣由與賴詩的「山作圍牆月作鄰」有關，構想極好。但吳濁流之作爲〈海月〉（〈水月（海蜃）〉）<sup>②</sup>，非「山月」，故題幹本身有問題。

<sup>②</sup> 吳濁流此篇小說之篇名有若干問題可留意。拙著《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曾提到吳濁流於〈泥沼中的金鯉魚

## （五）遺漏未入選的作家

苗栗出現過不少優秀的作家作品，當然不可能在這五冊全部涵蓋，而且編者事實上也注意到很多年輕作家，極力網羅失佚，但似乎仍可補上：曾信雄、李渡愁、（曾、李二人書後附錄「苗栗縣文字工作者資料」可見，但作品未收入）、林文煌、許仁圖等人。李渡愁，曾加入「四度空間」、「曼陀羅」詩社，並任《長城》詩刊主編，後創立「臺北詩壇俱樂部」，擔任社長。曾獲第 22 屆國軍新文藝金像獎散文首獎，第 21、22 屆聯勤文藝金駝獎散文首獎。詩風婉約，作品中透顯出一種憂鬱的氣質，充滿孤寂之感。曾信雄早期偏重鄉土小說的寫作，刻劃農村、林場之生活風貌，以低層人物為描述對象。1974 年以後，改寫兒童文學作品，以樸實的文筆描繪孩子們的世界。讀本在兒童文學上可以考慮選一些作品。許仁圖，曾創立河洛圖書出版社，並任《臺灣時報》記者、文藝組主任兼副刊主編，曾以獄中經驗寫成「阿圖鐵窗十書」，描述囚犯的獄中生活。

## 三、結語——許一個苗栗的未來

一個富有文化內涵的高品質社會進程中，文學是極重要的一環，文學是思想背後的推動力量，是對現實中的生活世界的補救。依王幼華、莫渝的《苗栗縣文學史》，可知苗栗自清領以來即文風鼎盛，人才輩出：阮蔡文、周鍾瑄、吳延華、黃驥雲、吳子光、蔡啓運、丘逢甲及櫟社陳貫、陳瑚（一門之雙璧），現代文學吳濁流、詹冰、李喬、七等生，及由北京返鄉的林海音等在台灣具有不可搖撼的重要地位。同輩如江上、謝霜天聲譽亦高。中生代詩人莫渝、杜榮琛；小說家雪眸、王幼華、梁寒衣；報導文學張致遠、張典婉、藍博洲；從事戲劇創作的鍾喬；致力於客家文學的黃恆秋等，可謂各領風騷，較諸其他縣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苗栗文化中心時期，即出版作家個人作品，後又有「認識

---

自述>謂：「於是我硬起頭皮，苦心三日寫一篇〈水月〉給她看，她稱讚不已，於是代我投台灣新文學雜誌，僥倖刊出。」然〈水月〉一文實則刊於新文學月報第二號，1936年3月2日，題名為〈海月〉。（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頁289、290）後來又見李魁賢先生〈水月、水母及其他〉一文有更詳細的說明，此問題頗有意思，可參《文學台灣》21期，1997年1月，或《李魁賢文集》（第柒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2002年10月，頁149-152）。

作家」系列，著重於重要作家生平介紹。1997年6月起每年出版一本「文學讀本」，2000年出版《苗栗縣文學史》（文化局時期），對當地作家作品，做了非常完整的描述。對於寫作人才的培養、閱讀人口的開發、相關文學活動的舉辦等，都具有推動文學的相當熱情。

然而商業社會的衝擊、視覺藝術的衝擊（這些衝擊在臺灣各地都是相同的），市場經濟和商品化社會使原來被壓抑的慾望表面化了，文學創作的神聖感被褻瀆、被懷疑，人們以幾乎不加節制的態度，視文學為遊戲和娛樂。擺脫了負荷沉重的文學，頓時變得輕飄，狂歡縱情的姿態，普遍缺乏一種人文的關懷、人文的精神，在信仰貧乏的世紀裡，召喚這些與土地人民歷史結合的文學，幾乎不免要受到年輕世代的嘲弄。但在這些讀本文學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台灣人對土地的認同和關懷，更感受到這一代的生命力和新希望。有志於台灣文學的愛好者，能從文本中獲得喜悅和智慧，甚至引誘出創作的可能和樂趣及資源，而各類秀異的作品，更是一道道精緻可口的文學佳餚。這些材料的提供，不僅可使讀者容易進入文學情境，也對鄉土教材編纂實有相當參考作用。目前由教育局編印的鄉土教材，題材的編寫側重於歷史，若能在定稿之前交由文學家及鄉土文學史家加以修訂及潤飾，使鄉土教材除了是認識鄉土史地的讀物外，也可以是一部文學作品。選擇台灣本土優秀文學作品，使學生直接進入本地文學的閱讀。希望此套書也能像台中縣文化局一樣大力推廣其縣內文學讀本，使更多人有機會接觸文學，提升文化生活內涵；願苗栗作家們繼續努力，打造更多苗栗文學的品牌，使苗栗文學的天空，更加星光燦爛。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44卷 頁409—413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年7月

## 《張文環全集》評介

林政華\*

書名：《張文環全集》全八卷（八冊）

編者：陳萬益主編

出版者：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出版時間：2003年3月

### 一、緣起

終身和臺灣土地相連，藝術成就崇高的人道主義作家——張文環先生，於1978年2月12日逝世，享年七十歲。同年七月十五日，張良澤、哲嗣張孝宗先生已爲他編印了《張文環先生追思錄》，收有親友的感念文章卅九篇、家人的哀思文字八篇；又有輓聯、唁電、花圈，以及附錄三篇。誠如張良澤在編輯〈後記〉中所說的：「因匆匆截稿，未能遍邀各界先（前）輩同聲一哭；然有此數篇（按：指數十篇），已足見先生精神不死，亦足啓迪後〔學〕堅定斯志。」

《追思錄》中所記，多談其人格；論張氏之文學成就，則有待閱讀其文本。1991年2月，由張恆豪主編的「臺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出版了《張文環集》，由前衛出版社印行。收有張氏的小說〈早凋的蓓蕾〉、〈重荷〉等九篇。雖說張氏最重要的短篇小說都有收錄，但畢竟張氏的文學成就，不止短篇小說之創作一端而已，其他尚有中篇小說、長篇小說、隨筆和日記等等。即以短篇小說而論，也不止九篇！因此，仍有待「全集」

\* 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本國語文教授



的編纂，尤其是在張氏一生以日文寫作，生前公諸於世的篇章有限的情況下。

## 二、《全集》的編纂經過

1997年4月，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委託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教授陳萬益，從事張氏全集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陳教授得到張氏家屬無條件的提供張氏的手稿、剪報；除在臺灣國內搜集資料之外，也到日本訪查，得到多位學者的協助；所以在一年後，即完成「《張文環全集》資料輯十四冊」，公開讓研究者使用。同時委請曾親炙張氏，甚為了解張氏的陳千武先生，幾乎一手包辦了翻譯一百萬字《全集》的大工程。2001年，文化中心又出版了《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陳教授在《全集》中文版序〈復活與還鄉〉一文中說：

張文環畢竟是以日文寫作的作家，再好的翻譯都難免損失，全集的出版，自始即希望能夠將作家本來面目示人，……因此文化中心……將張氏已刊未刊稿，包括修訂稿，以原作掃描，製作光碟，使讀者可以直接親炙張氏的文學，並且省視作家不斷修訂謄寫的用心。

至於華文翻譯的《全集》，則在2002年3月正式出版：前後歷時不到五個年頭。

## 三、《全集》的內容

《全集》出版前先行問世的「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分三片，是《全集》的姊妹作，更是《全集》的一部分。第一片有：序、小說（中、短篇《落蕾》等十八篇）。第二片為翻譯小說（《可愛的仇人》）、評論（九篇）、隨筆雜文（五十六篇）、編集後記（九篇）、發言記（紀）錄（十八篇）。第三片為草稿（包括未刊稿六篇、訂正稿七篇）。

《全集》一函凡八卷（每卷一冊）。一至五卷為小說集；前三卷為中、短篇，四、五卷為長篇。第一卷的篇目為：〈落蕾〉、〈貞操〉、〈哭泣的女人〉、〈父親的要求〉、〈過重〉、〈部落的元老〉、〈被強制的題目〉、〈豬的生

產〉、〈兩位新娘〉、〈辣菲纜子〉、〈憂鬱的詩人〉、〈藝姐之家〉等，凡十二篇。並附錄電影劇本〈嘆煙花〉，為林博秋所編劇。

第二卷小說篇目為：〈部落的慘劇〉、〈論語與雞〉、〈夜猴子〉（附修訂稿）、〈頓悟〉、〈閩雞〉（附修訂稿）等五篇。並附錄林博秋和清大中語系所編〈閩雞〉劇本各一篇。

第三卷小說篇目為：〈地方生活〉、〈故鄉在山裏〉、〈迷失的孩子〉、〈媳婦〉、〈父親的送行〉、〈戰爭〉、〈土地的香味〉、〈在雲中〉、〈日月潭羅曼史（一）〉、〈日月潭羅曼史（二）〉、〈莊稼漢〉、〈地平線的燈〉，凡十二篇（十一題）。

第四、五卷的長篇小說篇目為：〈山茶花〉（四卷；分孟麗君等十五題）、〈爬在地上的人〉（即《滾地郎》。五卷；分六章）。

至於第六、七卷則為《隨筆集》一、二，也就是雜文集；計有六十篇（六卷）和十九篇（七卷。七卷後有〈編輯後記〉十一篇、〈座談會記（紀）錄〉十一篇）。

最後一卷為《文獻集》，除首篇〈大會簡略日記〉，是張氏 1942 年參加日本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研究會」的十八天日記之外，就是臺、日學者對張氏及其作品的評論文字，有木口毅平的〈尖兵〉等二十篇。後另有張孝宗〈感謝的話〉、張玉園〈憶父親〉，以及柳書琴的二篇文字：〈張文環研究文獻（初編）〉、〈張文環生平寫作年表〉。

## 四、評 論

### （一）有待補苴之處

柳書琴所編〈張文環研究文獻（初編）〉（見第八卷文獻集）所收尚有遺漏，例如：1978 年 9 月《台灣論報》第十七號，有綺色佳人所撰的一篇〈台灣文學家——張文環〉評論，當補入頁 109 三、作品研究（二）總論之中。此文約二千字，記述張氏的生平及文學成就。茲錄一、二段評論其文學成就的文字於後：

除了〈藝姐之家〉以都市為背景外，其餘大都以鄉村的庶民生活為題材，描寫台灣農村的風俗民情，細膩感人，開拓了台灣鄉土文學的領域。他的小說中，幾乎網羅了社會各階層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他們模糊地知道，命運之神

是殘酷的、不公平的，卻無人加以對抗，只好讓正義摒棄他們，讓社會吞噬他們。

而此文對張氏的代表作〈在地上爬的人〉小說，更有深刻的評論：

〈在地上爬的人〉承繼他一貫的文學特色，以極細膩的手法描畫台灣民俗，銳利地刻畫出台灣民眾的性靈，在他的小說裡可以聽見三百多年來在異族鐵蹄統治下，被壓抑的台灣民眾的呻吟和憤怒，他所要表現的是「社會某一階層沒有做人的基本條件」的那種被欺凌，被賤踏的生活。他在給林芳年的信上寫着：「關於該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有否真實的人物，那當然有的，作品中的東保保正太太就是我的姑母，姑母的小姐就是我的表姐，這位表姐當時被譽為村中的第一美人，作品的內容描寫，可以說尚未到實際情況的一半，……」。此書足以與描寫知識份子的徬徨苦悶為主題的《亞細亞的孤兒》相媲美。

由上引，可知此文是一篇重要評述文章，遺珠甚為可惜！

另外，張恆豪主編的《張文環集》頁 271，〈張文環小說評論引得〉中，載張良澤 1978 年 2 月 20 日於自立晚報副刊發表的〈張文環先生逝世〉文，應收入柳書琴〈初編〉頁 98 下。

又：張恆豪上引書頁 274 有下列一文，為柳文所無，應補入柳文頁 100 第五則之後：

《文藝台灣》中的台灣作家 葉石濤 台灣文學的悲情 派色文化出版社 1990 年 1 月。

更有《張文環追思錄》中第三篇中的二十八則輓聯，柳文也全未採入。實則，由輓聯中可以看出逝者的人格以至成就、貢獻。茲列出其中可取當補入者數則於下：

古稀方屆明潭一夜文星殞

新作未完遺恨千秋鉛槧寒

黃得時揮淚哀輓

數十年文學運動春風並坐夜雨聯床回首前塵悲若夢

猶著佳構竟未成一朝永訣典型式望尚留斯界作巨人

巫永福敬輓

商界遺型

彰化銀行總經理羅光華敬輓

前二聯，因出於臺灣文學家黃得時、巫永福先生之手，特別具有文學價值；而彰銀羅總經理稱他在商界遺有典型，也見證張氏經商有成。三輓聯對後人欲探究張氏其人、其文，均有所助益。

## （二）編排可商榷之處

至於編排方面，也有待改進之處，例如：第一、二、三卷為短篇、中篇小說，計有廿九篇。短篇、中篇仍應再細分，不宜籠統處理。

而第一卷短、中篇小說後，卻附錄林博秋所編〈嘆煙花〉劇本。第二卷末也附錄林博秋、清大中語系所編〈閩雞〉劇本各一篇。這三齣劇本，嚴格來說並不是張氏作品，只可附入《全集》之末；雖然是根據張氏的小說所改編的。

另有《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中第二片，有翻譯小說《可愛的仇人》。在《全集》中卻未見。翻譯作品亦為一位文學作家「再創作」的表現，頗為重要。它是華文譯為日文，當以日文呈現在《全集》中。

《全集》最後一卷的《文獻集》，照理應該把前述《張文環追思錄》中所有的文字納入，它們正是研究張氏與張氏文學極重要的「文獻」，一篇也不宜摒棄。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414—421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評介

林珠雪\*

書 名：《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

作 者：王泰升

出 版 者：台北，聯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年 4 月

頁 數：427

國際書碼：ISBN957-08-1931-6

## 一、前言：台灣史研究的缺口與近代天皇制國家的殖民地統治特色

如眾所周知，1980 年代以前的台灣在台灣史的研究上是相當受限。由於受國民政府意識形態的影響，當時，如王育德《苦悶的台灣》<sup>①</sup>，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sup>②</sup>，許世楷《日本統治下的台灣》<sup>③</sup>，黃昭堂《台灣民主國的研究》<sup>④</sup>都被列為禁書，但 1980 年代以後伴隨著戒嚴令解除後的民主化現象，諸多政治禁忌漸被破除，台灣史的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迄今，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學術成果。以政治法律的範疇而言，相繼有初期的武裝抗日及 1920 年代之後的以知識份子為中心的政治社會

---

\* 東海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① 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93 年。

② 台北：草根文化出版，1998 年。

③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1972 年。

④ 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出版，1993 年。

運動等專論的出現，如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sup>⑤</sup>，吳文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sup>⑥</sup>等都受到相當高的評價。但或許是受到日文文獻的限制，有關日治時期的政治與法律方面的研究似乎較多是站在被殖民者的角度去看當時的殖民統治政策，當中有著較多的悲情和不平，即或是描述知識份子在當時民主思潮的影響下的民族民主運動，其場域還是限於台灣社會的格局裏，在這些著作中較見不到日本為政者的台灣觀及其與台灣社會的互動情況，乃至為政者在對台灣社會的更深的瞭解下（當然可能只是為了統治上的利益與方便）所帶來的殖民政策之變動及其影響，而在長達 50 年的殖民統治中殖民母國本身的社會文化是否已有某種程度影響了台灣今日社會的形成，當我們要連結因政權的改變而被斷裂的台灣歷史時，是否也應在被統治者的民族自覺與強調台灣本土之主體性的主題之外，加入日治時期統治者的種種要素及其對今日的影響？

另外，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中有一不容忽視的特色，即是對舊慣的調查，並在其殖民統治中融入舊慣的諸多要素。日本在近代是非歐美國家中唯一擁有殖民地的國家，歐美列強的殖民地多為歐美之外的不同文化圈，但日本的殖民地卻是其共同文化圈的亞洲鄰國，毫無殖民經驗的日本，勢必想借助其他列強的殖民經驗與殖民政策，來加強其殖民地統治<sup>⑦</sup>，就如其明治時期的近代化經驗一般，日本雖急於想建立一能與列強並駕齊驅的近代化國民國家，但深藏於其社會與政治文化中的前近代之封建本質，卻引領他們成立一近代與前近代並存的近代天皇制國家，在殖民地的統治上同樣亦具有此一特質，即一方面仿效先進諸國直接地強制其殖民地接受其法律制度與觀念，但同時又由於同屬亞洲文化圈的先天條件及其近代化的經驗，他們了解到舊慣對於統治上的必要性與方便性，因此在其強制性的殖民統治中亦融入台灣傳統社會的舊有慣例與特質。近代天皇制國家的統治特色不僅表現在其國內的政治社會，當然亦延伸到其殖民地，並在某種程度形塑了該殖民地的近代社會。

因此，若能掌握天皇制國家的統治特色，並將場域更擴充到殖民統治者的範疇，則在研究殖民時期的台灣之各項問題上將更顯周延。

⑤ 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89 年。

⑥ 台北：正中書局出版，1992 年。

⑦ 有關殖民政策的理論性問題，矢內原忠雄《殖民及植民政策》（東京有斐閣，1929 年）是相當先驅性的研究，當中對於先於日本的各國之植民政策與原理有很詳盡的比較與說明。而淺田喬二則對各家的植民政策論有深入的探討（淺田喬二《日本殖民地研究史論》，未來社，1994 年）。

## 二、《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所反映的殖民地特色

針對上述的目前台灣研究的缺口，王泰升教授<sup>⑧</sup>所著《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能有一部份的補強效果。本書討論的焦點雖然集中於「由日本主導的法律改革下，台灣人民對於近代西方法（尤其是刑事法和民法方面）的繼受」情形，但對於連結台灣歷史中日治時期的斷層部分，及日治時期的日本對形成台灣近代社會的影響的研究上卻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因此其成果不但受到台灣史學界的重視，在日本的史學界也受到相當的注目與討論。

此書由王氏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作者有感於長期以來，台灣法學界在討論法制史時，幾乎都排除了日治時代法律的存在，而極少數有討論過殖民時期法律的論述，卻也多半將重點置於具有壓迫人民性質的殖民地法<sup>⑨</sup>。因此，在「台灣的繼受西方法」上就產生了日治時期這個斷層，本書即針對此一斷層，檢討日治時期日本引入的西方式法律對台灣的影響，並探討此一影響在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獨特現象」，試圖藉此反省台灣社會戰前狀況與戰後發展所可能具有的延續關係。

本書雖然主要的焦點在於探討日本在台灣施行的西方繼受法，但另一重要的目的是強調台灣社會的特殊性，特別是經過日治時代之後，台灣有著截然不同於傳統中國社會的近代化本質<sup>⑩</sup>，作者在導論中提及「台灣人民在 19 世紀末即將面臨西方式法律時，不僅仍保留了許多移民社會所移留下來的特性，且多少沈溺於族群的分類意識，根本欠缺近代的國民意識，既無

⑧ 王泰升教授曾擔任律師，專辦國際商務；1989 年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期間，驚訝於台灣法律史相關史料甚為齊全，卻幾乎未見台灣法律人從事此領域之研究，為了一償替「台灣法」寫史的心願，乃改變整個人生規劃；在撰寫以「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為題的博士論文期間，為探求日治時期統治者制定各項法令之政策目標考量，乃親至前台灣省文獻會委員會查閱「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此項史料的運用不但為法學界之創舉，在當時的史學界亦屬少見。除了此博士論文之外；1998 年，重新整編台灣總督府法院於 50 年間累積之九千餘冊法律論著或期刊，完成了一本總目錄；同年又完成了對清治時期「淡新檔案」進行法學上的考察之國科會報告，並將其成果納入《台灣法律史概論》一書中；1999 年專程赴日查閱「公文類纂」及「公文雜纂」等日本內閣公文書，藉以釐清日治時期關於台灣的立法權之運作情形。由於上述對學界的貢獻，王泰升教授因此獲得了第一屆傑出台灣文獻獎的殊榮（2002 年）。

⑨ 特別是戰後台灣的法學界，向來一提及繼受西方法，馬上聯想到中國政權自 20 世紀初開始推行的法制西方化，但台灣在 1895 至 1945 年間並未受到中國政權所統治，應該如何解釋此一現象，是一不可忽視的課題。

⑩ 作者是以法律的改革問題來探討台灣近代社會的形成。有關於近代化的問題，一般較易被觸及的主題是經濟與政治體制的近代化，但法律制度的實施更相當程度地對社會面造成影響或改變，因此從法律的觀點來切入近代化的主題，是可以相當程度觀察到社會的改變。

日治以後所產生的『台灣人意識』，更無所謂『中國人意識』<sup>①</sup>。

### 三、本書的主要內容與特色

基於上述的認識，作者在第一章「日治前的台灣與治台前的日本」的歷史背景介紹中即鮮明地強調日治之前統治過台灣的政權中不僅荷蘭與西班牙是外來政權，鄭氏王國與清廷亦屬外來政權<sup>②</sup>，而這些外來政權雖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一些影響與法律制度，但在日本接收台灣當時，台灣依然是保留諸多原鄉習慣規範的移民社會。當時已將許多近代西方法納入新法典中的明治政府，即以此先進之姿君臨台灣，進行包括法律在內的「改造」。

接下來的第二、三、四章則就其專業的角度來看日治時期的近代法律改革。第二章「殖民地立法上對西方法的繼受」；探討的是日本政府為改造台灣的法律體制，在殖民立法上究竟採取了多少近代西方式法律規範。此章首先就台灣的殖民地立法制度部份，敘述了日本政府之所以陸續訂立「六三法」與「法三號」的原因，及其訂定過程中雖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及引發「有違憲之嫌」的反彈，但終究還是在其立法中相當程度維持了台灣總督的廣泛權力的整個過程。接著將日本時代區分為前後兩期，分別敘述當時刑事及民事立法的實際內容，及其與近代西方法之間的關係。日治前期的殖民地立法，經常是參考中華帝國法、台灣舊慣、殖民地法制而定，直至日治後期，才為了加速台灣人的同化，採行內地延長主義，使得西方法藉由「日本內地法」在台灣的實施，而得以進入台灣。最後再觀察被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對於日本統治者在立法上所進行的西方法繼受的看法，及其接受和抗拒的程度。當中作者特別強調多數知識份子雖傾向於西方的法律制度，但他們彼此之間，對於從事法律改革的途徑乃至具體的法律內容，仍有相異看法。再加上欠缺足以抗衡施政者的集體力量，這些希望在台灣法律近代化的改革中居主導地位的知識份子的努力終歸於失敗，立法權仍掌握於外來殖民統治者的手中。第三章「近代西方

<sup>①</sup> 本書，頁13。

<sup>②</sup> 「鄭氏王國仍是一個『外來政權』，只不過它是台灣第一個漢人政權。以台灣為暫居性基地的鄭經，果然於1673趁清朝中國的三藩之亂，『揮軍反攻大陸』(頁29)，對於清廷亦屬外來政權的說法是「不論是滿族或漢族的官員，皆非自台灣社會產生，故對於台灣的原住民及漢人移民而言，仍是外來政權」(頁31)。



式司法的運作」；探討構成整個西方式司法運作核心的法院制度在台灣的落實情況。作者提及經 1919 年的改革後，基本上台灣的法院制度已幾乎跟日本一致，擁有充分的硬體設備以及既有能力又廉潔的法律專業人員。但當時地方行政機關施行的民事爭訟調停權及警察機關的犯罪即決權卻已某種程度阻礙其將西方式法律逐漸滲透入社會的功能<sup>13</sup>。第四章「刑事司法與變遷中的社會」；此章主要的課題是，西方式刑事司法對於日本統治下台灣社會的影響，作者指出自 1930 年代後期，台灣人異議分子事實上在島內已逐漸消寂，日本為維持台灣的社會秩序，對於一般犯罪建構了一套結合法院制度、犯罪即行制度、浮浪者取締制度的「犯罪控制體系」，此法雖在國家權威的強力介入下傷害了人權，但卻也有效地壓制了自清治時期以來既存的重大危害社會秩序的犯罪，而在這項刑事司法轉變過程中，台灣一般人民已或多或少接觸某些近代西方刑事法基本概念。第五章「民事的西方化」則提及西方歐陸式民法在日治時期已逐漸施行於台灣社會的過程與實況（主要是從有關田園土地法律來看民事財產法西方化的歷程）。台灣人在傳統中國法制底下各種習慣規範的內容，首先被日本統治當局以歐陸近代法概念重新詮釋，且賦予西方的「權利」概念。雖然一套針對台灣社會情事而設計、揉和台灣舊慣與西方民事法規範的法典，終未被制定；但 1923 年以後，另一套原為日本社會設計、且已大量採取歐陸法規範的日本民事法典，除親屬繼承篇之外，仍施行於台灣。至此，於國家實定法上，台灣人的民事事項已大多依照來自西方的歐陸民法規定。

最後一章「歷史評價及其對後世的影響」；除了對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給予一「功」與「過」之評價外，並映照日治時期來看國府統治後的法律政策之實施狀況，以作一對照性的評判。在評論日本殖民政府在台之法律改革的功與過時，作者雖強調這個由日本主導的法律改革，最大的「過」在於改革的「程序」，即台灣人無權經由多數決選擇其自己所想要的，以致其整體利益，終歸是從屬於統治者的利益。但卻也明白地表明我們「必須承認日本政權的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改革推動者，且在台灣獨特的條件下進行法律的近代西方化」<sup>14</sup>。然而對於日治時代的近代法與中華民國法制

<sup>13</sup> 但筆者認為此點與其天皇帝國的統治方式有相當重要的連帶關係，即在其傳統統治當中「警察」對人民的監督與管理的功能，是其他法律條文或行政手段所無法取代的，當時日本之所以仿效西方法律是有其近代化的考量，但其在管理人民的理念上依然無法擺脫前近代的要素，因此與其說此點阻礙了近代化的體制不如說此點是其更主體性的選擇與特意的統治手段。

<sup>14</sup> 本書，頁 404。

的承續，則強調雖然自 1946 年 10 月 25 日起，日本原施行於台灣的 2600 餘種法令已遭廢止，僅剩暫行保留的 236 種法令，但由於中華民國法制，原即大多以日本法為典範<sup>15</sup>，故日本在台灣 50 年來實施的西方式法典，正好為中華民國西方式法典之實施於台灣，奠定堅固的基礎。也就是說，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已將台灣改變成能讓中華民國西方式法典（以日本法為規範）順利施行的近代化社會。作者試圖以此來延續連接戰前台灣社會與戰後台灣社會的關係。

另外，對於國民政府的評價，則以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的一連串法律政策與日治時期的幾個階段相映對來加以說明；諸如：在國府接台之初，國府亦與日本於 1896 年制定六三法時所辯解的理由一樣，表示台灣之做為特別地域，僅是過渡性的措施<sup>16</sup>、1945 年國府制定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內容幾同於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官制」、總督府時期的「評議會」與「台灣省參議會」的僅供「諮詢」的之同質性、實際的政治運作上國民黨政權的行政長官公署內的高階官位，幾乎都由來自中國內地者所掌握，宛如日本政權治下內地人之壟斷總督府內高層人事、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之訴求則可對照於 1930 年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等。作者以此映照的對比手法來詮釋原本被日本統治的台灣人的觀點，更表明國府實際上是一個外來的漢人政權，不同於日本統治者的只是自 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權已無「母國」可繼續支援其外來統治，但作者也強調國府治台 50 餘年後的今天，雖國家法律體制仍殘存著外來性格，但國民黨政權本身已蛻變為一由原住民、原台灣人、新住民（外省人）所組成的「本土政權」。

在結論中作者總結，基於同化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考量，日本在台灣有效地執行已西方化的殖民地法律，台灣人逐漸熟悉近代西方式的刑事，尤其是民事、法律制度。但這畢竟是經過日本政府篩選過的西方法，真正用以保護人民免受政府恣意侵犯、且以實現社會正義做為法律首要任務的近代西方法基本精神，則尚未為當時一般台灣人所知悉。

<sup>15</sup> 「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除了刑法典之外（清廷仿效自日本之歐陸式法典草案），皆未將其付諸實現。惟日本的法律，繼續影響著這個時期的中國法。許多日本明治時期的刑事特別法，都可在中國北洋政府的法律中找到相對應者……1928 年由國民黨取代北洋政府統治中國……國府所公佈施行的中華民國法典，仍保有濃厚的日本法色彩」（頁 381—382）。

<sup>16</sup> 國府接收台灣時，由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以「委託行使」的方式，賦予台灣在地政府「較大之權力」的作法，就猶如日治時期般，台灣被定位為一國之內的某個特別地域，成為新的「台灣總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是由中央命令。

本書雖以法律的立場來敘述台灣社會近代化的歷程，但卻也清晰地析論出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予台灣近代社會的影響與貢獻，並闡明台灣歷史社會的特殊性及歷經幾個包括初期的國民黨政權在內的外來政權之後的獨特發展。內容雖有諸多章節是屬法律專業的探討，但由於資料與舉證的豐富及敘述之簡明易懂，即使非法律專業者亦能完全掌握其脈絡及立論要點。

更由於作者的法律專業背景及其曾為執業律師的經歷，使本書除了筆者在前言中所提及的在法制史上的特殊貢獻外，其在探討各章節中的法令條文之變遷及分析條文之實質內容時，能更顯其深度與精確性。另外，作者的留美經驗（本書基本上是在美國留學期間寫成），使本書對於研究史的探討範圍不僅及於台日及中國，更及於美國的研究狀況，書中亦參考了諸多美國的文獻資料，使其論述更見廣度。

只是本書雖強調日本的法律改革已將台灣改變成具有能讓以日本法為規範的中華民國西方式法典得以順利施行的近代化土壤，並試圖以此來延續戰前台灣社會與戰後台灣社會的關係。但，對於台灣是否已然改變為近代化「土壤」的敘述篇幅卻顯然不足，亦缺豐富的舉證，使這一部份的說服力降低，另關於戰後施行於台灣的中華民國西方式法典與日本法的必然關係之說明與論證則過於簡約，亦同樣具有上述的缺點。

#### 四、結語：兼談《春帆樓下晚濤急》

視點、立場、乃至意識形態的不同，其所呈現的觀點甚至論點的差異性可能就是 180 度的兩極化。在「後李登輝時代」裏，統獨意識已從檯面下的暗洶洶湧，轉為檯面上的旗幟鮮明，或化為「族群意識」或化為「政治立場」不一而足，其意識形態之爭更展延到學術的領域裏，顯像為壁壘分明，敵我互見的立論與觀點。

對於日本治台時期的「功」與「過」，竟也在統獨的意識形態下（甚至是民族意識的情緒下），有著相當兩極的看法。在稍後出版的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sup>17</sup>對於王氏之對於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採正面積極的評價

<sup>17</sup>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4月。

⑬，提出嚴厲的批判，認為是溢美日本殖民統治之無視歷史真相的說法。黃氏十分推崇戴炎輝教授一貫的論點，認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基本上是愚民政策及民族歧視”，這是黃氏在書中不斷反覆強調的一重點，並藉此反駁親日者與對日採正面看法的學者。但筆者認為此點與王氏論點並無矛盾之處，王氏雖對日本的法律改革持正面評價，但也一再強調，任何改革皆是本於其殖民利益因此吾人並不需感激日本人。

因此，究其何以會有兩極化的觀點的產生。筆者認為問題的焦點並不在課題所在的日本之殖民地統治問題，或是反日或親日的立場，而是作者本身意識形態影響下的中國觀與台灣觀，甚至是其政治立場。就以此二書為例，不管其對日評價為何，以其立論的出發點來看，其最大的差異處在以下數點：

- (一) 中國是否為台灣的外來政權（包括鄭氏、清廷、國民黨政府）
- (二)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台灣是否已形成一有別於中國本土文化與民族形態的具主體性之獨特區域
- (三) 台灣的近代化成果究竟來自何處

以上數點的認知之差異，是兩者南轅北轍之論點的關鍵。

---

⑬ 黃教授是以王教授在 1992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Legal Reform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1895-1945)：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of Western Law，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eattle，Wa.，U.S.A.，1992.為主要的批判對象。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卷 頁 422—433

東海大學文學院 2003 年 7 月

# A Review of David Crystal's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Russell Morano\*

Book Name: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Book Author's Name: David Crystal

Publis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Date of Publication: 1997

Number of Pages: 150

ISBN # 0-521-629942

## INTRODUCTION

David Crystal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he author of some 60 books, he is perhaps most well-known as the editor of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He is the founder-editor of *Linguistics Abstracts*, has served as chair of the U.K. 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 and is an Honorary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Such an illustrious background has well qualified him to write the book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Fifty years ago, few people expected English to become the world language

---

\* Lecturer,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Tung Hai University.

that it is today. In this book, Crystal examines the reasons why this has happened. He is one of the first to write on this topic also willing to explore the social-historical factors that have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English as such a dominant language. Crystal's work is not a dry statistical survey. He is sensitive to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 role which English plays in the world today.

Although published several years ago,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still provides a good, informative review of how English has become the world's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those of us who are not quite sure why and how English has attained this position, Crystal's book gives a clear and interesting explanation. Both scholars and lay people will find the book helpful and enjoyable since Crystal refers to issues which are as alive today as when this work was first published.

## Chapter One

Chapter One is called Why a Global Language? In this opening chapter, Crystal explores the reasons why English has become a global language.

Crystal estimates that by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arly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as fluent or at least competent in English (p.5). However, most of these people are not native speakers of the language.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special position English has in the world exists in three basic forms: as a mother tongue, as a second or official language, and as a commonly-learned foreign language. Thus, the actual use of English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may vary greatly.

Examples of nativ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Britain, Ireland,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Examples of nations that use English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in government, media, and schools are Ghana, Nigeria, India, and Singapore. Many other nations have made English a priority in their foreign-language teaching. Over 100 nations such as China,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it into this category.

Why does a language become global? 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f a language is due to its aesthetic qualities, clarity of expression, literacy power, or religious standing. However, Crystal reminds us that the real cause of a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success is due to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strength of its speakers. Crystal gives examples of other languages that once were dominant in the world. The arm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spread Greek through the Middle East. The Roman armies spread Latin throughout its empire and the later rise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ensured Latin's place in Europe another 1,000 years after the empire fell. The armies of Islam were instrumental in spreading Arabic across norther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colonial policies of Spain, Portugal, and France spread their native languages in the Americas, Africa, and the Far East. Later,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economic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an enormous role in the spread of English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global language is needed today because of the huge increase in political and business contacts between nations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Nations was formed in 1945 and since then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any other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While translators are still common, their use can be both cumbersome and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at times.

However, there are dangers to having a global language. Critics have complained that an elite monolingual class of people may emerge who can use the language with ease and gain an advantage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over non-native speakers. There is also the danger of many local languages simply dying out through lack of use. Although he recognizes these problems, Crystal proposes two basic solutions: (1) Children ought to be taught English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ir full-time education (p.14). (2) More people need to become at least bilingual (p.19). Knowledge of a global language provides access to the world community. Knowledge of a regional language provides access to a local community.

World circumstances being what they are, it does not seem likely that anything could prevent a world language from continuing to develop. Crystal suggests that perhaps an efficient type of translation machine could someday mak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unnecessary. However, by the time such a machine could be developed and distributed, the position of English in the world will already have become impregnable.

## Chapter Two

Chapter Two is called Why English?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this chapter, Crystal gives a detailed history of the growth of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He traces how English first became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Britain and then spread to many other nations.

The British Isles represents the homelan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language began to take on a global status by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1603). At that time, the number of mother-tongue English speakers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between 5 and 7 million (p.25). English then began to spread from England and Scotland to colonies overseas.

The first permanent English settlements in America were founded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immigrants continued to flood the east coast throughout the century. Large numbers of Irish settlers entered America beginning in the 1700's. In addition, people from non-English speaking areas such as Africa, Germany, and Holland began to swell the popul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one or two generations, most of these immigrant families had learned to speak English and the common language helped to maintain American unity despite the remarkable cultural diversity that characterized the arrivals.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United States had almost four times as many mother-tongue speakers as any other nation (p.30).

Elsewhere in the New World, English spread into Canad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nada received immigrants from the British Isles as well as from the northern U.S. following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During the tim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British colonies in the Caribbean such as Jamaica and the Virgin Islands also became English-speak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also began to spread in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explorations of James Cook in 1770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colonie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Dutch, German, and English colonists settled in South Africa, arriving in large numb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day Afrikaans and English are both official languages in South Africa, although the black majority generally perceives Afrikaans as the language of authority and repression while English is seen as the language which gave it unity and an international voice.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has the third highest number of English speakers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p.41). British economic and colonial interests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sovereignty over India from 1765 to 1947. After India and Pakistan achieved their independence, English has continued to be used in those countries as an associate official language.

Many former African colonies have adopted English as their official language. Although not all of these modern nations were originally settled by the British, they have all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either Britain or the United States. African nations that widely use English today include Ghana, Kenya, Nigeria, Liberia, Uganda, Zambia, and Zimbabwe.

Finally, British influence has spread th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and into the South Pacific islands. English is an official language in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such as Singapore, Malaysia and Papua New Guinea. America has spread the language through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n various Pacific islands following World War II.

To help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tails of this chapter, Crystal refers to U.S. linguist Braj Kachru who has suggested that we think of the spread of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as consisting of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1) the inner circle, which includes the traditional bases of English such as Britain, the U.S., and Canada

(2) the outer or extended circle, where English is an important second language in such countries as India and Singapore

(3) the expanding circle, where English is commonly taught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such countries as China, Russia, Japan, Indonesia

and Brazil (pp.53,54)

How widely English will ultimately be commonly spoken in the world will depend much on the expanding circle. This group of nations represents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the langua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 the language has spread, different varieties of English have also emerged, thus reminding native speakers that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only ones who will determine how the language will develop.

### Chapter Three

Chapter Three is called Why English?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In this chapter, David Crystal explores the cultural roots that underlay the expansion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He describes what was taking place in Britai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which served to give greater impetus to the spread of English to other nations. This chapter is an eye-opener for those teaching or learning English today. It seems that the motivation which many people in Taiwan have for learning English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e the same that have existed for people in earlier centuries.

An important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led to greater study of English was the com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we saw in chapter 1,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had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industrial and trading nation. Its population of 5 million in 1700 more than doubled by 1800, and during that century no country could equal its economic growth, with a gross national product rising, on average, at 2 per cent a year. Most of the innovatio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ere of British origin: the harnessing of coal, water and steam to drive heavy machiner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in a wide rang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By 1800, the chief growth areas, in textiles and mining,

were producing a range of manufactured goods for export which led to Britain being called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p.71)

Since these innovations were coming from an English-speaking nation, this meant that those from abroad who wished to learn about these inventions needed to learn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enabled one to access knowledge. This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many Britons began to earn a living abroad and to teach new method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to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Not long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s momentum spread to the new United States. When the American research is added to the British, Crystal suggests that about half of the influenti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utput between 1750 to 1900 would have been written in English. About 45 per cent of the people from this period were either working in an English-language environment or collaborating with English-speaking scholars (p.73).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nglish had become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global politics.

## Chapter Four

Chapter Four is called Why English? The Cultural Legacy. In this chapter, Crystal reviews the cultural legacies of the colonial era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nglish became th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a myriad of growth areas that impacted the world. Crystal's research explains why English is so dominant in influencing the world's cultures toda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nglish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for official meetings and correspondence. Crystal notes that of the 12,5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sted in the 1995-6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Yearbook*, about 85% used English as at least one of its official languages (p.79). Associations as diverse as the Baltic Marine Biologists, the African Hockey Federation, the Asian Buddhist Conference for Peace, and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Fish Pathology use only English. English is even the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protests:

Whatever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protesters, they know that their cause will gain maximum impact if it is express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English. A famous instance of this occurred a few years ago in India, where a march supporting Hindi and opposing English was seen on world television: most of the banners were in Hindi, but one astute marcher carried a prominent sign which read 'Death to English'-- thereby enabling the voice of his group to reach much further around the world than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possible. (p.82)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has been dominated by English especial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s leading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are published in English. The newspapers with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in the world include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e Times of London*,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addition, approximately 70-80%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re published entirely in English (p.85).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is also predominantly in English. As international markets have grown, one of the most noticeable glob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use of English is in advertisements on posters, billboards, shop signs, etc. Product names such as Coca-Cola, Ford, and Kodak are recognized universally.

Radio and T.V. broadcasting had their origins in Britain and the U.S.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d the Voice of America produce well over 1,000 hours of radio broadcasts a week (p.89).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estimate statistics on how many dedicated listeners these broadcasts (and others similar to them) have, English is certainly the most common language on the radio airwaves. The growth of the T.V. industry, especially in the U.S., has brought many American programs into the hom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for good or ill).

The movie industry had its roots in Europe but soon switched its cen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dustry has grown enormously from the tim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lready by 1915 had its center in Hollywood, California. Despite the growth of the film industry in other countries, English- language movies still dominate. According to a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5 review, the U.S.

controlled about 85% of the world film market, with Hollywood films dominating box offices in most countries (p.91).

Popular music worldwide has been dominated by English songs ever since the invention of recording devices. Many people make their first contact with English through popular music.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many countries, the lyrics of English songs have become a symbol of freedom, rebellion and modernism. According to the 1990 edition of *The Penguin Encyclopedia of Popular Music*, of the 557 pop groups, 99% worked entirely or predominantly in English; of the 1,219 solo vocalists, 95% sang in English (p.94). However, Crystal is correct in admitting that such monolingualism in music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 good thing.

The huge increase in world air travel in recent decades has increased the nee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of various nations. In tourist spots around the world, shop signs and restaurant menus are often written in English. Many major cities have now installed English road signs. The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travel and transportation has also increased the use of English as the world's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safety. Safety instructions on international flights and information about emergency procedures in hotels are commonly in English alongside local languages. The main language used by pilots,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nd sailors is English..

English is now widely used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many countries. A leading motive for teaching cours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that so much of the world's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written in that language. English is naturally the language of choice for those wishing to access this knowledge. Th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rofession itself has expanded enormously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British council estimates that there are over one billion people currently learning English world-wide (p.103)!

Crystal then considers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for world communications. It is estimated, for example, that three-quarters of the world's mail is in English (p.105). The other major area of world communications is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was developed in the U.S. and English has been the dominant language on the Web from the beginning. Although some hav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a lack of English ability for many may further divide the world into the "haves" and "have nots", the

increasing use of other languages on the web can help to alleviate this problem.

Regarding the Internet, Crystal concludes that English was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For the immediate future, it is difficult to foresee any developments which could seriously reduce the stature of English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The biggest potential setback to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it has been said with more than a little irony, would have taken place a generation ago—if Bill Gates had grown up speaking Chinese. (p.112)

## Chapter Five

Chapter Five is called The Future of Global English. In this chapter, Crystal considers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that could undermine the role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Despite the massive evidence for the triumph cited in this book, he cautions that history often turns in unexpected directions:

But linguistic history shows us repeatedly that it is wise to be cautious, when making predic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a language. If, in the Middle Ages, you had dared to predict the death of Latin as 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people would have laughed in your face—as they wou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f you had suggested that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French could be a future norm of polite society. (p.113)

Crystal begins by citing examples of some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which have rejected English as a national language. Kenya, Tanzania, and Malaysia have all disestablished English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se nations, people have felt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ir colonizers has acted as an obstacle to asserting their own unique cultural identity.

He then describes the debat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over whether

English ought to be protected by law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land. In recent years many immigrant groups (especially Hispanics) have argued for b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in such things as government documents, medical prescriptions, and automobile driving tests. Bills have been proposed within the U.S. Congress that would establish English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bate over this controversial issue still continues in the U.S. today.

Crystal also reminds his readers that the number of speakers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s rapidly surpassing native speakers due to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world. Different varieties of English have emerged, as seen, for example,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fricans speaking the language as opposed to those who come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English could eventually fragment into a variety of mutually unintelligible languages as Latin did. However, the avail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T.V. programming and standard written English found in newspapers and textbooks lessens this possibility.

Finally, Crystal suggests that a World Standard Spoken English may emerge alongside local varieties. Whether such a standard develops or not, he feels that the emergence of 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 at this time in history is comparable to the notion of "critical mass" as understood in physics. The number of English speakers may now be so great that it may be impossible for any group to stop the language's growth. Crystal concludes:

If there is a critical mass,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language is a unique event, in evolutionary terms? It may be that English, in some shape or form, will find itself in the service of the world community for ever. (p.140)

## Conclusion

Crystal's informative work is a good, basic introduction to the topic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It is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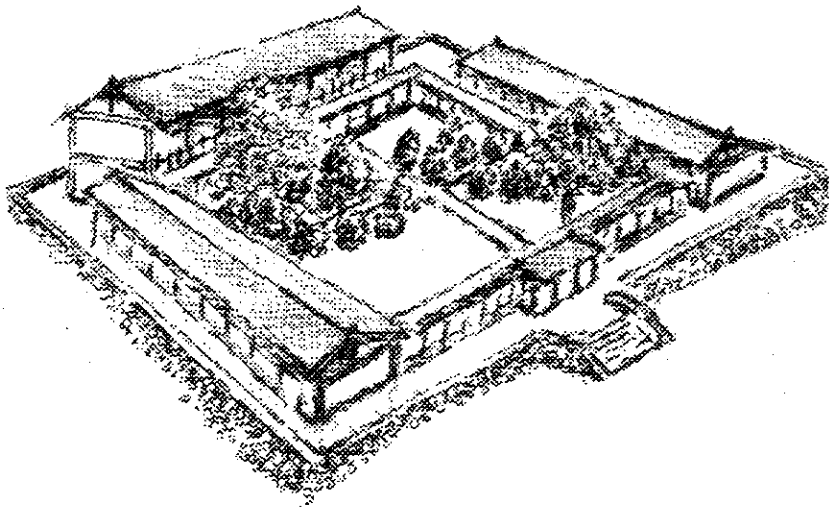
could easily be placed on a must-read list for anyone working in this field. With so many of us now either teaching or learning English, this book gives perspective in understanding how our endeavors fit into the broader schem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Crystal's clear style makes it no burden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topic to read through this book comfortably from cover to cover.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a general and readable survey,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remains one of the best books available on this topic.

A few minor drawbacks to the book may be noted. Crystal's work is filled with much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However, he has not footnoted his sources.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to follow up on the various topics to which he refers. For those doing research, this lack of sourcing may be somewhat frustrating.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he does not include a full bibliography but instead only gives a list of some books and journals for further reading. Although Crystal's book is a fine work, there are many items which he preferred not to deal with in greater detail. We may look forward to others who will undertake to writ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urvey of this fascinating subjec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ume 44*



*College of Arts  
Tunghai University  
July 2003*